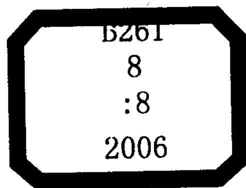
第八卷

# 艾思奇全書

人民出版社

第八卷

（1962—1965）




# 艾思奇全書



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外行与内行（1962.2）…………………………………………… 1
**历史唯物主义引言**（1962.3）…………………………………… 8
第一部分　怎样看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8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问题……………………………… 9
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问题 …………………………… 11
第二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哪些基本问题 ………………… 16
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 17
二、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规律问题 ………………………… 34
三、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 47
**关于“59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讨论的总结**
（1962.4） ………………………………………………… 51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 …………………………… 51
二、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规律的中心问题 …………… 54
三、关于掌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
规律问题 ……………………………………………… 59
四、关于革命和建设中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问题 …… 61
五、关于生产关系的内容问题 ………………………………… 64
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1962.9） ………… 70
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问题（1962.10）……………………… 96
**关于哲学教科书的一些问题**（1962.10）……………………… 99
一、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99

二、怎样使用哲学教科学…………………………………… 103
曲折前进是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1962）…………………… 112
**谈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1963.6）……… 120
一、正确解决了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 120
二、系统地解决了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问题……… 124
三、明确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 126
**略谈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
**对认识论学说的新发展**（1963.7）…………………………… 130
一、发挥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 131
二、揭示了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完成
的规律………………………………………………………… 132
三、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正确认识的
获得也是反复实践的过程…………………………… 135
四、提出了把正确认识交给广大群众的问题……………… 137
**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哲学思想**（1963.7）……………… 140
一、斯大林哲学著作的优点………………………………… 140
二、对斯大林哲学著作的批评不能无的放矢……………… 142
三、斯大林哲学思想的缺点和错误………………………… 144
四、公平地评价斯大林哲学思想…………………………… 145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1963.9）……………………… 146
**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1963.6、1964.6）……………………………………… 178
一、辩证法核心思想的发展………………………………… 178
二、辩证法三个规律的关系………………………………… 182
三、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183
四、哲学范畴和辩证法核心的关系………………………… 190

五、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 191
**《反杜林论》辅导报告**（1964.1、7）………………………… 197
第一次辅导（1964.1.22）……………………………… 197
一、《反杜林论》哲学篇的结构 ………………………… 198
二、学习《反杜林论》的意义…………………………… 212
三、辩证法的两章（量和质、否定之否定）的讲解…… 223
第二次辅导（1964.1.24）……………………………… 257
第三次辅导（1964.1.26）……………………………… 285
四、《反杜林论》中若干问题的解答 ……………………… 305
**关于《自然辩证法》中《〔札记和片断〕》讲解**
（1964.3）………………………………………………… 318
第一次讲解（1964.3.3）………………………………… 318
一、关于辩证法问题……………………………………… 319
第二次讲解（1964.3.5）………………………………… 345
二、关于辩证逻辑问题…………………………………… 345
第三次讲解（1964.3.6）………………………………… 368
三、关于认识论问题……………………………………… 368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
（1964.3）………………………………………………… 396
第一次辅导（1964.3.10）……………………………… 396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的意义和结构………… 397
二、第一封信（马克思给安能科夫）逐段讲解………… 403
第二次辅导（1964.3.12）……………………………… 433
三、第二至第十六封信的概略讲解……………………… 433
第三次辅导（1964.3.13）……………………………… 465
四、第十八封信（恩格斯给史密特）重点讲解………… 465

五、第十七封信、第十九至第二十一封信的概略讲解…… 486
**《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1964.4）…… 496
第一次讲课（1964.4.16）…… 496
一、毛主席为什么要写《实践论》、《矛盾论》？…… 497
二、毛主席这两篇著作所提出来的任务…… 515
第二次讲课（1964.4.17）…… 527
三、《实践论》的作用和意义…… 530
四、《矛盾论》的作用和意义…… 546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和他的哲学思想（1964.4）…… 566
**关于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布置**（1964.5）…… 582
一、关于学习的程序…… 582
二、关于学习的书目…… 585
三、关于学习的方法…… 594
四、关于学习中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602
**世界观问题**（1964.5）…… 607
第一次讲课（1964.5.25）…… 607
一、绪论——学习毛主席的世界观…… 608
二、《实践论》——学习毛主席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620
第二次讲课（1964.5.26）…… 643
三、《矛盾论》——学习毛主席的一分为二辩证法…… 676
第三次讲课（1964.5.27）…… 682
**略谈毛泽东对量变质变规律的贡献**（1964.6）…… 697

一、发挥了事物多方面的量和质的原理…………………… 698
二、提出了部分质变的原理……………………………………… 699
三、发展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 702
四、把量变质变规律具体化为工作方法原则……………… 706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辅导**（1964.7） …………… 709
第一次辅导（1964.7.9）………………………………………… 709
一、关于读这本书的方法问题………………………………… 710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713
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736
第二次辅导（1964.7.10） ……………………………………… 745
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745
五、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760
六、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 766
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1964.11） ……………… 775
**学习《实践论》辅导报告**（1964、1965）…………………… 789
一、两条认识路线………………………………………………… 789
二、认识依赖于实践……………………………………………… 793
三、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804
四、人类认识的总规律…………………………………………… 820
**学习《矛盾论》辅导报告**（1964、1965）…………………… 832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832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838

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845
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852
**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
**辩证法**（1965.5）……………………………………… 860
一、客观事物是“一分为二”，决不是“合二而一”的 ……… 861
二、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一分为二的，
而不是“合二而一”的………………………………… 867
三、不能把“合二而一”说成是辩证法的因素…………… 872
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1965.8）……… 877
**同日本哲学家船山信一的谈话**（1965.11） ……………… 881
一、关于矛盾、差异、对立的关系问题…………………… 881
二、关于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883
三、关于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问题……………………… 884
四、关于认识的辩证法问题………………………………… 885
**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几个时期**
（讲学提纲）（1965春、秋） …………………………… 886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三个五十年…………………… 887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阶段的特点………………… 890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 897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讲学提纲）（1965春、秋） …………………………… 903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 903
二、认识过程的两大飞跃…………………………………… 907
三、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913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
（讲学提纲）（1965春、秋） …………………………… 918

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920
二、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924
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925

**艾思奇生平年谱**………………………………………………… 929
**编后记**……………………………………………………………… 965

# 外行与内行

(1962.2)

读过汉朝历史书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汉高祖刘邦夺得了“天下”之后，曾向群臣询问：为什么他能够胜利，而项羽却失败了？王陵提出了一个答复，刘邦不同意，并讲出了自己的见解，说：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读曰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见《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刘邦把自己战胜项羽的原因，主要地归结为能够用人，这对不对，当然还有讨论的余地。但刘邦能用人，项羽不能用人，却是事实；而能用人与不能用人，作为两人之所以成功和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所谓能用人，就是说善于领导人。在楚汉战争时代，刘邦可以算得是一个最善于领导人的领袖人物，这主要是在于，他所能用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具有各种专长的，并且在这些专长方面都比他自己高明得多的，像张良、萧何、韩信这类的人。

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例子——历史上还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说明有这样一条规律：“外行领导内行”。在出谋定计，行政管理，带兵打仗等等具体业务方面，张良、萧何、韩信都是出人头地的“内行”，而刘邦和他们比较起来，则多少总是有些“外

行”。但“外行”的刘邦，却成为三个“内行”的领导者，而三个“内行”也曾经心悦诚服地遵从了这个外行的领导。不但如此，这条规律还关系到人们的共同事业的成败：由于遵循了这条规律，刘邦和张良、萧何、韩信都一起得到了胜利；由于违背了这条规律，项羽和范增一起遭到了失败。

凡是规律，都具有普遍的客观意义。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某种规律一定要发生作用。当人们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一项共同事业的时候，“外行领导内行”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不能把刘邦的历史故事看做全然过去了的陈迹，刘邦集团活动的目的和他们所实现的具体事业——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些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在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中起作用的某些普遍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事情，仍然有一定的意义。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有着更为高级的表现形式吧了。“外行领导内行”的规律，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个事业的伟大意义，它的内容之丰富和规模之宏大，都是刘邦和他的一批将相们的成就根本不能比拟的，虽然就古代的历史条件来说，那也算得是一桩够宏伟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着许许多多方面的斗争任务，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文艺的和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和技术科学的。为着实现这些任务，需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也需要推动各行各业熟习专门业务的人们来共同努力；这就是说，需要许多方面的“内行”。但重要的是，必须把千种万样的行业和业务适当地组织起来，把它们安排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轨道上，才能保证我们在工作和斗争中较顺利地克服困难和战胜敌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我们的共同任务。不如此，就会在我们的工作中

造成混乱，就会使我们的斗争遭受挫折和失败。这就是说，必须要使各行各业的人在一个共同的正确领导之下配合行动，而能否有这样的正确的领导，正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

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这需要做一点说明。这里所说的领导，不是指各种行业具体业务本身的指导。一个行业的具体业务，需要熟悉这一行业的人来加以指导，也就是需要“内行”的人来指导，例如工业的技术作业需要工程师的指导，农业的生产技术需要有经验的老农和农业科学技术人员的指导。没有这样的指导，业务的进行必然要遭受损失，因此这样的指导是丝毫也不能忽视的。但是，一定具体业务的指导，并不就等于领导。我们所说的领导，首先是政治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是要善于为我们的工作和斗争指出正确的路线和方向，善于把各行各业的工作和斗争引向这一个共同的路线和方向；是要善于解决各行各业之间以及每一行业内部经常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把人们的一切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我们共同事业上面。很容易了解，这样的领导任务，决不是一定具体业务的指导本身，能够担当起来的。一定具体业务的指导，只适用于各个行业的业务范围之内，这一个行业的业务指导，不可能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行业；而我们说的领导，却是一切行业的共同需要。要做好具体行业的业务的指导，只需要这一行业本身的专门知识；而要进行领导，就我们的事业来说，则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善于分析和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仅仅有某一行业的业务知识，是不能从事这样的领导的。这样的领导，只能是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才能具备上述的条件，并对我们共同事业中的各行各业给予正确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可以看做一种行业，要贯彻

这个领导，需要在这方面有经验有锻炼的人，也就是需要有领导工作上的“内行”。但党的领导的“内行”，并不就等于一定具体业务指导的“内行”。对于后者来说，它只能算是“外行”，而这个“外行”的领导却是任何一种行业都不能缺少的东西。为着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各行各业除了自己的具体业务的指导之外，还必须受到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每一个行业都会迷失道路和方向。这样，即使有着自己的“内行”的指导，也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很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正如有机体的各个器官的作用，必须通过神经系统的各个分支，受到脑脊髓即中枢神经的调节和控制，才能在整个有机体中正常地尽到它应尽的职能，同样，各行各业都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才能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很好地贡献它所应该贡献的一分力量。这就是“外行领导内行”这个客观规律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事业中的表现。

我们必须遵循“外行领导内行”这个规律。但这并不是说，在一定具体行业中从事党的领导工作的人，对于这个行业的业务根本不必加以学习和钻研，而可以满足于作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外行。这样来对待上述规律，也是完全错误的。熟悉自己所领导的工作中的业务，这是从事党的领导工作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因为党的领导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具体地加以贯彻。领导者必须了解他所领导的业务的特点，必须了解指导这个业务的专家们的特点，并善于在工作中和他们互相商量。完全不懂得具体业务的人，要想切实地做好领导工作，避免领导中的盲目性和错误，是很困难的。因此，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但应该在党的领导工作上是一个“内行”，而且应该力求在具体业务上也使自己成为一定程度的“内行”。忽视自己所领导的业务知识，不去努力学习掌握它，以

为有了某些一般的政治领导经验就可以自满自足的人，决不可能成为好的领导者。我们党经常号召党员们努力学习自己所不懂的业务。1949 年，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必须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新的东西。每一个从事领导工作的人，都必须坚决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但是，这个要求并不否定“外行领导内行”的规律。因为，第一，我们虽然必须要求党的领导工作者尽最大努力熟悉所领导的具体业务，但一般地说，不可能要求他们一定要每一个人都做到像这一行业的专家那样地“内行”。例如，不可能要求工业中党的领导者都能掌握象工程师一样多的专门技术知识。比起专家、工程师来，他们对业务总还是比较地外行，而这并不至于妨害他们从事领导工作。第二，熟悉具体业务虽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但领导工作的实质并不在于具体业务的指导（这主要是专家、工程师等人的任务），而是在于确定和掌握整个工作的路线和方向，正确解决各方面工作中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以推动整个工作的进步。它不是出自具体业务指导的本身，而是来自党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具体业务来说，它不是出自“内行”，而是来自“外行”。第三，一个党的领导者如果同时又具有专家的具体业务知识，这自然是一种很优越的条件，可以帮助他把领导工作做得很好。但他之所以能够把领导工作做好，首先还是在于他具有党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经验，而不是在于他具有和专家一样多的知识。一个专家，如果他没有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经验，他自然可以对具体业务进行很好的指导，但决不能做好领导工作。

这些就是我们必须坚持“外行领导内行”这个真理的理由。

我们反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有错误，不符合客观规律。有少数人提出这种说法是由于别有用心，资产阶级右派，曾经在1957年利用这种说法来反对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以此作为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种手法，这是必须坚决给予驳斥的。但也有一些人，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由于误解了“外行领导内行”这个规律，因此也表示加以反对。实际上，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对于这个规律的一种误解，并没有接触到这个规律的本身。因此，必须以正确的解释来消除这个误解。最容易发生的是这样的误解：即把“外行领导内行”误认为“外行代替内行”。正确的领导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善于使用各行各业的“内行”人物，为他们安排适当的条件，使他们各得其所，便于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专长能力。根据这个原则，领导者对于任何一种业务，都不容许采取包办代替的做法。包办代替的做法，对于各种“内行”的积极性，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使他们的专长能力不能正常发挥出来，甚至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造成“瞎指挥”的毛病，这是完全违背正确的领导原则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必须肯定“外行领导内行”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必须坚决反对外行代替内行的错误做法。当人们表示要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规律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他们的意见加以分析，如果他们所反对的实际上只是指的领导者对于各行业务的包办代替，那么，应该肯定这种反对意见有着对的一面，这一面是应该加以接受的。但必须指出，他们没有把一个客观的规律和一种错误的做法加以区别，没有注意到“外行领导内行”和外行代替内行完全是两回事情，反对前者虽然是对的，但反对后者却完全错了。

再引一个汉朝的故事来结束这篇短文。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说不知道。又问“一岁钱谷入几何？”

周勃又说不知道，惭愧得汗流浃背。又问陈平，陈平答说："这有人负责。"问"谁负责"？陈平说："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汉文帝说："如果都有人负责，你做宰相的干什么呢？"陈平答道："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汉纪五》）

这个故事说明，陈平是封建时代的一个较聪明的统治者，他比周勃更懂得作为一个宰相应该怎样对待在他所管辖之下的各部门的具体业务：每一项具体业务都应该有这一项专职的人去负责，居于总的领导地位的宰相，只应该总理其成，而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那些具体的职务。

（原载《新建设》1962年2月号）

# 历史唯物主义引言*

(1962.3)

现在正式讲历史唯物主义引言。主要讲两部分:一部分是怎么样看历史唯物主义;另一部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哪些基本问题。

这个引言怎么讲?我考虑了很久,历史唯物主义题目很多,如果每个题目都讲一段引言,实际上就等于每个题目都讲述一遍,时间又短,就会都讲不清楚,我们有本教科书,大家看看教科书就行了。这次讲引言就比较概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作一点解释,主要的还是结合实际,结合我们讨论中的问题来讲。

## 第一部分　怎样看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第一部分实际上是个帽子,引言的引言,要讲怎么看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比较少,只讲两点: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

* 这是艾思奇在1962年3月14、15、16日分三次给中央高级党校59班学员的讲课速记稿。我们按速记稿整理时,删去了讲《历史唯物主义引言》之前问题解答部分,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解答,我们并入其他相关的问题解答之中。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引言》,有其特点。我们尽可能保持原貌,只作少量的删节和文字加工。

##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在以前的教科书中都有了，但是不一定完全。现在这样提看是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的一个部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把握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的理论；把握研究各种社会科学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的理论。我觉得要下定义，这样下才接近全面。如果这个认识是对的，将来修改教科书时可以用，当然教科书不是从定义开始，也不是讲定义，但是定义是需要的。因为定义包括研究什么东西，它的对象，它的目的，它的基本方法，包括这些东西。

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这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这用不着解释，大家都了解，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从前所以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因为没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成唯物主义辩证法，然后运用到历史方面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思想推广到社会历史方面。只有马克思唯物主义者才能做到这点，以前的唯物主义没有做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叫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成为一个整个的、最完整的体系。因此，第二句话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的部分，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讲辩证法，如果在历史方面，在社会方面是唯心主义的，那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辩证法，比如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这些人的哲学，就已经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门里，但是到了历史唯物主义门前就

停住了，所以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要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只讲辩证唯物主义，不讲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在学术界有争论，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不是哲学。他还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不过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内是不对的。当然也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因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的部分。实际上，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反驳了，“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上面讲：“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过去唯物主义哲学就不是由整块钢铁铸成的，而是有缺口，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没有这个缺口的，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开。为什么不能分开？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哲学？有个理由，因为它是科学，但是它又有哲学的性质。本来辩证法也是科学，把哲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法的运用这点是科学，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有哲学的性质。为什么它有哲学的性质？为什么它叫哲学？凡是哲学就有这个特点，它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对世界一切问题总的了解，同时它又是科学研究各部门总的方法，不是具体的方法，是普遍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就有这个特点，它是人类社会、人类历史总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就

是要得到对人类社会总的认识。我们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普遍规律就是可以使我们得到总的观点。所以，从这点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因为它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认识这个普遍规律，对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就能把握总的观点。科学研究是研究客观世界某些方面的特殊规律，不是研究整个世界总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是要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不是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某些方面、某个部门的特殊规律的具体问题，就这点来说是哲学的性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用我们认识的普遍规律去把握总的方法，可以运用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总的研究方法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指导的。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问题。

## 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问题

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读一本书就算了，特别是不能单依靠教科书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问题，那样是不恰当的。我们发了一本教科书，那只是一个初稿，是试行本，没有公开印发。里面可能有毛病和错误，现在已经发现有个别地方是有错误的，也可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有错误，还要检查。所以，教科书只能作为参考书来读。

教科书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各方面的内容提纲挈领地写出来了，比较系统、完整。比起经典著作有一个好处，因为经典著作是针对一定的问题来提的，它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结合，所以，经典著作中讲到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时，往往是在某一本书或者某一篇文章中就着重讲一方面的问题。而教科书就是比较四平八稳的，哪一方面也不大着重，但是各方面又都讲

一些。这是教科书的缺点，也是它用来学习和参考的便利的方面。按照水平来说，它没有经典著作高。经典著作是高水平的，教科书只是一般学习水平，但是用来做参考还是必要的。我们学习时要用主要力量来研究经典著作。特别是在高级党校，我们不是一般的大学，所以要求还是着重研究经典著作。在学习计划中规定的有教科书，但那只是参考。大家可以钻研这样几本经典著作：《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这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时一本重要的书；另外，还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学习经典著作的方法，就是要学习经典著作的写作方法，不要学习写教科书的方法。我们写教科书是为了一般的参考，为了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纲领。但是，作为很专门的研究，作为认真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能学习写教科书的方法。就是什么都懂得一点，但是哪一方面都不深。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要像经典著作那样，就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最高的标准，就像毛主席那样的标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说明了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但它不像教科书那样说明各方面的问题，而是针对中国的实践问题，也可以说是概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经过仔细地研究写出了这篇大文章，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一般的同志写不出那么高水平的文章，但是我们要学习这种方法，努力学习毛主席写作的方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解决了一个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也是解决国家与革命的问题。《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将要爆发以前的经验，把有人类历史产生以来，国家产生之后，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所有国家问题都加以概括，指出

一般国家的性质。《叛徒考茨基》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这篇文章是《国家与革命》的补充，补充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国家的经验，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者作过几次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估计，只是比较抽象地讲无产阶级应该成为统治者。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作了总结，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提出来了。《国家与革命》是把这以前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加以综合。《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又把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作了概括，进一步阐明了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继《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之后，进一步总结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作了发挥，而着重对国家问题又有了新的发展。《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是研究国家是怎么产生的，最初在阶级社会里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选择这几本书作为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著作有一个线索，就是重点问题都是解决国家问题，这样就便利我们认识现在国家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在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了政权之后应该怎么办？这是大问题。因此，重点问题摆在这上面是有好处的。

这样一个布置，说明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要跟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要跟各种社会科学问题、各种人类历史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哲学，但是为了把哲学研究好，那么就要结合某些具体社会科学来研究，结合革命实践来研究。所以，我们读材料时要有重点。研究和解决国家问题时，要结合具体问题来作研究。每一

本经典著作本身没有什么连贯，但是你把它结合起来读，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重点问题。参考教科书可以使我们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在了解各方面问题的基础上，着重钻研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这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的第一点，就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要跟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要跟各种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跟人类历史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我们不能马上就要结合各方面的科学，所以，着重结合国家问题，附带地联系历史问题。《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研究人类历史的原则，又是研究国家问题的原则。结合理论问题、阶级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来进行研究就深一些，比单独学习教科书收益更大些。

另外一点，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批判。所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批判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实际上归根到底还是唯心主义，没有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真正唯物主义的，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问题上都是唯心主义。所以，在历史研究方面世界观的对立，归根结底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没有什么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机械唯物主义的对立。

历史机械唯物主义，就是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有一些机械论的观点，但归根结底是唯心主义的。苏联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他把历史发展看做是机械的力学关系，实际上就是均衡论的理论，用我们的话来说，叫做平衡论。他认为历史只有两种，就是由平衡到不平衡，又由不平衡到平衡，革命时期就是完全平衡被破坏了，革命结束之后，完全平衡又恢复了。平衡

和不平衡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样就把人类社会历史复杂的规律一笔都勾销了，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都简单化了，结果就是公式主义，归根结底是唯心主义。为什么说它是唯心主义呢？就是说只要有人考虑出一种办法，能够使各种社会力量平衡；那样社会就稳定了，布哈林就用这种观点解释当时的社会问题。他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使城市力量和乡村力量平衡起来。平衡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城市可以发展全民所有制企业，农村应该允许自由发展富农经济。他看不起中农、贫农，他认为只有发展富农经济才能够和城市工业平衡，如果是消灭富农，使全国生产力不平衡，苏联就要垮台，因此要根据平衡的原则，来解决苏联问题。这种原则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为了在农村保存资本主义作辩护，反映了富农思想，根本反对合作化。所以说，机械唯物论归根到底是唯心主义，因为他用主观原则来解决实际问题。另外一些机械唯物主义就更不用说了，像法国的唯物主义在社会问题上公开说：意志支配世界，等等。

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包括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要立就要有破，自己的立场站不稳，当然也不能破，也不能打倒错误的思想。但是，不在破当中立，这个立也不是很坚强的。锻炼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要跟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加以对比，不只是对比，还要斗争。一切正确的东西都要跟错误的东西互相比较，互相斗争，然后才能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要在战斗中研究。斗争、批判就是一种联系实际的方法。我们希望用这种方法学习，我们讲课时也尽量这样讲，在讲正面的东西时，批判反面的东西。我们搞的资料都是正确的东西，反面资料搞的很少，这是一个缺点，以前

我们没有注意，现在注意用一些反面材料。像国家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里面有一些修正主义观点可以利用一下。最近大家提了一点意见，我讲课时也要按照这个方向去作。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问题。

# 第二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哪些基本问题

教科书里讲了七八个题目，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些，那样问题太多了。我们这次的教科书比从前的教科书精简了一些，从前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包括的问题很多，有的包括民族问题、党的问题、战争问题，也有的把军事问题专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章。我们认为把这些题目当做历史唯物主义的专题未免有些勉强，因为有些不是一般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而是专门性的问题。民族问题的一般原理，在我们教科书里讲了一些，在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一部分中也讲了一些。把它当做专题研究，就变成专门的科学问题了，所以，这里我们没有作为专题来写。但是，这些问题也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要研究的问题。为了使我们的线索更清楚，我们把它概括得更简单一些，可以归纳成三个基本问题：

（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问题。

（二）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问题。什么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规定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矛盾，对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普遍起作用的矛盾。

（三）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教科书里所讲的许多问题，大体上可以归纳成这样三个问题。

下面就按照这三个方面结合实际，作一些一般的解释。

## 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把它作为第一个问题研究呢？因为它是规定哲学、历史观点根本倾向、根本路线的一个首要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哲学，它跟辩证唯物主义，跟一切哲学一样，最终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说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意识和存在哪一方面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一性的，还是存在是第一性呢？这个第一方面的问题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在历史唯物主义这方面也是一样，区别历史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路线，根本的标准也是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贯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列宁说是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就是说，从上到下，从头到尾都是唯物主义，无论是自然观还是历史观，都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按照唯物主义的标准来解决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把存在摆在第一位来看，对历史的理解，是把社会存在摆在第一位，把社会意识摆在第二位。自然观的根本问题，也是历史观的根本问题。这一点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曾指出过。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四章里面讲的很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就是它有彻底性，它把唯物主义贯穿在一切方面，首先是贯穿在历史方面，把存在摆在第一性来看，把意识摆在第二性来看。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时，也要把存在和意识问题当做第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区别历史观不同路线的根本标准。这个问题在一般哲学上是最根本的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里面也是最根本的问题。甚至在人类历史实

践方面，在实际工作里，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研究哲学的时候，学术界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究竟哲学的最根本问题，是一个还是两个？有的人主张哲学的根本问题应该是两个：一个是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一个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因此，讲哲学史时，有的人主张哲学应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也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斗争的历史。对这个问题，哲学界有争论。我觉得不能把两个问题并列起来，不能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存在和意识问题，一个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问题，这样两个问题不是并列的。

恩格斯说：思维与存在的问题，是哲学最高、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一般地讲根本问题，当然也可以说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也是一个根本问题。但是，如果说哪一个是最根本的问题，应该说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顶点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既然是第一个问题，就不能有两个，只能够有一个，就是存在和思维的问题。

我们研究某一个哲学派别时，首先用什么界限呢？首先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还是首先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应该肯定，首先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派别时，首先要问它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然后才问它是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不能够倒过来。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首先我们自己是站在唯物主义方面的，那么研究问题时，首先是唯物史观，还是首先是辩证法呢？首先要有唯物主义，然后辩证法才能起作用。如果首先不是唯物主义的，那么运用辩证法也就会落空。所以，第一个问题、最

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而这个区别最根本的标准又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中又是看思维与存在哪一方面是第一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教科书里就不采取有两个根本问题的说法。我们说哲学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历史观的问题也是这样，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我们首先看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因为我们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来看问题。当然，过去的历史观从来也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但是，在过去的哲学里，历史方面关于唯物主义思想的片断是有一些。片断的东西不能称为是唯物主义，而是在某一点上用物质的原因来说明历史的情况是有的。不但在外国哲学里有，中国哲学里也有。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很不完全，很容易变成唯心主义。整个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就某一点来说有一点唯物主义的因素，这种情况是有的。我们就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点因素。

马克思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法国的历史家曾经指出过：历史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这就说明他有一点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很重视这一点，就加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甚至这样来表彰他们的功劳：阶级斗争的观点不是我发明的。马克思是这样谦虚！本来建立真正系统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真正把阶级斗争问题解决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但是法国历史家提到这样一点初步的意见，就认为是他们发明的。不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实事求是的态度。谦虚就是实事求是，并不是虚伪的谦虚，因为事实上法国的历史家开始发现了初步的阶级斗争观点。

中国历史上的管子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就是说仓库里面充实了，然后才有可能讲礼义，还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冯友兰就用这句话来证明管子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整个来说，他不

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但在这一点上，他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这种片断的因素不但是管子有，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孟子也有，或者说有这种类似的片断。

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有时候他提到工具的作用。列宁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过去的历史观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只有类似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把意识和存在哪一方面是第一性的这个唯物主义的标准，彻底贯彻在历史研究的各方面，彻底地用这样一个根本观点来说明历史问题，就是说，社会存在总是起最后的、决定的作用，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经典作家列宁的一段话是比较典型的，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六章里比较典型地规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特点（上面已经念过了）。

历史唯心主义跟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相反，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一般哲学唯心主义里有两种唯心主义，在历史唯心主义里也有两种：有主观历史唯心主义，也有客观历史唯心主义。不过我们教科书上一般不这样讲，因为讲起来太噜唆了，在一般哲学问题中已经解决了，在历史问题中再讲就噜唆了。不过我们在学习时还可以指出：有的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有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性质。

客观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历史是由某种客观存在的意识、精神决定的。历史逃不出某一种精神原则。在这种原则下有各种说法：历史是由天命决定的，或者说历史是受某种道德原则决定的，这种道德的原则是客观决定的，不是人主观上随便想出来的，历史发展逃不过客观存在的道德原则，违反了这个原则，历史就要乱，合乎这个道德原则，历史就能够稳定，国家就能够太平。这

样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过去比较普遍。

我们读过贾谊的《过秦论》，这个人的思想大概是客观唯心主义，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混在一起。儒家思想是讲仁义道德、尧舜先王这些东西。道家不讲仁义道德，只讲一个道，德也讲一些，仁义就不一定讲。贾谊在自然观方面是道家思想，社会观方面也有道家思想。他有一篇文章叫《鹏鸟赋》，本来汉文帝把他找去作官，他的才能很高，汉文帝又想提拔他作宫卿。当他 26 岁的时候，皇帝提出来的问题，老大夫回答不出来的，他能够回答出来。汉文帝要提拔他，老家伙们就嫉妒，说他的坏话，说他想夺取政权，有很多标新立异的言论，不可重用。汉文帝这个人比较尊重老人的意见，听到这些话就相信，不仅不提拔他了，而且被贬到长沙去。他很失意，心情不愉快，在家里闷坐着。有一天忽然有一只鹏鸟飞到房里来就不走了。他很奇怪这个鸟飞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什么兆头？不知是吉是凶。就这件事情的感想写出了文章，这里面把他的世界观也写出来了，讲到他自己很失意，很苦闷，讲到天地万物变化无穷，很难了解，无非是由道在里面支配着。在这篇文章里有四句话："天地为炉，造化为公，（这里面就有唯心主义）阴阳为炭，万物为铜"。这四句话表明了他的自然观。是用一种比喻的方法来说明他的自然观。因为古代最大的工业是铸铜，所以他用铜来比喻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像大炉子一样，造物主在这里面熔化铜，自然界由此就千变万化，由石头变化成铜，由铜变成石头，变化莫测，福转化为祸，祸转化为福，变化无常。他认为变化的来源是造物主，所以还是唯心主义者。讲到历史问题就更明显了。贾谊《过秦论》的第一篇是讲秦朝发展和灭亡的历史，把历史作了扼要的刻画。这个文章写的很好，一两千字把整个历史说清楚了。按那个时候的标准来说是清楚的，但是按照我

们现在的说法就不清楚，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他根本不了解，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概括的。在概括了很多历史事实之后，最后一段就暴露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就是说，一个匹夫起来捣乱，一个宗庙就垮台了，自己也死了，这样会被人家笑话的。下面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他说为什么会垮台呢？是他不认识仁义的结果。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垮台的最后原因就是不认识仁义。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就是历史发展稳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没有仁义，没有仁义，历史就要被破坏，一个国家没有仁义就要垮台，有仁义就可以发展。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文章写的很好，结论也很有力量，把历史作了很好的概括，几百年的事一两千字就说清楚了，最后两句话就把原因找出来了。就文章本身来说，很有力量，写的很好，但是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不认识仁义就要垮台，那么，秦朝在很发展的时候是不是就很有仁义呢？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他就站不住脚了，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是典型的。

中国旧的历史学家主要是儒家，儒家的历史观主要是把仁义道德的客观标准，作为确定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的最根本的原因。比如，王阳明也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王阳明讲仁义，那个仁义是从内心主观产生的，并不是历史上有客观仁义道德的原则。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在自然观方面来说是唯物主义的。孙文学说是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对自然界阴阳五行的观点一点也没有。中国过去的哲学家，一直到康有为、谭嗣同，阴阳五行的思想都没有断，旧唯物主义者都讲阴阳五行。孙中山的世界观里就没有

这种东西，基本上是概括了现代科学，根据现代科学来说明自然界的发展，说明世界是由无生物变成有生物，产生了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自然方面的唯物主义思想比较明显。资产阶级哲学里，有近代唯物主义思想的，以孙中山为代表。“五四”运动之后，资产阶级都跟着欧洲主观主义走，有的是马赫主义，有的是实用主义，有的是贝克莱主义，只有孙中山带有十七八世纪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他的历史观又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民生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孙中山的宇宙观和我们不同，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唯心论的，或者说是二元论。那个时候毛主席先说他是唯心主义的，后说二元论。现在我们说孙中山是唯心主义的，不是二元论。

学术界有的人对毛主席的说法有误会，以为毛主席说孙中山的哲学整个都是唯心主义的，或者是二元论的。我看毛主席的话不能这样理解，毛主席并没有说孙中山的宇宙观就是唯心主义，而是说他的民生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或者是二元论的。毛主席并没有讲孙中山的自然观，所以，我现在说孙中山是近代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并不跟毛主席的观点冲突。他的民生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这是很明显的，随便提几句话就可以证明。在《孙文学说·绪论》里说：心是万事之源。这句话是唯心主义的。这句话不是指自然界的，而是指历史观点，如果包括自然观在内，那么从自然观到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

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思想哪一方面摆在第一位，王阳明说人的知识是第一位的，行是第二位的。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识之成”。他的宇宙观是良知学说。王阳明所说的“知”与孙中山的“心”有所不同。孙中山的“心”有一些客观意思，群众的心，人

民的心，他已注意到了。王阳明是讲人主观的心。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孙中山的话可以解释成唯心主义的。在《孙文学说》里讲到建立人类社会的原则是什么，他回答这个问题说：建立人类社会的原则是互相帮助，人类生活的特点是能够互助。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反映。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发展依靠生存竞争。孙中山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方面是唯物主义的。但是，讲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则，他认为是互助，因此解决社会问题强调互助的原则。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上的病态现象，他用互助论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就用唯心主义的互助原则来解释历史，所以这种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孙中山不是专研究哲学的，他的思想有些混乱，基本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王阳明是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

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在我们实际工作里也有，毛主席的著作里首先批评的以感想代政策的主观唯心主义。我们的错误有很多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可以说教条主义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好像有一个框子规定了我们一切的工作。以感想代政策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这几年来有很多口号是主观主义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主观唯心主义，不但是唯心主义，而且是主观唯心主义，“不怕想不到，只怕做不到”，“没有低产的土地，只有低产的思想”，这种观点毛主席概括为主观主义，这里包括主观唯心主义，也包括教条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比较多，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可以考虑。我看这与我们掌握了政权有关系，有了政权，作了首长，做事情比较随便，自己想搞什么就搞什么，有一个时期，人好像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不顾后果，因此，有了政权后特别要注意。邓小平同志讲，有了政权特别容易产生主观唯心主义。没有政权时，我们在

工作中遇到的抵抗力很大，因为有敌人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敌人被打倒了。我们掌握了政权，抵抗力就不那么大了。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就有一种为所欲为的错误，再加上骄傲自满，就会助长主观唯心主义。这样解释是不是对？大家可以考虑。

在苏联也有这个问题。不仅是在工作中有，而且经济学家已经把它理论化了，斯大林在经济学上也批评了主观唯心主义。斯大林在他死的前一年发现了这个问题，保卫了列宁主义，反对了经济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那以后受批判的经济学家要翻案，说斯大林对科学粗暴，把经济学的著作一笔抹杀。看起来，斯大林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而赫鲁晓夫又在搞主观唯心主义，在农业上搞瞎指挥。苏联的瞎指挥是赫鲁晓夫亲自主持的，他领导着瞎指挥。他吹牛说 62 年的生产可以赶上美国，现在 62 年到了，农业生产还是斯大林活着时候的水平。过去说要搞草田轮作制，现在草田轮作制搞的差不多了，又责备农学家搞错了，要取消这个东西，然后种玉米，结果长出来的玉米人没有办法吃，乌克兰北部种的玉米只能长杆子喂牛吃。他们从最高领导起都在搞瞎指挥，而我们的领导是实事求是的，发现了瞎指挥就要纠正。现在我们讲因地制宜。现在赫鲁晓夫这样搞，我看一定要垮台。

所以说，主观主义唯心史观是会发展的，这次中央会议上也说，有了政权后要特别谨慎。少奇同志说：我们要注意，不要有了政权后就为所欲为。所以，现在批判主观主义的唯心史观有很大的意义。

有了政权之后，主观唯心主义容易发展，这样的提法是不是合适，大家可以考虑。有了政权如果不注意，就容易发生主观唯心主义。苏联有，中国现在看起来也有。中国这两年提的一些口号，虽然没有像苏联经济学家那样理论化，但是已经在向理论上

上升，如果不批判它就会变成理论，而且个别地方已经成为理论，在58年底湖北就有这样的理论：规律是可以改造的。那时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就有人要把斯大林提出的原则推翻。据说有人写文章主张规律可以改变。所以说，个别地方已经形成了理论，如果不谨慎，有了政权会产生主观唯心主义。现在苏联从最高领导起是主观唯心主义。

有些高指标我们领导上也同意了，不过这要分析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跟各部门、各级商量的时候，领导上带着商量的口气说这个数目字是不是也很好，结果新闻界就去发表了。甚至公开写文章说：毛主席是怎么怎么说的。这些话是类似科学的假设。一个领导对农村的看法，在没有直接的、长期的蹲在一个点以前，就要根据汇报来判断问题，根据汇报来商量提出指标，这样一些数字，新闻界就拿出去公布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不在领导方面，因为那是在商量问题。而且是在商量中发现高了就要批评。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些高指标看起来是领导上提出来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下面的材料送上来了，提出了很高的指标，看情况很好，领导上也就同意了这种高指标。但是在同意的时候还是压低了。比如1958年的钢铁翻一番的指标，中央是同意了，但还是压低了，原来提1959年2000万吨，1960年3000万吨，毛主席在郑州会议时就批评了。批评之后的指标还是高了，由2000万降到1300万吨还是高了，但领导上还是把最浮夸的指标压下去了。像这种情况不能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它的路线是唯物主义的，是在不断地跟主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同意的，所以，我们的最高领导还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的，尽管受到很严重的抵抗，但思想上坚决向实事求是方面走。尽管一时群众还不清楚，尽管批评后的指标还是高的，但思想状态不是主观唯心主义。毛主席说：经

济工作者经常是倾盆大雨，搞很多材料来逼着我决定，有时是迫不及待的，不能不马上作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考虑的时间短，可能发生一些偏差，发现之后就提出批评，这就不能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我看，如果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恐怕也只能够作到这样。列宁说他自己犯过错误，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写文章说：我们在经济上犯了很多错误，这里包括有列宁的错误，但不能说列宁犯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至于下面犯的错误，也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也要分别对待。比如河南、安徽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是，有些虽然是犯了错误，甚至还相当严重，而他的思想方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坚持实事求是的人还是有的，公社领导，县的领导，起来批判主观唯心主义错误的还是有的。所以，也不能一律简单化地说：最高领导没有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都在下面，这样的说法也不好。这种简单化的方法，我们现在很容易采取，因而要接受教训，任何问题都要具体分析，谁有主观唯心主义，谁没有主观唯心主义，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简单划线的办法。少奇同志讲到成绩究竟是不是三七开的问题时，他说也要看情况，有的多，有的少，有多少算多少，各地要分别情况对待。

现在我们来讲，为什么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真理，把社会意识当做第一性，社会存在当做第二性是错误的呢？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因为真理要论证，要证明。我看理由有三条：

（1）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里说：人类不能任意选择他的生产条件，人只能够在现成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来活动。人在做某一件事情以前，在考虑某种问题以前，他的社会存在早已

经形成了，他只能够在已经形成的社会存在、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来行动和思考，不能任意选择自己的条件。这就是说，社会存在在社会意识以前就已经有了，不是意识在存在以前，不是社会意识在先，而是社会存在在先。人不能够希望任意选择自己活动的条件，如果这样做了就要碰钉子。如果希望自己周围生存的条件按照自己主观愿望去转变，就一定要碰钉子。我们现有的生产力，在城市有工业，在农村有农业，农业生产是手工劳动，在这个基础上工作，我们的工作只能适合这个条件。如果希望任意改变这个条件，或者很快地改变这个条件，就要碰钉子。所以，说什么苦战三年根本改变河南面目，苦战三年根本改变中国面目，这些都是唯心主义，就想随便苦战一下，几个月不睡觉，世界就变了，像神话上说的一样。这就是想随意选择自己的生产条件。农业六十条本来说：12 年达到 4、5、8。他就提出两年达到 4、5、8。主观地规定生产指标，一定会碰钉子，而且现在证明已经碰钉子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农村生产力是手工业的，就只能有集体所有制，一定要实现全民所有制，就一定要碰钉子。两年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煽动性的口号，范梁提出这个口号传到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这是作诗，要陈伯达调查，并作了批评。河南说：两年做不到，我三年做到。这些都是凭主观愿望任意选择自己活动的条件，一定要碰钉子。碰了钉子后就证明历史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而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包括生产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存在条件、整个历史存在条件，是在人类意识产生以前就存在的。

（2）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只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不是相反。社会存在不是社会意识的表现，而是相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正

确的意识也就是社会存在的正确反映。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说:“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3页)社会意识只能反映社会存在,而且只能反映一部分,连马克思这样了不起的人物也不能反映全部,70个马克思也不能把全部错综复杂的变化都反映出来,最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找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意识只能反映最基本的一部分客观存在,所以,不能说我们思想里有一些缺点和认识不完全的东西,就说是主观唯心主义。认识不完全不一定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甚至有一部分错误缺点,也不一定是主观唯心主义,主要是看他能不能把握基本的东西。把基本的东西找到了,就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我们讲唯物主义,不能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那样浮夸,认为唯物主义者能够把世界上的一切真理一下都认识干净。旧唯物主义者是有这种幻想和错觉的。实际上旧唯物主义世界观有很多是不完全的而且有错误的,比如,古代唯物主义的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这里面有唯心主义的解释,有唯物主义的解释。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你说它完全正确,我看并不完全正确,而且很大部分是不正确的。“阴阳五行”这个概念就不正确,就没有什么五行,五个行星是有的,但如果说一切事情都是由五个行星变化的,就没有这样的事,因为科学能够证明这个问题。人的五脏是五行;肺是金,肝是木,肾是水,胃是土,心是火,这个理论是唯物主义的,但很大程度上是荒谬的,不正确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它是唯物主义的呢?因为它的方向、路线是唯物主义的,它不用物质之外的原因来说明世界,而用物质作为根本原因来说明世界,因此它的方向是向真理、向实事求是方面走的,它是要努力去揭

露自然界的真面目，用五行去概括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而不用精神的原因去说明，因此，它的方向是唯物主义的，而且不完全是错误的，它的确概括了规律和经验。概括的形式是荒谬的，但是它的内容有些是有客观真理的性质。我问了一下中医，为什么说脾胃是土？他说：土生万物，而脾胃能够把吃下的东西供应到全身。这种观点跟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如果是吃不下饭，是脾胃弱了，就像我们种地一样，地力弱了，看来他是把握了客观规律。所谓人的意识是正确的，也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了客观规律。任何一种错误的意识也是反映了客观存在，不过是歪曲的反映，五行思想有错误，就是简单地反映了一些东西，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来源的，不是主观自生的。

社会意识的来源是社会存在，我们一切的经验都能够证明这一点。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共同生活的条件决定共同的意识，不一定不同的阶级才有不同的意识，同一个阶级，条件不同也有不同的意识。同样是无产阶级，但条件不同，有贵族工人，有一般工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什么人都是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有各种不同的条件，人民里有各种各样阶级和阶层的分别，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全民的国家。因为没有什么全民的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意识也是各种各样的。从斯大林起一直在说什么正义上、道义上的一致，好像就没有矛盾了，并不是这样的情况。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共同的思想，统一的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这是高薪阶层为了掩盖自己跟人民利益的矛盾而制造的片面的理论。这种片面的理论也是高薪阶层物质利益的反映。

（3）人的意识只能够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社会存在的规律性。这一点是在这次中央会议之后应该加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

以前总是讲：存在在先，意识在后，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过去的教科书中讲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一般只讲这两点，我想现在应该加上一条：人的意识只能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社会存在的规律性。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有这样的提法：由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是一个过程，从人的主观方面来说，就是由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意识反映存在，但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反映的，而要有一个过程，存在走在前面，意识在后，经过一定的时间，这个意识才能够反映存在。认识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首先是存在，然后是实践，实践当中得到感性认识，经过一定的过程，然后概括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这个时候才能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认识规律，就要被必然性所支配，只能够停滞在盲目性的阶段。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虽然是一个很平常的道理，是一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引申，但是运用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应该说是一个发展。因为恩格斯说：我们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由必然的王国飞跃到自由的王国。恩格斯这样的提法是对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盲目性所支配，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进入自由的王国。但是，恩格斯那个时候没有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他没有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这时我们的社会意识还是要经过由必然飞跃到自由的王国，而且要有一个过程。以前的解释恩格斯好像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我们是被必然的王国所支配和限制，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完全变成自由的王国了。以前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讲法，我也是这样的讲法，好像一进入社会主义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什么事情都好解决了。这是一种幼稚的思想。很多青年在刚解放时也有这种思想，认为解

放之后什么都自由了，因此对苏联产生了迷信，认为苏联人说的话一定不会有问题，斯大林说的话一句都不会错。有的人有这种想法：因为苏联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因此我们就接受苏联的经验，有这种教条主义。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况，比如“二十大”的报告出来之后，我讲课时引证“二十大”的东西，就没有一点怀疑。“二十大”的文件刚一发表的时候，中央的意思还不知道，就在一次讲课时说“二十大”所提出的几条都是对的，对苏联有迷信，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比我们多搞几十年，而且中央决议是经过反复讨论的，这不会有错，至少是要相信。反对斯大林的问题，有一个时期半信半疑。可是又有这样的想法：要相信苏联领袖。这就是不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由必然到自由要经过一个过程。毛主席就很了不起，从来没有迷信过斯大林和苏联，开始我们不知道，以后才知道原来毛主席对斯大林那里来的东西也是批判地接受。“二十大”一开始，就对和平过渡的问题表示了不同意。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能不能这样快的发展，我想恐怕不可能。当然还有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但是，如果是没有毛主席，我们对修正主义的认识不会这样快。认识，总是要认识的，因为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党总是革命的，修正主义暴露到一定的程度，总是能被人民认清的。跟着苏联跑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些人写信给我们，像捷克的工人写信来表示不满意他们的党跟着苏联跑，明确地指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而且明确地说：希望在中国。他说：希望就在非常好地运用了马列主义的毛主席的身上。

认识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有了政权之后，不要以为可以随便自由了，我们就不会在必然性面前碰钉子了，可以为所欲为了。“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口号。它的错误有两点：一点是把想到放在前面，想

是第一，做是第二，这是主观主义的。另一个错误是不懂得应该先做到，然后再想到，要先做一个过程，然后才能想，在事实上也是先要做到，然后才能想到。这个话说起来好像不符合普通人的想法，平常在做以前总是要先想一想，然后再做。可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应该是先做到，然后再想到，想到之后再进一步做到，不做到就能够想到，这是很奇怪的。人的认识过程是这样：在做的开始阶段，对事情并不曾想到（这里所说的想到，是说理性认识）客观规律、事情的发展，要做一个时期才能想到，最初的时候人不会想到自己做的后果怎么样，做的时候有了认识，但那是感性认识。人不会一点认识没有就去做，一做就有认识，这个认识不是想到的，是感觉到的。做以前看到是有，做到就能够看到，但是不能够想到。所以，要先做一段，有了一些感性认识，然后才能想到客观规律，真正想到之后然后再做，用所想到的再去指导行动，然后才能进一步做到。这是社会存在第一，意识第二这个原则的具体化。我们对客观规律必然会想到它，但是要做一下之后才想到。开始的时候往往用旧方法来想，或者对所做的事有一个模糊的想法，比较不完全的想法，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这种想法也不是一下就想到的。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问题就讲这些。除了上面讲的三点之外，再加上一点：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社会意识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就能对社会存在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上这一点，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意识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区别。大体上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够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落后的社会意识中，错误更多，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歪曲的，其中错误是主要的。在落后意识中，是不是也还有正确的东西？还可以研究一下，有些落后思想是不是也把某些情况反映

出来了？一般来讲，落后意识总是对社会存在有一些歪曲，因此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总是比较正确的反映客观存在，其中正确的东西是主要的。比如，孙中山的思想，在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他的思想主要是正确的。虽然他有很多错误的方面，特别他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在当时主要是正确的东西，那么这种正确的意识就能够把历史推动。所以，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把几千年的皇帝统治打倒了。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这一点，在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也讲到了。列宁说："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把握经济进化（社会存在的进化）这个客观逻辑的一切主要之点，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3页）要使我们的意识去反映客观存在的一切主要之点，这是人类最高的任务。过去的人类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恐怕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虽然不可能把经济进化、社会存在进化的全部一切都把握住，但是可以把握一切主要之点，这也很不容易，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达到了最高目的。

这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教科书里已经有了，但不完全，将来修改后再补充。

## 二、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规律问题

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我们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仅仅是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最起码的原则。这个问题要具体运用到社会历史上，就需要作许多具体的分析。真

正的要解决问题，就要根据这个原则对社会历史的各方面作具体的分析，如果没有这个分析就不能解决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也建立不起来。

要对历史社会作具体的分析，最主要的就是分析人类社会历史里面的基本矛盾，首先要揭发基本矛盾，或者说，首先要具体地弄清楚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就是要把什么是社会存在和什么是社会意识作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面所讲的就是最起码的公式，这个问题也必须要先讲，把历史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原则树立起来，但是讲这个原则还不是很具体的研究历史，只是把历史最起码的原则讲一讲。这些问题的内容比较贫乏，联系实际也不容易犯错误，只是把一些错误的例子举出来说明违背哪些原则，也不会有大的争论。

当然，也会有一些小的争论，比如，是不是一切错误都是唯心主义？都是主观和客观的分离？我认为有些错误不一定是唯心主义，因为错误和正确不能孤立的来看，要看它在认识过程中占什么地位，要从运动中看，在发展过程中起的作用不同，它的意义就不同。它可以起主观唯心主义的作用，也可以仅仅是一种暂时的，部分的主观和客观的分离，但是不起主观唯心主义的作用，相反它还是起开路的作用。这对科学研究有利，即使是真理的认识有时也会有错误，因为它有片面性。比如牛顿证明光学是离子，牛顿以后有人提出光学是波动不是离子，牛顿就错了，但是电子学说发明以后，又证明波动是片面的，光是由波动和离子形成的。所以，错误的片面性在认识过程中可以起作用，为了追求真理有时可以冒错误的危险，错误是必经的。这个问题可以有争论，可是争论不多。但是涉及到具体分析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

意识，这个争论就很多了，要准备反复辩论，我们多用一点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所讲的很可能有错误，希望大家在讨论中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

首先，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这个问题稍微具体点就有争论。可以有这样两种意见：

①社会存在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说，社会存在就是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只限于经济，经济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仅仅是生产关系，其他如政治、法律、思想意识等都叫社会意识。这是一种意见。

②社会存在是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仅仅是意识形态。

这两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考虑，我看后一种意见对。因为这个意见比较符合于经典著作的提法。我们先引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这是毛主席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一种基本提法。为什么说是基本提法呢？在毛主席说了这段话以后，经济学家引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前后对起来解决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问题。讲社会存在就是指政治和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和经济都是社会存在，意识是反映社会存在的，而意识对社会存在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我们的教科书的最后也引证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的一段话："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

筑所赖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经济结构，就是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是政治、法律、上层建筑赖以树立起来的基础，然后就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它相适应。社会意识一方面是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经济基础、政治法律，是跟社会意识形态分开的，所以，意识与经济基础、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相适应。用毛主席的说法就是：社会意识与经济基础、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相适应，它反映这个存在，又对它起伟大的影响作用。这些话都是很明确地具体分析了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这个问题。这样讲是不是妥当可以研究一下。

也可以根据另外的理由来不同意这个意见，根据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有一个提法，他的提法是：经济基础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然后社会意识又创造了某种政治法律制度。这个公式是：基础——社会意识——政治法律结构。这个提法跟马克思的提法不同，马克思的提法是：经济基础——政治法律制度，然后社会意识形态与这些东西相适应。有一些搞社会科学的人根据斯大林的提法就这样了解，社会存在就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上面就是社会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又产生一个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都是属于社会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因为它跟着意识形态来的，所以它也是意识形态。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搞理论的人是相信这个提法的，认为斯大林的著作是后出的，他可能概括了更新的经验，改正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不很确切的东西，因此对原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的提法就忘记了。

过去我也有这种想法，最近一二年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毛主席的提法比较妥当，意识和存在的关系具体的说，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大体上有三方面：首先是研究经济基础的变化规律；第二是经济基础如何规定政治法律和上层建筑；第三是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如何反映到意识形态方面，又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矛盾问题。最后还要研究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研究经济基础、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的相互变化发展的规律，如何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这样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有系统性了。

下面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经济基础的变化规律。所谓经济基础的变化规律是讲一切社会经济变化的普遍规律，不是讲某一个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律。研究各个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经济学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比较普遍的规律。

要研究这个普遍的变化规律，主要的是要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经济基础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影响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所以第一个基本矛盾问题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其次就是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相互关系问题。经济基础怎样规定了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制度怎样反映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如何对它们起伟大的影响和作用。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经济基础规定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又反映到意识形态方面。上层建筑一方面属于社会存在，一方面又属于社会意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各种问题中最复杂的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我们写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最多的篇幅是分析这个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复杂性比较少一些。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基本矛盾，所

以首先弄清楚这个矛盾问题，然后才能弄清楚其他问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第二个基本矛盾。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主要是抓住这两个基本矛盾。这两个矛盾是一切人类社会任何一个阶段普遍起决定作用的基本矛盾。

基本矛盾的意思就是：它是比较普遍的对各方面都起决定作用的这样一种矛盾。社会历史有两类基本矛盾：首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其次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个思想是在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我们才清楚的，以前是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决定社会基本矛盾的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至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作为基本矛盾来看。现在看来不应该这样考虑。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分析、研究这两个基本矛盾问题。这两个基本矛盾分析的清楚，问题解决的正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也就能把握、能认识。

现在我们就分别讲一下这两个基本矛盾。

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基本矛盾、决定一切社会形式的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分析这个矛盾，一切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个矛盾运动的表现。

这个矛盾的内容是什么呢？这里想先简单的讲一下，所谓矛盾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互相依赖互相排斥，又统一又斗争，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怎么了解呢？也是这样了解：一方面要了解它的同一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个相互依赖就是：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是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形式，总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所依赖；另一方面，生产力又对生产关系有所依赖，生产

力的发展需要跟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是相互依赖。但是又有相互排斥的方面，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差别的，差别就是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有所不同，生产关系总是比较缓慢的，生产力的发展总是比较迅速一些，所以生产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处于相对的静止。当然，生产力也有相对静止的时候，但是比较少一些，生产力也有它的不同阶段，但是它更活泼一些。所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常有不适合的地方，或者基本不适合，或者某一方面不适合，这样就跟生产力有所矛盾，就有排斥，就有斗争。或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名词来说，就是生产关系在不适合这些方面时，总是障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生产力就是斗争，就是排斥。这个斗争不仅表现在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生产力一定要突破生产关系的阻碍，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这个规律，是这个基本矛盾规律的核心。生产关系总是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它不能长久的不适合，可是总不能完全适合，在不适合的时候又要改正，这样就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这个运动就影响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抽象的原则，可以讲的很简单，只要讲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就行了，我们抓住这个中心是很重要的，是有现实意义的。

斯大林的著作特别强调这点，在理论上是有功劳的，他强调这个规律跟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有关系，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生活研究方面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必然王国变成自由王国，要对经济生活给予自觉的指导，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规律，中心问题就是要认识如何改变生产关系，使它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切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别

是经济工作的指导，中心问题就是要解决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性质的问题，说得复杂一点，就是如何去改变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能够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使它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做经济工作，研究经济问题，如果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个任务就会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经常注意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如有不适合就加以改变，这样在各种工作中，研究各种问题的时候头脑就比较清醒。

根据这几年的经验来看，我们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头脑不很清醒，不管适合不适合，乱搞生产关系问题，不仅在生产力方面瞎指挥，在处理生产关系上也有瞎指挥。苏联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害怕改变生产关系，使它适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不想去主动改变生产关系。苏联“二十二大”的共产主义纲领以及赫鲁晓夫的报告，都几乎没有讲到如何去改变苏联现有的生产关系问题，总是讲生产力的发展问题。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把经济学庸俗化，把经济学变成技术学，没有考虑到经济学主要的是处理生产关系问题，当然也涉及到生产力，主要的是解决生产关系如何变化、发展，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民主革命时期，1947 年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中，就说到我们的革命任务就是改变旧的、封建的、买办官僚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因为那种生产关系把生产力压着不能发展，这是在革命时期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也有这样的任务，根据这几年的经验，我们要注意经常调整生产关系，使它尽可能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旧社会的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性质完全不适合，或者基本不适合，因此要根本改变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这是革命时期的提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为生产关系大体上跟生产力的性质相

适合，因此我们的任务就不是根本改变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再这样提就“左”了。这几年，有许多人的脑子里就有这样的想法，强调不断革命论，没有注意到革命阶段论。有的人在理论上，在实际工作中想把生产关系很快的作根本改变，认为生产力需要解放了，把生产力估计的很高，认为很快就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调整问题，调整生产关系使它最大限度的适合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跟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就讲过：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强大的推动作用。这个话是对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使它尽可能的适合生产力的要求，是我们生产工作、经济工作中很大的问题。不能仅仅谈到技术，只谈到生产力，不谈生产关系方面，技术再好，生产关系搞不好，也没有办法使生产力发展起来。生产关系调整了，技术就会起作用了。

所以，在经济生活、经济工作中，正确的指导就能符合这个规律，错误的指导就违背这个规律。错误有“左”的，也有右的。一切错误的根源可以从各方面来，思想根源也可以从各方面来。所有的错误只要有路线性、系统性、方向性的就是主观主义，暂时的、部分的就不是。“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都是有主观片面性。但是片面不一定是主观主义，基本上全面了，就不能说是主观主义。当然，全面也只能说是基本上全面了，在现有的条件下大体上全面，就是正确了。我们所说的片面成为毛病的，就是比较大的片面性，就有主观性，坚持下去就是主观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是这样。但是还可以具体分析，对经济规律掌握不好，也就是错误的根源，不善于掌握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规律也是错误根源。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不敢根本改变生产关系，像陈独秀那样，害怕根本革命，怕得罪资产阶级。“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是由于对生产关系改变的要求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这样一种分析是不是适合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恐怕可以这样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有过右的思想错误，也有过“左”的冒险主义的错误。在1956年以前过渡时期，由于有右的错误思想，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个提法毛主席批判过，指出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因为新民主主义还是多种经济成分的制度，其中还有资本主义成分，是不是要使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长期和平共处？我们的任务是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不能提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是不敢或者不愿意根本改变生产关系。但是，那个时期“左”倾冒险主义也有，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搞起来以后，就发生“左”的倾向，希望一下子把资产阶级消灭，而且提出来对资产阶级采取剥夺的办法。这就是对生产关系改变的要求过早了，超过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后来中央给予了批评，并指出对资产阶级还要有统一战线，这种“左”的倾向就被制止了。

社会发展的第二个基本矛盾，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互依赖、相互排斥。上层建筑是基础的反映，上层建筑依赖基础，反过来上层建筑又对基础发生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基础又依赖上层建筑，总是相互联系又有斗争。上层建筑的变化总是落后于基础的，它反映基础、适应基础，可又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

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一般的都是这样，先是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然后形成政治运动，然后才有理论上、意识形态上的概括。我们学习世界史就有这样的问题，它讲无产阶级运动先有经济斗争，然后才有政治斗争。先有一些罢工，1824年前后开始有危机，危机中就开始有了比较大规模的经济斗争，那时已经有了英国的工联会的组织。再过几年，到了1830年才有政治运动，如法国的里昂暴动。政治运动虽然有政治思想指导，但是法国当时还没有有体系的政治思想，到了1844年才开始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才开始形成。所以，基础跟上层建筑的顺序是这样的。在具体问题中就复杂了，有时经济运动也有政治思想，有经济运动就有经济思想，有政治运动就有政治思想，但是，有体系的政治思想，必须在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时候才有。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在1848年以后才有。所以，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顺序，先有经济运动，再有政治运动，然后才有思想体系。思想体系形成以后，这个过程就倒过来了，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然后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然后就形成了无产阶级自觉的政治运动，才能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搞了几十年，才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革就是这样。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在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以后建立？这个过程不是违背存在决定意识吗？这个怀疑之所以产生是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整个变化过程割裂开来了，实际上要考察历史的过程必须从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这个规律是很清楚的。先有存在决定意识，然后上层建筑对基础起反作用，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规律。先是有经济变化，然后就形成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就推动新的思想意识的形成，这里有联系，又

有斗争，形成一个新的意识就要向旧的意识斗争，这是矛盾。有了新的意识形态，然后就反过来促进新的政治运动，这里也有新旧政治斗争，经过几十年的斗争，结果得到了革命运动的胜利，再进一步反映到基础上，这里也有经济方面的斗争，这种过程就很复杂。基础和上层建筑互相依赖、互相斗争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不但基础与上层建筑有矛盾，而且基础本身也有矛盾，上层建筑本身也有矛盾，这是很复杂的。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任何一个社会基础本身都是矛盾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基础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最清楚了，因为首先就有经济上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不同，所以修正主义就利用这一点说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政治上没有矛盾。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有矛盾的，工人和农民之间有矛盾，还有收入上的矛盾，高薪阶层与低薪阶层也有矛盾，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很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了。波兰有一个经济学家正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波兰虽是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但是有时有些地方跟苏联不一致，不过波兰的经济学家只是一般地讲社会主义社会有分配的不同，就形成了阶层的不同。基础本身就有矛盾，任何时代的经济基础都有矛盾，因此就反映到上层建筑里也有矛盾。

经济基础是一种经济关系，讲到关系就有不同的人的关系，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就是政治关系，就是政治上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阶级社会就有阶级斗争、阶级统治。不能把专政看成是单纯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反映经济基础的矛盾。这个政治关系是经济上阶级关系的集中表现。这种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反映到意识形态里面，又表现为思想关系，这个思想关系，有思想上的阶级斗争。

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的上层建筑，不是单纯的讲一种思想是某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理论界过去有这么一种想法，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只有一种思想，其他思想就不是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一种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不光能反映这个社会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不同的思想体系，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中有什么样的矛盾，有什么样的内容，在思想里也有什么样的矛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这样的话：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光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政治上层建筑有不同的思想，有统治思想，有被统治思想。所以经济基础方面有经济上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政治上也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到思想上也有统治思想和被统治思想的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统治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反映到思想上，无产阶级的思想也在资产阶级上层建筑中存在，但是它是被统治的。

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和政治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了，在经济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其中还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残余，这个残余包括在分配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包括农业的个体所有制。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残余的矛盾。要正视这些矛盾，只有这个矛盾肯定以后，才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有矛盾。所以，政治上必须要由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说国家是全民的国家，总要有一些人作为专政的对

象，有一些人代表资本主义残余，而这个残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实际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社会主义经济，这个反对就产生矛盾。这个矛盾可以有两种性质，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有一小部分需要用专政来解决。要肯定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里面也包括思想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我们在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要经常注意保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这不是很小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在政治上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又能保证无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就能对政治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就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思想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建设就能保证高速度的发展。高速度应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这就要靠上层建筑对它有经常的反映，也就是上层建筑要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统治。

如果上层建筑的统治关系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在思想上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占了主导地位，修正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就要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会变成全民的国家，再进一步就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发生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不能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就不能逐步发展为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就不能很好的调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它适合于生产力的需要。苏联就有这个问题。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对，大家可以考虑。

## 三、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这个题目也可以改为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人的问题，因为历史一方面是根据客观规律的发展，但是历史又是人的活动。所以历史科学跟自然科学不同，历史科学一定要研究人的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一定要有这样的体系：首先是解决社会存在和意识的关系，然后进一步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客观规律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规律，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律。然后再说明这些矛盾规律怎么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离开人的活动，历史的规律就不存在。规律性只是普遍真理，一切普遍真理都是通过具体事物来实现的。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历史的特殊性，就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最后就要研究人的活动问题。为什么要把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摆在最后一章，这也是客观规律。它不能摆在前面，说明客观规律不讲人的活动，历史的特点显不出来，所以，最后要讲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人的问题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的规律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人的活动力量就推动历史前进，所以，人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所有这些客观规律、历史规律，都和人的活动有关系，比如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首先是人的生产力，是劳动者的生产力。

怎么样给生产力下定义？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就有这个问题："一种商品，如果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其价值量也不变。但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随劳动生产力上的每一种变化而变化。"(《资本论》第1卷第12页）这段话可以给生产力做一个定义，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随劳动生产力上的每一种变化而变化，就是说，生产力在一定的劳动时间里面，劳动者能取得一定的物质财富，或者是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一定就有程度的不同，一定程度就有大小，这里就有劳动时间的限制。

生产力也就是人的生产力，以人的力量作动力。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什么是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关系就是阶级之间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就是阶级斗争的关系。思想关系也是人的思想斗争的关系。所以，人是历史活动的动力。这个动力有两种：一种是反动的动力；一种是先进的动力。反动的动力是指反动派，先进的动力是指革命的人。所以，如果不研究人的关系问题，只抽象的研究客观规律就不能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我们讲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的关系，着重就讲这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力，人民群众包括什么群众呢？主要的是劳动群众，劳动群众是人民的主体，劳动群众是社会发展一切力量的来源，劳动群众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

历史的发展如果很缓慢，处于停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找原因，归根结底可以从劳动群众这方面去找。在历史的过程中，劳动群众被压抑，不能翻身，生产力很低的时候，如封建社会没有农民暴动，劳动群众不活跃的时候，历史的发展就停顿；劳动群众活跃了，历史就发展，就前进一步。所以，劳动群众的积极活动，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劳动群众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劳动群众有不同的作用，只有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才能领导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才能解放自己。

另一方面，劳动群众的力量是需要组织，需要指导，才能发生作用的。劳动群众创造历史要经过集中，才能形成集体的力量。劳动群众不能自发地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组织自己的行动。这个组织作用，领导作用，集中起来就要归到杰出人物的作用。杰出人物在历史上起伟大的作用，这个作用是集中物质财富的力量，把它引导到某一个历史条件所允许的方向。封建时代的杰出人物能起一定的作用，汉武帝时，生产力很发展，物质财富就比较丰富，

在国内开辟土地，在国外与周围的不同民族发生联系，逐步组织了一个统一的大国，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武帝的领导起了进步的作用，当然破坏也很大，好的地方就是使历史推进了。这些作用在过去历史上是不自觉的。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我们是自觉地掌握这个规律，人民群众是主体。但是这个主体要加以领导集中，因此，党的作用，领袖的作用在一定的斗争中有决定性的作用。有没有英明的领袖，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没有人民群众也不行，没有物质条件也不行。但是有了这些条件，如果没有善于集中、善于组织、善于领导的人物出来，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过去任何伟大的领袖都没有这个自觉性，而我们就要发挥这个自觉性，这就是掌握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我们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很大的创造。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又分两方面，一方面要相信群众，依赖群众，这也反映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力这样一个规律，所以我们要相信他、依赖他。另一方面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需要领导，需要组织，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实践当中，就是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这样。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 关于“59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讨论的总结*

(1962.4)

我们今天结束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以前我讲了引言，现在再来讲结束语。有些问题再说一说我的意见。

首先，对这次学习中大家讨论的情况作一个估计。这次讨论得很好，主要的是大家都能结合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把理论方面的问题深入一步。和我讲的引言比较起来，大家讨论的内容丰富多了，我的引言只能是抛砖引玉。参加大家的讨论后得到许多启发，我现在才可以对许多问题作比较深入的说明。在讨论中大家也涉及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有些也可以讲一讲。现在先讲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留在后面再讲。

##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

大家提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像辩证唯物主义一样抓住一个核心来谈。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是矛盾统一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马、恩、列、斯的著作里还

---

* 1962年4月，中央高级党校“59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课程时，艾思奇在10日、11日，参加了该班学员的课堂讨论，针对学员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总结发言，回答了大家所提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只是节录了一部分，按当时速记稿整理，整理时只作了文字、标点和段落的加工。

没有找到明确的根据，没有明确的讲这个问题。因此需要我们自己来考虑。当然还是要根据经典著作的精神来考虑的。这个问题是有必要解决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在哪里？贯穿一切的问题是什么？就这个问题来谈谈我的意见。

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两个基本矛盾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解决历史唯物主义各方面问题的核心。

也可能有人这样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我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条件和起码原则。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首先是看怎么处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因为社会历史有它自己固有的客观规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也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核心，因为它是最根本的原则。但是单单这样一个原则还不能解决社会本身的具体规律问题。如果仅仅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进一步研究社会存在是什么东西，社会意识是什么东西，还不能具体掌握社会发展规律，不能把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区别开。所以，要把握社会发展各方面的规律，关键问题就是进一步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因为只有分析了这两个基本矛盾，然后才能具体了解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但是这个问题要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来说明。不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不能说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各个

历史时代的人民群众和个人是不同的，有什么样的人，就会起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而农奴和奴隶就不能？虽然都是人民群众，因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同。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杰出人物，但是每个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原因在哪里呢？要了解这个不同，就要根据两个基本矛盾来分析，两个基本矛盾分析不清楚，这个问题也不清楚。

总的来讲，历史唯物主义是三个大问题：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问题，两个基本矛盾的问题，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就像辩证唯物主义有三大规律一样，都是基本问题，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两个基本矛盾问题。

我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时，究竟以哪个问题为主要的呢？也可以讲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主要的问题。因为在实践当中这个问题比较大，在短期训练班里就可以着重讲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别的问题可以不专门讲。我们在党校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也要着重讲这个问题。因为解决群众路线的问题，是我们长期的任务。从理论上认清群众路线的重要，必须对于干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我们在学术理论上进行争论的时候，也要着重讲第一个问题，因为搞社会科学，首先就要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六章，专门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是理论斗争需要专门讲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短期训练班，不是为了解决专门的问题。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的中心问题，是分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着重讲了两类矛盾。我们的社会里为什么会有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从哪里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的来源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总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

有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表现，有时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表现。有时为了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和人也发生矛盾，比如1956年三大改造时就有人和人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1957年的反右整风，有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有敌我矛盾，这个矛盾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表现。在两个基本矛盾中，第一个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基本矛盾中最基本的，是核心中的核心。

## 二、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规律的中心问题

大家讨论中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规律的集中表现，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的问题。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矛盾经常要揭露、要解决，其结果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这个规律又可以说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规律的核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可以从各方面说明，中心问题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

这个规律在斯大林的书上说的是经济规律，恐怕还不只是经济规律，这个规律是社会历史发展最根本的规律，也是我们做经济工作必须遵守的根本规律。斯大林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总结了苏联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本书里反复讲了这个规律。现在看来反复讲这个规律有它的重要意义。但这不只是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而且是我们做经济工作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规律。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经验，更应该相信这点。1952年斯大林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对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规律，不很清楚，今天就很清楚了。这个规律要反复强调，并应

该经常注意遵守。如果不注意，我们一定要发生错误。这几年的错误就是不注意这个规律。

我们的错误都叫做主观主义，但是主观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看它的具体表现在哪里。民主革命时期主观主义错误的具体内容有哪些？现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观主义错误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首先是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客观规律的掌握上，犯了错误。当然，这个主观主义错误的内容，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讲，如在政治上违背民主集中制，也是主观主义。但是在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上的主观主义，首先是忽视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互相适应这个规律。今天我们反复强调这个规律有很大的必要。毛主席的眼光很远。1958年就提到要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们现在才深刻的了解了这一点。

要把这个规律的内容规定一下。怎样来理解这个规律，这个规律的内容怎么规定，怎么把握，这点也值得注意。这个规律可以从各方面来理解，也可以作一个比较简单的规定，就是生产关系不能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性质，同时也不允许人为地超过生产力的发展情况。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规律，就是有这两方面的内容。根据这十几年的工作情况，根据社会主义的客观情况，根据大家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我看可以把这个规律这样规定。这两种情况都要反对，不反对就要发生错误。

在我们的工作中，如果我们让生产关系比较长久的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要犯右倾保守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是在主观上想要使旧的生产关系比较长久的存在下去，害怕变革生产关系，因此使它落后于生产力；另一方面，如果企图人为地使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就要犯“左”倾冒险主义

的错误。我们这几年来可以说主要的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因为主要的倾向是人为地想要使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的前面。这几年主要的特点就是这样。1956年以前，有过右倾机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已经搞起来了，但是领导工作的人要把它砍掉，群众已经起来了，领导不去支持它，反而想把搞起来的东西砍掉，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那个时候批评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并没有批评错，因为他对已经搞起来的东西，采取消极的态度。1957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主要的倾向是想要人为地使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发展的前面。生产关系如果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情况，落后的比较多，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关系多少总是要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因为发展的速度不同，生产关系是比较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比较活泼一些。生产关系稍微落后一些，或者某一方面、某一个环节上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经常有的，如果落后久了就会有错误。生产关系如果是人为地使它超过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引起生产力的破坏。我们这几年来的工作使生产力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这已很清楚的证明了。

现在要问一下：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前面这件事，会不会成为客观存在？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前面这种情况事实上是不会存在的。人为地想把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的情况可以做到，在形式上好像是走在前面，比如搞公社的所有制，搞全民所有制，使公社掌握了所有权和分配权，按照全民所有制的办法搞。形式上好像是走在前面了，这个形式也是客观存在，但是这个形式里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并没有实行全民所有制，真正的公社所有制也没有实现，只是剥夺了农民的集体所有制，比个体的形式还落后。就这点来说，向“左”和向右的错误有共同点，当然内容还是有所不同的。“左”倾冒险主

义做的结果跟右倾机会主义有共同的东西，因为都是错误，这点是共同的。所以，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的前面这种事情，就客观规律来说是不存在的，生产关系只能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不能走在生产力发展的前面。

我们过去搞合作化运动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们中国有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的前面。过去党校的苏联专家吉谢辽夫同志就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和他有争论。党的“八大”会议的决议上也有这种提法，毛主席就不同意，几次提出来修改，有人讲我们的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毛主席认为没有这回事情。

先进的生产关系要看怎样的先进，每一个国家的先进的生产关系都跟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有关系。我们的生产关系是适合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的，并不是走在生产力的前面了。我们没有搞机械化就搞了合作化，我们的合作化是适合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的。我们的生产关系不是苏联的生产关系，苏联的生产关系适合于苏联的生产力水平的。当然，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总是比生产力要高一点，才可以推动生产力前进，从这方面理解也可以。比如，还在工场手工业的时候就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不是生产关系已经走在生产力的前面了，这样讲也有一些理由。但这样讲只是讲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先进的生产关系要这样看：一方面要看这种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要看这种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两方面有些不同。如果讲基本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开始到没落，基本形式是不变的，都是资本家所有制，一直到帝国主义阶段，也是资本家所有制。但是不能说因为基本形式不变，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工场手工业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是一样的。不能这样说，有它不相同的地方，

这是不同的几个发展阶段。

我对政治经济学没有多少研究，但是简单的东西也还可以说一点。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工场手工业的规模比较小，利用手工劳动，这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也是资本家所有制，但是一个资本家办一个工场，不需要股份公司。有了机械工业以后，小的机械工业，还可以一个人或几个人合办，大机械工业就不行了，开始有了股份公司，就要有资本家集团。资本家私有制就有这个问题，铁路就不可能由一个资本家的资本搞起来，就要搞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也可以由某一个家族为主，资本的来源是一个家族。一般的帝国主义的资本家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私有制不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它的资本是某个资本家集团垄断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但是部分制度还是要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时代大不相同。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产生的时候只产生了资本家个人所有制，股份公司是后来才产生的。生产力不发展到机械工业，股份公司是不会出现的，在工厂手工业时代，一般的说只能有资本家个人所有制，搞股份公司反而不方便，垄断更不必要，没有什么可垄断的。

所以，先进的生产关系总是要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是这样。从开始发生一直过渡到共产主义，基本上是不变的，可以几十年甚至于一百年其基本形式不变，但是具体形式是不断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而变的。我们现在开始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工业上有了大机器工业，还不能说是电气化，部分电气化是有了，整个电气化还没有。工业的生产力比较高，农业还是手工业的生产力，没有机械化，所以我们农村的生产关系就要适应这种没有机械化的情况。

我们现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点也没有超过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性质，恰恰适合于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跟农业没有机械化的形式相适应。合作化、集体化不一定要先机械化，因为合作化有各种不同的程度，我们的合作化是初步的，这种初步的合作化不需要机械化，可以先合作化，然后再机械化，有了机械化以后再进一步搞合作化，再进一步提高集体化的程度，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取得了典型的经验。如何使农村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情况，逐步调整，逐步提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摸到这方面的经验，老是停留在集体农庄的程度，集体农庄已经自发的联合起来了，但是领导还是阻碍它，没有很好的总结经验。我们中国这几年经过正面、反面的经验，虽然碰了钉子，但总结了经验，掌握了这个经验。

## 三、关于掌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问题

大家讨论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能很快掌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规律？

我看，这是因为客观规律的掌握不经过一定的实践是不可能的。正像毛主席说的一样，由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要经过一定的实践。反过来说，只要通过一定的实践过程，迟早我们总能掌握。这个过程有长有短。

为什么有的人迟一点，有的人早一点呢？是不是都可以早一点呢？我看是有可能的，问题是要注意掌握规律迟和掌握规律早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看能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这是一个根本条件，通过这样的实践一定能掌握客观规律。但是如果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总结我

们的实践经验，即使通过了实践，也很不容易掌握这个客观规律，甚至于就根本不能掌握这个客观规律。如果不是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时间就会很长，根本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可能永远在必然王国里面走不出来。如果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总结经验，就可能很快的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由盲目性走到自觉性。

我们中国的经验就是这样，能及时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总结我们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并能很快地掌握。从1958年到1962年四五年的时间中我们掌握了人民公社的规律，就全国范围掌握这个规律来讲，时间也不算长，别的国家40年还没有掌握完全，如果列宁还活着，也许早就掌握完全了。现在是修正主义的领导，根本就不能掌握这个规律，他不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适合这个环节，只抓技术这个环节。我们也很困难，但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过去了，不一定。

在实践过程中，一定的时候不能掌握这个规律，因此就有错误，就“左”右摇摆，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还没有把经验总结出来。免不了在工作中“左”、右摇摆，免不了犯错误，这也是客观规律，因为认识客观规律要有一个实践过程，没有通过这个实践过程，也没有总结，发生“左”、右摇摆也是必然的。这种“左”右摇摆的偏向，“左”倾冒险或右倾保守也是自然的。一般的讲，群众运动没有起来以前，右倾保守的偏向可能多一些，群众不起来就是因为有保守思想，领导上反映了这种保守思想就会出偏向。群众起来以后，做的时候搞的过头一些，就会出“左”的偏向。“左”的偏向碰了钉子以后，又可能回过来走向右的方面。“左”右摇摆的大小，也决定于有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作

指导。没有经验必然要摇摆的，但是如果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会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这些都决定于虚心谨慎。能虚心谨慎，就能实事求是，就能走群众路线，就可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能这样做，大的“左”、右摇摆就可以避免。这几年来有些东西不一定是不可免的，特别是个别省份已经带有路线性的错误。如果领导的人能真正虚心谨慎、实事求是，大的摇摆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小的摇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碰钉子要想掌握客观规律是不可能的。学习总是要花学费的，问题是花的多少，我们这几年学费花得多一点，部分地区花的太多了，如果搞的好一点就可以不出这么多的学费。“难免论”可以运用在小的摇摆问题上，小的错误上。但是大的错误，大的摇摆不一定是难免的，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当然这也有条件。像王国藩公社一直增产，他已经避免了大的摇摆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将来去某个国家当专家，一定可以帮助他们避免搞“共产风”，也可能要小小的刮一点。我们要注意到中国这几年虽然损失很大，但是对世界上的贡献很大，我们得到了无价之宝。

## 四、关于革命和建设中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问题

同志们讨论中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要求由逐步调整走向根本变革，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问题。

我讲辩证法的时候也讲到这点。根据我们这几年来全部正面、反面的经验，好像应该有这样的规律，在工作中应该掌握这个规律。由一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是普遍规律，应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这个问题，要逐步提高，由各个环节部分调整进入到根本变革，由部分质变进入到全部质变。我们的经验，是

按照这个规律做工作就可以避免生产力的破坏，就可以一方面逐步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程度；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可以发展。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律来做，就要发生很大的损失。

我感到斯大林讲到关于社会主义里面有逐步过渡的思想，有一定的真理性。逐步过渡这个概念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可以接受的，这不是否定根本变革。我现在感到还是这样看好。这并不一定就是改良主义。因为这并不否认逐步调整进入根本变革，部分质变进入全部质变。而且这些运动还要通过群众运动。即使是部分调整，群众运动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环节上还是有必要的，不能因为我们的工作是调整工作，因此就斯斯文文地像绣花一样地来搞。

社会变革不能这样搞，群众运动还是需要的，因为没有革命的运动就不能形成很强大的革命力量把旧的排除掉，把新的建立起来，推陈出新没有强大的群众力量不行。旧的东西不能很容易的退出历史舞台，旧制度的抵抗力是不小的。这种抵抗力量不是用武装力量去解决，不需要军事斗争，但是群众运动的推动还是需要的，没有群众运动就不可能把变革搞透，只是这里搞，那里没搞。搞群众运动就不能斯斯文文地搞，因此就免不了过一些。问题是过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革命斗争、群众运动一起来就要做过一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比较大的生产关系的调整也要搞群众运动，因此也免不了做的过一些，可以避免太过了，但是不能避免某种程度做过一些，除非不要群众运动。当然我们要求的群众运动要以细致的工作做基础，通过典型试验然后再普遍推广。我们这两年没有典型工作、细致的工作做基础，所以在某些方面做的太过了，这是不好的，应该避免。但是，经过典型试验就能保证一点也不过？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毛主席讲的“矫枉必须过正”这个原则是真理，不能希望矫枉一点也不过正，而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一个东西变了，要搞直它就要搞过一点才能直，这也是一种事物发展规律。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的，不能因为我们这几年搞的太过了，因此就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斯斯文文地调整，不能搞群众运动，一点也不应该搞过了，这是马克思主义跟资产阶级的观点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怕群众运动搞过一点。有的同志认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必须超过生产力，刚才我讲了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就群众运动来讲，要树立一个先进的生产关系必须有一个群众运动，因此总得在做的中间过一些。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肯定这种说法。要搞先进的生产关系，要把旧的东西扫除的比较干净，新的东西必须在一个好一点的基础上，新的基础打一个比较结实的起点，就必须过一点，这是不可免的。

我们中国革命的经验就可以充分证明这点，我们的民主革命搞得很快，搞的时候是过了一点，1947 年的土地改革有的地方就过了一点，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也有点过，但不是太过，完全不过的事情是没有的。我们细致工作的基础上搞群众运动，多少也要过一点，但是有一个结果，就是土地改革搞的很透。当然也有不透的地方，像河南光山县群众运动没有搞起来，旧的东西扫的不干净，新的基础打得不坚固，所以就有地主复辟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搞得透，在全国得到政权六七年以后，到 1956 年就全国合作化了，这样的速度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我们中国搞得比较普遍、比较透，这跟我们不怕群众运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群众运动这几年搞的粗糙了，就是太过了，有

不应该的地方，是错误的，应该批判，代价也太大。虽然代价很大，但是得到的是无价之宝，苏联40年的建设也没有我们这样的经验。

## 五、关于生产关系的内容问题

大家讨论了生产关系包括什么的问题。讨论当中有一个争论，有的同志认为：按照斯大林的提法生产关系有三个方面，其中第二个方面没有必要。理由是生产关系就是人和人在生产中的关系，第二个关系就是人和人的关系有没有必要?看起来也有点理由。我的看法，第二个方面还是必要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这个提法，还是可以不变的，因为生产关系的第二个方面不是一般的指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因为一般地讲，人在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可以分别从各方面具体说明问题。

所有制也是人和人的关系，分配也是在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生产关系总的概念包括各方面。所以第二个方面是有点特殊意义的，不是一般的人和人的关系。照马克思主义的讲法是不同劳动的时间内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也是指这些人在生产中相互所处的地位。比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处于主人的地位，奴隶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就是人身完全依附于奴隶主的这种地位。奴隶主根本不劳动，要奴隶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奴隶要忠实的为奴隶主任意支配进行劳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是半奴隶主的地位，农民是半奴隶的地位，大部分劳动是依附地主，小部分劳动还是为自己，所以劳动的交换和奴隶社会不同。虽然这一小部分有时被完全剥夺了，但是按照理论上讲是有一小部分属于自己的，所以在劳动交换方面有一小部分不能由地主任意支配。

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了，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工人对资本家没有人身从属地位，在法律上在交换劳动的市场上，工人和资本家是处于平等的地位，都是商品所有者，工人是劳动力所有者，资本家是金钱所有者，资本家要使用劳动力，就要向工人购买，在原则上按照等价交换，实际上不一定按照等价。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给工人阶级的工资是等价交换，这个工资保证劳动力的价值，保证劳动力的生活，同时还要保证他的后代继续成长受教育，工资本身不够还有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这个等价交换是原则和实际大体一致的。资本主义社会远不能这样，它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生活，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他还要劳动者受教育，因为工人完全没有文化不能劳动，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熟练的劳动力工资就高一些，原因就是工人和资本家虽然在法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在经济上还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地位，这点跟奴隶社会是一样的，马克思说过工人是工资的奴隶。但是有一点不同，在法律上他没有人身从属的问题，在法律上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

所以，劳动交换问题主要的是工人和农民的交换，还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交换问题，这个交换关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经济上也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工人拿的工资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工人和农民之间是采取等价交换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生产关系有差异。所采取的等价交换总的来说是平等的，但是交换的结果是不平等的，因为不同的生产力有不同的报酬，不同的生产力有不同的价值，熟练不熟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工资有差别，但是没有剥削和被剥削的问题，只是劳动交换的问题。

关于生产关系第二个方面讲的比较多，主要的是因为骆耕漠

同志在《光明日报》经济副刊上讲了这个问题。他说要了解生产关系不仅仅要了解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而且还要注意到劳动力所有制的问题。他认为不这样就不能具体了解每个时代生产的特点。在理论上也有一条根据，如奴隶社会的劳动力全部归奴隶主所有，封建社会的劳动力部分归封建主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归自己所有，最后归结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应该归谁所有？他认为应该归公有。否则，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完全。

这个理论在任何一个经典著作中都没有讲过，这是值得注意的提法。这个提法对不对？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可以“百家争鸣”一下，特别是经济学专业的同志可以研究。他把这个理论看做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创造，而且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力应该归公有。这种提法如果联系实际问题，也可以看做有积极的意义，也可以看有消极意义。如果说有积极意义，就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公有，因此人的劳动力应该让国家调配或者让集体支配；从消极方来看，既然劳动力归公有，如果肯定这点，就肯定平调劳动力是有理由的，也可以这样解释。

如果肯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来的提法，那么，他现在的这个提法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因为他没有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向来的提法来看，这个问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已经解决了。劳动力归谁所有根本不用提，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而是不需要这样提。

生产关系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处理劳动者相互关系、劳动交换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方面还有必要讲，因为除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外，还有劳动交换的问题。如果不这样提，第二个方面就没有办法解决，这是地位的问题。按照斯

大林的讲法，把它大体上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一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实际上这种的分法比较笼统。

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在阶级社会中，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各有时代的不同，奴隶社会时代是通过法律上、道德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来达到生产过程中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个人身依附关系又叫做经济以外的强制关系。奴隶的整个劳动力，在法律上是属于奴隶主所有的，这个经济以外的强制力量保证了生产过程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保证了奴隶主在生产过程中任意支配奴隶，最后达到剥削的目的，这是奴隶社会人和人的关系，这不是劳动力归谁所有的问题，是劳动力归谁支配的问题。

封建社会主要的是经济以外的强制，人身的依附，但是有一小部分劳动者还有个人的活动、个人的经济。照斯大林的提法就是地主对农奴是部分占有，通过这种部分占有保持他在生产中、在经济生活中，建立支配与被支配的地位。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地位，最终目的是使得地主能剥削农民，在这样的生产关系里地主对农民可以有大部分支配权，但是有一小部分劳动者可以自己支配，自己处理自己的经济，这也不是对劳动者所有制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对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在经济生活中，是处于支配地位，这样来达到剥削的目的。但是这个支配关系不是依靠经济以外的强制，不是依靠人身依附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在法律上跟资本家有形式上的平等，没有人身依附的关系，在形式上来说，工人阶级对资本家是平等的，是自由的，可以自由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的建立，是依靠经济上的强制作用，是依靠劳动力的出卖和购买劳动力。资本家给工人一定的工资，在一定

的时期内购买劳动力，当然不是购买整个的劳动力，而是在一定的时期根据契约的关系购买劳动力，然后强迫劳动者被剥削，这里没有经济以外的强制。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这样说：工人阶级把劳动力作为自己所有，资本家也承认劳动力是工人自己所有，但是这个所有权可以出卖，一出卖这个所有权就不是工人的了，所以，这个所有权也是形式上的，他不出卖就不能生活，一出卖就没有自由了，也没有平等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章最后讲：资本家和工人在自由市场上是自由平等的天国，但是市场交换一结束，到了工厂里工人变成了奴隶。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归自己所有也是形式上的，形式上他可以出卖，他不能不出卖，但是一出卖就不是自己的了，就归资本家所支配了。所以骆耕漠这种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归劳动者所有的提法，好像对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新的东西，但是不是全面，很值得考虑，这是应该注意的。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

究竟“劳动力归谁所有”这种提法全面，还是“不同社会阶段相互地位的关系，劳动交换关系”这样的提法全面？需要研究。照我们现在的分析，提出劳动力归谁所有这样的提法不全面，不能概括每个时代各方面的情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归劳动者所有也是形式上的，实际上一到生产里劳动者就归资本家支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究竟劳动力归社会所有，其中包括同志式的互助关系，还是同志式的互助关系包括劳动力归社会所有？我认为同志式的互助关系更全面。而且，把劳动力看做是社会所有，这种提法恐怕是会出毛病的，联系到实际还有它消极的方面。这个理论在大家讨论中，有的组已经注意到了，在这里值得提一提，现在没有跟他争论，以后可能有人争论，而且应该争论，因为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

这个提法我还有一个不同意的地方，就是他把人和物混淆在一起了。生产关系的第一个方面主要的是讲物的问题，即生产资料问题，人和人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相互关系。第二个方面是讲人和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讲人和物的关系，或者是以物为中心讲人和人的关系问题。把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看成是一个东西，都算作所有制问题，这就是把第一个方面和第二个方面混淆不清。对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和对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应该加以区别。生产资料是所有制问题，劳动力的问题，是人和人的关系问题，分配问题是人和物的关系，或者是以物为基础人和人的关系。

最后，就这次学习讨论再说几句。

为什么这次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以基本矛盾为中心，不以国家问题为中心？我们的国家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了，这个理由是不是对的，应该不应该这样做，还值得考虑。同时，大家在学习中，实际上是以两个基本矛盾问题为中心，联系实际首先还是联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可以作为我们的教学经验，以后我们怎么讨论好，大家可以谈一谈，把这个经验总结一下。

# 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1962.9)

## 一

凡是学过形式逻辑的人，都知道有一种叫做“偷换命题”的谬误。用“偷换命题”的方法来进行论辩，决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混淆是非。诡辩论的方法之一，就是“偷换命题”。

于世诚同志在《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上发表的言论，正是公然使用了这一种错误的逻辑方法：为要反对两年前我们对他的错误观点所给予的批判，他把我们原来所主张的命题“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偷换成了这样一个命题“恩格斯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

如果真像于世诚同志说，“艾思奇等同志”确实是主张“恩格斯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的，那么，两年前对他的批判在这一点上当然错了，而于世诚同志在这一点上就胜利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是于世诚同志把风车当成了妖魔，并全力向着自己制造的这个幻想举行进攻！而现实世界里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妖魔！批评于世诚的许多同志中间，在某些个别问题的提法上虽然各有不同，但并没有于世诚同志所企

---

* 此文题注见《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文。

图强加于人的那种观点。

我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指1960年7月21日人民日报《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写得很明白：对于“同一性”有两种相反的理解。一种是把同一性看做抽象的、绝对的同一，看做简单的等同。一般的唯心主义，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就是把同一性理解为简单的等同，硬说“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在这样的意义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即唯心主义者所理解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应该坚决加以否定的。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给予了最彻底的批判。当然，恩格斯也决不会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但同一性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即辩证法的理解。这里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的同一，差别的同一，而不是简单的等同。辩证的同一性，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它存在于任何事物中，也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中。只要不否认辩证法，也就不能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差别的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我们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正是指的这种辩证的同一性，而不是指的形而上学的简单的等同。在这种意义上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决不是等于肯定了唯心主义的理论，也不等于“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这难道还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吗？

自然，当恩格斯谈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时，是和黑格尔的哲学有一定联系的。恩格斯在引用这命题时，曾说这是“用黑格尔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意思”（“um mich hegelsc h auszudrücken”——见恩格斯1895年3月12日给斯密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5页这句话一般都译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恩格斯

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来表述自己的意思，这就是说他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可以肯定的积极的东西，可以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东西。但是，在旧的学说中找到某些可以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东西，并不就等于全盘肯定它的理论，而只是肯定其中可以肯定的某些方面。全盘肯定旧的理论，是说不问它的精华或是糟粕，一概加以肯定。批判地继承，是说要肯定其精华，而抛弃其糟粕，对其精华也加以改造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哲学正是采取了这种正确态度，而不是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这就是继承改造和发展了它的辩证法的方面，而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兼有着这精华和糟粕；如果要肯定“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那就得同时肯定它的辩证法方面，也肯定它的唯心主义方面。我的文章决没有说恩格斯作过这样的“肯定”，而只是说恩格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并附带地肯定了黑格尔的思想中可以肯定的精华，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的论证。批判地肯定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思想中的精华是一回事，全盘肯定“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又是一回事，两者决不能混为一谈，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关于这一点，我在两年前的文章中早已说得很清楚，那时我就说过：“黑格尔的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另一方面还有辩证法……黑格尔哲学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也有两个方面，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来说，黑格尔把思维看做第一位的东西，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解释成‘存在即思维’的意义；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来说，黑格尔和其他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肯

定地解答了‘思维是否能够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并在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时候，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给与了辩证法的说明，在这一方面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就有其合理的、即辩证的成分，而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命题。”那时我就说过，恩格斯并没有全盘肯定了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他只是“肯定黑格尔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的合理的辩证法因素，但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的论证”(见 1960 年 7 月 21 日《人民日报》)。

因此，我同意撒仁兴和王若水同志的这个意见：在我们和于世诚同志的争论中间，并不存在要不要肯定“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的问题，我们的主要争论是要不要在辩证法的意义上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要不要肯定黑格尔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中的某些合理因素的问题。“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是不应该加以全盘肯定的，肯定了这样的“同一论”，就也肯定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就是背叛唯物主义，当然应该加以坚决反对。我的文章也没有任何一句话表示过应该作这样的肯定。但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从而也批判地肯定黑格尔的这个命题中的合理的方面则是完全应该的，恩格斯也正是这样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而曾经反对这样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于世诚同志，则是错误的。我们正是因为他的这个明显的错误才对他们进行了批判，而他在最近那篇文章里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既然于世诚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么，问题本来用不着再争论下去了，然而，他现在又挑起了争论，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对黑格尔的哲学作了片面的了解，把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存在的

同一性的思想说成只有形而上学的、神秘的唯心主义的意义，否认其中还包括着辩证法的意义。由此出发，他就曲解了恩格斯的有关的论点，否认恩格斯在黑格尔的这个理论中肯定了应该肯定的东西，并断定如果有人指出恩格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等于说他“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就是“把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硬加在恩格斯头上”，就是“诬蔑”恩格斯！我认为于世诚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现在就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澄清。

## 二

从于世诚同志的文章看来，这两年来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似乎曾用了很多时间，去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中寻求证据。理论研究当然必须寻找证据，这种努力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们不是实用主义者，不能把任何被人认为有用的“证据”都看做可靠的根据，我们首先要考察一下，一个人是怎样去找证据？找到了什么样的证据？如果证据是用断章取义、随意曲解的方法去找来的，如果这些证据的本身就是不可靠的，那么，由它所支持的观点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虽然引用它的人满以为是有用的。这在形式逻辑上就叫做违背了“充足根据律”。于世诚同志的致命的毛病，正是在于使用了一系列的不可靠的证据，正是由于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这个根本的规律。

举几个例子来看吧：

于世诚同志说：“黑格尔虽然批判了‘一切是一，一切同一’的同一哲学，但同时又肯定了自己的哲学也是同一哲学”（《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第32页），他提出的证据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上说的一句话：“揭穿了忽视相异的抽象的形式的知性的同一之虚

妄不实的学说也恰好是这种同一哲学。"于世诚同志似乎忘了他所引用的《小逻辑》的话是来自中文译本，即使不懂德文的人也很容易查出他的割裂的手法：黑格尔的成段话本来有一个重要的开头，被他活活的斩掉了。全句话本来是这样的："前面已经说过（第一〇三节附释），近代哲学常被人戏称为同一哲学，殊不知，揭穿了忽视相异的抽象的形式的知性的同一之虚妄不实的学说也恰好是这种同一哲学"（《小逻辑》，中文版，第263页）。这里黑格尔明明说自己的哲学被称为"同一哲学"是别人的"戏称"，他自己对这种"戏称"是采取保留态度的，不，他是采取反对态度的！只要再看一看他所指出的"第一〇三节附释"就很明白，那里他说到："对于近代哲学的许多攻击中，有一个比较最常听见的斥责，即认为近代哲学将任何事物均归纳为同一，因此近代哲学便得到同一哲学的绰号。但这里所提出的讨论却在于指出，惟有哲学才坚持要将逻辑上和经验上有别的事物加以区别，反之，那号称经验主义者却将抽象的同一性提升为知识之最高原则。所以，只有他们那种狭义经验主义的哲学，才最适当的可称为同一哲学"。（《小逻辑》，中文版，第235—236页）

黑格尔把"同一哲学"这个"戏称"说成是对于自己的哲学（近代哲学）的"攻击"、"斥责"，并且把这个"戏称"回敬给"狭义经验主义的哲学"，这怎么能说他肯定了自己的哲学也是"同一哲学"呢？

我们用不着掩盖黑格尔的错误，因此也不必说他和"同一哲学"这个名词完全没有联系。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因此它和"同一哲学"有共同的一面。但黑格尔反对把自己的哲学简单的称为同一哲学，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对经验派的唯心主义哲学（如英国贝克莱、休谟的哲学，马赫主义哲学），可以简单地

称做同一哲学，因为它们把存在和知觉，感觉和世界简单地看做同一的东西，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费希特、谢林的流派，可以简单地称做同一哲学，因为他们宣传“一切是一，一切同一”。宣传主观和客观，对象及其概念的“直接的同一”。黑格尔哲学和这些唯心主义哲学有共同的一面，它有“思维和存在的思辨的神秘的同一”这一面，有主张“存在是思维”、“思维是事物或事物是思维”的一面，也就是有形而上学的等同论的一面，所以不能说“同一哲学”的错误和黑格尔哲学完全没有关系，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因此就把黑格尔的哲学和上述其他唯心主义的哲学划一个全等号，把它说成是单纯的同一哲学，说他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思想仅仅只是唯心主义的思想，而和认识的辩证法没有关系，如于世诚等同志所想的那样，那就是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非常片面的、浅薄的了解，最好也只是费尔巴哈式的了解。

黑格尔也肯定了“存在是思维”、“事物是思维”这些命题，但他在进一步解释这些命题时，并不是如上面所举的唯心主义者那样把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和思维、概念、观念解释成直接的等同，而是把两者看做有差别的同一性，也就是辩证的同一性。只要是细心地阅读黑格尔的原著，而不是像于世诚同志那样主观随意地把它斩头去尾，并加以曲解，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例如，于世诚同志说：“黑格尔在解释他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时，他明白地宣称：‘存在’不是指的‘具体事物’，而是直接指的‘概念’。他说，‘当我们说“存在”时，我们并没有说到具体事物，因为“存在”只是一个纯全抽象的概念’”（《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第32页）。看起来，好像黑格尔真是把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和思维、概念完全等同起来了。但是，试查一查于世诚同志的引文，人们就会发现，黑格尔的原来一句完整的话，又被他砍了

一个头！全句本是这样的："一个具体事物总是不同于一个抽象范畴的，当我们说'存在'时，我们并没有说到具体事物，因为'存在'只是一个纯全的哲学概念。"(《小逻辑》中译本第290页)注意，这句话里的"存在"一词，贺麟的中译本译作"有"，于世诚改为"存在"，意思没有重大出入）把这完整的一句话引出来，就可以看到，黑格尔说的意思和于世诚的解释是完全两样的。黑格尔这里说的"存在"，不是指的一般具体客观事物的存在，而是指"存在"这个范畴，是指人的思维中关于事物存在的概念。黑格尔在这里说存在"只是一个纯全抽象的概念"，这只是说人的思维中的存在是这样的概念，其意思决不是说我们周围具体存在的客观事物也等同于这样的概念，相反地，黑格尔是明确地指出了，思维中的"存在"这个抽象范畴决不同于作为具体事物的存在，不同于我们通常看做思维的对立物的客观存在。这就是说，黑格尔明明白白地并没有把思维概念和具体存在的客观事物看做直接同一的或完全等同的东西，而是看做有差别的东西。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识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戏法，并对它加以批判。作为范畴的存在，固然是"纯全抽象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决不仅仅是思维活动的产物，而是一切具体事物的某种共同本质的概括。所以，当人们说到"存在"这个范畴时，虽然并不就是直接指的任何一件具体事物，但也决不是与具体事物完全无关，因为这时人们是在思维的逻辑形式上反映了一切具体事物的共同本质——一切具体事物都有其客观存在这个共同的本质，任何范畴、概念都是某些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的共同本质的反映，说某个范畴是"纯全抽象的概念"，只说到事情的一面，只说到思维的逻辑形式这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即思维客观内容这一方，就这一方来说，范畴是具体事物的某些共同本质的反映。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抓着了逻辑形式的一面，抹杀了思维的客观内容这一面，他夸大了存在的范畴是“纯全的抽象概念”这一点，否认这个范畴的来源归根结底还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这样，范畴、概念都被看成是纯粹思维活动的产物，并得出了这样的命题：“存在即思维”，“纯有即纯思”。由此进一步引申，把作为主观的逻辑形式的范畴、概念加以绝对化，使之变成客观世界的主宰。本来，当人们说到“存在”时，可以是指仅仅在人的思维中才有作为范畴的存在，也可以是指具体事物的客观存在，前者固然是后者的反映，但并不是一回事情。这就是说，两者是同一的，但又是有差别的，并不完全等同，但当黑格尔说到“存在即思维”时，却把两者混淆不分了；“存在”既是思维，那么，不论作为范畴的存在，或具体事物客观的存在，好像都可以被看做思维。或者说，一切具体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好像也是以思维为根源，也是依据了思维。于是，唯心主义的戏法就做出来了。这个戏法力图使人相信在人的主观的概念、思维、观念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在性质上与人的思维、概念、观念没有差别的绝对化的“世界理性”、“绝对观念”，或“总念”，黑格尔把这个神秘的精神实体，这个变相的上帝当做世界一切具体事物存在的根源，用以代替一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所固有的本质，并把客观事物硬说成是它的活动的表现形式。“无论总念也好，判断也好，均不仅仅在我们脑子里发现，并且不仅是由我们造成的。总念乃是内蕴于事物深处的本质；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即由于总念。因此，把握一个对象意思即是意识着这对象的总念。”（《小逻辑》中文版，第345页，这里的“总念”一词也可以译作“观念”）因此，黑格尔虽然没有把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和思维概念看做直接同一的东西，但还是把人的思维、概念、观念和一切客观事物的本质（或叫做“世界本身”）看做完全

同一的东西，并从而做出结论，说人的思维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即是思维认识思维自己，或叫做绝对观念的自我意识。这就是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中的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糟粕，是思维与存在的等同论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的表现，这些糟粕的东西是必须给与坚决的批判的。但是，如果因此就把黑格尔的观点和贝克莱主义、马赫主义，以及费希特、谢林等的唯心主义划上一个全等号，如于世诚同志所做的那样，这也是片面的，错误的。和这些唯心主义不同，黑格尔并没有把思维和存在，概念和它的对象，观念和客观的具体事物看做直接等同的东西，相反地，他明确指出它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黑格尔认为，人的主观的思维、概念、观念只有经过它们的对象，经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经过这个媒介的环节，才能达到在后者的“深处”所“内蕴”着的本质，达到“绝对观念”。由于黑格尔把客观事物的本质看成是与人的主观思维、概念、观念同一的东西，所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有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一面，由于黑格尔又把思维、观念和它们的对象和具体事物看做是不同的东西，因此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终究还不是把两者看做完全的、直接的同一物的思想，而是同时注意到两者的差别的，即辩证的同一性的思想。

关于黑格尔的“世界本身即是理念”这个命题也要作同样的了解。这里说的是“世界的本身”（即世界的本质）是理念，并没有说世界的一切具体事物即等于理念。黑格尔的全文是：“那不实的倏忽即逝的东西仅浮泛在表面，而不能构成世界的真实本质。这本质就是自在自为的总念，所以这世界本身即是理念。”（《小逻辑》中文版，第419—420页）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具体存在的事物看做“不实的倏忽即逝的”、“浮在表面的”东西，而把它们的本质

看做自在自为的总念，这个“自在自为的总念”和人的主观的思维、观念是同一性质的东西，这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等同论的一面，然而他又把具体存在的事物和“自在自为的总念”加以区别，和思维的、观念的东西加以区别，这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一面。

恩格斯曾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是“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8页）唯物主义指出人的思维、观念只是物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概念只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本质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抽象的摹写。果实的概念，只是具体的果实如桃、李、杏、梨等等的共同本质在逻辑形式上的概括。唯物主义用反映论观点来肯定思维和存在，观念和它的对象、具体事物的同一性，即肯定思维、观念、概念所反映的内容是符合于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本质的，这里所说的同一性没有任何绝对等同的意味，因为它指出思维、观念、概念等都是主观的逻辑的形式，具体事物的本质则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的实在，而主观的逻辑形式和客观存在的物质的实在显然不是等同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这个关系倒置过来，硬说客观事物的本质就是一种逻辑的思维过程，就是和人的主观思维过程同一性质的东西，从而把人的主观思维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认识，看成是思维对思维本身的认识，这就使黑格尔的观点不能不陷于形而上学的等同论。要避免陷入这个形而上学的等同论，就必须把黑格尔哲学强加到客观事物的“内蕴”、“深处”去的这个思维的幽灵驱逐出去，把那儿的“本质”这个宝座还原为物质的实在，然而这就要把哲学还原为唯物主义，就必然要抛弃唯心主义。

但是，尽管有这个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方面，仍没有妨碍黑格尔的哲学在相当高的程度上阐发了思维与存在的

辩证关系。黑格尔把概念和具体事物、观念和它的对象加以区别，指明它们之间是互相矛盾的。在他看来，人的主观的思维、概念、观念要把握客观的事物、对象的本质——虽然他认为这个本质和思维、概念、观念是同一的东西，而认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思维、概念、观念对自身的认识——必须经过一个克服矛盾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必须对客观的事物、对象进行一系列的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的功夫，首先由具体事物中抽出一个个的抽象概念，然后随着观念运动的发展，使许多抽象概念一步步综合起来，形成具体的概念，形成逻辑系统或理论系统，一直达到能够把握住"总念"，而这个"总念"，据黑格尔说来，已不再是人们头脑中的纯主观的东西，而是体现着深藏在客观事物对象内部的本质。黑格尔说："无论总念也好，判断也好，均不仅仅在我们脑子里发现，并且不仅是由我们造成的"。"当我们进行去判断或批判一个对象时，那并不是根据我们的主观活动去加给对象以这个谓词或那个谓词。反之，我们乃在观察由那对象的总念所自身发挥出来的特殊性格"。(《小逻辑》，中文版，第345页)

这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在黑格尔的哲学里，主观和客观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并不是像于世诚同志所说的那种直接的同一性，如像在许多别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所有着的那种情形，在黑格尔的哲学里，由主观达到客观，由思维达到存在，由人的观念到对象的本质，是经过一系列的思维的矛盾运动，经过对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进行一系列的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的这种媒介运动而实现的。把人们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过程，看做是观念的辩证运动过程，这是黑格尔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辉煌的贡献，这是不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加以肯定和赞赏的（《哲学

笔记》，第 189 页）。

于世诚同志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立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这是片面的说法，他不知道，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立足于他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中的。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地就是认识的辩证法、概念的辩证法、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统一的辩证法。黑格尔当然不知道自然界的辩证法，他只是通过概念的辩证法的研究，而猜到了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这主要是由于他把人的主观认识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辩证运动，说成是观念对自己本身的认识运动。然而黑格尔的这个唯心主义辩证法，又是一切唯心主义中最接近唯物主义的。在黑格尔的观念的辩证法运动中，只要抛弃了那把“总念”、“绝对观念”说成是客观世界的本质的思想，把那些偷换到事物“内蕴”、“深处”的思维的东西还原为客观事物的物质实在，就可以找到许多对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极为有用的宝贵的东西。因此，列宁说：“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学说是倒立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大抵抛弃神、绝对、纯粹观念等等。”

由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具有着两重性，有着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糟粕和辩证法的精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它，就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必须采取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展的态度，即否定它的唯心主义，而对于它的辩证法的核心则又加以肯定。对于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观点也应如此（因为如于世诚同志所谈的，这是他的哲学体系的立足点），对它的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一面必须坚决予以驳斥，但对于它的辩证法的一面则应该予以肯定的评价。不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这样做的。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里，曾引了黑格尔的这样一

句话："概念在其客观性中，是自在自为的事物自身"，对这种形而上学的提法，他曾给予尖锐的否定的评语，说这是"＝客观主义＋神秘主义和对发展的背叛"。(《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6页)然而，在《哲学笔记》的另一个地方，列宁又引了黑格尔的这样一些话："事实上，主观仅仅是从存在和本质而来的一个发展阶段，——然后这个主观性辩证地'突破自己的范围'并且'通过推理展开为客观性'"。这些话如果用于世诚同志的眼光看，又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了，然而列宁却在这里看出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的思想，并且加以称赞，说："极其深刻和聪明！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同上，第195页)。列宁还从黑格尔《逻辑学》的最后一页摘引了这样一段话："正是因为观念把自己当做纯粹概念与其实在性的绝对统一，从而把自己列入存在的直接性，所以作为具有这个形式的整个来说的观念就是自然界"。这里谈到了"纯粹概念与其实在性的绝对的统一"，说到观念"把自己列入存在的直接性"，说到"观念就是自然界"，如果用于世诚同志那种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的方法来评论，那还不是十足的唯心主义的等同论吗？然而，列宁对它是怎样评论呢？列宁却是这样说的："《逻辑学》最后一页即第353页上的这句话，是妙不可言的。逻辑观念向自然界的转化。唯物主义近在咫尺"。接着列宁还对《逻辑学》的这一章做了进一步的赞扬，说："极妙的是：关于绝对观念的整整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仅仅有一次偶尔露出了"神的""概念")，此外，——注意这点——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而是把辩证的方法作为自己的主要对象。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后的话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还有一点：在黑格尔这一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

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哲学笔记》，第223页）

花了很多工夫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黑格尔著作中寻找材料的于世诚同志，为什么竟看不见列宁的这些十分鲜明的评语呢？列宁不是也在“美化黑格尔”（见于世诚同志的文章，《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吗？难道列宁也错了吗？撒仁兴同志说：“翻一翻黑格尔的书是有益的”，我认为这句话并不错，但我还要补充一句：如果不采取列宁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采取轻率的、否定一切的态度，那么，即使翻了黑格尔的书也是无益的。

## 三

现在再说恩格斯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采取什么态度，还是先从证据的检查开始。

我在两年前写的《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文中，曾经说到，恩格斯在1895年3月12日给斯密特的信，是明确地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加以肯定的，而于世诚同志却错误地把这信的意思读成了它的反面。他这一次的文章不但不承认这个错误，并且还要对自己的原来看法勉强加以辩解。但这个辩解是非常牵强无力，完全站不住脚的，为要充分说明这一点，我想有必要把恩格斯的德文原文研究一下。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似乎还只看到根据俄文转译过来的译文（我当时引用的也是这个译文），而俄文的转译和德文原文是有出入的，最近在《光明日报》经济副刊上发表的一篇译文，甚至是有原则错误的。

恩格斯原文中有关我们争论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Die Vorwürfe, die Sie dem Wertgesetz machen, treffen *alle* Begriffe vom Standpunkt der Wirklichkeit aus betrachtet Die I-

dentität von Denken und Sein, um mich hegelsch auszudrücken, deckt sich überall mit Ihrem Beispiel von Kreis und Polygon. Oder die beiden, der Begriff einer Sache und ihre Wirklichkeit, laufen nebeneinander wie zwei Asymptoten, sich stets einander nähernd und doch nie zusammentreffend. Dieser Unterschied beider ist eben der Unterschied, der es macht, dass der Begriff nicht ohne weiteres, unmit telbar, schon die Realität und die Realität nicht unmittelbar ihr eigner Begriff ist Deswegen, dass ein Begriff die wesentliche Natur des Begriffs hat, dass er also nicht ohne weiteres prima facie sich mit der Realität deckt, aus der er erst abstrahiert werden musste, deswegen ist er immer noch mehr als eine Fiktion, es sei denn, Sie erklären alle Denkresultate für Fiktionen, weil die Wirklichkeit ihnen nur auf einem grossen Umweg, und auch dann nur asymptotisch annähernd, entspricht."（《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德文本，1953年柏林版，第581页）

这段话译成中文，应该是这样：

"您对于价值规律的责难，适用于从实在的观点来看的一切概念。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完全切合于你所举出的圆形和多角形的例子。或者说，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这两者是并行地运行着，像两根渐近线一样，不断地互相接近，但却不会合而为一。两者间的这种差异，正是使得概念不直接地就这样成为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成为其本身的概念的那种差异。虽然概念有着概念所固有的特性，因而它不是直接地一目了然地和现实——它首先必须从里面抽象出来的现实——相一致，虽然如此，它毕竟不就是虚构，除非您因为现实与其思维结果之间的符合只是经过很大的迂回方式甚至只是采取渐近线式的

接近，而把一切思维的结果都说成是虚构。”

在这一段话里，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给予肯定的积极的评价，是很清楚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词，如果充分地加以直译，就是前面说过的：“用黑格尔的方式来表述我的意思。”这里明明指出黑格尔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作了辩证法的理解，即这种同一性是被看做圆形之与多角形那样一种近似的渐近线式的接近，而不是绝对的同一。因此，恩格斯接着就在“或者说”这个连续词的下面，进一步加以引申，指出这个命题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是不断地互相接近，却不会合而为一地、并行地运行着的。但两者虽然不能直接合而为一，却并不妨碍概念“毕竟不就是虚构”。很明显，为着反对斯密特的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恩格斯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的辩证意义的。

于世诚同志对恩格斯的话作了牵强的曲解，说恩格斯好像是特别“强调了思维和存在的‘差异’”，这样来“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同一论”。他的理由是恩格斯引用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之后，就用“换句话说”，来另外阐明自己的否定黑格尔的命题的见解。于世诚同志这样说：“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必须在认识论中既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又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划清界限。针对斯密特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者的谬论，恩格斯回答说，就算是你把我说成是黑格尔一样都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者，然而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完全适合你所举出的圆形和多角形的例子，即承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仅仅在肯定可知论这一点上，这种笔法同《费尔巴哈论》的笔法相似），接着恩格斯立即用‘换句话说’，即换成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换成恩格斯的话说，来说明马

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哲学研究》，1962 年第 3 期，第 38—39 页)“换句话说”，是从俄文的“иначе”转译来的，其实这个字的德文原文是“oder”，应该像上面译作“或者说”，译作“换句话说”并不确切。在“或者说”的下面所说的一段话，决不能看做是对前面的命题的否定，只能看做是对前面的命题的积极的发挥，这是具有起码的语法常识的人都能够了解的。(并且，即使是译作“换句话说”，于世诚同志的那种说法也是不通的。)于世诚同志既然能读德文书，就不应该对这个最普通的德文单字也弄不清楚。

这里必须指出，上面引的于世诚同志的一段话里，还有一个历史知识的错误。他说恩格斯的这封信，是“针对斯密特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者的谬论”而作的回答。稍微会用头脑思考问题的人都可以看出，恩格斯的语气，决不像是为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而写的。恩格斯所回答的，是斯密特“对于价值规律的责难”，是他的那种不可知论的观点，即把价值概念说成仅仅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虚构，否认概念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恩格斯对这种康德主义的谬论给予“尖锐的批驳”，但是对于于世诚同志所讲的那种“诬蔑”，却半个字也没有提到，也根本没有为此而特别“强调了思维和存在的差异”，“批判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绝对同一的理论。”(同上，第 39 页)于世诚同志对恩格斯的信的这种解释是毫无根据的、凭自己的主观“想当然”的解释。

当然，于世诚同志他所谈到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来由的。斯密特的确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作过这种诬蔑，不过，这并不是在恩格斯活着的时候，而是在恩格斯死后。因此，恩格斯当然就无法在自己的信里回答这个诬蔑，而回答这个诬蔑的人，乃是俄国的普列哈诺夫。于世诚同志也提到普列哈诺夫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同上，第 40 页)但是，这是 1898 年到 1901 年之间的事，而不是恩格

斯写那封信时——1895年——的事。于世诚同志对这次有关的问题似乎是努力做了历史的研究，但他的研究竟得出这样的结果！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校正于世诚同志的历史知识的错误，是为着再一次说明，恩格斯生前的情况，和他死后的情况有所不同，恩格斯活着的晚年，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威信已开始普遍地树立起来，这时伯恩斯坦之流的修正主义思想也露头了，但还没有形成很大的势力，还没有像恩格斯死后那样敢于对马克思主义举行大规模的猖狂的进攻。那时斯密特的修正主义面貌也还没有显露出来，恩格斯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修正主义者来对待，而是把他当做一个思想上有些错误的青年朋友来对待，对他进行了谆谆的教诲，并非常耐心地向他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恩格斯给他的一些已有中文翻译的信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那时欧洲的哲学界流行着“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反对黑格尔哲学和宣传不可知论成为很大的潮流，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着这个反动潮流，曾在许多文章里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积极意义。恩格斯看到斯密特是受了康德主义哲学的影响，为着想帮助他克服错误，曾劝他好好的学习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给斯密特的许多信中，总是首先指出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形下，恩格斯对斯密特提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时，就着重从它的辩证法方面来给以肯定的解释，这是很自然的。

为着证明这里所说的情形，我想介绍一下恩格斯给斯密特的另一封信。这信写于1891年11月1日，现在摘录如下：

“……没有黑格尔，当然不行，而要领会他就必须付出时间。……

……最重要的部分是，本质论：抽象的对立消溶在它们的不确

定性中，当人们想死死地只抓着一个方面时，它却不知不觉地转为另一个方面了，如此等等。这一点你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的，例如，你可以作为未婚夫，在你自己和你的未婚妻的身上，找到同一性和差别性之不可分的鲜明的例证（恩格斯写这信时，斯密特刚刚订婚；恩格斯在这封信的开头曾向他表示祝贺，这说明他们当时个人的友谊也并不坏），完全没有可能来确定，两性之爱的欢乐，是由于同一性中的差别性，还是由于差别性中的同一性。试取消这里的同一性（双方都是人）或差别性（这里是指性别）你还会剩下什么呢？我回忆起，最初，正是这个同一性和差别性之不可分，使我感到多么困惑，而我们不被它绊一绊脚跟，就一步也走不出去。

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像巴尔特那样，只为着发现黑格尔用作体系的杠杆的那些荒唐论点和骗人伎俩，去读黑格尔的著作。这是小学生的事情，……”（译自《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德文本，1953 年柏林版，第 524—525 页）

从这封信的口吻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是把斯密特当做一个青年朋友来给以教诲和帮助，而并没有把他作为政敌来看待。恩格斯一开始就强调学习黑格尔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要着重学习他的辩证法：同一性和差别性之不可分的关系，对立面的互相转化，等等。恩格斯也指斥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荒唐论点和骗人伎俩”，但却认为如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方面，就不但是片面的、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幼稚的行为。恩格斯特别向斯密特介绍黑格尔的同一性和差别性之不可分的关系的观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旁证，说明恩格斯论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时，是着重于肯定它的辩证意义，肯定它的差别的同一性。正是因为恩格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遵教诲的堕落

青年斯密特，才会在恩格斯的死后把他的话加以曲解，诬蔑唯物主义者恩格斯肯定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恩格斯并没料到这个诬蔑，因此他的文章也就不会特别为这个诬蔑来作回答。

但马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哲学总是采取批判态度的。恩格斯并没有单纯地、片面地肯定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对于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的唯心主义方面的理解，他仍然无保留地给予彻底的否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对杜林的批评，只是其例之一。“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证明某一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某个黑格尔的最荒唐的、神魂颠倒的幻想之一”(参看《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指斥的，正是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的唯心主义方面的，也是杜林的片面的了解。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恩格斯也作了类似的批判。这些批判都不能说是对黑格尔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个思想的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贝克莱的，马赫主义的等——以及谢林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全盘否定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把这类理论看成“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3页)，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列宁并没有说这个理论就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18—19世纪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如于世诚同志所武断的那样。对于黑格尔的有关思想，列宁是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又否定又肯定，又批判又赞扬的态度，如像在《哲学笔记》里所做的那样。

和列宁一样，恩格斯对黑格尔也是采取又否定又肯定，又批判又赞扬的态度的。而在康德主义，不可知论以及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流行情况下面，恩格斯就比较地更着重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法。为

着充分证明我们的这个论断，我想再从《自然辩证法》里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都服从于同一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整个理论的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8世纪的唯物论，由于它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性质，所以只就这个前提的内容去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且还复活了下面这个命题：‘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同时也从形式方面去研究这个前提的，只有现代唯心论的但同时也是辩证法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不管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无数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的东西；不管这种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是采取了唯心论的颠倒形式，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个哲学在许多场合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与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即同一的规律支配着这一切的过程。……”（《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3—234页）

看吧？恩格斯是怎样估计黑格尔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恩格斯虽然也批判了它所采取的唯心主义的颠倒形式，但又指出它“同时也是辩证法的哲学”，这个哲学证明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还不能加以完全证明的重要真理，即同一的规律支配着思维的过程与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

## 四

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并不就等于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这道理已经充分地说清楚

了。“迷信”应该再一次打破:不能说在任何意义上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加以肯定,都会沾染上唯心主义的鬼气。不错,列宁曾说过:“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性理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但是,普列哈诺夫在《再论唯物主义》(《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5—156页)这一篇文章里也曾肯定了“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之同一性”,这篇文章,列宁是见过的,为什么列宁在批评普列哈诺夫的其他错误时,却没有把他的这些话说成“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呢?为什么列宁对普列哈诺夫的这些文章还作了相当高的估价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前一种同一性和后一种根本不同。前一种是波格达诺夫在主观唯心主义的意义上所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把思维与存在看做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思想,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从头到尾坚决加以反对的,都是这种同一性。当普列哈诺夫说到“只有唯心主义才承认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同上,第55页)时,他所指的也是限于这种等同论。至于后一种普列哈诺夫自己所说的同一性,则是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意义上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样的肯定,并没有任何错误。所以,尽管普列哈诺夫的这篇文章是为着回答斯密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而写的,尽管这时斯密特也采取了偷换命题的诡辩法,硬说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肯定了唯心主义,但普列哈诺夫仍然理直气壮地作了他自己的肯定(虽然他的肯定还不够深刻,因为他不了解认识的辩证法),并且说:“斯密特的‘批评’武器,反对这一同一性,是完全无力的。”

历史的发展往往在外表上重复某些旧事物的特征,于世诚等同志在现在也想来反对这一同一性,他们的“批评”武器也同样是完全无力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依据自己的观点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给予肯定的答复,决不会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更不是要用"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必须有自己严格的专门的术语,当然不能用"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来代替反映论或能动的反映论。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只是说对于"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页)这个问题给予辩证唯物主义的肯定的解答,也就是从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上来给予解答,这决不等于要改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专门术语。但是,不能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论"来代替反映论或能动反映论,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列宁曾坚决反对用"实在论"(Realism)这个术语来代替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原因是这个术语曾被唯心主义玷污过,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者在文艺理论的范围内以肯定的意义使用这个术语——"现实主义"(外文也是同一个 Realism)。同样,因为在历史上唯心主义者曾使用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就把它看成辩证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条件下也不能涉足的绝对的"禁地",这完全是书呆子气十足的形而上学!

有的同志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说成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共同的概括",我认为这话是有语病的。但我们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者在内——都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这并没有什么错误,也不见得因此就会混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界限。因为这里所说的绝大多数哲学家们的共同点只限于对"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

现实世界"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这一点，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如何肯定这个问题上也有共同点。在如何肯定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哲学派别当然有不同的方法和观点，这里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唯心主义者，首先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是用形而上学的绝对等同论的观点来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黑格尔的哲学一方面用唯心主义的等同论观点，另一方面又用辩证法的方法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他的辩证法的一面为哲学思想史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人类的思维是一个不断地接近现实世界的发展过程；一切唯物主义者都从反映论的观点上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指出人们思维能够反映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其中，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只能"从内容"上去研究这个问题，即"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辩证唯物主义则不只要从内容方面，而且还要"以从形式方面"去肯定这个辩证的同一性，还要证明思维和存在两者是渐近线式地并行地运行着的发展过程，"两者之间虽有差异，但都为同一的规律支配着"，或者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的，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这里还应该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认识论上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它揭示了人类的社会实践和认识的不可分性，揭示出思维和存在的上述的辩证同一性，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

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人类的变革世界以实践过程推动人的意识、认识、思维向前发展，意识、认识、思维的发展又指导人们去变革世界或“创造客观世界”。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就把人的思维、意识、认识看做是在实践中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就是能动的反映论。毛泽东同志把能动的反映论概括为这样一个总的公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这样，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就是以实践为基础，通过不断前进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而实现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来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

以上这些，就是不同党派哲学家们在肯定地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不同的方法和观点，这里的界线不是划得很清楚的吗？是不是因此恩格斯和列宁就成了唯心主义者，而“贝克莱和费尔巴哈也成了辩证论者了呢？”(《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第38页)请放心，于世诚同志们！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混乱现象。你们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

(原载《哲学研究》1962年9月，第5期；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 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问题*

(1962.10)

在目前哲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研究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问题。

列宁说过：研究认识论必须用辩证法去研究。

过去的哲学家没有把辩证法运用到认识论中去。黑格尔曾说，认识是辩证的过程，但那是唯心主义的。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辩证法和认识论结合起来。简单地说，人的认识就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主客观矛盾、知和不知矛盾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之一，就是彻底地把辩证法和认识论统一起来，科学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发展规律。以前的旧哲学都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把认识论变成科学，其主要关键就是把认识过程放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把认识和社会实践统一起来了。这个认识的规律，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阐明得很清楚。

《实践论》就是阐明认识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克服主客观矛盾、知和不知矛盾的理论，是讲人们认识规律的科学著作，它是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没有辩证法，或不懂辩证法，就不能掌握人的认识规律。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实践论》是科学

---

* 艾思奇于1962年10月，在北京哲学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中，讲了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这是报告记录的摘要。在整理时只作了文字加工。

地反映了认识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认识看做一个过程，而旧唯物主义哲学却认为人能一下子就认识一切，这是错误的。

认识的目的，就是认识必然，得到自由。认识客观规律就是认识客观必然，掌握这个必然，就能得到自由。斯宾诺莎、黑格尔都曾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是，没有认识到：认识必然是一个过程。

恩格斯肯定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对必然到自由是一个过程的问题，也曾指出“自在之物”到“为我之物”，即“自在的必然性”到“为我的必然性”，是可转化的，但也未强调这是一个过程。恩格斯在谈到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时，认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似乎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人的认识，从必然到自由就不再是一个发展过程了。

毛泽东在必然和自由的问题上，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强调这是一个过程。毛泽东在 1962 年 1 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还说：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

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实践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丰富和发展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的人认为，有了优越的制度，不斗争就可以得到自由，那是不对的。在旧社会，由必然到自由需要斗争；在新社会，由必然到自由也需要一个斗争过程。虽然不像旧社会那样，要对抗斗争，要推翻旧制度，才能得到自由。在新社会，我们不必推翻现制度，但必须和主观盲目性作斗争。只有从实践中克服主客观的矛盾，必然性才能被我们认识，才能得到自由。当然，我们不但要和盲目性作斗争，还要和旧社会的残余作斗争。不仅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只有在实践中取得经验，经过一个过程，才能认识必然，得到自由。我们对任何新的东西，无论做或认识，都要有个斗争过程，思想上要有碰钉子的准备。应当把这当做规律看待。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强调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指明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是一个过程，教导我们在实践中去克服困难，克服错误，这是科学的思想。任何科学的发现，都是经过若干次经验积累，把积累的经验作综合的分析，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重视辩证法和认识论统一思想的研究，这对我们实际工作有很大意义。

# 关于哲学教科书的一些问题*

(1962.10)

## 一、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编写哲学教科书的原则，大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我们编写教科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学习哲学的同志讲解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不是要写一本学术讨论的著作。我们力求它的内容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希望能在稍长的时期内，不必作很大的根本性的修改。本书（即艾思奇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编者）在解释哲学原理和原则时，着重系统说明经典著作中已经有了定论的，或是在理论界经过讨论，大体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尽量避免一些在学术界还有争论或争论还没有完结的问题写进教科书中。例如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生产力内部有没有发展动力，这类问题，我们就没有写；又如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在某些方面虽然已有了结论，但争论还没有完结，这类问题，我们也没有写进教科书中。

在联系实际问题的时候，联系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着重从哲学上概括一些比较重大的经验。民主革命中许多经验

* 本文原是艾思奇同志应邀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所作的一次讲话，后摘要发表。

是经过总结了的，我们都联系了。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著作和党的历史，联系了民主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但对许多具体的并且正在试验的措施，我们就避免去论述它，因为它本身是否成熟，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前两年我们喜欢把一些眼前正在试验的措施写进教科书中去，过半年、一年就要作很大的修改。这就不能保证教科书的稳定性。我们这次就没有这样做。讨论学术问题的著作，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写，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要联系什么问题也可以比较随便；教科书则不能这样做。

第二，力求比较准确、简练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同时又在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说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把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哲学原理和说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如果我们不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就不可能了解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要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只注重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而忽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贡献。过去这种偏向是有的，我们要反对和防止。另一种是，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还没有搞清楚，就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泽东同志对它的发展。这种偏向前几年也是有的，我们也要反对。强调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强调研究问题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个方向是要坚持的。但是，如果不注意毛泽东思想本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

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还没有搞清楚，就想了解毛泽东同志对它的发展，这是不对的。以为只要贴上一个标签，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第三，教科书应该适应它的对象。我们考虑到，教科书既应适应教师的需要，也应适应学生的需要，要根据教师和学生的需要来写。学术著作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作者想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我们这本书，主要是一般高等学校文科学生用的哲学教科书。教学时数有一定的限制，教科书的分量不能太大，哲学的基本原理又都必须讲得全面些，因此，内容的阐述就应力求简明扼要；联系实际力求避免用很多的、繁杂的例子，只要能够说明问题就够了。这样作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教科书的分量适当，使学生有学完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教师在讲授时有发挥的余地，使学生有独立思考的余地。由于原理原则讲得比较扼要，因此一部分学生理解它会有一定的困难。有困难是免不了的。这些困难可以由教师来帮助解决。书中联系实际的例子不多，教师在讲授时可以补充一些。书中没有举目前正在试验的事情作例子，教师讲课时如果认为适当的也可以举。教师可以斟酌情形把问题讲具体一些，解释原理时可以更详细一点，引用例子可以更多一点。

第四，贯彻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原则。为什么教科书尽量避免直接涉及理论界有争论的问题，或争论尚未完结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反对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提出这些问题和讨论这些问题。相反地，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便于教师和学生能在课堂上自由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教科书里不写学术界争论中的问题，对学术界争论中的问题不作论断，是为了不让教师和学生有先入之见，在课堂上敢于自由讨论，保持活跃的学术空气。有的同志说，教科书里对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不作论断是个缺点。我们是有意识

地这样做的，让教师来启发同学的思想，活跃学术空气；根据课堂情况、学术界的情况，适当引导学生提出一些讨论中的问题，研究学术界争论的问题。

教科书尽量避免涉及争论的问题，并不是绝对不涉及这些问题；有些地方，有些问题也不能不涉及，否则，书就没有办法写下去。如《绪论》中的哲学史部分，谈到老子哲学问题，关于老子哲学的性质，正是目前学术界争论中的问题。由于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必须谈，否则中国哲学史就无法写。我们谈了这个问题，并表示了我们自己的意见。又如对部分质变如何理解的问题，上海和北京有不同的意见。生产力究竟是三要素还是两要素，苏联有不同的意见，他们的哲学教科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提法就不同，各写各的；对这个问题，中国也有不同的意见。这一类问题，虽然理论界的讨论还没有结论，我们仍然写了。要写就要有论断。我们下论断时是采取编写组大多数同志认为妥当的意见。如关于老子哲学性质的问题，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在教科书里就把它说成是唯心主义的；同时在附注上指出，这个问题还有反对意见。这样可以使教师和学生的思想不受限制。教师可以不同意教科书的意见，可以提出他的根据和理由，说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学生也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还在争论的学术问题，不能写出最后的意见限制大家的思想。也有些问题，我们写了自己的意见，但没有加附注，因为觉得没有必要。我想声明一句，只要不是在经典著作中可以找出根据的定论，不论在教科书里有没有附注，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讨论。在经典著作中有了定论的问题，我们不赞成有反对意见。当然，如果有人不同意经典著作中的定论，要提出讨论，也不能完全禁止。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怕有人提

出反对意见的。有反对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会更进一步证明它的正确性，也才能使人更深刻地了解它的正确性。

## 二、怎样使用哲学教科书

首先，这本书是供一般文科同学使用的，哲学专业使用时会嫌内容少一些，理工农医科专业使用时会嫌多一些。现在还没有写出一本分量较大的、为哲学专业用的教材，因此，哲学专业也有采用这本教科书的，在使用时就需要教员依据情况补充一些内容。理工农医科专业用这本书时又需要教师进行适当的挑选和辅导，有些内容可以少讲一点，如像《绪论》哲学史部分，可以适当省略。这样，在使用教科书时，就要求教师表现自己的创造性，适应不同的对象，更好地发挥教科书的作用。

其次，在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教学时，要努力做到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联系实际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它的总原则是要用理论原则作为方法指导，来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有一种方法叫做原则加例子的方法，这就是在讲述某一理论原则的时候，挑选一些自然界或社会的现象来作为证明。为了通俗地说明问题，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部分地曾用过这样的方法，但仅仅采用这样的方法，是不够的。严格地说，这种方法还不能算是真正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真正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需要采用更高的方法。最高的方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对革命工作和科学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做出结论，提出指导工作和斗争的方针、计划、方法，以此来推动工作和斗争取得胜利。这个最高的方法，我们一般哲学教师是不可能马上做到的，但应该把这作为长期努力的方向。还有一种方法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来批评某种错误思想，这是比原则加

例子高一些的方法，其所以高一些，是因为在批评一种错误思想的时候，就树立起了思想的对立面，并通过批评斗争来解决一个矛盾。而解决矛盾，就是解决问题，在研究理论的时候解决了一定的问题，就算是达到了联系实际的目的。原则加例子之所以不能算是真正联系实际，就是因为它不解决什么问题。应用这样的方法来讲课，就需要教师们自己善于找到某种违背理论原则的错误思想来作为批判的对象，这种对象可以在学校范围内存在的活的思想中找到。联系活的思想来学习理论，可以收到很大效果。但应用这样的方法时要十分谨慎，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如果不采取谨慎态度，把人们所说的话不加分析地随便戴上错误思想的帽子，那就不但得不到好的教学效果，而且会适得其反。挑选思想批判的对象，不能只限于学校范围，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国内的革命历史上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现的各种错误思想，都可以联系到哲学上来加以解决。自然科学的某些错误理论观点，也可以作为批判对象。教科书本身也批判了一些这类的错误思想，教师们不妨就这些加以适当的引申，也可以自己独立地另外找一些批判材料。还有一种比较更高一些的方法，这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对我们周围的许多工作和斗争的经验加以概括和说明。从事哲学教学的人应该努力学会应用这样的方法，前一种方法，也只有在这一种方法应用得好的时候才能做得好。这个方法要应用得好是不容易的，但努力做去是可以逐步学会的。例如这几年人民公社发展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上加以概括和说明，人民公社几年来如何逐步完善起来，这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和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的逐步发展过程密切联系着。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不断地暴露和一步步得到解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主

客观的矛盾，我们的认识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的党中央领导，能够不断地及时发现和及时纠正错误，使主客观之间的矛盾逐步得到解决，使我们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日益深刻，日益全面，日益完善起来。像这样，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对人民公社的经验做出一些概括和说明，由此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获得较为深刻的说明。这就是一种联系实际的方法，是比仅仅批评某一种错误思想要高一些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也同时可以包括批评错误思想的方法在内。这个方法之所以比较高，就是因为它要我们应用理论来分析问题，说明问题，来概括和总结实践经验。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时应努力联系实际，要避免太多地纠缠在纯粹概念和原理的争论上面。有许多人喜欢讨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间是否对立统一关系”这类的问题。这些问题谈来谈去最后就陷于纯粹是概念上的纠缠，很难从这样的讨论里来说明和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虽然在学生提出来时可以多少谈一谈，但决不要扯得过多。总之，搞哲学的同志要多注意联系实际问题，要对实际问题提出自己哲学上的说明和看法。如果长久不敢这样做，我们哲学工作就会停滞起来不能前进。

在联系实际时我们的教师同志可以比教科书中联系的问题更具体些，可对当前国际、国内的一些实际问题做出哲学上的说明，例如今年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有一个公报，公报中提出了并说明了许多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教科书中没有联系到，因为教科书是去年写的。但教师们在教学时就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当前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对这些问题做出哲学上的说明。公报中讲到几年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很多困难，而成绩是主要的。这些问题在讲辩证法时就可以作

哲学上的说明：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人的认识却难免有片面性，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而不注意相反的方面。如果对国内问题只看到缺点的一面，就不能理解成绩为什么是主要的这一点。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既然根据大量事实，充分理由，得出了一致同意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个结论，我们在讲辩证法时就有责任给予哲学上的论证和说明，只有这样，才能使同学们认识更深刻，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有信心。从世界观上来打好认识的基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哲学教师们做一些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理工农医科专业的哲学教师还可以就自然科学的问题来作些解释。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也谈了一些自然科学的问题，但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同志，都不是专门搞自然科学的，因此举的那些例子都很简单。理工农医科专业的哲学教师同志们就可以更多地对自然科学上的理论问题作哲学上的说明。如像在生物学领域中米丘林派和摩尔根派的争论，有一个时期米丘林派曾把自己说成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生物学派，而摩尔根派则是唯心主义的。这样的说法如何不对？我们要从哲学上来加以论证，在理工农医科专业从事哲学教学的同志，应该努力来解决这类的问题。总之，联系实际可以联系社会政治问题，也可以联系自然科学问题。

联系实际要注意避免对具体问题不加分析，任意抓住一点，贴上标签。有些哲学工作者曾经有过这种缺点，如对实际问题不是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然后做出结论，而是随便贴上个标签，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是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完全与联系实际的正确方法背道而驰。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问题的指南针，而不是标签，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首先要求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要求用辩证法对事物的正面、反面作周密的分析研究，然后才作结

论。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计其余，根本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联系思想是联系实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这在上面已提到一下，现在再说一说。初学哲学的人一定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学习才能深入。如我们讲什么是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的特点时，就可以联系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我们曾经有过的一种思想，这就是把摩尔根学派的研究成果，不分青红皂白，当做唯心主义来看待。这样的思想就值得在学习唯物主义的时候重新认真地来检查一下，只有在这样的具体问题上联系自己的思想，把正确的观点加以肯定，错误的观点加以修正，才能帮助我们对于什么是唯物主义的问题获得深刻理解。联系思想和联系周围实际是分不开的，要对周围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才能肯定我们的哪些思想认识是正确的，哪种思想是错误的。这样才能做到联系周围实际、联系思想，达到解决问题、加深认识的目的。

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一定要批判对立面，要和唯心主义、主观主义作斗争。批判主观主义并不是随便乱贴标签，乱戴帽子，而是进行认真分析，认清了确有主观主义，然后再加以批判。在这里还要区别个别问题认识上一时的主观性、片面性，和坚持主观片面认识一直发展到系统程度的主观主义，两者是不同的。个别问题认识上一时的主观性、片面性是任何人在认识过程中不可免的情形，只要能够在认识过程中比较及时地克服，就不是主观主义。如果把这也当做主观主义来进行批判那是不对的。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批判对象，可以在我们现有的活的思想中找到，也可以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理论中找到，也可以在过去历史中找到。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现状，但联系历史也是一种联系的方法。不管是联系现状还是联系历史，都要作详细的调查研究，然

后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总之，学习哲学要在批判错误的斗争中学，因为真理总是在和错误相比较、相斗争中发展的，讲真理也只有在和错误斗争中对比中才能讲得深入。讲辩证唯物主义应该树立对立面——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等。

主观主义有两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学生中可能没有经验主义，教科书中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列，不一定恰当，经验主义可以不强调。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学生中是否有经验主义当然可以研究，但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讲原理要全面，主观主义既然有两种，就需要全面讲到。并且，认为大学生中只有教条主义而没有经验主义也不见得对，学生很可能没有系统的经验主义，但经验主义性质的思想是否就完全没有呢？他们如果不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那么会不会产生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呢？肯定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拿大学生下乡劳动来说，有的人得到一点劳动经验，局部地区的经验，就自以为有普遍意义，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在实验室中做实验，有了一点经验，而看不到这点经验的局限性。这都是经验主义性质的东西。并且，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实用主义的坏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实用主义就是一种经验主义，因此不能说在学生中批判经验主义没有现实意义。我们讲经验主义常常是指工作中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有所不同，但就其实质来说，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马赫主义也有某些基本的共同点。因此，我们在教科书中和在大学中批判经验主义决不是完全无的放矢的。还有一个问题，教科书中论到主观主义时，不是把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列而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列，这是不是不强调反修正主义呢？当然不是，我们的教科书是把反对修正主义思想作为一个主要的批判方面的。但修正主

义不只是思想方法的问题，而且是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体系，而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是思想方法问题。第一章《绪论》中第四节谈到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时就是从方法论上讲的，所以，在这里只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列，并不就等于不强调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可以是经验主义的，也可以是教条主义的。但就主要的情形来说，修正主义的思想方法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我们有时也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并列，这里的教条主义就不单纯是思想方法的问题了。修正主义是根本背叛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该和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也是要反对的。我们在第一章《绪论》中讲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所以没有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并列。在教科书中我们是把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作为政治上主要的反对方向的。修正主义的方法不仅包含经验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且也包含诡辩论，诡辩就是主观随意地歪曲应用辩证法的对立面相互转化原理，如说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不经过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例。辩证法谈转化，总是有条件的，因此辩证法认为，资本主义一定要经过革命才能转化为社会主义。而诡辩论在说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时取消了不可少的一个客观条件，由此做出荒谬的结论，说现代资本主义可以直接转化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议会可以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机关，而把马克思主义讲的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一条件抹煞了。

上面谈的是如何利用这本教科书的主要问题。下面再谈一点零碎问题。

讲授哲学史是否需要划三个时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按恩格斯的说法划分三个时期，另一种意见是不划分三个时期。我们

在教科书中没有明确划分三个时期，原因是中国哲学史中第二个时期、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时期很短，只有一二十年，而古代唯物主义时期很长，有几千年时间，内容丰富，这和西方哲学史不同。因此划分三个时期和西方哲学史并列起来写有点不方便。但恩格斯说的三个时期是应该肯定的，哲学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也是三个时期，只是第二个时期从康有为、梁启超时起才有点萌芽，到孙中山、“五四”运动时止，只有一二十年，时间很短，而且没有出现完整的体系。我想教师同志们在讲授时可以肯定恩格斯的三个时期这一规律。当然规律的表现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中国的表现就有它的特殊性。

关于这本书里讲到一些自然科学的问题，文科同学说看不懂，有的教师也说不懂得，怎么办？我看暂时不完全懂得，也不要紧。如关于相对论的问题，文科哲学教师很可能不懂，就是理工农医科的哲学教师如果未钻研过相对论也不会懂，我们教师同志们可以告诉同学，我们谈这些问题，只是要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结论来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至于为什么得出这些结论，不搞这项科学专业的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因此我们也不必勉强去求完全弄懂，只要这些结论在科学理论上已有了定论，在实践上已经得到了证明，我们应当相信这一结论，我们的任务是只要了解这些结论的内容，并且弄清楚它在哲学上的意义就够了。

最后，在使用教科书的时候，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水平出发来进行讲解，学生所需要解释的问题，和教师、专家所需要解释的问题不一定相同。有些问题，对于教师来说似乎已经明白，不用多解释的，对于学生来说却需要充分解释，例如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是哲学上的最根本问题，这个原则在教师

和对哲学有专门研究的人是已经清楚了的，但对学生却需要从各方面反复阐明才能理解。同时，不充分了解这样的根本问题，其他哲学问题也就不可能进一步深入理解，因此，教师同志切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问题，在同学中也不会成问题，而不作详细的阐明。教师们在进行教学时，应该首先研究同学的要求，根据他们的要求挑选某些问题重点地详细讲解，而不要对一切问题都平均地使用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原载《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5期，1962年10月；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 曲折前进是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

(1962)

宇宙发展的总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不断上升的过程。在总的上升趋势中，到处可以看到前进与后退、向上与向下、正向与反向等互相对立的运动倾向、反复交替的现象。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历过蓬蓬勃勃的前进上升时期，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就转入倒退没落的过程。然而接着就出现了辉煌灿烂的新的人类社会的前进运动，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的胜利。在自然现象方面，地球曾经像太阳一样，是一团奔腾涌沸、光芒四射、不断爆发的原子能火焰。后来表面逐渐冷凝僵固，像是要进入休眠死寂的状态了，然而终于又活跃起来，出现了有机物和生命，展开了天体发展史上万紫千红、无比丰富的图景。生物的进化，是各种各类有机体的兴起、灭亡和更高的有机体又再兴起的运动。爬虫类曾是中生代横行世界的霸主，由于冰期的出现而遭到灭绝；接

---

* 这篇文章是1962年写的。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总理为首的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在社会上和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出现了一些怀疑、动摇、悲观的情绪。艾思奇试图在哲学理论上阐明我们党的方针，辩证地分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曲折，从而坚定我们前进的信心。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作者在中央党校内部曾讲过多次，但没有公开发表。1979年10月在《昆明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上首次登载。

着来到了新生代，陆地上的统治地位就被更高级的哺乳动物所掌握，而人类就是从哺乳动物中发展起来的。不但这些巨大的自然界发展过程表现为方向相反的运动趋势，不断相互转化的形式，最为微小的粒子如电子、中子、质子等等的空间运动，也是采取波浪形式曲折前进的。人类的整个历史经历了一个大的回旋周期：由原始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然后又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人类的日常生活，也是由许许多多小的周期构成的，例如每天的工作、休息，再进入第二天的工作，就成为一个周期。这些周期性的过程，都由反复出现的互相对立的运动趋向所构成。

在总的前进上升过程中包含着正相反对的各种运动趋向不断相互转化的内容，这是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也作用于人类的革命实践斗争中，革命是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前进事业，这个事业中就包含着高潮与低潮、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等等多次循环往复的现象。在革命前进的途中，每一次进攻战役之后都必须继之以暂时的停顿、休整；当周围遇到了特别的困难，或者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逆流，往往要走上曲折的甚至于暂时退却的道路。但是停顿、休整、曲折、退却之后又会继之以新的进攻，在党的领导下，困难会被克服，逆流会被冲破，错误会被改正，革命斗争会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1927 年右倾机会主义所导致的失败，使革命由城市退入农村，但我们终于建立了工农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 年至 1934 年间，“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工农红军不能不从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转移，但长征的终点又成为革命运动更强有力的大发展的起点，经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而取得全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革命是前进上升的运动，但不是直线上升的前进运动，而是有进有退、有起有伏的波浪式地向前推进的运动，革命事业是这样，宇宙间的任何事物也都没

有例外。

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谈谈辩证法问题》）又说："发展不是按直线式而是按所谓螺旋式进行的。"（《卡尔·马克思》）"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一切事物内部都包含着互相对立的倾向和势力，这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的源泉；第二，由于内部互相矛盾的倾向和势力的斗争，使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或者说，使发展过程采取不断地向对立方面转化的形式。所谓螺旋式的行进，就是进与退，向上与向下，正面与反面的运动形式不断地互相转化的发展形式，肯定这种发展形式的普遍意义，是辩证法的宇宙观的基本点之一。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即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是用逻辑的形式概括了上述宇宙万物发展过程的特征，即"螺旋式行进"，也可以叫做波浪式的推进或周期性的前进：起初是具有某种肯定意义的前进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转化为它的否定，表现为与原来前进方向相反的某种发展趋势，包括转折、停顿、变形、向反面的转化等等，然后在一定条件下，这个趋势再被否定，转回到更进一步地正面前进的过程，这不是简单地重复最初的前进运动，而是在更高一级的基础上的前进运动。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的统一，正面的发展与反面发展的对立的统一，不断地循环往复，相互转化，构成宇宙事物发展一级高似一级地无限地向上升长的总进程。列宁说："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谈谈辩证法问题》）这是发展的每一周期的基本图景。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实际工作中，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都需要善于应用唯物辩证

法，也必须认识和掌握否定之否定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统一，虽然不能简单地完全归结为这一点；因此，为着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个规律，需要对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相互联系作进一步的分析：后退运动是前进运动的否定，但不是单纯地只有消极意义的否定；只有形而上学者才会作这种片面的理解。后退运动本身自然是一种消极的过程，但也能表现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事物发展的总过程中，某一方面的后退运动在一定情况下正是事物继续向前推进所不可少的环节。没有这样的后退，就没有更大的前进。工作后没有休息，就不能更进一步工作；党团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不继之以整顿，就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革命和战争经过一次进攻战役之后不退入休整阶段，就不可能举行更有力的新的进攻。人的理性认识，对于实践中直接获得的感性经验来说，有一种脱离具体生动性而走向抽象性的后退倾向，但只有经过理性认识，人们才能深入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才能使认识进一步来指导实践。错误对于正确的认识是一种明显的倒退，但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常常不可免地要犯一些或大或小的错误，如果人们善于总结经验，能够由错误中取得教训，就能更深刻地把握正确的认识。批评和斗争对于团结来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但只有经过这个曲折，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更进一步的团结。在革命和战争中间，是否能够认识前进运动和后退运动的这种辩证联系，对于领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对这一点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说：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

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1906年、中国在1927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条约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180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首先是前进发展的观点，但只知道向前的运动而看不见某些为前进所需要的后退，还不是真正的辩证法。辩证法是把后退运动作为一定条件下不可少的从属因素而包摄在自己内部的前进发展观点。辩证法发展观不把后退运动单纯地看做前进运动的消极的否定。辩证法的否定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哲学笔记》，第244页）。深入地观察后退运动和前进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就不会在后退运动中只看见消极的意义，而且也可以发现一定的积极意义。

后退运动对于前进运动来说，是某些东西的丧失。但如果把事物运动中的各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就可以知道，任何后退运动中所丧失的只能是发展过程中某些必须丧失的部分，而不是它的一切积极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仍然被保留下来。革命转入

农村，丧失了某些城市据点，但保住了革命力量的最坚强的部分；军队以退却方式诱敌深入，要打破某些老百姓的坛坛罐罐，但保持着待机反攻的有生力量；整顿组织，在数量上要丧失一部分成员，但却集中了精干的成员；调整工农业生产，要缩小计划上的某些数字指标，但保证了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保证了生产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资本主义的没落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不会随着它的制度而归于消灭。事物的后退运动，通常都是以已往发展的积极成果为基础的某一方面的后退，仅就这个方面来说是丧失了一些东西，但发展过程中已经达到的积极成果则不会根本上有所丧失。当发展过程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逆流、曲折、停顿等等）的时候，发展过程的总体已形成了一个较高的地位，因此，宇宙间不会有整个过程的一切方面的倒退，不会有绝对的倒退。这也就是说，事物的倒退、逆流、曲折、停顿等，在总的向上发展过程中，只会引起部分环节上的某些丧失，绝不会招致发展本身根本的丧失。在发展过程的某些倒退或逆流中应该看到可能丧失东西，但片面地只看到这些可能丧失的东西，而看不见总的过程中已形成起来的较高的基础，这并不是辩证法观点，而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如果把事物的发展过程作更进一步的全面分析，就还要看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后退趋向的时候，也不是一切都走向逆转，而没有任何东西在前进了。对立的统一规律不但表现为对立方面的相互转化，首先还表现为对立方面互为条件地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向对立方面转化，正是共存在统一体中的对立方面互相斗争的结果。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关系也是如此。向前的运动中就包含着某些向后的运动的因素，因此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下转化为后退运动。在后退运动过程中，同时有着新的前进运动的因素，这

些因素的向前发展，使它能够终于再转化为更高一级的前进运动。资本主义在上升的时期，自始就有着使它自己走向没落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这两者的集中表现，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终于使它转向没落的阶段。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没落的过程中，大工业继续向前发展，无产阶级的势力日益壮大起来，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一天天成熟起来，最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终于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获得胜利。在革命势力开始前进的时候，由于组织成分的复杂，敌对阶级的影响，对斗争缺乏经验以及其他主客观的原因，就潜伏着使革命运动犯错误和遭受挫折的因素，因此，在革命发展过程中，逆流的出现，或大或小的挫折和失败，由进攻向防御、退却的转化，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在犯错误和遭受挫折的时候，革命势力就得到了锻炼，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在组织上变得更纯洁更坚强，数量上可能减少了，质量上却更加强了。这些因素的生长，或迟或早地会使革命运动转入新的更有力的前进和高涨。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来看世界一切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不但前进运动占主要地位的过程中，事物是在向上发展，就是在后退运动表现为主要形式的时候，事物的发展往往在本质上、总体上仍然是在前进中。波浪下降的时候，和它上涌的时候一样地多少有所推进，螺旋回折的时候，和它前进的时候一样地有所升高。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出现对原始公有制来说是一种后退，但人类的历史由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辩证法要求我们在一些事物的后退、向下、没落、衰亡的运动中，同时看到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些事物的前进、上升、兴起、生长的运动。在革命犯错误和受挫折的过程中，看到革命人民的经验的增长；在数量缩小的过程中，

看到质量的提高；在休息和睡眠过程中，看到工作精力的恢复和生长。现时代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包括修正主义者）不断捣乱和走向灭亡的时代，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走向胜利的时代，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时代。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同时在一个时代中进行，并遵循着两条正相反对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了这些规律，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又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1376页）资产阶级思想家常用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来恐吓人民：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了，那就是世界的末日，人类的毁灭！马克思主义者鄙弃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这一类牧师式的谎言。事实上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过程中，革命人民一步步建立起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百倍的社会主义新生活。

必须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辩证法：在实践向前推进的时候，注意到与此相联系的必要的后退，注意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的原理，防止"左"的片面性和冒险主义，这样就可以避免一旦必须走曲折道路的时候陷于被动，避免被迫走上不必要的更大的弯路；在实践中遇到困难，要求走暂时的曲折、后退的道路时，要看到已获得的各种重要成就，努力巩固并发展这些成就以及其他积极的因素，反对右的消极退却思想，这样来逐步准备条件，以便时机成熟时能够及时地把工作推向新的更大的跃进阶段。

（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 谈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

(1963.6)

学员同志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哪些发展？

这个题目很大，要求系统的介绍这很困难，只能讲一个大概的轮廓，讲讲主要的发展。

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全面的。所谓全面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最主要的东西都有发展，这里就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

## 一、正确解决了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

唯物主义的问题，主要是认识论问题。

认识论问题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正确的认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一个是如何得到正确的认识，就是杨老（即杨献珍同志——整理者注）所说的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最近中央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问你的思

---

* 这是艾思奇在1963年6月10日给中央高级党校“61班”学员所作的问题解答中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题目，艾思奇只讲了一个轮廓、要点，但是，讲得比较集中，又简明扼要，所以单独成篇。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文字加工。大小标题是我们整理时加的。

想是从哪里来的？认识论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主要是解决什么是正确的认识的问题，反复解释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存在第一，思维第二，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反复解释这个问题为的是什么呢？杨老讲了很多，我不再讲了。反复解释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分清什么是正确的认识，什么是错误的认识。正确的认识就是遵循着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原则，就是注意到认识必须反映客观存在，思维如果不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不是根据客观存在产生自己的思维，而是脱离客观存在，那就是错误的思维。错误就是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了实践，不管什么错误都是这样。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列宁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那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和修正主义者，想在理论上、学术上用诡辩的方法混乱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所以列宁有的放矢地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了很大的力量作了彻底的粉碎性的打击。

列宁有没有“正确的思想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一些，但不是主要的方面。《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有两章是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全书里占的分量比较小。

毛主席有什么发展呢？

我看毛主席的发展就是正确解决了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列宁也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毛主席在列宁解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充分地解决了。列宁解决的很简单，就是实践是认识的标准这个问题解决了。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把认识过程规定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感性的直观，第二是抽象的思维，第三是实践。列宁简单地写了一个公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解决，但是没有作充分的、系统的解决。

毛主席特别作了系统的、充分的解决。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一直到最近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是系统地充分地解决了正确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是很大的贡献。列宁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充分地解决了，并且做出了完整的公式。这就是《实践论》最后一段中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个循环也是否定之否定。实践、认识、再实践，经过一个循环，认识就进一步，就有一个发展，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实践"，是要去做工作。"认识"，就是把工作转为反面，又思考，否定了工作，从事思考，就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思考的时候不工作了，可是工作经验就在思考中间得到提高的，然后思考之后又进一步实践。进一步在实践中把思考的东西作一个检查。错误的东西把它丢掉，正确的东西肯定下来。每一个循环使认识提高一步，多次反复循环的结果就可以得到比较完全正确的认识。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对实践、认识过程又用另外的形式来表述，就是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过程。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不断反复，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样完整地来说明认识过程，完整地论证正确思想从何而来，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是新创造，是重大的发展，是对最根本原理的发展。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毛主席只发展了这一方面，而是说主要发展了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至于正确认识和错误的区别，这个问题，毛主席当然也有发展，在很多著作里都提到这个问题。强调主观要符合客观，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要划清界限；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里讲到：重要的问题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我们就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在《晋绥干部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说，我们的认识要符合客观情况。最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又讲到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以前，首先指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正确与错误界限划分的原理。那么，有什么发展呢？这个发展主要是运用在实际工作里，在实际工作里区别正确与错误。

所以，列宁主要是解决了划界限的问题，而毛主席是更重要地解决了正确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是不是说，毛主席凭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点都不知道，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马、恩、列、斯已经知道的东西，毛主席更加发展了。以前，我讲过一个比方，说毛主席的发展好像树苗和成长的树一样，如果拿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来比，这样比不恰当。但是，就一个问题来讲，是可以这样说的，比如，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问题，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只讲到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在《哲学笔记》中讲了三点。但是，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实践论》，还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里也讲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比列宁讲到的丰富得多了。像这样的个别问题，就可以作比方。还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列宁只讲了两句话："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可以说这是一棵树苗，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里，是树苗和成长起来的树的区别。就毛主席发展的一些突出的问题上来讲，可以看出是树苗和成长着的树的关系。整个来说不好这样比。整个来说，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吗？在1959年时，中央同志已有这种比方，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主干，我们中国的经验是枝叶。这样的比方是确切的。当然这些比方并不是完全的，所以不要把它当做绝对的东西，任

何一个比喻都是有缺点的。

## 二、系统地解决了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问题

毛主席在辩证法方面是有发展的。列宁主要有这样一些发展：确定了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的规律；确定了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等等。

列宁在讲辩证法问题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辩证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研究辩证法时，要着重方法这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就不懂得这一点，只是把辩证法当做几个现成的公式，以为研究辩证法主要是用一些例子来证明它。列宁着重在方法方面，就是怎么样运用辩证法的问题。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第一句话：统一物分解为二以及矛盾的各方面的认识……是作为方法来看的。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也就是讲方法，认识事物不要片面，要从各方面来加以认识，等等。

毛主席把列宁这个思想作了充分的发展。列宁提出了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但没有写出系统的文章加以充分的发挥。毛主席解决了列宁提出来的问题。《矛盾论》是把列宁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作了系统的解决。

这个方法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所谓矛盾的普遍性，就是我们运用辩证法的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坚持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个普遍原理，不要动摇，不要说在某些问题上对立统一规律不适用了，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就没有矛盾了。毛主席说：亿万年后都有矛盾。修正主义者说，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矛盾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没有矛盾了，发展动力已经不是矛盾了，发展

的动力是统一。在很早就提出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是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最初提出来不是修正主义的，是暂时性的错误。在斯大林去世以前开始纠正这个问题，但是不彻底，修正主义把这个思想发展了，取消了矛盾的普遍性。所以，讲辩证法就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在任何问题上，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动摇。事物的发展，是矛盾推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首先要分析矛盾，绝不动摇。同时，在坚持分析矛盾的时候，又要注意每一种矛盾的具体性、特殊性，一定要注意具体分析，要注意矛盾各方面的特点。整个《矛盾论》的精神，就是既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又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

这些思想，马、恩、列、斯都有，但是，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概括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因为有了这一点，既可以避免教条主义，又可以避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在辩证法问题上就是要修正矛盾普遍性的法则。我们坚持矛盾普遍性的法则，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站稳脚跟，克服修正主义；另一方面，只讲矛盾的普遍性，不注意具体分析，就可能产生教条主义，把书本上的东西简单地用到中国来，不注意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注意矛盾的特殊性，那就是教条主义，王明就是一个例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原理简单地运用到中国来，不注意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又有联合的一面，因此，就成为教条主义。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就可以在方法上保证我们在认识上能够正确地走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保证不偏到修正主义方面去，也不偏到教条主义方面去。毛主席说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所谓“精髓”的意思，就是保证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不会发生偏向。当然做起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坚持这个原则可以减少偏差。毛主席解决了列宁提出来的没有充

分发挥的问题,集中概括出来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像这样集中的说明，在以前的哲学著作里，是没有的。

## 三、明确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

还有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比较突出的贡献，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矛盾问题。这是对辩证法的贡献，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

这里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进一步肯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思想当然马、恩、列、斯是有的。如果马克思生在今天，他也会像毛主席一样要肯定地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生在社会主义时代，列宁也早去世了，所以他们都没有做出这个结论。为什么不做出这个结论？因为他们严格地遵守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原理，没有实践的时候，他们不作这个结论。如果他已经有了这个实践，他们当然要作这个结论。纯粹用理论推理的方法，纯粹用演绎的方法，抽象思维的方法，也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但马克思他们不这样作，因为他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遵守自己建立的学说。不像我们有些人那样，很喜欢没有根据地去作结论，而且以为自己很聪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按照实践的经验，纯粹从书本原则上推出结论。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王明这些人就是在中国经验一点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要作结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面讲：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

实践的问题。我们的思维究竟是不是正确，不纯粹是从理论上可以证明的，而是在实践里得到解决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这个问题不作结论，因为没有实践，不能做出结论。

斯大林本来有一点实践经验，1932 年把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了。可是因为经验少，再加上有点骄傲自满，经验没有总结好，也否认了基本矛盾。

毛主席肯定了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重新肯定下来。这个重新肯定，同时也就是发展。重新肯定这是一个普遍原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重新肯定这个普遍原理的时候，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做出了新的结论。虽然只说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一句话，但这是新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有没有这句话，关系很大，没有这句话，社会主义就会停顿。苏联现在的社会主义，按照生产力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按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仅仅是 1932 年的水平，最多是 1936 年的水平，现在并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纲领，那是吹牛！这就是因为在理论上没有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新肯定了普遍原理，所以说是发展和贡献。

在肯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人和人的矛盾。这个矛盾包括阶级的、民族的矛盾。这个原理完全是新结论，马克思时代是不能做出这个结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那时不但没有实践的根据做出结论，就是理论上也没有，但苗头可以看出来。

马克思说：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是有阶级才需要专政。因此也可以估计到，马克思那时候有点估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能有矛盾，但是他不作这个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做出这个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毛主席明确做出这个结论，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有没有这个结论，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斯大林有伟大的贡献，他在苏联国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他们说是建成，还差得很远。

斯大林没有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把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之后，并没有使它巩固起来，进一步发展。因为他认为已经建成了，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毛主席的发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进一步解决了如何巩固、如何发展的问题。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的方法讲问题，那么，在 1956 年就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成了。毛主席没有搞教条主义的习惯，就不允许我们宣传，毛主席清楚地看出来这只是初步的建立。所以，在 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提出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什么讲这些问题呢？以前我们不了解，现在可以了解了。毛主席知道一个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之后，还要巩固，还要发展，将来还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不能不解决。解决的方法就是分析出制度里有什么矛盾。首先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肯定是有矛盾，要去分析矛盾，所以毛主席首先讲十大关系。到了 1957 年，进一步总结和集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人的矛盾。在坚持普遍性的同时，又注意到矛盾的具体性。现在的矛盾有两种，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有两种情形，一部分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部分是敌我矛盾，把这个特殊性搞清楚了，又坚持了矛盾的普遍原理。我

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逐渐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因为肯定了矛盾，就要经常注意矛盾，肯定还有阶级斗争，就要警惕资产阶级的进攻。经常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的斗争，抓住这个线索，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和发展问题就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巩固呢，就是因为有敌对阶级在破坏，不是个别的原因。毛主席看清楚了这些，巩固问题就好解决了。敌人进攻，你就打退他的进攻，我们巩固起来了。这几年来，我们辛辛苦苦，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很快就恢复了。资产阶级不甘心我们的恢复，又要来捣乱、破坏，我们就进行斗争，这样就能巩固，能巩固就能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如果解决的好，就可以很顺利的发展。

这些问题具体地要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解释，现在只能简单地讲一讲，讲一个比较模糊的轮廓。毛主席的贡献是什么？唯物主义部分的贡献，是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辩证法部分的贡献，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普遍性和特殊性；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贡献，是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有人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思想。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 略谈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对认识论学说的新发展*

(1963.7)

学员同志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对于认识论的学说有一些什么新发展?

我要声明一下，我现在还没有能力系统地讲，文件才发表不久，我也是正在学习，因此有许多问题讲不出来。现在，虽经过一些初步思考，但是要拿出一个非常详细、系统的意见，还是不大可能的。所以，现在还是只能提纲挈领地讲，讲一个要点，讲讲我的初步体会。对于认识论的发展有哪几点，只讲一些我现在所体会到的，大家听了可以补充，如果大家在讨论中多提出一些意见，可能比我讲的还要充分一些。政策教研室讨论了这个问题，分析了一下，提出了一些意见，我是根据他们的意见来讲的。

---

* 1963年7月，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刚发表不久，中央党校的学员在学习中提出：毛泽东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说有哪些新发展?艾思奇根据自己的体会，在1963年7月15日的讲课中，讲了自己的意见。后来，他在其他讲课中，又作过多次讲述。在这篇口述作品中，讲得比较集中，有一些独到的解释和发挥，所以，我们整理速记稿时，独立成篇。整理时，我们加了小标题，删去了少数有关阶级斗争的事例。

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对认识论方面有一些什么发展呢?

## 一、发挥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草案"里面已经做了具体说明。这是一个新发展。

认识的基础是实践，这个原则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已经是肯定了的。认识的惟一来源就是实践，认识的标准也是实践，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已肯定了。但是，实践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很明确地分析。当然也讲到了，《费尔巴哈论纲》里面，讲到实践是革命实践，是社会实践，但没有更进一步分析。毛主席在《实践论》里对实践的内容，也作过分析，这一次做了详细分析，更明确了、更深刻了。实践主要是三个：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发展，使我们知道要找正确思想从哪里去找，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工作中间，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有了底，现在我们更清楚了。

以前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知道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是究竟依靠什么实践，是不很明确的，所以，可以有这种情形，口头上讲要依靠实践，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但实际行动上却不依靠实践；在课堂上讲依靠实践，实际上找不到什么叫真正的实践。有了毛主席这种思想，我们现在很清楚了，任何人要得到正确的认识，一定要投入生产劳动，要参加阶级斗争，要进行科学实验。

科学实验，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也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里面的典型实验。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就要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但在搞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先做一个实验，经过实验以后推广。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实验，这

是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早已经提出来的，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做。

毛主席在认识论问题上，具体分析了什么是我们认识的实践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说把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比较原则提到的东西，做了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这就是发展了。

## 二、揭示了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完成的规律

这个思想也应当说是一种发展。

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于这种思想说的很原则，没有像毛主席这样具体的加以发挥。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列宁在《哲学笔记》里面提到了这个问题，逻辑的公式在实践上重复千百次以后才形成公理。这只是讲逻辑的公式，没有讲一般的认识，但逻辑的公式可以概括为一般的认识。所以可以说是原则上已经讲了这个思想，逻辑上的许多公式不是天生的，是经过千百次的重复以后成为公式，在人们的思想里面固定下来，他讲的是逻辑学。

毛主席发展了这种思想，人的一切正确认识都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完成。这种思想在《实践论》里面也有了，已经提出来一个公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不断循环往复，这种循环每重复一次，人的思想就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实践论》里面的这种思想进一步发挥了列宁的思想，现在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比《实践论》又进了一步，认为对每一个问题的正确认识是经过多次实践反复得到完成的。这个发展是很清楚的。正确的思想是实践不断

反复的结果，这种思想应当说是一个新的东西，说明了正确思想要通过一个实践与认识的路线来实现的。

认识是一条路线，不是一种灵感。从前往往把认识当做是一种灵感，一个聪明人忽然心血来潮，就把真理认识了。这种看法有一点类似宗教的看法，有一个上帝对他特别看中的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给他一个启示，于是这个人就了解上帝的意志了，就能够说出一切真理来了。形而上学的观点就有这种错误的看法，认为人的认识好像一次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偶然的机会，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想到一切正确观点，不必经过一条认识路线，不必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忽然一下子得到了启示就可以认识真理了。这是错误的，这是把正确的认识看做是天上掉下来的。

毛主席反驳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观点，指出正确认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得到什么启示得来的，不是什么聪明人生来就会有的，认识一定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条认识的路线。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经过这条道路以后才能完成认识的过程。

我们要找正确的认识，一定要花工夫，在生产劳动中、在阶级斗争中搞科学实验，反复多次，毛主席经常举这样的例子，“六〇六”这种药品是经过 606 次的实验，失败了 605 次，最后 606 次成功了。正确的认识要经过艰苦劳动得到的，不是睡在床上或者读几本书能得到的，而是要在阶级斗争、生产劳动里面，经过辛苦的劳动，同时要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正确认识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是经过这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路线得到的。

错误认识是怎么来的？可以反过来说，违背这一条路线，一

定会得到错误的认识。脱离生产，脱离劳动，脱离阶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不做调查研究，不耐心在反复实践中间仔细思考问题，或者虽然是多少搞一些实验，可是不用脑子，不让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陷在经验主义里，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一定会犯错误，也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如果是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这样的错误还可能会成为路线错误。这种错误自己不能发现，自己不能改正，因为没有能力发现。没有实践，又不想问题，错误就没有办法发现。

错误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我们上面说的情形，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一定会犯错误，而且可能是犯大的错误，甚至是路线的错误，这种错误自己不会发现，自己不会改正，甚至碰了钉子也不会发现错误，如果没有外边的帮助自己不会发现。就是有了外边的帮助，自己不会接受教训，不虚心，永远也不会改正错误。碰了钉子，有外边的帮助，自己能够虚心起来，能够接受教训，可以改正。但是这种性质的错误自己没有力量发现，自己没有力量改正，要经过外边工作，有改变的可能，但也不一定，像王明这样的人，经过了工作也不可能改正。有的是经过工作暂时改正了，以后又犯错误，也有的是不认真改变认识路线，经过工作暂时改正一下，后来老毛病又犯了，这种人在我们党内也是有的，有的人就是不改正，有的人是改正了又犯老毛病。

错误还有一种情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来寻找真理，终归可以得到正确认识，但是，正确认识没有完成以前，可能有一个时候还有错误。在实践的反复过程里面，会有一些错误，可能大也可能小，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带原则性的，但是这种错误自己有能力发现，而且可以改正，因为路线是正确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两种错误情形，不聪明的人

要犯大错误，犯了以后自己不能发现，不能改正，聪明的人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自己有能力发现，有能力改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要求，不是要求绝对不犯错误，要求不要犯大错误，犯了错误自己能够发现，自己能够改正，这就是唯物主义。能认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做到这一点就不大容易，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能遵守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一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这是毛主席的发展，这种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中，实际上已经有了，但毛主席具体加以发挥，加以分析了，因此，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对我们更便利。学习经典著作要以毛主席的著作为中心，这样对我们更好，对于我们处理工作，解决认识问题，更亲切，也更清楚。

## 三、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正确认识的获得也是反复实践的过程

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我们人的正确认识也要通过认识过程，实践和认识不断反复才有可能完成。搞社会主义建设常常出现主观主义，以为我们有了政权，怎么搞都行，以为有了政权就不会有盲目性，有了政权就可以利用政权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不注意实践和认识的不断反复过程。《实践论》已经指出了这种主观主义。

我们在工作中，以为有了政权什么都可以解决，实际上没有这么一回事。有了政权更要求谨慎，从实践中不断地反复找正确认识，因为没有政权我们可以小心一些，没有骄傲情绪，不容易犯错误；有了政权更应该虚心，不然更容易犯错误，有了错误更应当注意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更要小心注意到生产中

间、阶级斗争中间去求得正确思想，更要自觉地认识这个问题，不提高这样的自觉性很容易犯错误。政权在手里很容易脱离群众，脱离生产，脱离阶级斗争，对待问题很容易不用科学态度，结果就出现了盲目性，就要犯错误。

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还是有这么一个阶段：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有许多事情是自发地在群众里面搞起来的，然后我们的领导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也通过科学实验，总结经验，使自发变成自觉。我们中央对许多问题都是这样的，先是群众起来，然后中央总结经验，做出了决议，决议是精神，然后把决议拿去贯彻，精神变成物质。在变成物质的过程中又总结，又变成精神，然后又拿去指导运动，又变成了物质。从 1958 年到现在 1963 年，这五六年，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反复过程，后来有了农业六十条，有了十中全会决议，有了今天的农村若干问题决议(草案)，这是实践和认识的反复过程。这个过程完结了没有呢？还没有，还要发展。

我们党中央是自觉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通过这一条认识路线把群众中间的自发运动一步一步的提高到自觉阶段，每一个决议使我们的自发运动变成为比较自觉的东西，每一个新的决议都比一个旧决议更能够提高群众行动的自觉性。现在我们中央的决议，就使我们运动的自觉性达到进一步的高度，当然，以后还会发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不但是在阶级社会里面，人的行动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也有这个过程。有一点不同，就是在阶级社会里面自觉的过程差不多要到革命的时候，才可以出现，在没有实现革命运动以前，群众的行动差不多都是自发的，整个社会发展

到革命运动出现的时候,才开始自觉。封建社会里面,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性。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自发过程,到了有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才有了自觉性,无产阶级自己就是这样,到了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时候,才由自在变成自为。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过程就不是这样,无产阶级有了政权,一开始就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不是要等到社会发展到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才出现自觉运动,不是要到这个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时候,才出现自觉。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里面,是不断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但是,我们经过几年的时间,可以完成一个正确认识。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群众运动,也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不过不是像旧社会那样,一定要到社会发生根本转变的时候,才有群众的自觉性,而是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实现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恩格斯说过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不断认识必然性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不是到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改变的时候,而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面就不断能够认识必然,使我们不断达到自由。但这个认识是经过一个过程的,不是运动一开始必然性就完全认识了,就能够达到充分的自由了。现在我们可以达到很大的自由,所以我们的经济好转得很快。

## 四、提出了把正确认识交给广大群众的问题

这个基本思想马克思有了,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

会变为物质力量。只要把革命理论拿到群众里面去，就可以变为物质力量的思想，现在毛主席把它更具体化了。就是文字也有一些改变，把理论掌握群众改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文字上有了发展，具体化了，内容也更具体了。一定要注意把正确思想拿到群众里面去宣传，使群众能够掌握；要是根据错误的认识做工作，错误的认识被群众掌握，那就变成了反动的物质力量了。

物质变精神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成为改造物质世界的力量；一个方面，是错误思想也可以被群众掌握，赫鲁晓夫的理论可以被群众掌握，那就变成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变成了反动的力量。用正确思想反对错误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对修正主义思想，这不是一个无意义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写八篇文章(现在成为七篇文章，把对印度的除外了，印度不值得提，不是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加上我们的 25 条，来对世界上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目的是为了使群众掌握正确的理论，使它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变为世界的革命力量。

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不是一般的把正确的理论拿到群众中间去使他们掌握，还要把认识论也交到群众中间去。这一点特别深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更根本的问题，使群众掌握了认识论，就能够正确掌握认识。

怎么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交给群众掌握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很好研究，一下子也很难说清怎么解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哲学，要使群众掌握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群众不会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要靠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注入到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很重。怎么把哲学从课堂上、从书斋

里面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武器，这是很大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来解决，就是我们搞哲学的人，我们干部和群众结合起来，和群众一起在行动上贯彻认识论，才能够解决问题，不能简单的靠嘴上说。我们可以在课堂上了解这个问题，对基层干部、对群众要靠像现在这样课堂上讲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主要的办法是靠我们自己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去，运用科学实验的办法，带着群众一起在行动上运用认识论，通过行动，通过实践使群众了解认识论。要不要讲课？可以讲，在自己行动的实践基础上，要懂得哲学的人讲一点，可以使得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的认识论变成自觉的东西，不过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只能在他的行动过程里面，工作过程里面指点一下。毛主席说，讲哲学不要讲长了，讲短一点，最好是在工作中、运动中抽时间讲几十分钟，这样可以使干部一下子了解根本问题。我们大家这样做，会起很大的作用，这样来讲哲学，意义会更大一些。

毛主席关于怎么把认识论交给广大群众的问题，这对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如果我们领会了毛主席思想去做工作，就会对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深刻的了解。我们做干部的人需要很好的学习，很好地了解毛主席的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交给广大群众，首先是基层干部，以后要交给世界上的广大群众，把这个工作做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快了。

关于认识论的问题，就讲这几点。这只是我的一些初步的体会，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 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哲学思想*

(1963.7)

学员同志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提出：怎样正确评价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对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评价？

这个问题可以简要地讲一讲。斯大林的哲学，特别是对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本书如何评价呢？

## 一、斯大林哲学著作的优点

首先应当肯定，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绝不是修正主义的著作。这本书简单明了，有一些地方也是相当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样简单明了、字数不多，便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括起来的著作，在以前的经典著作里面是没有的。斯大林这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马克思的一个愿望。马克思曾经有过这样的希望，很想把哲学用很简单、很通俗的话写出来。马克思自己没有写出一本通俗的，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斯大林这一本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的愿望。毛主席的

* 这是艾思奇在1963年7月15日讲课中，为中央党校学员解答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讲得简明扼要，这是一个专门问题，所以，抽出来独立成篇。按速记稿整理，题目是我们加的。

《实践论》，《矛盾论》也是实现了马克思的这个愿望的。《实践论》、《矛盾论》在认识论问题上，在如何分析矛盾这个问题上，比斯大林的著作更具体、更深刻。

斯大林著作的优点，首先第一句话就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党性，这是很突出的优点，和修正主义哲学比较起来是一个鲜明的对照。现在苏联有两本哲学教科书，根本不提哲学的党性。斯大林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这一句话，修正主义是害怕的。康斯坦丁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库西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取消了斯大林这一思想，也就是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想，尽管他们长篇大论地引用了马克思、列宁的话，但是他们取消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党性，实际上根本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前几次讲课中曾说，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著作在辩证法唯物主义方面看不出多少修正，这是说从字面上、形式上好像看不出什么修正，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讲实质上。在实质上是根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取消了。因为只要把要害的东西取消了，马克思的整个观点，把它重要一点取消了，这个观点就没用了。比如一部很好的机器，你只要把它的一个重要螺丝钉弄掉了，这一架机器就没用了，形式上好像还是那一架机器。修正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就根本没有了。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什么别的世界观，把无产阶级这个词取消了，就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斯大林哲学著作的一个突出优点，是第一句话就讲哲学的党性，毛主席的《实践论》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是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性就是党性。苏联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全民的哲学，是人性的表现，不是无产阶级阶

级性的表现。

## 二、对斯大林哲学著作的批评不能无的放矢

有些人批评斯大林说，他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割裂了，这是无的放矢。他首先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然后分开来说，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对世界的理解，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用来观察世界的方法。所以，斯大林是把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讲的。世界观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又是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一个是理解的方法，一个是研究的方法，实际上还是方法。那种批评是没有意义的，是无的放矢，没有任何作用。

斯大林的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每一条哲学原理都指出它的实践意义，就是说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一点也是他的优点。比如这一条原理是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运用到实际中去怎么来解决实践问题，这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这一点斯大林把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了，方法是指导实践的方法。这也是他的优点，这一点也很深刻。第一句话讲哲学的党性很深刻，每一条原理都讲到实践意义也是很深刻的。

苏联对斯大林有一个批评，说斯大林把哲学原理简单地拿来对具体问题做出结论。这个批评也是无的放矢。斯大林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实际问题的方法，一般不是简单的做结论，他所有的著作都不是那样简单化，而是用哲学原理对具体材料做具体分析。比如民族问题，列宁主义基础，都没有简单的套材料，或是原则加例子的痕迹。指出某一条原理的实际意义，不是把原理简单地套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他总是说，这个原理作为方法来看有什么意义，在方法上提供一个什么原则。

唯物主义肯定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是一种世界观，物质在先，精神在后。这个原理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实践问题的了解，首先要研究客观规律，并不是说这一原理对某一个具体问题可以做出结论，一般的是告诉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它的客观规律，不要从主观出发。这是对的。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它的实践意义就是我们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分析矛盾，注意斗争。这没有什么简单化的东西。

斯大林解决问题一般不是简单化的，也许在个别问题上有，在自然科学上可能有，比如在处理李森科学派、摩尔根学派问题上，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这有一点简单化。摩尔根学派有不少人是唯心主义，有些人是神甫、牧师，但有一些人不是唯心主义，像中国的谈家桢是摩尔根学派，但他不是唯心主义，他现在相信唯物主义。就算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化了，那也是个别问题，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登徒子的办法，修正主义攻击斯大林就是登徒子的办法。

有些人批评斯大林，说他在结构上有问题，先讲辩证法，后讲唯物论。这个批评也是不对的，讲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一个绝对的结构，要看具体情况，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面，把辩证法放在历史唯物主义后面来讲，先讲道德和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面问题，后来才讲辩证法。我们的教科书是先讲辩证唯物主义，后讲历史唯物主义。先讲辩证法，后讲唯物论，这不是斯大林的问题，是苏联哲学家的问题。斯大林这样做不一定错，在一定的条件下，怎么写更有利就怎么写，没有一个绝对的写法。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唯物主义，辩证法几乎没有讲，历史唯物主义在最后一章讲了一点，难道列宁错了？列宁没有错，当时理论上的斗争需要这样写，

就这样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有一个绝对的、死的结构，它本身是发展的、灵活的，所以它的结构也应该是千变万化的。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没有一个规定，没有格式。比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讲辩证法的规律，也不是错误。

## 三、斯大林哲学思想的缺点和错误

斯大林专讲辩证法，不讲规律，可以说有缺点，但不能说是错误，斯大林不讲，别人可以讲，恩格斯已讲过，也就可以了。现在苏联批评斯大林的这些所谓错误，实际上不是他的错误，都是无的放矢，都没有批评到斯大林的真正错误所在。

如果说斯大林这本书有错误的话，我看只有两点：

第一，是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性，不注意到对立的统一。就是认为根本对立的东西是没有统一性的，统一的东西不能有斗争。这样一种思想就不对，在贯彻对立统一这个规律问题上有一些不彻底，这是在理论原则上有一点缺点。讲到对立斗争的时候，不承认有统一性，讲到统一的时候，不知道统一内部有斗争。这个缺点影响他另外一个缺点。

所以，第二个缺点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没有看清楚。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在实际斗争里面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矛盾，首先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其次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统一的，因此不注意它有矛盾，特别是不注意它有斗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本书最后表示斯大林逐步改正了他的错误，肯定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矛盾，但是改正的不彻底。在书里面还讲到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会变成对立。这个提法很不清楚，怎么不

会变成对立？我们现在很清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可以发展成为对立，所以他虽恢复了辩证法，但不彻底。

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他在临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恢复辩证法的情况，一直强调各民族、全国人民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强调这一条，认为上层建筑和基础没有矛盾了，这可以说是一种错误。

## 四、公平地评价斯大林哲学思想

斯大林的错误是个别的，不是要根本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修正主义。所以，这种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经验不足，第一次由社会主义物质变为社会主义精神。在第一次物质变精神中间那个精神，不能完全反映物质是可以原谅的。我们要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和缺点，但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特别是要首先肯定他的成就，肯定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然后来批评他的个别错误，这样才是公平的，像修正主义者那样，把他一棍子打死是有害的，是要打击无产阶级事业，打击共产党，不是真正要批评斯大林的错误。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1963.9)

## 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今天看来，这话可以作这样引申：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社会上不是只有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而是还存在着反映腐朽、落后势力的错误思想，这些思想影响了群众，也会变成阻碍社会进步，破坏世界革命事业的物质力量。

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正确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过去40多年逐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变成了摧毁帝国主义及一切国内反动统治势力的物质力量，使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但是，也有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如陈独秀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所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潮（在抗战初期它又一变而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曾在革命队伍中泛滥起来，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的失败和挫折。

---

* 本文是艾思奇同志1963年八九月间在青岛疗养时写的，后来曾几次修改，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1979年首次发表于江苏《群众》丛刊创刊号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百多年来逐步被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所掌握，形成了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力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已经突破了帝国主义世界的链索，创建了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直接间接地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非拉美的许多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但十几年来又涌出了现代修正主义这一股反动思想的逆流，它的影响所及，阻碍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对亚非拉美有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起了破坏作用。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日益广泛地被群众所掌握的过程，同时也是它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对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过程。一百多年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过几次大论战，这些思想斗争的物质结果，是赢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发展和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壮大，赢得了亚非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保卫和平运动的空前高涨，赢得了现时代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但是，要使社会主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得到巩固和发展，要使世界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取得全胜，要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还需要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长期的严肃的斗争，还需要通过这样的斗争，使得更广泛的人民群众脱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错误观念的影响，使它们在实际斗争中掌握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论。这个斗争现在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进行的。

什么是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怎样才能掌握到这种正确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时候必须回答的认识论上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并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这就能帮助他们学会在思想上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从而也就比较容易在实际斗争中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严格按照唯物主义的原理，一致肯定：正确认识不外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革命领导者的正确认识不外是社会发展规律、革命发展规律以及先进阶级的历史要求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那些主观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那些人狂妄地以为自己的头脑里生来就有正确的认识，以为可以凭自己的主观任意制造、改变和消灭事物的规律。他们把客观实在看成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可以“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文存》第2卷，第106页）。他们常常把自己偶然的感想，把各种违背客观现实的荒谬想法硬说成是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反对那种客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他们以为在宇宙的什么隐蔽地方，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绝对精神。只等待世界上出现一个幸运地被上帝选中的杰出人物，那个绝对精神就会突然从天上掉到这个人的脑子里来，使他可以自封为真理的惟一垄断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止一次地驳斥这类荒谬的真理观，指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的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从广大人民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中找到根本来源。正确的认识只有一种，即总结了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经验，又在实践斗争中获得证明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从他领导中国革命的最早时候起，就坚决反对唯

心主义的错误认识观点，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有些同志的“以感想代替政策”的错误思想方法，提倡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提倡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在对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并且结合着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认识论。抗日战争开始的一年，毛泽东同志把以前领导革命斗争的认识经验和政治思想斗争经验作了哲学的总结，写成了《实践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宝库贡献了一篇辉煌著作。

《实践论》全面地阐明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在思想和工作中掌握这个规律，就有可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克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就能克服那种脱离本国革命的实践、简单搬弄书本词句、或者盲目的拾人唾余、以指挥棒代替真理的教条主义；也能克服那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把个别现象甚至虚构的假象夸张成事物的全体和本质的经验主义。《实践论》以及和《实践论》同时写成的《矛盾论》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整风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家知道，整风运动使中国党的广大干部在当时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这个基本方向，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从而推动中国的民主革命在短短的四五年中间就获得全国胜利。

由于无产阶级、共产党掌握了坚强的领导，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在中国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3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

新的时期里又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事实证明，取得这些胜利的过程，也是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一次又一次反复斗争的过程，是党中央和广大领导干部在实践斗争中一步比一步更深入更具体地认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把这些正确认识贯彻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思想和行动中去的过程，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所阐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不但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仍然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理。结合我们当前的斗争，认真学习《实践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这个科学的认识论，仍然是提高我们工作和斗争的自觉性、有力地向前推进我们的事业的根本方法之一。

##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认识论问题上不但坚决反对唯心主义，并且也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旧唯物主义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承认正确的认识就是人们在思想上恰当地确切地把握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这些观点都是对的，这说明旧唯物主义能够正确地回答什么是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它也能完全解决正确认识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不能真正加以解决的。这是因为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没有实践的观点，不知道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在旧唯物主义者看来，人们认识世界的时候，似乎只是处在纯客观的、旁观者的地位接受外界事物的影响。他们的认识似乎可以不受他们的实践活动的任何影响和限制，因此，按照旧唯物主义的

观点，不论什么人，不管他们站在什么实践立场上，不管他们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封建主义的立场还是农奴的立场，不管他是革命者也好，反动派也好，是脱离生产的剥削者也好，是生产中的劳动者也好，只要幸运地一旦发现某种巧妙的方法，都可以对周围事物获得同样正确的认识。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是人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他们对周围世界认识发展程度就有所不同，不同阶级的人，对周围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并不是任何立场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同样的认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正是在于不知道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实践论》）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科学总结，它证明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和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密切联系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同上）。认识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回答：第一，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因此，它首先来自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但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还要看到事情的第二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认识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因此，它又是来自人们的实践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不是像普通的一面镜子那样，固定在一个地方，消极地把外界世界的种种印象反映出来，而是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能动地去接触外界，按照实践的要求去把握周围事物的情况。农民在生产劳动中接触工具、种子、土壤等外界事物，并一步步地了解这些事物的联系，工人在生产劳动中接触机器、原料等物质对象，由

此逐步掌握这些物质的性能。工人、农民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接触地主、资产阶级，并且在这些斗争中认识这些剥削阶级的本质。不通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这些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就不可能明确反映到他们的意识里来。旧唯物主义只看到上述事情的第一个方面，而看不到第二个方面，因此，它不能完全回答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才能全面地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把实践的观点提到认识论中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的地位，而且还在于科学地精确规定了实践这个概念的内容。以前的哲学，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也常常谈到实践的概念，但他们所把握的实践概念都是抽象的，不能真正反映人类社会实践的本质，就西方的德国古典哲学来说，康德的实践理性，费希特的自我和非我的辩证运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的历史活动，都是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用来规定实践概念的种种提法。中国哲学史上有大量的关于知和行的材料，“行”就是指实践。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有人主张知先行后，有人主张行先知后。《尚书》上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说法，这就是孙中山所反对的“知易行难”的思想，而孙中山则提出“知难行易”的说法。所有这些关于实践或行的议论，都只是抽象地谈到人们的实践行动，而不能指明实践所包括的具体的现实内容。这是因为过去的一切哲学派别，唯心主义固不用说，就是唯物主义也不能在社会历史研究方面运用唯物主义观点，没有找到决定人类历史行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无法证明人类实践的现实的物质的内容。马克思在谈到唯心主义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实践时，曾说：“从前一切唯物主义——连费尔巴哈的也包括在内——所含有的主要缺

点，就在于把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方面或从直观方面加以理解，而不是理解为人的感性的活动，不是理解为实践，不是从主观方面加以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能动的方面竟是跟唯物主义相反地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被它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有真正现实的活动，真正感性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01页）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揭示了决定人类历史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以这些条件为基础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因此，就能正确地指出实践究竟包括一些什么内容。这些内容就是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人们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人的认识主要是依赖于生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说：“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实践论》）毛泽东同志又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同上）因此，生产和阶级斗争是对人的认识发展起主要作用的两种实践，而人们的一切真正知识，也都是从这两种主要实践中发源的。毛泽东

同志说："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774页）

指明了什么是人类认识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实践，这就能回答认识从何而来，特别是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认识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人们正是为了达到实践的目的，才要去努力求得有关事物的认识。人的社会实践包括人类社会生活各种各样的领域，处在不同领域中的人，有着不同的实践活动，要求不同的知识。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在社会实践中处于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对于周围事物的认识，就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立场和要求，这些不同的立场和要求，对于他们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影响和限制作用。在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的实践地位有所不同，他们的认识能力也有所不同，因此，人们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随着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论》）

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人类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全部

历史的总结。它告诉我们，第一，人们对周围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规律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正确反映，绝不是由那些偶然发现了某种巧妙方法的聪明人一下子就掌握到手，而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一步一步地完成的。对整个世界的全面认识固然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过程，就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某一方面和某一问题的正确认识也相应地需要经过一定的实践过程。第二，人们正确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还受到他们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特别是对社会的认识是如此，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大工业和无产阶级以前，人们对于自然界虽然已掌握到多少全面的科学知识，但对于社会本身却只能获得某些片面的认识，而不能在这一方面建立科学的知识体系，不能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且当剥削阶级掌握着社会的统治权，从而掌握着知识的垄断权的时候，他们还要按照他们自己褊狭的阶级目的来歪曲社会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总要把封建制度说成是天经地义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家总要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制度。这就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不但始终停顿在片面的状态，而且还形成许多错误的观念，因此，第三，决不能说只要是一个人，不管他处在什么样的实践地位和阶级立场，都有可能表现同样的明智，都有可能同样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现代修正主义者为着逢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代表人物，硬说他们也能明智到爱好和平，能够放弃战争政策，放弃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略政策和对其他国家的扩张政策，能够放弃对社会主义的颠覆阴谋，甚至愿意接受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一切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如果不是有意捏造的骗人假话，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的纯粹幻想。在一切有阶级的社会里，人的本质和所谓的人性，都具有阶级的差别，不同阶级的

人的认识，都受到他们自己阶级性的限制，只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们，只有敢于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人们，才有可能全面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才有可能对现代世界发展的规律和各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一切真正的知识和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都是从变革现实的实践中、从革命的实践中发源的。生产劳动首先就是改造自然界的斗争，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也要改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改造社会。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包括社会主义社会，要改造社会制度，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在这里，只有革命的阶级及其革命的同盟者，才是真正愿意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阶级；反动阶级则要用一切办法来抵抗社会的改造，阻碍人类的进步。和生产劳动、革命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还有科学实验，也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界的革命实践。科学实验包括两种类型：第一是自然科学的实验，这是在实验室和农事试验场里、在有计划的人为的一定自然条件下，来促进某些自然界事物的变化，以便于自然科学家和农业生产的指导者精确地解决有益这些事物变化的关键性问题；第二是革命工作者有步骤地安排的改造社会的典型试验，例如土改、合作化运动、工商业改造的典型试验，社会主义教育的典型试验等等。这是要在少数选定的据点首先进行这些改造的工作，使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们取得一些基本经验，以便于进一步推广这些工作时不致发生大的偏差和错误，只有这些变革现实的实践，才是取得真正知识的根本源泉，只有依赖这些革命的斗争，才能保证获得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同志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

得参加革命。”(《实践论》)

只有变革自然界和社会的实践，才能成为我们正确认识的主要来源。而我们所以要掌握正确的认识，也正是为了服务于革命的实践。正确地认识世界、革命地改造世界，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立场和要求。我们必须反对像唯心主义在那样抽象地谈论实践、抽象地谈论知与行的问题，这样的谈论不能在革命的实践和反动的行为中间划清界线，也就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正确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相反地，还会在实践和认识的问题上把我们引上错误道路。

在唯心主义哲学中，发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就是滥用实践概念，以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来曲解这个概念的最典型的例子。它的特点，就是把一切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曲解成以追求眼前利益为目的的应付环境的行为，否认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动。实用主义在中国流传很久，对中国知识分子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它的代表者胡适，对实用主义所做的解释，很足以说明它的本质。胡适说：“现在我们受了生物学的教训，就该老实承认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与环境的交互行为”；“人类的经验全是一种‘应付的行为’；经验乃我对付物，物对付我的法子”；“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胡适文存》第2卷，第118页)。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实用主义者把人的实践全部都说成是“应付的行为”。至于这种所谓“应付的行为”是为了什么目的，胡适的答复是：“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胡适文存》)第3卷，第99页)。“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

进化的。”（《胡适文存》第4卷，第164页）以上的话综合起来，就说明实用主义者是用资产阶级的市侩观点来曲解人的实践活动，把它说成仅仅是为谋取眼前小利的买卖行为，根本抹杀了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动。这又是一种腐朽的庸俗进化论，否认事物的革命的突变，否认量的渐变和革命飞跃的辩证的联系，大家知道，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世界观，曾经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可耻的思想工具。

在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思潮中，当前我们应该着重反对实用主义。这不仅因为它是胡适一流的反动资产阶级代表者用来反对革命的思想工具，而且也因为它是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世界观的基础。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他们把自己伪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有时也会在口头上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甚至好像也在反对实用主义，然而他们的世界观的实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实质恰恰是百分之百的是实用主义，而一点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实际上却在肆无忌惮地糟踏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内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用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用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

修正主义者在思想上的反动手法，就在于用实用主义的实践观点来腐蚀工人阶级的意识，力图引诱他们只注意一点一滴的眼前便宜，而忘记根本改造社会的远大任务，这样来出卖和背叛工

人阶级的利益，帮助资产阶级来延长统治寿命。列宁在批判修正义的时候，曾经指出它的这个特点："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页）列宁在这里所指出的正是最明显的实用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完全适用于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不过是老修正主义在现代新的条件下的再版，尽管具体形式有许多不同，本质上则是一致的。以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它们共同的本质。

实用主义的反动性，还在于它在认识论上抹杀真理和谬误的客观标准，使人不能分清是非界限，甚至于把谬误当做真理。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人的全部生活都是应付环境的行为，从而人的思想也只是一种应付环境、谋取眼前利益的工具。因此，思想的正确与否，不是决定于它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而是决定于它对于人们应付环境的目的是否有用。有用的就是真理，这就是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和反动性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任何一种思想只要便于实用主义者谋取眼前利益便于他们应付环境，即使是远离事实的谬论、甚至于捏造的谎言，实用主义者都可以把它叫做真理。胡适说："杜威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和一切主观唯心主义一样，实用主义不承认有客观真理，不承认真理应该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而认为它只是一种"应付实在，适应实在"的工具。胡适又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

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胡适文存》第2卷，第101页）。人们不难看到，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真理观，在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中有着特别突出的表现。为了向资产阶级讨好，取得他们某些点滴的恩赐，为了向帝国主义乞讨“和平”，反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确善于用人造的方法造出了他们认为有用的种种“真理”工具。一切制造谬论的手法，逻辑上的片面夸大、偷换命题、指鹿为马、前后矛盾、以至于蒙蔽真相、捏造谣言等等，都被现代修正主义者使用上来，用以制造他们大有用处的得意“真理”。就这一方面的“制造的智慧”来说，甚至一般的资产阶级和老修正主义者都是望尘莫及的！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在认识论上必须严格区别两种相反的实践：一种是斤斤计较个人的眼前利益，没有远大理想，反对改造世界的革命行动，对周围事物的现状采取迁就、迎合态度的庸俗、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实践。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实践，这是以不断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逐步实现共产主义世界为目的的、把目前利益和远大理想结合起来的变革现实的实践，修正主义者就是站在庸俗的资产阶级实践的立场上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就是他们的口号，在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也有的人脱离革命实践，走上资产阶级腐朽的道路，他们误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革命事业就算完成了。而不知道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只是革命的开始，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他们把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胜利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不知道还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不知道还应该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实践证明，我

们只有依赖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革命实践，才有可能和广大人民取得深入广泛的联系，才能了解他们的情况、经验和要求，才能集中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加以总结，才能正确认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来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计划和办法，有了这样的正确的思想，又把这样的正确思想贯彻到广大群众的实践中去；才有可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世界共产主义事业，一步一步地达到最后胜利。

## 三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里，曾指出人们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第 152 页）。这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自然科学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人们比较能够全面地认识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些规律来改造自然界，使它服从人们的需要，但对社会本身人们却做不到这一点，那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作为一种盲目力量支配人们生活，只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人们才有可能对社会发展进程本身予以有计划的自觉的指导，这个可能性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现实，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成为现实。

但这决不是说，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自由的王国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事情决不是这样简单的，这还需要条件：第一，必须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强指导，如果领导这个政权的党不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而是受到修正主义腐蚀的党，如果原来的无产阶级专

政的政权，被一些浸透了资产阶级意识的政客所篡夺，那就仍然要使社会向盲目的必然王国倒退，向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向倒退，仍然不会有恩格斯所说的自由王国。第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强指导下，还必须不断地对被打倒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残余努力进行斗争，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和各种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这样才能保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较顺利地进行有计划的自觉地指导，才有可能不断提高这个计划性和自觉性的水平。第三，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要实现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计划的自觉的指导，领导这个事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广大干部必须正确认识有关这个事业的各方面的客观规律，并依据这些规律，正确地制定出能够指导人民群众实现这个事业的路线、政策以及有关的一套计划和办法，但是，要正确地认识这些必然性，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实践、认识的反复过程，不能希望有什么其他巧妙的捷径，更不能希望个别天才的头脑偶然一下子就想出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人们仍然要通过实践和认识的反复过程，对客观事物的必然性一步一步地由不知到知、由片面到全面逐步达到完全的正确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间，暂时的摸索、部分的偏差、个别问题上的盲目性和错误常常是难免的，只有在实践和认识反复过程中逐步发现、逐步克服这些缺点和错误，人们才能够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进程，给予有计划的自觉的指导。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和在人类任何历史时期一样，人们的认识仍然必须遵循认识本身的规律性，仍然必须依赖于实践，不同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指导下，有可能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自觉地运用这个原理，从而

比较及时地对周围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获得正确的认识，在工作和斗争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人们预期的目的，而不致于犯大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指出，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表现为认识和实践不断转化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循环往复，一步比一步更高地推动认识向上发展的规律，这里的每一次循环和反复，都构成一个认识过程，其中包含着两个飞跃的阶段，第一个是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在实践中，人们首先应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和外界事物接触，把外界的种种现象反映到自己的脑子中来，这就有了感性认识，又叫做感性的直观或叫做直接的经验知识；这种感性认识积累多了，这时我们就要运用思考的功夫，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方法，对已经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在我们的认识上就会出现一个飞跃，这时我们的脑子里所反映的就不再仅仅是事物的外部现象，而能进一步把握到事物的内部联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这就是理性认识，又叫做理性思维或理论知识，也就是真正的思想。这一个认识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是由客观物质变为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变为思想的阶段。这时人们就有可能以思想的形式（包括理论、政策、办法、计划）把握外界事物的必然性。然而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究竟我们的思想是否正确地充分反映了事物的必然性，是否已经确切地把握了客观真理，这时还没有得到证明。人们的思想是否有真理性，是不能完全依靠思想本身来证明的，只有实践才能给予这样的证明。这样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变为物质、思想变为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阶段获得的认识拿到实践中去，看这些思想等等的认识能否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

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方的力量，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的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实践的考验，是认识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这里说的也正是包含两个飞跃阶段的人类走向正确认识的基本过程。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把列宁的这个思想作了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认识世界，又在这个实践中来检验这个认识的真理性，一切真正的知识都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取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认识这个途径，自觉地遵循这个途径，遵循由物质变到精神、又由精神变到物质的这条认识路线，来掌握客观事物的必然性，为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导。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物质变到精神、由精神变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就中国的民主革命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是由1921至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24年的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过程，逐步丰富、发展而完成起来的。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仍然是有阶级和阶级

斗争的社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关于如何高速度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全国解放十多年的认识和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才逐步地明确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还在继续，认识和实践还会多次反复，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比较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无产阶级的党，必须掌握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并自觉地遵循这个认识真理的路线，以便在我们的工作和斗争中获得正确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要阐明人类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认识真理的这条正确路线。同时，也要揭露和批判与此相反的错误路线，那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我们有些处在领导地位和一般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他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是遵循正确的认识路线，而是走了错误的认识路线，他们并不懂得或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这样他们对问题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做好，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要在工作和斗争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的认识路线，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错误认识路线，就必须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使之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时期里，正是这样做的。

什么是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如果说掌握客观真理的正确的认识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以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密切结合和互相转化为特征，那么，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的特征，就是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互相分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分裂的路

线？答复是：人的认识的某些因素脱离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这个不断循环往复向上发展的轨道，片面地孤立地发展起来，就会出现那种分裂的情况，就会走上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列宁说："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过分地发展，(膨胀、扩大) 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又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 (被片面地变成) 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 (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 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411—412 页)

毛泽东同志曾批判过两种主观主义的形式：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1. 经验主义就是感性认识的片面膨胀，把局部经验的意义过分夸大，满足于有限的感性知识，不注意大量积累感性材料，不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由量到质的真正飞跃，从个别现象、个别感性材料轻率地简单地对问题做出一般的论断，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不问情况任意机械搬用，这就是经验主义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的路线。2. 教条主义就是理性认识的片面的直线发展、死板和僵化。不做调查研究，不联系广大群众，不重视本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实事求是地找出周围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来对当前的工作和斗争做出切合实际的正确指导，相反地，简单搬用某些书本文件的个别词句，或者

盲目听从国外指挥棒的号令，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把一些违反本国实际情况和危害革命利益的措施，施加到本国人民身上，这就是教条主义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的认识路线。

前面说过，在今天我们对唯心主义斗争的时候，特别要反对实用主义。因为实用主义是修正主义者和一般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的世界观，又是一种极端反科学的唯心主义。不但如此，实用主义还为自己制作了一套精巧的貌似科学的伪装，没有彻底唯物主义观点的人，很容易受骗，而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受到它的欺骗。要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必须揭露和批判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反科学面貌。

实用主义也是一种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它以“注重事实，尊崇证验”（《胡适文存》第 3 卷，第 100 页）为标榜，夸大经验的意义，夸大局部的感性认识的意义，贬低思想的作用。在实用主义者的眼中，一切人的认识都应归结为经验，归结为“应付环境的行为”，而“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他们“把经验和思想看做一件事”（《胡适文存》第 2 卷，第 113 页），否认思想是经验的总结，是比感性经验更高一级的理性认识，否认人类通过抽象思维能够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归根结底，不论经验和思想，都被实用主义者看做为了应付环境的主观活动的产物，和客观存在的物质实际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把主观和客观的分裂在理论上推到了顶点，完全堕进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深渊。

但是，“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口号，却使实用主义取得了貌似科学方法的伪装，在这个口号下，它也规定了一条认识路线，人们如不加以分析，也很容易把它误认为科学的路线。按照杜威

的提法，这个路线分为五个步骤：一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在何处；三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四决定哪一种假设是实用的解决；五证明。胡适介绍实用主义时，又把这五步简化为三句话：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第一句大致概括上面五步中的一二两步，第二句相当于三四两步，第三句相当于第五步。据实用主义者自己说：似乎人们的认识只要按照他们指出的这条路线进行，就符合于科学的要求了。

许多人被实用主义所迷惑，就因为它所标榜的这一套，在外表上很像科学的认识路线，好像也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根据调查研究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但如果把真正的科学认识路线拿来和它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这是似是而非的。

科学认识的出发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是变革现实的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不是任何一种抽象的“疑难的境地”。科学认识首先要在实践中通过感觉器官（有时要通过科学仪器）去观察周围种种有关的事实现象，并由此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疑难。这些问题和疑难是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疑难，它在实际上就应该是客观事物本身存在着的某些根本矛盾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初步反映。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自然界的矛盾，社会科学要研究的问题就是社会生活的矛盾和阶级矛盾。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所要提出的各方面问题自然是很多的，但归纳起来，不外就是属于以下范围的问题，即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如何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把落后的农业中国改造成为用最新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国防

的先进国家，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在一个长时期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在革命实践中要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是当前我们周围世界内部存在着的客观矛盾的揭露。揭露矛盾，以便引导人民在科学研究中去进一步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认识路线所要求的提出问题的原则。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实用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这个原则相反，它也需要从“搜求事实”，提出问题，提出疑难开始，但它在进行这些步骤时，不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革命的阶级斗争为依据，不是以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为依据，而是从应付环境、敷衍现状、追逐眼前利益的主观愿望出发，从一时的感想，从主观的公式等等出发，从这样的立场上搜求的“事实”，只能是被主观的褊狭目的所限制的某些局部现象。以这样的立场和事实为基础提出的问题，就不可能帮助人们揭露客观事物本身存在着的内部矛盾，相反地，却只能是把事情的某些表面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夸张起来，而掩盖了真正的矛盾，掩盖了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中真正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掩盖了事物的矛盾，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就不可能引导人们打开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门径，就不能真正开辟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维的科学认识路线。

科学的认识在取得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以后，就要运用思想的工夫对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使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使表面的、片面的经验知识飞跃到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是否完全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当然还要拿到实践中检验，在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以前，它在某种程度上就带有假设的性质。但科学的假

设，必须是经过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的结果，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必须力求保证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而要避免主观的随意性，这就要对事实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想上加工改造的工夫。“去粗取精”，就是要在大量的事实材料中对主要的事实材料和非主要的事实材料加以区别，而在对问题提出解决意见，进行论断的时候，要着重依靠主要的事实材料，例如研究社会的问题要着重依靠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有决定意义的材料，在社会生活中有普遍决定意义的典型材料，而不要着重枝节的事件，表面的现象，个别人物的脾性、嗜好等等非主要的材料。“去伪存真”，就是在各种现象中把那些表现事物本质的现象和违反本质的假象加以区别，并主要依靠前者来对问题进行论断，而不要受到后者的迷惑，例如要了解帝国主义的本性，要看它是否会放弃战争和侵略政策，就要根据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实际行动和措施来下判断，要根据他空前膨胀的军事预算，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武装干涉等重大事实来判断，而不要被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冠冕堂皇的口头宣言所欺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要根据上述经过认真考核检验过的主要事实和真实现象来加以分析和综合，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由表面的联系进到内部的更深刻的联系，正确地把握到这些联系，就可以说是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这就是在科学的假设时所要求的基本原则，要做出这样的科学假设，常常也需要有大胆创造的勇气，但是，首先必须以谨严的研究作为基础，而不是把大胆摆在第一的地位。实用主义者所谓大胆的假设却和这相反，实用主义者对问题所要求的假设，实际上是把大胆作为惟一原则，这只能有主观主义的大胆假设，而不能有真正科学的假设。实用主义者虽然谈

到要“细心搜求事实”，但是，这个“细心”，并不是要把主要材料和非主要材料加以区别，把真实的现象和虚伪的假象加以区别，相反地是常常把两种相反的事实材料和现象混淆起来，把两者的意义同等看待，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着要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便于为了“应付环境”，“人造”出“有用的真理”，而“细心”利用非主要的事实来做出论断，来抹煞主要的事实，“细心”利用虚伪的假象来提出意见，来掩盖事物的本质。胡适曾在一篇关于人类历史的文章里说到一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636页）在另一篇谈研究学术的文章里，他又说道，他认为考据学者考证一个字义的成绩可以和天文学家发现一个星球的意义相等。胡适又在一篇论到旧中国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的文章里，硬把混乱的原因归之于中国自己本身的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同上，第441—442页），抹煞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存在的这些根本原因。胡适还根据帝国主义国家的某些政治宣言硬说帝国主义者再也不希望旧中国出现军阀内战，而希望中国的国内和平。这些就是实用主义者的主观主义的大胆假设的典型例子，它说明实用主义者为了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反对人民革命，怎样把自己的思想作为应付环境的工具来使用，怎样为了他们的私利，捏造出一套对他们有用的违背客观事实的人造的真理，他们的基本方法就是根据眼前一点一滴利益的需要，“细心搜求”枝枝节节的非主要的事实材料和虚构的假象，来对问题做出虚构的大胆的假设（与其说“大胆的假设”，不如说“大胆的武断”还更正确些！）。修正主义者在思想方法方面正是接受了实用主义的这个衣钵，甚至还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假民主现象，说成是无

产阶级可以用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靠桥梁;抓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的几句假话，就把他们崇奉成爱好和平的天使；和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个欺骗性的条约,就把它吹嘘成救世的福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正确观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们却采取捏造谎言、掩盖事实真相的无耻手法，尽情地加以诽谤和诬蔑。有的时候，实用主义的“大胆假设”，在修正主义者手里已经发展成最荒谬最可鄙的法西斯式的欺骗宣传手段，而不仅仅是一般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武断了。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要求我们的认识在实现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个飞跃之后，接着再进行第二个飞跃：由理论到实践，即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真理性，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把握了客观的必然性，是否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经过实践的检验，坚持正确的部分、修正错误的部分，补充新的东西，使认识进一步发展。这样进行实践的检验，就是科学的求证方法。但这和实用主义的“小心的求证”并不是一回事。小心的求证也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小心的求证；一种是主观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小心的求证”。科学的求证，是要把思想拿到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去，拿到变革现实的一系列的实践中去检验；主观主义的求证，是离开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凭着主观的应付环境的需要，小心地搜求一些枝节的事实、表面的现象，来为主观主义的“大胆的假设”或“大胆的武断”找强辩的口实。主观主义的武断是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但主观主义者离开了实践、离开了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真实情况，任意拉扯一些似是而非的局部事实和表面现象，来为自己的谬论找“论据”，把错误说得仿佛成了真

理，把谎言说得仿佛成了事实，这却是他们能够做到的，而且在他们的言论中是到处可以看见的这种所谓的“求证”，实际上只是一种诡辩术，而不是什么科学的证明方法。列宁在批判修正主义的诡辩术时曾说：“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的这一崇高事件中，普列汉诺夫真是创了新纪录。诡辩家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但是黑格尔说得很对，人们完全可以替宇宙万物找出‘论据’”（《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4页）。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人，他们总是喜欢对问题做出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大胆武断，尽管实践早已驳倒了他们的谬论，他们还是要找某些理由、“论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这些理由和“论据”有时是掩盖了事物本质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和假象，有时甚至是完全人造的骗局；议会选票的暂时的多数、资产阶级政客的暂时漂亮的诺言，就是这种现象和假象，也是一种人为的骗局，而修正主义者就是非常欣赏这一类“事实”、“论据”并利用它来为自己的反对革命的谬论进行“小心的求证”的。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这种“小心求证”的尖端的典型，是这种诡辩术的尖端的典型。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把实用主义的这种诡辩术作为自己经常警惕自己的反面教材！

## 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人们的世界观上、在认识论上，有着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斗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认识科学真理的路线，人们的正确的认识、真正的知识都来自这条路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斗争，需要在认识上遵循这条路线；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路线是

反科学的错误认识路线，实用主义是这一路线在现代世界上最流行的形式，人们思想和行动中的重大错误都是来自这条错误的认识路线。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制造反动的谎言，也利用了这条反科学的认识路线，因此，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大敌，必须坚决加以反对。毛泽东同志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永远对于我们有用的。

前面说过，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走向科学真理，取得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由物质和精神，认识和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在未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人们的认识也可以表现某些片面性，甚至出现部分的错误，在科学认识的道路上，这种暂时的部分的偏差和错误，常常是不可免的。这种偏差的错误和那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之下所犯的错误，情形有所不同，它不是出自世界观的错误，只要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经过物质和精神，认识和实践互相转化的许多次反复，就能在认识过程中逐步发现这些片面性和错误的所在，并及时地加以克服，属于完全实现正确的认识。列宁说："不犯错误的人并不是聪明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但错误不很重大，同时又能迅速而容易地纠正错误的人才是聪明人。"（《列宁全集》第31卷，第17页）我们不可能做到绝对不犯任何错误的人，但一定可以做到列宁所说的这种聪明人。学会并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能做到这一点。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要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向自由的王国的飞跃”,要使我们的各方面工作都能实现有计划的自觉的正确指导，需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使他们学会善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成为列宁所说的聪明人。这就是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认识依赖于实践,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本身的认识，也要依靠实践。正确认识是发源于变革现实的实践的道理，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又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的道理，对于从来不离开课堂的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不容易真正领会的,对于具有很多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的经验的人来说,只要经过适当的学习和讲解，即使文化不高也是可以获得深刻的具体的了解的。几年以来，在我们的广大基层干部中，有脱离生产劳动的经验，也有参加生产劳动的经验，两相对比，他们就得到了一个认识论上的总结。“不参加劳动，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摸不到底。”“干部参加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做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像这样，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自己亲身参加的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具体实践经验，帮助他们从中引出理论性的论断，就可能使他们逐步深入地学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路线进行工作和思考问题这个学习本身，也需要一个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的反复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造性的发展，就是把物质和精神、实践和认识的互相转化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在我党的

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不是在群众运动中自发地产生，而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辛勤的科学研究工作产生和发展的。但这个科学研究的成果，归根结底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经验作基础，并且是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归根结底，仍是从群众中科学地“集中起来”，又要拿到群众的实践中“坚持下去”，使之变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物质力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认识论，也是这样。它是全部人类科学发展史和认识发展史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总结，也是能够拿到群众的实践中“坚持下去”作为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的。要达到这个目的，要使这个科学的认识论群众化，从事哲学工作和有志于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交给广大群众的人，就要在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和群众结合。首先和群众一起学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的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经验，然后把这些亲切的经验，用生动、简明、准确的语言加以概括，或帮助群众自己加以概括，通过这样的方法，做出能够使群众喜闻乐见的哲学的讲解或文章，再拿到群众中去宣传，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交给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逐渐学会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

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有效方法之一。这个方法的运用，在 1958 年工农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中已经有过一些好的开端，目前又在一些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体会的日记和文章中有着动人的好例。这个方法值得以后继续加以坚持和发展。

1963 年 9 月于青岛

（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 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1963.6、1964.6)

中央党校的学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理解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辩证法的三个规律的关系是怎样的？辩证法的核心和辩证法的范畴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是不是明确讲过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等等。我在讲课时多少都讲过一些这个问题，但讲得不集中、不透彻，所以，大家不断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根据我的理解，回答一下大家所提的问题。我讲得对不对，大家可以考虑，可以提意见。

## 一、辩证法核心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地说过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做了，也这样说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讲到辩证法的特点时又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

---

* 这个稿子主要是根据艾思奇在1963年6月10日和1964年6月15日给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作问题解答时所讲的内容，重新整理而成的。因为讲得比较多、比较集中，所以单独抽出来独立成文。整理时在文字和内容上以及逻辑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但没有增添什么观点，力求反映出艾思奇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标题以及引文出处是我们整理时所加。

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见《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卷第 24 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是概括《资本论》的总方法，他说这个方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对任何事物采取：一方面从肯定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否定方面来理解。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又是，又否；又肯定它，又否定它。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一范围内要肯定，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否定它。马克思就是这样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从价值、使用价值，一直到积累，到资本主义灭亡，这中间一直是分析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时，首先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当做贯串一切的中心，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贯串一切的中心。他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由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工业，这是生产力在向前发展，他肯定了这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发展是为了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在发展过程中，加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冲突，因此，就有了否定的方面。结论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顶点，这个制度就要垮台。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时，是把对立统一规律当做核心。他是这样做了，只不过没有用“核心”两个字。

恩格斯也没有明确说过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这可能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恩格斯在当时碰到了“回到康德去”的潮流，因此，需要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反驳，要宣传黑格尔哲学中合理的东西，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本东西加以概括和说明，所

以，把黑格尔哲学里面的主要部分概括为三个基本规律，对杜林也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进行批驳的。恩格斯受到当时这样一个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是指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而没有突出来讲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过这样一段话："……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见《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38页）对于这一段话，我在给中央党校59班、60班哲学专业辅导这篇著作时，曾经作了解释。我曾说，恩格斯这段话事实上把对立统一规律看做是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是怎么理解："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有同志就提出一个疑问：恩格斯是不是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当做辩证法的核心。我认为不能这样理解。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核心"，和列宁所说的辩证法核心不是一个意思。恩格斯不是说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规律里最根本的东西，不是这种意思，这里是讲整个发展过程里最普遍运用的规律，他总结了《反杜林论》前面所讲的否定之否定的许多例子，说明发展过程里都是采取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所以，应该说，一切发展过程里都是贯串着否定之否定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切发展过程里的核心。这里很清楚，恩格斯不是讲发展根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有这样的意思，"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构造他整个体系的核心。

所以，我们要注意，读书时不要拘泥于字句，不要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有冲突。有时同一个名词有不同的意义。比如，"必要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社会必要劳动，一个是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一个名词可以有两种用法。恩格斯所

说的“核心”和列宁所说的“核心”，不能理解为一个意思。

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是列宁。列宁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方面当时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另一方面，是修正主义要“修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阉割它的革命精神。修正主义要用庸俗进化论来窜改革命的辩证法。庸俗进化论认为，发展是量的增加和减少，否认质的飞跃。修正主义者就是用庸俗进化论的方法作为他们的思想基础。列宁为了跟庸俗进化论斗争，简单明了地把两个世界观对立起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发展是对立统一的问题，是对立统一斗争的问题，提出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

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又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2、305页）

列宁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需要说明和发挥的任务，然而，列宁没有完成。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写了一部《矛盾论》，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问题，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阐明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阐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阐明了对抗矛盾和非对抗矛盾的问题，等等，从而出色地实现了列宁的遗愿，完成了“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思想。以后，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一书中，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矛盾学说，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进一步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思想。

## 二、辩证法三个规律的关系

我反复考虑，要理解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必须首先弄清辩证法三个规律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能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我以前讲课中讲过，辩证法规律可以讲它是三个规律，也可以讲它是四个特征，说它是十六个要素也可以，这就要看你是怎样理解了。归根到底，辩证法的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就是统一物分裂为两个对立部分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对立的斗争和对立的统一。实际上，从最本质来讲，辩证法就是一个规律，一个特征，最根本的要素就是一个。所以，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只能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现，一种展开，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展开为质变量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曾经使用过肯定否定规律的名称。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样的提法，适合中国语言的特性，比较整齐，大家已经习惯。我们一般不大使用“肯定否定规律”这样的提法，而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概念，大家已约定俗成，比较熟悉，同时，也可能比较更完全一点。所以，习惯于使用否定之否定规律。至于肯定否定规律这个提法，我们一般地不用，但到底能不能用，也还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讲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个概念的内容有一些缺点，但是，不管怎样，应该这样理解：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都是这一规律的表现。

为什么恩格斯说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基本规律呢？因为这两条规律比其他任何辩证规律的普遍性更大一些，它们是涉及宇宙中一切事物的规律，没有任何一种东西不受这种规

律的支配。

有一些规律也是辩证的，但不是那么普遍，比如，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到实践，它虽然是辩证的规律，是思维认识的辩证规律，但这个规律只能用在人的思维过程，用到客观世界就不行，所以，只能是认识规律，不能叫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不能普遍应用，不能应用到其他问题上。因为它本身作用范围就不是普遍的，而只是思维和认识的规律，所以，它不能叫做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至于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不管是客观世界也好，人的思维也好，到处都能起作用，都是没有例外的。从高深的科学所研究的一些复杂问题，一直到简单的日常生活，到处都有这种规律，所以，它们就成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辩证法基本规律有三个，但是，这三个基本规律并不等于就都是辩证法核心。辩证法的核心，只有一个，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

## 三、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简要地说，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实质，只有从这一点上也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及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在关系。

为什么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呢？这个问题可以主要根据两本经典著作来回答。

一本是毛泽东的《矛盾论》。这本著作里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有一段话：“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这两种状态也就是量变和质变状态。“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

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这些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从对立统一规律的角度讲的，讲到了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的关系，讲到“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

另一本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引过的那段话：“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这一段话可以说明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关系。

从上面这两段话，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弄清辩证法三个规律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关系。

量变质变规律，这是一切事物发展过程里变化的普遍规律，一切变化总是逃不脱这个规律，总是这两种状态反复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状态呢？究其原因来说，就是因为事物内部矛盾统一和斗争的表现。事物内部两个对立着的方面又统一、又斗争，这样就推动事物的发展。发展过程中，有时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有时就突然出现激烈变化状态。因此，只有用对立统一规律，才能说明为什么两种状态互相转化，才能说明转化的根源。

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很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自己运动的泉源。不了解对立统一规律，就不能够了解事物自己发展的源泉。形而上学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它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就不了解发展是从哪里来的。列宁说：“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

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说:“按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它的泉源、它的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上帝、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按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列宁接着进一步指出:“第一种观点是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55卷第306页)列宁的这几段话是很深刻的,可以帮助我们从源泉上来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的关系,理解为什么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如果觉得列宁的话太抽象、太原则,我们可以做点具体解释。事物发展为什么一个时候会是相对静止?为什么一个时候又能够稳定,以后为什么又不稳定了,有激烈的变化,又发生了革命?最好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来说明这个问题。两种状态的变化,是由该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矛盾斗争在一定的时候,还处在量的准备过程中,还没有到破坏统一性的程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能够维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就处在相对静止状态。然而,矛盾斗争是不断的,在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势力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势力也发展了,但是,对比的结果,无产阶级势力更强了,这样,有朝一日,矛盾斗争激化了,无产阶级就会起来革命,斗争性就会破坏统一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就要被打破。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统一物的分解,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等等状态的破坏,变成相反

的状态。现在世界上有僵持的局面，这个僵持的局面用什么打破呢？就是世界人民的力量正在发展，有朝一日，人民的力量发展到跟帝国主义相比，出现了很大优势，那个时候，这种状态就会破坏。这种状态破坏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帝国主义认为它的战争准备已经够了，帝国主义开火了，那个时候，僵持局面也全部打破；或者相反，世界人民的力量很强大了，修正主义有了很大克服，革命斗争很发展了，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国家又走向社会主义，或者出现世界革命的形势。

所以，只能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质变规律，而不能反过来，用量变质变规律来说明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不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而只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事物由于自己内部的对立而统一和斗争，推动事物由量变到质变发展，出现渐进过程的中断，出现激烈变化的质的飞跃。

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一切事物的发展，总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发展，就是说，总是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永远不向对立面转化这种发展过程有没有呢？绝对没有，没有一种发展过程是可以不向对立面转化的。每一种发展过程都有一种极端，一走到极端，就要向对立面转化。白天工作总有一个极端，因为工作造成疲劳，疲劳到一定程度，就非要向对立面转化不可，非要睡觉不可。休息也有一个极端，休息到一定程度非起来不可。躺在床上太久了也会生病。任何事物都会走到极端。议会民主制走到极端会变成法西斯制。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这篇文章里说：修正主义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社会民主制发展的结果，一定会走向暴力革命。如果精神上没有准备，会造成比应有的暴力革命更厉害得多的暴力革命。这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的，每一个极端朝向对立面转化。

这个规律，古代的辩证法者也看到了，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吉凶祸福，到了极端，都会向相反方面转化。还有像"穷则变、变则通"，穷到了顶点，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要变。不过，怎么样变，他没有讲。古代辩证法是有一些模糊，变到什么地方，不清楚，只说了个"变则通"。任何一个东西发展都有一个极端。在数学上有一个极限，一到了极限，就变成了另外的数字。战争与和平，战争总有一个极端，战争到了一定程度，就是和平。在阶级社会里，就有战争的因素，和平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有战争。战争与和平有互相转化的局面，也有一个极端。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有一个极端，到了极端，一定要向对立面转化，转化之后，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又要向对立面转化。这样两次转化的结果，否定之否定那个阶段就会在形式上重复肯定阶段里的某些特征，在形式上看起来好像是最初阶段的重复，但这不是循环。因为两次否定，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有一些相似，有的像得多，有的像得少。比如，有工作、有休息，就像得多，第二天的工作和第一天的工作是相像的。有一些东西就不很像，但也有某些相像的。比如，个体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是不像的，但是还有一个特征像，就是个体经济也好，共产主义经济也好，劳动人民掌握自己的工具，劳动人民手里掌握生产资料。

否定之否定规律有没有普遍性呢？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恩格斯肯定地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规律，到处都可以看到，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

有同志问：我们举的社会例子多半是讲从原始公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否定之否定，没有人讲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又到

封建社会，又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把这些作为否定之否定的例子来举，这是什么原因?

并不是不可以举，是因为经典著作里没有举。经典著作里在说明问题时，不需要什么例子都举，他一定要举最典型、最显著的例子。不典型、不显著的例子不举，举出来要作很多的说明。用典型的例子，可以少作一些解释，问题讲得更简单明了。我们所说的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表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都起作用。

封建社会跟原始社会有相同的地方，劳动者都有自己一定的生产资料，这一点跟奴隶社会相反，是奴隶制的对立面，但是跟原始公社所有制有共同点。原始公社是原始的集体经济，生产资料在劳动者手中，经济属劳动者自己所有。封建社会的劳动者也有自己的经济，但这不是简单地回到原始社会。在封建社会，劳动者自己的经济是不完全的。在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基础上，个体生产者才有自己的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剥夺者被剥夺，实际上是讲的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又到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封建社会劳动者经济的对立面，封建社会的劳动者、个体经济转化为无产阶级，这样，就由自己有经济转化为毫无自己的经济。然后，资本家也被剥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又把生产资料拿到自己手里，又建立自己的经济。这就是一种否定之否定。

不仅这样大的一个段落里否定之否定，列宁甚至这样讲，封建社会的垄断，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又到资本主义的垄断，这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有封建社会的垄断，就是行会的垄断，不允许自由竞争，不允许有所发明，不允许传播技术；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不垄断，而是自由竞争；到了资本主义末期，出

现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又对新技术发明采取垄断。所以，凡是事物两次向对立面转化，都可以看出否定之否定的作用，第三阶段重复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

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发展也都是如此。打仗之后要休整，休整之后又要打仗；我们党的发展也是这样，要有发展过程，又要有巩固过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来一个大的发展，然后调整、巩固，到了一定程度又来一个数量的发展。量变到质变的这个规律，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渐进到渐进性的中断，中断之后，又渐进，由量变到质变，又到量变，这也是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包括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但是，质量互变规律是一个很普遍的规律，所以，必须把它单独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包括它，但不能完全说明量变质变的特点，所以又不能代替它。否定之否定只是说明事物的波浪式的发展，讲对立面两次转化的关系；量变质变规律还要说明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静止状态和激烈变化的状态，特别是说明社会中和平发展和革命变革的两种状态，实际意义很大。所以，要成为一个单独的规律，辩证法还是要分作三个基本规律，都是事物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但从它们的作用和地位来说，又不能并列，核心还是对立统一规律。

否定之否定的源泉，还是来自对立统一规律。一种事物为什么向极端发展？为什么不能顺着一条直线发展下去？因为它内部有矛盾，对立面互相斗争，斗争中两方面都互相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矛盾的被支配方面转化为支配方面，这个时候就走向反面，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所以，从源泉来讲，只有用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才能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就不懂得为什么事物发展总是曲折的、螺旋式的。可见，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 四、哲学范畴和辩证法核心的关系

我先来回答大家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辩证法的范畴这个名词是不是确切？

说本质、现象、现实性、可能性等等范畴，是不是辩证法的范畴，还可以研究。现在教科书里这样写了，但是经典著作中没有这样写。教科书上所以这样写了，是因为1930年苏联批判德波林时，米丁这些人写教科书是这样写的。到现在我们都沿用这个习惯。现在看起来不确切，将来写教科书恐怕要改一改。我们曾经讨论过，但是没有想出适当的改写方法。所以，暂时还这样写。

实际上，有些范畴是属于唯物主义部分的，比如，现象和本质，是不是一定说是辩证法的范畴？现象和本质和认识论有关系，当然也与辩证法有关系。但是，现象和本质又是唯物主义的范畴。自由和必然，也可以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称作辩证法的范畴不很确切，需要改。

现在讲这些范畴实际是指什么呢？是指除了辩证法基本规律之外另外一些比较普遍的矛盾规律，总的属于哲学范畴。一般叫哲学范畴就可以了，单纯说范畴就不行。这些范畴不单只是思想领域里的范畴，这也是客观规律。如本质和现象，是客观的东西，不仅是人们脑子里的范畴。客观事物的范畴本身就包含着本质和现象、可能性和现实性、必然和偶然，这些都不是主观的。所以，这些范畴实际上所要研究的是客观事物某些最普遍的矛盾运动、矛盾关系。因为它也是最普遍的，所以归到哲学范畴里来研究。它不像经济学中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等范畴那样，仅仅是经济学里的范畴。经济学范畴，超出经济学的范围就不起作用。现象和本质、可能性和现实性等等这些范畴，不管在经济学中也好，在自然界

也好，都起作用。自由和必然这个范畴，在自然界中不起作用，只是在社会范围、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才起作用。其他一些哲学范畴，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起作用。比如，在人类思维中有没有可能和现实的问题？我们现实不知道的东西，以后都可能知道，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动物没有这种可能性，自然界也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人一定要认识不知道的东西。这种可能性要变为现实性，要有一定的条件。

范畴本身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各方面的普遍的表现，是本质和现象方面、必然和偶然方面等等这许多方面的表现。这种对立统一，实际上除了教科书上写的以外，还可以提出很多。比如，一般和特殊，都是对立统一的范畴。实际上，所有哲学上的辩证法、哲学上的一切学问，都是处理对立统一的最普遍范畴的学问。唯物主义要处理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思维和存在也是一对最普遍的哲学范畴。实践和认识，也是一对普遍的哲学范畴。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研究世界各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普遍范畴，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起，一直到现实性、可能性等等，实际上都是这样一种学问。量变质变也是一对范畴，肯定否定也是一对范畴，对立统一也是一对范畴。所以，一切辩证规律，归根到底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因此，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从对立统一规律这一点出发，可以解释辩证法方面的一切规律、一切哲学范畴。对立统一是一切矛盾运动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要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个话的原因。

## 五、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

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我们已经从上述各方面作了解释，

问题大体上已可以解决。但是，如果再深入一层，问题还不算透彻。我们进一步问：对立统一规律为什么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呢？这就要深入理解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问题，要弄清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一原理，这正是深刻理解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的关键问题。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讲两种发展观时，指出发展是对立统一的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这是提供理解一切事物辩证发展的“钥匙”。接着，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6页）列宁在针对庸俗进化论提出发展是对立面统一和斗争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统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原理。

这个原理，大家在学习中经过讨论，大多数同志有了较深的理解，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还是觉得不能充分理解，还有的同志总觉得，既然是矛盾，斗争是绝对的，统一也应当是绝对的。我想，这个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原理，反正是真理，如果不能充分理解可以再研究、再讨论，如果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争论，经过讨论、争论，再加深理解。

如果要纯粹从逻辑上、理论上来理解，就很简单明了。既然叫对立面，它的互相排斥是无条件的，离开实践，纯粹从逻辑上理解对立面本性就是要对抗，就是要斗争，就是要互相排斥。这种互相排斥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如果有条件就不叫对立面。那么反过来说，对立面要成为统一性，那就非有条件不可。因为他本身是对抗的，对立的，是互相排斥的，要把两个排斥的东西让它能够在一个统一体中联系起来，那就非有一定的条件不可，没有一定

的条件怎么能联系起来呢?至于说任何矛盾都有统一性,都有斗争性,因此说,统一性也应该是绝对的,这是没有理由的。虽然,我们认为任何矛盾有统一性,但是,任何矛盾的统一,都是一定条件下的统一,都是有条件的统一,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使对立面联系起来。没有统一性当然不能成为矛盾,这是肯定的,但是,斗争性是对立面本性,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它的统一性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来实现的。要联系实际,例子很多,可以从各方面来看。

比如说,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是怎么一种统一性呢?这种统一性要充分实现,就要思维正确地反映存在,就是要人得到正确的认识,这样,才可以说他的思维和存在充分实现了统一性。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理论可以看出,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实践和认识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这就说明正确的认识不能一次完成,而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能不能说没有完成正确的认识就没有统一性呢?没有完成正确认识也可以有一点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没有发展到完成的地步。也不是说,认识还有错误的时候,就没有统一性。因为错误的认识也是经过实践产生的,或者是由于立场的错误,那就是直接由实践来的。或者由于方法错误,那是在处理实践中得到的材料时发生错误。所以,来源也可以是实践,但是,对实践材料的处理有毛病。总不能说错误的认识已经完成了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不能这样说。有统一性,但不能说是完成了。正确的认识完成了,以后如果你不进一步发展,又会变成错误,由统一变成了不统一了。

统一性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在思维和存在问题上不能一下子就完成,而是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反复,所以它是有条件的。思维和存在之间互相排斥,那还不是说是无条件的。思维和存在是对立面,所以它仍然有脱离的倾向,你一不注意它就脱离了。这

种矛盾一般不是对抗的，但它的对立性是无条件的。就是说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如果不继续发展还可以变成错误。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它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因为在它发展过程中，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命题，如果实践前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命题仍然不变，就变成错误的。发展的过程里面，马克思主义就一分为二，有的跟着实践发展了，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发展，就变成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不是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的阶级斗争，那就更清楚了。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革命人民。

统一性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某一方面或者是某种程度、某种性质的统一。统一性总是非常具体的，比如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种性质上，随着资产阶级情况的不同，程度也不同，在某种不同程度上跟无产阶级有统一性，能建立统一战线，联合就是具体的联合。我们跟帝国主义，比如法国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矛盾问题上，就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多的统一性，因为法国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法国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反美”这一点上——有了联系，我就跟它采取一定的联合政策，跟它建立关系。美帝国主义跟我们就没有这个统一性，但是也有一点统一性，就是它总是要跟我们有一点联系，一点不联系它也做不到，所以，在波兰华沙会谈一百多次，一直不断，直到现在还在谈。它要跟我们联系，我们也需要跟它有点联系，但这也是有条件的，是一定程度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必要的。帝国主义虽然反对我们，反对得那样厉害，但它跟我们断绝任何联系，也是做不到的。所以，研究统一性问题要联系实际，就要这样联系。

研究统一性要非常具体地研究，就是要看条件，看哪些方面，看多大程度，什么性质。我们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我们不因为敌人或是剥削阶级跟我们是对立面，就把任何统一性都排斥了，如果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总会有点统一性的。但是，要考虑统一性，并且体现到我们的政策上，就非具体研究这个联系是什么条件，怎样程度，那一方面是什么性质，要把它搞清楚。所以，在研究这问题时不要脱离实际抽象研究，要抽象地研究就简单，但是解决不了问题。要联系实际，要很具体地联系。斗争虽然也有各种具体的方法，但斗争的方法寓于统一性中，斗争性是绝对的。因为统一性很具体，所以，斗争方法也很具体。统一性的相对性影响我们的斗争方法，但不等于斗争本身有相对性。需要考虑不同的斗争方法。

毛泽东对列宁的关于统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原理，有深刻的说明和发挥，而且，运用得非常具体、非常巧妙。毛泽东在好几篇著作中讲到，我们跟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方面，在某些问题上，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矛盾总是有联系的，联系很具体，程度不同、性质不同、方面不同，需要具体研究。坚持运用一分为二哲学，要善于具体研究，才能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才能准确地决定我们行动的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于列宁的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原理，作了深刻的透彻的阐释和发挥，我希望大家要深入研究一下。他有两段结论性的话：

“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

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强调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这几段话琢磨透了，我们也就会深刻明白列宁所说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明白对立统一规律为什么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从而也就更深刻地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为什么是辩证法的核心的道理。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 《反杜林论》辅导报告*

（1964.1、7）

## 第一次辅导

（1964.1.22）

今天讲《反杜林论》。原来计划上没有这一课，后来教研室同志说这本书很重要，有些问题要我来讲一下。因为是临时增加的，决定的时间也很短，准备得不够。我主要的是回答一些问题，同时还想着重地讲一讲辩证法的那两章（量和质，否定之否定）。

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准备讲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反杜林论》哲学篇的结构；

---

* 艾思奇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主要是哲学编），曾作过两堂辅导报告，第一堂是1964年1月22、24、27日，分3次（三个半天），为中央高级党校“59班”、“60班”哲学专业所作的辅导；第二堂是1964年7月2、3日，分2次（二个半天），为中央高级党校“60班”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所作的辅导。这里整理的是以第一堂速记稿为主，也吸收了第二堂速记稿中不重复的有新意的部分。所增加的第二堂辅导内容用〔 〕表示。删去了少量明显不合适的例子和重复的段落，不增加任何观点，尽可能保持辅导报告的完整和丰富的内容，力求反映艾思奇的哲学思想。

艾思奇辅导的《反杜林论》，是用的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吴黎平译，所有引文皆出自这一版本。为了查阅方便，我们又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反杜林论》新译本页码注明。

二、学习《反杜林论》的意义；

三、辩证法的两章（量和质，否定之否定）；

四、前一段辅导中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

## 一、《反杜林论》哲学篇的结构

哲学篇为什么这样写？内容为什么这样安排？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写文章，特别是研究怎样写论战性的文章。为什么《反杜林论》这样安排？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系统的，它的系统是活的，是发展的（有一次我和“59班”支部的同志谈问题时也谈到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是跟实际问题联系着的，如果有争论的时候，跟争论的问题有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会在一篇著作里面把马克思主义各个方面的一切问题都谈到，总是有个重点，着重阐述那一方面。所以，我们看马克思主义著作，看哲学著作，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系统。同一个恩格斯写的两篇哲学著作（《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系统就不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是批判黑格尔，着重讲辩证法问题，第二章是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第三章才讲到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第四章讲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是这样安排的。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费尔巴哈的哲学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批判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他要从黑格尔讲起。写黑格尔学派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吸收辩证法的问题，然后在继承的过程中发展了唯物主义。这就涉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第二章就讲唯物主义，然后就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又着重批判了宗教问题，因为当时主要的是宗教批判问题。在费尔巴哈以前，德国哲学界还没有直接谈政治问题。所以讲历史唯物主义也主要的

是谈宗教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很多，像人民群众的问题，国家问题等等，但是他着重谈宗教问题。他是根据论战的需要安排系统的。

《反杜林论》哲学篇就不是这样的系统，等一下再讲。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几乎没有讲辩证法，只讨论了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而在认识论问题中又着重于认识论的最根本问题，最起码的问题，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反映论问题。他在那篇文章中从头到尾贯穿这样的问题。第六章讲历史唯物主义，也是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其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讲；那么大一本书只是全面地解决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个哲学上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用通俗的话来说，他主要的是解决了什么是正确的认识问题，而没有着重解决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像《实践论》里面所谈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规律，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根本没有提到。他在这本书里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到各方面，如自由与必然的规律性，但是归根到底是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很透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面还没有这样的透彻、深刻地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但是他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好处是这个问题解决得非常透，如果说他有缺点，就是他解决的范围仅仅限于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当时哲学界发生的主要的争论就是这个问题，当时哲学思想界、工人运动里面成为危险的就是这个问题，在根本问题上动摇了。由于 1905 年革命失败了，一些人被敌人关进监狱，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上跟着资产阶级走。所以当时这个问题最突出，不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就要垮台。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最根本的理论就要

被拆台，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怎么能行?!所以列宁就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1937年7、8月，毛主席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当时还有哲学提纲和别的问题，不过突出的是这两篇。因为在中国革命运动里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中心的问题是这两个问题，所以毛主席写了这两篇文章)，为什么这样写?《实践论》着重写在实践基础上认识的反复，一直到现在还发挥了这个思想。《矛盾论》着重写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深入阐发矛盾问题。列宁那个时候，主要是暴露在学术上根本取消马克思主义。而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不是这个问题。中国在这时主要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因为教条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脱离实践，不知道从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当时主要的危险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跟着教条主义走的。所以毛主席着重讲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实践在今天的意义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从前是教条主义使得我们脱离实践，现在我们有了政权，主要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所以，《实践论》、《矛盾论》今天还有重大的意义，在反对官僚主义脱离实践时，结合反对主观唯心主义，这也很有意义。

《反杜林论》这本书这样的写法，和当时的论战、跟当时敌人提出的问题有关系。这本书首先有《引论》。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就要看引论。包括哲学篇在内，《引论》就是讲提出的中心问题。现在我们究竟要争论什么问题?把这个主要的矛盾提出来了。《引论》里面又有两节，一节是概论，一节是杜林先生作了何种诺言。这两节就是两个对立面，究竟我们主张什么?杜林主张什么?概论是讲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在第二节里面讲到杜林要把这个科学的社会主义否定，只有他的所谓社会主义才是“终极真理”。

凡是写文章，开头总要把问题说清楚，一般理论文章，或者是论战文章，总要有这样的程序。不管怎样开头，开头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一般总有个原则，一开头就把争论的矛盾提出来，大文章也好，小文章也好，一本书也好，大体上总要这样做。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所有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是这样。《实践论》、《矛盾论》一开头就把主要问题提出来了。《矛盾论》一开头就讲矛盾问题是根本问题，只要了解了矛盾的规律，就基本上弄懂了辩证法。《矛盾论》是为了反对德波林学派的，一个小的开头就把全章要争论的问题指明了。这样，读的人才能知道读这本书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反杜林论》开头比较长。概论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明的。什么叫科学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要说明科学的社会主义能站得住脚。第一，它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有认识了斗争的规律，认识了斗争的前途，才能提出这个科学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有客观规律，不是凭空想出来的。第二，理论的形式，理论材料是从长期前进中探索积累起来的，是继承了以前，特别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有的知识财富，经过批判、研究，得出的结论。把以前启蒙学者思想的优点、缺点都研究过了，他们思想中好的都发展了，他们的缺点都克服了。启蒙哲学思想包括许多方面，包括法国的唯物主义，包括法国革命时期的各种思想，包括德国的古典哲学，还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所有这些以前的学说都批判过了，才能得出这样最高的结论。从理论本身来讲，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而是经过非常辛苦的科学研究，所以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它的内容是有客观基础的，它的形式是经过许多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思想家、科学家从各方面摸

索的结果。这样，矛盾的一个方面就树立起来了，这是正面，是站得住脚的。现在忽然又出现了杜林，这个杜林先生自己认为很了不起，把自己说成是空前绝后的人物，好像只有他的思想才是唯物主义的，是绝对正确的，所有过去的思想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看他有没有一点像赫鲁晓夫？他把斯大林以前一概否定，当然还不能直接否定列宁，但是他认为列宁主义也过时了。他自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一点错也没有，错的也是对的。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完全能够站得住脚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提出一套自认为绝对真理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怎么办？就要斗争一下。《引论》的意思就是这样，把对立面树立起来，在概论的一开始就讲了，我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不赞成杜林，他是吹牛皮。这样把态度表明。至于我们的态度对不对，请看下面再一章一章地批判。

这本书的结构也是从哲学到经济学到社会主义，恰恰适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它比较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这样写是有原因的，这跟论战有关系。如果没有杜林这个人的出现，恩格斯也没有机会全部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有杜林这个人想搞一个包罗万象的典型，他自己搞了三部分东西，第一是“哲学讲义”；第二是经济学讲义（“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第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他也是三部分著作，当然还有其他著作，但这三部分是他最基本的著作。他全面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也全面地向过去一些学说展开大举进攻，这个进攻是相当猖狂的。杜林这套东西，后来还得到伯恩施坦的称赞。

伯恩施坦是怎样称赞他的呢？伯恩施坦写了一本书叫《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这本书大概是他自己的自传。他在这本

书里面讲，“1872 年的晚秋，欧根·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一书出版了。这使我对这位失明的学者的兴趣大为增加，……。他在这本书中坦率地表示信奉社会主义（他也相信杜林是社会主义——艾注），他用来说教的那种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形式很中我的意，尤其是因为自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在德国还没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和目的提出任何概括性的表述”（《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三联书店 1953 年版，第 14 页）。伯恩施坦也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像《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和目的提出任何概括性的表述，只有杜林把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和目的提出一个概括的表述。伯恩施坦把杜林说成是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从恩格斯的批判来看，杜林主要的还不是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他是黑格尔的图式主义和机械论，有些地方他是唯物主义（主要是唯心主义的，但里面也包含机械唯物主义）。他主要的哲学观点就是这样，唯心主义是黑格尔的图式主义，他的机械唯物主义就是把对立统一的规律解释成两种外力的对抗。把对立统一规律解释为对立的力量的对抗，用外力对抗的规律来代替对立统一的规律，这是机械唯物主义。

所谓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从伯恩施坦的眼睛里看，杜林的这些社会主义主张，有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色彩。有没有这种色彩呢？也有。他也是改良主义，迁就现状，不是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谓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就是着重眼前利益，迁就眼前现状，这点很合伯恩施坦的口味。

我们提出这点是说明杜林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他写了很大的著作，很吓唬人。在当时杜林的著作很流行，在工人运动中起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又有伯恩施坦这样的人给他宣传。所以，恩格

斯不能不用很大的力量来粉碎他，实际上他的内容不值得批判，很肤浅的，杂乱无章。一方面轻视前人，另方面却又非常浅薄的抄袭前人的东西。口头上把黑格尔说成是神魂颠倒的、非常愚蠢的，但是他自己恰恰又抄袭黑格尔的东西。机会主义野心家都有这样的特点，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一方面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同时斯大林的错误，他抄了很多，而且发展了，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他不抄。杜林也是这样，一方面全盘否定黑格尔，但是黑格尔完全错了的东西，他又都抄过来了。当时恩格斯就碰到这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水平那么浅薄，那样无聊。但是他在理论界，在工人里面却有影响，所以要给他系统地批判。因为对方的理论有三个大部分，恰恰使得恩格斯有机会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系统地说明。所以，这本书也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正好是批判对象的三个部分。

哲学部分，他先讲分类、世界图式论……最后才是辩证法。这个顺序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顺序：头两章是讲唯物主义，第五、六、七、八章是讲自然界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第九、十、十一共三章是讲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第十二、十三两章是讲辩证法问题。这个顺序不是像我们一般的教科书那样。教科书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顺序，或者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他为什么这样搞呢？这也是跟杜林这个斗争对象、这个对立面的特点有关系。因为杜林把他自己的哲学作了分类，他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分做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总的东西，总的哲学思想，关于存在的基本原则，详细一点说，就是对一切存在都适用的关于形式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存在首先要研究这种形式原则，然后再进一步把这些形式原则用到自然，用到社会。因此接着就有自然哲学，然后是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哲学。杜林

的体系就是这样的。因此，恩格斯的批判也就按照他的结构，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批判。哲学篇的结构就是这样，先批判他不变的形式原则，然后批判他怎样运用这个形式到自然界，然后再批判他怎样运用到人类社会，也就是道德和法，最后有两章关于辩证法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总结，意思就是说，所有杜林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违反辩证法的。这些问题的对立，都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最后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来概括全部争论。然后来一个小结，这个结论很短，无非是说明杜林的哲学就是唯心主义的，是反辩证法的。这个哲学篇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哲学篇共有十二章，实际上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三、四章，批判杜林总的哲学观点，就是他所谓的适用于一切存在的形式原则。这是批判杜林最根本的哲学思想，指出杜林这种哲学观点是先验主义。所谓先验主义，就是说，杜林认为有一种思想原则，一种形式原则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没有存在以前，在宇宙中先存在，在有人的经验以前，先有一种思想原则。先验主义认为理论在经验以前就存在了，这是颠倒的，这是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为理论是在经验以后产生的，先有经验，然后才有理论，理论是经验的概括。所以理论不可能在经验以前。先验主义认为，在没有任何经验以前理论已经存在了。“先验”这个名词是康德的名词，他认为理性原则是在人的经验以前就存在了，一切人可以经验到的东西还没有在世界上出现，先有一个理性原则，先有理性的形式概念，这些东西是在世界以前就存在。所以，从世界发展史来说，从宇宙论来说，他就是唯心的，他认为精神在物质以前出现，自然界，社会历史没有存在以前，先有一种存在形式的原则，由于这些原则的发展，最后出现了自然，出现了人类社会。这个观点和黑格尔完全一样。恩格斯讲得很清楚，整

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杜林的看法和黑格尔的看法完全一样，他批评黑格尔，否定黑格尔，但是他的宇宙论是跟黑格尔一样。“分类。先验主义”这一章，即《反杜林论》中第三章，主要是揭露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实际上是不高明的，非常粗糙的抄袭黑格尔哲学的结构。

《反杜林论》的第四章，是世界图式论。他所谓的形式原则、所谓的世界图式是什么东西呢？把杜林的世界图式分析一下，恩格斯说，杜林的世界图式也是黑格尔逻辑学非常不高明的抄袭，是非常粗糙的、没有连贯的一种很浅薄的抄袭。杜林说：世界图式要从存在的概念开始，黑格尔也是这样。但黑格尔还比他高明一点，没有胡说存在是惟一的，存在的概念是统一的。黑格尔讲存在的时候还讲辩证法。他说：真正的存在是存在和不存在的结果，存在和不存在相结合，存在和不存在的统一是生成。就是说，一种东西在生长，生长和不生长，存在和不存在的统一。杜林也抄了这点，他先讲存在是惟一的。讲存在是惟一的，就不能讲不存在。他又说存在太抽象了，抽象的存在等于虚无。因此就要使存在成为一种暂时的存在。纯粹的存在等于虚无的，因此就使存在的概念成为切实的存在。有一种具体内容的存在，就是存在是什么东西的存在，然后，既然是有切实的存在，就要有质，有质就要有量，这是比较自然的发展。黑格尔讲这些问题有一定的道理，这跟人的认识发展过程有关系，人认识事物就是有这种过程。当然黑格尔讲这个问题时讲得很神秘，但是用到个人认识过程中，还有一点道理。有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人的认识开始的时候，模模糊糊的觉得有存在，开始不会认识到有什么东西存在，如果自己只满足于这种存在就没有认识，所以存在不等于存在。因为自己有这种反省，觉得模糊的认识没有什么认识，就要搞清楚什么

存在。搞清楚确实有一个东西存在，模糊的认识也许有东西，也许是一个方向，要进一步搞清楚。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开始感到有苗头，但是模糊，要弄清楚确实有这个东西，而且弄清楚是什么东西。弄清楚有什么东西也就弄清楚是什么质。弄清楚是什么质，就要搞清楚这个质有多大的量，弄清楚量就要弄清楚质和量的关系。黑格尔哲学合理的东西就是他反映了人的认识过程，但是他错误的地方是把人的主观认识过程看做是客观存在，看做是宇宙产生以前就有这个过程，自然界还没有出现以前，好像世界上就有这么一个东西，不晓得是上帝还是什么东西，在那里存在。然后又搞出一个确实的存在，又考虑质和量，最后，这一套逻辑讲完了才出现自然。这一套黑格尔是这样讲的。但杜林讲自然界不会自己跟自己矛盾，如果要想把存在到存在中，就有虚无，又觉得存在和不存在是统一的，他开始讲存在是统一的。逻辑上非常不连贯，比黑格尔混乱多了。

下面就是自然哲学，这几章里面主要是讲杜林对时间和空间的形而上学观点。他不是用辩证法去理解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他想用一种图式(公式)去说明一切问题，结果又自相矛盾，因为他是形而上学者。历史哲学也是这样，在谈道德问题、善恶问题、真理和错误等问题的时候，可以看到都是指出杜林用一种死的公式去套问题，想找一个绝对真理。因此陷入了形而上学，违背了辩证法。

最后两章讲辩证法，这等于总结了前面所有的批判。归根到底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当然首先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但是从具体问题来讲，实际上也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杜林的形而上学是唯心论的，否定对立统一的规律，否定矛盾的规律，用外力冲突的规律来代替对立统一的规律。对立统一的规律是两种力量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互相对立，一方面又分

不开，又统一又斗争。而杜林认为两种力量是绝对对立的，如果讲对立，是两种力量从外部的对立。

哲学篇的结构就是这样。

（注意：凡是【 】内的内容，均为第二堂课中所讲，以下不再注明——编者。）

【《反杜林论》有一个引论，是全书的主题。究竟这整本书要解决什么问题，引论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讲的这个问题。究竟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应该怎样来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不是要像杜林那样，由他个人来发明最后真理来解决，是不是杜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才是最后真理?以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不算数了？实际上就是要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跟杜林所谓的绝对真理拿来对比一下。

所以，引论里第一段简单地叙述了一下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史，这个发展说明社会主义思想的发生、发展史，反映了阶级斗争，反映了欧洲当时阶级斗争的变化。在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以前，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资产阶级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号称自己是代表一切阶级的，代表全人类的。实际上这种所谓代表一切阶级，代表全人类是一种假象，“正是这种情形，使资产阶级的代表能够标榜自己不是某一个别阶级的代表，而是全部受苦的人类的代表。”（《反杜林论》第 15 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356 页。以下只注明“又见同上书”的页码）资产阶级自己标榜代表一切阶级，代表全人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资产阶级的学说只代表资产阶级。而且在资产阶级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时候，同时已经出现了与它对立的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的某种独立运动了。所以实际上资产阶级那种所谓代表全人类的名誉是虚伪的。

这一章我们要联系到不久前的一个争论，就是跟冯友兰的争论。冯友兰认为革命的阶级（其实是资产阶级）他能够代表全人类。这次争论有点真实的意义。他真正能代表全人类？大体上资产阶级他们能够提出一种普遍的形式，这种普遍的形式能够符合各阶级的要求。这个理论我们有人反驳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也可以作为反驳他的内容。恩格斯的末一句话讲：资产阶级真能代表别的阶级么？而且讲资产阶级标榜自己能真正代表全人类，不过是形式上代表全人类而已。实际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当时已经出现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初步思想。

所以，无产阶级思想的萌芽，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法国大革命以后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出现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出现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是他们的思想形式还是唯心主义的，体系、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是从资产阶级继承下来的一些方法，就是认为“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反杜林论》第17页；又见同上书第358页）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内容是反映无产阶级要求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在观点上是唯心主义的，把社会主义看做是一种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没有把它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学说本身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子看，而看做绝对真理、永久正义的表现。这种思想首先是从法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所以，形式往往是继承了以前的东西，把社会主义看做是绝对真理的表现，看做是理性和正义的表现，这样就不能深刻地了解社会主义的来源。好像社会主义思想是可以偶然发现的，跟空间、时间没有关系，只是有一个什么聪明人一发现，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在

唯心主义的观点之下，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资本主义的矛盾。这种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当然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因为社会主义本来是反映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是他没有把社会主义看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反映。因此，就不能从无产阶级群众里面去找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想凭上层人物用恩赐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不是到群众中去，不是去发动群众来争取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提出了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

后来，因为经过了一段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发展起来了。然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法的观点去观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变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拯救人类历史，然后说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从阶级斗争这个观点出发，以阶级斗争为基础来观察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样，就使空想社会主义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已经科学地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科学了。这种科学的产生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作基础的，科学是不断推进的。"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而现在的事情首先是在于把它的细目〔及其相互联系〕进一步加以发展。"（《反杜林论》第 27 页；又见同上书第 366 页）

马克思奠定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以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要在细目上进一步地发展。这里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也要不断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不把真理完全看做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一下子被偶然发现的，一经发现一切都解决了，不是这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科学的原理，让以后的人逐步地加以发展。社会主义学说本身要不断地发展。

看到这地方我们就要想想今天。今天社会主义的学说在中国

是不是大大地发展了？比起马克思、恩格斯那时候来说是不是更多了？显然是更多了。比起列宁，我们也知道的更多了。

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真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所谓绝对，就是一切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方向是绝对的。所谓相对，是指走向共产主义的每一个时期，我们所能达到的程度，我们的认识水平、工作水平有历史的限制，我们今天只能做到我们今天这种地步。我们要想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不行的。共产主义是一定要过渡的。如果是两年，我们还只能是搞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发展。再过 20 年我们这些人如果还活着，我们要知道的东西比今天更多，社会主义的问题会更发展。而杜林所讲的绝对真理，片面的绝对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是发展的，所以，又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关于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有很多人觉得难以了解，常常一提起这个问题就觉得不清楚。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真理是不断发展的。因为它不断发展，总是又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它的绝对性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的方向、规律是不依赖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要如此的，是绝对存在的。但是，发展总是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受历史的限制，所以是相对的。

《反杜林论》中第一章《概论》就是把这样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阐明了，告诉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了。】

【《反杜林论》的结构里，我们有什么可以学的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写文章不需要一个死的公式，要看批判什么对象，再决定怎样写。恩格斯针对杜林这个对象，是这样一个体系。我们一般大学的教授都喜欢讲系统性、概括性、科学性。搞一个一成不

变的体系。这个系统是有机的、联系的、完整的。搞一本教科书，搞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哪一个问题摆在前面，哪一个问题摆在后面是不能动的，实际上永远不能成功，因为系统总是要发展的。

所谓系统性，我们常常讲系统性不能只看到形式上的固定的系统，总是要针对一定的目的，解决一定的问题才有系统性，有一定问题的系统性。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系统。

哲学系统是不是恩格斯就是惟一的？列宁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也另有一个系统。在这里辩证法、唯物主义也没有讲，从头到尾就解决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问题。可不可以说，列宁只讲了这个问题，没有恩格斯系统？不可以。因为列宁当时要解决的问题跟恩格斯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恩格斯是要批判杜林，杜林提出了这样一套东西来，你要针锋相对地批判，所以提出了这样一个系统。列宁活着的时候，当时最成问题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大流行。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流行，腐蚀、影响无产阶级，这时就要集中力量驳倒主观唯心主义和马赫主义。因此花了那么多功夫，写了二十多万字，从头到尾从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系统。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是活的，活哲学、活理论，不能有什么死的形式。】

## 二、学习《反杜林论》的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一下，空洞地讲意义是没有办法讲的，必须具体地讲，而且也不是讲几条就能讲完的。因为学习经典著作要联系现在，要看现在的情况，现在有哪些东西可以用，哪些东西用不上，用不上的就摆在一边，一般地只能这样讲。我们研究《反杜林论》要研究恩格斯是如何批判杜林。首先，我们

要学会如何对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里包括斗争的方法。比如我们刚才讲的结构问题，系统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的学习有两种学法，一种学法就是恩格斯跟杜林斗争采取这样的形式，我们现在跟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也照着恩格斯的办法，机械地把赫鲁晓夫的言论排列成三个大部分，他的言论哪些是唯心主义的，摆在第一部分，再找一些讲自然哲学的材料，然后再搞一些关于道德和法的材料，把赫鲁晓夫的材料串起来，最后搞辩证法的材料。这种学习方法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要这样学习。我们要抓住精神实质，总的来讲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要针锋相对。既然是针锋相对，那么机会主义有什么问题，我们也要考虑什么问题，他提出什么问题，我们也要打他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写反对赫鲁晓夫的文章，就不能机械地照搬恩格斯的公式和结构来搞。我们学习《反杜林论》决不能看到恩格斯怎么排列的，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也这样写，这样做一定要失败的。值得学习的是针锋相对地写。我想一般地讲有这样的意义。

杜林这个学派不是修正主义的，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它跟修正主义不一样，修正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反对马克思主义。杜林是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得一钱不值，把《资本论》也说得一钱不值，认为就是他对。因为他写著作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最后在工人运动里面取得支配地位。杜林的书是在 1872 年巴黎公社以前出版的，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支配地位是在 1872 年以后第一国际结束的时候。这时，马克思主义把巴古宁主义粉碎了。1872 年以前，工人阶级中的机会主义都是可以公开打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拉萨尔、杜林都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鲁东也是这样。杜林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活动做得不多，他主要是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影响。所

以，杜林和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的修正主义不同。但是，他是机会主义，这点跟修正主义是一致的，所以有许多东西可以作为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材料。我们今天学习《反杜林论》就可以找一些武器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找武器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应该从总的方面找一些恩格斯已经发挥了的武器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反对辩证法，恩格斯就坚决主张辩证法。比如恩格斯在概论里面讲到关于经济学的问题时，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他说："事实日益明显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虚伪性——这些学说，说资本和劳动的利益是一致的，说自由竞争的应有结果是普遍协调和普遍的人民幸福。"（《反杜林论》第24—25页；又见同上书第364—365页）恩格斯所批判的这种经济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有没有呢？还是有的。所以，当我们研究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些经济思想时，就可以把恩格斯的武器拿出来运用。我们研究《反杜林论》可以从里面找正面的武器，也可以找反面的武器。所谓反面武器，就是把现代修正主义和杜林加以比较，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时候说：你这种思想不仅仅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的思想，而且是杜林的思想。比如，在哲学上杜林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他首先攻击对立统一的规律。恩格斯在辩证法量和质这章一开头就引了杜林的这段话："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和极重要的原理，就是矛盾的排除。……"（《反杜林论》第122页；又见同上书第460页）现在修正主义在哲学上是不是也排除矛盾？他也是排除矛盾的，不过他不像杜林那样露骨，不是公开讲要排除矛盾，而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转弯抹角地讲排除矛盾。恩格斯就反对排除矛盾的学说，今天我们发现现代修正主义也要排除矛盾，当然可以用当时恩格斯的武器来批判他。但是光用恩格斯的武器还不够，我们要根据恩格斯的话对现代修正主义排除矛盾的狡猾手法

作进一步的揭露。杜林就用不着揭露，因为他自己就公开地讲排除矛盾。但是现代修正主义不公开地反对矛盾的规律，他口头上还承认矛盾规律的辩证法，但是他用各种各样的诡辩手法来掩盖矛盾。使用恩格斯的武器对我们是有力的支持，在这种支持下，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进一步揭露，就可以有效地达到我们斗争的目的。

学习《反杜林论》，一方面要把文章弄懂，把原理搞清楚，不过更重要的还是用到现在，要注意哪些地方跟现在的问题有关系。也可能有些东西看不到，将来再翻的时候也可能看到，现在要我举出哪几点今天有用，哪几点没有用，也没有办法，因为这往往要在斗争中才能发现，真正要批判的时候，本来不注意的地方，现在也有用了。所以经典著作不能看做那几条，它是根本原理，用处是无穷的，这要根据实践来决定。

再一个意义就是跟毛主席思想挂钩。一方面要把《反杜林论》里面的基本原理弄清楚，另一方面跟毛主席思想做一些比较，这并不是说毛主席有另外的东西，而是说毛主席在根本原理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发挥。比如关于先验主义这个问题，这里有没有关于认识从何而来的思想呢？也有。恩格斯就提出了"思维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原则呢？从它自身中吗？不，……。"（《反杜林论》第34页；又见同上书第373页）毛主席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恩格斯是讲思维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是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里说明毛主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恩格斯在这里仅仅着重说明原则是从客观实践中来的，不是从主观来的。而杜林认为数学是思维本来就有的，人的头脑里就有，或者是先验的，在没有经验以前就有。恩格斯就强调原则是从客观事实概括

起来的，而概括首先要根据人的经验，这里没有讲实践。在 37 页中讲到经验，数学的公式也是从经验来的。算术的计算为什么用十进位，因为人最初的计算是用十个指头，自然而然的就十进位。如果人的两只手是七个指头，可能就是十四进位了。可见数学是从经验概括出来的。有许多原则恩格斯全讲了，但是讲得很简单，也不很展开。比如说由经验到原则要不要飞跃？恩格斯在这里就没有完全讲，他只讲了一点。在 37 页上（又见同上书第 377 页）他说："要作计算不但要有被计算的对象，而且还要具有这样的能力，使其在考察这些对象时，能够摆脱其他的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而这种能力则是长期的依据于经验之上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人的计算不仅仅要靠有对象，而且要靠有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抽象的概括能力，考察对象的时候，要摆脱其他特性。人就有这种能力，比如在讲 1、2、3……10 的时候，他就能摆脱一个人，一只狗，单考虑 1、2、3……10。最初的时候还有许多东西，比如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用指头代替人、狗。最后就是 1、2、3……10，指头也没有了。这种能力动物是没有的，就是高等动物猴子也没有，甚至原始人也没有这种能力。刚解放时云南的原始人就不能计算太多的数目，10 以上就不能计算了。现在我们有这种能力，能脱离十个指头抽象地计算，11、12，一直到 100，1000，……。这个经验，是人类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最初的人不行，后来由不能脱离十个指头到能脱离十个指头计算，这是一个飞跃。我们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在原始人来说，困难大得很，要经过多少万年才能有这种能力。要有一个实践、经验的过程，到了几十万次才能得到抽象的概念，所以这是一种飞跃。毛主席用飞跃这两个字把这个过程（由实践到理性认识）很形象很生动的讲清楚了。从恩格斯这里讲的，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主席为什么

在《实践论》里讲反复多次才能飞跃，就是因为飞跃要长期的实践经验。越是早期的人，实践、经验的时间越需要的长。我们现在的人比较不同，认识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由感性到理性比较快，当然复杂的问题也不行。革命的问题要经过几十年，或者是几年才能抽象，对社会主义建设要达到规律性的理性认识，也必须经过几年或几十年的实践过程才行。一个巩固的概念，一个原则的思想形成，就要经过几年或几十年的经验。不见得开始觉得对，后来又觉得不对，总结经验里面看到成绩，后来又发现有缺点，又怀疑，或者是总的不怀疑，部分怀疑。这个过程有的长，有的短，这和我们的经验有关系。大庆的领导坚信人民群众，没有动摇，这跟他们军事干部长期的斗争经验有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过去长期从经验里面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得到一个巩固的原则的知识，真正地掌握了理性知识，思想就比较巩固。如果理性原则还有点动摇，说明他还没有完全从经验飞跃到理性，他的方向还不那么坚定。

我们读《反杜林论》的时候，可以从这里看清楚恩格斯已经阐述的问题，毛主席用新的形式又发挥了。第一，使我们对毛主席思想得到更深刻的了解，因为毛主席思想是从现在的实践中发挥这个原则的，恩格斯是根据当时的斗争经验，从某一个角度加以阐述。所不同的是毛主席所发挥的一个“飞跃”，恩格斯没有从“飞跃”来讲，而是说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依据于经验之上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它跟经验有本质的不同。这样就会加深我们对“飞跃”的了解。

第二，可以知道毛主席是从经验、实践的基础上，用新的形式又发挥了这个原则，或者还有某些方面补充了。比如正确的认识要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才能完成，这里恩格斯还没有这样明确地

讲到。

我们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采取这种态度就可以得到比较多的益处，就可以避免简单背诵。

【下面再讲一讲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反杜林论》。这个学习的总原则就是联系实际。讲原则大家都知道，是老生常谈。但是在学这个著作的时候怎样具体来应用这个原则呢？我看可以采取这样一个办法，就是要用比较的办法。用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哲学思想，跟恩格斯当时所阐述的这些原理作一些比较，根据这些比较就可以联系实际了。恩格斯在当时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到今天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东西要讲？从中我们就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发展的。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多少了解了。要了解发展就要了解历史与当时的情况，和今天作比较，就要注意到今天我们的哲学为什么有一些新的发展。我们学《反杜林论》可以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原理。

《反杜林论》中辩证法这两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说是把辩证法的内容说得最完全、最全面的著作。

讲自然哲学、道德和法，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其中对辩证法规律全面加以说明的还是这一本。

大家要学习经典著作，我要推荐这一本，原来大家想学《费尔巴哈论》，我没有推荐。因为《费尔巴哈论》没有这本完全，当然它有它的系统。恩格斯著作中系统是不同的，因为他的目的不同，他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这一本书就辩证法来说，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做了全面的说明，而且是很通俗的。

这本书用领读的方法不大合适，因为很多地方大家可以看懂。领读这方法也不能绝对化。也有这种看法，好像本本书都要领读。这本书可以把难读的几段读一下，其他的东西，大家学了就都懂得。我是很外行的，没有大家懂得的多，那还领什么读呀！所以，任何方法都不能绝对化。

在这本书里，恩格斯对辩证法说得是比较全面的，但是，跟列宁所讲的辩证法来比，跟毛主席的《矛盾论》来比，他讲的内容就比较简单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面辩证法的东西比《反杜林论》讲得更细致一些。有些应该突出的问题《反杜林论》中没有突出，所以要比较。

我们学习的方法也是讲的方法，也是用比较的方法。因为通过比较的方法可以联系实际。为什么恩格斯那个时候只讲那么多，我们今天有一些问题要讲得更细致、更突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理论是从实际来的。当时实践工作需要理论着重讲某几点，马克思就要比较突出地概括某几点。等到事物发展了，辩证法的另外一方面就需要突出起来，那就需要在另外一方面发展。所以，《矛盾论》里的一些东西，《反杜林论》里没有讲。这不能怪恩格斯，不能说恩格斯水平低，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时代的条件问题。绝不能解释成为标准低的问题，是历史条件的问题，实践条件的问题。某一个时候，实践需要突出某一些问题，《矛盾论》里突出了一些主要的矛盾问题，都是为了当时的斗争来突出的这个问题。把主要的矛盾问题归结到现在，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因为实际斗争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个问题，所以就要特别阐述这个问题。恩格斯写辩证法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他没有这个实践的需要，并不是他不懂，如果有了实践的需要他

也可以看到。恩格斯如果活到今天，他要讲这个问题。他活到19世纪，他解决19世纪的问题。

通过历史的比较来联系实际，这样来学习经典著作也就好学了。

比较以什么为中心呢？以我们现在的东西为中心，就是我们应该以毛主席的著作为中心来比较，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什么要以现在的东西为中心呢？因为现在的许多问题更展开了、更清楚了。所以要以现在的东西为中心，再回过头去理解以前的东西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以前的东西是比较原则性的。原则性的东西有时候可以这样解释、那样解释，它可以有各种解释。因此，它可以引起争论。那么，争论应该怎样理解呢？以现在所概括出来的东西为准。比如我们最近讲课时经常说到这个例子，有人说列宁讲过这样的话：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毛主席在《矛盾论》里引了这句话。有人问：列宁说对抗消灭了，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有对抗性的矛盾呢？是不是列宁错了？或者是列宁正确，我们不应该这样说？是不是列宁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有矛盾呢？是以列宁的话为中心来解释问题，还是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观点来解释问题呢？我看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观点来解释列宁的话就不会出错误。如果用列宁的话来解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能就有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提出这个问题，我就作这样的回答：要理解列宁的话，就要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理解。以前的人对列宁的话作怎样的解释不管他，反正要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解释。因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概括了更多的经验，概括了列宁死后三

十多年的经验。列宁的话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很原则的，想用那个话来概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概括不了的。只能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的观点来解释列宁的话。如果以前有人解释过了，而且解释的不符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的观点，那么就要重新解释。以前就是这样解释列宁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一进入社会主义对抗就消灭了，所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对抗的矛盾。以前就是这样解释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解释。修正主义他们否认苏联有阶级、阶级斗争。后来我们给他一批评、一攻，他们马上改口说：我们并没有否认有阶级，只是否认有对抗。苏联现在就是搞这种鬼名堂。这是以前的解释。

以前的解释对不对呢？我们说要重新解释。有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要重新解释。以前的解释要取消，因为修正主义也是那样解释嘛，就是散布所谓对抗消灭了。应该怎样解释呢?应该解释成对抗逐渐在消灭，不应该解释成为对抗已经完全消灭了。应该大胆作这样的解释。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要以毛主席的著作为中心，才能学得好，才能学得准确。

还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政权的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也是很原则的话，对这句话有过解释。

苏联有过解释，把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解释成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初期。资本主义刚刚过渡到初级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过渡时期。1936 年以后苏联就结束了过渡时期，这就是从前的解释。

这个解释我们要不要保留？如果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学习苏

联我们就不要保留。我们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所以我们要重新解释。这两年出现了修正主义，我们对马克思的话就要作重新解释。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就是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不是刚刚一建立起社会主义就实现过渡了，实现共产主义了，而是一直要到高级共产主义。这个解释就正确了。因为新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苏联俄国革命胜利后四十几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从1936年以后一直到现在苏联的发展过程证明苏联的过渡时期并没有结束。

用历史的比较法来联系实际，同时以现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中心来学习才能得到益处。不然就会学成只会背旧教条。《矛盾论》里有些话恩格斯没有讲，那是不是《矛盾论》有点问题了？有人说，恩格斯讲辩证法的核心是否定之否定，而列宁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的统一。究竟是以列宁的话为中心解释问题，还是以恩格斯的话为中心解释问题呢？实际上，恩格斯的话也是以对立的统一为核心（后面要讲这个问题）。他这话的意思是另有所指。

我们大家学过《资本论》，很清楚，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解剖人是了解猴子的关键，把人的身体解剖了，了解了，要了解猴子也就容易了。了解了更发达的东西，那么，不发达的东西就更能够了解了。根据人的身体情况来了解猴子，能不能根据猴子的情况来了解人呢？那就不能了。当然，做比方要注意确切。因为恩格斯、列宁不是人与猴子的问题。不要误会，误会就要犯错误，大家不要多用这个例子。

但是，事实上是有这个问题的。根据比较展开的东西能够了解比较原则的东西，使我们对原则的东西了解的更深刻。如果只重视原则的东西不重视展开了的东西，那么，你对展开的东西的

了解就有所限制。恩格斯在这本书里讲辩证法，对立只讲了对抗，非对抗这个名词没有讲，这些都是因为他当时没有接触对抗、非对抗的问题，所以他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

我想，这是一个学习方法，也是我讲这本书的方法。这个方法对不对，大家可以考虑。这是我的观点。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来。我觉得应该这样了解。】

## 三、辩证法的两章（量和质、否定之否定）的讲解

这两章比较容易懂，不需要采取领读的方式来讲，不过重点的地方可以讲得详细点。这两章是讲的辩证法问题，对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最根本的内容都有全面的说明，我想还是按两章的顺序作一些说明，然后再概括地讲一下总的内容。

量和质这章说明了辩证法的两个基本规律。这两个基本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讲到最根本的方面，讲到矛盾的普遍性问题。这两章虽然是讲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但是应该看到从头到尾，归根结底还是讲的对立统一规律。质和量、否定之否定这两个规律应该看做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虽然它们也是基本规律，但是更基本的还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和质的规律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实际上是讲肯定和否定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的规律。

大家提出一个问题，究竟辩证法的核心是什么？列宁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恩格斯在这个地方又说一切核心是否定之否定，究竟是列宁对了、恩格斯错了，还是恩格斯对了、列宁错了。在这里列宁和恩格斯发生了矛盾。这个问题应该说明一下，我认为还是列宁说对了。列宁讲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

心，三个基本规律的核心还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和质，否定之否定，归根结底还是对立统一规律。

恩格斯讲一切核心是否定之否定，这个意思不要只从前面去看，要把前后的文章连起来去看，要把整个量和质的意思连起来才能看出来。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书（《反杜林论》第 144 页；又见同上书第 483 页）中讲道："所以，我们在卢骚的书上，不但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同出一辙的议论，而且还可以看到卢骚所详细叙述的一系列和马克思运用得相同的辩证的说法：本质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朝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最后，作为一切的核心的，否定之否定"。他首先是讲对抗包含着矛盾的过程，这个矛盾过程又自己表现向对立方面转化，最后作为一切核心才出现了否定之否定。由矛盾过程到否定之否定，逻辑上有一个很自然的环节，就是说这个过程中的矛盾也就是对立面的斗争，使得这个过程达到一定阶段就转到自己的对立面，最后才出现否定之否定。这里所讲的一切核心，不一定就是辩证法的核心。也就像我们现在讨论问题的分歧一样，当时的争论是杜林反对否定之否定，他把否定之否定看成是不变的公式，这是他们争论的核心。我们了解了过程是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是会向对立方面转化的，这样才能理解最后的核心——否定之否定。

这里所讲的否定之否定，是两次向对立面转化的结果。首先是因为有矛盾，有了矛盾就引起事物向对立面转化。而且转化不会是一次，转化了再转化，结果出现了否定之否定。这个道理很平常，并没有什么神秘。

下面先把辩证法两章的逻辑结构讲一下。这两章讲了三个基本规律，首先从矛盾的规律开始，由矛盾规律转到质和量的规律。

然后再一章讲否定之否定。这个结构跟刚才讲的几句话是相适应的，首先要反对杜林排除矛盾的思想，肯定矛盾是存在的，一切过程中存在着矛盾。肯定这点以后，指出矛盾的过程引起对立面的转化。最普遍的就是量和质的转化，这样就引出量和质的规律。量和质的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是矛盾过程引起由量转化到自己的反面——质。然后再进一步就有了两次转化的关系问题，这就表现为否定之否定。这个否定之否定内部包含着矛盾，这个内部矛盾表现为发展过程也采取对立面互相联系的这种形式，就是向对立面转化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表现为量和质的转化这个普遍形式，在表现为两次转化中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种形式。因此，量和质的转化关系，否定之否定规律，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规律，这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两种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所以它们也是最普遍的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因为这两个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再简单地说，就是事物都有矛盾，矛盾的内部斗争，使得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向自己反面转化。最普遍的是由量向质的转化，而这个转化不是一次就行了，向反面转化以后，再经过斗争，又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这种两次转化中间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否定之否定的关系。这个规律也是普遍的。量和质的转化也表现了否定之否定的关系，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还是否定之否定。凡是两次转化总是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三条基本规律中间归根到底还是一条最根本的规律。这两章在逻辑结构上就表现了这个关系。所以，讲辩证法要从对立统一的规律讲起比较适当。从量和质的规律讲起不大合适。我们写教科书一般还是先讲对立统一规律，因为把这个规律说清楚了，量和质的规律才好说明。首先说明为什么从量变为质，又由质变为量，这就要先懂得对立统一规律才能很好了解。这就

是这两章的结构。

这两章的内容是论战的内容，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斗争的内容。杜林的观点是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的，恩格斯用辩证法来加以批判。这里附加说明一点，从杜林哲学总的结构来说，是唯心论的结构，但是，他又包含着机械唯物论的成分。他的观点主要的是唯心主义的，但就他的自然观点来说是机械唯物论。因此，杜林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混杂的东西，是一个大杂烩，不要把他看成从头到尾是一个一贯的体系。所以恩格斯讲他是唯心主义的，是对的。列宁讲他是机械唯物论，也是对的。如果把杜林的学说看做是一贯的体系是不对的，他和黑格尔不能相比。历史上比较大的哲学家大多是一贯的观点，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当然大哲学家也有混杂的东西，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都有，在历史观上不是一贯的，那是不彻底的。杜林的思想没有什么系统的东西，所以不能按照杜林的原则运用到自然观方面，他自己没有什么逻辑性，前后矛盾。他反对否定之否定的观点。因此我们不能从杜林的哲学思想中替他找出一个体系来。

有的同志问，杜林是怎样从形而上学滑到唯心主义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难以说明，当然他的唯心主义就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就是把思维的形式和存在形而上学的等同起来，认为思维中最原则的形式也就是世界图式，客观世界要反映他的思维。唯心主义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把思维和存在等同起来，没有看到它矛盾的差别。另外他还有唯物主义，他的唯物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也就是形而上学，所以他不是滑过去的问题，而是凑上的机械唯物主义。

法国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可以这样说，因为法国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把自然界当做是客观存

在，但是又认为它是不变的，因而他们是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把这种不变的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来，把人类社会也当做一种不变的自然现象，结果他就要从人类社会中找一种不变的东西，找来找去就找到一种精神原则，觉得人类社会是从精神、良心来的，找到这种东西就滑到唯心主义去了。费尔巴哈认为人类社会精神是第一性的，要去找不变的人性，最初认为人性是和自然界一样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原来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来，把人性作为解释一切的最根本的原则，人性变为第一性的，具体的东西倒是第二性的，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唯心主义了。

杜林就没有这种转变，没有这种由形而上学到唯心主义的自然逻辑关系，他就是杂凑的。所以，我觉得找不出这种联系，他并没有从唯物主义转到唯心主义,他总的观点就是唯心主义的。所以在他的道德和法中讲的唯心主义也不是从机械唯物主义转来的，他跟唯物主义不是一个东西。法国的唯物主义是从唯物主义开始发展到唯心主义的。而杜林总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他是从唯心主义出发，凑上一些机械唯物主义，所以这种思想体系是非常混杂的，没有真正的逻辑体系。

现在就正文作一些解释。量和质这一章开头引了杜林的一段话，杜林说，应该把矛盾从存在中排除出去，他认为这是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和极其重要的原理。这个存在好像也是人的思想里面存在的概念。可是因为他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思想里面存在的概念也应该是客观存在。思想里面既然有存在的概念，客观里面也就应该有存在。所以这个存在主要是逻辑上的存在概念，但是他也把它看成是客观世界的存在。他不但在思想上排除矛盾，而且认为周围世界也不应该有矛盾，首先认为存在应该是惟一的，因此不应该有不存在的东西和它并存，而存在这个概念

本身不应该有矛盾，因此客观世界也不应该有矛盾。事物中有矛盾是荒谬的，事物中只应该按相反的方向互相反抗的力量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世界及其一切生物存在的最基本的形式。所以存在的基本形式不应该是矛盾，而只应该是对抗。他是用机械对抗的形式、机械对抗的原则来代替对立统一的原则。这是杜林在认识论上的基本思想，只承认外力的对抗，不承认内在的矛盾，当然内在的矛盾也有对抗，但它是内在的对抗，而不是互相反抗的两种外部力量的对抗，这是有区别的。下面恩格斯引了一段杜林批评黑格尔的话，可是他批评黑格尔的地方也正是黑格尔对的地方。他说："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各斯学说，矛盾并非存在于思维中（思维按其本性只能被看做是主观的和自觉的），它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与过程本身中，并且可以说是能以肉体感触到的，这样，荒谬就不再是不可思议的思想组合，而成为实际的力量。……"（《反杜林论》第122页；又见同上书第461页）这里恩格斯对杜林的看法做了一些引申，杜林认为矛盾就是荒谬的，因此在现实世界中不应该存在。杜林认为他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很容易明白，这种明白就好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一样的。

恩格斯说，从一般常识来说，好像矛盾是荒谬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的说法，在一般常识来说好像是对的，但是高等数学微分学就不是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微分学要把曲线成为直线，这要作通俗的解释确实是很难的，不过这种数学无非是研究一种数量的变化，结果会怎么样？一种数量逐渐变小，在变的过程中无限变下去，变到无限小会发生什么结果？在数学上应该怎样计算？微分学就是这样一种数学。普通数学只研究固定数量，微分学就要研究某一种数量无限变小，在数

学上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如果用在曲和直的问题上可以作通俗的解释。如果比较长一点的曲和直，曲线就是曲线，直线就是直线，这个矛盾不能统一。假如这个弧无限缩小和它相连的直线也无限缩小，确实小到无限，最后的结果怎样？小到无限不一定消灭，但是小到无限最后就会发生一个结果，距离也缩小到几乎等于零，那么两条直线和弧线发生一个关系，就是曲线差不多等于直线。到了这种程度，在数学公式上计算就可以把曲线当做直线来计算，而且这样计算不错，结果会很准确。当然要有一定的前提，就是要无限小，如果不缩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是固定的，始终是这样大，曲线和直线中间有距离，也不能说曲线就是直线。可是如果无限缩小下去，最后到了极限，就等于零，那时曲线就等于直线，最后曲线就几乎变成一点，两点几乎合在一起。当然在我们的思想上还觉得曲线是曲线，直线是直线，可是在数学上计算可以把曲线当做直线来计算。按照常识来讲讲不通，但是在数学上计算是可以计算准确的。恩格斯在后面还讲，数学家自己已经用微分学去计算也得出了结果，但是数学家还不能懂，因为他们有形而上学思想。有辩证法思想就可以想通了，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曲线和直线到无限小的时候就相等了。高等数学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初等数学就没有这个问题。不但无限小是这样，无限大也是这样，如果把圆的每个弧线无限放大，结果会怎样？结果圆的每个弧线就可以成为直线，最后圆的弧线就可以按照直线计算。天文学往往把曲线当做直线计算，这也是准确的，相反天文学上的直线也可以看成曲线。

【现在就从正文来研究。有一些我估计大家看得懂的东西就不念了，有一些地方作一些解释。

在第十二章，开头一段引了杜林的话。杜林的思想全部都包括在头六行里。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和极重要的原理，就是矛盾的排除。”（《反杜林论》第 122 页；又见同上书第 460 页）

杜林第一句话就讲到排除矛盾。这就是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首先反对对立统一的规律，反对矛盾论。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首先破坏矛盾的规律，第一个就是矛盾的排除。

“矛盾是一个范畴，它只能同思想的组合有关系，而决不能同现实有关系。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认为矛盾就是实在，这是荒谬绝伦的……”（《反杜林论》第 122 页；又见同上书第 460 页）

修正主义、杜林都是攻击的矛盾规律，认为它是荒谬绝伦的。下面就是杜林真实的思想。

“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诸力量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诸因素和诸个体的力量在方向上的抗衡，和荒谬的矛盾观念丝毫不符合……”（《反杜林论》第 122 页；又见同上书第 460—461 页）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杜林提出了一个机械论的规律来反对对立统一的规律。认为一切事物的基本形式是以相反的方向相互抗衡的各种力量的对抗，这就是两种外部力量互相发生对抗。

辩证法的观点是内部一分为二，矛盾对立的观点，即统一物一分为二。而杜林是两个外部力量互相抗衡结成一个东西。一个是内部一分为二，一个是外部互相抗衡，这是两个根本的对立。

一开头杜林的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就明确的对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杜林的观点的对立，第一句话就搞清

楚了。恩格斯在下面就是要驳斥杜林这种观点，就是着重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事物自身有矛盾，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而不是两种外部力量。量和质这一章，开头这部分主要是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做了具体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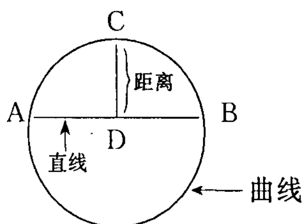
恩格斯在引了杜林的话之后说："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意思可以归纳如下：矛盾等于荒谬，所以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在其他方面具有足够常识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一见解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的说法一样，是不言而喻的。"（《反杜林论》第 123 页；又见同上书第 461 页）

只要有普通常识的人也许认为客观事物是这样的，这跟曲的不能看做直的，直的不能看做曲的一样。但是，下面恩格斯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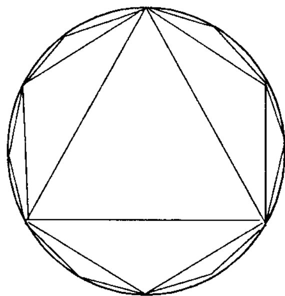
"可是微分学却不管人的常识的一切抗议，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使直线等于曲线并因此达到人的常识（它固执地认为曲直相等是荒谬的）所永远不能达到的那样的成果。"（《反杜林论》第 123 页；又见同上书第 461 页）

你说直的不能是曲的，但是在微分学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微分学里，在一定的条件下，直线要等于曲线。不这样相等，微分学你就搞不懂。如果不承认这一点还要犯错误。

有没有同志学过微分学，高等数学简单讲不大容易懂，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微分学就是讲微积分，研究数字变化的数学。普通数学、代数、几何叫常数数学。就是数目字不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考虑变化，公式和数目字是绝对的。微分里要研究一个数学公式里某一个数目字是会变的，变小、变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研究这个问题的数学叫做变数数学，专门研究数字的变化。微分就是研究如果一个数目字变到无限小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样的意思：直可以曲这个例子，我用图来说明一下。




这里有一条曲线，圆就是曲线。我看有好几种例子可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讲圆吧。这个圆可以看做是一条曲线，在圆上划一条直线（AB）与圆相交，则这条直线（AB）叫做切线。切线（AB）把圆切下来一部分（AB）叫做直线，$\overset{\frown}{ACB}$ 是曲线。微分学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圆不断缩小，缩小到无限小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圆是这样大，使这条直线（AB）和曲线（$\overset{\frown}{ACB}$）之间有距离（CD）。但是，当这个圆无限缩小下去，缩小到不能再小了，那么直线（AB）和曲线（$\overset{\frown}{ACB}$）的距离（CD）是不是会缩小呢？是会缩小的。直线（AB）和曲线（$\overset{\frown}{ACB}$）之间的距离可以设想缩小到无限小，缩小到最大限度就使直线（AB）和曲线（$\overset{\frown}{ACB}$）的距离（CD）差不多等于零，差不多没有了。到了那种程度就可以看出直线和曲线完全相等。切线（AB）和曲线（$\overset{\frown}{ACB}$）就完全合并起来。直线和曲线不能合并，但是直线缩小到最后无限小时终归有一天会和曲线合并起来。这样直线（AB）等于曲线（$\overset{\frown}{ACB}$），数字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直线和曲线就相等了，至少可以看做相等。如果你不看做相等，数学上的计算就会出毛病，高等数学有这么一个问题。



还有这样的情形。比如说，这里划一条相等的线，无限地划下去，划到最后的一条直线和圆很靠近了，也就相等了。就是说，如果圆不缩小，但是切线成倍增加，一倍、一倍地切下

去，切线就越来越短，短到最后切线差不多等于圆周上一点了。所以直线就变成曲线了。这里是讲微分。

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确有点不能理解，你再怎样小切线跟圆周总有一点距离。但是无限缩小，小到极点，总会相等的。要承认这一点，而且在计算微分方程式的时候一定要肯定这一点，才能算准确，否则会犯错误。微分是这样。

积分也是这样。变得无限大的为积分。恩格斯在后面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两条相交直线只要离开交点相当远的程度，无限延长，就可以看做是平行线。如图：如果是这样两条线：就不能说是平行线。但是要计算大量的数目字，如计算天文学上的数字，离开交点时，无限延长，这两条线就可以看做是平行线，因为两条直线永远也不会相交。两条线距离越来越大，大也大不到多少程度，大到一定的程度，大体上不相交，就平行了。在无限大的情况下，相交线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变成平行线了。

只学过初等数学的人是很难了解的，但是一学到高等数学的人非承认这一点不可。所以，直线中有曲线的因素，只能一分为二。这不是什么外来力量对抗的结果，就是他本身在运动中出现的矛盾。】

恩格斯在这一章讲矛盾问题，着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他举了一些例子说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他举的都是一些特殊的例子，也就是平常大家认为没有矛盾的，如普通数学看起来好像不应该有矛盾，但是结果还是有矛盾。比如平方不应该有复根，结果还是有复根，在某种情况下还应该有这个东西。

【恩格斯引了人的思维矛盾，说明人的认识也有矛盾。

“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类认识能力仅仅在那些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解决的，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反杜林论》第124页；又见同上书第463页）

这一段是说明人类是有认识实践的无限能力，人能够认识无限的实践的真理。人的认识能力是没有限制的，可是这个能力在一个人身上不能实现，无限的能力在一个人身上不能实现。一个人的一生只能认识自己的运动所能认识的东西，不能认识一切东西。人类的无限能力在个人身上是受到个人限制的，这就是无限能力和有限能力的矛盾。人的认识就有这样一个矛盾，人有无限的认识能力，但是每一个人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这是人的认识矛盾。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这个矛盾就要在无限的发展中解决。人是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一代要比一代知识多。人类无限的传下去就能实现无限的认识能力，就能够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说，人类认识能力的矛盾，是人类认识不断发展的原因。

如果人的无限认识能力在一个人身上就能够实现了，那么认识就没有发展了。黑格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在他的哲学里面就能够实现了。有了这样一种观点以后，他就认为后来的人类用不着思考问题了，人的认识用不着发展了。所以，人类的认识如果没有矛盾，人的认识能力也就不能发展了。人的认识之所以需要无限的发展，就是因为人的认识有矛盾。马克思主义是无限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无限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使人能够认识世界一切真理的绝对的方法。但是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只能认识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那样高、那样伟大的天才，有些今天

我们所能看到的问题，他们也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身就有矛盾，他们的能力是无限的，但是受他们生命的限制。所以要由第二代——列宁来继承和发展的。列宁死了以后由斯大林、毛主席进一步来认识这些新东西。

这个问题也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有关系。人类的无限认识能力，就有认识全面的绝对的真理的能力。但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个别人只能认识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也就是只能认识相对真理。所以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矛盾使人类的认识科学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永远不能自满自足，永远不能认为某一个人的知识已经够了。比如说，有的教条主义者说：你看，恩格斯这样说了，我们就不能多加一点。恩格斯只是讲了对抗，我们说还有非对抗。恐怕有问题，你这样说就是不了解辩证法。恩格斯他有他的历史条件限制，所以他的《反杜林论》所讲的辩证法，就他的根本原则来说是绝对真理，但是他对原则的阐述是相对真理，他只讲了这么多，并没有我们还要讲的一些东西。】

我们只是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说：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的、孤立的，或者是单独的、相互并列的东西的时候，形而上学就有一些用处（《反杜林论》第123页；又见同上书第461—462页）。我们平常说形而上学的方法是错误的，但是恩格斯说，形而上学的方法在一定的条件下观察问题时可以使用。是不是说形而上学没有一点用处，这个问题在我们学辩证法的时候要弄清楚。恩格斯在这里肯定形而上学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用处的。这就是说在我们讲辩证法的时候，我们认为辩证法是科学的方法，但是也不要把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做是绝对荒谬的，一点用处也没有。恩格斯这个思想恐怕和我们同志们讲辩证法时的理解有所不同，我

们在讲辩证法的时候，认为辩证法是正确的方法，形而上学是错误的方法，因此形而上学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错误的，没有任何用处。我们就得到这种结论。这样的结论恐怕恩格斯是不赞成的，因为这种看法就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去看辩证法。辩证法既然是正确的，因此跟它相反的方法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没有用处。这样的看法就太绝对了，看问题太绝对了也有错误。因为事实上我们经常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问题，而且在一定的问题上使用形而上学也不一定完全碰钉子，也不一定就会失败。法国的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它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可是法国的唯物主义还是一个时代很优秀的思想，这是事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论断一件事情，不考虑矛盾，不考虑它的反面，也不一定就成问题。比如就拿这两章的例子来说，这里举了波义耳定律，我们在一定的范围内认为波义耳定律是正确的，违反波义耳定律考虑就是错误的。但是这也不一定是错误的。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说，波义耳定律是正确的，但是任何时候它都有一点不同程度的误差，首先这个定律应用在一定的气压、一定的温度，而且还只能应用在一定的气体上，有些气体使用这个定律就得到准确，有些就不准确。就是对它最适用的气体也不能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丝毫一点误差也没有，如果具体的考虑这些细微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讲。所以在一定的时候，波义耳定律是真理，对这个气体，对这样一个气压，就是真理。恩格斯说，在家庭生活中形而上学是适用的，甚至是必要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家里都用形而上学，只是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在研究问题时，要暂时把它看成孤立的、静止的东西来研究，在这个时候形而上学是可以用的，而且是必要的。形而上学使用的范围是有条件的，比如在科学发展的初期，要分类整理的时候，这就有必要把每种东

西当做孤立的东西来看，这个时候形而上学是适用的。这样的提法是不是说我们观察问题应该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混杂起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工作中观察问题，一般地都要观察问题的发展，所以我们的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方法。只是在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有时暂时把一件事当做孤立的来看，这时自然而然就有形而上学的方法，因为那时需要把它当做孤立的东西来看，所以用形而上学的方法也不会出大毛病。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混杂起来用。有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时把它当做孤立的东西来看也可以，不会发生坏的结果。但是一般地做工作，研究问题，绝不能把问题当做孤立的、静止的东西来看。从总的原则来说，我们的方法应该是辩证法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我们的方法应该是辩证法的，因而要考虑矛盾运动，不能满足于静止地看问题。要研究一个同志的思想，要研究他怎样变化，注意他的发展，不能满足于讲他是好同志，同时还要注意他的缺点。做工作也是这样，不能只讲我们工作中有成绩就够了，一定要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检查缺点，因为成绩和缺点在我们工作中是统一的，我们必须自觉地注意，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检查缺点。如果不这样做，就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怎样发展，不知道我们还要怎样努力。所以观察工作的时候，就不能把它当做孤立的、静止的东西，一定要从联系和发展中观察。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问题一定要采取辩证法，排除形而上学。但是另外要注意形而上学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可以使用，而不是我们的工作中这个用辩证法、那个用形而上学。我们总的方法是辩证法的，但是也要注意形而上学也曾经起过作用，而且不一定都会引起错误的结果。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是片面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使用，也不会发生错误的结果，这样做就不会使我们的思想

绝对化。

恩格斯这段话是说明，对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关系，也要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不要绝对化。怎样才能不绝对化？具体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我认为，就是既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又要肯定形而上学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它适用的范围，可是又不能说我们可以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要紧的就是要把这种关系弄清楚，不讲清楚这个问题也还是有一定的形而上学的障碍。许多问题争论不休，往往因为我们还有点形而上学，真理和错误的问题也有这个问题。要克服我们脑子里的形而上学的习惯很不容易。虽然我们是运用辩证法的，但是碰到某些具体问题，形而上学还是起作用。

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矛盾的普遍存在，而且还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很多例子，着重证明矛盾的普遍性，肯定对立统一规律是普遍的规律，指出否定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因为客观事物没有静止的、孤立的，所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是错误的，作为方法来说也是错误的。既然形而上学的方法是错误的，为什么有时又能使用呢？它本来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我们暂时把它当做孤立的、静止的东西来看，是为了方法上的便利，研究上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形而上学没有多少妨碍。从总的来说，形而上学是错误的方法，只有承认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观点，只有分析矛盾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只有一分为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

恩格斯在这里讲的辩证法可以说还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是对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到有对立有统一，而没有提到有对立面的斗争性，全篇都是讲对立面互相联系，统一中有对立，没有讲到斗争。实际上社会问题经常要讲阶级斗争，列宁把斗争性问题发展

成为普遍原则，对立面的斗争问题是绝对的，对立的本身就具有斗争性。恩格斯在这里没有讲，这是不足的地方，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意思，他强调对立也包含着这个意思，不过他没有发挥出来。列宁把它明确地讲出来了，这就是发展。

在这里恩格斯所以没有特别讲这方面，也和论战有关系，这个论战不必特别讲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没有特别注意这方面。实际上不讲斗争问题也不能说明对立面互相转化问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得很清楚，由渐变到突变，为什么会变？这和矛盾的斗争有关系，质量是由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由此就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发展。这个原则在毛主席以前没有人讲，毛主席讲到了，这跟中国的复杂实践有关系。

【还要说明一点，就是恩格斯在这里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到事物有矛盾，对矛盾的内容是什么没有具体说明，没有很展开地讲什么叫做矛盾，矛盾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没有很具体地讲这个问题。他这里所讲的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比自然辩证法所讲的还少得多，自然辩证法还讲到对立面。矛盾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矛盾的对立面互相斗争引起事物的发展。在《反杜林论》里，矛盾的同一性、斗争性没有具体说明，特别没有讲对立面的斗争。这一点要注意，因为恩格斯在那时候仅仅是为了反驳杜林，杜林强调事物是相反的两种力量的抗衡，不是事物内部有矛盾。恩格斯着重回答他，每一件事物内部都因矛盾，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转到对立的方面，所以事物内部有矛盾。至于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方面有什么关系，同一性、斗争性的关系，为什么会转化？这些问题恩格斯就没有回答。大概在当时的论战中不需要都回答，这并不是说恩格斯不认识矛盾对立的斗争性，而是因为当时的思想

斗争、理论斗争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来，因此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讲对立的斗争讲的是比较多的，而且把斗争看得比较重要。一般在社会科学上都是讲阶级斗争的，所以不能因为这里字面上没有讲到矛盾的对立斗争，就认为恩格斯不提这个。以后列宁特别在《谈谈辩证法》里讲斗争是绝对的，这也是一个历史条件的问题，实践条件的问题。那时候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实践上就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斗争，强调阶级调和。所以，列宁跟修正主义斗争的时候，矛盾的斗争性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因而在那种情况下，在哲学上把斗争性的问题做了新的概括，提出斗争是绝对的。而在反驳杜林的时候，当时的确不需要。因为杜林是讲对抗的，讲暴力的。所以，在当时的理论斗争中，斗争的问题不是主要的，不是要不要斗争的问题，是内部矛盾还是外部力量对抗的问题。首先不是外部力量的对抗而是内部矛盾。内部矛盾也是对抗，而是外部力量有发展，在否定之否定中证明：

"本质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朝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反杜林论》第144页；又见同上书第483页）

这段话是恩格斯在这本书里关于对立统一的规律的比较全面的概括。他承认本质是对抗的，内部是对抗的，包含矛盾的斗争。恩格斯在这里把对抗解释成为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意思。我们要用今天的观点，用今天新的了解，用更具体的观点来解释以前的经典著作。这样来解释以前的"本质的对抗"几个字，所以，把它们解释成为互相排斥、互相斗争比较好。排斥和斗争可以包括非对抗的斗争。那时候恩格斯用对抗两个字，并没有考虑到我们今天要考虑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所以对抗与斗争、互相排斥，用一句话就概括了。

我们学习经典著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拘泥于字眼，要根据我们今天的发展灵活地理解以前的提法。如拘泥于字面上了解这句话，好像恩格斯跟毛主席就发生对立了，恩格斯只讲对抗，毛主席还有一个非对抗，列宁也有一个非对抗。所以，对抗要作灵活的解释。本质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也包含了矛盾的非对抗的一面。当然，这个问题恩格斯当时不明确。这也不是要责怪恩格斯，不能因此而贬低恩格斯。当时恩格斯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是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伟大的思想也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他只能说到这样的程度，而且他当时的论战也只需要写到这种程度。说到这种程度，已经写出了这么大一本书，再说明其他很多东西，就多得不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应该有的放矢的，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就可以不讲。所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就没有讲辩证法。因为当时的斗争没有直接涉及到辩证法问题。】

关于量和质这方面，恩格斯做了很深刻的阐述，并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你们是哲学专业，可以自己研究，我不用多讲了。

【从第128页第二段起就讲量和质对立统一的规律。

一开始就引了杜林的一段话，这段话是来攻击量变、质变的规律。

“例如，根据黑格尔关于量转化为质的这种糊涂混乱的观念，所以款项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因为这个量的增加而变为资本，——这话听起来难道不滑稽吗？”（《反杜林论》第128页；又见同上书第466页）

恩格斯主要驳他的这句话。杜林的这句话是对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做了一个曲解，下面恩格斯根据他的曲解做了批判。

他的曲解是两点。第一点：杜林好像是说，款项增加到一定界限，仅仅因为量的增加而变为资本。这是一个曲解。好像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量的现象转化为质。

实际上是什么情形呢？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实际上是对立统一规律表现在量和质的关系上。对立统一的规律里面有一条，我们大家学过哲学都知道，就是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对立面是要有条件才能转化；没有条件不能转化。量和质互相转化也是服从这条规律。

这里举《资本论》的例子。资本款项达到一定的界限，货币达到一定的界限就转化为资本。货币到一定界限转化为资本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杜林解释成为：就是仅仅一定量的增加就会变为资本。就是数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质量。数量变为质量，当然数量本身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这是一个方面。但同时，达到数量程度的本身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质、转化为资本。不是任何一个量，达到任何一个界限就一定会转化为资本的。

要使货币变为资本，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但是也不能仅仅有了一定数量的货币就可以成为资本的。不能这样说。

比如说：1000 元钱可以成为资本。是不是仅仅有了 1000 元就可以变了资本呢？不能这样说。如果，1000 元摆在皮包里，会不会变为资本？把 1000 元锁在柜子里会不会变为资本？如果一天摆上 100 块，摆上 10 天会不会变为资本？不会的。仅仅有 1000 元是不能变为资本的。

恩格斯就批驳了他这一点：不是仅仅量的增加就会变为资本的。量转化为质，当然要有一定量的数目，但是达到这一个量的数目以后，还要有一定的条件货币才能变为资本。

比如后面恩格斯讲到货币时说到：货币不是到一定数量就会变为资本的。问题在于，货币一部分要成为工资，一部分变成生产资料。要购买足够的生产资料，要有足够的投资，来雇佣足够的工人，要有雇佣工人的条件，然后才能转变成为资本。

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常常有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任意曲解。曲解以后按照他的曲解再来反驳。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先说成是很荒谬的，然后再攻击，这当然好攻。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像这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所讲的那样。这种曲解就是杜林说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就变为质量，就可以达到转化，好像对立面的转化是无条件的。这完全不符合辩证法。还有一种曲解就是，杜林好像认为马克思就是把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这一个原理当做公式。硬套到每一件事情上去。他是用自己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

杜林是唯心主义者，是从原则出发。思想方法是先讲原则，再用原则硬套到资本中去。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也是按照唯心主义方法定出一个原则，然后按照这个原则来任意解释一切。在这里恩格斯给予他一个反驳：

“现在让读者来赞赏杜林先生的崇高尊贵的风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加到马克思身上的。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量达到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数量（这个数量虽然因条件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可是在每一个场合都是一定的）时，它才能转变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而杜林先生却硬说马克思有这样一种思想：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化为质，‘所以款项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变为资本。’——可见和马克思讲的完全相反。”（《反杜林论》第129页，着重号原有；又见同上书第467—468页）

马克思的方法是先研究货币和资本的关系，具体地把这个关系完全弄清楚了。货币达到一定的数量，并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资本。这个事实清楚了，然后做出结论。这是黑格尔规律的证明，先有事实，然后再有原则。先根据事实，再来说明原则的正确性。

而在杜林好像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先有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原则，然后不加调查研究就随便说款项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变为资本。一个是从事实出发然后到原则的唯物主义；一个是杜林的曲解，就是从黑格尔的原则出发，然后任意解释客观事物。马克思主义者应用辩证法时不能采取杜林的这种方法，而要采取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方法。

这段话值得我们很好地注意。因为我们很容易犯这个毛病。我们虽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研究问题的时候，常常容易犯这个毛病：脑子里面先想好一个原则，然后用原则简单的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事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什么？是把原则作为指导思想，先不用它来解释问题。先在脑子里面开一个门，然后，首先是对事实做调查研究，把事实研究清楚了，然后根据事实来看我们的原则正确不正确。如果事实研究的结果和原来的原则一致了，那么我们说，事实证明了原则。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用原则证明事实，而是用事实来证明原则。如果对事实研究的结果和原则有一点出入，我们就要修改这个原则。比如列宁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他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对的。但是第一句话不很明确。

如果我们按照唯心主义的方法，我们就根据列宁的这句话来解释我们的社会。我们就会这样解释，大概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其结果就会发生很多问题，我们

会忘记阶级斗争，忽视了敌人的捣乱。

如果我们从原则出发，列宁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能动，一点也不能增加，一点都不能重新加以理解。那么，我们一定会犯大错误。

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这样。毛主席照样引用列宁的话。1937年在《矛盾论》中毛主席就引用了这句话。到了1957年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简单重复了这句话，是不是用列宁这个原则来解释当时的社会主义问题？不是的。相反，是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做研究，然后再概括。概括以后再得出结论。现在我们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对抗的矛盾和非对抗的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以后，就使列宁原来的原则得到发展。列宁的原则就不会机械地用来证明现在的事实，而是用事实、用一九五七年综合起来的事实证明了列宁的原则大体上是对的。但是又发展了他的原则。所以，理论指导实践，又从实践中间概括出一些新的理论，补充了旧的理论，发展了旧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永远要这样，首先从实际出发，任何时候不要把已经有了的现成原则、公式当做解决一切具体问题的药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认为已经有的书本公式能把我们的一切具体问题都解决了。只要简单地加以证明就行了。不能这样。任何时候都应该首先从实际出发，先研究我们已经取得的经验，然后再根据已经有的原则来做对照。对照以后，能够证明的就要证明，不能证明的就要修改。如果证明不够的就要加以发展。

杜林是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是恩格斯反驳的。恩格斯的这个反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自己想一想有没有这个毛病？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就有这个毛病。当我们在碰到恩格斯

说的话和列宁的话及我们的话有些出入就没有办法想通了，常常有这样的问题。不了解恩格斯所说的话我们现在有了新的发展，对恩格斯所说的话再进一步了解，进一步来解释。对列宁的话也是这样。

下面恩格斯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恩格斯讲，杜林是制造了一个假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曲解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虚构一个达尔文来反对达尔文。我们要注意这个方法。

现代修正主义也经常用这种手法。他们的所有言论都是把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首先加以曲解，曲解成好像是非常荒谬的东西，然后再来攻击。他们对我们真正的言论他不敢给公众看，同时还歪曲地做一番解释，说我们不要和平共处，不要和平，就是要搞核战争。这样曲解以后，再来进行攻击。这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方法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能不用这种诡辩。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办法驳倒的。他要想把马克思主义驳倒，只能加以曲解，把它解释成为可以驳倒的东西。因为只有说成可以驳倒的东西，才能驳得了。我们没有的，他们也是要造谣曲解。实际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是一点也不能驳倒的。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时候，我们经常要揭露这个问题。

下面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例子不作解释了。有些自然规律的、化学的例子也不解释了，还是大家看一看好。

对于量变质的问题，我想根据毛主席的一些著作进一步讲一讲。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对于量变质的规律讲了一个基本的原则。说明量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要变为新的质。这个原理是量变质的规律的基本思想。

新质出现以后，又发生新的量变。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又变

为质，质出现以后，又开始新的量变。这是由量到质、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实际上，这个规律也可以叫做量和质的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量和质的互相变化的规律，实际上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在量和质关系上的表现。所以也可以叫做量和质的对立统一规律。

因为这些名词不重要，主要是讲讲它的意思。主要说明量变质的规律本身要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

《矛盾论》就是根据矛盾规律来说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

《矛盾论》关于同一性和斗争性那一段里，有一段话，讲到事物变化一种是平静的变化状况，一种是激烈的变化状况。平静状况就是量变的状态，就是渐进的变化状态。激烈变化状态就是质变的状态。《矛盾论》里已经说明了这个规律。

在《矛盾论》里，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量变、质变。在“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段中，讲到由量变到质变是矛盾的一个变化过程。

矛盾的同一性在一定条件下，暂时存在的这种情形，事物就发生平静的变化状态。矛盾发展到尖锐的程度，发展到对立物分解、破裂的时候，就出现了激烈的变化状态。

量变到质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还是因为事物内部有矛盾。为什么事物内部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引起质变？内部矛盾还能够共处于同一体中？在这样情形下，事物发展是量变。当矛盾内部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了，对立斗争非常紧张了，弄到对立面相互依赖、共处在同一体中就等于不能维持下去。这种情况就要发生激烈的状态，就要发生质变。

所以毛主席是进一步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对量变、质变转化的

关系做了说明。

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具体说明，但是实际上是把量转化为质的规律看做对立面互相转化。所以由量变转化为质变原因是由于内部矛盾的发展，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由量变变化为质变。量变到质变本身是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转化为质的。

我讲一点毛主席的著作是希望同学们联系起来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说明为什么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说明它是最根本的规律。量变和质变的规律本身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现。同时这种变化过程也要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说明，用事物内部矛盾变化情形来说明。

另外，再讲一讲毛主席在量变和质变规律的问题上，有没有新的发展？想讲一下这个问题。

从党的历史上来看，从《毛泽东选集》来看，我们觉得毛泽东思想在辩证法上、对立统一规律上是有发展的，有许多新的、更具体的说明。根本的原理没什么变化，还是恩格斯这些原理。但是在许多具体方面有新的展开，有新的发挥。

我这里主要讲三点。

一、对事物多方面的质，多方面的量的研究问题。

二、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关系问题。

三、关于在实际工作里面质的数量的界限问题。

这几个问题想先讲一讲。《毛泽东选集》里有的想提一下，大家作为研究时的参考。

关于多方面质和多方面量的研究问题，主要是从《论持久战》里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曾讲到一种自然界的事物中有多方面的质。用什么证据可以说明？

一个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由量变到质变的现象。例

如：水在100℃的时候可以沸腾，变成蒸汽。有人说水到100℃沸腾不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例子。他们说：虽然水沸腾变成蒸汽，但是它的化学成分不变，还是$H_2O$，蒸汽还是水的成分，怎么能够说是质变呢？以后我们是这样回答他：你就是不懂得事物有多方面的质。我们说水到100℃时就会沸腾变成蒸汽，是质变，指的是物理学上的质，不是讲化学上的质。如果讲化学上的质，当然没有变，但是讲物理学上的质就变了。因为物理学上水和蒸汽大不相同。

比如，开火车，用水就不能开动。但是把水烧成蒸汽就能够使火车开动。水和蒸汽根本不同。水不能对火车有这么大的压力，而蒸汽就能推动机器。水变成蒸汽这是物理的质变，而化学的质没有变。所以，水有物理的质，也有化学的质。

一切生物都有质，人有人的质，动物有动物的质。人主要的质是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人的质主要是阶级性。但是人也是动物，也有动物的质，动物的质不是人的本质。因为动物也有质，但不能成为人自己的本质。人的身上也有两个质，有动物质、也有化学质，医生就是研究我们身上的化学变化，医生不研究我们的阶级性，他专门研究我们的生理质、化学质。

所以，一种事物有多方面的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只讲到一句话，讲得很少。这个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里一般没有很大的发挥。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对这个问题有了很大的发挥。

《论持久战》中关于持久战的三个阶段那一节里，在不同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个阶段有什么变化？在第一个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是敌进我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要有一些东西下降，要有些东西上升。

下降的主要是量的下降，就是我们的一些抗日军队经过第一个阶段，力量会有所减弱，人会减少，数量会下降。这个下降主要是量的下降，质并没有很多的下降。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一些东西上升了。主要是我们质的上升。某些量有可能上升，但是主要是质的上升。质的上升是指我们的战斗力是逐渐上升。开始抗日的时候是国民党的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一起打敌人，后来国民党的军队腐败，垮下去了，量下降了，也可能他的质也下降了。但是他主要是量下降了。同时我们有一个东西上升了，就是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质上升了。觉悟提高了，战斗力增强了。但是人数不一定增加多少。主要是讲质的增加，新质的增加，量也有增加，但是主要的是质的增加。

这是把量变质变的规律运用到我们的抗日战争上来。至少在抗日战争里有两种质。一种是旧质，一种是新质。旧质被敌人一攻下降了，而新质增加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战斗力增强了。至少有两方面的质。

毛主席讲到这个问题，说不要看轻多方面质的这个思想，用它来分析我们抗日战争的问题，就能够使我们对抗日战争的变化得到全面的了解。

亡国论只看到我们数量下降的方面，没有看到上升的方面。特别是质上升的方面。亡国论分子是这样来看的。我们是要全面的看，是有下降有上升。

这种方法不只用在抗日战争里，很多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分析我们的工作，分析我们的思想……都可以用它。如我们思想有矛盾时，可以一分为二。我们的思想不是非常纯的，这是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两种质在我们脑子里闹矛盾，这种情形是有的。坏事变好事，坏事里有好事的因素，也是从两方面来看质的。

坏事不能说就是等于好事,但是坏事可以说起促进好事的作用,可以起教育的作用。也就是说,坏的质和好的质可以联系起来看。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值得注意的发展。我们研究哲学要注意这些问题。这里也有一个例子,虽然不能直接讲量和质的关系,但是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在否定之否定里,杜林是反对马克思的。说马克思讲的将来的共产主义是简单地把个人所有制废除了。实际上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先有个人私有制,以后变成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被剥夺之后就恢复了公有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而杜林却曲解为简单的个人私有制,而个人私有制就是公有制。对此恩格斯进行了反驳。

恩格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在共产主义里,我们是讲生产资料公有制,至于人的消费品方面还有私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还有两种情形。质的两重性经常要注意的。比如马克思讲过在共产主义的两种生产资料完全公有,这种制度是共产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还办不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也还是不完全是公有的,生产资料有一部分还是私有的,还存在着这个问题。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制度说它完全公有制就片面了。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看的。实际上它基本上是公有制。但是有私人所有制性质的一部分。

私有公有互相矛盾。这里有多方面质的问题。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

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以后,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发展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看法。

比如总的质和部分质的关系。质是有各方面的质,还有一个总的质和部分质的关系问题。总的质变并不等于部分质变,部分

质变不等于总的质变。在总的量变的情形下，还可以有部分质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多方面质的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不很重要，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就很重要了。比如我们得到政权以后，总的来说旧社会的质变了，变为新社会了，我们已经是新社会了，旧社会发生质变了。但是能不能说新社会完全是新质了？新社会是不是已经从政权到各个部分全都是新的制度了？不能这样说。

我们说，总的来讲我们的社会是新社会，但如从各个方面、各个部分来讲，旧社会的残余还很多。所以总的质变以后，接着还有部分质变的问题。总的质变依靠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是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是革命力量发展的结果。革命力量一天天增长，在斗争中逐渐发展把反动势力完全推翻了，在总的质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并不等于部分质变也变化了。最初几年，部分地区还要搞土地革命，在土改以后还是个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实际上还是旧制度，它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总的质变以后还要有一个一部分一部分地变。先搞土地改革，然后搞互助合作，再搞公社化。

在城市里面，总的质变是把官僚资本没收。但接着还要把民族工商业逐步进行改造，还有部分质变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大概是1953年毛主席开始提出总的质变和部分质变的思想。以后常常提这个问题。

部分质变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里意义很大。所以毛主席在这个时期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说的这些问题可以证明一点：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就在哲学上有了新的概括，就在原来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新的解释，做了一

些新的发挥、新的解释，没有这些新的解释就不能解决新的问题。

新的理论是从新的实践里面来的，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如果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里不考虑部分质变的问题是会犯错误的。现在苏联的理论就是这样，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得太简单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阶级了，清一色了，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幻想。

部分质变就是包括在多方面的研究质的关系的思想里面，这是一种发展。我们研究量变质的问题，不能不同时考虑现在我们有一些新的思想，要了解这个规律，要了解这种新的思想。

其次是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和量变、质变有关系，它是以量变和质变规律为基础的。

革命阶段论就是两次质变不能同时进行。在发展过程中，第一次质变和第二次质变不能同时进行。所以，两次质变中间要有阶段，两次革命变化中也要有阶段。

本来质变从广义来讲，是一种革命式的变化。量变是渐进性的变化，革命是质的变化，这是一种质变。革命，从广义来解释，就是质变的意思。狭义地解释是指在阶级社会里夺取政权的革命。

修正主义现在就强调这点，说：以后没有革命了。因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就没有夺取政权这种政治斗争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修正主义建立了统治地位以后，是不是不要夺取政权了。将来要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统治是不是还要重新夺取政权？恐怕还要重新夺取政权。

修正主义总是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就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了，也没有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问题了。所以革命的名词就

不能使用了。我们觉得用真正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还是应该把一切根本性的质变都叫做革命性的变化。

事物革命性的变化有一个特点，一次革命变化之后，要经过一个阶段，经过一个量变的间隔才能发生第二次革命（质变）的变化。由量变到质变，质变之后还要经过一个量变的渐进发展的过程。然后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出现新的再一次的激烈变化的革命的飞跃。

革命阶段论是讲两次革命中要有量变的过程，量变的间隔，不能把前后两次质变合在一起来实现。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种新的变化。两种新的变化不能同时完成。1949 年我们完成了民主革命，全国胜利了。1949 年以后开始准备，并且初步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全面地实现还是 1956 年——1957 年。1956 年和 1957 年三大改造胜利。以后在 1957 年又有反右斗争的胜利。三大改造在经济基础上实现了革命。1957 年的反右整风是在上层建筑方面实现了全面的革命改造。所以 1956 年、1957 年社会主义才算比较全面地得到了胜利。

1949 年主要只是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革命的胜利又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所以决不能说：1949 年实现了民主革命的同时又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这样说。实现民主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同时。所以革命是有阶段的。两次质变中有量变的阶段，量的间隔。革命阶段论就是这个意思。

不断革命论的意思，是进行一次革命质变以后同时就要积极准备第二次革命。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民主革命实现以后，立刻就打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准备全面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不断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早期提出来的。比较明确地提出来

是在《法兰西内战》里面。那时候他就提出，一个战役胜利以后，接着就准备进攻，不要让敌人有喘息的时间，那时候就这样提出一个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来。在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对这个思想加以曲解，把不断革命解释成：同时发动世界革命。以后不断革命论的名誉就糟了，没有人再谈起了。一讲就有托派的嫌疑。所以没人敢讲了。

以后毛主席又讲了，还是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意讲。革命要不断地进行，一次革命以后接着准备第二次革命。

我们现在讲不断革命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此它有新的意义。

不断革命论的意思不仅仅是对总的质变来说的，前面讲的不断革命论是讲的总的质变。在民主革命的总的质变中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指总的质变来讲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涉及到部分质变的问题。一个总的质变以后，还要积极准备部分质变的问题。三大改造的实现是一个总的革命，将来还要有什么总的革命变化呢？肯定还会有的，这要看社会主义发展和实践的情形。在不断革命论里，总的质变里面，还要进行部分质的改变，这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简单讲一点，大家可以参考《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条是“胸中有‘数’”，做工作要“胸中有‘数’”。所谓“胸中有‘数’”，就是对问题要经常掌握数量界限。那时候他是指什么问题说的呢？是指当时搞土地改革要掌握一个打击的百分比。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打击百分之十以下。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谈了这个问题。就是在政治上要有数量的界限。一切事物中都有数量界限。超过这

个数量，界限，质就会发生变化。

比如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要控制着只打击百分之十以下，甚至只打击百分之五。要能够控制着这个数量，大体上可以保证了斗争的胜利，大体上能够保证民主革命的性质，就是打击对象的确能保证集中在地主阶级、封建富农阶级的身上。如果打击对象超过了这个数量，超过了百分之十，就很可能超过了民主革命的界限。因为超过了百分之十，打击对象就可以扩大到富裕农民身上去了。打击到农民身上就有点不是民主革命了。控制人数可以保证反对的对象不超过民主革命阶段。

量变成质的规律在实际工作里是非常深刻的运用方法。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哲学原理直接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变成直接指导实际工作的具体方法。是哲学，但不是只讲原理。哲学本身变成活生生的工作中的哲学。这是一个例子。量变质的规律，我们学校里面有的教员讲得神乎其神。量变质、质又变量，讲来讲去讲了很多名词。与生活根本没有联系。

同样，毛主席关于工作里面要做到胸中有数，这个原则也是量变质的规律。根本原则也是一个，也可以说没有增加一点，或者减少一点。可是也增加了一点，就是量变质变的规律，成了活的科学的哲学直接指导工作的哲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突出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个问题与我们今天也有关系，所以值得特别谈一下。

毛主席关于量变质的规律问题方面的发展大体上讲这几点。也许我所讲的还有遗漏，大家可以进一步研究，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东西。根据我所了解的有这几点。

我觉得，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一定要联系现在的发展来研究，否则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就很贫乏，特别是不能联系

实际。所以，我是用比较的方法讲的。不知道这种比较方法对不对。这是我自己的意见，希望大家研究。】

# 第二次辅导

(1964.1.24)

今天接着讲十三章——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这一章是专门讲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因为杜林也反对否定的否定。这一章开头，恩格斯把杜林的话做了引证。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杜林的书是很大的一本著作，写的东西内容很多，恩格斯从中找出最重要的一段，加以批判。这是杜林对马克思《资本论》里讲的剥夺者被剥夺那一篇的攻击。

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大家都学过《资本论》，是了解的，用不着解释。

杜林这一段话的攻击，有许多手法，可以把它揭露一下，恩格斯也揭露过这个手法。

1. 杜林说马克思讲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是完全依靠否定的否定规律的，是黑格尔公式里做出来的结论。这个意思就是把马克思的方法解释成为公式主义。他说："这个历史的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算是马克思书中还比较好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他除了倚据科学的拐杖之外；不再倚据辩证法的拐杖，那么或许更要好些"(《反杜林论》第133页；又见同上书第472页)。这就把否定的否定当做一个"拐杖"，当做一个公式。后面还讲这个公式"起着接生婆的作用，因它之助，便从过去的胎中产生了将来"。

2. 杜林把否定的否定看做是一种简单的循环。他说："16世

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达到了个人所有制的消灭，这是第一个否定，之后跟着产生另一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同时被称为是‘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同上书)。他把马克思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方法，曲解成一种循环，即从“个人所有制”又回到“个人所有制”。

3.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杜林说：“如果马克思先生把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高级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用黑格尔的游戏文字来表达，这就是矛盾同时既被克服又被保留……”(同上书)这里他把否定的否定第三阶段，一方面曲解成一种循环，另一方面把第三阶段的“个人所有制”和“公有制”硬说成为一个东西。第三阶段本身是一个高级的公有制，是共产主义的公有制。他说这是“个人所有制”同时也称为“公有制”。这是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曲解。即把对立统一的法则曲解成绝对的统一，把对立的方面硬说成绝对的统一。这是攻击辩证法的一种方法。你说有对立的统一，即前面杜林讲的，马克思认为对立的统一的一切东西都是一样的，都融合为一，他在前一章讲过这样的话：“归根到底一切都成为一样的东西。”要不是这样就是否定对立的统一规律，如果你要承认对立的统一规律，那你就要把一切都成为一样的东西，把“个人所有制”看成为“公有制”。他硬说马克思是把“个人所有制”同时也看成为“公有制”。就是说，好像是马克思是这样讲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恢复到“个人所有制”而“个人所有制”同时也是“公有制”。他把对立的统一看成是对立的完全融合，完全相等。

恩格斯引的这几段攻击否定的否定的话，就是包含着这三种曲解，把否定的否定看成是这样一种非常荒谬的东西。实际上，否

定的否定规律本身不是他所讲的这样的东西。用曲解的方法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现代修正主义也是照样用这种手法。比如他们把否定的否定说成是一种简单的死的公式。这种曲解，不但是杜林这样做了，后来的民粹派也是这样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说明了这样的攻击。杜林在这里把马克思讲的否定的否定硬说成“个人所有制”的恢复。马克思并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并不是说简单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恩格斯揭露了这一点，马克思讲的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这个前提是生产资料的公有，个人所有只限于生活资料这一方面。杜林硬把它说成是恢复个人所有制。这种曲解的方法叫偷换概念的方法。他攻击对方的时候，把对方原来是合理的概念偷换成为一个很荒谬的概念，然后进行攻击。

还有一种，就是用简单的形式类比的方法，来攻击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把否定的否定比成基督教教理。他说:“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起着从基督教教理问答中剽窃下来的堕落这一概念的作用，而第二个否定则是起着引向赎罪的高级统一的作用。”(《反杜林论》第133—134页；又见同上书第472页)

这是《圣经》上的故事。知道基督降生的故事的人都了解这一点。就是说，原来人类在天国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没有罪，后来有一个使者偷了上帝的苹果吃了，上帝降罪了，后来上帝为了要拯救人类，要人类赎罪，全人类都为那个使者因为偷了一个苹果而赎罪。而偷苹果的罪叫原始的罪，这也就是基督教的所谓原罪。人类之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使者犯了原始的罪过。所以人类的生活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在上帝乐园里生活，没有罪，没有什么痛苦；后来犯了原罪，就永远受苦受难；最后，如果经过人

类的赎罪，上帝就来拯救了。

从形式上来看，基督降生就有点否定的否定的味道。因此他用形式类比的方法进行攻击。你看，基督教就有这样的故事，仿佛马克思是模仿基督教的故事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在这里，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杜林这样的错误理论里，恩格斯能够抓住它一段最典型的材料集中加以批判。下边就是恩格斯对杜林的反驳。

首先，是揭露杜林对马克思的否定的否定规律的内容加以曲解了，最后归结到对规律应用的曲解。

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给马克思加上他所从来未提过只字的什么所有制的高级的统一。他说："马克思说：'这是否定的否定。它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果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就是说，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土地的共有和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从那以个人劳动的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自然是比从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长久很多，困难得多，艰苦得多的过程'。全部就是如此。"（《反杜林论》第134—135页；又见同上书第473页）

恩格斯对这一段话下面做了解释，就是说，马克思讲的这个个人所有制，这是讲产品的消费的个人所有制，它的基础是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那么这个高级的统一当然也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但它主要的东西是公有制，而不是简单恢复的个人所有制。这是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对马克思的曲解。

恩格斯在下边又讲："既是个人的同时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种糊涂拙劣的观念，这种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得出的无稽之谈，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马克思让其信徒自己去解决的这种意味深长

的辩证法之谜——这一切又是杜林先生的随意捏造和臆想。”(《反杜林论》第 135 页；又见同上书第 474 页)

这一段话的意思我们是明白的，不过这里面值得讲一点，辩证法讲的对立的统一，不是对立面的相等。但是，我们一般讲话有时候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成为对立面相等。比如，修正主义的出现是不是好事情呢？我们用辩证法的原则，一般地讲，可以说，这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说简单一点，如果从字面上了解，好像坏事就是好事。曲解辩证法的人常常是用这种手法的，说辩证法是把对立的东西搞得好坏不分了。实际上，我们讲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坏事又是好事，这是讲这件事的两方面，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危害性，帮助了帝国主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说它是件好事，并不是因为它帮助帝国主义这件事本身就是好事，帮助帝国主义当然是坏事，决不能说这是好事，我们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它有另外的一方面，它可以向我们提出问题，使我们了解到修正主义的危险，使我们得到教训，提高警惕，搞社会主义要防止修正主义，所以是好事情。辩证法是一分为二的两分法，不是把对立的东西任意混淆起来的方法。一分为二怎样分？就要看对象。有的东西，对立面很清楚，很容易看出来。如一个社会，有无产阶级，有资产阶级，一看就知道。有些对立面，在形式上多多少少好像又是外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形式上是阶级区别的对立面，但它们之间又有内部联系，那就是表面上不容易看到的，要用思想去理解，如资产阶级影响到无产阶级队伍里面，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修正主义。这种情况，如果不用头脑去想，光靠感觉去感觉出来是困难的。有些东西，它暴露出来我们感觉不到，不容易看到它的内部联系。一分为二，就是思想上一分为二，理解它的不同方面。各种事物都是这样的，外

部不易暴露对立面。如修正主义的出现这件事，可以把它看成好事的方面，这是不能感觉到的，只有从长期的经验中才能体会到，用自己的思想去领会才能领会到。但是不管怎样，对立面总是两方面。我们说这件事是坏事又是好事，并不等于说坏事本身就是好事，是说这件事有坏的一方面，但也有另外的一方面，即它附带着起好的作用。两点论就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还要注意到它的本质的主要方面是什么？不是折衷主义，总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消费个人所有制。修正主义本质是坏事，但在附带方面，次要方面又是一件好事，可以使坏事变为好事。

有的同志问：怎样一分为二？一分为二，首先是看到事情总有两方面，其次是要搞清楚以哪一方面为主，根本不是对立面的相等。杜林荒谬的所在，就是把对立面看成相等的东西。

第 136 页（又见同上书第 475 页）中间一段，是恩格斯揭露杜林对马克思的曲解，好像不可能是无意的，不可能是无知的，而是有意的。原因是他的曲解是三读《资本论》之后才这样做的。他在作这种曲解之前，他的书已经出了两版，也没有讲这个问题，后来突然出来这个问题了。恩格斯在这一段最后几句话里讲到杜林的方法。他说："而且几乎是杜林先生逼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杜林先生在这里故意地来'有利地扩展'马克思的思想，就是说对杜林先生自己有利。"

伯恩施坦曾说，他很欣赏杜林的实用主义是实证主义，杜林的世界观是黑格尔的图式论，机械唯物主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实用主义，对我有利，有用就是真理。这是实用主义的原则。当然，伯恩施坦讲的实用主义主要的是讲他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用到工人阶级队伍里面来就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就是追求眼

前的利益迁就现状。这就是实用主义的特点，也是机会主义的特点。杜林曲解马克思的方法，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性质。

第 137 页上，就是《资本论》上讲的剥夺者被剥夺的问题。马克思是这样讲的，由小生产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又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都读过《资本论》，这里用不着解释了。

第 138 页，是恩格斯对上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些解释，这个思想是完全合理的，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分析，并没有什么像杜林曲解的那种情况。恩格斯在头一段的第 5 行说："马克思只是从历史上予以证明并在这里简短地概述，说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产生自身消灭的条件，即小私有者被剥夺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自身也产生了使它一定归于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么这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错了……。"（又见同上书第 476 页）

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很清楚。恩格斯这种解释还是想来说明否定的否定规律反映了什么？就是说一种东西，如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必然产生自己灭亡的条件。这个思想可以用到一切东西上去。任何东西，它在发展过程中就产生了自己灭亡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它的对立面。对立面的出现，结果使这种事物开始消灭。所谓消灭，也就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是说，否定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只是事物的一种形态的消灭。小生产变为资本主义的集中生产，走到它的对立面，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自己消灭的条件，即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最后是资本主义也归于灭亡。而这个灭亡，也是转到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

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的内容，无非是说：一件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原因，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

自己产生矛盾，矛盾的发展，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对立面以后，又产生自己新的对立面。经过两次转化，就形成一种否定的否定关系。为什么叫否定的否定关系呢？就是说，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带有曲折性或者是螺旋的形式，经过两次否定。原来是个人劳动，个人私有为基础，经过两次否定，出现了共产主义，好像是有些恢复又有了个人私有，和最初的个人私有有某些相同的地方。所以第二个否定常常在某些方面好像又恢复了最初阶段的某些特征。恩格斯在这里具体说明了这个内容。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讲得更清楚。他讲到否定的否定在外表上的反复并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而是某些特征的反复。

另外，关于发展使事物转到对立的方面的思想，它的核心还是对立统一的规律。首先是事物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统一就是矛盾。所以矛盾的发展，就是对立面的发展。对立面的发展使事物转到反面。矛盾的发展怎样引起事物向对立面转化，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是斗争。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这本书里没有讲。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讲过了，现在要作点补充。当然不是说恩格斯写这本书犯了什么错误。因为在那个论战中不需要提出斗争的问题，所以没有提出来，但是对立却讲了。毛主席讲辩证法，着重讲对立统一规律。他解释对立统一规律，认为对立统一是宇宙普遍存在的规律。事物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对立面的斗争使事物向反面转化。由于事物向反面转化就引起发展，引起质变。这里或者再加上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毛主席在 1957 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过这方面的原理，比恩格斯当时讲的更展开了一些，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就更清楚一些。我们说一分为二的方法，这是简单的说法。但是要说得全面一点，应该把毛主席说的所有的

这些话都说出来。首先是事物是统一的东西，但有对立面，对立面的关系是又统一又斗争。又统一又斗争，通过斗争引起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然后推动事物前进。两个向对立面转化，就是一个否定的否定，一般可以这样说。向对立面转化，也有集中进行的，一个整个事物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资本主义的灭亡，到社会主义，是整个的向对立面转化。也有在斗争的过程里，对立的一个方面向对立面转化，这也是对立面的转化。如我们党内要整风，整风就有对立面，有正确的思想，也有错误的思想，这两种思想经过斗争，结果会发生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斗争的结果是不是会使我们的整个党向对立面转化呢？当然不是这样的。经过整风，不是使党向对立面转化，而是达到更统一更团结。但是经过这个斗争，可以使有错误思想的人向对立面转化，使正确的思想提高，正确思想的支配地位更加强了，所以党就更发展了。对立面的支配地位发生变化，或者是矛盾根本解决了，或者是矛盾双方的某一方面由被支配的地位走向支配的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使事物发生质的飞跃，对立面的支配或者被支配地位不变化，但在某一方面发生了转化，使事物更前进了一步，一般是量的变化，或者是部分质变，阶段性的发展。也可以有相反的情况。比如，在苏联原来是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斗争的结果，统治地位变了，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这也是一种发展。这一种发展是带有倒退性的，复辟性的发展。复辟这件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它的必然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如进行一个新的事业，搞一个新的创造，一点经验也没有，出发点是先进的，但到了一定时候，因为犯了错误，碰了钉子，遭受挫折。从形式上看是倒退的，实际上也有前进的一方面，因为他可以通过吸取教训，再向前进。在发展的过程中，绝对的倒退是没有的。当然如果不接受教训，那就

不能再前进。人类要搞一点什么新的事业，碰了钉子，绝对不取得教训是没有的。这一部分人得不到教训，另一部分人会取得教训。有人提出：有了正确的方向，经过失败达到胜利，算不算否定的否定？可以这样说。在完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一般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有了经验就不同了，那就不是失败的问题了。如我们中国可以接受国际上的教训，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还会有某种反复，也还会碰到资本主义的进攻。在发展过程中，还会或多或少地经过曲折。这个曲折也就构成了否定的否定的一种形式。因为有了旧的经验，也可能对一些新情况不了解，再碰到一些新情况，还是没有经验。在斗争中还可能有许多复杂的情况，或多或少的曲折都会有的。

第138页的第二段，就讲到否定的否定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恩格斯说："马克思只是在提出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说明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过程是否定的否定，并不是先拿一个否定的否定作为公式来套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不经过研究，简单做出结论，说将来一定会出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不是这样做结论的。这里恩格斯告诉我们，否定的否定规律是作为一种方法，一个向导，不是一个用来证明问题的公式。什么是证明公式呢？就是说：对于一个问题，不经过任何调查研究，只根据现有的一些现象，就直接做出一个结论，说这个现象一定要走到它的反面。反面的结果，即否定的结果怎么样，他不管。如果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能够做出结论，他说是根据否定的否定规律，所以我的结论是对的。黑格尔讲一切事物都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把否定的否定规律看做同杜林讲的一样，把它当做证明某个结论的工具，有了这个工具，用不着对事物作调查研究

就可以按照这个公式作结论。

初等数学有时候可以这样做。如两条不相连的直线＝＝＝＝，怎样证明它是相等的？这就要把一条线的一端摆到另一条线的一端，再把一条线的另一端摆到另一条线的另一端上，使两条线相垂，我们说它是相等的。为什么？因为有这样的公理，两条直线的两点都合在一起，那么这两条线是完全相等的。两条直线只要两端完全重合，它就相等。我们这样做了，完全符合这个公理，它是相等的。这就是证明的工具，初等数学常常用这样证明的方法。

杜林就是把否定的否定看做是简单证明的工具。因为初等数学很简单，这样做了就能证明。可是，社会的发展，自然界许多复杂现象的过程，就不能这样简单地来证明。运用否定的否定规律，就是说，我们根据以前观察的许多事物研究的结果，发现了否定的否定规律是普遍规律。因此，我们以后在研究一个新事物的发展规律的时候，把这个规律作为一个向导，估计可能会有这样的过程，但会不会实现这个过程，要具体研究，特别是怎样否定、怎样被否定，要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做出结论，在没有具体分析之前，不能下结论。

否定的否定总是表明事物是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才能够发展的，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因此，不管是任何社会，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好，一万年以后也好，它的发展过程还可能会表现出否定的否定的形式，也就是采取曲折的形式，螺旋的形式。肯定地说，共产主义也不是完全直线发展的，这是可以估计的。至于怎么样发展？我们现在不能提出具体的估计。

所以，辩证法这种方法，只能够作为我们研究方向的指南，不能直接用来帮助我们对事物未来的发展做出很具体的结论。

辩证法的规律是普遍的规律，那么是不是它本身就完全是绝

对真理了呢？有没有相对性呢？一切真理都有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法的普遍规律本身也有相对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真理性也是受限制的。受什么限制呢？就是说，只能够把它作为向导，作为研究的指南才有真理性，如果想把这个限制夸大，突破这个限制，把它当做万能的公式，那它就荒谬绝伦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包括一分为二的方法，也是这样的，只能当做开辟真理道路的工具，它才是真理，而不是当做死的公式，否则就是错误的。

有人问：一分为二怎么分法？

如果要求我们定一个很具体的一分为二的方法，那么问题就来了，对立统一规律不能回答如何具体的分法，普遍规律不能回答我们对一个具体事物究竟应该怎样分法，它只能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方向。一切问题都要采取两分法，当你碰到问题时，不要只看一面。任何时候，如总结工作的时候，都不要只看见成绩或者只看见缺点。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那样好，也不能说它就没有缺点。我们和大庆油田比，我们的工作差得多，但不能说自己的工作好像一团黑暗。所以要反对两种倾向。学习大庆油田经验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估计也是这样的，估计过低了也不行，把自己估计过高了，故步自封也不行。

怎样看事物的两面呢？对不同的具体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东西，从表面上就可以分为两部分。如世界上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在空间上就分为两类。有的东西，它有两个方面。如一个人的思想有两重性。你不能把一个人分为两部分，但每个人的思想上都有两重性，如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有的人即使有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但是也会有缺点，总有两重性。而同样的两重性，但又有程度的不同。

有了一分为二的方法作指导，并不等于直接就能解决问题，只能做为一个向导，它告诉我们怎样一分为二。如果要真正把事情的两方面搞得很清楚，那就需要很好地调查研究，要自己做具体的努力，不可能依靠一个公式就立刻把问题解决了。辩证法是一个向导，要把它运用得很好，使它真正起作用，还是要靠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问题。还要经过调查，经过实践，在辩证法两分法的指导下，可以把事物的矛盾揭露出来，然后才能寻找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办法。

第 138—139 页这一段，说明了杜林不懂得辩证法的本性。

刚才讲过，辩证法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作为科学的方法是研究的向导，不是证明的工具。形式逻辑从形式上来看便是一种证明的工具。形式逻辑叫三段论法，三段论法在形式上就是一种证明的工具，一切的推理大体上都分三段，或者是三句话。前两句话叫前提，后一句话叫结论。一般的推理形式都叫三段论法。普通教科书的三段论式，如一切人都要死，某人是一个人，所以某人也必然要死的。如秦始皇是人，他虽然想长生不老，但他还是要死的。这个三段论法的公式，有一些相互的关系。第一段叫大前提，一切人都要死，这是普遍原则；第二段是具体事例，秦始皇是人；第三段是把普遍原则和具体事例结合起来得出结论，秦始皇是要死的。大前提是原则，小前提举出具体事例，第三是结论。这个结论是对第二个前提做出的论断。这是形式逻辑最基本的形式，基本的公式。如果我们把一种事情看做是很简单的，是孤立不变的，那么运用这个公式就可以证明问题。只要有一个大前提（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比如人都是会死的，那么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公式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用不着请医生，请生理学家研究这个人的生理，只要根据三段论法，就可以做结论。凡是比

较简单一点的事物，用推理的方法直接可以做出结论。又如杯子，一切杯子都可以盛水，我手里这也是个杯子，结论，它可以盛水。很简单的事情可以用三段式来作结论，不需要研究杯子为什么可以盛水？它的质量怎么样？用什么质料做成的，形式逻辑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用做证明的方法，对简单的事物直接做出结论。

恩格斯在第138—139页上讲道："……形式逻辑首先也是寻找新结论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就是说，已经知道了普遍的原则，那么对某一个具体的事情结果应该怎样研究，我们可以运用三段法来求得。形式逻辑可以直接证明问题，用不着作什么结论。恩格斯说："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罢了，而且，辩证法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这就是说，形式逻辑的眼界比较狭隘，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不经过研究就作论断，所以它只能运用在比较简单的事情上，比较复杂的事情就不行了。

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化。那么可不可以根据这种原则对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做出结论说这个国家的劳动者一定贫困化呢？恐怕不能这样说。因为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总的趋势来说劳动者是要贫困化的。可是，可能在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它的劳动者普遍不是贫困化，有点稍微富裕起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会有的。如劳动就业的问题，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失业现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充分就业了，一个是瑞士，一个是西德。南斯拉夫有许多人跑到西德去找工作。现在西德又有失业的了。这种情况用三段论法做结论就不行。在这里，形式逻辑就没有用了。如果你想用形式逻辑做出这样的结论，瑞士的劳动者一定会有失业的。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有失业？有什么证明？你回答说，有三段论法作证明。三

段论法是普遍原则，一定能运用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上去。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失业，瑞士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瑞士必然有失业的。你看，三段论法是这样的，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如果你要这样来证明，那就要落空。

因为社会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简单用那种公式来作结论是不可能的。这就要用辩证法来解决问题。资本主义必然引起失业，资本主义必然引起劳动者的贫困化，这是普遍的规律。但是普遍的规律应该这样了解，它是资本主义总的发展趋势。但在总的发展趋势中，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具体情况，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殖民地很多，从殖民地掠夺超额利润，使本国的劳动人民比较富裕起来。所谓比较富裕是平均来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比我们高一点，这是一种矛盾现象，如果不分析这些现象，就搞不清楚。总的趋势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终归要发生问题的，失业的情况，在任何国家里，迟早是要增长的。现在还没有失业情况的国家，将来还是会有失业的，这是总的趋势。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在暂时一个阶段里，又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对这种情况不作具体的调查研究是不能理解的，也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这就非用辩证法不可。这就要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眼界，到广大的事物中去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要联系到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联系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关系，联系到全世界的经济情况。

恩格斯说："辩证法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反杜林论》第 139 页；又见同上书第 477 页）这就是说对世界的看法能够看得更广大了。所谓广大，也可以从数量上来说。初等数学运用于狭隘的范围内是正确的，高等数学要运用到广大的宇宙空间才能显出它的广大。高等数学要

用辩证法，从广大世界范围内来看，就要把曲线看做直线。

当然，形式逻辑也不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在一定范围内要用形式逻辑的公式作证明。有时在检查一种思想是正确还是错误，要运用三段论法的公式，你违背了它也会犯错误。从前，古代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搞的形式逻辑，目的就是要向当时的诡辩论作斗争。当时的诡辩论者就是设法利用混乱的逻辑进行诡辩。形式逻辑把逻辑的规律搞清楚了，可以用逻辑的规律来检查一个人的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形式逻辑作为证明的工具有时是需要的，但不能真正对事物作科学的研究，而简单的证明只能摆在次要地位。恩格斯在第139页的第8行说："在这里，简单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内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肯定地落到了次要地位。可是高等数学中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开始，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初级数学的观点来看，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同样，像在这里那样要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么情况也必然如此。"用辩证法来研究，我们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趋势当然是劳动者的贫困化，资本主义要产生失业。用辩证法又可以说明瑞士可以充分就业，而形式逻辑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像这一类的问题很多。孙中山也批评过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讲过，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总是喜欢延长劳动时间，这不见得对，像美国福特汽车厂，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他也是想用三段论法来证明马克思是错的，那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是进行了矛盾的分析，资本家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可以延长劳动时间，也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增强劳动生产率。一个是延长劳动时间，一个是缩短劳动时间，要进行对立面的分析。孙中山只抓住一面想来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是错误的。所以，形式逻辑不能证明

辩证法研究的结果。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初等数学都是用已知求未知的方法。初等数学也是用两个数来求两个数，用已知求未知。代数也是根据公式然后把未知数找出来。这都是由已知到未知的方法。

形式逻辑有两种：一种是演绎逻辑，一种是归纳逻辑。演绎逻辑是根据两个大前提、原则来推测某一个具体事物，由已知到未知。有时候自然科学常常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由已知推到未知。

比如达尔文有这样一件事情，他经过对很多事实的研究得出许多植物的花的花粉总是要靠昆虫来传播。因此，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原则断定凡是有蜜的花都是由昆虫来传播花粉的。后来有一个读过达尔文的文章的人，在非洲发现了一种花，这种花很大，也是有蜜的花。但是花太大了，很难想像有一种昆虫能来给它传播花粉，于是他就写信给达尔文，说我就不能设想这种花会有一种昆虫能给它传播花粉，因为太大了，恐怕你讲的原则不对。达尔文回答他说：你再去调查调查，如果你所发现的那形状的花可以肯定，传播那种花粉的昆虫一定能找出来。后来这人根据达尔文的信，就找到了这种虫。不过不容易找到。

在非洲发现了一种花，形状与达尔文研究的花一样，达尔文推测这种花一定要有一种昆虫来授它的花粉，他还没有找到这种虫，但是他可以推测。这就是说，简单的形式逻辑也可以帮助人们从已知到未知。

人都是要死的。因为某人是人，所以要死的。这是演绎逻辑。一切人都是要死的，这是普遍规律。因此对个人作结论就一定准确。根据这个原则就可以推测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这样的规律：要死的。如果有谁说我发现长生不老的药，吃了这种药可以不死，那

可以根据形式逻辑肯定这是错误的。

逻辑，即使是形式逻辑也可以帮助人们由已知推到未知，辩证法不过是更高级点。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可以指出一个方向，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可能采取这种形式，至于是不是一定要采取这个形式发展，那还要先进行具体地研究。不能直接作结论。规律只是一个向导、方向。有了这个方向，在观察问题时可以注意这个方向。

所以，不能把理论原则当做简单的公式。初等数学有些问题可以用公式来简单的证明，但不是占主要地位。这段话恩格斯讲过。他说：即使是初等数学也是一种推测未知的方法。有时初等数学的公式也可以简单地证明问题。因为初等数学比较简单。大家读过初等数学都知道。

恩格斯又说："可是高等数学中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开始，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初级数学的观点来看，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反杜林论》第 139 页；又见同上书第 477 页）

如果用形式逻辑或初等数学来证明高等数学的一些结论，那是完全不能证明的。初等数学认为，直线就不能是曲线。如果要用这种观点来理解高等数学就必然要犯错误。初等数学认为，两段之间直线最短。这种公式可以证明日常生活中许多问题。比如我们想走最短的路自然而然要走直路。因为比走弯路近一些。这是初等数学。但是到了天文计算时，很长的两段距离中间最短的并不是直线，而是曲线。这是常识所不可设想的。高等数学的公式只能这样计算。在用微分法分到无限小的情况下，也不能说两段之间最短的就是直线。在研究地质，研究最基本的粒子运动时，如果简单地按照两段之间最短（就是直线）来计算也会犯错误。高等数学中的最大的和最小的东西跟日常生活中的最大和最小又不

一样。

“同样，像在这里那样要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么情况也必然如此。”（《反杜林论》第 139 页；又见同上书第 477—478 页）

形式逻辑有一条规律，就是和实际不能有矛盾。A 就是 A，甲就是甲，甲不能又是非甲。就是不能有矛盾。这种形式逻辑的观点用在日常生活中，用在不需要发展，不需要考虑复杂的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杯子就是杯子，不能说它又不是杯子，不能考虑变化的情况。但是到如果要考虑它的发展，这个公式就不行了，直线可以是曲线，直线在一定条件下就是曲线。是可以这样的。】

第 139 页（又见同上书第 478 页）最后一段，这里讲到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像杜林讲的像《圣经》上的故事那样一种神秘的法宝。恩格斯讲：辩证法“这是非常简单的、到处、每天发生的过程，如果清除掉它上面的、被旧时唯心主义哲学蒙上的、而且无能的形而上学者如杜林先生之流为着自身利益还想继续蒙上去的那层神秘的翳障，那么它是任何小孩子也都可以理解的”。下边，恩格斯举了一些很通俗的例子作说明。

这一段说明很重要。我们一般同志在学否定的否定规律的时候，也常常有这样的障碍，觉得否定的否定规律很难理解，是一个很神秘的规律，好像中间有很难了解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是日常存在的东西。毛主席说过，工作要有节奏，要劳逸结合，事情是有曲折的，波浪式的，有起有伏。劳动——休息——劳动，这种简单的事情就是否定的否定。生产是波浪式发展的，就是否定的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有繁荣，有危机，又有繁荣，也是否定的否定。

形式逻辑这个名词，有时候是指纯粹的形式观点，不研究内容。不研究内容，当然就不研究矛盾，所以是违背辩证法的。形式逻辑这个名词，有时候是同形而上学混用的，有时候又有区别。形式逻辑就是讲形式逻辑的科学，形而上学是世界观，是方法。形式逻辑不是世界观，是具体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候是这样分的。有时候把形式逻辑看成和形而上学差不多。主要是它只表示形式的一种片面、表面的思维方法。形式逻辑在科学研究上，作为帮助证明的次要方法还是有用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我们作科学研究，搞工作的时候要排除，不能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做工作，观察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只能用辩证法的方法。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观点，错误的方法。

要注意，为什么有一些形而上学的方法在人们的思想里影响这样大呢？为什么我们在用辩证法的方法研究问题时常常碰到困难呢？这是有原因的。恩格斯讲：形而上学的方法在日常家庭生活范围内使用它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对问题作研究，看得表面一点、片面一点也不会碰钉子。在日常生活里，表面看问题，片面看问题成为一种很巩固的习惯，加上几千年来统治阶级在形而上学方面有发展，并着重进行宣传，所以就形成一种巩固的习惯。也是由于在日常生活里不会使我们受很大的害处，而且也还方便，所以容易形成这样的习惯。但是一旦要涉及到要真正研究、解决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没有辩证法就一定要碰钉子。这个意思，绝不是说形而上学在科学方法上还可以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它在科学发展到一个历史阶段上曾经作为一种习惯起过作用。形式逻辑这个名词，如果用形而上学的意义去了解是要不得的，在科学研究上要反对形式逻辑。但仅仅思维时所采取的逻辑，还是要用的，我们除了主要用辩证法的分析矛盾

之外，在逻辑上我们要弄懂问题。

正因为否定的否定是一种普遍规律，所以它可以作为我们考察问题的向导。这样一种平常的普遍规律，连小孩子都可以了解。当然，小孩子的了解并不等于真正理解了这个规律的内容。因为事物都是波浪式的、曲折的发展，一看就可以知道。走路用两只脚走，也是否定的否定。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引用了一些例子，如麦粒的例子，数学的例子，关于正与负的关系，关于微积分的问题。恩格斯在这里讲了dx和dy的关系。$\frac{dy}{dx}$本身就是微分，无限小，xy是实数。可以用具体数字来代替，如$\frac{4}{8}$，这是一个不变的分数，8与4微分之间的关系等于$\frac{0}{0}$，8与4都会变小，假如不断地变动，小到无限，小了又小，总是小下去，最后出现的结果是，8接近于0，4也接近于0，结果$\frac{d4}{d8}=\frac{0}{0}$。那么$\frac{0}{0}$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普通的初等数学来了解，$\frac{0}{0}=0$，那么$\frac{4}{8}$的关系是不是最后变成零了呢？所以用普通的数学观点来看$\frac{4}{8}$是$\frac{1}{2}$，再小下去也是$\frac{1}{2}$，可是就很难理解微分不是$\frac{1}{2}$，变成了0，在微分学上，它一直小下去应该达到这样的结果，而不是$\frac{1}{2}$。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就想不通。好像$\frac{1}{2}$的数就消灭掉了。微分学一直小下去，具体的分子等于否定了。用初等数学的看法，这个否定完全没有了。但在微积分看来，$\frac{0}{0}$是不$=0$的，但也可以说$=0$。应该这样理解，无限小下去，可以设想是$=0$，接近0，可是

你说它就是0，也不对。因为它再怎么小，它原来是$\frac{1}{2}$的关系。在微分学上应该怎样看$\frac{0}{0}$呢？一般说来，数学家叫不定等关系。初等数学认为$\frac{0}{0}=0$，在微分学上$\frac{0}{0}$是不等的，为什么是不等的呢？因为你可以把它看成是0，也可以不是零，它还是$\frac{1}{2}$。恩格斯讲，又可以把它看成积分，积分也可重新变大。微分之后有积分。积分就是把无限小变回来，走向相反的方向，结果还是$\frac{1}{2}$。所以$\frac{0}{0}$可以$=0$，但也不$=0$，还可以是$\frac{1}{2}$。因为这里面有变化。高等数学要经常注意变化，$\frac{0}{0}$是不定等的。所以$\frac{4}{8}$的微分关系可以是$\frac{0}{0}$，$\frac{1}{9}$也照样是$\frac{0}{0}$。高等数学里面，0的内容非常丰富。初等数学的0是没有什么东西的，高等数学的0就有无限的内容，可以产生$\frac{1}{2}$的关系，可以产生$\frac{1}{9}$的关系，可以产生$\frac{1}{10}$的关系，可以产生无数的关系，但是也可以等于0。一个公式，经过微分的结果就是0。但它还可以作积分计算。

还有一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这本书的《引论》里讲辩证法变成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变成现代的辩证法，这是否定的否定，最初，古代罗马的唯物主义，后来变成唯心主义，后来又变成唯物主义，这都是否定的否定的关系。恩格斯这里讲的，也是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否定的否定关系的。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到学术上争论的问题。就是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会不会转化的问题。照恩格斯的说法，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是可以转化的。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否定了，唯心主义后来又发展到唯物主义。哲学史的过程是这样的。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冯友兰等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恩格斯这里的提法，肯定是有这样的关系的。我们感到这个关系的主要问题似乎有点难于理解。唯物主义本来就是唯物主义，它怎么能转化为唯心主义呢？唯心主义是荒谬的哲学，为什么会转化为唯物主义呢？抽象地讲是绝对对立的，不能转化的。问题是具体的历史过程有这么一个关系。唯心主义怎样产生的呢？就是早期的唯物主义有些问题还解决不了，唯心主义就从它的缺点中产生出来了。古代唯物主义本身是有缺点的，自己内部有矛盾克服不了，所以它对立的方面就发展了。这里主要不能理解的是恩格斯讲的思维与物质的关系。人的大脑怎么产生思维，古代人搞不清楚。我们现在搞清楚了。我们经过实践，达到感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古代人没有这个认识，设想精神是独立的东西。设想的结果，越来越认为精神脱离物质而独立，精神越来越成为主动的东西。再加上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由于剥削阶级，脑力劳动者占统治地位，强调精神的独立作用，就转化为唯心主义。这并不是唯物主义本身就会变成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本身包含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结果唯心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唯心主义发展的结果，又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都是客观规律，这些知识有认识的来源和客观的来源，科学越来越发展，知识越来越发展，这就越来越清楚，要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概括客观的知识即自然的知识，社会的知识，是越来越不行了，越来越和它的观点相矛盾。最后，唯物主义打倒了唯心主义，而这个唯物主义是从唯心主义内部矛盾生长出来的。如果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绝对不转化，那么势必要发生这种观点：世界上原来有一个唯物主义，后来又

出现了一个和唯物主义没有关系的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存在一个时期，又出现了一个和唯心主义没有关系的新的唯物主义观点。这还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还是应当运用事物自己内部的矛盾使自己被消灭，产生另外的事物，把自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才是符合辩证法的。冯友兰说，唯物主义的发展是经过唯心主义的。“经过”的讲法不妥当，好像唯物主义的发展非经过唯心主义不可。这不是具体的分析。从矛盾分析的方法来说，转化都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不是永远转化的。古代的唯物主义可以转化为后来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可以转化为现代的唯物主义。现在，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在一个时期转化为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呢？当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有的。将来一个人的思想，一个时候唯物主义占优势，一个时候又犯了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然后又克服了主观主义回到唯物主义方面来，这种过程以后还是会有的。至于整个的历史时期都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会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一定。社会主义有列宁的唯物主义，斯大林的唯物主义。斯大林是唯物主义者，部分问题上出现了主观片面性。由于这个主观片面性没有很好地克服，现在苏联就出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统治，修正主义现在影响到整个哲学界。修正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极端，它要碰钉子，结果还要转回唯物主义。

这就是我的一种解释。这是个学术问题。我这几年老在想这个问题，反复想过好多次了，还是感到这样讲妥当一点，符合辩证法。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唯物主义不是铁板一块，唯心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都是可以分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具体的。凡是具体的东西都是可以分的，都有矛盾。当然，它是唯物主义的时候就是唯物主义，但它有自己的矛盾，这

个矛盾发展了，就会导致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如果说得妥当一点，可以说是唯物主义转化为唯心主义的时期，唯心主义转化为唯物主义的时期。不能简单地说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就是唯物主义。

关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问题。恩格斯还讲到："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恢复旧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和古代唯物主义有共同的特征，但决不是简单地恢复。因为新唯物主义有一个特点："一般地说这已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并表现出来。"(《反杜林论》第 143 页；又见同上书第 481 页)

这一段话较难理解，有个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曾经有些托派把恩格斯这段话做这样的解释，他们说：恩格斯认为在黑格尔以后哲学就消灭了。当时有一种叫做"哲学消灭论"的观点，只要有科学就够了，不需要有哲学了。我们当然反对。我们要反对他们，就要对恩格斯这句话作解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哲学。为什么"一般地说这已不再是哲学"呢？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新的特殊的哲学，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如果说这仅仅指的是以往的那种哲学，那么也可以不叫哲学。但是，如果哲学是指的世界观，那么还是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过去的哲学不同。过去的哲学是想要超越各种科学之上，不要严格根据科学知识作基础，自己设想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以前所有哲学的特点。恩格斯这里讲的"一般地说这已不再是哲学"，就是指的这种哲学，那么现在是不需要的，要消灭的就是这种想要超越各种科学之上的另外搞一套的哲学。这种哲学，大部分内容与科学没有关系，是主观臆造的。所有黑格尔

以前的哲学，都有这种特点。恩格斯讲，这种哲学没有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完全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的世界观，它不是在科学以外去虚构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它本身仅仅是把各种科学成果作一个概括，从各种科学中抽出来的，因此，各门科学都是适用的。并且任何一门科学，每一次新的发展，都证明辩证法的正确性，都使辩证法得到一次新的证明。所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哲学，不过不是从前那种哲学。从前那种哲学是不是完全消灭了呢？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呢？那也不是。从前的哲学，它的整个体系是消灭了。它有许多虚构的东西可以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代替，这些就不需要了。但在从前的哲学里面，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即从前哲学研究过的形式逻辑，研究过的辩证法，还是保留下来了。所以恩格斯讲"扬弃"的意思，就是说，"同时既被克服又被保留"了。整个体系消灭了，但它里面有价值的东西被新的科学、新的哲学吸收了。所谓批判地继承，就是这种意思，把所有的糟粕取消，但对某些有价值的精华的东西保留下来，加以发展。这些问题，还涉及到道德的问题，以后解答问题的时候再谈一下。

【《反杜林论》第143页中所说的"现代唯物主义"，是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高成果，也是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斗争、互相转化的最高结果，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哲学的历史。总的说来，科学唯物主义发生、发展，完成的历史，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完成了科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表明科学的唯物主义开始完成了。

这个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特点，就是把两千年来的历史本身和全部的思想内容加到唯物主义的巩固基础上去。这个思想不要机械地来了解，不要把它理解为两千年全部的历史推到唯物主义上去，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应该了解现代唯物主义是两千年来哲学发展的最高的结果。两千年来哲学中消极的东西，不好的东西都被克服了，凡是积极的东西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所有哲学，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有一种特点。每一个哲学家都企图自己完成一套最后的哲学，完成一套绝对真理，企图把历史知识的全部真理包括在自己的哲学著作里面。这些哲学家都有一种幻想，以为自己的哲学就是人类认识中的最高峰，不能再发展了。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要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这种做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根本不需要，也是根本没有的。任何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都不可能在自己的一生里建立一条永远适用的绝对真理，不可能幻想自己搞出一套系统，以后别人就用不着研究了，前进了。这种思想从马克思起一直到毛主席是根本没有的。但是以前的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这种幻想。这就是以前所有的哲学的糟粕，消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几千年来的哲学经验做出了总结，把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经验做了最高的总结。同时又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根据当前社会革命的经验，概括出一些世界观的基本原则、方法论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都是用来帮助我们指导研究具体问题的，帮助我们指导我们来研究自然科学的具体的实际问题、社会斗争的实际问题，不是想要在哲学上建立一套体系，来代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只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论，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提出一个正确的指导原则。比如《矛盾论》就是提出了一些我们怎么样去研究矛盾的指导原则，研究矛盾要注意

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联系,要注意抓住主要矛盾,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抗与非对抗等等。这些都是给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提出了一些指导原则,不是要用这些原则作为死的公式来代替我们的具体研究,而是用来帮助我们具体研究问题,为帮助我们具体研究问题提出原则性、方针性的意见,是一些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

所以,在这里恩格斯这样说:一般地说,这里已经不再是哲学了。是不是它就不再是哲学了,是说不是以前的哲学了,不再是黑格尔以前的哲学了。马克思的哲学跟黑格尔以前的哲学有根本的区别。以前的哲学都是想搞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代替自然科学,代替社会科学,或者想超过社会科学,企图建立一种科学的科学。是科学的太上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只是在科学的研究、社会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思想上的指导原则,世界观的原则,方法论上的原则。所以不再搞包罗万象的体系。这种哲学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哲学,以前的那种哲学被扬弃了,所有的体系被克服了,被扬弃了。但是它的合理的东西都被保留了。以前的哲学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总想搞包罗万象的体系,另一方面也企图搞出一些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后一方面被马克思主义保留下来了。所谓保留也不是简单的保留,是提高了,改造了,发展了的。所以恩格斯讲:包罗万象的被克服了,但是真实的内容被保留了,哲学上的真正的原则、内容、任务保留下来了。

所以,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就是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要是从前的哲学家,就要写几十万、几百万字,单说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几十万字,而且他还有体系,还有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美学等,都是他的

哲学。《逻辑学》，还只是他的方法论，他的第一本东西，逻辑学里还有一个精神现象学。每一本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字。所有他的哲学的整个体系里，最有价值的还是他的《逻辑学》。因为他的《逻辑学》是讲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原则。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吸收黑格尔的合理的东西，主要是从《逻辑学》中吸收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吸收的比较少。因为他的真实内容在《逻辑学》里，特别是辩证法是在《逻辑学》里面。

抗战以前，有一个托派的人叫叶青，根据恩格斯的这段话提倡一种“哲学消灭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了。恩格斯已经讲过，哲学已经不是哲学了。他主张用科学来代替哲学。那是根本错误的。恩格斯并没有说用科学来代替哲学。从前用哲学代替科学当然是错误的，用科学代替哲学也是错误的。恩格斯的意思不过是说：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要站在科学之上另外搞一套体系，就在科学中，把各种科学的成果做出哲学的概括。哲学是要的，任务是从科学斗争中总结出哲学来。现在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攻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哲学无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没有什么帮助，这些观点苏联的哲学家也就顶不住了，有些苏联哲学家就接受了，有些哲学家反对、批判。这是修正主义思想的一种，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修正主义哲学家也有这种观点，这是一种修正，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修正。】

# 第三次辅导

(1964.1.26)

现在从 144 页讲起，这一段是把以上所讲的许多道理作一个

总结。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怎么来的？就是根据卢骚的书来的。恩格斯在第144页（又见同上书第483页）这段话最重要的是第三行那句话，这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本质。为什么会有否定之否定规律呢？他上面讲：我们在卢骚的书上，不但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同出一辙的议论，而且还可以看到卢骚所详细叙述的一系列和马克思运用得相同的辩证的说法（所谓相同点就是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话。这个辩证法是什么意思呢？下面讲）：“本质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朝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最后，作为一切的核心的，否定之否定。”这段话我们在第一次讲的时候也谈过，现在再讲一下。

首先说辩证法的内容，应该注意“本质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这里用对抗这个词，并不是说一切矛盾都是对抗的矛盾。当时恩格斯还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还不能提出对抗和非对抗的区别问题。所谓本质上的对抗，应该理解为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但是不能说不调和就一定要冲突。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对立面都是不可调和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所谓矛盾的对立面不能调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立面的矛盾不能用调和的方法来解决，只能用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但是斗争不一定就是对抗，不过终归要斗争。调和矛盾，折衷主义的方法不能解决矛盾。调和矛盾的情况有没有呢？调和矛盾的情况是有的。修正主义讲调和矛盾，有没有这个调和呢？也会出现这个调和，比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有时也采取调和的办法来处理，但是这种调和的办法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矛盾。调和是暂时出现的现象，不能成为解决矛盾的道路。一切本质上对抗的过程，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过程，这种过程发展到每个对立的

极端就会向它的对立面转化。所谓极端是什么意思？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极端，这个极端主要决定于矛盾内部的对立情况，有时也决定于外部条件，比如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极端，资本主义的极端就是向社会主义转化。过去修正主义者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的极端是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因此，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他们思想上认为的那样高的程度，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能转到社会主义。就是说，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者曾经想给资本主义规定一个很详细的数字上的极端，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方法。所谓极端，是有一定量的极端。这里也包含着量变到质变的意义。但是每一件事究竟什么是极端，这又不完全决定于量的本身，而是决定于内部矛盾的发展情况，也决定于某些外部条件。一个社会力量发展到什么程度是极端？列宁讲过，统治者不能再统治下去了，被统治者也不能再忍受统治，矛盾、阶级斗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革命就会到来。这主要是决定于阶级斗争，而不是片面地决定于生产力，当然生产力需要有一定的水平。什么时候革命来了，决定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情况。不但不由事物量的极端决定，就是同一个事物在同样的条件下，它的量也不一样。比如水的沸腾是摄氏 100 度，同样的水在西藏高原可能是 90 度或 80 几度就沸腾了，有些地方连饭都煮不熟。这是自然现象，量的极端随着气压而变化。应用辩证法的规律只能做一个向导。对事物的转化一定要作具体研究，作具体分析。辩证法就是这种方法，要注意问题的方向。比如旧社会要向对立面转化，至于什么时候转化，怎么转化？要作独立的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问题作独立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是基础，但是不能因为

有了唯物辩证法就可以取消调查研究，有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还是要搞调查研究的。

这里还有一个向对立面转化的问题，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的对立面，毛主席讲向对立面转化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比如鸡蛋不能转化为石头，鸡蛋只能转化为小鸡。所有事物本身的对立面在发展过程中，它的矛盾引导它必然要转化为那个对立面。资本主义必然要转化到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转化到共产主义，也不能转化到原始公社或奴隶社会。当然，倒退的转化也可能有，社会主义是过渡时期，它可以向共产主义转化也可以向资本主义转化。世界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前进的，但是个别倒退也是存在的。倒退也有量变质的关系，比如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斗争到一定程度，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就向资本主义倒退了，如果马克思主义再占统治地位，又可以仍然回到社会主义。每个极端都朝着它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但是每个极端究竟向哪一个对立面转化，也还是要经过调查研究的。因此我们在研究问题时，要注意有可能转化的方向，这个方向具体的怎样实现，一定要经过调查研究。辩证法离开了唯物主义就不能真正成为我们科学的武器，辩证法要用唯物主义作基础，才能真正成为科学的方法。

恩格斯讲了前面的两句话以后说："最后，作为一切的核心的，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发展过程向对立面转化的一种结果，矛盾过程发展到最后才能暴露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里讲作为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现在争论的核心，因为事实上恩格斯在这里仍然把对立统一的规律、矛盾规律看做辩证法的核心。哲学篇从引论起，都是把对立统一规律看做辩证法的核心。引论中有一段还可以说一下，第 20 页开头讲："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硬化的、永久

如此的研究对象，是应当一个一个地、彼此孤立地被研究的。形而上学者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又见同上书第360页）形而上学者认为的对立就是绝对的对立，否认对立的统一。

下面，恩格斯又说，“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绝对互相排除的，原因和结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反杜林论》第20页；又见同上书第360页）这是说形而上学不讲对立统一的规律。“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理的，因为它正是合乎所谓常识的。可是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虽然在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程度要看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定）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迟早它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了。因为它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见它们相互的联系；只看到它们的存在，而看不见它们的产生和消灭；只看到它们的静止状态，而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反杜林论》第20页；又见同上书第360页）这里恩格斯还举了例子，下面他说，“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确信地说，某种动物存在或不存在，可是在更切近的研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常是极度复杂的事，像法学家所熟知的，他们苦心焦虑想发现在母亲子宫内杀死胎儿，究竟超出哪一种合理的界限才算是谋害，可是毫无结果。同样的，死的时间也是不能明确地确定的，因为生理学说明，死亡并不是一种突然的，倏忽完成的事件，而是一种延续的过程。”（《反杜林论》第20页；又见同上书第360—361页）恩格斯所举的例子都是讲对

立统一的，杜林就是不了解对立可以统一，他认为要不就是绝对对立，要不就是绝对统一。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杜林是用机械唯物论来代替辩证法，他主要是不懂得对立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联系，可以成为统一的东西。恩格斯也就是针对他这点来批判的，反复说明对立的东西可以统一，统一的过程中总是包含矛盾的。所以，从恩格斯和杜林争论的特点似乎可以了解恩格斯为什么没有提斗争性问题，就是因为当时的争论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不是要强调斗争性问题，而是要强调对立面可以统一，对立面是统一过程中的对立面。杜林主要是不了解内在矛盾，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内在的统一。恩格斯必须着重说明对立面的统一，因此斗争性这方面就没有特别加以发挥。我们现在感到没有谈斗争性有点不足，这并不是恩格斯的错误，恩格斯在当时只能这样处理问题，在争论中着重展开对立面的统一这方面，粉碎机械的对抗观点、绝对对立的观点，这是应该的。如果恩格斯那时就强调讲对立面具有斗争性，斗争性是不调和的，是绝对的，那恰好杜林就要说恩格斯同意他的意见，斗争是绝对的，所以说对立面也是绝对的。读者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杜林对，还是恩格斯对。所以，那时不必强调斗争是绝对的，这是适当的。在别的问题上可以强调斗争性的时候，他在另外的场合强调了斗争性。这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正面着重批判一种错误思想时强调辩证法的某一个方面，但另外方面也不能忽略，不过强调的这方面还是突出的。斗争性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对抗的”这句话里就有了，如果不讲这点也不行。

有同志提出一个意见，认为恩格斯讲的形而上学好像是指的形式逻辑，因为他讲形而上学在家庭里面是可以尊敬的伴侣。我看不是这样。第 20 页清清楚楚是讲形而上学，不是讲形式逻辑。

恩格斯讲："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都是指我们在一定的情况下，把事物暂时看做是不变的、孤立的东西，有时需要这样做，这种时候形而上学就能使用。但这并不是说客观事物是孤立的是静止的。是说我们有时有必要把这件事情看做是孤立的、静止的，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且也有一定的便利。这并不是说形而上学的方法是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只能说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或者是一定的情况下，为了暂时便利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所以能这样做，就是因为客观事物虽然不是静止的、孤立的，可是它有相对静止的一面。所以我们有时把事物当做静止的来看，在一定的范围内也不会碰钉子。如科学发展的低级阶段就要用分类的方法，就要把自然界当做死的、固定的东西来看。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方法是科学的、完整的，但是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暂时这样做，才能分类研究，分别看清楚各种各样的自然界面貌。在日常生活中用是则是、否则否的观点来处理问题就行了，但涉及到要深入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

大家提的问题我只能这样解释，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是不同的。形而上学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做为一种方法来说，是片面的主观主义的方法。首先是片面的，如果把这个片面性坚持下去，就变成主观主义的方法，再继续下去就会发展为唯心主义。形式逻辑不是世界观，它是研究人的思维规律的，这种规律只是一些很单纯的规律，所以这种规律很可以普遍运用，我们用辩证法考虑问题的时候也要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律。在辩证法总的指导下，适当地运用形式逻辑的规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形式逻辑当做普遍的方法来代替辩证法，也会陷入形而上学，会发生错误的。形式逻辑在辩证法的指导下，在辩证法研究问题的基础上可以运用。

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失业，必定要出现就业不足。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如此，在特殊情况下就不一定。在这个大前提下把矛盾弄清楚，然后又在小前提下，资本主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暂时不出现失业，这样就符合形式逻辑。问题是大前提、小前提怎么处理，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调查研究，一定要有唯物主义辩证法。如果没有唯物主义辩证法，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套到三段论上去，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形式逻辑只是思维的初级阶段的一种手段，但是应该普遍遵守。它作为初级阶段的东西，要受高级阶段的支配，就像人的身体是高级的东西，但是高级的东西一定要包含低级的自然规律。比如人走路是机械的运动，但是机械运动不能直接解决人的生命问题，人的生理问题指的是生命现象，研究生命的规律才能了解人的身体情况。高级现象可以包括低级的东西，辩证法是高级的思维，所以也可以包括形式逻辑。真正的辩证法是不会违背形式逻辑的，但是并不等于形式逻辑。《资本论》的体系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严格地符合形式逻辑的，但是不等于形式逻辑。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是这样，矛盾的过程走到反面，两次向对立面转化。就是表现这个过程是曲折的、波浪式的，否定之否定就是表示第一次波浪到第二次波浪之间的起伏关系，一起一伏，然后再起，螺旋式地旋转一个圈，再重新旋转，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用科学上的名词讲就是周期性。毛主席用了很通俗的名词叫做有节奏。节奏和周期是一个意思。一个否定之否定表现为一个周期，出发一次又回来再出发，这是一个周期。为什么不叫多次否定过程，不用这个名词表现这个规律？就是因为多次否定没有显出周期性来。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可以用，就是因为它表现发展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比如由原始公社到阶级社会，又到新

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一个很大的周期。经过这个周期，人类发展到新的阶段。用恩格斯的话来讲是产生两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序幕。从原始社会起人类就脱离了动物，开始自己改造自己，就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是很低级。在阶级社会里面，人类对自然界有很大的改造能力，但是对社会本身就不行。人类对社会本身基本上受社会发展规律的盲目性支配。革命时期不同，人类认识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就有些自觉性。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发展规律对人类来说是盲目起作用的。在阶级社会里面，没有哪个统治阶级能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得到政权以后，才开始能比较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要表现有自觉性。当然修正主义是另一回事，赫鲁晓夫就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发展是不依赖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他们就会走向垮台。但是有了无产阶级自觉性的国家就不同，社会主义就能胜利。我们周总理的非洲之行是大胜利的进军，一走就十几个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真正的人类历史是这样的历史。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从原始社会到科学的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周期，是否定之否定，这有很大的意义。人类经过这个大的周期（小的周期很多，从原始公社起每个社会阶段都有它自己的周期），这是真正人类历史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人类历史的发展又要有新的规律。

如果有人说将来共产主义社会还要被否定，这是历史的幻想。否定之否定将来还会有的，而且现在也有，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曲折的，有各种各样的曲折。比如战争与和平的曲折性，苏联也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曲折性也有。无产阶级第一次得到政权的时候，这是它的正面，另一方

面，无产阶级还有没有经验的问题，这个政权怎么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最初得到政权的时候是没有经验的，所以需要取得经验，这个经验怎么在实践中取得？就要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新事物，这就会得到一些新的感性知识。碰到一些新的问题，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答复。人类不可能对新的问题一次答复得正确，很自然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对所碰到的新的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为什么会出修正主义呢？因为一开始时就有矛盾，但是不暴露。它的本质是对抗的，是不会调和的，经过一个时期这个分裂就表明了，分裂就必然斗争，经过斗争把错误克服了，又得到统一。

我们党内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又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是否定之否定的自觉运用。毛主席是善于运用辩证法，这是辩证法的发展，这是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运用到党内斗争。

第 145 页（又见同上书第 484 页）第二段讲："所以，什么是否定之否定呢？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因而也是非常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表现于动植物界中，表现于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对于这一规律，就是杜林先生自己，不管他如何顽强抵抗，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遵循的。当然，譬如在我说麦秆的发展过程是否定的否定时，我还丝毫没有讲到麦粒从发芽起到麦秆死亡为止的特殊的发展过程。而积分的演算也同样是否定的否定。这么说来，要是我限于这种一般的论断，似乎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谬论，说麦穗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演算，或者说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谬论正是形而上学者常常强加到辩证法身上的。当我说到所有这些过程是否定的否定时，我是用这一运动规律把所

有这些过程概括起来，因此我就不去注意每一特殊过程的各别特点。”

否定之否定虽然是普遍规律，但是它表现在每种具体事物中都有它的具体过程。我们讲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无非是宇宙的一切事物中曲折的、周期性的发展过程的一个总的概括。否定之否定是一个最普遍的规律，这个原则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千千万万的客观事物周期性的发展过程中概括出来的。先有原则还是先有事实？当然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原则。黑格尔的逻辑学认为先有原则的形式，杜林的观点也是先有原则的形式，然后才有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事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先有千千万万的事物，然后才有人的头脑、人的思维，把千千万万事物的共同发展规律概括起来。所以这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讲这个问题。“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第145页）这个普遍规律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千千万万客观事物具体发展过程中，把它的共同点概括出来的。所以，辩证法这个哲学里面的规律，无非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研究清楚的无数规律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哲学不是在科学之上的一种特殊科学，而是在各种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共同规律，它要依靠各种科学，而不是在科学之上自己单独搞一套包罗万象的东西。把辩证法运用到具体事物中也只能做一个向导，只能研究大的方向，而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所以对辩证法绝不能要求具体的公式，它只能告诉我们有一个方向，不管研究什么对象总要一分为二，不用一分为二，认为是绝对统一就错了，如果这样得出原则，这个原则也是错误的。怎么分呢？就要调查研究，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办事。

下面讲否定之否定有其特殊性。每一件事物的否定之否定过

程都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因此，对某一个具体事物，要使它能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要按照它自己的特点、它自己需要的条件来推动，才能实现否定之否定。每一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对立面，你不能要求它不向它的对立面发展，如果要求它不发展，就等于破坏它的过程。所以麦子只能按照它自己的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使它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是把麦子埋在土里，有一定的水、温度，让它发芽（否定）。如果磨碎了、吃掉了，就不叫否定，是简单的消灭，这不是辩证法里面所讲的否定，这是一种过程的中断，麦子也不能发展，因此也不能再长出新的麦子，因为麦子已经消灭了。这种过程中断的现象世界上也是有的，这是过程的破坏，在人类社会里面也有。比如非洲、美洲有一种社会的人，被欧洲人整个消灭了，整个消灭的民族不可能又整个恢复。否定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自己否定自己，这种否定同时又是规定它的成为一种新的东西对旧形式的否定。这是辩证法讲的否定，这种否定必然会再发生否定，这也是自己的否定。每一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特殊否定的过程，所以要使任何一件事情按照它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发展，必须要有它自己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条件不能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讲的，如果把数目字写在纸上，涂掉，涂掉了再写上，他说这只是一种儿戏，不是什么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中，出发点和第三个阶段有些类似，道理并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在更高的基础上回到出发点，在某些方面和原来的出发点在形式上有些类似，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第一个否定当然跟肯定的内容是相反的，再否定又跟原来第一个阶段有点类似。当然类似的程度可以不同，有些很类似，几乎等于出发点，有些类似的情况比较少。比如水的

波浪运动，否定之否定的类似情况比较大，第一波起来，第二波又起来，几乎和原来的一样，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只是类似的情况比较多。人类历史的否定之否定就不同，原始社会跟共产主义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公有制这点上有共同点。所以否定之否定阶段跟肯定阶段，在某种情况下有类似的地方，但只是外表形式上有类似，并不是本质上完全相同。周期性的发展必然有这种情况。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日常生活里到处都有的，非常普遍的，谁都可以理解，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规律。所以它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这个问题前几年理论界曾经有过争论。有人认为，否定之否定不是普遍的规律。在斯大林的哲学小册子里，根本没有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也说明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有怀疑。斯大林的哲学小册子出来以后，苏联哲学界一般都不讲否定的规律。他们有一种解释：说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个名词是马克思读黑格尔哲学著作后带出来的残余，是黑格尔术语的残余。

否定之否定这个名词是黑格尔创造的。这个名词的性质也的确是有点黑格尔式的残余。这是一种逻辑的名字。否定、肯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人的思想里面，是主观的。我们要肯定某一种事情或者否定某一种事情，把逻辑的名词拿来当做客观规律，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形式。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所以他认为肯定、否定这种过程不仅仅是人的思想过程，而且客观实践本身就是一个精神。所以，客观事物自己可以肯定自己，自己又会否定自己。客观实践按照逻辑的方法自己肯定自己，或自己否定自己。所以，他把客观实践的过程与人的思想过程看做是一件事情。因此，他就直接使用逻辑的名词来表达客观规律。所以，否定之否定的名词是黑格尔学术语言的残余，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它跟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不同。对立统一规律不只是人们脑子里面的问题，客观事物本身就是又对立又统一的。对立的统一不是一个纯粹的逻辑术语，它是直接概括了客观事物的规律。质和量也是这样。质和量是两种概念，它是客观事物性质和数量的一种概括。

所以，质变量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我们可以直接当做唯物主义的术语来看待的。而否定之否定这个术语有点唯心主义的色彩，这是可以肯定的。本来是一个客观规律，但他把它说成是一种逻辑的过程。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现在我们在学习和工作，这是肯定。晚上我们睡觉就是否定。明天我们又起来工作和学习，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表现。生活就是这样：工作——休息——又工作——又休息……。这就可以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来看。那么是不是我们白天工作就肯定自己？晚上工作就否定自己？明天工作又对自己作否定之否定呢？如果这样来解释就有点牵强。工作就是工作，休息就是休息。工作到了精疲力尽的时候不休息也不行。不能工作了、疲劳了，劲头就转到反面。休息够了，老躺在床上，像死人一样，这样受不了，因此就要起来。这说明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转向它的反面。

所以，否定之否定规律还要正确地表达，要作为唯物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要把“否定之否定”换成真正是唯物主义的语言，就不能用否定之否定的名词，用波浪式地前进，或是螺旋式地上升比较确切，因为事物的确是这样的。例如经过白天的工作，这是一波起来了，晚上休息，这个波浪又下去了，明天起来工作，波又起来了。就是这样一起一伏。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有起有伏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有起有伏的，这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毛主席的辩证法比斯大林高明。斯大林说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尖锐。这就是不讲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有片面性。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有起有伏的，有时候甚至是很尖锐、很激烈，有时候是平静的。有起有伏是波浪式的或是螺旋式的，看起来好像是绕圈子，是循环，实际上是上升的，上升到更高的阶段。

所以，否定之否定这词有点唯心主义的残余，而唯心主义者又把它说得很神秘，好像是一个事物的理性，因此很难理解。我们要把它倒过来，把唯心主义去掉，这样，这个规律是很普遍是到处都可以利用的，甚至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有些东西，比如光线，看起来好像是直线传播，实际上它不是直线传播的，而是波浪式的。没有一种前进运动不是波浪式的。走路也是波浪式的，两只脚走路也是波浪式的，一起一伏。为什么两条腿走路也是波浪式的？因为一只脚走路是不大好走的，就是你一只脚走路也是跳跃式的，也是波浪式的，飞跃起来后还是要下去的。】

【事物发展都是这样的波浪式的，螺旋式的前进过程。自然科学的名词就是周期性的发展过程。周期性也是循环的意思。绕一个圈就算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完后，然后又有一个周期开始。化学里不是有元素周期表吗？有九十几种元素，每八种元素一行，到了第八种又是一次开始。因为第一种到第八种是两个阶段。开始，化学元素是金属性，以后是非金属性元素。由金属到非金属再到金属，这也是否定之否定。每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也有一个化学的周期，每八种元素排列，一行一行，大体上十来行。

化学元素的变化是周期性的，将来进一步研究粒子、电子、质子。现在还没有发现，到完全发现以后也可能列出周期表来，这是一定的。因为它有正、负，电子有阳电子、阴电子；中子有中子、反中子；质子、反质子都有正、负。所有这些都有矛盾，都

有正到负的变化。以前认为是没有的，以为电子是阴性。后来才发现了阳电子。原来说中子都是阳性，都是正电荷，后来又发现反中子，中子有阴、阳。总之，层出不穷。列宁这样讲过，电子元素的东西也不是纯洁的，也是一分为二。原来认为不能一分为二的结果都能一分为二。科学越发展，一分为二越清楚。

否定之否定无非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使它到了发展的阶段就向反面转化。两次向反面转化就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周期性的发展关系。这种周期性的发展关系是普遍的规律，毫无例外，没有一种事情可以例外，没有一种运动的发展可以例外。恩格斯所举的一些非常平常的例子是说明这些问题。】

【毛主席对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有深刻的理解，而且从来都是坚持应用这个规律的。从民主革命时期起，我们只要举几个大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江西讨论怎样发展革命力量的问题，有的同志说，红旗恐怕插不下去了，到城市去搞秘密工作。这不对。有些人认为，可以一直向前发展，仗打下去，到处搞游击战争。以为可以一条直线向前发展，这也很不妥当。

毛主席就提出另外一种看法，按照否定之否定精神，要采取波浪式的发展的方法。就是打一次仗得到胜利以后，要停下来巩固，搞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搞好了，然后再参加武装斗争，再进一步发展。就是巩固和发展不断地向对立面转化，这是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巩固和发展互相交替。这种思想后来是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来了。比如，发展党员也是这样，发展一段，巩固一段。发展组织，发展合作化，甚至搞新运动也是采取这种办法。战争——休整——再战争——再休整，在战争间隙中间抓紧时间休

整。这种思想都是自觉地运用了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个规律是正确的，所以斗争能够得到胜利。

在战略问题上，大家可以看《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战争的围剿——反围剿——再围剿——再反围剿，这个规律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运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很多的辩证法思想，里面否定之否定这个思想用的比较多。因此，战争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过程。而且在这种过程里面，对否定之否定这个规律掌握的不好，不可能取得胜利。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艰苦的斗争，发展的过程慢一点还不要紧，激烈的斗争过程，只有掌握好否定之否定这样的规律才能胜利。斗争很紧张，发展很迅速，在这个时候，如不在紧张中间及时休整，天天紧张，就会搞垮。紧张一段之后要休整，然后再来更大的紧张。战争也是这样。敌人也是这样。敌人也是这样来的。打一次围剿，准备一下又来围剿，战争本身就是否定之否定。所以要适应这种过程，能很彻底的、非常注意掌握这种节奏，很好地利用这种周期性。从《论持久战》中也可以看出这个规律。

《论持久战》中讲战争有三个阶段，速胜论与亡国论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三个阶段实际上是否定之否定，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第二个阶段是相持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反攻阶段，是我进敌退。这就是说，第一阶段有进有退，第二个阶段基本上是没进没退，第三个阶段是反攻阶段，是我进敌退，有进有退。第三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有点类似，不过时间不同，第三阶段是我进敌退，这也是否定之否定。毛主席是自觉地运用了这个规律，而且这不是套公式，是根据客观矛盾发展的情况。矛盾斗争发展的情况，它自然有这样的过程。把这个自然过程加以具体地调查研究，而且把它叙述出来，这就证明了否定之否定。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也是常常用这个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最显著的就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有些农村工作的同志热情太高了，不准人睡觉了，不许农民睡觉。我们有些同志也搞过农村的工作，恐怕也有这种情况的。不准人睡觉就是不懂得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以毛主席那时候反复讲过，工作要节奏，节奏就是有否定有肯定，节奏就是钟摆。劳逸结合就是否定之否定。所有的工作要有休息，不能只有工作没有休息。那个时候毛主席还用古代的话，大概是用孔子的徒弟讲的一件事情来加以说明。就是孔子的学生去看了一个庙会，他就跟孔子讲：这些人这样快乐，未免太松劲了，生活未免太悠闲了。孔子答复他说：这是需要的，很多事情就是一紧一松的，他的说法是一张一弛。就像拉弓一样，一张就紧了，一放下来就弛了，事情总是一张一弛的。那个时候孔子最崇拜圣人，尧舜、文王、武王等。所以他说，如果是张而不弛，只是拉紧不张开，那是“文王、武王难为也”，但是张而不弛，“文武非能也”。就是他们也做不到。张而不弛圣人也做不到。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也。这是圣人要走的道路。所以，这有点辩证法的因素。】

【恩格斯当时讲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哲学关系还有一点要注意。马克思、恩格斯活着的时候，他们是要极力强调黑格尔的哲学的价值。因为那时候资产阶级的哲学中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都有人主张，完全扬弃黑格尔。当时有一个口号：回到康德去。把黑格尔当做一条死狗看待。所以，他们那时的任务，是要积极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重要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我宁愿承认是黑格尔的学生。他本来也是黑格尔的学生，可是学生与老师不同。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法与黑格尔不同，并且是完全相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

完全相反的。

我们读恩格斯著作的时候，要考虑到这样的历史情形。那个时候反对马克思的人都说：马克思应用黑格尔的公式，简单地用黑格尔的公式。而他的所谓的公式，就是否定之否定的公式。他们集中攻击的就是否定之否定。杜林集中攻击的也是否定之否定。

以后还有这种情形：俄国的民粹派反对马克思的时候，也是反对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里也有整整的一段话说明这个问题，也在这个问题上批判了民粹派。所以那个时候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问题。那个时候，矛盾的问题，对立统一的规律，不突出。那时斗争的中心是正反合公式，是三段法，是庸俗的形式主义。根本的问题还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但当时突出的是这个问题。因此，恩格斯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作为核心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并不是说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而是因为当时争论的需要。

同时，在黑格尔的哲学里，否定之否定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弱点。因为黑格尔自己的确把否定之否定当做一个公式。这是出自他的一套哲学体系。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架子，一个骨架，钢骨水泥的架子，是以否定之否定来制成的。他的哲学著作都是三段法。《逻辑学》是有三篇，每一篇有三章，每一章有三节。都是机械得很。每一个事实都要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他的整个《逻辑学》第一是存在论，第二是本质论，第三是概念论。他分三大篇，存在论又分三章，第一章是质，第二章是量，第三章是质量，质和量统一。他的否定之否定的第三段是整个的统一，质和量的统一。本质论又分三段：本质论，原因论，现实性三段。现实性是本质和现象的统一。他的概念论又分三段，

第一是主观性，第二是客观性，第三是理念，又是正、反、合三段。本质论也是有起有伏的。质量、本质、现实、现实性，然后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理念，这样的结构。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核心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不是讲合理的核心。唯心主义的体系是否定之否定。这是他的弱点。他把否定之否定搞成了一个死公式。所有这些东西他讲得很勉强，是勉强凑进去的，他要凑成一个架子。黑格尔哲学合理的核心还是对立统一规律，恩格斯讲的核心应当当做当时争论的核心。

我们还可以顺便说一下，马克思搞《资本论》也是多多少少学了一些黑格尔的体系。不过，不是公式主义。《资本论》有三篇。有否定之否定，一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二是资本的流通过程，三是资本生产的总过程。

我们搞经济学专业的同志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些地方他是学的黑格尔的体系。说明黑格尔的逻辑里面有合理的部分。他的整个结构是这样。有个别的结构也是这样的情况。有许多东西常常是三段。比如生产剩余价值部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然后又是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三章有否定之否定，它有这样的结构，这个结构不是套公式，根据资本的发展过程，的确有这样的过程。所以，他就根据这种客观的情况做了安排，来证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确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规律。价值形式也是做了这种安排：有简单的价值形式，复杂的价值形式，价值形式，三种。

我们写文章，搞社会主义经济学不一定这样搞。但是可以参考马克思的方法。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不是也有一种体系？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然后是生产和流通综合起来的总过程。作这样的全面联系。虽然不一定要那么长，但是这个方向还是可以考虑。

否定之否定规律实际上还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在列宁的辩证法十六条要素里面，否定之否定也是当做例子来说的。否定之否定的例子就是量变、质变，还有形式和内容。实际上否定之否定就是讲对立面的转化，就是两次转化的关系。我们现在因为用惯了这个词，虽然这个词是唯心主义的残余，但已经用惯了还是可以用。只要正确理解就行了。只要不用唯心主义来理解，那就没有问题了。】

下边是总论，举了两个例子，第144—146页是对否定的否定作一个总的概括的说明。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规律的意义在哪里，那就要用哲学来说明。

我要讲的关于《反杜林论》一书中内容的理解，就讲到这里。

## 四、《反杜林论》中若干问题的解答

下面，我把大家提出的比较重要的问题解答一下。

**（一）关于存在这个概念怎么了解？**

"存在"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了解。这里的"存在"是认识论里面的一个基本概念。黑格尔和杜林都是从存在开始，他们所讲的存在都是抽象的存在，不是指具体的那种事物的存在。杜林的思想和黑格尔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在宇宙及一切事物没有出现以前先有一个绝对精神，因为有这个存在的概念，才逐渐产生了世界一切具体的存在。这是唯心主义的。先有概念的存在，然后才有具体事物的存在，这个存在的概念跟我们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同。唯物主义认为先有具体事物的存在，把这千千万万的具体存在的事情概括起来，然后才在脑子里概括成一个存在的概念。唯物主义的存在概念是客观物质存在的反映，黑格尔和

杜林的概念存在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原动力。这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存在的概念不同的认识。唯物主义讲到存在的概念时，是指一切物质存在的反映，所以存在也就代替了物质的概念。但是存在的概念和物质的概念也不相等，因为思维也是存在。这点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承认，物质是存在，思维也是存在，不能说物质是存在，思维不是存在。说物质和存在的概念不相等，是因为物质的概念比存在的概念范围还大一些。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思维存在是物质存在的反映，思维存在只是附属于物质存在的。一般的讲存在就是指客观存在，就是指物质。思维也属于一种存在，但是思维这种存在是物质存在的反映。

思维是什么呢？思维和存在的区别就是第二性与第一性的区别，离开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不会有绝对的区别，因为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又是存在的反映，思维还是物质的产物，它基本上是物质的作用，归根结底还是物质派生的东西，因为它不能离开物质。所以把存在和思维对立起来，总是在第一性和第二性这个意义上。在认识论上只就第一性、第二性问题来说，存在和思维是绝对有差别的，物质绝对是第一性的，精神绝对是第二性的，这个差别是绝对的，绝不能混淆。离开第一性、第二性问题就要涉及到转化问题，物质转化为精神，精神转化为物质，这个差别就不是绝对的。物质转化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我们的思想、认识。既然说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就是说物质和精神的差别不是绝对的，精神既然能转化为物质，也说明精神和物质的差别也不是绝对的，它是同一的。马克思主义用存在的概念代替物质，就是因为除了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以外，没有绝对的差别，并且根本的东西是物质的。

能不能说思维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撇开第一性、第二性

的问题，把思维当做一种作用来看，也可以说是客观存在。我自己对大家的思维认识是我的主观，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的思想是大家脑子里活动的一种作用，这些作用对大家自己来说是主观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每个同志用自己的脑子思维。所以大家的思维是离开我的主观而客观存在的。我的思想当然也是我脑子的活动，但是对我自己就要加以区别，一方面是脑子活动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一种主观意识，就这个问题来说，思维和存在也不是绝对的差别，大家的思维就是大家脑子的活动，所以也是客观存在。

**（二）关于机械运动外力能把它推动，然后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起作用的问题。**

机械运动一般的从形式上看都是要靠外力推动的。但是外力怎么能把一个东西推动？就是因为它现在是不动的，但是又可能动，它本身有这个矛盾，如果它没有这种矛盾，外力就不能推动。比如这个房子要用我的手推就不能推动，因为这个房子没有被推动的可能性。这是讲用人力推它的内部没有这种可能性，用机械推是另一个问题。这个桌子我来推一下就能推动，因为桌子有可能被一个人的手推动，他自己内部有不动和动的可能性的矛盾，只要有人用手去推就可能动。可是一座房子没有用个人的手去推动的可能性，所以再怎么推也不能推动。这就是机械运动最后决定于内部问题。外力也是必要的，任何事物都有外力联系，所以任何事物的运动都需要有某些外部的条件，但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内部。

**（三）思维的运动形式是否是物质的运动形式，是不是一种独立的运动形式？**

所谓运动是物质运动的形式。物质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

此我们主要谈谈社会的和思维的运动形式。比如说，一种是人脑子的运动形式，一种是社会运动形式，人的思维一方面决定于人的脑子，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发展。思维的运动一方面不能离开人脑，同时也不能离开社会发展规律，不能离开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说它是独立的运动形式。当然，它有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客观世界不存在普遍规律，客观世界的普遍性都是寓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在客观存在中都是具体的。把人的思维看成是纯粹普遍的东西在脑子里概括起来，这是它相对的独立性，它把事物的本质，事物规律的普遍性采取纯粹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是思维本领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人类了不起的地方。但是有时也使人发生麻烦，所以我们人类运用这种思维的时候，不要使它的相对独立性变成绝对独立性，不要脱离社会实践，不要脱离经济基础。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它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的。

**（四）关于时间、空间的无限性怎么论证？**

这个问题不好答复。要论证也可以写一本书，但是最简单的论证是这样，不管怎样把时间、空间设想成有限的是讲不通的，总是要碰到矛盾的。比如说世界有一个边，当你想到边的时候，立刻想到边之外还有什么，所以有限不能设想。但是这种设想的矛盾可以解决，就是说，要承认空间是无限的，但是具体事物的空间是有限的。物质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空间积累起来的。时间也是这样，宇宙有一个开始，盘古开天地，一想到这个，就立刻想到盘古以前又是怎样。以后也是这样，宗教上有上帝的末日，大家都上了天国，以后又怎样呢？上了天国不还是发展吗？时间、空间的无限性就是物质的无限性，物质是不断运动发展的，不能设想它有尽头，宇宙的存在也不能设想有一个边，所以无限又有点想不通。想不通也没办法，设想它有限也不行。康德的“二律背

反”就是这样论证的，说它有限想不通，说它无限也想不通，只能说整个物质是无限的，个别物质是有限的，整个宇宙是有限和无限相结合。杜林就想把世界看成是有限的，所以他是荒谬的。恩格斯反驳杜林也是这样，恩格斯说杜林讲宇宙有个开始，可是还有一个倒退回去的现象。所以只能说具体事物有一个开始，整个宇宙就没有什么开始。

**（五）道德究竟有没有继承性？**

第 95 页最后一段，恩格斯讲：“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可不是也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或许至少这就是永久不变的道德之一端？上述道德论，表现了同一历史发展上的三个不同阶段，这就是说，它们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就此而言它们已不能不包含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于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的阶段，道德论也必然多多少少互相吻合。自从动产的私人所有制发生以来，在一切存在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的箴言不能不是：‘勿偷盗’。这个箴言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箴言呢？绝对不是。在任何偷盗动机都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从只有神经病者才会偷盗的那个时候起，如果某一道德宣扬者想来庄严地宣布勿偷盗为永恒的真理，那么他将受到如何的讪笑！”

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阶级社会的东西，这种道德论有共同的东西，虽然有不同的道德论，但是这里有些共同的东西，有共同的东西当然就有点永久性。恩格斯是这样设想的。这个意思就是说道德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相同的特点，有共同的背景就可能有相同的东西。不仅如此，对于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的阶段，道德论也必然多多少少互相吻合。他说在经济发展到私有制阶段，道德就有共同的箴言，共同的口号，就是说不要偷盗，讲善恶的标准，偷盗不好，不偷盗就好。勿偷盗被认为是好的，这

是肯定的。这个问题在最早的原始社会不存在，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可偷，只是到了末期才有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就反对偷盗，这跟阶级社会有某些吻合，但是这些吻合不是相等的。恩格斯的说法有分寸，他说有共同社会历史背景的情况下，道德的标准就有某些相同点，有某些吻合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不同的阶段的道德标准是相等的。这是第一。

第二，这种吻合并不等于有了永久的道德。所以没有什么永久的道德标准，没有完全相等的道德标准。恩格斯着重指出两段，勿偷盗这个道德标准在早期原始社会不存在，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几千年里面成为国家采用的道德箴言、道德标准。可是每个时代所采用的标准也不一样，只是有某些吻合。过去社会历史上说的勿偷盗是指的什么呢？主要的是你不要偷盗地主、贵族家里的东西，地主、贵族向农民家里拿东西就不认为是不道德。庄子讲，窃钩者杀头，窃国者封侯。偷窃的标准每个时期使用的范围也不同，相同的就是形式。

关于道德的继承性问题，恩格斯没有讲。恩格斯只讲了有没有永久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应该想通没有永久的道德。现在争论的是道德有没有继承性，现在学术界的争论，我也没有时间看，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很难解答，所以我想暂时不要讲继承性的问题。对旧社会的道德是不是要继承，一般地讲继承是不对的。比如说对封建道德要继承便是错误的，首先它是封建道德，所以我们就不能继承。一般讲，对资产阶级道德也是如此。因为在阶级社会道德的阶级性非常强，它直接反映了阶级利益。哲学中，能反映普遍的客观规律的因素我们是可以继承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辩证法思想是反映客观规律的(尽管它被歪曲了)，我们也可以继承，

当然要批判地继承。道德和法就不是这样的东西。它是直接反映阶级利益的，而不是直接反映客观规律的，所以对过去的道德，过去的阶级意识，我们是采取彻底揭露、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我们对待道德问题的前提。怎样说明有些过去的人所赞成的事情，现在我们有赞成呢？比如岳飞抗金，这个戏我们也演；现在提倡节约的美德，薄一波同志讲日本这个民族有节约的风气，是不是要继承这些东西？这类问题比较复杂，要很好地研究。下面提出几点意见，作为研究的参考。

1. 对过去的人做的事情，有些要肯定它是好的，肯定它有继承的意义，肯定它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过去的人虽然是剥削阶级的，但是他在上升的时候有些行为是起了进步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他这个活动在当时是起进步作用的，但这不等于我们现在就拿来使用。比如资产阶级讲自由、平等、博爱，这在反封建时期起进步作用，要求个人解放，这点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要肯定他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但是绝不是说因为它在历史上是好的，因此我们也完全照搬。关于个性解放，我们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把个性解放。有的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今天就不一定起进步作用，有些历史上最好的，今天可能要反对。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2. 另一种是恩格斯所讲的，在共同的背景下面提示某些道德标准。比如说受到侵略要反抗，岳飞抗金，我们觉得他是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的，所以他在历史上是好的。如今如果我们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要反抗。因此，我们现在赞扬岳飞的精神，并且作为今天教育的一种方法。这就是说，在历史上肯定起了好作用的，今天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采用。就这点来说，今天适当的利用是可以的。比如勿偷窃，从前勿偷窃的意思和今天我

们反对贪污、偷窃的意义根本不同，但是今天可以适当地利用这种形式。这是在有这种条件下运用，而不是简单地继承过去反对偷窃的观点。

历史上的反侵略和我们今天反对侵略有共同性。有共同点，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问题不要一般地讲继承，而是利用这种精神来教育我们今天的人。但是利用的过火了也不行。苏联由于利用历史的东西利用过火了，就搞成大国沙文主义。这是第二种形式。不承认这点，全都绝对了，把过去历史上的东西都不要了，也不行。完全否定了共同的东西也不符合辩证法，这就是矛盾，一方面要批判揭露，另一方面要利用某些形式。

还有一种，尽管人的道德标准本质上是直接反映阶级利益的，可是某些道德标准带有反映客观规律的形式。比如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利用。像节约这个问题，节约能使社会扩大再生产，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节约？就是要使他的资本扩大再生产。所以节约成了一种风气，它体现了发展经济的一种必然规律，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规定一种道德标准，他那个节约是想把劳动者的裤带勒紧，资产阶级自己就不一定，实际上是一种剥削的方法。但是它所表现的客观规律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采用的。节约这个风气能使生产发展，它那里有一部分带有客观规律性的，凡是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采用。这种问题是不是叫继承？恐怕一般的不要用这个名词，但是也不能说过去的东西跟现在的没有联系，也有一些联系。这就是说，过去尽管它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道德标准，但是里面也可能会有一些有价值的可以利用的东西。

关于道德问题，我只能讲这点。有没有继承性问题？这不是继承问题，说有继承性就容易出毛病，剥削阶级的东西无论如何

不能继承，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美德我们要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标准就是要根本决裂。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东西是根本决裂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可以采用。

和这个问题有联系的，就是道德有没有否定之否定问题？否定之否定是否运用于道德问题?这就要看道德有没有发展过程，有没有曲折性。如果有曲折性，就要具体研究一下，不能抽象的讲。从大的方面来说，原始社会的人是原始共产主义的道德，阶级社会出现了私有制的道德标准，以后又出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这就是否定之否定。道德是反映社会的，社会有否定之否定，当然道德也有否定之否定。一般的，大的方面可以这样讲。

对过去的文艺有没有共鸣的问题，我自己是没有研究。不同的阶级有某些不同的东西引起共鸣是可能的。现在的人欣赏过去的文艺有共鸣也是可能的，而且对过去的文艺作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欣赏。比如对《红楼梦》，欣赏的人很多，但是从那里看出好处的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人说这方面好，有的人说那方面好，毛主席特别注意了冷子兴的那段话，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就不注意这方面，而去注意贾宝玉这个人。解放以后对《红楼梦》多是注意欣赏它个人的东西。《红楼梦》也有规律性的东西，像毛主席所看到的冷子兴的那段话，毛主席有时也欣赏被压迫人们的反抗性，像探春、晴雯，他是从这种角度来看文艺作品的。

文艺作品和理论有某些共同的东西，由于它反映某些规律，过去好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规律，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继承。文艺作品反映旧的阶级意识，那些阶级意识我们还是要跟它决裂的。《红楼梦》里面的阶级意识、情调，我们还是要决裂的。但是反映阶级规律的，还可以利用。冷子兴的话总结了一个家庭、一个社会制度的没落规律，我们还可以利用。

**（六）关于真理和错误的问题。**

错误的来源有各种各样。我们工作中最主要的、比较大的错误，是脱离实践的结果，当然也有官僚主义、阶级立场问题。正确的认识总是从实践中来的，而错误之所以产生，第一的、最大的原因是脱离实践。这是第一个原因，这种原因可以使得人们犯很大的、根本性的错误。另外还有第二种情况，即不是脱离实践，而是经验不够，或者是有了经验，概括经验的方法不好，这也会犯错误。这种错误可能比前一种错误犯得小一点，可能在实践的发展过程中自己克服，因为他不脱离实践。前一种错误是应该避免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后一种错误往往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只能在进一步实践中丰富经验，学会更好地概括经验。我们总结1958年以来的错误，大量的是后一种错误。

关于真理，真理和谬误的关系问题。真理，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有两个意义，客观真理中就有绝对真理，但是客观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有绝对的一面。总的是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相对真理的全部就是相对真理的无限总和，任何时候也不能把相对真理的全部统统认识完。相对真理都有绝对的一面。任何一点相对真理都有绝对的方面。所谓有绝对方面，也就是因为它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

真理和谬误的转化问题。大家可以看看第92页的那段话，恩格斯在这里肯定了真理和谬误可以互相转化，真理可以变成谬误，谬误也可以变成真理。同时也讲到真理和谬误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如果超过这个条件，真理就会变成谬误。真理和谬误可以互相转化就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讲到真理和谬误的转化问题。毛主席在《谁说鸡毛不能上

天》这篇文章的按语中讲了辩证法，当时搞合作化，富裕中农反对，贫农坚持要搞。富裕中农就挖苦他们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毛主席指出，这对合作化是一种障碍。“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不能上天这个从古以来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就不是真理了，就要变成谬误。所以真理是有条件的，真理的相对性是受一定历史条件限制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是真理，超过了这个条件，就会变成谬误。恩格斯在这本书里用的是波义耳定律，如温度不变，气体的容积和加在它上面的压力成反比例。在这样的范围内波义耳定律是真理，如果超过这个条件，就不是真理，所以真理可以变成谬误，谬误可以变成真理。恩格斯肯定了这一点，肯定的原因，就是因为真理本身包含着自己可以变成谬误的因素。真理本身是矛盾的，它是真理，就带有普遍性，为什么带有普遍性？就是只要这种条件存在，它就是真理。所以它有普遍性，可是这个普遍性又是有条件的，又是相对的，这就是它的矛盾。它有相对性，可是它还有普遍性。鸡毛不能上天这个真理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普遍性，这

是就这个条件来说，它有这个条件就是真理，就有普遍性。可是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历史条件，所以又限制它只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才能是真理。因此它就有矛盾，它不是绝对普遍的。又是普遍，又不是普遍。如果这个条件不存在，就变成了谬误了。

另一方面，真理是由我们人来认识，真理都只能是近似的。百分之百的一点误差也没有的不是真理。除非抽象的讲，真理和谬误一点联系也没有，如果这样看当然是真理，绝对真理没有任何一点谬误的因素。但是实际上真理只是人认识的真理，没有离开人的认识抽象的存在宇宙中的真理。唯心主义者说，整个宇宙就是真理，那是黑格尔的说法。唯物主义的说法是，真理都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客观世界无所谓真理，客观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以及它的运动规律，它的本质，它无所谓真不真，也无所谓假。客观事物也没有什么谬误不谬误，它就是事实。所以客观物质本身没有真理和谬误的问题。真理是人认识的真理，没有离开人的认识客观存在的真理，所以凡是真理总是具体的。我们说具体就是人自觉的最大限度近似的认识客观情况，这就是真理。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真理，就应该承认真理是可以包含谬误的因素的。真正存在的真理不可能是纯粹正确的，总有点误差。只要能做到近似的反映客观事物，就是真理，就不是谬误，应该肯定这点。哪怕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还有百分之十的误差，也应该说是真理。《资本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规律，也是近似的反映。不然为什么列宁还要写《帝国主义论》？还是讲得不够，所以还可以补充。甚至个别真理还可以在进一步社会发展过程中加以纠正，或者是按照新的条件加以改变，所以真理里面难免会包含着某些谬误的因素。但是不能因为它包含着谬误的因素就说它又是真理、又是谬误。矛盾的主要方面最大限度的近似就是真理。恩格斯在第 93 页

讲:“这样他或许就把自己的本来是正确的结论变成为错误，而与这一错误相较，则包含少许错误的波义耳定律可以说是真理了。”包含某些错误因素的真理就不能说是错误，就应该说是真理。在原则上说真理就是真理，错误就是错误，抽象的、原则的讲应该是这样。所以从原则上讲真理不包含错误。但是人们认识真理都是具体的，不是纯粹的原则，人们认识具体的真理都可能包含某些错误因素。

所以，真理不包含错误这个说法太绝对了。恩格斯在这里肯定真理是包含错误的，不等于没有条件限制。所以我们叫真理的东西总是包含某些不足，可以补充，可以在个别部分加以修改。这样了解问题才有好处，免得我们的思想僵化、凝固，变成思想僵化的人。这样有利于人们认识的发展、真理的发展。

我这样讲是不是和现在报纸、杂志上的论战有点不同？恐怕有点不同。现在的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相对真理都不包含错误；一种是主张真理就不包含错误。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很生硬。恰当地说，真理因为是人认识的真理，所以是具体的，是近似的，总是会有点误差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关于《自然辩证法》中《〔札记和片断〕》讲解*

(1964.3)

## 第一次讲解

(1964.3.3)

今天辅导《自然辩证法》的《〔札记和片断〕》中的辩证法问题。

这里有两部分要辅导，我想把第一部分的一些问题简单地说一下，再着重讲第二部分。同时，顺便把《〔札记和片断〕》总的内容也介绍一下。

《〔札记和片断〕》是恩格斯的一些笔记，内容有点像列宁的《哲学笔记》，随时读书，随时研究，记下一些感想。当然这些感想都是经

* 1964年3月初，艾思奇按照中央高级党校教学计划安排，应59班、60班哲学专业学员的要求，辅导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札记和片断〕》，共辅导三次，按所讲解的主要内容，我们分别标了“关于辩证法问题”、“关于辩证逻辑问题”、“关于认识论问题”，讲解中内容有所交叉，事实上，艾思奇在辅导中贯穿了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是统一的东西的思想。1979年7月5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按速记稿做了初步整理，印发给校内理论班哲学专业的学员参考。现在又做了进一步整理。原稿用的《自然辩证法》原著，系1955年中文版，现加注了1971年中文版页码。

过考虑的，也是很有价值的。这本书恩格斯自己没有编，而是出版时经过编辑的人编的，大体上是按照恩格斯原来的顺序编的。

## 一、关于辩证法问题

《自然辩证法》中《〔札记和片断〕》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讲辩证法总的规律；一部分是讲辩证逻辑和认识论。这一章的内容虽然是一些零碎的笔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方面价值是很高的，内容可以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相媲美，意义都很大。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许多问题是发挥了这个札记的思想。恩格斯在这里专门对辩证法和辩证逻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把意见写出来。这种著作在马克思主义著作里面是很少见的。列宁在《哲学笔记》里面讲到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是统一的东西，这个思想可以从恩格斯的札记中看到。为了更好的了解列宁的《哲学笔记》，先学习《自然辩证法》这部分是很必要的。

《〔札记和片断〕》对辩证法问题讲得很全面，比如第一部分，辩证法的一般问题，基本规律、基本公式，开头几句就很全面地讲了。当然他没有直接讲否定之否定，量变到质变，对立统一的规律，不过最主要的内容这里讲得很全面。开头一句很重要，客观辩证法也讲了，主观辩证法也讲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整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的反映而已（主观辩证法是讲认识论和逻辑的，它不过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艾注），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以其最后的互相转变或转变到较高形态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自然辩证法》第174页，新版第189页）对立面的东西经过不断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最后互相转化，或者是转化到较高的形态，这样就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这

个观点非常重要。

我们读这段的时候，可以想一想毛主席经常讲的辩证法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矛盾论》里面，还有后来的政论文章如《1957年夏季的形势》，都提到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首先是矛盾的法则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前进。对立面经过斗争转化为自己的反面，或者是整个事物转化为反面，或者是一个事物转化为它的反面。但是如果斗争得不好，正确的思想也会转化为错误的思想。

对立面的转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向前进的方面转化，一种是倒退的转化。我们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能使我们中国向前进的方向发展。错误的思想可以转化为正确的思想，模模糊糊的正确思想也可以转化为很清楚的正确思想。有的人有错误思想，经过斗争，可以向正确的思想转化，这是向前进的方面转化，是事物的前进。但也有向倒退的转化的。

转化的中心问题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统一不成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统一物的对立面，所以中心问题是斗争问题。经过斗争，或者向前进的方面转化，或者向倒退方面转化。我们观察问题的方法是一分为二，就是找出对立面然后展开斗争。矛盾暴露清楚了，然后就展开斗争，力争使对立面向前进的方面转化，这是我们运用辩证法总的方针。

恩格斯这段话，把辩证法的核心，重要的内容，比较全面地阐明了。列宁后来讲的东西，毛主席全提了，有些细节更充分，更展开了。

这段话很重要，《〔札记和片断〕》的第一部分，整个贯穿着这个思想。这段话里面还有一点，特别强调了不断的斗争，谈到了斗争的绝对性。我们上学期学习《反杜林论》的时候没有学到这

点。《反杜林论》是反驳杜林的机械论错误，杜林主要是用外力对抗来代替对立统一的规律。因为恩格斯要谈这种观点，所以强调对立的统一，谈到对立面互相渗透，就没有谈斗争。在和杜林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没有着重提对立面的斗争问题。如果我们片面地解释恩格斯的著作，根据《反杜林论》就说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就错了。因为在那个论战里面任务不是需要着重谈斗争，主要的是要解释对立面是内在的对立面，不是外力的冲突。在《自然辩证法》中，对斗争问题都提到了，不看《自然辩证法》就可能曲解这个问题。

恩格斯不但是一般地讲对立面的不断斗争，引起对立面的转化，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而且特别讲到斗争。可见，对立面的斗争性并不是专指人类社会问题，可以说，斗争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也表现在自然界。苏联有一个时期展开了很大的争论，自然界有没有对抗性的斗争，最后得到一致的意见是没有。按照恩格斯的著作就不能这样解释，自然界不断的斗争，其中自然有对抗，而且这里讲到自然界生活。首先讲到吸引和排斥，在一定的时候可以作为对抗来解释，地球有吸引力，把一个东西从高处引到低处来，结果就要发生冲突。恩格斯在这段话里不但一般地讲了，而且举了具体的例子。

下面讲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比如父亲的特点遗传给儿子，但是儿子又要适应新的环境。这两种倾向中的矛盾，就要不断的斗争，但不能说是对抗。一个人自己身上为了要适应现在的环境，是不是跟自己祖先的特点对抗？可以说不是对抗，但还是斗争。因为列宁讲互相排斥就是斗争，适应和遗传就是互相排斥，所以就有斗争。

下面一段讲到“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的问题。恩格斯

讲“非此即彼”的时候，是讲对立面的斗争发展到顶点，发展到立刻要向对立面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非此即彼”。但为什么会出现“非此即彼”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原来有个“亦此亦彼”，原来是对立的统一，这个统一物里面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原来就有对立，就有差别。活着的人是活着的，但是也可以说有死的因素。原来就有“亦此亦彼”，原来就是对立的统一。所以，对立面经过斗争到一定程度，就“非此即彼”，这不是外在的突然来的，因为原来内部有“亦此亦彼”。先有“亦此亦彼”，然后才有“非此即彼”。以后恩格斯始终是讲统一性中有对立面，都是向“非此即彼”的东西转化，讲辩证法一般的是讲这样的问题。其中特别举了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在搞科学研究的时候，就要考虑“非此即彼”，因为科学是从偶然中找必然的规律，因此就要撇开偶然找必然性。但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在任何时候，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大体上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开始时偶然性占优势，但包含着必然性，发展到最后，必然性占优势，这里就有“非此即彼”的问题。事物发展到最后，必然就暴露在表面，但是新的事物在萌芽时期往往是通过偶然的因素出现。

大家让我讲抽象的同一性这一节，这节也不是太难懂，这节自始至终就是要解释世界上没有绝对同一的东西，任何同一性都是内部包含着差别、对立的必然性。没有一种纯粹的同一性，也就是抽象的同一性。抽象的同一性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既然是形而上学的思想，为什么能在人的脑子里起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时免不了要把事物的某一个方面抽出来单独地研究，要研究同一性的东西，在人的头脑里就把差别性撇开。人的主观思想有这种能力，也有这种习惯，这种能力对人是

有好处的，便于人们对事物的分析、解剖。

研究同一性的时候，暂时把差别性摆在一边，在数学上研究数量的时候，把质量放在一边，客观世界没有抽象的1、2、3……10，世界上有的就是一个人，两个人，一间房子，两间房子。但是我们人的脑子能把一个人，两个人，一间房子，两间房子放在一边不讲，专门考虑纯粹的1、2、3、4、5，……这个纯粹的1、2……5，就是抽象数量的同一性。在实际生活中，任何数量同时都是质量，任何一个数目不和质结合，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数都和具体的质结合。所以数量抽象的同一性在原始世界就没有。但是人的头脑，人的理性有这个能力，在脑子里设想脱离各种各样质量的纯粹数量。他可以设想一条线，只有长度没有宽度和高度，如果有宽度和高度就不是一个数学上的长度，而是一根棍子。这种数学上的长度，在世界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但是人的脑子可以设想，这是长度，除了长以外不包含任何东西，不和长以外的任何数量相联系。世界上没有哪个资本主义不夹杂着封建的东西，或者夹杂着其他旧的不纯粹的东西。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英国还有女皇。它是资本主义，但是它又有封建的遗留，可能还有公侯伯子男。可是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时候用英国做典型，这个资本主义和一些非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关系。人有这种能力，能把复杂的客观事物某一方面抽出来单独研究，这是人的高级思维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也使人的思想有可能养成一种形而上学的习惯。就是不能由于把同一性看成抽象的东西，认为客观事物的同一性也是抽象的，脱离活的辩证法。人的这种能力叫抽象能力。抽象能力是好的，但是，不要因为运用了抽象能力结果，产生了一种抽象同一性的观点。我们研究数学上某个数的时候，可以把它抽出来研究，但如果因为这种研究引起我们一

种认识，认为客观世界可以有一种纯粹的数就不好了。

我们运用抽象能力研究问题，才能研究得深，撇开一切复杂的影响，专门抓住最本质的东西，用抽象的能力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抽象的能力来研究。但是我们运用抽象能力的时候要避免产生抽象同一性的观点，不要以为世界上存在抽象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和自己的对立物没有联系。这种观点就错了。《资本论》里所讲的资本主义，虽然是脑子里概括出来的，但是，他每讲一段抽象的原则，都要引用具体生活中的统计材料来认识，除了抽象的分析以外，还加上具体材料作证明。比如，在积累那部分，积累的结果资本家越富，工人越贫穷，这是一个趋势。讲完这个趋势，把英国的实例，统计材料拿来具体的充分的加以证明，这样就可以避免纯粹的抽象研究。当然，这里讲抽象的同一性问题，主要的是讲否认内部有矛盾的同一性。《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虽然是用抽象法来研究，但是他经常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反对资本主义的势力，就这点来说它的性质和抽象同一性根本不同。一方面研究资本主义，同时研究资本主义自己产生的反资本主义的力量。研究任何东西都不要只把它当做统一的，而要看到它的内部会产生破坏它的力量。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也不要把它看成天下太平，要看到社会主义里面，也存在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毛主席是彻底的辩证法，他一开始就注意到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矛盾。1956 年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系大体上开始建立了，那时就考虑了社会主义矛盾，就提出十大矛盾，十大关系问题，提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都可以一分为二。而且永远有矛盾，永远可以一分为二，将来共产主义实现了，也还要一分为二，有先进和落后等等。一万年之后，还有先进和落后之分。

第 177 页（新版第 192 页）第 6 行，已经都讲了，现在讲第 7 行：

“然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及其诸范畴却还继续存在。”这句话非常有现实意义，有普遍作用。我们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我们是搞革命的。革命斗争也经常破坏抽象同一性的观点。

自然科学也有这个问题，古代讲的物质不可分的最后单位就是原子，后来化学发展了，证明原子内部还是复杂的，并不是不可分。主要的是镭的发现，原子一分，就有了电子、质子、中子。镭的发现破坏了形而上学，也破坏了原子抽象的同一性，这时有了辩证法。电子学说一出现以后，自然科学得到一个胜利，但是立刻又回到老的观点，认为电子、中子、质子是最新的，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叫基本粒子，这是物质最基本的东西。列宁在1908年就说：电子也是不能穷尽的。就是说电子还可以一分为二。但是列宁不是自然科学家，他们看不起列宁。一直到现在有些自然科学家还是把电子叫基本粒子。这种思想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抽象同一性的观点。如果说电子不可分，为什么电子有阴电子和阳电子，另外阴电和阳电结合起来还可以变成原子。有些内部原因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也有些已经搞清楚了，比如电子有什么自旋，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想的自旋？很难说，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特点，中子还可以分很多种。所以值得警惕的就是形而上学。抽象同一性的观点经常要来进攻我们。所以，要经常保持辩证法的高度自觉性，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有人认为176页（新版第191页）第一段：“由量到质的转变＝‘机械的’宇宙观”，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把质归结为量，另一种解释就是反对由量到质的转变是“机械的”宇宙观。现在看起来，后一种解释妥当一点，因为“机械的”三个字是打括号的，说明是引用别人的，不是恩格斯自己的意见。有些人认为，“由量到质的转变是‘机械的’宇宙观”，就是量的转化改变了质，这种

意见是错误的。最后一句话，“绅士们从没有猜想到这点！”绅士们就是指那些形而上学者。因此他们把它叫“机械的”宇宙观。

有人问，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是否有共同的原则？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形而上学是一种错误的、片面的世界观，形式逻辑是一种关于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专门研究人的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和规律。所以形式逻辑不等于形而上学。因为人的思维可以不遵守形而上学，但是一定要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律，人的思维起码要符合形式逻辑。当然，有人可以把形式逻辑的规律曲解为形而上学，就是说它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它的公式 a 为 a，或者是甲是甲，这个规律可以曲解成形而上学的规律，可以把甲是甲解释为甲和甲是绝对相同的。

第 178 页（新版第 193 页）第 3 行，恩格斯讲：“旧的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的世界观的基本原则：a＝a。每一事物和它自己相同。”就是说 a 和 a 绝对同一，没有差别。这种解释是形而上学的，是把形式逻辑解释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形式逻辑的规律并不等于形而上学，形式逻辑的 a 等于 a 的规律，在形而上学看来是绝对同一的规律。前一个 a 是 a，后一个 a 也是 a，实际上不是这样。形式逻辑的第一个 a 和第二个 a 有区别，头一个 a 叫主词，后一个 a 叫宾词，主词和宾词代表两个不同的概念。把这个公式具体化，比如人是动物，人就是主词，动物就是宾词，a 是 a 就是：人是动物。但是人是一种具体的高级动物，动物是一般的动物，人这个范围比动物小。动物的概念可以叫普遍概念，人可以叫特殊概念，或者叫个别概念。所以，a 是 a 这个公式是表示主词等于宾词，不是主词等于主词，不是人等于人，或者是动物等于动物，而是人等于动物。或者再逻辑一点，叫特殊概念等于普遍概念，或

者叫个别概念等于普遍概念。它并不是简单的a等于a。所以这个同一是有差别的同一，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包含客观的意思，它的意义也是有差别的，包含不但主词和宾词相等，还有一种逻辑上使用的概念前后要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接近抽象的同一性。比如我们说，我们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写文章的时候，解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意义，前后都要一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在任何一篇文章里面，这个名词都要这样解释，不能前后不一致。形式逻辑在这个问题上要求概念一致、论断一致。人是动物，就要始终承认人是动物，你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就要始终承认。但是要求名词前后一贯，并不等于要求对名词概念用绝对同一性来解释，思想要一贯，讲也要一贯，看矛盾要一贯，研究矛盾也要一贯。这和抽象同一性有点接近，但并不等于抽象同一性。

上一段就是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做了总的叙述，下面讲对立面的同一性。这里举了偶然和必然的例子，否定之否定只提了一下，没有正式讲。

下面讲辩证逻辑和认识论。

1930年以前讲辩证逻辑，1930年以后主要的是讲认识论。大体上是这样分的，因为辩证逻辑和认识论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和认识的发展结合的。认识论里面也有辩证逻辑，而辩证逻辑和认识论又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基本表现，逻辑和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所以这一部分札记虽然也不是有系统的东西，但大体上还是有条理的。一开始还是解决物质和精神，认识和自然的关系。它有一个题目叫“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实际上也就是讲的认识和存在的统一，精神和物质的统一。

这一段是讲精神应该是自然界的反映，理性认识也是自然界的反映，意思是这样的。但是他的提法，他所采取的叙述形式，我们看起来有点难懂。难懂的原因是有许多提法，借用了黑格尔的语法。他的札记，一方面是研究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是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所以这里着重是讲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很好的评价，利用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解决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因此有许多说法现在看起来比较难懂。比如“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这句话可以说是黑格尔的说法。我们要理解这句话就要用列宁告诉我们的方法，用倒转的方法。因为他是札记，很快写下来的，而且不像《反杜林论》是写给别人看的，他是为了将来写给别人看的参考，所以就按照黑格尔的话写下来了。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理性是自然界的反映，如果按照原来的顺序讲，就是自然界不能不反映为理性认识，或者倒过来讲，理性能反映自然界，理性不应该不反映自然界，这样来了解自然就通了。

这里说，“希腊人已经是不证自明的了”。希腊人所有大的哲学家认为，了解自然界要通过理性，不能通过感性，通过感觉不能真正认识自然界，只有通过理性，才能真正认识自然界。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争论，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是辩证法的，认为自然界是不断变化的，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巴门尼德是另一个学派，主张自然的本质是不会变的。这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庄子的《天下篇》里面讲的“飞矢不动”，箭本来是飞得很快，但是他说这个箭不动。巴门尼德这派人就是这样的主张。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箭动是你的感觉，你用理性去了解它，就知道它不动。他的理由很怪，看起来似乎又有点对，如果说箭是动的，必然要从这一点动到那一点，由这点动到那点就必须通过甲

点到中点再到乙点，这样动下去中点是无限的。首先问你承认不承认从甲点到乙点中间通过无限中点，两点中间的距离可以无限分的，因此是有无限的中点。既然看到通过的中点是无限的，就是说它永远也通不过。他就是这样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在古代人是了不起的，一下子反驳不了。有一个故事，巴门尼德派有一个人和赫拉克利特派的一个人争论，这个人原来在洗澡，搞得他没办法，一着急从澡盆里走出来了，他说，你看我可以走出来，不过这是你的感觉，你要用理性想一想，我也不能走出来。赫拉克利特派就不是这样看，他说，我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变的，但是由感觉来看，石头山都不能变，你要用理性来思考，山也是变的，石头也是变的。这就是说，只要大家用理性思考，结果大家就觉得应该不成问题，没有人要求证明它。恩格斯这段话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不需要用理性来证明，人的实践中就可以证明，希腊人谁也知道，已经成了习惯，成了不证自明的道理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主要的是批判经验主义者。他在第 184 页（新版第 200 页）里面讲："现在最愚蠢的经验论者甚至还用他们的推理（不管是如何地错误）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深信：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这句话是说，有许多经验主义者是很愚蠢的，认为用理性不能认识自然界，所以理性和自然界不矛盾。实际上，认识自然界主要的是实践问题。经验论者不讲实践，他们认为单凭观察、感觉就能认识，把感觉看成是惟一可靠的认识工具，靠感觉、观察来认识人类，认识自然。他对理性的实在性不相信，实际上他不相信理性是否真正反映自然界的本质。有些经验论者就变成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多半是从经验论者来的。后面恩格斯引的休谟就是不可知论，也就是经验论者，经验论者事实上就是不同程度的不可知论，因

为他认为人只能根据感觉认识现象。事物的本质，事物的规律性，究竟是不是确实存在，这要通过感觉来判断，但是不能证明是不是客观存在。

为什么恩格斯要讲经验论呢？就是因为经验论者本身就怀疑理性的确实性、实在性，因此，有些经验论者就不得不百般想办法，证明一切理性认识是符合自然界的。有些经验论者怎么就相信理性是符合自然界的？恩格斯这话是反话，实际上是说不相信。因此才想办法证明，本来是用不着证明的，长期实践已经证明了。恩格斯的这话还有这样的意思：经验论者要证明他一开始就深信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但是他们相信了没有？没有相信。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经验论者实际上不相信理性。这些经验论者是一些什么人呢？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都讲到了，早一些的是德国的黑尔姆霍兹，后来是英国的赫胥黎。这些人是经验论者，也就是不可知论者。这种不可知论者和后来的不可知论者不一样，他们不是不承认唯物主义的原则，但是又表示对唯物主义怀疑。他们的理论是，科学上发现的自然规律，的确是有效的，这点肯定要相信，但是这种客观规律究竟是不是最后符合于物质本来的情况，我们还是不能知道。这些规律运用起来是客观有效的，可是，是不是符合于物质的本来面目就不知道。多多少少承认一点唯物主义的原则，人的思想反映客观规律，羞羞答答地承认一点，但又不敢承认这个规律本身就是物质本身，或者是这个规律来自物质，来自实体，他只承认理性认识对自然界是有效的。这段话批判的经验论实际上是不可知论。这是认识论的一个前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先要肯定精神和自然界的同一，理性能反映自然界。这段话的意思正面阐述了这点。

物质的前提讲完了，后面就讲逻辑。

逻辑主要是研究概念的，人的理性认识的特点，就是用概念、推理、判断的形式来反映事物，所以辩证逻辑也和形式逻辑一样，就它研究的直接对象来讲，是研究理性概念的关系。所以，184 页（见新版第 200 页）（乙）第二段一开头就讲："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本体和变体）的发展对于它在个别辩证学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对于它在胚胎学中的发展（或者不如说是它在历史中的发展以及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

第二段主要是讲：辩证逻辑总的要求是什么？总的要求就是研究人的概念是怎么发展的，怎样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种发展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发展的。原始人的概念就比较简单、粗糙，现代人的概念就很复杂、高级。形式逻辑就不研究概念的历史发展，而辩证逻辑就要研究人的概念的历史发展，或者一般的说研究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理性思维的发展就是概念，所以又可以叫概念的历史发展。黑格尔的《逻辑学》里面专门讲辩证法的部分可以叫概念，就是因为逻辑的直接对象是研究概念的运动，这是辩证逻辑总的要求。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不同就在于形式逻辑把概念、判断的思维形式加以排列分类，不研究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概念的发展规律）。辩证逻辑是怎样研究人的思维发展规律呢？研究的方法就是把整个人类思维的历史加以直接概括。人的思维历史要经过几千年、几万年，有很多经验，概念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连续发展经过几千年。辩证逻辑就是把这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过程，把它的基本规律概括起来。因此，几千、几万年的历史，可以在一个小小的例子里说清楚，因为只讲它的基本规律。

恩格斯这段话是做了比方的，他说："……辩证学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对于它在胚胎学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胚胎学就是研究一种动物在胎里发展的情况，从一个受精卵子开始，最后成为一个动物。胚胎学研究的过程得到一个什么规律呢？这是动物在胎里面的发展过程，由一个受精卵子成为一个动物，比如成为一匹马要几个月的过程。胎儿的变化等于重复一遍生物进化的过程。生物的进化要有几万万年，但是在胎儿里面由单细胞的卵子，变成成形的马、猴子，虽然时间那么短，但大体上重复了生物的进化过程。单细胞分裂，就变成最简单的生物，慢慢地就变成类似鱼的形态。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在胎儿里有尾巴，到了六七个月的时候就没有尾巴了。这是由单细胞到简单的生物，然后变成鱼、再变成走兽形状的东西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辩证逻辑里面也是这样，基本上重复了人类从原始人一直到现代人的思维发展过程，从最简单的认识到最复杂的认识，并且要研究这种过程，研究一个人由一个简单的概念起，最后形成一个最复杂的概念，也就是能反映自然界的概念，经过一个什么过程，是研究简单的思维怎样变成复杂的思维能力的这种过程的。这就是辩证逻辑总的任务。黑格尔的逻辑学虽然是唯心的，有荒谬的东西，但是大体上是按照这样的原则研究的。最初研究最简单的概念，叫纯概念，一直到最后研究到最高的概念，能把主观和客观统一起来的概念这样一种过程。总的来说，辩证逻辑学是能表明人的思想发展过程、思想发展规律的。

现在讲第三段（见新版第200页）。前两段讲了以后，特别是第二段讲了辩证逻辑，下面就好说明了。

第三段是讲抽象的和具体的。

这段就是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了解抽象

的和具体的是统一的，所以把抽象的和具体的当做一句话。辩证逻辑要求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统一起来，不要把抽象的和具体的绝对离开，抽象的东西中有具体的，具体的东西中有抽象的。下面举个例子，“运动形态变化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态变化的任何个别‘具体’例证更具体得多。”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一般规律应该是抽象的，个别具体的例子应该是具体的。但是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一般规律里面有具体的东西，而且甚至比任何个别具体的例子更具体得多。如果把一般规律的某一方面拿来看，可能就不具体了。比如全部《资本论》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没有讲哪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当然以英国为典型，但是也不完全是讲英国。《资本论》里面除了英国以外，任何国家都可以用，当然要讲《资本论》的某一节，那是另一个问题。比如第二章第一节只讲商品，这就没有具体讲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情况，没有个别具体的东西那样具体。但是把整个的拿来跟个别具体的国家来比，把整个《资本论》全部叙述的东西拿来和马克思那个时候所知道的英国资本主义来比较，就琐碎的现象来讲，英国可能比《资本论》所讲的还丰富一些，《资本论》里面就没有公侯伯子男，也没有女皇，英国就有，有很多混杂性的东西，可是就资本主义本身的规律来说，英国这个资本主义是不是能表现像《资本论》中所讲各种规律，这些规律是不是在英国完全暴露了，也不一定。有些原理不是从英国概括出来的，是从德国、法国概括出来的。总的来说英国是典型，但在某一个问题上英国又可能不是典型。所以就这方面来说，《资本论》就资本主义本身的规律暴露的全面性来说，要比英国资本主义丰富得多，具体得多。因为《资本论》虽然以英国为典型，但是它不仅以英国为典型，它还概括了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东西，甚至于俄国的

情况也概括了。而且他叙述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商品叙述起，从资本主义的产生说起。所以这里有些规律不是纯粹表现英国的。总的来说，虽然作为一般的规律是抽象的，但是一般规律把一个事物的发展总过程全部暴露出来，它就具体了。就它一部分一部分来说是抽象的，一章一节都是一些抽象的原则，一章讲商品，一章讲价值，一章讲货币，一章讲劳动者。这样每一章把整个资本主义有机体的一部分抽象出来，当做纯粹的东西来叙述，综合全书就反映了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发生、发展、一直到灭亡的过程。《资本论》第一卷就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要灭亡，但是当时英国没有灭亡，正在上升；指出剥夺者要被剥夺，但是英国的剥夺者没有被剥夺。所以，辩证逻辑一般的规律，比认识一个个别的、具体的例证更具体得多，因为它更全面、更丰富。

辩证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把一部分一部分抽象的原则，综合成一个具体的事物由发生、发展到灭亡的总的规律。把一部分一部分抽象的东西综合成具体的东西，这叫由抽象到具体。辩证逻辑要求由抽象到具体，把一个一个的抽象原则联系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具体的，某一个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总的过程，这个逻辑上所反映的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和具体事物发展的历史中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也和第二段所讲的关系一样，一个事物的发展历史和胚胎发展的历史一样。

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几百年，由发生、发展到灭亡。从15世纪就有资本主义了，到现在已经四五百年，将来可能还有几百年。这么长的历史在三部《资本论》里就反映完了，甚至第一卷就反映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回头看一下，它的基本过程和《资本论》是一样的。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只有几万字，把八年抗战的历史都讲

清楚了，那还是1938年抗战的第二年写的。抗战胜利以后，回头来看，抗战的发展过程和毛主席描写的过程一样，就基本过程来讲，没有超出持久战的原则。

所以，这节里面讲的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不是指一条规律，是指辩证逻辑所阐明所反映的某一事物由发生、发展到灭亡的总的基本规律。这种基本规律比任何个别具体例子更具体得多。《论持久战》里面所讲的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过程，在某种意义来说，比我们八年抗战更完全一些，八年抗战的反攻阶段，由于苏联的参战缩短了，没有完全按照《论持久战》所讲的规律充分暴露出来。没有苏联的参战，可能抗战还要打几年，可能更充分地暴露《论持久战》中所讲的过程。

我们学习辩证逻辑主要就是学会这种本领，学会在思想上把一个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基本上反映出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那些矛盾，最后把这些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指出它的结果。比如资本主义的剥夺者要被剥夺，这个结论的产生就要分析很多矛盾，比如商品和价值的矛盾，货币和商品的矛盾，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步一步地暴露。各种矛盾暴露清楚了，然后掌握这些矛盾的联系，就提出一个总的结论，所有矛盾汇集一个结果，就是剥夺者要被剥夺。

平常反映一件事是怎样发生、怎样发展，矛盾是怎样萌芽出现，怎样展开的，由一个萌芽的矛盾变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矛盾逐渐复杂，最后经过各种各样的斗争，得到了解决。好的文艺作品就有这样的本领。比如《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从矛盾的萌芽开始，五花八门的事情都暴露出来了，归根结底是两种人，一种人是压迫者，一种人是被压迫者，这两种矛盾斗争的结

果，大观园没落了，贾宝玉出家了。那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出现，所以没有资本主义的前途。文艺也讲辩证逻辑，这是封建社会一个一般的规律在那里的表现。

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掌握辩证逻辑，也就是要掌握这个本领，先是一条一条的抽象，先把矛盾加以分析，然后再把矛盾联系起来加以说明，最后的结果得到一个事物发展中的规律。《资本论》就是辩证逻辑的一个典型。以后我们还要学习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说明人类的思维，由发生到发展，由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程，由最简单的概念一直到最后理论的形成要经过什么步骤。《资本论》就是运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方法，从最简单的思想，最简单的概念说起，然后回顾资本主义的全部矛盾，得到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出现的结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这几年就有争论，突出的是王亚南和吴传启的争论。王亚南认为《资本论》的方法主要是辩证法，不是辩证逻辑。吴传启反对他的意见，认为《资本论》的方法不是辩证法，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的方法。这个争论如果大家好好研究对方的意见就可以综合起来。《资本论》就方法来讲，当然是辩证法，但是这个方法在逻辑上的表现，是辩证逻辑。这个方法是一分为二，表现在概念上也是一分为二。首先分析商品，把商品一分为二，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根据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来看运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使商品向前发展。这个发展经过三个阶段三种价值形式，单纯的价值形式，特殊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经过这三个阶段就出现了货币，货币和商品又发生矛盾，而货币又是商品的一分为二。原来只有一个商品的概念，一分为二，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抽象概念中的一个抽象概念变为三个抽象概念：单纯价值，特殊价值，一般

价值。货币和商品又发生矛盾，货币如果一发展，又出现了资本。这样不断的抽象，又不断的综合，结果由于抽象越来越具体，不断的抽象就不断的更具体，最后反映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所以辩证法的方法和辩证逻辑是一个东西。马克思运用辩证法不是抽象的运用，他在理论上要通过概念的分析，概念的发展，必然要表现为辩证逻辑形式。辩证逻辑的形式就是由抽象到具体，不断分析，不断综合，不断抽象，不断的又更具体，具体以后，又抽象，又更具体，最后得到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所以，这个争论可以综合起来。他们的文章我没有仔细看，谁是谁非也不能判断，似乎王亚南这方面对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联系看得不够一些，只着重辩证法。分析矛盾的方法，一分为二的方法，辩证法必然要表现为辩证逻辑才能在理论上实现。客观辩证法使事物的矛盾暴露，在理论上反映客观辩证法，就要暴露矛盾，就要解决矛盾。

第四段（新版第 200—201 页）讲悟性和理性。

黑格尔规定人的感性认识以外，还有理性认识。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看法，人的认识有两种能力，一种是感性能力，一种是思考能力。思考能力又分为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悟性是一种单纯的思维能力，是比较低级的思考能力，理性就是辩证思维，是高级的思考能力，只有人类才有这种思考能力。一般的讲，动物只有感性认识，只有人类才真正有理性认识。但是事情也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一般地讲动物只有感性认识，那么就一点理性认识的因素也没有了吗？还应该用“亦此亦彼”来认识，高等动物已经有了理性认识的思考能力了。恩格斯的这段话是指这个意思。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能力，比如狗是四足的食肉动物，鸟是两足动物等，对未知对象加以分析，高等动物像猴子能把果实打开，这是分析的开端。某些综合能力，动物

例如狐狸也有狡猾的伎俩。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某种动物会实验，比如啄木鸟就有综合和分析能力，它知道某种声音有害虫，某种声音没有害虫，对树有实验的作用。运用它原来的经验去实验这个树，如果它听到有虫的声音，就进一步用舌头伸进去把虫吃掉。动物也有这种实验的活动，所以这种能力在本质上人和动物是相同的。高等动物也有这种综合、分析的能力，但是都是表面的、外部的，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

人的特点就是辩证的思维，在第185页（新版第200页）第八行恩格斯讲，辩证的思维“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这是黑格尔的话。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的概念本性就是内在矛盾，辩证的思维就是以研究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为基础。这种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这种思想，在黑格尔的著作里没有，因此他只提出概念本性。在黑格尔看来，概念就是客观存在，唯心主义者的概念本性，也就等于唯物主义的客观事物的本性。这种能力只有对人才是可能的，而这个人还不是原始人，还是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这里恩格斯举了佛教徒和希腊人，他没提中国人，这不是看不起中国，是因为恩格斯对中国的材料不熟悉。我们中国古代人有很多辩证法的思维，从老子起就知道概念本性，正反的联系。相反相成是我们中国很早的话。下面恩格斯接着讲：“而其完满的发展则更晚得多，在近代哲学中才达到；虽然如此，可是早在希腊人中间就有了预示着后来研究工作的巨大成果！”

化学研究的方法首先是分析，但是也要综合。

下面讲判断。

判断问题可以举出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辩证逻辑是什么东西，整个判断这一段的基本思想是从黑格尔的著作里面发展起来的。

这一段一开头就讲："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像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把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论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形式逻辑的排列是按照外表的形式排列的。形式逻辑的判断大体上有四种，一种叫否定判断，一种叫肯定判断。人是动物，是肯定判断；人不是植物，是否定判断。还有一种叫全称判断，讲总的，所有的人都是能说话的，这是全称判断。再一种是特殊判断，是讲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某一个特点。全称判断就是普遍概念和特殊概念的结合，"所有的人"，就是普遍概念，能说话是特殊概念，表明一个特点。还有特称判断，就是有些人是完全的辩证法，有些人是完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是所有的，不是全称，不是普遍概念和特殊概念的联系；是一个普遍概念，一个特殊概念，一个个别概念的联系。"一些人懂得一件事"，是一个特殊概念和个别概念的联系。逻辑都是概念联系，各种各样的概念互相联系。形式逻辑多半是研究这四种概念的关系。

但是，辩证逻辑就不是随便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辩证逻辑研究判断的时候就要研究判断的发展，把它们出发点的东西由低级到高级联系起来。黑格尔开始就是这样做的。

下面就讲黑格尔把判断分为四大类，这是黑格尔《逻辑学》里面有的。这四类排列起来由低级到高级，由比较简单的判断到复杂的判断（简单和复杂是讲内容)。这些判断大家可以自己看，这里各判断的特点都有解释，实在判断、反省判断、必然性的判断、概念的判断四种。有些逻辑书又把这四种判断用另外的名词，实在判断叫质的判断，反省判断叫量的判断。

质的判断就是对事物表面性的一些判断，比如说玫瑰花是红的，玫瑰花不是蓝的。反省判断又叫量的判断。

所谓量的判断就是不断出现数量关系。有些论断，这在黑格尔看来是更深一步的判断，最初由简单的论断来判断，到进一步研究量。不仅研究它是什么，而且要研究它有多少，有点反省，深入的想一想。不过这个反省还是初步的，还不够深。

第三叫必然性的判断，有人也叫关系判断，就是说不只是性质怎样，数量怎样，而且是和性质联系起来，所以更深一点。玫瑰花是植物，玫瑰花和植物联系起来。不仅是玫瑰花的一种表面现象，还要把玫瑰花的性质联系起来。假言判断，研究它的关系就比研究现象深一些。

最后他认为最高的是概念的判断，这种判断是深入到本质了，要去抓本质判断，抓最后的必然性。必然性判断，还不完全确切，只是把关系联系起来了，所以这个翻译可以研究。实际上最高的判断是概念的判断的最后一种，概念的判断要掌握必然性，掌握本质的联系，虽然不一定就掌握得了，但是思想深入到本质。这里是这样解释的：概念的判断就是主语对自己的一般本性，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自己的概念符合到什么程度（就是主语所表示的客观事物的本质掌握到什么程度）。这里有几种："实然判断：'这所房子是坏的'；或然判断：'如果这所房子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它便是好的'；必然判断：'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是好的'。"这很肯定，这个必然性也是很肯定的。

这样来看黑格尔的分类逻辑比较好说一点，所以恩格斯用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指出，这些在本质上的东西是天才的思想。他讲到概括人类认识的历史，根据判断分类来说明人的知识是怎样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通过判断来概括人类对事物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黑格尔这些基本思想可以从人类的认识历史得到证明。他下面举了摩擦生热做例子。

恩格斯不是机械地按照黑格尔的十二个特征、四类判断去教条主义的学习，而是抓住了黑格尔的精神，重新从人类认识的历史出发再来概括。黑格尔的基本精神也掌握了，但是不受黑格尔的东西限制。他大体上分为三类：个别判断、特殊判断和普遍判断。判断的最高级是普遍判断，因为它把一个事物全部的联系都掌握了。个别判断，比如摩擦生火，只掌握了个别运动的联系，一个是摩擦，一个是生火，两种运动形态联系起来，这是个别判断，又是肯定判断，又是实然判断。黑格尔的十二类可以综合起来，主要的是个别判断，由个别判断进入特殊判断。特殊判断就是一切机械运动都可以通过摩擦变成火，在摩擦这个条件下变成火，再进一步掌握普遍判断就是一切运动形态都能发生转化。恩格斯在这里指出，必然判断是判断的最高形式，但是内容还是要发展。恩格斯那时所知道的运动形态无非是机械运动通过摩擦生火，那时还没有光变成声音，声音变成电，当时恩格斯还不知道火可以变成光，光可以变成声音，声音可以变成电。

个别判断在今天还使用，但是有发展。特殊到一般是认识发展的基本过程，同时也是实践的基本过程。还可以举别的例子来说明，比如，人对物质的认识，物质的定义，古代的物质定义是什么呢？古代所认识的物质就是某种原始物质的代表，原始的物质就是水、空气，我们中国最原始的物质就是金、木、水、火、土，再加上气，气实质上就是阴阳的矛盾，就是由个别的物质来代替一切物质，所以是个别判断。当时的物质定义是用个别判断来表现，以后进入到十七十八世纪，天文学，自然科学发展了，这时就出现了机械唯物主义。它的物质定义是什么呢？物质就是一切机械实体，物质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机械力学的特点，它有重量，占据一定的空间。这就是由部分物质的某种特性来代替物质的特性，

比古代进了一步。这种判断是特殊判断，就是用某种物质的特性来代表物质，它比古代进步，思维能力提高了，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一直到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现在的唯物主义，现在的物质定义就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就不是以某种个别具体的物质来代替物质，也不是片面的用某一种具体物质的特性来代表物质。现在我们所说的物质，普遍有一种本质，就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个判断是普遍的判断，这个判断就到了物质定义的最高形式。这个形式以后还改变不改变呢？基本上不改变，以后科学发展了，革命发展了，越来越丰富这个定义。不是不要发展，是要发展的，可是这个基本形式已经形成了，已经完成了。很多事情都有这个认识过程，比如我们搞土地改革运动，就有个别研究、典型实验和普遍推广的过程。首先要个别研究，把麻雀解剖一下，然后找一个地方搞典型实验，然后就可以普遍做。这是毛主席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讲黑格尔的判断有很高的思想，他的基本思想和我们人的认识历史，实践历史有内在的联系，基本思想是天才的。

这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辩证逻辑研究思维的发展规律，判断分类表现了这种发展规律。

第 188 页（新版第 204 页），这段可以把上面讲的告一段落。辩证逻辑就是研究概念发展、思维发展的，这一段多少有一点带总结性的。恩格斯在这段开头讲："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这就是全部'概念论'在其中运动着的三个规定。"概念本来就可以分为这三种，整个逻辑从形式上来说，就是个别概念、特殊概念和普遍概念的联系。说它复杂，归根到底也不复杂，它就是研究这三大概念的联系的，概念是逻辑的基本元素，研究化学是研究分子，研究生物学是研究细胞。资本主义的细胞是商品，逻辑学

的细胞是概念，首先指概念的个别、特殊、普遍。某一个人就是个别概念，《水浒传》上的武松，就是个别概念，某一类人，如梁山泊上的英雄，就有点特殊性，因为他们不同于李自成这样的农民英雄，这是特殊概念。农民英雄就有点带普遍性，其中包括梁山泊、李自成，包括黄巢、洪秀全。所以，由武松到梁山泊的英雄到农民英雄，就是由个别概念到特殊概念再到普遍概念，概念都是分这三类。但概念的分类是相对的，有的特殊概念也可以当做个别概念来看，只是程度不同。梁山泊的英雄，撇开武松是个别的，农民英雄就是特殊的，他不是一切英雄，是指农民英雄。农民英雄跟无产阶级英雄有区别，比梁山泊英雄高一点，梁山泊英雄是个别的，农民是特殊的。但是他又比革命英雄低一点，革命英雄是指无产阶级英雄，它有更普遍的意义。运用概念的时候不能省略，刚才我们讲判断有三种，就是以三种概念为基础。摩擦就是个别的，但是机械运动比摩擦高一点，然后就有一切运动形态。推理也是这样，推理更复杂了，里面包含各种概念的关系，这一方面以后再讲。

判断是两个概念的联系，摩擦可以生火，是一个个别概念和一个特殊概念的联系，推理基本上是三个段落联系起来的，所以也叫三段论法，推理的基本形式是三个判断组成的，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推理是三段论。比如，共产党人是守纪律的，某人是共产党员，所以某人要守纪律。这是推理，三句话、三段论、三个判断里面每个判断里面都有两个概念，所以就有六个概念，实际上，六个概念中三个是重复的，因此，一个推理是三个概念组成的。像我们讲的共产党员是守纪律的，某人是共产党员，所以某人要守纪律。这里只包含三个概念，就是共产党员、守纪律、某人。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推理的组成是三个判断三个概念。在形式逻辑

上把它看成一个规定，一个基本推理应该是三个判断，三个词(概念)。一个基本推理不能违反这个规定，如果由四个或五个判断组成的推理，可能不是一个基本的推理。可能是两个推理连起来的。如果一个基本判断里面不是三个词，是两个词或者是四个词，这样就搞不成推理，或者会使推理错误。如果说只有两个词，共产党员守纪律，共产党员是守纪律的，守纪律的是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员要守纪律。这就不能算推理。

研究逻辑总是要研究这个问题，所以讲推理都是这样。三种概念又反映了由个别到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动。这点我们从前面讲的判断问题就可以了解，在认识上、逻辑上来说，上升是由低级到高级。黑格尔说，这种上升运动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逻辑公式来实现的。

在逻辑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公式，但是经验论者相信归纳法，而且把归纳法看成惟一的科学方法。恩格斯说，赫克尔们就是这样一个经验论者，他主张由个别到特殊到普遍，就是要通过归纳的形式，而不能采取别的形式，只有先通过归纳法以后才能搞演绎法。这种思想，一方面把归纳和演绎对立起来，另一方面把归纳绝对化了，把归纳的作用看得太高了。实际上，由个别到普遍的上升，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归纳和演绎要同时并用。如此由个别判断到特殊判断不仅要归纳，而且也要演绎。所谓演绎，就是把一切有联系的原理，在新的事物中加以运用，发现特殊判断的时候，在作研究工作的时候，要运用原来的个别判断经验。做实验是不是就仅仅用归纳法？从一个具体的事情中归纳出一般的原理？不只是这样。做实验里面一方面要从实验中归纳经验，另一方面在实践的过程中运用各种原理。

所以，恩格斯批判赫克尔有三条：

“（一）他们在这些名称下是不自觉地应用了完全另外的推理形式”。赫克尔虽然那样赞成归纳法，但是他自己搞的时候，却不自觉地运用了演绎，或者还运用了其他形式。我们现在的辩证法，矛盾的分析方法，既不是归纳，也不是演绎，我们用的是一分为二的方法。

“（二）只要他们不能把全部丰富的推理形式都勉强塞进这两种形式的框子中，他们便情愿把这一切丰富的形式全都丢掉”。事实上他不能看到各种形式。

“（三）因此他们把归纳和演绎这两个形式变成了纯粹的蠢话。”在实际生活中，单纯的运用某一种形式是不可能的。逻辑是包含着归纳和演绎的。

# 第二次讲解

（1964.3.5）

## 二、关于辩证逻辑问题

今天要讲的是逻辑问题，主要是讲推理问题，即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作用问题。还有，就是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分别。

这两种逻辑处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时的观点有所不同，形式逻辑一般的是把个别、特殊和普遍分开来，看做是两个推理，辩证逻辑还要研究这三种概念的内在联系，就是说，辩证逻辑要看到个别中有普遍，普遍中包含着个别和特殊。这个地方恩格斯没有讲，我们先说明一下，下面就好了解了。

下面讲完逻辑问题，就讲人的认识问题。

人的认识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究竟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就是说认识到一定程度为止，还是包括发展，主要是处理这个问题。

整个这两部分札记就是研究认识论和辩证法、逻辑学。(甲)段是关于辩证法的一般问题，主要是研究辩证法。(乙)段前半部分一直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逻辑归纳，是讲逻辑学，最后一部分是讲认识论。这三部分是相互联系的，把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应用到逻辑学方面，也应用到认识论方面，逻辑和认识论分不开。三方面判断：一方面讲认识的分类，一方面讲认识的发展，辩证逻辑同时要研究逻辑的发展，逻辑的发展也是认识的发展。

《资本论》中的逻辑学，就是由最简单的概念，一直发展到很复杂的高级概念。由最简单的商品价值，一直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积累，到否定之否定，剥夺者被剥夺，很复杂。这是逻辑的发展，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法，同时也跟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基本一致，就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个胎生学的缩影、一个概括。人类正式认识社会以前，开始先认识商品，我国古代春秋前后，对商品就有所了解，六七千年以前就开始有交换。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资本，然后人类才认识资本。出现了资本以后，对资本的认识也是不断地发展的，开始只是一般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罪恶，反对资本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规律、推动资本主义灭亡的力量还看不到。空想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最初10年产生的，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危机还没有暴露（资本主义最初的危机是1825年），从那以后逐渐产生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最初的工人组织是英国的工联会，到了30年代才有工人的党，这是历史的变动、发展。人的认识也跟着发展，逐渐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队伍，然后才看到资本主义的积累、集中，最后到消灭。

《资本论》就概括了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过程，又在逻辑上概括了人对资本主义概念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过程，而这个变化过程也是整个人类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缩影。

所以，列宁说：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是同一个科学，在理论上阐述可以分开讲，辩证唯物主义可以单独地讲辩证法、唯物主义；逻辑可以单独地讲概念、判断、推理，认识论可以讲相对的、绝对的。可是实际上要把它看成一个统一的东西。

刚才讲的这些是总的观点，用总的观点来读恩格斯的书，才容易了解。不注意这点，就不容易把这些零零碎碎的片断贯串起来。

下面讲推理的形式。前面也提到这个问题。

逻辑只是研究个别、特殊、一般的关系，讲各种判断形式、推理形式的。

在这个札记中归纳推理讲得那么多，主要是由于自然科学界把归纳法的作用夸大了。他举了赫克尔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最可靠的逻辑，主要是归纳法。甚至认为演绎法不等于推理，演绎法和归纳法是对立的，意义不大，对科学发展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他崇拜归纳法。这是经验主义的意见，经验主义认识事物，只是完全靠感觉观察来的，就是靠感觉上一个一个的个别事物加以表面比较，比较以后归纳出共同的，这样就可以得到科学的结论。

归纳法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就是根据感觉所感到的，经验所观察到的表面的特征来对世界上各种复杂的事物加以分类。把某些特征共同的归纳为一类，如有四只脚走的叫走兽，马、狗、猪都有四只脚，都归为兽类。兽类里面还可以分，猪是不太能跑的，马是能跑的，或者马是吃草的，老虎、豹是吃肉的，又分食草类、

食肉类。这样一类一类地分，每一类都有一定的特征作标准。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完全由这些表面上的特征来划分的，各类中间没有什么根本联系。

15世纪以后，一直到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方法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归纳法，因为这时期，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阶段，把自然界各种事物分门别类地排列，所以，归纳法逐渐成为主要方法。到19世纪，黑格尔把这个归纳法看做主要的方法，并在理论上加以宣扬。其实，到了19世纪中叶，黑格尔这个时代，已经有了进化论，这时再把归纳法作为主要的方法，已经不行了，更不能把归纳法当做惟一科学的方法，惟一正确的方法。

归纳法和演绎法有什么分别？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两种对立的推理方法。归纳法是根据事物的特征归纳成类，这种研究方法是由个别到普遍。演绎法是根据普遍原理来估计某一种事物，由普遍到特殊到个别。比如，归纳法认为，狗、猪、马、老虎都有四只脚，凡有四只脚的都是兽类，所以，狗、猪、马、老虎都是兽类。而演绎法则相反，它认为凡是兽类都有四只脚，老虎是兽类，所以老虎也有四只脚。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可能有的同志不了解，所以我讲一下。

下面就念188页（新版第204页）原文："归纳和演绎。赫克尔，第75页及以下各页，在那里歌德做出了归纳的推理：通常没有颚间骨的人，必须有颚间骨；于是他用错误的归纳法得出了正确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恩格斯不赞成赫克尔的意见。他说：归纳法不能说是惟一正确的方法，它的正确性在一定条件下是有的，但夸大了它是错误的。

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归纳法的出发点是把一个一个的事物列举出来，然后归纳它的共同点来做结论。比如后面举的例子：

哺乳动物都有乳腺。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就是从一个一个动物观察过后所得出的结论。一切动物都有颚间骨，这个结论是一种一种动物观察过的，凡是观察过的兽类都有这个特点，因此就得到一个结论：一切动物都有颚间骨。但是做这个结论的时候，虽然观察了所有的动物，就是没有观察人，人究竟有没有？这是观察一切兽类得到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是可靠？这个结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靠的，应用在兽类是可靠的，如果夸大了这个结论，说归纳出的结果是惟一可靠的，一点问题也没有，那就会成为错误的。因为个别事物是列举不完的，有时有例外，归纳的时候没有发现，就没有列举。那时归纳的结论对例外就不能使用。所以归纳所得到的结论不一定有完全的普遍性，它的普遍性不是绝对可靠的。因此如果认为归纳法是惟一正确可靠的方法就错了，归纳法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这里举的例子就是说，在对通常的人来说，哺乳动物有颚间骨。但对人就不适用，人是哺乳动物，原来的结论是哺乳动物都有颚间骨，按道理这个结论是绝对可靠的，用到通常的人也应该可靠，用通常的方法推测，人一定有颚间骨，可是恰恰通常的人就没有颚间骨。这说明归纳法是错误的。这里讲错误的归纳法是夸大了的归纳法的作用，不是讲归纳法就是错误的。

赫克尔就是夸大了归纳法，他认为归纳法的结论是惟一正确的，所以他说："……得出了正确的东西！"这句话，这说明赫克尔相信归纳法的结论。因此我们对人也有这些估计，人也应该有颚间骨，那么，这个估计同样是不对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也是对的，所以，"得出了正确的东西"是在特殊情况下，就是说，人在胎儿时期有颚间骨，离开胎儿时期，一出生，颚间骨就没有了。这个归纳法只是适用于那种特殊情况下，所以说夸大了归纳

法是错误的。他之所以得出正确的东西，并不是那种归纳法那么可靠，就是因为他碰到例外的情况，一种是在胎儿时期，一种是偶然有个别人出现返祖现象（若干代祖先有的特征，好几代、几十代、几百代没有，突然有一个人又出现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归纳法那么准确，但是对人来说，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准确，并不是像歌德所讲的那么准确。因为一种逻辑形式的运用范围都有限度，人的认识要反映客观形式，需要各种逻辑形式来反映，不是依靠一种。

科学家认为归纳法是惟一的逻辑形式，实际上按照辩证的观点来看，它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要想能从逻辑上充分地反映客观现实，除了归纳法以外，也要看到演绎法。实际上赫克尔要用演绎法，而这演绎法后来又经过新的发现，发现胎儿有颚间骨，经过几个反复才得到正确的结果，这个正确的结果并不是单靠归纳法得来的。至少靠两种形式，第一是归纳法，第二种是歌德根据归纳法的结果，用演绎方法估计人可能有颚间骨，然后又根据科学的发展找到了在人身上，只是胎儿，只是个别反祖的人才有，经过这样的反复，才能得到人有颚间骨的结论。这个过程，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精神到物质，物质到精神，然后再由精神到物质。这里讲“他用错误的归纳法得出了正确的东西”，是对赫克尔的讽刺，实际上他认为夸大归纳法是错误的。歌德并没有简单地依靠归纳法得到这个正确的结论，这个正确的结论是经过好多逻辑形式得到的。人的认识由个别到发现特殊的东西、普遍的东西，要经过各种逻辑形式。

这段比较费解，这段了解了，后面就比较容易了解了。

下面：“赫克尔的荒谬：归纳和演绎对立。（他是排斥演绎的——艾注）似乎演绎不等于推理，因此归纳也是一种演绎。这是

由两极化而来的。赫克尔，‘创造史’，第 76—77 页。推理分为归纳和演绎两极！”（第 188 页，新版第 204—205 页）

归纳和演绎推理的结果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可以帮助人作进一步的研究。歌德根据归纳推理估计人可能有颚间骨，有了这个估计就可以推动我们进一步研究。但是把演绎夸大了也是不对的，歌德的演绎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歌德说一切人都有颚间骨就错了，如果说人可能有颚间骨，这个估计就对了。为什么人没有颚间骨，只有胎儿的时候有？这个道理和进化论、胎生学有关系。胎儿重复人类的进化，哺乳动物有颚间骨，人是更高级的动物却没有，但是胎儿有。胎儿阶段不同于兽类阶段，因此，一般地讲颚间骨在通常的人是没有的。只是因为在胎儿过程中要重复动物进化的历史，所以有这种情况。归纳法也有它的正确性，演绎法也有它的正确性，但都不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应看做是互相补充，交叉加以运用。不要把归纳和演绎推理看成是绝对对立的，两种方法对科学都是有用的，如果绝对对立起来，那么每种方法都会成为荒谬的，都会成为错误的。

这是讲认识的相对性，逻辑的相对性。

下面的两句话："推理分为归纳和演绎两极！"是把归纳和演绎绝对起来，看成没有联系的东西。

“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新版 205 页）。现在再一归纳又不是了，就是因为从前归纳的材料还不足。海虾和蜘蛛是比昆虫更低的动物。海虾和蜘蛛是昆虫是对的，实际上海虾和蜘蛛和蠕虫中还有一类叫 X 类。

“现在用归纳法发现了这是荒谬的，并且发现了有 X 类存在。这样，如果所谓归纳推理和以分类为基础的所谓演绎推理可以是同样错误的，那么所谓归纳推理的优越性是在什么地方呢？”这都

是批判赫克尔的。

下面是讲归纳法不够的地方。“归纳法绝不能证明：世界决不会有无乳腺的哺乳动物。从前乳房是哺乳动物的标记。然而鸭嘴兽就没有乳房。”进一步研究，发现了有一种鸭嘴兽就没有乳房，所以说归纳法的结论也不是绝对可靠的。

下面讲英国人惠威尔把归纳法全部弄得混乱了，也是设想把归纳法和演绎法对立起来，因此把一些科学说成是归纳法，一些科学说成是演绎法。有些科学比较多的用归纳法，但是也要用演绎法，有些科学看起来是用演绎法，但实际上还是归纳出来的，比如数学的许多公理也是人的长期实践归纳出来的。这段的最后一句话：“从个别东西开始的一切推理形式都是实验的，而且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事实上甚至归纳推理（一般说来）也是从 A—E—B 开始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里面也有演绎的成分，它本身是归纳法，但是也要依靠演绎。以经验为基础，就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在进行实验的时候，总是要运用过去的原则，运用过去的经验，把过去的经验作基础。

下面就是讲这个问题：“事实上甚至归纳推理（一般说来）也是从 A—E—B 开始的。”也是从个别开始的，归纳推理应该说是从个别开始，但是实际上是由普遍到个别到特殊。这个意思有点难懂。什么叫从 A—E—B 开始？这是恩格斯从黑格尔的《小逻辑》上引来的。归纳的公式是 A—E—B，是普遍经过个别到特殊，普遍的东西以个别为媒介达到特殊，然后根据普遍现象对个别进行归纳研究，发现某些共同特点。黑格尔的《小逻辑》里面有这个例子，（在《小逻辑》里面关于推理这一章最后一部分，很容易找。）那里讲反省推理、讲归纳推理。

反省推理，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里，是把它算作推理的一个阶

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有归纳推理、演绎推理。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什么是推理，也是按照三段论来进行推理的，就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一个结论。如铜是金属，铁是金属，金也是金属，金、银、铜、铁、锡都是金属，这是大前提，所有的金属都能传电，这是小前提，结论是凡是金属都能传电。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从这个推理可以看出 A—E—B 的形式。提出一个大前提，说明金、银、铜、铁、锡都是金属，这是普遍判断，这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它是金属，所以以经验为基础，这个大前提的本身就是演绎的结果，就是运用过去普遍经验演绎的结果。然后是一个小前提，根据现在的研究，金、银、铜、铁、锡都有一个特点，把金、银、铜、铁、锡一种一种地研究，都能传电，都有传电的特殊性。金属的特殊性就是传电，所以就找出了特点。一个普遍经验，经过个别研究，以个别为媒介，得到特殊性的发现。实质上归纳就是这样，所以，一般地讲，归纳法是由个别上升到普遍，但是逻辑的结果，实际上是由一般到个别到特殊。一般的判断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实际上它是包含了演绎的因素，但是这个推理不是演绎的推理，只说明归纳推理中有演绎的因素，没有演绎不可以作归纳，没有过去的经验，这个推理就搞不起来。

这个 A—E—B 的公式还可以有另外的解释，就是从推理形式来研究，我们刚才讲归纳推理的公式，三段论形式本身是推理，也是讲 A—E—B 三个字的关系，金、银、铜、铁、锡都是金属，这个大前提里面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有两个词，上面是个别这个词，下面是金属，是普遍这个词，写成公式，就是个别是普遍。小前提是金、银、铜、铁、锡都能传电，这个判断又可以叫个别就是特殊，可以划等号。最后的结论：所以，凡是金属都能传电。金属是普遍的概念，传电是特殊的概念，结论也可以这样写：普遍

＝特殊，逻辑形式是这样。这个形式，第一个判断是前提，第二个判断是小前提，第三个判断是结论。这里有三个概念，每个概念重复一遍，等于六个概念。这些概念在逻辑学上有它自己的名词。我们分析有这种情况：三个概念在大前提、小前提里面都有，结论里面只不过两个概念，有一个概念在结论里面没有出现，就是个别这个概念在结论里面没有，只是有普遍和特殊在结论里面有。在结论里不出现的概念，在逻辑学上叫中词（项）；大前提里面出现，又在结论里面出现的词叫大词；在小前提里面出现，又在结论里面出现的词叫小词。三段论逻辑有三个判断，三个判断又包含着三个词（大、中、小）。

三段论逻辑可以这样下定义：凡是推理都是大词以中词为媒介和小词联系起来，就是以中词联系大词和小词，这是在逻辑上的基本形式。所以，在逻辑上普遍、特殊和个别的基本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就是大词以中词为媒介和小词取得联系，这个联系就是结论，这个结论要经过中词作媒介，这就是逻辑学推理的形式关系。我们刚才举的归纳推理就是普遍概念，就是大词，它的中词就是一些个别概念，小词就是特殊概念，所以归纳推理就是普遍概念以个别概念作媒介和特殊概念联系起来。归纳推理就是这样，因此它的公式自然就写成这样。A—E—B 这样写也是很自然的。正是个别概念，是中词，它把普遍概念和特殊概念联系起来，所以 A—E—B 的关系从形式上讲就是这样。

下面这段用不着讲了，他是讲归纳法到处会发生问题。用赫克尔的归纳法归纳出的结论总是常常有问题，因为它总会有例外，每天总有新的事实发现，把旧的归纳结论推翻。这段是进一步批评赫克尔的。现在是十九世纪，进化论都出来了，他到现在还狂热地拥护归纳法。说明这些自然科学家的思考力的特色。现在自

然科学已经暴露了自然界辩证法，说明你要观察事物的联系、发展，就不能把宇宙的生物看做是一成不变的，光归纳分类就完了，而归纳出几类，还要研究它各种种类的发展过程。这时候你狂热地拥护归纳法，归纳出来的机械分类，就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起了作用。好多科学已经暴露了辩证法，而科学家的头脑还是形而上学。生物界的进化论已经证明，每种物种都是亦此亦彼，都包含着对立面，没有抽象的同一性。可是赫克尔还是用归纳法把生物归纳为这类那类，中间没有独立的，没有亦此亦彼的情况。

下面讲进化论。

除了归纳一些表面的特征之外，还要用脑筋思考，用理论说明。这个东西靠归纳法不能说明，有些需要用演绎来说明，用血缘关系来说明不同物质之间的联系。所以一切种属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不会向归纳法让步的。“归纳法所运用的种、属、纲等概念，由于进化论而变成了流动的，因而成为相对的了”（新版 205—206 页）。相对性就是有条件的同一性。把归纳的结果看成是绝对统一的思想，是不对的。

再下一段（第 189 页，新版第 206 页），恩格斯讲归纳万能论者。

我们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这种人？现在也有。赫鲁晓夫跑到美国，看到美国的玉米很好，回到苏联就大种玉米，这也是归纳万能论者。如果苏联的技术条件和自然条件和美国一样也可以，问题是有条件的，随便拿到苏联用是不对的。

“……世界上的任何归纳法都永远不会帮助我们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作到这点。”这句话很重要。

辩证法怎么看归纳法？辩证法看归纳法和归纳万能论者不同，赫克尔是表面上看归纳法。我们讲归纳法的意思也可能是他们的归纳法，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讲归纳法是包含分析的，这个

分析就不是一个一个的看表面现象，要把认识过程所发现的问题加以分析，这里就用分析矛盾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进行这种分析，把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是归纳法本身也包含着演绎的因素。而赫鲁晓夫的归纳法就一点分析也没有，他就是从表面上看现象，做结论。玉米虽然有高产的优越性，但是这个高产的优越性在什么条件下表现出来，在什么条件下表现不出来，这种矛盾他不去研究。一般地讲，归纳中就有分析，演绎是把普遍和个别联系起来，就是综合。实际上，归纳也是综合，经过一个过程，把普遍和个别联系起来。

“我们不应当在两者之中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高高地抬上天去，我们应当力求在其适当的地位来应用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而要想做到这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这是恩格斯的结论。

下面是举一个例子讲纯粹归纳法不对，意思和前面一样，所以不作解释了。

第 190 页（新版第 206 页）第一段最后一句话是讲赫克尔虽然是提倡归纳法的，但实际上他也懂得进化论，所以，他的实际研究已经超出了归纳法。

“……假如归纳法果真是不会错误的，那末有机界的分类中的翻天覆地的变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们是归纳法最独有的产物，然而它们却互相消灭着。”

过去的归纳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现成的，达尔文运用归纳法推翻了过去的结论。这个意思就是说归纳的结果是互相消灭、互相冲突的。赫鲁晓夫用归纳法归纳出一个大量开荒，后来又用归纳法归纳出开荒可以不搞了，其实这个思想实质不是归纳法。前后矛盾是因为客观事物有矛盾，要正确地分析这个矛盾，就不会

有前后矛盾的问题了。所以单纯地用归纳法是不可靠的。

下面还有一段再讲一下。

“归纳和分析”。这段（新版第206—207页）和前一段相呼应。对归纳的过程要很好的了解，要分析，这段也是讲归纳本身最高的、更高的方法要靠分析。

“……在热力学中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证明归纳法之妄图作科学发现的惟一的或甚至占统治地位的形态的想法是如何地没有根据。”他下面举了蒸汽机的例子：“从热当中能够得出机械运动，这点已由蒸汽机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十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更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它们只是愈来愈逼迫物理学家们必须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思想和毛主席所讲的“解剖麻雀”一样，只要研究一只麻雀就能了解几万只麻雀。这种分析研究下面还讲到一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点。这种采取典型研究的特点，不能纯粹靠表面观察，而要靠脑子思维。

这里举了卡尔诺研究蒸汽机，不是研究蒸汽机表面形态，而是发现了蒸汽机中的基本过程，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被各种各样的辅助过程所掩盖住了。所以，仅仅靠表面观察对蒸汽机的了解，就不那么清楚了，特别是对它的根本规律的了解不清楚，因为那个规律受其他影响，不纯粹。因此，卡尔诺就设想一种纯粹的蒸汽机。这个抽象的思想也是根据观察得来的，但是他又超过了表面观察。因为他先经过观察发现蒸汽机不纯粹，因此他就用思维设想一个纯粹的蒸汽机，这样就找到了蒸汽机的根本规律，就和马克思写《资本论》一样，他用英国这个具体国家作典型，他也观察、也归纳，但是观察的结果，又把英国资本主义里面的复杂因素撇开了。英国资本主义里面有封建残余，这个封

建残余有些什么作用？对英国资本主义有许多作用，这个作用在《资本论》里面一句也没有讲，只讲英国资本主义的那一方面。这样他就能抓住资本主义的根本规律，真正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能适应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适用别的国家时，又要根据具体情况，但是这个根本规律是有效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这样的理论，都是研究最根本的东西的。这种最根本的东西不是完全靠观察，要以观察为基础，经过抽象，把最纯粹的东西在脑子里加以考虑，然后得出规律。毛主席在观察抗日战争开始一年多的情况以后就写《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里面不讲很多复杂的东西，不讲很多具体现象，只讲抗日战争的基本矛盾关系，敌我关系，撇开暂时的因素。就是一般设想，敌人有四个特点、三个缺点、一个优点，我们也有四个特点，而是三个优点、一个弱点，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对立面。两方面都有特点，这种特点相互发生关系的时候会起什么作用？因为敌人有三个弱点，所以他想把我们灭亡是不行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弱点，我们想很快把他们打败也不行。所以，既不是亡国论，也不是速胜论，这个战争是持久战。8年抗战只经过一年，根据以观察为基础得来的材料，经过抽象分析（就是矛盾的分析），就把矛盾分析清楚了，就可以预见8年以后7年的规律，不但知道持久战，而且知道持久战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每个阶段怎么样。这个辩证逻辑靠什么方法？只靠归纳法行不行？全世界只有一个抗日战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而且抗日战争只出现了一年，用归纳法没有办法归纳。所以只能用辩证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里面有归纳法，就是归纳过去的战争经验。为什么我们过去的战争能胜利，因为已经有了10年内战的经验，证明人的力量是大的，只要指挥得好，就能胜利。这里有归纳也有演绎，把过去10年的经

验归纳了，用这种经验对矛盾进行分析，结果就能准确地估计 8 年抗战的前途，把规律搞清楚了。

到了这段，恩格斯就把马克思主义所创造的真正科学归纳和演绎的辩证逻辑说清楚了。马克思的方法既要归纳，也要演绎，但是主要的不是简单的依靠归纳和演绎，主要的是对事物内部矛盾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不是表面观察，是用自己的思想把最根本的东西把握住，这就是理性认识。认识要到这样的程度，才能真正实现飞跃，归纳就不可能由感性到理性。单单归纳不能实现，单单演绎也不能实现，演绎只能把先前的经验拿来运用，却不能把我们今天所碰到的新的矛盾和规律加以掌握。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一分为二的方法，是矛盾和观察的方法。以这种方法为基础，也运用归纳法，也运用演绎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推理逻辑不是简单的归纳，也不是简单的演绎，而主要的是把矛盾加以分析。分析的结果正确不正确，也不能用归纳和演绎来证明，而要靠实践证明。

第 191 页（新版第 207 页）还有短短的一段，就是讲这个问题。“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于人类活动中，在实践中，在劳动中……”这一段是两句话，这样造成一种结果，就可以肯定实践的结果是正确的。

这几段的中心意思就是这样。

下面一段是讲归纳法可以对必然性提供材料，但是不能全部证明必然性。经过动物的研究，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材料：哺乳动物都有颚间骨，但是不能证明任何哺乳动物都有颚间骨，也不能证明为什么它会这样。所以对人的认识必然性的证明，主要靠实践。

下面都是说明这个问题，证明必然性，证明真理主要依靠实

践，实践可以证明真理，也可以证明错误。这一段用因果性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各个物体的个别运动的相互间的联系，它们相互间的制约。”相互间的联系和相互间的制约还不是因果性，因为因果性只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不仅看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看到：只要我们造成某一特定的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时所必需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一特定的运动；甚至我们还能产生在自然界中完全不会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运动；我们能预先规定这些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性观念的基础，而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因果性观念说明不仅反映，而且是反映人的活动，这种联系要经过人的活动，经过实践，才能在我们思想上一致起来。所以，这里说人的活动建立了因果性观念的基础。就是说，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因果关系。

“……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依次更替，就能产生因果观念：例如，随太阳而来的热和光；但是在这里并没有任何证明，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休谟的怀疑论说得很对：有规则地重复出现的 post hoc〔在这以后〕决不能确立 propter，hco〔由于这〕。”

休谟是主观唯心主义，又叫怀疑论，他最主要的思想是关于研究因果关系的思想。在哲学上，一个时期他的直接活动就是对因果关系怀疑，这在 18 世纪初期也就等于怀疑科学。所以这种思想是反科学的，他认为科学规律是不可靠的，科学规律、科学的因果关系是不是能反映世界的事物本来规律性，这是不可知的，是

值得怀疑的，是不能证明的，是另一种现象，是人类感觉现象和出现的事物经过几次反复，在感觉上给我们多次反复，我们就认为有因果关系。实际上，这仅仅是我们感觉上感到它先后继续出现，至于它本身是不是真正有现象和联系，这是不能证明的，这只是表面感觉而已，因此因果关系是不可靠的，这个规律没有必然性。休谟是18世纪初的英国哲学家，在贝克莱以后，休谟比贝克莱的反动性稍微轻一点，因为贝克莱直接否认物质的存在，肯定上帝的存在。而休谟讲：我们既不能肯定物质的存在，也不能肯定上帝的存在，所以是怀疑论，这就是不可知论。有没有物质？是不可知的。有没有上帝？也是不可知的。所以，恩格斯讲：不可知论有时动摇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有时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有时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休谟的不可知论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因为他根本否认必然性，是经验主义，认为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规律。因果规律无非是感觉的先后联系，先后出现两种感觉，经过几次重复，人就认为有因果关系，不承认那些必然性。恩格斯在这里特别举出他来，因为他的哲学最起作用的一个论点，就是对因果规律否定，就是反对因果规律。

恩格斯讲：19世纪末期的赫胥黎也是不可知论者，但是他有点特殊性，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是进化论者，是为达尔文辩护很有名的人。他相信进化论的规律有必然性，但是他的怀疑论在于这个必然性是由物质来的，或者是由上帝来的，这是不可知的，所以他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动摇的。但是在事实上还是不能不承认唯物主义的一些原则。对于科学规律有客观必然性这点是肯定的，但是客观必然性是从哪里来的，就不敢明确主张了。休谟根本否认客观必然性，一切规律他都认为是感觉的一种重复，感觉的先后联系，不是客观事物的联系，而是感觉上

的联系。但是恩格斯在这里肯定了怀疑论（休谟的观点）的一点道理，他认为休谟反对因果规律是错误的，但是他反对因果规律所提出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恩格斯还是肯定了他的这一点。实际上休谟讲的只是经验的一个特点，就是个别经验的观察不能证明因果性，这是暴露了人的纯粹经验观察的弱点，不能证明必然性。休谟把这个弱点夸大了，好像人除了经验观察以外，就没有别的能力。因此就走到怀疑论去，走到主观唯心主义。我们要驳倒怀疑主义是有办法的。我们虽然不能证明必然性，虽然就总的来说，休谟是对的，可是他还不懂得人类除了经验以外，还有自己的实践，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造成自然界所没有的不会发生的东西，这样就可以证明因果关系。

“但是人类的活动却造成了对因果性的检证。如果我们用凸透镜把太阳光恰恰集中在焦点上，造成像普通火一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雷管、炸药和子弹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已往经验所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详详细细地研究全部过程：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化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力。在这里怀疑论者也就不能说从已往的经验不能推论出下一次将恰恰是同样的情形。”有了这个实践，休谟的怀疑论就站不住脚了。

“……不过有时候在事实上并不发生恰恰同样的情形，雷管或火药不起作用，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些事实恰恰就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于每件这样不合常规的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引火物的化学分解，火药的潮湿等等，枪筒的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做了双重的检证。”

经验的观察就不能证明因果性的必然性，实践就能证明。用

经验观察的那种感觉，先后连续出现，尽管出现一万次，也不能证明它的因果性关系。但是人的实践就不同了，人的实践就能证明因果的必然性，实践能出现预期的结果，就能证明因果性。不能出现也能证明，就说明有另外的原因。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纯粹凭经验观察来判断的，我们也用经验来观察，但是主要的不依靠经验来观察，主要是依靠通过实践，对实践进行分析，对实践中的矛盾进行分析、归纳，经验观察是敲门砖。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讲，现象是我们观察事物的向导。只靠经验观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维。”这是指赫克尔等人，以后列宁批判受唯心主义影响的自然科学家也是一样。现在马赫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影响，所以，现代自然科学家还有这个问题。

“但是人的思维之最本质的和最密切的基础，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非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这段话很重要，也是《实践论》的证据。

“……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雷柏和其他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就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这种历史观因此是片面的，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这些科学家也不是根本否认人能制造工具，人能制造机器，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能反映自然，这种能力对人的认识的作用。这里讲的都是认识论，不是讲人和自然的

关系。如果讲一般的人和自然的关系，那么，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家都不会否认人能认识自然，人能制造工具，来改变自然界。你说自然科学家否认人能改变自然，也不是。因为他的确相信人能制造工具，制造机器改变自然。离开认识论，单个地讲人能不能制造工具改变自然界，任何自然科学家都能承认。问题是这里讲的是在认识论上，自然科学家一般的都承认了，至少是不注意人能反作用于自然界，人能改变自然。人的认识直接决定于自然界，还是主要决定于人对自然界的改变？就认识论来说，人的认识的发展，主要还决定于人改变自然界的活动的发展，而这些自然主义历史观的人，以及赫克尔这些人认为，人的认识就是简单的由自然反映到人的认识，就是简单的经验观察，不知道人的认识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去认识的。在认识论、反映论里面，自然界反映到人的认识里面，和人作用于自然界相互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人所以认识自然界，主要是人改变了自然界，人不改变自然界，人的实践根本没有接触自然界，人一般的不能认识自然界。生产越发展，接触自然界的范围越广，人的认识领域也越广。人所以认识自然界，基本上是人改变了自然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点我特别讲一下，因为这个道理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是很重要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修正主义对这点做了很大的歪曲，利用对这个看法的歪曲，曲解成唯心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有这种情况。

我们要认识自然界，基本上是我们自己改变自然界，在马克思他们的早期著作里面讲这个道理讲得很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自然界是人改变了的自然界，是人化了的自然界（在《哲学·经济学手稿》里使用了这些话）。这些话被现代修正主义曲解了。马克思讲这些话是就认识论范围内讲的。现代修正主义把他夸大了，就脱离了认识论，而一般地讲自然界就是人化了的自然界，进而

人也是自然化了的人。那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人，结果整个宇宙和人分不开，马克思是在认识论范围内讲自然是人改变了的自然。而修正主义指的是整个的自然界都是人化了的自然界，人也是自然化了的人，结果就和主观唯心主义搞在一起了，人和自然分不开，离开了人就没有自然了。人和自然是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关系是因果关系，主观和客观就变成原则同格了。主观不能离开客观而存在，客观也不能离开主观而存在。这样一来，列宁所讲的，物质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这样一个定义就取消了。

下面讲第 192 页（新版第 209 页）“相互作用——这是我们从近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考察整个运动着的物质时第一个遇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态：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变、有机的生命，——如果现在姑且把有机的生命除外，——这一切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而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的总和在其一切变化着的形态中始终是不变的。”

这是讲整个宇宙是一切事物互相转化、互相作用的总体。“运动的总和在其一切变化着的形态中始终是不变的。”这句话要注意，在整个运动中，一切变化形态是不变的，物质是无限的，在自然科学上叫能量守恒原则。宇宙，事物是变化的，但是运动的质量是不变的。这不是否认发展，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宇宙是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整个物质就是这个物质，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只讲它综合不变，这个综合实际上是物质的综合。如果说宇宙的东西可以增加，谁来增加？就有这个问题。如果说可以减少，可以消灭，谁去减少？谁去消灭？如果有这种思想，就要请上帝帮忙，无中生有的创造出来，或者是本来有的东西，把

它消灭了。一种具体的东西消灭了是可以的，可是消灭并不是绝对的消灭，消灭实际上是转化，消灭是有消灭，有不消灭，消灭只是一个方面。资本主义要消灭，但资本主义的消灭并不是绝对消灭。资本主义自己消灭了，同时它又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这个创造是物质自己的创造，是一方面消灭，一方面又创造。消灭了一个东西，又创造了一些东西。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没有消灭，就具体的东西来说又消灭又创造。这句话的意思就要按照斯宾诺莎的实体是“〔原因自身〕”，就是宇宙本身，没有宇宙以外的原因，物质变物质，就是一种物质消灭了，另一种物质产生了，并不是物质以外的力量来创造它，它自己消灭，又自己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整个宇宙就只有物质。唯物主义一定要承认这点，宇宙就是物质的宇宙，这个物质的宇宙在总体上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一切创造、消灭都是物质自己内部的运动，如果否认这点，就是否认唯物主义。所以，整个宇宙就只有一切事物相互作用的总体，这个总体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一切变化现象都在实体自己内部。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他的话是正确的。

下面，“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 causa finalis〔究极原因〕。”最后的原因，部分的原因，可以说某一件事的原因，但是归根到底是相互作用。

“……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正是因为在它背后恰好再没有什么要去认识的东西了。”除了相互作用，再认识更深的原因，就不能认识了，再追究就变成神秘主义了。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有很多东西是唯物主义的。这句话就完全可以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打破了他的唯心主

义原则。

"……如果我们认识了物质运动形态(因为自然科学存在并不久,所以我们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我们也就认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恩格斯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

"……(格罗沃对因果性的全部误解是由于他对付不了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有了要点,但没有把它用抽象的思维形式表达出来,所以他便弄糊涂了)。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个别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个别的现象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更替着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

下面,"对于否认因果关系的人,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那些不能比这更前进一步的人的思维是何等浅薄呵!"这就是不可知论,还是休谟的观点,他认为因果关系没有必然性,因此他认为自然规律都是假说。因为人有些感觉先后连续出现,而且重复多少次,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人们就叫因果关系。

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都不承认科学规律是客观真理。实用主义也是这样,而实用主义更露骨一点,更资产阶级化,就是一切所谓真理都是由我假设,对我有用就是真理,对我没有用就不是真理。因此,真理的思想,甚至科学都是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

第193页(新版第210页)讲到的耐格里,也是当时的经验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是归纳万能论者,所以,他不相信人能认识无限,只相信人能认识有限的东西,整个是接近不可知论的,怀疑人的认识科学的能力,怀疑人的认识的客观性,或者至少是怀疑人的

认识能力的无限性，人有无限的认识客观的能力。实际上就是怀疑唯物主义。

“耐格里首先说我们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马上跟着又说这类‘绝对差异’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这是只讲矛盾。一方面是不可知论，另一方面自己又要设想认识自己制造什么东西。自然界没有绝对质的差别，这是正确的，可是他又说不能认识。这种经验主义者的思想很混乱，他又反对唯物主义，表面上跟着唯心主义者，但是又偷偷的承认唯物主义。这种人也就是恩格斯讲的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这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有点区别。自然科学的不可知论不完全是唯心主义，它是羞羞答答的，偷偷摸摸的，也讲点唯物主义。

# 第三次讲解

(1964. 3. 6)

## 三、关于认识论问题

下面第193页（新版第210页）是恩格斯自己的意见，他主要是反驳耐格里所讲的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的问题。

“第一，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例如颜色深浅、硬和软、生命的长短等等，并且它们虽然在质上各不相同，却是可衡量而又可认识的。”

“第二，质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

这句话里面讲的质是不存在的，脱离了物的质是不存在的，因

为没有抽象的离开物的质，实际存在的质是物，而这个物是具有无限多的质。这个“无限多的质”这句话需要注意一下，恩格斯讲的所谓物的质是有无限多的，这个无限多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物就有无限多的质，物有多种多样。另一方面的意思，就是有一种事物也可能有无限多的质，不是一个物只有一个质。

我们一些学校讲哲学的同志是不是这样的看法：一种物只有一种质。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总的来说是统一的质，但是这个统一物包含着的质可以从各方面来看。从前我们讲哲学的时候，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讲量变到质变的时候，举这样的例子，水变汽到摄氏100℃就沸腾了，就是质变。有人就反对。这个例子恩格斯讲过，黑格尔也讲过。他们为什么反对呢？他的理由是这样，他说，水到了一百度沸腾，只是沸腾而已，水并没有变化，他认为水的质就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化合成的，沸腾也好，不沸腾也好，质是不变的。这样的想法是不了解它的质是多方面的。我们讲的这个例子，一百度沸腾就变质，这个质是物理质，他用来反驳的理由是化学上的质。

人的质，就有社会质，也有生物的质，人又是社会的一种事物，但是又和一种生物、自然界动物一样，人有两种质。当然人最主要的质叫本质，还是社会的东西，就是说把人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要跟动物加以区别，主要的在社会关系。人之所以和动物有差别，主要的是社会性，所以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了人也是一种哺乳动物。不过这个质不是主要的，不是指和其他动物区别的本质。或者本质是指一个物质表现为他自己的主要特点，这种质是他的本质，所以本质还是质，一种物可以有多种质。如果一个生物学家看人，就把人看成一个动物，比如巴甫洛夫研究人的脑神经的时候，也研究由感性到理性的关系。但

是这种研究着重生理关系，当做自然关系来研究。如果是化学家，可以研究人身上的化学变化。物理学家可以研究人身上的物理质。一个物包含各种各样的质，越高级的物包含的质越多，其中有一个是他的本质。

这个思想和毛主席的总的质和部分的质这个思想是一致的。总的质没有变化，但是部分的质变化了，如从社会主义社会一直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总的都是共产主义，但是它有各个阶段，这些阶段里面还有小的阶段，所以，许多独立的阶段就表现为部分的质，有许多不同，部分的质来源于部分的矛盾，总的质来源于总的矛盾，即最根本的矛盾。这句话很有意思。

“……两种不同的物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这个属性上）是它们所共有的，其他的一些质是在程度上不同的，而另外还有些质可能是这两种物之一所完全缺乏的。如果我们分别拿两种极端相异的物——例如，一块陨石和一个人——来比较，那么我们由此得到的共同点便很少，至多不过是两者都有重量和其他共同的物体属性。但是在这两种物之间还有一个无限的系列的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它们容许我们把从陨石到人的这个系列填补起来，并指出每一物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因而可以认识它们。这是耐格里自己也承认的。”（第194页，新版第210—211页）

人和陨石为什么共同点不同，要从进化论上来看，因为人是物质发展到最高级的物质，而陨石是比较最低级的矿物质。很高级的和很低级的距离很大，所以共同点很少。从最低到最高的质，还有一系列的等级可以填补。两种相近的物质，共同点就多一些，比如陨石和泥土比起来，它的系列有共同点，都是矿物，都有重量，甚至有些化学成分还是一样的。在这里恩格斯讲物质的差别是不能按照归纳法的办法并列起来分类的，由进化发展系统，由

低级到高级排列。19 世纪以前，对物质的分类往往是并列的，19 世纪有了进化论，完全按照发展正确来分类。

第二条中说明差别中有共同点，绝对差别是不存在的，但是差别还是可以认识的。

第 194 页（新版第 211 页）“第三，我们各种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这是讲我们主观的感觉可以感到不同的质。

“……我们靠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经验到的属性，因而会是绝对不同的。”

只讲物质本身的质，属性是讲我们感觉到的，是物质本身的表现，和别的事物接触以后表现出来的特性。比如光波和我们的眼睛接触以后，常常产生颜色的属性，属性是一个事物的质和外界事物接触以后表现的特点，实际上就是它本身的质表现在外部。所以，由于感官的不同，我们所感觉到的属性也不同，一个事物的属性有各种各样，我们不同的感官可以从各方面感觉到。这里要和主观唯心主义区别，主观唯心主义认为感官所感觉到的东西是惟一的存在，唯物主义认为我们感觉到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在这里这些差异随着研究的进步而消灭。嗅觉和味觉早已被认为是两种相近的同类的感觉，它们所感知的属性即使不是同一的，也是同类的。视觉和听觉两者所感知的都是波动。”

这也是说明进一步研究各种属性，绝对差别就消灭了。这条所讲的和上条讲的不同，上条是讲客观事物的绝对差别是不存在的，这里是讲主观上所感觉到的事物属性也不是绝对有差别，表面上看起来有绝对差别，进一步研究绝对差别就会逐渐消灭。

“……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据

某一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

这个问题有时会产生错觉，比如雕刻一个人的身体，本来石头硬得很，但是因为雕刻得很好，用手去摸会感到很软。寒假我到西安去参观，看到一个白玉少女像，雕得很好，不用手摸，一看就感到很美、很软，这是艺术家的表现。

“……最后，总是同一个‘我’，接受许多相异的感性印象并且改造它们，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而另一方面，这些相异的印象是由同一物所给与，并显现为它的一般属性，因而就使我们可能认识它。”

我们利用五官感觉到各方面的属性，我们不是把各种属性孤立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而这种一般的属性就包含各方面的属性。化学上最常用这个办法，比如金子有什么一般的属性？它的重量比一般的金属都重（除了白金以外），它的熔化点很高，不容易熔化。但是我们确定各种属性并不是分类；而多半是通过各种属性综合起来。你看到一种属性就不能确定某一种事物是什么东西，如果说银子是白的，这可以，如果说白的是银子就错了，因为锡也是白的。必须把两种物质的属性加以区别。

哲学上的规律就是通过属性来规定的，有时也叫特点。某一种东西是什么性质？怎么确定？就是要看它有几种特点。斯大林说辩证法有四个特点，有些人攻击斯大林，为什么讲辩证法有四个特点，不讲三个规律？认为斯大林讲的特点依据不完全，比如发展的曲折性，否定之否定规律没有规定。批评他不重视否定之否定这是对的，但是批评他讲辩证法不讲三个规律是不对的。辩证法可以讲三个规律，但是对特点只有一个总的概念，所以，讲四个特点也不是不可以的。

现在苏联攻击斯大林是抓辫子，但是这个辫子也没有抓住。比

如说斯大林不注意实践，实际上斯大林讲辩证法的每条都讲实际意义，怎么说不注意实践呢？说现在的教科书不注意实践倒是真的。斯大林的教科书的缺点不在这个地方，缺点就是辩证法不够，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矛盾了，主要还是这些根本问题，并不是枝枝节节的问题。

还有一种说法，说斯大林把理论和方法分开了，辩证法是方法，唯物主义是理论。这种批评也没有多少道理，因为也可以这样分，并且斯大林也不是这样机械的。他一开始有句总的话：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党的世界观，他总的指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都是世界观。然后再讲理论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方法，这和毛主席讲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没有什么根本差别。现在苏联和法国都有些人攻击斯大林这些观点，但都是攻击的没有道理。

“……说明这些只由不同的感官才能接受的不同的属性，确立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总的感官，或者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气味和滋味。”

科学研究就是把这些特点联系起来，把各种特点指出联系起来，这就是一种科学。所以斯大林的提法也还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下面一段：

“不管我们向哪里看，自然界中我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样‘在质上不同的或绝对不同的领域’，关于这些领域人们告诉我们说，它们是不可理解的。全部的混乱是发生于关于质和量的问题上的混乱。根据盛行的机械观，耐格里认为一切质的差异只有在归结为量的差异时才能说明（关于这一点在别处还有说明的必要）；质和量在他看来是绝对不同的两个范畴。形而上学。”

耐格里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观点，他为什么要讲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又说绝对差异在自然界中不存在呢？这两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可是他所以要讲这两句话的目的，是为了要否认这个差异，或者是把这个差异简单归纳为量的不同。因为量的差异，量的多少取决于质的差异，混淆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实际上，他不相信事物有质的差异，他所以不相信是因为他不了解绝对差异不存在是什么意思。他把绝对差异不存在这种客观事实，解释为差异不存在，差异不可认识，质的差异都是量的差异。

第 195 页（新版第 211 页）“‘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有限的东西等等。’只要在我们的认识范围内碰到的仅仅是有限的对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如下的补充：‘我们根本上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

认识要从无限当中看到有限，要从偶然现象当中看到普遍规律，看到普遍规律才能算作认识，因此说明我们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它有普遍性，所以叫无限的。

下面就是解释：

“……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完全在于我们在思维中能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提高到特殊、然后再从特殊提高到一般；完全在于能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

这段话就是说，真正的认识一个东西，不是看到一个感觉现象就认识了，而是要认识它的本质，认识一般性。把个别的东西集中起来，集中成一般的。从物质到精神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观察中研究它的特性，然后集中成为一般的东西，这样就完成了由物质到精神，完成了这个集中。反过来就可以指导工作，就可以由精神到物质，进一步创造新的物质。从《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认识论的观点。不懂辩证法的人，看到只有这点点红色，就觉得完了，但是懂得辩证法的人，看到这个问题就感到这是特点，这里有个方向问题，这样就坚定起来，就是要搞红色小点，革命就是要从这些根据地搞起，就是要在农村搞起。我们要学习这种方法，注意发展新的个别的东西，研究它的特点，然后从这里归纳一般的方向。

“……然而一般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的形式；它是把许许多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

恩格斯在下面举了例子：

“……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之下受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气体氯化氢；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了上述的条件，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这件事情，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了千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自然界中的一般的形式便是规律，而对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谁也没有自然科学家谈得多。”

凡是规律总是一般的东西，这里要注意由个别到特殊到一般这个规律，个别经过特殊，才能真正指导一般。在观察个别东西的时候，还要研究某些特殊条件，条件弄清楚了，然后才能抓着一般性。经验主义就做不到这点。上一段恩格斯反对经验主义，就是批评这点，马克思主义不只依靠表面现象观察，不是搞个别归纳，而是先研究特殊性，然后再上升到一般。赫鲁晓夫在美国参观玉米，就没有上升到一般，他只是表面上看美国种玉米好，能高产，他没有研究美国种玉米有什么条件，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玉米高产的规律，机械地拿到苏联去种，结果就失败，没有找到规律。现在对化肥也是这样，以为把化肥一撒下去，植物就长起来了，不知道用化肥还要有一些特殊条件，把这个规律掌握了，才

能用化肥高产。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认识规律是普遍的，是永恒的，又是无限的，但同时又是有条件的。从普遍的无限的这方面来看，它是有条件的，只要有这个条件，哪个星球上都能出现这个事情，这是绝对的，但是一定要有条件，所以它又有相对性。恩格斯在这里强调永恒性，他所以讲永恒性是反驳耐格里。在《反杜林论》里，他又否认永恒真理，因为杜林片面地讲永恒真理，杜林只讲绝对的一面，而恩格斯就讲相对的一面。耐格里片面地讲相对的一面，恩格斯就强调绝对的一面。因为真理是有相对和绝对的，这里帮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怎样阐明这些理论，怎样反驳错误的片面的理论。

"……因此，当耐格里说如果人们不限于只研究有限的东西而把永恒的东西和它搅在一起就会把有限的东西弄成不可理解的东西的时候，他不是否认了自然规律的可认识性，便是否认了它们的永恒性。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这种认识在本质上是绝对的。"

有些人说，恩格斯没有讲过真理是绝对的，这种提法在这个地方就可以驳倒了。为什么有这种提法呢？因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只讲到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有些人不注意《自然辩证法》，就认为列宁的意见和恩格斯的意见不一致。

"但是这种绝对的认识有一个重大的困难。正如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只是由有限物所组成，绝对地进行认识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的头脑所组成，而人的头脑是一个挨一个地和一代跟一代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常犯实际的和理论的错误，从歪曲的、片面的、谬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确定的途径进行，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

真理（普里斯特利）。”

这段话是说，认识绝对的东西是有困难的，有时要许多人花脑子才能认识，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这段话大家可以联系毛主席讲的：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飞跃。我们可以认识绝对的东西，但这不是容易的，是有困难的，要经过许多反复，中间要犯错误，要通过克服错误的过程，通过各种认识上走弯路的过程。

绝对认识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认识了一般的规律，就算是认识到绝对的东西。这个意思是一个比较有限的条件下认识。只要认识到氢和氯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之下受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气体氯化氢。认识了这个条件就有这个结果，就算是认识了一个永恒的东西了。就这一个有限的规律本身来说，已经是认识它的永恒性了。但是这个认识可能还是有限的，这只是认识了氯和氢的关系的一部分，氯和氢除了这个规律以外还有其他关系，氯和氢碰到一起燃烧起来，化合起来就是盐酸。我们只了解爆炸这件事情还不等于认识氯和氢还有其他作用，爆炸以后会变成什么东西，不知道，还有其他方面的规律，我们还不认识。你要认识其他方面的规律，又得花力气来研究。所以，虽然找到一种一般的规律，虽然有点普遍性，但是这个普遍性只是真理的一小部分，还不是全部，因此还是没有绝对性。就总的来说还没有绝对性，因此，这个认识还是有限的，还是相对的。就是说只认识这个问题，这个认识还是受研究条件的限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绝对性认识另一个问题，就是对事物各方面的规律充分的认识。全面的认识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绝对性的认识不是一、两个人的认识，甚至不是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的认识，甚至于几万

人、几十万人也认识不了。事物的规律可以是无限的。我们是不是把社会经济的规律绝对的、全部的认识了，还没有。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经济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不认识。就是现在，也是大体上估计一下，还很不完全，到了共产主义，还要具体的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认识，因为共产主义还要发展，社会经济永远还要发展。因此对社会经济里面所包含的规律可以是无限的，我们要认识它就要经过无限的认识过程。所以这种绝对认识就是一种真正的无限认识，就是说，这种绝对性本身是无限的，人的认识也是没有完的，只有经过无限的认识发展过程逐渐接近它。恩格斯的这段话就是讲这种无限是要经过世世代代人的努力逐渐增加的，而在这个努力中还要走弯路。某一方面的规律经过曲折、经过错误认识清楚了，又有另一方面的东西我们还不认识，又要经过曲折、经过错误才能认识。所以，这个无限本身就是一个无限的认识过程。

相对、绝对的统一，有两种意思：

一个意思是，每一种规律本身就是相对、绝对的统一。每一种规律都是有条件的起作用，只要有这个条件，不管在哪里都起作用，这是绝对的；但是，它要起作用一定要有条件，这又是相对的。这就是又绝对又相对的道理。对一个真理比较容易认识，一个人经过若干次摸索，经过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若干次反复就认识了。

另一个意思是，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每一个真理都只是相对真理，都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这个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就是讲宇宙的绝对发展过程是无限的，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也是无限的。

下面是讲第二种绝对和相对的意思。

“……因此，对无限的东西之认识是被双重困难所围困着，就其本性来讲它只能在一个无限的渐进的过程中实现。这已经足够使我们敢于说：无限的东西可以认识，正如不可以认识一样，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马克思主义者就需要这样看，只说无限的东西是不能认识的不对，但是说无限的东西是可以认识的也不对。

“耐格里却可笑地说着同样的话：‘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能认识在我们感性知觉范围内的**一切有限的东西**。’我们感性知觉范围内的有限东西在总和中就构成无限的东西，因为**耐格里正是根据这个总和构成他的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如果没有这个有限的东西等等，他就没有关于无限的东西的任何观念了。”

无限就是有限的总体，这里说明耐格里不懂辩证法，结果自相矛盾，还是受辩证法支配。

“在这无限性研究面前有下列几点：

（一）空间和时间上的‘细小领域’。

（二）‘感觉器官之大概不完备的发展’。

（三）‘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变动的、暂时的、以及程度上不同的、相对的东西，因为我们只能把数学概念转用到自然物上，只能用衡量它们本身的尺度来判断自然物。对于无限的或永恒的东西，对于经常的和稳定的东西，对于绝对的差异，我们是一点观念也没有的。我们准确地知道一点钟、一米、一千克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力和物质、运动和静止、原因和结果是什么东西’。”

这三段话还是这样一个意思，耐格里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说只能认识有限，不能认识无限。时间和空间这些最细小的领域我

们不能认识；感觉器官不完备，所以不能认识无限，我们认识事物只能用有限的来衡量它，不能设想无限的尺度。所以，他说我们只能准确地知道一点钟、一米、一千克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力和物质、运动和静止、原因和结果是什么东西。不是具体的有限，在感觉上可以感觉到的东西，我们就不认识，一般的时间、空间、具体的一米、一点钟我们可以认识。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抽象和具体的问题，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问题。耐格里还是经验论者，他认为我们感觉上能感觉到的东西就能认识。至于抽象的东西，理性所设想的东西，我们不能认识。他是这种观点，就是否认理性的实在性，把无限的东西和理性上抽象的把握的东西混在一起。

下面恩格斯就反驳了。

“这是老生常谈。首先人们从可以感觉到的事物造成抽象，然后又希望从感觉上去认识它们，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

时间、空间本来是脑子里抽象出来的东西，只能用思考去理解，不能用感觉去理解。

“……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了他所习惯的经验的认识之中，以致他以为他在研究抽象的时候自己还是在感性认识的领域之中。”

理性认识是一种感性认识的飞跃，是质变。具体的东西可以用感觉来认识，抽象的东西只能用思考才能认识。我们研究这段的时候，可以参考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一节中提到的，我们有些问题不能凭感觉，要用脑子去想才能了解，有些事情直接看不到，要用脑子去想才能想到。你要用眼睛去看资产阶级的性质、根本特点行不行呢？比如肯尼迪是帝国主义的头子，他就代表帝国主义的本质。你能不能从肯尼迪的脸上就可以看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呢？他的脸和其他

人的脸一样，所以必须根据他所作的具体事情概括起来，然后给他一个概念，叫帝国主义本质。

这段总的来讲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驳耐格里的荒谬。他要想看抽象的时间、空间、力和物质，抽象的运动，这些东西当然看不到。

“……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是其他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小时的总和，空间是其他的某种东西而不是立方米的总和！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假若没有物质当然都是无，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然而确实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还没有任何人以其他的某种感性方式看到或体验到物质本身和运动本身；人们所碰到的只是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的实物和运动形式。实物、物质无非是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本身无非是一切从感觉上感知的运动形态的总和；像‘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种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因此，只有研究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且因为我们认识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

这里是讲抽象的东西不能离开具体的东西，一方面不能希望直接去感觉到抽象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要了解抽象的东西，就一定要以具体的东西作基础，从具体的东西里面概括出来。你只要把具体的东西一个一个地研究清楚了，把它的特点研究清楚了，一般的东西就搞清楚了。

“……因此，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仅仅是说我们首先凭借自己的

头脑从现实世界制造了抽象，然后却不能认识我们自己制造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可以意识到的事物，而不是可以感觉到的事物，但一切认识都是由感性来测量的！”

这是耐格里的经验主义的看法，他就不知道还要用理解来概括。

“……这正是黑格尔所指出的困难：我们当然能吃樱桃和李子，却不能吃果子，因为没有任何人吃过果子本身。”

经验主义就是这样，要吃果子就是这样荒谬。我们平常也有这种人，他只相信他直接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直接感觉到的东西就不相信。赫鲁晓夫实际上就是不相信理论，他只相信胃的感觉。什么叫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桌子上、盘子里多一点就是共产主义，离开了黄油、面包、土豆、牛肉，共产主义就不能理解。修正主义都是由经验中来的。

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就是经验论。我们去年、前年讲大好形势，资产阶级就不相信，有些半信半疑，有些人不相信不敢说，有些人就说出来了。我们说我们不孤立，他们说我们孤立了，从现象上看是孤立，我们说不孤立是从理性来的，资产阶级不相信理性。现在有些资产阶级也相信了，为什么相信了呢？因为他看到周总理出去有那么多人欢迎。外国有个文学界的人，就认为中国孤立，要垮台，一直到今年才相信。他说：为什么中国的石油自给自足，为什么周总理到非洲去飞机场上会受到那么多人欢迎？他现在还是不理解，还是凭感觉看问题。他为什么不相信呢？他认为都是例外。多少有点理论就不会认为是例外了。

“如果耐格里断言自然界中大概有许许多多我们感官所不能感知的运动形态，那么这只是一种可怜的遁辞而已，它就等于——至少对于我们的认识来说——否认运动是不可创造的这个定律。

要知道，这些不可感知的运动形态是可以转化成我们所能感知的运动的！这样一来，例如，接触电就不难说明了。”

这段是耐格里认为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他认为我们的感觉器官不完备。恩格斯讲自然科学家抱怨自己有五个感觉器官，耐格里就抱怨因为感觉不到，因此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有许多东西我们不能认识，抽象的东西不能认识，还有许多具体的东西也不能认识，只要我们感觉器官感觉不到的，就不能认识。恩格斯指出这是遁辞，有些理由他回避了。所谓的理由，就是下面恩格斯讲的，说我们的感觉器官虽然有限，但是不完全限制我们的认识，我们还是可以认识的。电子里面小的东西怎么能认识呢？实际上，现在的电子也可以听到，现在研究电子有一种计数管，电子在里面能起作用。电子通过一下就发生爆炸，这些爆炸就可以发生声音。所以，爆炸一下就知道有一个电子通过。而且还可以看到，现在的电视就是物理电子冲击到荧光板上，本来是没有光的，但是冲击到上面就有光。因此就有一种仪器，有一个电子接触到荧光板上，就亮一下，每一个电子通过都可以看到。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们的感觉不能感觉到，这是遁辞。

耐格里否认运动是不可创造的这个定律，实际上，是运动可以转化。运动不可创造，就是一切运动都是有来源的。不是可以主观上去创造，他认为有许多运动形态我们绝对不能感知。这种观点在认识上否认了运动可以转化，否认现在不能感知的运动形态可以变为感知的运动形态，我们能感知的运动形态都是有来源的，都不是随便能创造的。他说：有些运动形态我们能感知，有些就不能感知，感知和不能感知这两种运动形态绝对没有关系。同时又设想我们能感知的运动形态就仅仅跟我们的感官有关系，跟不能感知的运动形态绝对没有联系。这样一来我们的感官也能创

造一种运动形态。如果我们的感官存在了，这种运动形态也存在。主要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把运动形态是不可创造的这个定律搞清楚了就能懂，这两个提法是一个意思。

“Ad vocem〔关于〕耐格里。无限之不可理解。当我们说物质和运动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灭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步存在着的，即是以恶的无限的形式存在着的，而且这样一来……”（第 197 页，新版第 214—215 页）

这段话实际上是解释上面的话，我们讲这个规律的时候，就是说，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步存在着的，它本身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谁也不能消灭，谁也不能创造。无限的进步也叫恶的无限，就是说这个无限没有尽头，有时感觉不可理解。对人的思想来说，有点难理解、有点作恶的意思。

“……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理解了这里所必须理解的一切东西。最多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过程是同一东西——以大循环的形式——的某种永远的重复呢，还是这个循环有向下和向上的分支呢？”

就是有进步和退步，最多有这个争论。这两个理解是有机械论和辩证法的分歧，机械论的理解是同一个东西永远重复。真正的唯物主义机械论也承认物质是无限的存在，但是就是不承认发展，而辩证法就要承认发展，承认有进步、有退步，有向上、有向下。

“恶的无限性。”就是没有什么尽头。

“黑格尔已经把真实的无限性正确地安置在充实了的空间和时间中，安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第 198 页，新版第 215 页）

这个意思就是说，黑格尔的著作里面对无限性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恶的无限性，另一种无限性是跟有限来的，从另方面看它又

是有限的。这种问题具体例子可以找，刚才我们讲的一般规律也是无限的，但是它和有限结合，又是有条件的，这是一种真实的无限性。比如数学上的无限大无限小，它也可以有一个范围，它是无限的，但是可以有一个范围。我们上次也举了这个例子，曲线同直线的关系，弧和弦的关系。把弧线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小，这个缩小可以无限，小到直线和曲线成为一个东西了。无限大也是这样，把曲线或弧线无限放大，结果直线和弧线相等了。在数学上一想起来成为相等了，就同有限相联系。黑格尔叫现实无限性；或者叫真实的无限性，恶的无限性是讲抽象，没有有限范围的那种无限，这样一种无限叫恶的无限性。

这个问题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普通算术的分数，三分之一是一个有限数目，如果用算术计算，得一个什么等数呢？三分之一等于零点三三……这个三就是无限的，怎么也结束不了。这个例子可以了解这个问题。无限是现实无限性，它尽管是无限的，但是它有一个范围，有一个尽头。

“黑格尔已经把真实的无限性正确地安置在充实了的空间和时间中，安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这是说黑格尔把有限和无限统一起来了。

“……今天整个自然界也都溶解在历史中，并且历史和自然史之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在其自身中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恶的无限性——”。自然界和历史要讲它的发展前途永远没有范围，所以这是恶的无限性。

“……这只是被扬弃了的、虽然是本质的、但却不是占优势的因素。”

恶的无限性是被扬弃了的本质，设想自然界和历史只是无限

的发展过程，不能设想一个尽头。这个问题虽然本质上是这样，但是却不是占优势的因素。在认识的时候只讲恶的无限性，没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具体认识问题的时候，还要把无限和有限结合起来。实际上，我们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认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恶的无限，但是我们研究总有一定的范围，总是把无限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来研究。

"……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的范围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去认识自然界时所用不着的。"

后面讲，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还是地球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这些东西还是以地球为基础，对我们的地球有关系我们才能研究，恶的无限我们可以设想，但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还是有限的。所以他说恶的无限被扬弃了，我们也不能否认恶的无限，但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具体的东西还是有限的。这段基本上是这样的意思。

"……此外，只有千百万个太阳中的一个太阳和这个太阳系才是我们的天文学研究的主要基础。对地球上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我们是或多或少地局限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而对于有机科学则完全是这样。但是这对于现象的实际无限的多样性和认识自然界却没有本质的损害，类似地、但更大地局限于比较短促的时间和狭小的一部分地球，对于历史同样也没有害处。"

"（一）依据黑格尔，无限的过程是一个空漠的荒野，因为它不过是同一物的永远重复：1+1+1 等等。" 这个问题实际意义不大，不必深研究。

"（二）然而实际上它并不是重复，而是发展，是前进或后退，因此它成为运动的必然形态。它决不是无限的，这一点更不必说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地球生存时期的终结。但是地

球也不是全宇宙。”

实际生活中，无限是发展的，但发展有阶段。所以在时间上，它也是在这个阶段来说是有限的，在空间方面来说，有一定范围。我们说要研究有限，都是跟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联系的这种无限，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某一个范围。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的历史在时间上是没有任何发展的，要不是这样，自然界就不会是精神自己的外在了。”

这是讲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认为只有精神是无限的，自然界是不被发展的。

“……然而在人类历史中，黑格尔承认无限的过程是‘精神’的惟一真实的存在形式，虽然他空想地认为这个发展是有终结的——在黑格尔哲学的确立中。”

“（三）也有无限的认识：questa infinita che le cose non hanno in progresso，la hanno in giro〔事物在前进过程中所没有的无限，在循环过程中必定有〕。”

这也是从耐格里来的，他本来否认无限认识，但是他说在循环过程中是无限的。

“……这样，运动形态替换的规律是无限的，是自封的。然而这样的无限又感染了有限，只是片段地出现。$\frac{1}{r^2}$也是如此。”

$\frac{1}{r^2}$是指的圆周率，圆周率的公式是有限的，但是这个等式一边是有限的，另一边是无限的，无限感染有限。

“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规律。”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自然规律是一般的变化规律，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它所以能起作用，是表明自然界历史发展到一个阶段，像水的沸腾和结冰，要依靠一定的压力和温度。这个规律只在自

然界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一个发展阶段，像地球这个阶段，才能表现出来。这是反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事物都是现成的，永远如此，永远不变。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化论，所以他有这种观点。恩格斯讲：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自然的一切规律都表现为历史的规律，不仅仅人类有历史，自然界也有历史，每一个规律都表明自然界发展的历史规律。

下面都是例子，不念了。

这里有一个名词，倒数第五行有个“热之唯动说”，就是说热是由运动产生的，然后向其他能量转化。各种运动形态都能转化，热的形态是由机械运动转化来的，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这个规律也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规律。

这段的最后两句话：“……但是如果把这个理论彻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去，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会变成某一个宇宙系统从产生到消灭中一个跟一个地发生的变化的历史表现，就是说，会变成在每个阶段上由其他的规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其他现象形态来支配的历史，而且这样一来，只有运动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

就是说，每一种具体运动形态的规律，都是相对的，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所以真正完全绝对的东西就是运动本身，是没有条件的，具体的运动形态都是有条件的。每一种具体的运动规律，如水变成汽是普遍的，有绝对意义，但还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而运动本身就没有条件，宇宙是永远运动的，这是无条件的。这一点是辩证法的根本观点，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有人有这种问题：辩证法认为一切都是有条件的，那么运动本身这件事是不是有条件？我们搞辩证法的人要回答，就是普遍的运动，总的运动是无条件的，具体的运动是有条件的，可以互相转化。一

切都有条件，运动是没有条件的。

下面一段：

“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并且已经很公正地被推翻了。但是当我们在研究中愈益深入时，它又愈来愈出头了。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黑格尔，《自然哲学》，第155页）。”（第200页，新版第217页）

古代天文学家认为地球是中心，太阳围绕地球转，那种观点是错误的。哥白尼就反对。现在又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这不是回到以前的观点，不是说地球是中心，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说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研究是以地球为中心，我们的一切研究为地球服务。这不是又回到太阳绕地球，而是说我们的研究目的还是为地球服务。

“……（整个巨大的太阳只是为着一些小行星而存在着。）我们只可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虽然断言这些科学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因而只是相对的，可是它们并不因这种说法而损失什么。如果我们认真地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么我们就会使一切科学停顿下来。对我们说来，只要知道，在相同的情况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就够了〕。”

我们的研究点要有一个中心，现在研究的中心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

下面讲：“认识。蚂蚁具有和我们不同的眼睛，它们能看见化学（?）光线（1882年6月8日《自然界》，勒保克），但是在对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光线的认识上，我们却比蚂蚁前进得多。我们能够证明蚂蚁看得见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并且作这种证明只是以我们的眼睛所造成的知觉为基础，这个事实就表明了人的眼睛

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

这里是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可以利用运动的相互转化，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有思考能力。有些运动形态我们的感觉不能接受，如紫外线，但是我们可以运用工具设法把它变成感觉能接受的形态。

下面讲：“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们的思维活动。关于思维活动的情形也正如关于视力的情形一样。”

所谓思维活动形式也是有限的，但是也不能限制我们的认识。思维活动有抽象性，有时会犯教条主义，抽象的结果错了。它只能概括地了解问题，不能像感觉器官一样具体地感觉问题。思维有它的缺点，思维里面的东西没有感觉接触的那样生动，那样具体。可是这种缺点对我们的认识没有限制，我们可以把抽象的概念不断地综合起来，又丰富了具体的东西。把一个具体的事物发展过程，扩大到思维中，把握起来，所以思维可以像感觉一样，有缺点，但是不能限制我们的认识，不能说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

“……为了知道我们的思维能探究到什么，在康德后一百年，企图从理性的批判和从认识工具的研究去确定思维所能达到的范围，是没有任何必要的。”（第 200 页，新版第 218 页）

康德的哲学专门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多少。他有什么原则呢？那是错误的观点，我们这里用不着去研究这个问题。

“……这是徒劳无益的，正如黑尔姆霍兹用我们的视力的缺陷（的确是必然的缺陷：能看见一切光线的眼睛，正因为能看见一切光线，就什么也看不见）和眼睛的构造（它使目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不能给予完全正确的再现）来证明我们的眼睛对所看见的东西的性质的报告是不正确和不可靠的一样。”

黑尔姆霍兹的认识有缺点，他想证明我们的眼睛有缺陷。我们不需要作这个研究。

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的确是必然的缺陷：能看见一切光线的眼睛，正因为能看见一切光线，就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什么东西都看到，到处都是亮的，如果我们的眼睛把光线看得跟太阳一样，我们的房子就是一片光，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是辩证法，没有比较就不能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光明和黑暗的比较，对事物就不能认识。毛主席讲真理是和错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没有错误也看不到真理。不搞百家争鸣，大家把不同的意见比较一下，究竟哪个人是真马克思主义，就看不清楚。赫鲁晓夫就不敢比较，所以他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发表。我们将了一军，他勉强发表，《真理报》印了5万份，只有国外版，没有国内版。所以苏联国内看不到我们的"二十五条"，当然也有看到的，只是很少的。

人的感觉器官有些缺陷，因为它有缺陷倒有好处。认识也是这样，因为它有抽象性，不那么生动，所以避免那些混乱，就可以抓着最本质的东西。善于思考的人和不善于思考的人就有这个区别。所以认识能力，认识器官的有限性，反而是它认识有限的一个条件，没有辩证法观点就不能了解这个问题。

这段以后可以不研究了。

"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究竟蚂蚁把化学射线看成什么样子。谁要为这件事情苦恼，那我们是一点也不能帮助他。"（第201页，新版第218页）

这就是说，有些缺陷对我们没有什么妨害。

下面这段是讲自然科学的假说问题。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件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就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

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那种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的新的说明方式了。更进一步的实验材料便会洗清这些假说，取消一些，修正另一些，直到最后建立起一个纯粹化的定律。如果我们要等待建立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么这就等于说在此以前要停止思想的研究工作，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这段话可以用毛主席的《实践论》作参考。《实践论》也是讲的这个意思：要认识真理，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假说的阶段，不能一下子得到正确的认识。在得到正确的认识以前，先作一个假说，做了假说有什么好处呢？假说就是初步把物质变成精神。但是变的准确不准确还不知道，所以反过来，用假说去指导我们的实践过程，来检验这个假说，有不对的就可以纠正。反复多次就可以最后完成这个正确的认识。这是科学研究的认识方法，也是科学的逻辑。这个逻辑不仅仅是归纳、演绎，是由具体认识到假说，由假说再回到实践，再做出第二个假说。如此反复，最后变成正确的认识，变成真理。这种反复也是对立的，辩证逻辑要和实践联系起来。我们前面讲的逻辑的那一部分，恩格斯的意思是利用逻辑认识问题，也就是在理论上认识，首先要利用各种各样的逻辑形式，不要片面地把某一种逻辑形式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那样的看法不对。不管哪种形式都有缺点，归纳逻辑本身不能证明真理，不能证明必然性，演绎逻辑也有限制，它也要有一个大前提，如果大前提是错的，它的结论也会错误。每种逻辑都有缺陷，但是都有用处，都应该使用。不过更根本的方法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而是对事物的矛盾的分析，对事物的特点的分析。如果善于分析，就用不着一个一个的归纳。你研究一件事情，如果对这件事情分析的好，你也可以得出比较好的结论。但

是这个结论对不对？还要经过实践。所以，辩证法对辩证逻辑要求各种形式。着重分析事物的矛盾，事物的特点，把实践当做推理的条件。实践是证明必然性的惟一的标准，运用实践的时候，要对实践的条件进行分析、研究，我们采取的总的概念就是这样。所以要得到真理，首先要观察一下各种事物，加以分析，做出结论，然后再实践，再观察，这样修正假说，修正几次就得到了真理。

下面："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观念（哈勒尔和歌德）。"

不懂得辩证法的科学家就有这个问题。

"……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因为人的全部认识都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在历史学科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互相排挤的，可是没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思的东西。——这种观点的最后形态就是'物自体'。"（新版第 218—219 页）

不可知论就是假说多，假说互相排挤，归纳的结果前后不一样，后面的归纳推翻了前面的归纳，结果就出现了不可知论。认为没有必然性，事物的必然性是主观的东西。实用主义就有这种观点，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假说。这种观点，恩格斯在札记上也提到了：把什么都看成是假说，这种人很浅薄。要经过假说才能得到真理，他就认为不可能得到真理。这种观点的最后形态就是物自体，这是康德的观点。

"……认为我们不能认识物自体的这种论断（黑格尔，《百科全书》，第四十四节），第一，是离开科学而转到幻想里面去了。"

物自体是幻想，既然说不能认识，为什么你又说有物自体？所以这是幻想。

“……第二，它丝毫没有添加我们的科学知识，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于我们就是不存在的了。第三，它是纯粹的空话，并且是永远不适用的。抽象地说来，它好像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且让我们把它应用一下。如果一个动物学家说：‘一只狗好像有四条腿，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实际上是有四百万条腿或是一条也没有’，那么我们对这个动物学家会作什么想法呢？如果一个数学家首先下定义说三角形有三条边，然后又说他不知道三角形到底是不是有二十五条边，2×2 好像等于四，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数学家会作什么想法呢？”（第 201—202 页）

把这些已经决定的真理看做是不定的真理。

“……但是自然科学家们却小心地避免在自然科学中应用物自体这个名词，只有在转到哲学时才允许自己应用它。这就最好地证明了：他们是如何不严肃地对待它，它本身的价值是如何地微小。如果他们严肃地对待它，那又 a guoi bon〔为什么〕终归要研究点什么东西呢？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一事实就有一定的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认识事物，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下面一段是恩格斯引的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是黑格尔驳康德的物自体的一段话。康德认为我们看见的东西都是表面现象，都是假象，和现实的东西没有关系。黑格尔就驳他，但因为他不是唯物主义，所以他不能用现实驳，只能用逻辑来驳。他说：康德你说看见的东西是假象，可是你又把物自体包含在假象里面，这是自相矛盾。就是说，一方面认为你的感觉不能认识世界，你又说你的感觉已经认识了世界的一切内容了。黑格尔的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黑格尔说，你一方面认为假象是不存在的，不能反映

客观存在的物自体，可是你又说，存在假象是包含世界的一切，所以是自相矛盾。

“‘……这个内容可以完全没有存在、没有物或物自体作基础；这个内容对于自己始终是它那样；它不过从存在转到假象而已。’”（第202页，新版第220页）

它本身就是存在，就是假象，所以就没有物自体，假象本身就是客观存在，这是唯心主义的话翻成唯物主义的话，归根结底还是承认了假象就是反映了存在，并不是跟存在没有关系。

“……黑格尔在这里比起近代自然科学家来是一个更加坚决得多的唯物论者。”

就这句话来说，他是承认人所以认识现象是存在的反映，这话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

“康德的物自体之有价值的自我批评，〔证明了〕康德在思维着的‘自我’上面也失败了，在‘自我’中他也找出了一个不可认识的物自体（黑格尔，第五卷，第256页及以下各页）。”

这段意思，好像在康德写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到这个问题。人既不能认识物自体，人就像瞎子一样生活，就生活在自我中。世界上只有我可以看到客观世界，所以，在《实践理性批判》里面又讲到，我们虽然不能认识物自体，但是实践理性引导我们和世界的本质得到一致，实践理性能使我们不至于走错路。实践理性里面包含对上帝的一致，一直使得我们能跟世界本质沟通的一致那样。所以他这里讲康德的物自体，有一种自我批评。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

（1964.3）

## 第一次辅导

（1964.3.10）

今天开始讲马克思、恩格斯书简。

我准备用我自己翻译的本子来讲，因为准备时是用的这个本子，所以讲时也用这个本子。这个本子翻译的时间早一些，译法接近直译，稍微难看一些，其中有一两处翻译错了，我讲的时候提一下。大概编译局要把这个本子重新校过，另外出版，既不是这本，也不是另外一本。出入不太大。

*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辅导，是艾思奇在 1964 年 3 月间，给中央高级党校"59 班"、"60 班"哲学专业所讲的讲课速记稿，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用的是艾思奇自己的译本（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 年 7 月第 1 版，1961 年 6 月北京第 8 次印刷），研究时，可参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新译文（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 年 6 月第 2 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没有的 4 封信可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还可参考 1962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这里不再一一标明。讲课稿原无标题，现在的标题是我们整理时所加。

##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的意义和结构

“《书简》集”也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很早的时候（大概在1936年、193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有一个版本，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所以我的版本也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后来出的两卷集里，改叫做《书简》，原因就是原来这信集里只有9封信，连给库格曼的信都没有，后来马恩选集再版时又增加了十一封，范围比较大了。加上的这些信都是中间的，两头是原来的。加上的这些信里讲阶级斗争、政治、国家的较多，都是揭露拉萨尔、巴枯宁这些人的。因此，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而是涉及到国家与革命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就不再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而叫做《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我的译本仍然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因为我原来最早出版的版本就叫这个名字，所以就沿用了这个名字。沿用以前的名字也不算大错误，因为革命问题、阶级斗争、国家问题也可以算是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叫做《书简》也好，因为它不仅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这11封信，就可以看到，这个本子虽小，但包罗万象，比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问题、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国家与革命的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包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问题、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在这书里都有了，不过没有展开就是了。所以，这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

有的同志说，你讲讲现在读这本书的意义。我说，这里的内

容很丰富，这一点就很有意义。所谓意义，简单地讲，无非是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世界观的认识，加深我们对毛主席思想的认识，加深我们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重要性的理解。这里面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修正主义，但是反对了各种机会主义。这里有一些反对机会主义的信，特别是 1865 年 2 月 23 日给库格曼的信，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很好的参考；还有第十五封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布拉格等人的通告》，也是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材料；此外，第十一封信、第十二封信都是揭露巴枯宁的，对反修正主义很有参考价值，这两封信揭露巴枯宁搞宗派主义、分裂活动，嘴上讲团结，利用团结的口号搞分裂，我们“七评”上面就引用了上面好几段话。其他的反对蒲鲁东的信里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在反修正主义中参考的东西。

所以，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意义就是看现在斗争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有什么意义，它本身是包罗万象的，很难说哪点有意义、哪点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根据现在斗争的需要来说，就可以着重讲某点特别有意义。这本书不仅帮助我们了解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著作，我们哲学专业要注意根本的理论方面；同时，要注意里面反对机会主义的信，这对我们今天反对修正主义很有意义，这一点不能忽视。这方面的信主要就是中间的几封。

整个这本书好像很有逻辑地安排，同时又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编的。包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最早期著作直到恩格斯临终的时候(1846 年到 1894 年)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信，按照时间排列起来。因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大体可以看到一些线索。同时，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斗

争。和马克思、恩格斯斗争的机会主义主要有三派：拉萨尔派、蒲鲁东派、巴枯宁派。杜林算不了什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影响和活动，后来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一时有了名望，但是时间很短，影响很小，不像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他们在理论上、实际上都和马克思作过长期的较量。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线索，可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线索。

所以，这本书有些像小百科全书，仔细研究，味道很深。不但是历史的顺序，而且逻辑上也有一定的联系。

第一封信很长，里面讲到全部的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上层建筑，包括国家和观念形态、由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的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线索。

第二封信很短，接触到了阶级问题。

第三封信进一步谈到无产阶级的党、宪章党的问题，还提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

第四、五封信谈到了和阶级斗争有关系的军队问题。

第六封信就进入政治了。其中揭露了拉萨尔的投降主义。第一次鲜明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应该怎样，是否能够随便地妥协？阐明了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和机会主义观点的对立。

第七封信谈到政治斗争。有政治斗争就有党的问题，这里就谈到党的问题，反对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

第八封信中间插了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这是插进来的，本来这些信主要是讲政治的。这里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方法，就是不要只看现象，要看本质。科学的任务是观察本质，不要只看表面现象。把庸俗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政治经

济学对立起来。

第九封信就进入到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谈到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

第十封信也是谈革命问题。

第九、十封信都是谈革命问题，又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称赞巴黎公社。这里有这样的思想：革命士气可鼓不可泄。尽管巴黎公社有错误，是失败了，但是你应该承认他们有冲天的干劲，对这种干劲应该赞扬，这是历史性的创造。所以，革命运动，不管他犯什么错误，首先要肯定他的创造性。当然，错误也要检查，但首先要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要看他创造历史的英雄行为。

第十一、十二封信就进入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这里主要是反对巴枯宁的宗派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权威？无政府主义者想利用反对权威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搞宗派主义。赫鲁晓夫还不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个人迷信"！这和巴枯宁反对权威有什么区别？形式上有区别，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第十三封信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系，这里也是讲宗派主义和党的统一问题。前两封信是揭露那些高叫团结、实际上搞分裂的人。这一封信里讲到一个思想，就是我们要怎样的统一，是主要争取一两个犯错误的人和我们统一，还是面向广大群众，从广大的群众中找统一的意志？对那些犯错误的人，你争取他，他也可以进来，他进来以后当然经常要把错误的观点带到里面来散布。这些人要搞分裂，分裂就分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有广大群众做基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做基础，我们就可以忍受这些分裂。

第十四封信就是讲，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也有胜利。这

个胜利震动了世界，国际共产主义威信大大提高。但因此也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想按照自己的要求来解释这个运动，因此就要有各种不同的分歧，就会有人搞宗派。

第十五封信是一个通告，是对党内新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倾向提出警告，这种倾向是以三人的宣言表现出来的。三人里面包括伯恩斯坦。这封信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党内要出修正主义。当时不叫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这些人还不敢大规模地向党进攻，还没有系统地进攻，但是已经有宣言，并且已经提出纲领来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时已经开始反对修正主义了。

讲到关于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的，就是这几封信。从第六封信到第十五封信，包括了以下六个问题，阶级斗争、政治、国家、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正主义。

从第十六封信起，就开始进入历史唯物主义比较一般的理论范围。

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这四封信都是讲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这两个问题在第一封信里没有讲到，第一封信里只是讲了一个方向问题，没有讲到上层建筑对基础、生产起什么反作用。从第十六封信直到第十九封信，这四封信就专门讲到相互关系问题，肯定首先是物质决定精神，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最基本的，是第一性的关系。肯定了第一性的关系并不能否定还有第二性的关系，这就是精神反过来又作用于物质，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作用于基础，而且上层建筑还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这个相对的独立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每一种上层建筑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它最后决定于基础，但是它

还有自己发展的历史。比如，哲学有哲学的继承性，它是利用以前的哲学才能发展，它并不是割断以前的联系而简单地、直接地从基础产生的。另一方面，各种上层建筑有相互的关系，政治可以影响宗教，宗教可以影响政治。不仅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互相间有第二位的决定作用。政治斗争当然最后决定于经济，但政治斗争的形式（只讲形式）往往又决定于别种上层建筑。有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革命就采取了宗教战争的形式。所以采取这种宗教的形式，并不是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宗教情况决定的。如果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例如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就没有宗教的性质，因为中国的宗教势力不是那么大的。当然，中国的农民战争也还有宗教战争，如太平天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宗教的性质。

这里有历史的过程，也有逻辑的过程，开始第一封信讲第一性的关系，最后再补充第二性的关系，如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后来的补充是因为早期没有这样的问题，批判蒲鲁东主要是打击他的唯心主义，所以强调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强调了这个方面，就忽视了反作用的方面，忽视了上层建筑的相对作用。

第二十封信是讲农村公社问题，也是补充前面没有讲过的问题。农村公社是什么东西，会有什么发展前途？当时俄国还有民粹派，这封信好像是反驳民粹派在这方面的主张。1893 年到 1895 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系统地批判民粹派的主张。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已经开始谈到民粹派对农村公社的错误看法。

最后一封信是比较综合的，说明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并且也具体分析了一下经济基础的概念。

这本书大体上就是这样的结构，它既反映了历史，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构。逻辑结构和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逻辑结构也是历史发展的索引，是整个历史过程的胎生学的反映。整个的逻辑结构概括了历史，把历史的复杂过程撇开了，只把历史的最基本的关系概括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思想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把这本书仔细读一下，加以展开，联系别的经典著作，联系毛主席的思想、联系现在我们的斗争，是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的。

我从前翻译的时候，也没有看全书，现在准备讲课，就等于再学一遍，一学就感到内容很丰富。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前有人问我：你翻译这本书有什么体会？我一点体会都没有，只是适应大家的学习要求。因为从前根本没有这样仔细地读。

面对这么多的东西，怎样讲呢？我想这样：挑两篇最难的读一读，对其他各篇只把一些重要的向大家提一提。准备读一读第一封信、第十八封信和最后一封信，别的信就不读了，只把里面重要的几段指出来就可以了，因为那些信都容易读，没有读《自然辩证法》那样困难，我看大家是能够读下去的，问题是有些历史知识需要考证，可以由别的同志作些辅导，把知识性的东西讲给大家听，这方面我就不讲了。

## 二、第一封信（马克思给安能科夫）逐段讲解

现在就从第一封信讲起。

马克思的这封信（1846 年 12 月 28 日于布鲁塞尔）是他的另一部哲学著作，即《哲学的贫困》的提纲，他写了这封信就准备写《哲学的贫困》，所以这封信大体包括了这本书的思想。

第一段、第二段说明了蒲鲁东那本书很不对，很不好，他要批评那本书。

第二段的意思就是讲蒲鲁东随便抓了一些哲学的词句就想来解释经济问题。这里有一句难懂的话："蒲鲁东并不是因为作为可笑的哲学的所有者，才给予我们以政治经济学上的虚假的批判，他之所以把可笑的哲学供给我们，是因为他不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 年第 1 版，1961 年第 8 次印刷，第 5 页，以下引文只标页码）这个意思实质上就是讲，蒲鲁东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经济知识所以错误，并不直接地因为他有一整套错误的哲学，主要是他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客观情况不了解，所以勉强抓了一些哲学词句套上去。这是知识的贫乏，主要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研究，对于资本主义的规律没有什么知识。"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就是讲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联系。由于他在这方面没有去研究，根本不懂，所以就要勉强地解释。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抓唯心主义的哲学，从付立叶书里随便抓一些片面的东西来勉强加以解释。"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是借用付立叶的话，付立叶当然也不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但是他多少知道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锁链"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就要解释成"规律"。

"为什么蒲鲁东要讲到神，讲到普遍的理性，讲到与个人无关的人类理性，说它是任何时候都没有错误的，说它先是和自己本身相等的，说人们必须对它获得正确的表象，才能够掌握真理？何以他要依靠浅薄地摄取了黑格尔的哲学，来把自己描写成深刻的思想家？"（第 6 页）

他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浅薄的，但是还要借用黑格尔的名义把自己装作深刻的样子。他的思想内容，无非是说世界上有一种

永久存在、永久正确的理性，这种理性不知道存在在哪里，反正世界上有。人要得到正确的思想，就要从天上找到这种理性，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这种理性，才能得到真理。天上有一个永久的理性，只要你善于祈祷，它就会降临到你的脑子里来，宗教家经常讲祈祷，请“上帝”给他“启示”，牧师讲道的时候就说：上帝给了我一个启示，我讲给你们听，你们要好好地听，上帝是正确的。蒲鲁东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思想。你看，讲社会主义的人可是又讲神的理性。

蒲鲁东为什么这样说？下面一段是解释。蒲鲁东觉得有一个永久正确的理性，这不是决定于个人，个人只能去认识它，适应它，但不一定能够掌握它，个人的认识有时会错误，与理性不一致。为什么有这种情况？他自己给我们提供了揭破谜语的关键。

“他自己就提供给我们揭破谜语的关键。蒲鲁东在历史中看见社会进化的某种序列。他看出历史是进步的实现。总之，他看出作为单独的个体的人们，没有理解到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他们是错误地设想了自己本身的运动。这就是说，一眼看去，他们的社会发展似乎是超越于、独立于、不依赖于他们的个人发展的东西。”(第6页)蒲鲁东看到了历史发展不依赖于个人的情况。本来他已经看到了规律，看到了历史的必然倾向。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能力来解释这个事实”(同上)。

人的历史为什么不依赖于个人发展，为什么人不能自觉地认识它？有的时候是出乎人的意外的。中国的形势发展得这样好，不是就出乎他们意外的吗？今年有十大意外：石油自给，周总理到非洲这么受欢迎，法国居然能够承认我们，美国到处碰壁、对这么小的南越竟没有办法等等，都是意外。为什么历史是人的历史，但总是出乎人的意外呢？蒲鲁东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由于他不能解释这个事实,“于是在这里就出现关于自己显现着的普遍理性的臆说。再没有比发明神秘的理由，也就是发明缺乏正确意义的空话这件事更容易的了。”(第6页)好像有普遍的理性、客观的理性支配人类的历史，历史是服从于这个普遍理性的，所以他就离开了唯物主义。如果他真正了解了历史发展规律，那么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了,用不着用什么理性来解释。但是他不能这样解释，他觉得很奇怪、很神秘，只能用理性来解释。客观唯心论都是这样产生的，所有的客观唯心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宗教产生的原因都差不多,由于人类对自己周围的规律无法认识、无法支配，经常出乎意外，于是只好用上帝、鬼神来解释。古代的人知识少，就说是上帝，近代的人文明一点，就说是普遍理性。所以，理性和上帝就是一个东西。

下面作一个结论:“蒲鲁东先生不是正因为承认自己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完全无知——当他从普遍理性、神等等大吹大擂的名词里去找依靠的时候，他就承认了这一点——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理解经济的发展吗?”(第6页)

承认对历史的完全无知，因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没有能力去理解经济发展的法则。用神来解释历史，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自己无知。这并不是说，蒲鲁东公开承认自己无知，他认为自己还是很有知识的。马克思说他是客观上承认了自己无知。这是对蒲鲁东唯心主义的揭露。

下面是马克思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什么是社会，不管它属于哪种形式?是人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社会形式吗?决不能。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有一种相应的交换和消费的形式。在生产、交换、消费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就会有一种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形式，就会有一定的

家庭组织、阶级状况，一句话，就会有一种相应的公民社会。在这样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就会有一种相应的政治状态，而这政治状态正是公民社会之正式的表现”。(第 6—7 页)

上面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性的关系：由生产到交换、消费，一直到阶级、国家、政治状况等这样一条线索。这都用不着解释了。要解释的是这样的问题：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有相应的交换和消费形式，为什么马克思在这里不讲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那时他的概念还没有最后形成和确立，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还没有使用。这里说的交换，消费的形式就是指生产关系。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要求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对他也应该有历史的观点，不可能要求什么概念都确定下来。

这一段最后还有一句：“这一切，都是蒲鲁东先生不会了解的，因为他以为，只要从国家转向公民社会去求诉，也就是从社会之正式的总结转向正式的社会去求诉，就算是做了大事情了。”(第 7 页)这意思就是说，蒲鲁东不懂得国家政治是反映生产关系、生产力的，他不懂得政治是国家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就不懂得要解决经济问题，根本的关键在于解决政治问题、国家问题。所以，他以为可以离开国家转向工业、转向经济，直接通过经济搞一个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离开社会的集中的东西而只是讲社会性，把目的放在社会本身而不放在解决政治问题方面。这是批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

“还必须要再附加一点：人们对于自己的生产力——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并不是能自由选择的，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已经获得的力量，都是从前活动的产物”(第 7 页)。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是以前已经形成了的。

接着说："固然，生产力是人类的实践能力的成果，但这能力本身却决定于人类所处的情况：即由以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在他们之前已经存在（不是他们所创造的，而是过去世代的生产物）的社会形式所形成的情况。"（同上）这里也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以前已经形成的，不是自由选择的。

接着说："任何后来的世代都是靠着先前的世代所获得的生产力（它对于前者是作为新的生产的原料）而存在的，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在人类历史中间构成了一种联系，构成了人类的历史，这历史，当着人们的生产力愈更发展了时，从而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愈更发展了时，就愈更成为人类的历史。"这里是说，不仅仅是受自然的影响了。

"由此得出必然的结论：人类的社会史，常常只是他们的个人发展的历史，不管他们对于这点是否意识得到。"这里讲的"个人"不是讲一个人，而是讲许多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作用。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每一个人都在历史里起作用。不过这一点他不一定能意识到。

"他们的物质关系构成了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物质的关系，只是他们的物质的、个人的活动藉以实现的必然的形式"。这里的"个人的活动"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个体生产，还是每一个人都参加了活动的。这是和"普遍的理性"对立的，历史并不是受"普遍理性"的支配，而只是每一个人活动的总的结果。这里总是提"个人"。这并不是个人主义，并不是认为个人决定历史。而是说，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许多个人活动的总的结果。

"蒲鲁东先生把观念和事物混淆了。"这是把上面的话总结一下。历史是一个事物，不是受观念支配的，观念只是反映这个事物。而蒲鲁东认为，理性就支配历史，历史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

样，就把事物本身和观念混淆起来，好像事物的运动就是观念的运动。历史是许多个人活动的结果，所以是一种事物，它本身不是观念，它本身的历史不是观念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只是反映事物的历史。蒲鲁东认为历史是观念的历史，就是把观念和事物混淆了。

下面是另外的解释："人类决不放弃他们所获得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也不放弃那他们藉以获得某些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完全相反，为着要使争取得的成果不至于丧失，为着不要失去了文化的果实，人类在他们的交换方法不能再和既已获得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瞬间，就不能不改变他们的传统的社会形式——我这里所说的"交换"是指最广义的用法，就等于德文里的'往来'(Verkehr）的意思。"（第8页）这里讲的"交换方法"、"社会形式"都是指生产关系。这里讲的"文化成果"也不是指思想文化，而是指人类进步的成果，即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生产力是一种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生产力。我们到故宫博物馆去参观，古代的铜器、铁器有许多是生产力，但是也叫文化。要使生产力的成果不致丧失并继续发展，就要在一定的时候抛弃生产关系。"交换方法"就是指生产关系。"往来"就是指人和人的联系。

接着下面是："举例来说，譬如特权，行会和社团的制度，中世纪的法规等，都是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仅只是适应于既已获得的生产力和以前存在过的虽使这些制度产生出来的社会状况"。就是说，这些社会关系以前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

"在这些社团和法规的庇护之下，资本就积蓄起来，海上贸易发展了，殖民地也建立起来，而人们如果还要想保守着那使这些果实在其庇护之下成熟起来的形式，那么他们就会连这些果实也要失去。由此才发生了两次暴动，即1604和1688年的两次革命。"

（第 8 页）这里讲，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行会就不能要了，历史上发生的两次暴动，就是为了取消行会制度的。

“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以及旧公民社会的正式表现即政治的状态等，在英国都被打碎了。这样，人类实行生产、消费，交换等所依据的经济形式，都是过渡的、历史的。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就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又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就改变一切的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仅只是这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第 8 页）

这里面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混用了。我们讲生产方式，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生产方式已经包括经济关系了，这是现在这样用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用得不是这样严格的，他说的生产方式有时是指生产力，就是指技术方式、劳动的方式、劳动使用什么工具。生产方式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说用什么工具，另方面是在生产中人采取什么方式，互相结合。就是说，人和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结合，人和人怎样结合，这样两个方面。这里讲的生产方式主要是讲人和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结合，实际上就是指生产力。这两方面是分不开的。

“这些都是蒲鲁东先生所不了解，尤其是很少论证到的。由于没有注意到历史的现实过程，蒲鲁东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一些幻影作为补充，而这幻影是力图要成为辩证法的幻影。他不觉得有必要来讲一讲 17、18 和 19 世纪的事，因为他的历史是出现在想象的九霄云雾之上，并且是高高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限界之外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派的废物；这不是通常的历史——人们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

这里讲黑格尔的历史是在九霄云外的历史，不是在现实世界里面的历史，所以说是观念的历史。

"……按照他的观念,人类只是被观念或永久的理性利用来使自己发展的工具。"

黑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世界上的英雄人物都是绝对精神的工具，拿破仑到了德国的时候，黑格尔说：这是骑着白马的绝对精神。因为个人是没有意思的，所以黑格尔把个人和绝对精神对立起来了。

"……进化，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那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天国里实现着的进化。如果你揭去了这神秘词句的掩盖，你就会看见蒲鲁东先生是在向你叙述着那种秩序，那里面的经济的范畴都是在头脑中安排成的。用不着很大费力就能证明，这是最糊涂的头脑的秩序。"(第 9 页)

他口头上说世界理性支配历史，实际上他解释历史是用他自己脑子的观念来安排历史，不去研究客观世界，糊里糊涂的想，这种头脑是糊涂的头脑，是脱离现实的，凭脑子想来随便解释问题。和黑格尔一样，教条主义虽然讲的是马列主义，但实际上是把脑子里凝固化了的一些死的东西看做是支配客观实际的动力。

下面就具体地批评蒲鲁东的那些范畴。

"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一开始就讨论到他所爱好的玩艺，即价值。对于这一部分作品，我现在不打算加以分析。"

"永久理性的经济进化的系列，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他认为蒲鲁东脑子里所想象的那种发展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所以首先讲劳动分工。"对于蒲鲁东先生，劳动分工是极其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能算是劳动分工的一定的样式吗？难道行会制度不能算是劳动分工的另外的样式吗？又，难道在英国由 17 世纪中叶开始而到 18 世纪末叶完结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劳动分工，不是绝对地有别于现代大工业的劳动分工吗？"(第 9 页)

这里批判蒲鲁东的劳动分工的概念是死的概念，简单的就是劳动分工，他不知道劳动分工是一种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形式，不懂得行会制度的时候，有封建时代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初期工场手工业时代，有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分工；而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分工，又不同于现代大工业的分工。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分工。这些问题是蒲鲁东一点也不研究，说明他对经济一点都不懂，就是简单地讲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他就没有这种观念。

"蒲鲁东先生是那样不善于了解事情的本质，以至于竟会忽略掉连普通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忘记的事情。讲到劳动分工时，他全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谈一谈世界市场。难道说 14 和 15 世纪，当殖民地还不存在，当欧洲还不知道有美洲，而和东亚的交往仅只能依赖君士坦丁堡的时候，那时的劳动分工不是应该根本地区别于已经有了殖民地的充分发展的 17 世纪的劳动分工吗？"（第 9—10 页）

就是说，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的发展也有不同。

"但还不止此。难道说各民族的一切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是劳动分工的一定样式的表现吗？难道说这一切不会要随着劳动分工的变化而变化的吗？"（第 10 页）

这一段讲蒲鲁东不懂得生产力可以决定生产关系，可以决定社会组织，他是用当时的语言来讲的。

"蒲鲁东先生是那样不能够理解劳动分工的问题，以至于连城市和乡村的分化也没有提到，这分化，以德国为例，是从 9 世纪到 12 世纪之间产生的。"（第 10 页）

我们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这样的好处，就是他们在作理论分析时，同时就说历史概况，所以，可以使我们知道许多历

史过程，读了这一段，我们就知道在欧洲什么时候有城市和乡村的分化。以此为榜样，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也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城乡分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理论分析要和历史概况密切结合，这种方法是要经常注意的。总要研究历史经验，概括历史经验，毛主席、党中央从来就是这样。我们听了周总理、陈毅同志的报告，他们在非洲时，人家和他们谈问题，他们总是讲中国历史的经验，讲了就能解决人家的问题。马里凯塔总统一定要在公报上写他是搞社会主义的，如果我们简单地反对，他就不高兴，我们就讲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到了全国胜利，还不谈是社会主义，要等待、要研究，使人民脑子里成熟了。不能以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就写上社会主义，你写上大家不能接受，就会脱离群众。把历史经验一概括，他就没有话讲了，还很佩服。如果非常生硬地说：你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写。那就要搞僵了，还叫什么统一战线？所以，说服人要善于利用历史经验。毛主席和外国人谈话也是用这种方法。因为讲我们的经验就讲到普遍规律，我们的经验带有典型性，讲我们的经验也能说服人，人家也不好反驳，因为我们讲我们的经验，并不强加于你，供你参考，但是你不能不尊重我的经验。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大的胜利，他也不能不尊重。所以，这样就能够说服人。蒲鲁东根本不研究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研究历史，讲城乡分化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他有确凿的证据，时间、空间确确实实的，在 9 至 12 世纪中间，德国有了城乡的分化。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分化是永久的，不变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它的产生，也不知道它的发展。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里是这样地论述着，好像这一定生产方式之下的产物，是会永久地继续存在下去似的。蒲鲁东先生关于劳动分工所讲到的一切，

都不外是亚当·斯密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以前已经讲过的东西的概括，而且还是非常肤浅的，不完全的概括。”（第10页）

亚当·斯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所以蒲鲁东的经济学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

“永久理性的第二步进化，是机器。”这是说劳动分工产生机器的观点，第一步是劳动分工，第二步是机器。“劳动分工和机器之间的联系，被蒲鲁东先生讲得非常神秘。劳动分工的每一种样式，都有过自己的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人们就不是完全用手工作，他们有许多器械，而且还有极复杂的，如像车床、船只、杠杆等等。”（第10页）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出现一般地看做劳动分工的结果，是非常荒谬的。”（同上）

马克思说，它们的关系应该反过来，工具的发展产生劳动分工的不同形式，而不是劳动分工产生机器。所以蒲鲁东是荒谬的。

“顺便指出，蒲鲁东先生对于机器发展的历史之缺乏了解正像对于它的产生的历史一样。”

这里说的“它的产生的历史”就是认为机器是劳动的分工产生的。至于机器怎么发展，蒲鲁东也不怎么懂得。

“……应该说，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的时候——以前，消费的需要一般地是比生产的发展快，而机器的发展，则是市场要求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是1825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仅只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战斗的结果。但这只对英国来说才是正确的；至于说到欧洲各民族，那么，他们之被迫应用机器，乃是因为不论在他们本身内部的市场上和国际市场上都受到了英国的竞争的缘故。最后，在北美洲，不但由于对别的民族的竞争，也由

于劳动人手不足，即由于北美洲工业的需要和它的人口之间不相称，唤起了机器的采用。根据这些事实，你就可以断定，当蒲鲁东先生把竞争的怪影当做第三步进化，当做机器的反命题召唤出来时，是表现了怎样的一种识见。”（第 11 页）

蒲鲁东是这样的公式：劳动分工产生机器，因此，同样的，劳动分工使机器发展了。但是，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历史上机器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蒲鲁东根本是主观主义。同时，机器的发展原因之一还有竞争，由于欧洲受到英国的竞争，所以欧洲非用机器不可，所以竞争产生机器。但是蒲鲁东认为机器以后才有竞争，所以把竞争当做机器的反面，这完全是一种主观的错误的思想。

“最后，把机器看成与劳动分工、竞争、信用等等相并列的经济范畴，一般地说也是荒谬的。”（第 11 页）

下面就解释。

“机器不能算做经济范畴，正如拉耕犁的牡牛一样”，这是一种工具，工具不是经济范畴。马克思说，生产力要素和经济不是一回事。

“……现代机器的应用，是我们现代经济制度的一种关系，但机器的利用方式并不等于就是机器本身。火药总是火药，不管它的使用是为着要引起人类的伤害，或者是为着要治疗人类的伤害。”（第 11 页）

这里附带可以联系这样的问题：现代修正主义把核武器的出现这件事说成是决定了时代的变化，使得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不存在了。这种观点也是把一种工具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好像核武器的出现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了，时代就变了。实际上，核武器的出现是一回事，这是人类发现的一种工具；

另外，正义与非正义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决定于经济关系，决定于阶级关系，决定于社会制度，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所以马克思讲，火药总是火药，至于用火药来治疗人们或者伤害人，那是人的关系问题，和火药不是一回事。

“蒲鲁东先生作了空前的努力，来把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差额、信用和所有制等，按照我这里所列举的秩序，从自己的头脑中构想出来。”（第 11 页）

在竞争以后，又出现了垄断。竞争、垄断、税收、警察……这种排列都是主观的。

“……几乎所有的信用制度，在英国，在 18 世纪初期，在机器还未发明以前，就已获得了自己的发展。”不是在机器竞争的时候，而是在机器以前。“国家信用仅只是使税收得到提高和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所造成的新的需要获得满足的新的方法。最后，所有制在蒲鲁东的体系里构成末尾的范畴。在现实的世界里却相反，劳动分工以及蒲鲁东先生的一切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它们在总体上构成现在时候人们称做所有制的东西。”（第 12 页）

所有制不是最后出现的，劳动分工的出现就有所有制，各种社会关系都以所有制为基础。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所有制不是在最后，而是几乎在最前面。

“……离开了这些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就不外只是形而上学的和法律的幻想。”（第 12 页）

还没有所有制以前就有这种社会关系。

“……另外时期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是在全然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的。由于断定所有制是孤立的关系，蒲鲁东先生就做出了某些比方法论的错误更坏的事情：他暴露自己不懂得把一切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统一起来的那些联系，他暴露自己不懂得

一定时期的生产形式具有着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由于没有看见我们的社会的建制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不能理解它们的产生以及它们的发展，蒲鲁东先生对于它们就只能给予教条主义的批判。”（第 12 页）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制在很早就有，对所有制本身也要历史地看。蒲鲁东最坏的一点就是不懂得把一切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统一起来的那些联系，他暴露了自己不懂得这种关系的历史过程，不懂得一定时期的生产形式具有着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他把所有制的各种方式都看做是永久的、固定的支配人类历史的，所以，蒲鲁东就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当要说明发展时，蒲鲁东先生就不得不依靠虚构。依他的想法，劳动分工、信用、机器等等的发明，都是为着给他那麻烦的观念——平等观念服务的。”（第 12 页）

他认为分工、信用、机器等，最后总是要发展到平等。

“……他的解释是极端地幼稚。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平等的名义之下构想出来。但，不幸的是它们都是趋向于反对平等的。”（第 12 页）实际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和平等相矛盾的。“他的全部议论都处在这种情况中，这就是说，他采取随意的臆测，但是，由于现实的发展每一步都和他的虚构相抵触，他就由此做出结论，说矛盾存在着。同时他却掩盖了这一点：即矛盾仅只存在于他那麻烦的观念和现实的运动之间。”（第 12 页）

他也承认了矛盾，但是，他就不知道他的那种虚构的观念和现实的运动是惟一的矛盾。这并不是说否认客观矛盾，他所讲的矛盾实际上并不是矛盾，他真正碰到的矛盾，主要是他的麻烦的观念和现实的矛盾，这不是否认矛盾的意思。

“这样，蒲鲁东先生首先是由于没有历史知识，因此就不了解，

人们是在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的时候，也即是在生活的时候，就发展着一定的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性质是不可免地要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造和发展而发生变化。”（第 12—13 页）

马克思的这个分析中没有用“生产关系”这个词，但是并不是没有生产关系的含义。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他不了解，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并且只在这些关系存在着的时候才具有真理性。”（第 13 页）

人的主观范畴受客观的支配，范畴只是历史经济关系的反映，如果这经济关系不存在了，那么这范畴就没有实际意义了。这一句话很重要，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重要的是他两句话在一起，范畴要反映现实的关系，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不仅仅是反映，而且范畴的真理性要关系存在的时候才具有。这个关系如果已经过去了，你还要使用这个范畴，那就要犯错误。所以，真理也还是相对的，要在它所反映的事物存在时才有真理。所以，没有永久的范畴。修正主义者就认为有永久的范畴，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永久的，将来共产主义就要实行自由、平等、博爱，其实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资产阶级的革命过去了，这个口号就没有真理性了。现在讲自由、平等、博爱就是骗人的口号。因为现在我们一方面要自由，一方面也要有些人不自由，自由和不自由是联系的。平等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只有法律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也是有限制的，没有经济平等。我们讲平等也不是讲平均主义，不是抽象地讲平等。平等友好，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做买卖可以讲，兄弟国家的关系在讨论问题时要有平等的关系。修正主义在讲平等，对待别的兄弟国家就不讲平等，这不是骗人吗？博爱，更不行了，爱敌人行不行？所以这是骗人的话，一点真理性也没有，因为不符客观事实。

下面马克思讲，由于他不懂这些，“这样，他就陷落到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错误当中，他们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是永久的，而不是历史的规律——这规律，仅只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才是现实的。因此，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看做现实的、过渡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之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着问题，把现实的关系看做仅只是这些抽象的东西的体现。”（第 13 页）

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把共产主义看做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最高体现，是所谓“人情”的体现，就是人道主义范畴的体现。现代修正主义主要还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还有一些客观唯心主义。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

“……而这些抽象的东西，乃是自从开天辟地就已睡眠在上帝的胸怀里的一些公式。”（第 13 页）

所有这些公式，在盘古开天辟地以前就在上帝的脑子里了，还是黑格尔主义。

“这里，我们良善的蒲鲁东先生就开始陷于严重的智力上的困境。倘若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神的心胸里的流出物，倘若它们都是人们的隐秘的和永久的生命，那为什么，第一，发展会存在着；第二，蒲鲁东先生会不是保守主义者？对于这明显的矛盾，他是用对抗的全部体系来作为说明的。”

为什么说还要改革、还要发展，为什么不早一点实现上帝的这种范畴？为什么以前不会实现，偏偏要蒲鲁东才能实现？蒲鲁东就用他的全部对抗的体系来说明。他怎样调和对抗的体系？

“试举例来解释这个对抗的体系。”

蒲鲁东的体系里面有互相对抗的一些范畴，他要把它调和。

“垄断好，因为这是经济范畴，也就是神的流出物。竞争好，

因为它同样也是经济范畴。”

两个对抗都好，怎么办？

“……至于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那却是不好的。”（第13页）

他这样解释：作为神的范畴是好的，但是作为现实存在，垄断和竞争是不好的。

“……尤其因为垄断和竞争彼此要互相吞没的，就更不好。怎么办呢？蒲鲁东先生以为，这两种永久的神的思想既是互相矛盾的，那么显然地在神的胸怀里也同样会具有着双方思想的综合”（第14页）。蒲鲁东只有用神的思想调和，人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在这里，垄断的坏处由于竞争而得到均衡，相反地也是一样。”（同上）现实世界不调和没有办法，由于神的因素就调和起来。

“……观念双方之间的斗争会得到那样的结果，即只有它们的好的方面向着外部显露出来。神必须培养这些隐秘的思想，然后应用它们，而一切就会美满了。”（同上）

就是说，要像神一样，把自己对抗的概念的好的东西都设法显露出来，使它把那些坏的东西都能够消灭，不显露出来，这样就会融合、美满了。

“……必须去发现那隐藏在与个人无关的人类理性的混沌中间的综合的公式。”就是调和的公式。“蒲鲁东先生是一分钟也不动摇地以发现这个秘密的资格自任。”（第14页）

就是对立面的融合论、对立面的调和论，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用这种观点来歪曲对立统一的规律。对立面是经过斗争使矛盾解决的，不是经过调和来解决矛盾，任何矛盾的对立面都不能调和，不管是对抗的或非对抗的。比如我们党内正确与错误的思想，这是非对抗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的解决是否能把正确思想和错

误思想加以调和就能解决？不能，只能经过两种思想的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错误克服了，然后才能解决。我们所谓矛盾是不能调和的，意思就是说，矛盾是不能经过调和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斗争来解决。并不是没有调和，调和是有的，不过矛盾不能通过它来解决。修正主义者就是和资产阶级调和，要想调和矛盾。调和会不会解决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暂时是有的，有条件的调和是有的；但是调和并不能解决矛盾。两种不同的意见在一起谈判，得到一个调和，公报是混合的公报，这当然有一个暂时的统一性，可是矛盾并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能不能经过谈判搞一个调和的公报？不可能。

1960 年莫斯科会议以及 1957 年莫斯科会议，在个别问题上有一些调和，那是没有解决矛盾，因此修正主义抓住公报里调和的地方，特别是和平过渡问题大做文章，所以矛盾还是发展了。我们不否认一定的条件下调和的事实，但是有这种事实并不等于矛盾要经过调和来解决，矛盾是不能用调和的方法来解决的。蒲鲁东也是一种庸俗的调和矛盾的论点，他一分钟也不动摇地想来调和矛盾，所以他就是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边。在这个地方，马克思用辩证法来反对他的那种变相的形而上学。

“但是，请把视线略微投到现实生活上去吧。在现代的经济生活中，你不仅仅会找到竞争和垄断，也同样会找到它们的综合”，这是另外一种综合，“不是表现为公式，而是表现为运动。垄断生出竞争，竞争生出垄断”。（第 14 页）对立面互相转化。“然而这种均衡化的结果是造成愈更困难和愈更混乱的局面，而不是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的那样会排除现代局面的困难。”（同上）矛盾总要经过革命才能解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矛盾越来越激化。“这样，如果把现代经济关系所从属的基础加以改变，把现代的生产

方式加以消灭，你就会不只是消灭掉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也会消灭掉它们的综合——竞争与垄断的现实的均衡化所由此产生出来的运动。”（第 14 页）

“这里我给你举出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范例。”（同上）

“自由和奴役表现为对抗。我不需要讲到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役，它的坏处也用不着提及。只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就是奴役的好的方面。”（同上）

大家对“奴役的好的方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方法是一分为二的，奴役也有好的方面，不是说奴役好，只是说它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问题不在于间接的奴役，不在于无产阶级的奴役。问题是在于直接的奴役，在于苏立南、巴西、北美南部诸州等地的黑种人的奴役。”（第 14 页）

黑奴是直接的奴役制度。

“直接的奴役之成为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是正如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第 15 页）

“没有奴役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当时纺纱用的棉花主要靠非洲的黑奴种出来，美国南部就主要是种棉花。

“……奴役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创造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是巨大的机器工业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黑人贸易没有建立以前，殖民地给‘旧大陆’的产品是很少的”美洲没有黑奴就没有这么多的棉花。“并且也没有使世界面貌发生什么显著的改变。这样，奴役——这是具有巨大意义的经济范畴。没有奴役，北美洲——最进步的国家——也许会变成家长制的国度。”（第 15 页）

奴役是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资本家使用黑奴，奴隶是生产力、劳动力。

"……只要把北美洲从世界地图上除去，你就会看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无政府状态，它们的完全的衰落。"（同上）

当时的黑奴这样重要，没有黑奴，资本主义就不存在。

"……而奴役的消灭，就可以看做是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这样，正由于奴役是经济的范畴，所以它是自从开天辟地就会为一切民族所遇到。现代的人民只能在自己中间掩盖着奴役，但在'新大陆'又使它暴露出来了。蒲鲁东先生的关于奴役的这些想法究竟是为着什么呢？他是要寻找自由和奴役的综合，寻找真正的黄金般的中心，换句话说——寻找奴役和自由之间的均衡。"（第 15 页）

他专门讲奴役的好处，使奴役和自由均衡起来。黄金般的中心，就是说找到天平支架中的一点使两边平衡，这像黄金一样，很不容易找到。找到了重点，两边就平衡了。这里的翻译是用直译法，所以有时看起来有些难懂。

"蒲鲁东先生很能了解人类制造毛呢、麻布和丝织物这些事；而了解这样一些微末的事情，并不算是很大的劳绩。但蒲鲁东先生所不了解的是，人类还能适应着自己的生产力来生产出他们在其中制造呢料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更了解不到的是，人们不但生产着与他们的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并且还会创造出观念、范畴。"（第 15—16 页）观念、范畴不是要有就有的。"也就是创造出一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因此，范畴也和他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久的，它是历史的和过渡的产物。"（第 16 页）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道德的范畴，不是属于当时历史的，现在就没有真理性。

"……蒲鲁东先生却完全相反，把抽象和范畴看成最初的根

源。照他的意思，创造历史的就是它们，而不是人类。抽象、范畴，只就它自身来看时，也就是，把它从人类和人类的物质行动分离开来看时，自然是不死的、不变化的、不运动的，它本身只是一种纯粹理性的产物，这不外等于说，抽象这东西就是抽象的。多好看的同语反复？”（第16页）

就是说，没有什么意思。把抽象的东西离开了人的生活，看起来当然是永久的。我已经把它抽象了，变成普遍的东西，然后我又说是普遍的、永久的。这是我抽象出来的东西，是普遍的东西，我就把它看做是永久的。那有什么意思呢？自由、平等、博爱离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来看，那当然可以看做是永久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联系起来，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那他就不是永久的东西了。所以冯友兰说抽象的继承，他总是想不开，总觉得这是对的。抽象的东西是永久的、具体的东西，所以他说我们就是继承了抽象的东西。就是因为他的抽象和历史条件剥离开来，所以他觉得它就永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怎么也不能理解，抽象的概念总是一定历史条件的反映，所以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真理。我们现在也可以继承他的概念、名词，但只是在形式上借用这个名词。我们现在讲的自由是借用资产阶级用的名词，并不是继承他的抽象的东西。人要思维，当然总要用一些概念，有一些是可以创造的、有一些是可以把现成的拿来应用，从概念形式上把它借用过来，如此而已。并不是把资产阶级概念、资产阶级思想抽象地继承下来。

“于是，在范畴的形式上所看到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也成了永久的公式，它既没有起源，也没有发展。”（第16页）

“用另外的话来讲，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直接肯定，说资产阶级的生活在他看来是永久的真理，他是间接地肯定了这一点，因为

他把在思想的形式的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加以神化。当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思想的、范畴的形式上呈现到他前面来时，他就把它当做自发地生出来的、天赋着独自的生命的、永久的本质。因此，他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水平线。”（第 16 页）

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身是资产阶级的范畴，他把它看做是永久的，结果事实上等于肯定资产阶级的生活是永久的真理。这是一个普遍的范畴。替资产阶级的生活辩护的科学家一般地都不直接地说这一个生活是永久的，但是他把生活里面反映出来的概念说成是永久不变的真理。这样一来，就把他所辩护的制度说成是永久的。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他所谓的道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道不变，实际上就是说封建统治永久不变。蒲鲁东讲的某些道的不变，就是理性不变。中国旧的“道”翻成现在的语言，就是理性。蒲鲁东讲理性不变，他的理性就是资产阶级的理性，因此他讲理性不变，实际上就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因为他是用资产阶级的观念来立论，并把他们当做永久的真理，他就要寻找这些思想的综合，寻找它们的均衡，却看不见它们的保持均衡的现代的方式，正是惟一可能的方式”（第 16 页）。

只有现在他才能说成精神、观念，超出了这些观念的都要消灭。

“事实上，一切良善的资产者们所做的，他都做了。”（同上）

良善的资产阶级，就是主观上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他们主观上都认为自己要把社会制度搞得很好，甚至要为劳动者谋福利，实际上他是资产者。主观上以为自己是为人类谋福利，为劳动者谋福利，甚至真的以为是替人类的幸福着想。蒲鲁东也是这样，他以为他搞社会主义，他要来解放工人阶级。

“……他们都告诉你们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也就是作为抽象的概念来看，是生活的惟一基础，但在实际上，他们都还希望着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都希望竞争不要有竞争的悲惨结果。”这是好心。“他们都希望着不可能的事，也就是希望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不要具有这些条件的必然的结果，他们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的形式，就像封建的形式是过渡的一样。”（第 17 页）

董仲舒就希望封建社会按照道的原则永久地存在下去，他不希望会发现封建社会的具体罪恶，不了解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形式。

“……这错误的发生，是由于他们以为资产阶级人类是一切社会的惟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设想不到那样的社会制度，在里面人会不再是资产者。”（第 17 页）

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这种味道，他就是认为不可能有那样一种共产主义，那种共产主义里面的人不要求个人的利益，不追求个人的物质刺激，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幸福是永久的范畴，永久的真理，所以共产主义也是为了实现这种永久的真理。赫鲁晓夫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自私的，人的积极性的惟一鼓励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物质刺激，最多再加上精神刺激，精神刺激无非是名誉、表扬，不是什么政治思想，和物质刺激是差不了多少的。他认为人都是要名利的，他不相信人不要名利，因此他认为走向共产主义惟一的道路就是物质刺激，就是个人主义。蒋介石从前“剿共”的时候，得意洋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相信人不要钱，不相信人不要做官，我有钱一定能够搞垮共产党！他就不能理解有一些人就是不要钱，就是不要做官，甚至生命都可以不要，就是要共

产主义。他不能理解，赫鲁晓夫也不大能理解，他以为像新西兰这样一个小党，几百人的小党，那还不容易吗？六百镑（英币）就想收买它。他就没想到，这个党虽小，就是收买不了，他们就不爱钱。夏吉的党虽然比新西兰的党大一些，但是行得通，因为他和赫鲁晓夫一样，可以收买，大概八九万卢布，比六百镑高一些。他不能设想，在资产阶级的人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人，蒲鲁东也是这样，他讲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他的真正的思想是资本主义，他脑子里的人是资产者。蒲鲁东是主张分散小生产，不主张集中的生活，实际上是为个体生产辩护，为小生产者辩护。

"因此，蒲鲁东先生必然是教条主义者。"（第 17 页）

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客观唯心主义——它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客观唯心主义。修正主义一般是主观唯心主义或经验主义，只看眼前利益，表面现象，感觉就是实践，物质就是感觉的复合，有用的就是真理。修正主义一般的是这样一种世界观，教条主义是客观唯心主义。蒲鲁东是教条主义者。

"……他把那引起现代世界的变革的历史运动，归结为要在两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中间去找到适当的均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位灵敏的青年就用技巧来发现隐秘的神的思想。发现两个孤立的思想的统一，其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使它们从实际生活孤立起来，使它们脱离了它们所表现的现实性的结合，即现代的生产的缘故。"（第 17 页）

像竞争和垄断，实际上不是互相孤立的，是互相联系的，但是蒲鲁东先生使它脱离了经济，变为两个东西外部对抗的、互相孤立的概念。

"……蒲鲁东先生用自己的头脑的荒诞的运动，来代替那人类已获得的生产力和不能再适应于这生产力的社会关系中间的冲突

所产生的伟大的历史运动”，他不研究历史运动，而用头脑里的荒诞的运动来代替它，“来代替那一国的许多阶级中间以及在许多的国家中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来代替那惟一能够解决这些纠葛的、实际的、强有力的、群众的行动，来代替这一广泛的、长期的而又复杂的运动。”（第17页）

一句话可以这样解释，蒲鲁东不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去暴露这些矛盾，不去研究由于这些矛盾引起的阶级斗争、国内、国际的战争，以及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必不可少的群众的革命斗争，这些东西他都不要，他只要脑子里主观空想的对立的调和、综合。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不要暴露矛盾，不要去展开和解决斗争，不要开展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相反地，要调和矛盾，迁就、让步、迎合、投降，想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

“……这样一来，有学问的人，能够知道神的隐秘的思想的人们，就创造着历史，而普通的人民只要在实践中承受他们的启示就行了。”（第17—18页）

修正主义不也是这样吗？就是那些明智的人、明智的头脑创造历史，至于亚、非、拉美搞民兵、游击战争的人，都应该听那些明智的人的话，当然他还是主观唯心主义，和蒲鲁东不同，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是一样的，是掩盖矛盾、取消斗争，反对人民的革命运动，用自己认为是明智的头脑来代替这种运动。

“……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是一切政治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现代的问题的解决，在他看来，并不是通过社会的行动，而是通过他头脑中所进行的辩证法的转动。”马克思的修辞很漂亮。“在他看来，范畴即是推动力”，先改变范畴，然后作为结果来改变实际生活。“因此就用不着靠改变实际生活来改变范

畴。完全相反，应该先改变范畴，然后作为结果，就发生现实生活的改变。”（第 18 页）

“由于热望着调和矛盾，蒲鲁东先生就根本不问一问，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加以推翻。”矛盾的基础就是根本的制度，他根本不问。“他和那些想把国王、众议院和上议院都看做社会生活的不可少的部分，看做永久的范畴的政治教条主义者完全一模一样。”他认为现存的制度的基础不能推翻。“他只想去寻找新的公式来使这些势力得到均衡，其实它们的均衡恰恰是在它们的现代的运动里，在这些势力之一或者成为另一势力的胜利者，或者成为奴隶的运动里。”（第 18 页）这里说的现代的运动，就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已经起来了。均衡只有依靠运动来解决，只有依靠两个势力的斗争，谁战胜谁的斗争来解决。

“……像这样，在 18 世纪就有过很多平庸的头脑努力想寻找真正的形式来使社会的诸阶层，即贵族、国王、国会等等得到均衡，而到后来，不论国王、国会或贵族都没有了。”（第 18 页）

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有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的资产阶级就是改良主义，他的改良主义就是要和国王、贵族妥协。18 世纪出现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也还有一些平庸头脑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些改良主义者都失败了。

“……一切构成封建存在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覆没，一切构成封建存在中对抗势力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覆没，就是这些对抗势力的真正的均衡。”（第 18 页）

这里均衡不是调和，而是矛盾解决了。矛盾的真正均衡实际上就是矛盾的解决。

“因为蒲鲁东先生把永久的观念，纯粹的理性的范畴摆在一个

方面，而把人类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在他看来，这只是那范畴的应用）摆在另一个方面，因此你在他那里一开始就遇到关于生活和观念，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在种种的形式里反复出现的二元论。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对抗，只不过是表示蒲鲁东先生对于他们神化了的范畴的平凡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没有能力来理解罢了。”（第 18—19 页）

这里说的二元论不是一般哲学上讲的二元论。蒲鲁东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这里的二元论是讲他们的整个言论，他的思想和现实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他的思想经常受到现实的反驳，他的现实生活和他的观念、灵魂和肉体之间，就是他的理性和客观实际两者之间是无法一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蒲鲁东把范畴神化了，把平凡的历史摆在一边，结果就无法理解，这两个东西经常打架、经常互相否定。

“我的信写得太长了，我已不能再涉及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那些可笑的责难。请你暂且同意我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情况不了解的人，是更没有能力来理解那为破坏这个社会而进行的运动，以及这个革命运动的文献表现的。”（第 19 页）

蒲鲁东根本不懂得革命。

“我对蒲鲁东先生完全同意的惟一的一点，——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所表示的反感。”（第 19 页）

这里讲的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就是指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实际的，不能实现的，他以为他的观点是实际的。

“……在他以前，我已经因为嘲笑了卑屈的、温情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而引起了许多人对我的敌意。”（同上）

因为他对乌托邦有反感，我也曾经嘲笑过乌托邦，因此，在这一点上大家有同感，都是对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意。

“……但蒲鲁东先生只能算是为自己造成了一些奇怪的错觉，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幻想——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妇爱的夸夸其谈以及他的一切庸俗议论——来和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相对立。”（第 19 页）

蒲鲁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赞美那种小生产、小家庭夫妇的代表，所以他的思想是庸俗的。他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来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幻想相对立，他以为自己比那些高。这是一种奇怪的错觉，其实他并不比空想社会主义高，还比空想社会主义庸俗。

“而后者，例如就付立叶来说，是比我们良善的蒲鲁东先生的骄傲自大的鄙俗见解更为深刻得多的。”（第 19 页）

那种社会主义的温情的幻想虽然是空想，但是他的思想比蒲鲁东深刻，因为它能够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不是像蒲鲁东那样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说它深刻得多，就是因为他想搞社会主义、想解放无产阶级。蒲鲁东是肯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付立叶是想要取消私有制。

“……由于他自己也很感觉到自己的论据的完全空虚，自己谈论这一切事情的十足无能，因此突然不能自抑地陷于狂怒，陷于高傲的愤怒、哀号起来，发狂、谩骂、谴责、诅咒，捶胸顿足，向神和人吹嘘自己的清白，说社会主义的丑事与自己毫不相干！”（第 19 页）

这里有一些像赫鲁晓夫，自己感觉到空虚，只好用谩骂、发狂来掩盖自己的空虚。

“……他并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或他所认为的温情幻想给予批判。”（同上）

实际上他并没有真的批判。

“……他像圣者，像教皇一样，把诅咒加在贫穷的罪人身上，而对小资产阶级的及可怜的、色情的和宗法式的家庭幻想则唱起光荣的颂歌。”（第 19—20 页）

这也有一些像赫鲁晓夫，他不是咒骂那些贫穷的人吗！他说，人多不过是一堆肉，是死尸运动。

“……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者、经济学者。”（第 20 页）

这里的所谓“经济学者”，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

“……小资产者在发现了的社会里，由于他本身的地位关系，一方面会成为社会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者，这就是说，他迷惑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感受到人民的苦难。”（第 20 页）

他迷惑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但是又感到人民的苦难，所以就要搞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资产者有两重性，这一段讲得非常深刻。

“……他同时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有着这样的骄傲：他是不偏不倚的，他发现了那敢于说与中庸之道的确有所不同的真正的均衡。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它的本质的基础。”（第 20 页）

他承认有矛盾，但是又要调和矛盾、掩盖矛盾。

“……它本身不外就是具有形体的社会的矛盾。它需要在理论上来证明它在实际上的情形，而蒲鲁东先生的功劳就在于做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的解说者；”他在理论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是真正的功劳，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以后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第 20 页）

马克思承认蒲鲁东有一个功劳，就是把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理

论化了，又系统地提出来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怎样联合小资产阶级，并且和小资产阶级作斗争，改造小资产阶级，使他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不等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也会有小资产阶级参加，所以，了解小资产阶级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也是一分为二，一方面批判他的错误，另一方面肯定他有什么功劳，在哪一点上有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是否定的，但是又肯定他做了一些历史上需要做的工作。

“我很想把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第 20 页）

这一段不必解释了。

# 第二次辅导

(1964.3.12)

## 三、第二至第十六封信的概略讲解

现在讲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很短，是讲阶级问题的，大家都能看懂。要注意的就是关于阶级的学说，马克思以前已经有人注意到，这里面主要的是关于阶级学说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讲了三条：第一，它的来源是生产；第二，有个去路，有个来龙去脉；第三，将来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很短，但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讲得很深刻，很清楚。和修正主义有原则的区别，和资产阶级学说也有原则的区别。资产阶级学说：第一，不看生产；第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否认阶级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就是否认无

产阶级专政，否认阶级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封信，马克思讲到英国宪章党和他自己的关系。这里重要的就是，这些宪章党的主持人“相信我们是宪章党的惟一亲密的同盟者”（第22页）。别人要出钱买票才能参加的会，他是被邀请去的。下面讲那时大家不承认这点，他说：“任何时候我们都有权利来把历史已经归属于我们的地位重新抓住”（第22页）。工人运动、工人党，归根结底要马克思主义来领导，可能一个时候被机会主义者所影响，他讲法国侨民集团，法国人可能是指受蒲鲁东影响的人。

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讲德国革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德国的一切事情都有赖于无产阶级革命要能够得到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的支持。那时一切就会很顺利……”。（第23页）这是他的工农联盟思想，这个思想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已经开始有了。他总结了拿破仑政变的经验，为什么拿破仑那样的流氓会做了皇帝？归根结底是靠法国小农的支持。那时候农民不认识无产阶级，对拿破仑有幻想，拿破仑解决土地问题，这实际上不是拿破仑的功劳，是法国革命的功劳，使农民得到土地。后来拿破仑成了领袖，农民以为是拿破仑的功劳，拿破仑第三（他是拿破仑的侄子）就利用农民对拿破仑的崇拜思想出来活动，做了皇帝。

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马克思就讲到拿破仑第三得到农民支持上了台，将来农民对拿破仑第三的幻想破灭，那时拿破仑的纪念碑就要倒了。农民就会支持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胜利。那句话就说明了这个意思。

第四和第五封信没有什么好讲的。第四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第二段开头一句话：“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事物都更明白地显示着我们的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联系的见解的正确性”（第24页）。第

五封信也是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的生产手段决定劳动组织的学说,能够有比在杀人工业里所有着的还更辉煌的确证吗?”(第24页)。

战争是政治的尖端表现,战争的主体——军队,把社会的矛盾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在军队里特别会首先表现出来。这是这两封信的中心意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队又是政治的最高表现,战争也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所以,军队里特别突出地能表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如果联系到现在来说,为什么现在解放军总是走在前头呢?这是有道理的,当然人民解放军首先是有党的领导,许多事情值得我们学习。联系这个问题来考虑,军队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走在前头。

第六封信,是马克思在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这封信很重要,我们现在研究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很值得参考。我提出几段大家注意一下。

第27页,第三条开头一句:“由于还在他进行宣传工作以前,我就从伦敦这儿向他详细地解释过和证明过:要对‘普鲁士国家’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的干涉——这是荒谬的见解”。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和封建势力妥协,要用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干涉它,使它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变,那是荒谬的见解。马克思和拉萨尔在当时就争论这个问题,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相反,他想去干涉,勾结普鲁士政府,幻想普鲁士政府可以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他投降了普鲁士政府,投降了俾斯麦,出卖了工人阶级。但他说是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干涉,这是表面的借口,是错误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就是这样,和平过渡就是这样的思想。什么叫和平过渡?在现有政权下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通过结构改革,现有政

权可以改变为社会主义?!拉萨尔早有结构改革的思想，马克思早已驳斥过了。

下面揭露拉萨尔的背叛，他和俾斯麦签订了条约。拉萨尔刚死的时候，马克思并没有揭露这点，有种种的原因；他和拉萨尔还有点友谊，有个伯爵夫人苦苦哀求，写了申诉信。伯爵夫人受了拉萨尔的帮助，对拉萨尔有好感，在拉萨尔死后，写了申诉信，替拉萨尔说好话。马克思、恩格斯觉得应该参加到《北极星》杂志里。这是拉萨尔派主持的，想参加进去影响他们。由于这些原因，暂时没有揭露他，只写了个声明。但后来《北极星》派捣乱，所以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把他的底交出来了。

这封信还有一点，第 29 页这一段很重要，这是讲拉萨尔犯错误的原因，为什么会叛变工人阶级的原因："拉萨尔走上了这条歪路，是因为他是米克尔式的'现实的政治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米克尔式的现实政治家。米克尔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客，拉萨尔是学资产阶级政客的，是现实的政治家。

我要特别提起大家注意，赫鲁晓夫经常讲现实性。去年年底他接待合众社记者，发表了谈话，甚至这样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乐观主义的基础就是现实主义。他不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而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现实主义，乐观主义就是一种世界观。赫鲁晓夫要说这种话的原因，就是想把话说得使资产阶级喜欢听，因为资产阶级经常讲现实主义。戴高乐是现实主义，肯尼迪是现实主义，资产阶级政客喜欢讲现实主义，赫鲁晓夫也跟着讲现实主义，甚至说是我们世界观的基础，他是为讨好资产阶级而说这个话的。同时说他的世界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什么东西？现实主义是实用主义的代名词。他是政客，要从政治上考虑，要用能更普遍影响人的名词，所以叫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政客的现实主义，赫鲁晓夫嘴里讲的现实主义或现实态度，都是实用主义。

拉萨尔这种行动中也表现了实用主义，这点马克思也有揭露。“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习惯于只看见直接横在他们脚底下的作为‘现实性’的利益”（第29页）。所谓现实，就是习惯于看到直接横在他们脚底下的、现实的利益，就是眼前利益。实用主义的特点就是眼前利益。下面说：“也因为这个阶级在事实上甚至于对封建主义也到处进行了妥协”。一个是为眼前利益，一个是对环境采取妥协态度，应付环境的态度，这不完全是实用主义吗？那时候没有实用主义的名词，但已经有了实用主义。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实用主义。

这一段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下一段还讲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卑劣的‘现实的政策’，——它使德国资产阶级忍受了1849年至1859年的反动并对民众之被愚弄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第30页）。现实的政策就是这种政策，肯尼迪耍和平手腕，这是他的现实政策。戴高乐的现实政策承认中国，这当然好了，从中国方面说，是中国的胜利。但从戴高乐方面说，他的现实政策有他的打算。一方面承认我们，和我们搞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和我们斗争。不过现在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大，所以对我们在友好方面讲得多点。对资产阶级的现实政策，是不能不警惕的，因为它主要是谈眼前利益，为着眼前利益，可以搞点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但它只是暂时搞点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决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进一步来剥削人民。如果你不注意，就要上当，就要被愚弄。它刚承认我

们，就向蒋介石致敬，如果我们不公开宣传不承认两个中国，它也就不会那样快的想办法对蒋介石方面施加压力。蒋介石撤回大使，和法国断交，是因为富尔的一个谈话，当然富尔是代表戴高乐的，他公开讲蒋介石政权不能代表政府，只是一个个人的政治代表，这样蒋介石政府吃不消了，就主动断交。

我们平常看到资产阶级讲现实的政策、现实主义觉得还有点好，它现实了嘛。我们有时讲反映现实，这是革命的反映现实，用革命的态度反映现实，和现实主义不一样。名词有点混淆，听不出问题来，要在哲学上加以揭露。上一次我讲实用主义，对这点没有很好地展开来讲。

这篇文章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这里面讲现实的问题是好几种。在 31 页上说："我相信施维泽尔等人是有真诚的心情的，但他们是'现实的政治家'"。"我相信施维泽尔等人是有真诚的心情的"，这是客气话，也许他们主观上想搞社会主义，但他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想就现存的条件来作打算，而不愿意让米克尔独占'现实的政治家'的特权"。他们要向资产阶级政客争风头，和资产阶级搞和平的竞赛。也许他们真心想将来搞社会主义，但他们现在要和资产阶级比赛，要学资产阶级。也许赫鲁晓夫脑子里想将来搞共产主义，可以作为他主观上想搞共产主义，马克思对施维泽尔就是这样的解释。也许他将来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现在要向资产阶级学习，要向资产阶级争地位，要作官。

"他们知道，在普鲁士（并且也在德国其他地方）工人的报纸和工人运动是只能在警察允许之下存在的"。他们明明知道这点，"因此他们就想来顺应当前那样的环境，想不去刺激政府，等等"，不作非法活动。"全然就像我们的'共和主义的'现实的政治家一

样地‘接受’霍亨索伦族的皇帝”(第 32 页)。资产阶级现实的政客向封建皇帝妥协，无产阶级“现实的政治家”向资产阶级投降。

第 32 页倒数第一段也讲了这个问题，拉萨尔的信徒和马克思作对，举出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极端愚蠢地生怕失掉自己的影响”，患得患失。“第二，他们知道我是公开反对德国人所谓的‘现实的政治家’的。(这是这样一种‘现实性’，它使得德国远远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第 32—33 页) 所以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公开反对现实主义。

这封信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问题。

第七封信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第一封信是批判蒲鲁东的理论，这封信是反对蒲鲁东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些破坏行为。

第一段有两句话可以注意一下，“我有意地限制了它的论点”，马克思给第一国际搞纲领，在日内瓦会议上，他的纲领有意识地把论点加以限制，不要搞得太高，“使它们可以取得工人们的直接的同意和共同的行动，并且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把工人们组织成阶级的需要提供直接的营养料和推动力”(第 34 页)。根据工人阶级现在的情况，把自己的革命论点稍微限制一点，这不是原则上取消，是按照工人现在能接受的程度。这不是应付环境，应付环境是应付资产阶级。这不是应付资产阶级，是为了提高工人，根据工人阶级现有的水平来提高它，最大限度地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他的目的是把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搞的纲领就要做到这点。

要团结最大多数。毛主席讲得更形象了，毛主席又发展了，组织群众，搞群众运动要争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怎样争取？就是靠我们的政策、纲领。纲领、政策不好，路线不好，就争取不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革命必须依靠这样的力量，因为这样，就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是什么态度？这里面有描写："他们傲慢地对待一切革命的、也即是从阶级斗争本身生长起来的行动，傲慢地对待一切集中的社会运动，也即是那些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如像劳动日的法律上的规定）来加以贯彻的运动"（第34页）。他们是反对政治运动、反对集中的社会运动的。第一封信讲到蒲鲁东轻视政治，认为只要靠头脑的转动，就可以使世界转动。蒲鲁东不向社会求诉、不向国家求诉，意思就是说，不要解决国家问题，不要解决政治问题，只要去解决一般社会问题就行了。不要集中地解决社会问题，只要零碎地解决社会问题。国家问题、政治问题，就是集中起来解决社会问题。阶级斗争、各种运动，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政治运动，也是目标在于夺取政权的运动，至少是为国家问题斗争的运动。政治和国家分不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怎样集中？集中到国家问题上。政治问题的核心，是国家问题，政治革命的问题，就是夺取政权问题，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政治运动就是要夺取政权，国家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核心。蒲鲁东的根本错误，就是不向国家问题去求诉，以为撇开国家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只要直接去处理一件一件的社会问题，就算是做了了不起的事情。

这封信主要是反对蒲鲁东这种观点。

下面还有句话可以注意："借口自由，借口反对统治权或借口与一切权威作对的个人主义，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安静地容忍了并且容忍着最可耻的暴政"（第34—35页）。对暴政一点不关心。"在事实上只是宣扬了由蒲鲁东主义所观念化了的普通的资产阶级经济"，"借口与一切权威作对的个人主义"。现在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作对，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搞他的个人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者搞个人主义，但对一般群众，他又要搞权威主义。

第八封信是讲经济学，这封信在这里，逻辑上是插进的东西，不过历史顺序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讲经济学，所以不一定要多研究。

有两点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点，就是关于按比例分工规律的问题。“同样地谁也明白，为要产生出与多种多样的需要的量相适应的物品的量，就必须有多种多样的，在数量上确定了的社会综合劳动的量”。有多少物品，就要有多少劳动。下面一句比较重要：“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工的必然性，决不会在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之下被消灭，能够变更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第 36 页）。这句话值得研究。就是讲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按比例发展是必然现象。自从有劳动分工以后，整个来说，劳动就要按比例分配，整个社会劳动的发展也要按比例发展，这是必然的，是带支配力量的总的趋势。问题就是形式不同。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按比例分配、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是要通过危机来解决的。因为它是一种无政府生产，所以不会有意识地来按比例分配劳动，这个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比例大大破坏，结果发生危机。在危机的调节下，比例有适当的恢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采取有计划的形式，比较自觉的形式。

这句话讲形式会变更，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盲目的，被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所支配；社会主义社会，则能比较自觉地掌握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不一定能立刻百分之百地掌握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我们搞了十几年，是不是能完全掌握？我们的方向是要掌握，是要运用这个规律，但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掌握。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意识地要去掌握这个规律，主观上有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至少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还不能完全体现这个

规律，我们的计划并没有百分之百的体现这个规律。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中间还有许多盲目性，特别是最大的比例，工农业的比例长期不自觉。毛主席看的最早，1953年就提出工农业并举，1959年着重讲农业为基础。这样才开始更正确地认识到这个比例。从1959年提出农业为基础，到全党了解农业为基础还有几年的距离。大家了解了，实践上完全贯彻了又要有个过程，所以说还有距离。我们掌握规律，要经过反复实践，中间会有差错的问题，只要方向是这样，就是社会主义。

这段话是比较重要的。

后面讲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问题。这里面讲到思维和存在统一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你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理论的历史终归证明了，价值关系的理解经常总是同样的，不过有时比较明确些，或者比较模糊些"。人对价值的理解，不管是哪个国家，总是不谋而合的，为什么不同地方的人的思想会一样呢？这是"由于思维过程本身是从特定的关系中成长起来，它本身就是自然的过程"（第37页）。因为它要反映它的自然过程，它有它的自然规律。"因此现实地理解着的思维只能是同样的，不过随着发展的成熟性的不同，特别是随着思维器官的发展的不同，而有着程度上的差别罢了"（第37页）。不承认天才，这也是片面的，有天才的问题，但不是说天才不可以学，不能完全学到，也可以接近。上高山不一定能完全达到，往那里走去，总是一天一天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我们要学习，还是可以接近的。思维反映存在，所以只要存在条件一致，思维也是基本上一致，只有程度不同。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完全没有来往，可是两个社会的思想本质上一致。所以，真理只有一个，对价值的正确理解只能有一个，离开这个就是错误的。

下面批判，“庸俗经济学者一点也没有认识到，现实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的大小是不可能直接成为同一的”。大家学过经济学，就可以不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要点就在于，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自觉的、社会的生产调节”(第37页)。苏联就是要放弃这种自觉的、社会的生产调节，事实上他也没有调节，赫鲁晓夫上台十年就是盲目指挥，到处碰钉子。“合理的东西和具有自然的必然性的东西，只表现为盲目地作用着的平均数”(第37页)。资产阶级社会里，合理的东西、必然的东西，只是在不断被动的过程中作为平均数表现出来。只要有反复的实践长期的确切的统计，就可以摸索出它的规律来。

研究经济学比较不容易，要研究各种统计，而且要研究长时期的统计。《资本论》里常常出现几十年的统计，一个一个的表，用这些统计来证明规律。搞经济学一定要掌握长期的统计才行。搞一般的社会规律也要这样，只看眼前不行，要看几十年的统计。只看眼前是庸俗经济学，赫鲁晓夫就是庸俗经济学者，在哈萨克开荒就是两年增产，一点东西就高兴得冲昏头脑，立刻做出结论。现在10年了，10年再一看就很清楚了。没有10年以上的统计，就看不出规律。

一般看问题也要这样，往往有这种人，看问题只看现在。我们有时候只看现在一时困难了，就以为规律就是困难的规律，一时好了，就以为好得了不得。毛主席经常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在得到胜利的时候指出困难。1957年是我们胜利的时候，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不是风平浪静的，没有一点困难，是很不合理的幻想。那时候很多人头脑发胀，看不到困难，这当然不是修正主义，也不是实用主义，但有经验主义的味道。这种经验容易改正，因为是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只要经过学习就了解了。

“庸俗经济学者却认为，只要他针对着内部关系的揭露而自负不凡地提出反对的主张，声明事物在现象上是另外一回事，这就算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了”（第 37—38 页）。庸俗经济学就是想用表面现象反对内部关系的科学。我们说，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变，赫鲁晓夫说肯尼迪很明智，艾森豪威尔关心和平，用表面现象掩盖事物的本质，反对我们揭露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这里批判的是庸俗经济学，我们批判的是赫鲁晓夫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

下面的话很好：“事实上他所引以自负的，乃是在表面性面前匍匐献媚，乃是把表面性看做根本的东西。”（第 38 页）马克思最反对这种对科学危害性最大的观点，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下面两封信是讲巴黎公社的，又回到阶级斗争了，这是国家问题了，用不着多少解释。

第九封信有一段话说：“如果你看一看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是主张最近法国革命的意图不能像从来那样把官僚的军事机构由一双手转递到另一双手，而要打碎它，而这也就是大陆上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前提条件。”（第 39 页）打碎国家机器，这一段的中心思想就是这样，和修正主义针锋相对，这是用不着解释的。

第十封信可以注意的，是关于哲学问题。第二段是讲偶然性的问题。他认为偶然性在历史上还是起作用的，不过不起支配作用。“这些偶然性本身当然要作为组成部分而进入一般的发展进程中，同时又为另外的偶然性所抵消。但事情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第 41 页）。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群众要起来革命，但眼前由于偶然原因，有重大困难。巴黎公社时普鲁士军队站在巴黎门口镇压革命。这怎么办？马克思说只有两条路，看哪一条好。“因此他们就逼使巴黎人在二者之间择

一：或者接受挑战而进入斗争，或者就放弃斗争”(第42页)。革命形势面前出现严重困难，你究竟是勇敢地斗争，还是放弃斗争？马克思是主张勇敢斗争的，他说：“在后一种情形下面，工人阶级的道德败坏，会比随便几个领导者的牺牲更是极大的不幸。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阶级和代表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的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的阶段”(第42页)。如果放弃斗争，那就是工人阶级的道德败坏，坚决斗争，可能失败，可能牺牲几个领袖，但牺牲几个领袖也是值得的，工人阶级的道德精神大大振奋，可以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宣布，工人阶级敢于作这样的事情，可以作这样的事情。巴黎公社失败了，公社万岁，有了这个先例，就可以从中取得经验。像右倾机会主义者，胆小鬼；不敢斗争，或者失败以后，垂头丧气，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对工人阶级来说就是道德败坏。这和赫鲁晓夫也是针锋相对的，赫鲁晓夫说，革命不是为了死，即使是壮烈地死去，也不值得。还说：“我们根本不打算死，我们就是要活着”。他认为壮烈的死，都是不值得的，而马克思的看法却相反，认为牺牲几个领袖不要紧，比放弃斗争值得，英雄地死，比跪着投降有价值。英雄地死去，对历史做出了贡献，创造了历史。

下面讲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阶级和代表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的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的阶段。”(第42页)这是直接夺取国家政权的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前面的阶段是准备夺取政权，以前的直接行动只限于向国家要求立法，要求八小时工作，没有到直接打碎国家机器的阶段，“尽管这一次的事情并不曾直接有所成就，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重要性在于新的出发点却仍然争取到了”(第42页)。这是新的出发点。

毛主席的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思想，马克思早已经有了。

第十一封信，是马克思给波尔特的，这是反对巴枯宁的，反对宗派主义的。第十二封信也是反对巴枯宁的，恩格斯更具体地揭露了巴枯宁的破坏过程，马克思主要是在理论上讲到宗派主义应该反对。

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国际的创立，是为着要用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真正的组织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宗派"（第43页）。要有一个能进行阶级斗争的真正组织。这个话用到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也是很好的武器。马克思特别讲到反对宗派主义的必要，在工人运动成熟的时候特别需要。在工人运动没有成熟以前，那是准备阶段，出现各种宗派是不可免的，成熟以后，就应该统一起来，真正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宗派主义的分裂。不是不要分裂，有了宗派主义，就要和宗派主义分裂。宗派主义的分裂阴谋、破坏阴谋要揭露，要坚决反对。

第二段说："国际的历史，也正是总委员会对于宗派的不断的斗争，正是对于那些企图在国际本身内部巩固起来来反对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第43页）宗派还会巩固起来，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这是一种浅薄的尝试。这都可以联系现在。

下面有一段，讲到蒲鲁东主义在巴黎开始很占优势，法国是小资产阶级国家，小农多，蒲鲁东主义很得势。后来集体主义发展了，后来终于与他们相对形成了实证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其他集团。那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已经主要搞集体主义。实证主义就是注意一下实际要求。工人阶级要求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进行斗争。

下面讲，巴枯宁的话是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我们“三评”引

了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说他在理论方面毫无所知，但作为阴谋家倒是很有本领的。我这本有点出入：“如果说他在理论方面是个零数，那么，作为阴谋家倒是符合他的本性的”（第45页）。宗派主义最主要的特点是搞阴谋活动。

第45页最后一段，讲到什么是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一切的运动，一切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反对统治阶级并力图通过‘从外面的压力’来战胜后者的运动，都是政治运动”（第45—46页）。政治运动，是整个阶级对整个阶级的斗争，通过外部压力，这不是说纯粹是外部斗争，是人家说的话，用外部压力战胜后者，这里有国家斗争、政治斗争的意思包含在内。

下面解释经济运动，是个别工厂中、个别工业部门的斗争。下面说：“相反地，如果运动的目的是在于要强迫发布关于八小时劳动日的法律，等等，那就是政治运动”（第46页）。政治运动是要整个阶级动起来，强迫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让步，这就是政治。发布法律等等就是国家问题，虽然没有推翻国家，但要变成国家法律。政治运动，归根结底是要涉及到国家的。

下面说：“这样，从工人们的分散的经济运动中到处成长着政治运动”（第46页）。分散的经济运动集中起来，成为全阶级的，就是政治运动。经济斗争变成集中的东西，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围绕国家问题的集中斗争，就是政治运动。

下面说：“成长着力图把自己的利益用普遍的形式，用对于自己的社会具有强制力量的形式实现出来的阶级的运动。”（第46页）政治运动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变成普遍形式表现出来，变成全社会的强制力量。靠什么强制？靠国家力量。政治运动如果没有这种形式，工人阶级不是要去把自己的力量普遍化，不是要使它成为全社会带有强制性的，就不叫政治运动。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就是蒲鲁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反对集中斗争的强制力量的。

最后还讲这个问题："在工人阶级还没有把自己的组织发展到足够开始向统治阶级的集体的权力即政治的权力举行决定性的攻击的地方，他就需要时时刻刻在这方面从事准备。"（第46页）工人阶级要准备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进行攻击。下面说："为此就要不断地进行反对这个权力的宣传鼓动，就要对于统治阶级的政策保持敌对的阵势"。工人阶级经常要把自己的纲领和统治阶级的纲领对立起来，而不是要混淆起来。你不对立起来，就没有办法教育工人准备对资产阶级进行总有一天要来到的集中的攻击。修正主义恰恰相反，就不愿意对统治阶级的政策保持敌对的阵势，不愿意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相反地，要替它涂脂抹粉，向它妥协。意大利就是这样，要在现有的宪法下进行改革。丹吉完全是个叛徒，把尼赫鲁的纲领当做自己的纲领。马克思说："要不是这样，工人阶级就会被后者所玩弄"。不这样，统治阶级就可以玩弄工人阶级，修正主义者就是帮助资产阶级玩弄工人阶级，生怕刺激资产阶级，总是希望说出话来资产阶级喜欢听，连哲学也要说得资产阶级喜欢听。资产阶级说现实主义，他也就说现实主义。资产阶级讲马赫主义，他也跟着讲马赫主义。马赫主义是列宁所驳倒了的，所以不敢公开跟资产阶级教授走，没有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教授的哲学。苏联也不是绝对没有，有人就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哲学太宗派主义了，否定一切。不敢说用资产阶级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不敢，可是采取另外的方式，跟着资产阶级政客的屁股后面跑，资产阶级讲现实主义，也跟着讲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帮助资产阶级玩弄工人阶级，他自己也玩弄无产阶级。

第十二封信是一些具体的揭露，可以不讲了。

开头一段着重讲到巴枯宁主张的特点，就是认为一切罪恶来自国家，所以要根本反对国家。这封信主要是指出这点，其他都是一些具体历史，就不讲了。

第十三封信，是恩格斯给倍倍尔的，是讲党的统一问题。党的统一、党的分裂，是统一和分裂的辩证法。有许多话在“七评”里都引用了，因此用不着多讲，只是提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三段有一段话很重要：“依照许多经验所证明了的我们的意见，宣传方面的正确的策略并不在于要从这里和那里去夺取敌人的组织成员中的个别人物和集团，而是要去影响广大的、尚未被吸引到运动中来的群众。一个由我自己从荒地里找到的新人，比十个常常要把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点因素随身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投诚者更有价值。”（第 57 页）这段话很重要，就是我们宣传的对象主要是什么，政治上联合的对象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面向广大群众，不是某个团体里个别的头子、某些领袖，那些人物和我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当然也要争取，也有一定的好处，但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去影响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修正主义者就是想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去拉关系，赫鲁晓夫就是专门和修正主义领袖拉关系。去年开反对氢弹原子弹大会，赫鲁晓夫的代表就和社会民主党右派勾结起来，反对共产党。你能在群众中找到一个真正觉悟了的工人，比 10 个经常和我们闹意见的头子要好得多。这是马克思主义面向群众的观点。

你看，甚至说：“如果能做到仅仅吸收群众而不要地方的领袖，那也还行。遗憾的是常常要附带地接受一大堆这类的领袖，他们不是由自己过去的观点联系起来，就是由自己过去公开的主张联

系起来，并且他们首先总是想证明他们并没有背弃自己的原则，证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反倒宣传着真正的拉萨尔思想。”（第 57 页）他想证明社会民主党宣传拉萨尔思想，这是指巴枯宁。巴枯宁反对马克思，把马克思和拉萨尔拉在一起，马克思反对拉萨尔的事实他根本不管。他参加国际的领导，经常要证明他的对。不要姑息这些人，这些人捣乱太厉害，分裂出去没有什么了不起。

下面一段有些话就是“七评”引用的。“不要因为关于‘统一’的叫喊声而把自己弄迷惑了。那些最喜欢把这个口号挂在嘴上的人，恰恰就是挑起纠纷的主要角色；目前瑞士尤拉的巴枯宁主义者们正是这样，他们是所有的分裂活动的挑拨者，却对于统一比一切都叫喊得更厉害。”（第 57 页）赫鲁晓夫对统一叫喊得最厉害。这一段最后一句说得非常重：“这就是为什么最顽固的宗派主义者和最喜欢播弄是非的人以及最卑劣无耻的人在一定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声音叫喊统一。”（第 58 页）

对待这些人采取什么态度呢？下面一段讲了，捣乱很厉害的人，群众也知道他捣乱了，就是说分裂已经成熟了。我们要不要调和？恩格斯说：“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协调的态度，如果我们抹煞了已经成熟的裂痕，结果会像什么呢？宗派主义者，也就是巴枯宁主义者就会获得更多几年的时间，来借着国际的名义做出更多的蠢事和丑事来”（第 59 页）。到裂痕已经成熟的时间，要来调和，结果只有让坏人多做一些丑事、蠢事。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说停止论战？就是希望多延长几年，多做点丑事。这样会有什么危险呢？危险很大。他说：“最发展的国家的工人们，会要因为不满而走开”。搞丑事的人在这里，真正觉悟的工人要走开。“气泡不会破裂，它会因为受到针刺般的伤害慢慢蜷缩起来，而最近将来的大会——在那里，危机一定会要发展起来——将会变成最庸俗最丑

恶的个人间的内讧”。现在妥协，将来闹得更厉害。“因为原则在海牙已经被牺牲了”。原则已经牺牲了，将来闹得更坏。“这样一来，国际就要在实际上遭到破灭，为了统一而‘破灭”（第59页）。想统一，结果整个国际都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分裂出来，或者把右派领导打下去，不这样作，统一就完全垮台。

第60页第三段很重要，也是讲分裂问题的。这里引了黑格尔的话，他讲辩证法有些好东西：“此外，老黑格尔就已经说过：党是这样来证明自己的生活力量，它走向分裂，并忍受得起分裂”。经过分裂，还能更团结。“无产阶级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种种的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都有一些不愿意再前进的人们堵塞着道路。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在实际上到处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党的分派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是辩证法：团结是以各种分派的方式来实现的，团结是以分裂来实现的。“这些分派相互间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古罗马帝国处在最严重的被迫害时期的基督教宗派那样”。基督教最初是奴隶，被压迫劳动人民的宗教，在纪元3世纪以前是被压迫的，由耶稣诞生二三百年间是受压迫的。那时基督教为了团结抵抗罗马统治者的压迫，内部常常要闹分化，因为有些人被收买了。12门徒里有个犹大，得到30元金币，就分裂出去，把耶稣出卖了。以后11个门徒继续团结起来，一直搞了几百年，后来到3世纪，罗马一个皇帝用各种压迫、收买的办法，杀的杀，有一部分收买了。这个皇帝叫君士坦丁，把所有拉拢了的基督教的头子，开了个宗教会议，承认基督教为国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以后，基督教变成统治阶级的教了。

这一段讲的是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团结总是通过分裂发展起来的。不断地巩固团结，不断地发展团结，但同时又不断地分裂。把坏东西分裂出去，团结就能进一步巩固，进一步发展。从

前修正主义分裂出去，后来丹吉分裂出去，以后还有什么人分裂出去还要看斗争。分裂不分裂，在于改造不改造，向好的方面改造，就可以不分裂，坚持坏的东西，总归要分裂。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恐怕没有希望，恐怕总归是要分裂出去的。我们还有策略，说要分裂，不是马上和赫鲁晓夫分裂。但要看到这个趋势，看到一分为二，不要那样害怕，不要那样大惊小怪。如果有一天分裂来了，就分裂，如果能不分裂，就不分裂，容忍到一定程度，非分裂不可，就分裂。容忍的目的就是要争取一部分人、改造一部分人。有些人跟修正主义走是可以觉悟的，是被迫的。周总理到阿尔巴尼亚去，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作东欧的工作。东欧也不是不能一分为二的，就是苏联也是一分为二的。所以在一定的时候容忍，就是要做工作。你主动的分裂，太快了也不好。要经得起分裂，愿意分裂就分裂，但也不要时机不成熟就分裂。群众还没有了解的时候，修正主义还没有彻底孤立的时候，你提出分裂就脱离群众。

可是，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分裂是必然的，团结也是必然的。分裂和团结是对立的统一，一切都是对立的统一，一切都是一分为二。有人提出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也一分为二，当然会一分为二。既然根本理论是一分为二，当然它本身也是一分为二。问题是怎么分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有革命性，一方面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有普遍真理，有具体实践，这也是一分为二。革命搞过头了，也会忘记科学性，太注意科学性，有时候就忘记了革命精神。我们有些搞理论工作的人，在搞理论批评的时候，纯粹搞理论批评，忘记了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些打击。要统一起来，要能结合。这个矛盾结合好了，就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得不好，就会出偏差。偏差很大，就会变成错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会分出反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外来的，这是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分裂出来，分出修正主义，分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没有结合。这个矛盾没有结合得好，只注意到普遍原理，忽视具体实践。结果普遍原理变成空的，变成教条主义。现在的教条主义不是这样，现在的教条主义根本没有普遍真理，机械地搬外国的现成的纲领，这是另外一种形式。

辩证法会不会一分为二？也会一分为二。这也是普遍原则和具体运用的问题，把普遍原则具体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是真正的辩证法。只讲普遍原则，算不算辩证法？只是嘴里讲一点，没有运用，这还不是教条主义？所以辩证法是不是有条件，就这点说，是有条件。作为真理性，一定要把普遍原则用来分析具体问题，真正掌握辩证法。讲辩证法是为了要掌握它，要把辩证法学到手，要能用它分析具体问题。这是讲辩证法是对立统一规律。马克思说过了，恩格斯、列宁也是这样说的。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规律，仅仅这样讲，算不算讲辩证法？我看还不算。讲辩证法，引证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引证大量的毛主席的话，可是思想可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思想。引证也是要的，但引证的目的是为了把它拿来具体运用。如果我讲辩证法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你们提出那个问题，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不一分为二的，那我就没有辩证法，只是嘴上讲辩证法，不敢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承认对立统一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承认这个规律就要肯定这个规律在一切问题上都能运用，问题是它的转化方法不同，转化形式各种各样，但原则到处都可以运用。问题就是要具体解释。

第十四封信也是关于国际问题的，是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这封信主要是讲国际为什么会有分裂。分裂的发展有一个原因，有

的时候得到一个胜利，就会发生这种问题，"第一次巨大的胜利就会要破坏这一切派别之间的天真的合作。这样的胜利就是巴黎公社，它无疑地是国际的精神的产儿，虽然它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国际直接的推动；这样，可以完全公正地说国际对于公社是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的。当着国际因为公社的关系而成为欧洲的道德力量时，这时纠纷就开始了。每一个流派都想为着自己来利用这次胜利。"（第 61 页）到得胜利以后，就要警惕会发生的困难，这是很好的经验。恩格斯总结了这个经验，每次胜利以后搞得昏头昏脑，如果不警惕，错误的东西就会发展。在胜利中，各种各样的思想都会有，想来利用胜利的结果。如果不注意困难，不辨别是非，就会搞得一塌糊涂。第一国际分裂的发展就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在巴黎公社以后的第二年，巴枯宁实在闹得不成样子，马克思、恩格斯只好把他开除出第一国际。

这封信也讲到第一国际的解散，讲为什么要解散。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不同，它是各种各样思想集团联合的、各党各派联合的统一战线。第三国际是共产党联合，第二国际是社会民主党联合。第三国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主义虽然占领导地位，但它不是统治的，有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等。它是一种旧形式，这个形式经过了巴黎公社，它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它的形式过时了。特别是巴枯宁开除以后，马克思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时需要一个新形式，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统治的党，但这个党在那时不是成熟的。这里讲了它不成熟的原因。

"在十年的期间国际支配着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奠定将来的方面，它很可以自傲地来回顾自己的工作。但它已经历过了自己的旧的形式。要想像旧时那样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即

建立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党的联盟，那就必须要有普遍的工人运动的压力，像1849至1864年那样”（第62页）。巴黎公社以后，工人运动有一个低潮，资本主义有个和平发展的时期，一个比较稳定发展的时期。在这种低潮前面，组织国际，群众基础不成熟，过了15年，恩格斯才组织第二国际，工人运动才慢慢恢复起来，特别是德国的工人运动，那时德国工人运动是中心。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1899年修正主义大举进攻，10年就堕落了。第三国际是1919到1943年，第三国际的寿命很久。说明20世纪帝国主义时期是革命战争时期，是帝国主义垮台时期。第二国际时间短，就是在资本主义稳定的发展时期。到了20世纪，帝国主义走向崩溃，革命高涨，所以第三国际一直保持它的精力，保持它的革命性。

现在没有国际了，恐怕也会出现一个国际，现在实际上有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中现在出了修正主义。1956年出了赫鲁晓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没有倒，还是有人坚持，不像第二国际有个时期几乎全面垮了，就是俄国有列宁坚持。社会民主党还是一部分，列宁的处境比我们困难得多。我们现在有这样大的国家，有许多国家站在一起，一开始形势就很好。有些人认为我们孤立，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出修正主义的时候，同时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修正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东西，还是赫鲁晓夫1956年搞起来的。现代修正主义，真正主力是赫鲁晓夫集团。

第十五封信，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修正主义（那时是修正主义前身，不叫修正主义），有倍倍尔等三人在苏黎世作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非常生气，发一个通告反对他们。这一封信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联系。

修正主义和拉萨尔派有点类似，我们还是提出几段，大家注意一下：

三人宣言和拉萨尔主义是一致的，在信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特点。第64页上说：“照这些先生们的意见，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为真正的人类爱所鼓舞着的一切人’的全面的党”。这里有赫鲁晓夫的观点。“为着证实这一点，它就应该首先断绝粗糙的无产阶级的热情，并在有教养的和具有慈善心情的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来‘获得优良的口味’和‘熟习优良的语调’”（第64—65页）。赫鲁晓夫自己没有本领说出充满资产阶级优良的语调，就拼命学习资产阶级的优良语调。“那时，某些领袖们的‘不漂亮的风度’就要让位于修养良好的‘资产阶级的风度’（好像这些人们的外表上不漂亮的风度，也不能不算是他们该受斥责的很重要的东西）。那时很快就会出现，许多来自有教养的和有财富的阶级中间的多方面的人物。也就是必须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以便使鼓动工作获得显著的胜利’”。要把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吸引到这边来，赫鲁晓夫现在不能公开地把资产阶级吸引到共产党里来，不能公开地把社会民主党吸引到共产党里来，实际在那里拉拉扯扯。东欧有些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合并起来的。他以为这样才能获得显著的胜利。“德国社会主义是‘过多地重视了争取群众的意义，并因此忽视了所谓上层社会中间的强有力的宣传工作’”（第65页）。

下面一段，他有句话很重要：“一句话，工人阶级没有能力亲手争取自己的解放”。修正主义者不相信工人亲手解放自己，要靠别人解放它。“其次呢？不应该有任何需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想法，——只需要用强有力的宣传工作把它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第65页）。只要宣传共产主义吃得好，桌子上有丰盛的盘子，资产

阶级就可以吸引过来了。

下面一段说："既然我们希望争取社会的上层，或者即使是争取其中对于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那我们就要注意使他们不至于受惊"(第 65 页)。怕资产阶级受惊！毛主席说要有武松打虎的精神，老虎不管你刺激它也好，不刺激它也好，就是那样。修正主义就是怕刺激它，毛主席思想就是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

还有精彩的，第 67 页第二段最后一句话："消灭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和'一切独立的人们''不至于害怕来和无产阶级携手'。然而，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受到了愚弄"。像修正主义那样，主张眼睛向上层。发动群众消灭阶级斗争，让资产阶级不至于害怕，让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很高兴，这样愚弄无产阶级。反修正主义，可作的文章很多，"七评"没有作完，这些都还没有写进去。

下面还有一段讲到修正主义者的实用主义："'人们应该了解'，我们（这是替苏黎世三人说的）并不想'拒绝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不过我们认为，我们尽可以放到以后的年代来做，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我们的一切精力都要用来争取达到一定的、十分切近的目的，这目的是在我们能够开始考虑实现更进一步的任务之前，无论如何先要达到的'"。就是一个十分切近的目的就够了！"这样一来，'现在被悬得太远的要求……所骇退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的群众，就会开始来和我们联合了"(第 67 页)。不要用远大的目的吓唬人，不要树立共产主义旗帜。可以暂时摆一摆，可以口头通过，但实际上不做。

下一页，反驳修正主义的主张："用不着拒绝纲领；不过应该把它的实现搁置……到一定的时候，接受它，但实际上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要在自己生存的期间来追求它，只是为要做成遗嘱

来交托给儿子和孙子”(第 68 页)。现在不干共产主义，只搞眼前的利益，等儿子、孙子来搞，我是主张共产主义的，你们去搞好了。“目前则把一切力量和一切精力都用到种种细微末节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方面，借此表示自己多少总算做了些事情，而同时又不至于使资产阶级受惊”(第 68 页)。这些都和现代修正主义一模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描写得非常生动，对修正主义、对机会主义描写得深刻。

第 68 页第三段:“在我们面前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那时，机会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宣称，说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社会上的革命地位所激发，可能‘走得太远’了。不是要坚决的反对立场，而是要到处调和；不是要对统治者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要设法去劝说他们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不是要对从上面来的压迫进行忿怒的反抗，而是要温驯地低首下心，承认应该受罚”。承认应该受压迫!?

下面一页，揭露了机会主义的虚伪，第二行就讲了这个问题，修正主义“在纸上也承认这斗争，因为它已经不是可以随便否认的事情，而在实际上都来掩盖它、抹煞它、减弱它”。就是在纸上也承认阶级斗争，而实际上掩盖它。“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党，不应该引起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仇根，或者一般地不应该引起任何人的仇恨”。引起任何人的仇恨，就不符合人性，就是好战，就是想用世界大战推进革命。但我是主张斗争的，帮助被压迫人民进行斗争，赞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和平共处也是斗争。但如果真正要斗争，就说你是好战。这一段很精彩。“它应该首先在资产阶级所害怕而在我们这一代又不能完成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而是最好让它把自己的全副力量和全副精力用来实现那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补缀，这样来巩固旧的社会制度，也许借此还

能将那最后的灾祸转变为渐进的、一点一滴地实现的、尽可能地和平的蜕化过程。这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在煞有介事地注重实际的伪装下面，不仅仅自己什么事也不做，而且还要企图妨碍所有不属于空谈的事情的出现”（第 70 页）。他们的思想是庸俗进化论，希望一点一滴地渐进的变化，实际上是要巩固旧制度。

下面一段讲到机会主义者讲的人类爱。最后两行反驳了人类的爱的问题：“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不值得注意的和‘粗野的’事情而避开了的地方，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东西，就只剩下‘真正的人类爱’和关于‘正义’的空洞词句了”（第 70—71 页）。现代修正主义照样讲人类爱，讲什么人性。这就是上封信讲的，思想总是同样，思想反映现实，现实是同样的，现实只能反映同样的思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反映同样的立场，所以不谋而合的就是一种思想。掩盖矛盾，实用主义、庸俗进化论、人性论，所有赫鲁晓夫有的东西，这里都有，或基本上都有，不过程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

后面就讲他们的主张，大家可以自己看。值得注意的是 72 页的第二段，这条是讲无产阶级革命可不可以吸引别的阶级的人参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有条件：“如果有别的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无产阶级运动里来时，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以及这一类的成见的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学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要经过思想改造。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请进来，吸引来。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形而上学，不绝对排斥别的阶级的人，别的阶级的人可以一分为二，不能绝对排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坚决反对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请进来，但也不排斥有条件地容许他们进来，条件就是思想改造。

这个思想，毛主席是大大地发展了，在新的条件下，采取许多具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思想改造，毛主席用新的思想改造来概括这个问题。规模更大了，采取新的形式，还有许多新的具体办法，整风的办法，这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条件下考虑到的。把它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充实了，采取许多新的形式表现在更大的规模上。就是这样发展了，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则丢掉，另外来一套，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继续生长，把枝叶发展起来，开花结果，算不算开花结果？毛主席就是开花结果，我看是可以说的。毛主席就是大量开花结果，做出新的结论，根本原则并不违背，但有了新的形式，有了新的更多的内容，根本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这些人带来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反对。“如果有什么理由要暂时容忍他们那我们所要做的也仅只是容忍他们，而不是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还要懂得和他们的分裂仅只是时间的问题。”（第 72 页）如果坚持他们的立场怎么办？还要请他们、求他们留在组织内？没有这个理由，他不改造，一定坚持他的立场，还要影响领导，分裂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时间，在我看来，是已经到来了”（第 72 页）。那时要开除他们。“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党怎样才可以再容忍这些论文的作者留在自己的队伍里”。他公开搞宣言、搞纲领，怎么留？“如果党的领导竟然在某种情形下落到了这些人们的手里，那就是说让党随便受到阉割，并使它不能再葆有无产阶级的精力”（第 72 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一发以后，伯恩施坦感到害怕了，暂时承认一些错误，后来没有开除，可是后来在党内继续要搞他那一套阴谋，而恩格斯死后就进攻了。这里讲了如果修正主义者领导党，会发生什么结果，就是尽力销蚀无产阶级革命精力，有

很大的坏处。

最后一段可以提一提："在将近四十年的期间，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推动作为历史的直接动力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变革的强力杠杆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是怎样也不能够和那些企图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取消了的人们走在一道"（第 73 页）。马克思、恩格斯搞了 40 年，都是为了要推动阶级斗争，修正主义想取消阶级斗争，怎么能和他站在一起。

这里面讲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问题。这里把阶级斗争叫直接动力，意思是说还有许多别的动力。动力就是矛盾，其他的动力，就是各种其他的矛盾。其他矛盾还是比较艰巨的，但推动历史要靠阶级斗争。其他矛盾包含什么矛盾？产生阶级的那些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不是历史的动力呢？这些基本矛盾都是历史的动力，这些动力都表现为阶级斗争，并且通过阶级斗争直接推动历史发展。我们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这些矛盾都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包括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总之表现为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并且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人民内部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直接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用词很严密，叫直接动力，把直接两字漏掉，就在理论上犯大错误。

第十六封信是给史密特的。从这封信开始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范围，以后好几封信都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特别是讲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

这封信开头是批评巴尔特的书，写这封信的时候，恩格斯没

有看过这本书，间接听到了，以后看了。费尔巴哈也提到这本书。这个人用庸俗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或经济唯物论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有人说，经济唯物主义以谁为代表？在这封信里恩格斯以巴尔特为代表。我翻译得有毛病，有的地方译成巴特，这是一个人。这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看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没有看到，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基础。所以恩格斯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当我们说到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位的原因时，并不因此就否认观念的领域本身又能够反过来对这物质生活条件发生第二位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这一点，那么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写的那个对象"（第 74 页）。

如果不懂得相互关系，那就根本不懂得所写的对象，本来想写马克思的思想，可是又完全不懂得。这两句话大家注意一下，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位的原因，观念领域有第二位的作用。我们常常讲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这两个概念这样来解释，第一性就是第一位的原因，精神第二性，就是精神在宇宙各种联系中是第二位的原因。不这样了解，就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讲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就不够。辩证法按照这样了解，第一位的问题，是物质到精神的问题，物质为原因，精神为结果。然后精神到物质，精神又是原因，可以变为物质，这是第二位的关系。讲宇宙的发展，当然应该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这是绝对的，这是一个方面的解释，这方面也不能取消。但有了精神以后，有了高等动物以后，问题就不能这样简单了。就整个宇宙说，一个时候没有精神，后来才有精神，在这种关系上，可以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就等于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如果涉及人类文化，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就用另一个解释，由物质到精神是第一位的关系，而精神到物质是第二位的关系。所以

我们谈到精神到物质的关系，那基本上是联系起来讲的。首先物质到精神，然后精神到物质，首先实践到认识，然后认识到实践。

毛主席讲认识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物质到精神，第二个阶段精神到物质。这也是说的这点，第一性的联系是物质到精神，第二性的联系是精神到物质，这种联系都不能取消，不能取消任何一个，不能片面强调一个，而忽视另一个，两个都要注意。

这里面有个翻译问题，第一位的原因，别的本子译成基本的原因，我认为是不确切的。因为第二位的原因，原文倒是第二位的意思，但第一不简单是第一的意思，也不是基本的意思。这是个拉丁字，按照中国旧术语，比较确切的译法是"太初"，就是最初的最初、最原始的、最后的。是纯粹的科学术语，不是简单的、普通的第一，而是最后的第一。翻成基本，有点轻，翻成太初，文不文，白不白，翻成第一位，比较熟悉一点。"太初"两个字，好像太上感应篇，有点迷信。这是哲学术语，是最原始的意思，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世界最初的东西。"太极"两个字好像也有点迷信，被和尚、道士搞得很神秘。其实太极图也不很神秘，就是两个鱼盘在一起，一黑一白，就是矛盾，是最初的东西。黑格尔说矛盾相互关系是最初的原因，阴阳搞在一起是宇宙的最初原因。这并不是宗教名词，最有辩证法味道的哲学名词。

这封信还有个地方可以谈一下。"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曾考虑到，分配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以被分配的产品的多少为转移的，而产品的多少，当然又要随着生产和社会机构的进步而发生变更，这也就是说，分配的方式也应该变更"（第 75 页）。下面讲辩证法，"参加'社会主义社会'讨论的人们都看不到任何经常变更和进步的东西，而只看到固定的、一成不变地建立起来的分配方式"（第 75 页）。这里面涉及到经济学问题，巴尔特讲经济学，讲社会主义

社会的分配，应该有个固定不变的形式。我们要了解按劳分配，应该很好地研究这段话，按劳分配究竟是一个固定的形式，或是个基本原则。按照恩格斯的意思，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只是一个基本原则，至于按劳分配实现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变化。大家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特别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现代修正主义有种想法，好像苏联的分配方式，就是最高的、惟一的社会主义的方式，它的高薪阶层反对平均主义，高低相差100倍到300倍。最低30，最高3000，特殊情形下，一个院士兼莫斯科大学校长，大体是9000到10000新卢布。他认为这种分配形式很好，这样做才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按需分配。我们的实际生活看得很清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工业有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具体搞法也有不同。以什么为定额？要不要计时工资加奖励？怎样奖励，现在都要研究，不是已经搞得最完善了。农村就更复杂，北京郊区几乎要搞货币工资。像红星人民公社主要是工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搞工分制。还有些地方，工分也不能搞，就是基本口粮加一点照顾，或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或基本口粮加奖励。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就是基本口粮加工分。种类很多，能不能机械地搞一种？那不行。由郊区到边远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不同，采取同样的分配形式，一定要失败的。我们有这样的基本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生产条件，就要采取各种不同方式，这形式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按劳分配本身要不断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发生质变，变成按需分配。恩格斯的这个思想是很宝贵的。

第76页，最后一段第四行，“学生”两个字应该是学者，学生怎么会骄傲自满。

# 第三次辅导

（1964.3.13）

## 四、第十八封信（恩格斯给史密特）重点讲解

恩格斯给史密特的信（1890 年 10 月 27 日于伦敦）一开头说：“我利用最初的闲暇时间来答复你，我认为你接受‘züricher Post’报的工作，是做得很对的。你在那里可以和很多人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如果能够经常注意到，苏黎世仅只是第三等的货币和投机市场，因而从那里所获得的印象，就由于经过了第二遍或第三遍的反映而减弱下来，甚至于受到有意识的伪造。”（第 82 页）

这一段话是说，你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投机市场，要想通过投机市场认识经济情况不能认识的准确，特别是货币投机市场。货币价值的涨跌，能够反映经济情况，但是不能准确地反映，有时候不但不能准确反映，甚至会歪曲，有意识地伪造。

下面解释说：“但你在实际上对所有的机关都是熟悉的，你就应当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地去索取第一手的交易所公报。”要求他注意全面看问题，不要在那一个市里面就根据那个市的交易所来了解经济情况。“那时世界市场就会作为它的货币和有价证券市场的反映而显示在你的面前。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的反映，和人的眼球中的反映有相同的情形。它们通过了折光镜，因而在达到人的头脑里时就表现成倒立着的样子。不过

前者缺少着能使我们的印象再度倒转回来的神经工具。”（第82页）

眼睛的构造像照相机一样，外面的图像到照相机上是倒的，人的像到眼睛里在眼底上是倒的，经过神经的倒转，我们看人就是正的。现在我看大家是正的，实际上在我的眼球里面的影子是倒的，因为有神经的构造，因此我看不出大家是倒立着的。但是，社会上货币市场反映经济情况就不是这样情况，货币市场反映经济市场就是倒反映的，人看起来就是倒的。意思就是说，按照客观规律，世界经济市场决定货币市场，就是生产的情况决定货币的情况。但是在货币交易所里面来看，在货币市场来看，好像货币市场倒过来决定经济情况。比如某一种行业，你的股票价格跌了，为什么跌？之所以跌归根到底是这个行业的生产不景气了，要发生危机了，或者是已经发生了危机，有了这种情形这些企业的股票就跌价了，或者是这些企业还不一定就要衰落，只是有一点衰落的因素，但是搞货币投机的人，看到了这种因素，大家一起哄起来出卖股票，结果价格就跌了，价格跌的结果影响这个企业更困难，它的股票大家都不要，于是这个企业的股份投资就有人要来兑现，这个企业本来就有点困难，股票再一跌就更困难了。股票的跌首先是由于企业本来有一点不好，但交易所把这个不好企业的股票一出卖，这个企业就更不好了。由此在表面上看起来，在股票市场上大家都不要这种股票，都来出卖股票，使得股票的价格就跌了，引起了企业的衰落。表面上是这样的现象，好像是货币市场，有价证券市场的变化引起了经济生产的变化，而不是像原来的规律，经济生产的变化引起了货币市场的变化。这种颠倒的情形在市场上就不会像人的神经一样再把它恢复正确了，而把颠倒的印象直接表现出来。这是现象和本质不一致，现象里面有倒立着的假象。

交易所的人只能通过货币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的倒立着的反映来看工业运动和世界市场，因而就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对于这一点，还是在四十年代时我就已经在曼彻斯特看到了："要依据伦敦的交易所公报来构成关于工业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周期的高涨和低落等观念，是不中用的，因为那些先生们总想用货币市场的危机来说明一切现象，而货币市场的危机本身大部分都只能看做仅仅是些征兆。"（第 82—83 页）

这是说，有时危机往往在征兆以后暴露出来，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货币市场的危机产生在工业生产的危机以前，因此似乎货币市场是原因，工业市场是结果。这一句话可以用来作为《自然辩证法》中有一段话来解释，就是在感觉中间先后出现的东西不一定表明因果规律。所以休谟怀疑因果规律，他认为这是感觉先后反复出现多次，这种反复多次，只是一种感觉习惯，并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不可知论者就抓住这个片面作为他不可知论的理由。他抓住的这个片面确实存在，但是他把这种片面现象夸大了，认为是因果规律。在感觉这种现象里面先后出现并不一定等于因果规律。这种情形在世界上的确很多，比如我们看到寒暑表上升了，因此温度提高了，我们的说法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表上升了，然后才知道温度上升，如果不看到就不知道温度上升。有时就有这样的错觉，气温上升是由于寒暑表上升，因为我们是先看到寒暑表上升，实际上是相反的，气温上升了，寒暑表才上升。

"这在那时是为着要拒绝把一定时期的生产过剩作为说明工业危机的发生的原因，因此全部事情还更包含着一种力图曲解真相的目的。"（第 83 页）

那时资产阶级为了要掩饰生产过剩是工业发生危机的原因，因此故意说工业发生危机是由于货币市场发生了问题。我们解放

以后没有这种事情了，解放以前上海就有这样的情形，报纸上常登某个工业发生危机了。为什么？是因为银根吃紧。银根吃紧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工厂的流动资金没有了，工资发不出去，没有钱买原料，反正是有各种困难，要关门、破产。债还不起，一个企业经常向银行借债来补充流动资金，债太多了，银行就不借了。银行逼债，工人要工资，没有办法只好关门、破产。这种现象是货币发生了困难，结果使得企业也就发生了困难。这种论调在资产阶级报纸上虽不一定每天有，几乎也是每星期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把货币发生危机作为工业发生危机的原因，以此来掩盖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他这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容易销出去，因此钱拿不回来，流动资金就少了。资产阶级采取人为地利用货币的力量来缓和危机的办法，就是通货膨胀的办法。这不是讲一个企业，是整个企业发生了周转不灵，仓库里面的存货太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向政府要求帮助，这时政府一个是采取通货膨胀的办法，再一种是让银行多印钞票，然后银行借债给企业使得他手头松一些，流动资金比较松了，既发了工资，债也可以缓一下，以前的旧债可以借一笔新债来还。仓库里面堆着的东西暂时卖不出去也不要紧，而且也还可以卖一些，因为通货膨胀，经营商业的企业可以向银行借钱向工厂买些东西，工厂的存货就可以销掉一些。利用通货膨胀的办法使工业企业产生一种人为的缓和，这也是一种现象。货币市场松动了引起企业生产、工业市场的松动，这种现象是不是客观事实？是客观事实，但这不是第一性的事实，是第二性的。首先是工业危机引起了货币市场的危机，工业影响货币，生产影响货币，以后才是货币影响生产，本来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但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里面，把第二性的关系当成了第一性的关系。而且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弱点，故意这样做。

恩格斯讲这是40年以前的情形，下面他说："在今天，这一点至少对于我们是永远不存在了"。这是说故意歪曲真相的情形。就英国来说是这样的，实际上至少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会这样看。"而且下面的情形又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即货币市场也可以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危机，而工业领域的直接的瓦解对它只能起从属的作用，或甚至于不起什么作用。在这里，就需要对于最近二十年的许多事情特别从历史上来加以探讨和确定。"

这里面讲货币和生产的关系，货币市场和工业市场的关系，相当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不过货币市场并不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内部也有生产关系，第一位的关系是生产影响货币，第二位的关系是货币影响生产。同时也像上层建筑一样，上层建筑本身有相对的独立性，货币市场本身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规律，他在服从总规律以外有自己的规律。所谓总的规律，就是货币市场的变化归根到底决定于工业市场的变化，除了这个以外，货币本身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有时货币危机的产生不需要工业发生什么变化也可以直接产生。有时候，市场上买卖人的心理状态也会起这种作用；有时候，在政治上造一个谣言，也可以发生这种危机。

解放以前蒋介石政府经常利用政治谣言来制造货币市场的变化。比如他造谣说国民党打了胜仗。这个谣言一哄，国民党的工业股票或是金圆券就涨起来了。不过这是一天两天的现象，因为很快大家会看到真相，但是他就利用这个时间把存的股票卖出去，看到卖完了，就跌价，所有买他股票的人吃大亏。这是一种赌博，国民党经常搞，搞到最后钱都集中在他的手里，不但是老百姓发生问题，民族资本家也受他的骗。

所以，货币市场有它自己的规律。你要了解问题的真相就需要对20年来的事情特别是从历史上加以探讨和确定，要经过长期的研究。

“在全社会的规模上实现着劳动分工的地方，个别的劳动过程在相互的关系上就成为独立的东西。”（第83页）

这句话译得长一些，有点难懂，另外一个译本好懂一些：全社会各种劳动有分工的地方，每一种劳动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比如农业和工业有分工，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关系。农业是农业，工业是工业，封建时代农业和手工业是搞在一起的，没有全社会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生产具有最后的决定作用。但当着贸易把生产品和本来意义的生产隔离开来时，它就有了它自己所有的运动，对于这个运动，生产的运动在总的方面是起着支配作用的，但在个别的部分和在这总的从属性的范围之内，贸易的运动还是有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即在这新因素的本性里所包含着的规律。”（第83页）

这也是解释我们刚才讲的问题。这是讲贸易和生产也是一种分工，这种社会贸易和生产各自有一定的独立性。贸易有自己独立性，自己的规律，比如供给和需要的规律，这个规律不直接是生产的规律，而直接是贸易的规律，市场货物多了就跌价，货物少了就涨价，这种情形最后决定于生产。当然有时候市场货物多不一定是生产多了，有时候市场货物少不一定是生产少了，用的多少也可以影响价格或者是跌价。货币市场也有自己的规律，现在我们不用金属货币了，从前用金属货币的时候，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和生产没有关系。如果在货币市场出现了两种银币，一种是含银成分高的，一种是含银成分差一些的，两种货币在市场上使用的结果，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经过一定时候，在市

场上充满了银子成分低的货币，银子成分高的货币很快会在市场上消失，这是货币市场的规律，这个规律和生产没有关系。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17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把它当做一个规律表现出来。

“这贸易的运动有它自己固有的样式，并且它自己又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表现出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由于对黄金的渴望引起的，这种渴望在以前已经把葡萄牙人驱使到非洲去了（参看谢特柏尔的‘贵重金属的生产’），因为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工业的发展以及和它相适应的贸易的发展是那么强烈地使人要求更多的交换手段，而德国——1450 年到 1550 年间最大的产银国家——却不能满足这样大的要求。从 1500 年到 1800 年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征服印度，目的都是为了要从印度输入。没有人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什么。可是结果，这些纯粹由贸易的利益所引起的发现和征服，对于工业竟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反作用：单单为了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就建立了和发展了巨大的工业。”（第 83—84 页）

最初是从这些殖民地国家输入一些工业国所需要的东西，但这种输入不久工业发展变成了输出为主了。

“货币市场也是一样。当着货币贸易从商品贸易分离开来时，它就——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在生产与商品贸易所规定的限界之内——具有着自己所固有的发展，具有着由它本身的特性规定了的特殊的规律和样式。不仅如此，当着货币贸易在自己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中摘大成为有价证券的贸易，并且这有价证券又不仅仅表现为国家的证券”（第 84 页）。这是指公债，我们国家也有公债，但我们现在的公债是不买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债可以到交易所买卖。

“而且还把工业和运输企业的股票也包含在内时，当着货币贸易（它在总的方面是受生产支配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生产的一部分取得了直接的支配权时——那时货币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会更为强烈和更为复杂了。”（第84页）上面我们讲的用通货膨胀来影响生产这是一种方法。

“银行家成了铁道、煤井、矿坑的所有者。这些生产资料具有着两重的性质；它的劳动既必须适合于直接的生产的利益，又必须适合于股东们的要求，因为他是银行家。”这种生产银行家觉得可以发财他才干，不能发财，他就不去搞了。“这里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洲的铁道。它们的全部业务都从属于当前的某个吉·古尔得、万得比尔特之流在交易所的活动，——对于个别的铁道及其作为交通工具的利益来说是完全异类的活动。”（同上）不是直接的生产活动，交易所活动可以引起生产的多一些或者少一些，能够支配铁道的生产活动。

“就是在这里，在英国，我们也看到许多铁道公司在几十年间为着划分他们的区域而继续不断地进行着的斗争，在这斗争里花费了巨量的金钱，并不是为着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仅仅是由于持有股票的银行家们力图使交易所的活动容易进行这个惟一的目的。”（同上）

恩格斯这封信是1890年写的，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已经接近于帝国主义时期，银行垄断资本的作用逐渐抬头，所以这封信表明恩格斯在这个时候开始看到银行垄断资本对工业的重要作用，开始看到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苗头。当然没有列宁后来写《帝国主义论》的时候看得那样清楚，但是在那个时候所出现的这种突出现象，恩格斯已经看到了，而在前几十年的信或者是文章里面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在90年代恩格斯写这封信时，

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我的这几点意见中——关于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这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这几点意见中，我已经在基本上回答了你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的问题。”（第 85 页）

这一句话是他的中心点。生产、贸易和货币这几点的关系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第一性决定第二性的关系，同时第二性关系又反过来决定第一性的关系。事物在相互关系中间，有第一性的关系和第二性的关系。一切关系互为因果，但是互为因果中间有第一性因果关系和第二性因果关系；有第一位原因和第二位原因，要分清。找到第一位原因时不要忽视第二位原因。第二位原因也是原因，它有它一定的独立作用。它跟《自然辩证法》后面讲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自然辩证法》只讲相互关系，没有讲相互关系中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得更全面了。在相互关系中有第一性关系和第二性关系的区别。在恩格斯的信里，这种第一性、第二性的相互关系重复了好几遍，这是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问题的基本原则。经常要注意第二位原因，我们很容易忽视第二位原因。

“从劳动分工的观点上来看，这就最容易了解。社会产生出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公共的职能。担负这些职能的人们就形成了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他们由此获得了甚至于与他们的授权者互相对立的特殊的利益，他们与后者相对地成为独立的东西，于是——这就出现了国家。”（第 85 页）

这里讲到国家问题，国家本来是经济决定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形成国家以后，国家反过来可以影响阶级斗争，影响经济。而且国家里面的人有一定的独立性，国家统治者个人的特点有时会对社会起作用，做总统的人的特点不同，他起的作用也

会有些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不能根本改变经济决定政治的规律，只是在某些具体特点方面，某些事情发展得快一点或者慢一点。

“同样的情形也在商品贸易以及稍迟以后的货币贸易里存在：新的独立的力量在总的方面来说应该是从属于生产的运动的，但由于它内部存在着的，或者更正确地说，由于一度赋予它而渐渐地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相对的独立性”，这里直接用相对独立性这个名词了。“使得它对于生产的条件和进程也发生了反作用。这就有着两种不同的力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的运动，另一方面是那向着最大可能的独立性进展的、一经产生之后，还能够进行独立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经济的运动在总的方面为自己开辟着道路，但它仍然不能不受到那依据于它自己、而建立起来的、并且获得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第 85 页）

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例子，比如老挝和柬埔寨从前同样是法国殖民地情况差不多，里面都有共产党。当头子都是亲王，一个是西哈努克，一个是富马，两个人的思想有一点不同，两个国家的结果不同，发展不同，如果富马到柬埔寨，西哈努克到老挝，柬埔寨和老挝的情况就不同了。苏加诺他有特点，崇拜孙中山，要学习孙中山，所以出现了像印尼这样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跟阶级斗争有关系，但是和出现苏加诺崇拜孙中山有关系。如果换一个人，情况也不一定这样。国家领导人站在国家领导地位就有相对的独立性，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起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但不是起最后决定作用。不过那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总是要最后胜利的，但是有些胜利得快一些，有些胜利得慢一些。这里面就有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问题。也有偶然性的问题，某一个人当了总统，当了首相，也有若干作用。

“这政治运动一方面是国家政权的运动，另一方面是与国家政

权同时产生出来的反对势力的运动。就像金融的市场在总的方面，在上面所说的保留条件之下，并且自然是颠倒地，反映着工业市场一样，政府和反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从来就存在着、斗争着的阶级间的斗争，而这反映也是同样地颠倒着：它已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追求政治原则上的斗争。它是这样的颠倒，使得我们要经过成千年的时间，才能够再发现事情的真相。”（第 86 页）

这个运动本来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但是看起来就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由它决定的。政治斗争是为了一些政治上的不同见解，不同的政治原则而进行的斗争。

“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情形：它可能是循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事情就进行得更快；它可能与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反，这样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大民族里，国家权力都要在一定的期间走向破灭；或者，它会把经济发展的一定的方向切断，并推进到另外的方向——这一种情形，归根到底又会归结为前面两种的一种。很明白，在第二和第三两种情形里，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会给与很大的损害，会造成大量的力和物的浪费。”（第 86 页）

举例来说，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反作用的三种情形：第一种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把经济向前推动得很快，实现飞速发展；另外一种是修正主义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反，因此要引起经济的破灭；第三种情形最确切的例子是外来民族的侵略，武装占领这个地方，它把经济切断了，比如欧洲人到了美洲，原来美洲印第安人是原始公社末期，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是向封建社会发展，但是，欧洲人一去就切断了。还有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占领了汉族的农业区域，如蒙古族和满族，可以

把经济发展的历史切断。切断的结果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新入侵的国家它的方向和经济发展一致，比如蒙古人侵汉族，清占领汉族地区，它来了以后，仍然按照向前发展的方向从事政治活动。蒙古族开始到华北想把一些农田改成牧场，几乎要实行了，后来耶律楚材（是金人投降蒙古的，他有帮助金人搞统治的经验）要忽必烈不要这样搞，搞了牧场不好，还是让汉人照样生产下去，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每年可以收很多粮食来供给西征（打欧洲），如果不这样搞，尽搞成牧场，那么多牛羊运不到欧洲去，对西征没有好处。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套，按照汉族制度来进行统治，所以生产没有受到大破坏。清朝也是这样，入关以后很快建立了统治，特别是康熙统治比较好，到了乾隆是发展的时代，这是清朝封建社会比较好的时代，和汉、唐一样是兴旺的时代，这是因为国家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不能因为他是满清人，是进攻汉族的，我们就歧视他，把清朝人的统治看得一塌糊涂，一定把他说得很坏，这样不公平，他的统治比崇祯皇帝的统治好得多。欧洲人到美洲这个方向也是前进的，生产也是超过历史阶段发展的。另一种是这个国家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相反，比如忽必烈刚到中原的打算，如果这个打算实行了，经济就发生很大破坏。但是不管哪一种切断，对经济、物力都会有大破坏。因为切断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尽管以后仍然还是前进的，可是在切断的过程里面有大破坏，比如蒙古人、满清人南下都有大破坏，对于这一点不能因为他以后有进步就给他涂脂抹粉，“扬州十日”、“嘉定之屠”，把全城人都杀光了，这些坏事他还是做了的。所以，恩格斯这里讲的可以概括一切历史情形。还有这样的情形，欧洲罗马帝国是奴隶制，很发达，后来日耳曼人进来把罗马帝国搞垮了，日耳曼人要用原始公社末期的制度来代替奴隶制度，所以他的方向是反

动的，那时的破坏大了，经济受破坏，文化也受破坏。日耳曼的领袖认为学习文化是最丑的事情，是可耻的事情。有一个日耳曼的领袖，他的女儿认识了罗马教士（基督教士是有些文化的），她跟这个教士学习拉丁文，非常有兴趣，学了两年很有文化了，后来她父亲知道了就禁止了，处罚了她，也处罚那个教士，认为我们是高贵的人，是全能的，怎么能干“下流”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文化是倒退的，从 6 世纪到 9 世纪这三百多年中间是过渡时期，9 世纪才开始恢复。那个时候奴隶制度垮了，究竟是一个什么制度？很混乱。封建制度是 9 世纪开始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暂时切断了、倒退了，最后还是向前发展的，所以最后还是出现了封建制度。

“除此而外，还有经济资源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这一种情形，这在以往的某些情况下面，有时会使一整个地区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全部遭到毁灭。这种情形在今天却多半只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大民族中间是这样：被打击者最后常常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要比胜利者得到更多的胜利。”（第 86 页）

在奴隶制时代，占领一个地方可以把整个部落屠杀了，比如欧洲人到美洲，把印第安部落几乎全部屠杀光了，因为它是落后民族，是原始部落时代，抵抗力小，一下子可以杀光。近代就不同了，殖民地国家要摆脱殖民统治，最后的结果是相反的。恩格斯的话可以作为预言，把今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情况都预见到了。

下面是讲法律问题，这一段比较重要。

“就法律来说，也是一样：当有了新的分工的必要而产生职业的法律家时，于是又展开了一种新的独立的领域。这个领域对于生产和交换虽然有着它的一般的依赖性，但同时对于后者又具有

着一种特殊的反作用能力。”（第 86—87 页）

为什么上层建筑会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上层建筑不是空的，是有一批人组成的，有一批人始终以上层建筑为职业，因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阶层，这是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就要搞它的相对独立性。

“在一个近代的国家里，法律不仅仅应该适应于一般的经济状况，不仅仅应作为它的表现，并且还必须是一种内部首尾一贯的、不至于因为有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表现。为要完成这一点，就使得经济关系的反映的确切性愈更受到破坏。法律的典籍愈是不能作为严峻的、尖锐的、没有伪装的一个阶级统治的表现时，那破坏也就愈更厉害。”（第 87 页）

第一段话比较重要，上层建筑除了它是一批人外，要有独立性，就要搞自己的系统，要使内部在自己的逻辑上能够首尾一贯，因此基本上它要反映经济的要求，可是为了它的逻辑系统，就不能完全反映。剥削阶级统治的时候，他要伪装成为全人类的，他要以全人类的名义贯串他的系统。用冯友兰的话是他要采取一种普遍性的形式。实际上这也不是冯友兰的话，有这么一种伪装的普遍性，冯友兰把这种普遍性说成是超阶级的形式，实际上完全是阶级的，但是因为它有这种形式不是完全确切反映经济基础。统治阶级内部本来是有矛盾的，而一种法律观点只能反映这个阶级一个阶层的东西，这一派和那一派有不同的法律观点，某一派的法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它能够反映这个阶层的利益，但是不能完全反映另外一个阶层的利益，这就会发生冲突。

中国古代，特别是讲儒家学说，讲经学的人，他的法律观点、道德观点和封建阶级某些人的意见是有矛盾的，因为他讲爱民，不要过分糟蹋老百姓，可是统治阶级里面最富裕，最有权势的人，偏

偏不爱民，荒淫无耻，这就有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变成对抗性的，讲经学的人往往要遭殃，甚至遭到杀头。有时这个阶级的统治不稳了，非要他的东西来欺骗不可，就用他一下，讲经学的人一般不是当权的，比如汉朝的董仲舒，在意识形态方面代表统治阶级，而他本人在统治阶级里面来说是倒霉的，没有当过宰相，做过部分地方的国家官吏，不是皇帝的直接帮手。这种人在封建社会来说是正派人，他的言论里面有时也反映一些民生疾苦，而且对老百姓糟蹋得太厉害，有反感，但又不是真正站在老百姓方面，不过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着想，希望能够永久统治下去，希望不要发生封建统治规律所必然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违反客观规律，但言论里面反映一些民生疾苦，描写了一些豪强糟蹋老百姓的现象，把它写成文章，奏本上也有一些暴露。

讲到对法律、道德有没有继承性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一点。“继承”这二个字有广义、狭义的解释，广义的解释是建立马克思主义要利用旧的历史材料，旧的历史文化不管好的坏的统统要利用。利用的意思是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是说要把它拿过来作为自己的，而是把它拿过来研究，研究以后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广义来说，所有的历史遗产，我们都继承。是继承材料，把材料留下来，比如我们图书馆里面把所有封建时代的东西，不管好的坏的统统保存起来，这也是继承，是广义的继承。

狭义的继承是我们是不是要它，是不是拿过来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利用的一些东西，如果这样来解释继承就要严格一些，首先我们只能继承人民中间的东西，有科学贡献的东西，对大众有利的东西，并且在继承的时候，即使这些东西也要找精华，要批判地继承，而不是原封原样地继承。因此那些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统统不要，丢掉它。对于封建道德我们继承不继承？不

继承。封建法律当然不继承，要根本决裂。但是要不要把材料保留下来作为研究的资料呢？还是要的。一点也不研究过去，怎么能够把现在建立得更好呢？这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还有一些概念、形式可以利用，这种利用并不是继承封建道德，或者是资本主义道德本身，是利用它的学说。利用过来以后，形式、内容都变了，比如资产阶级讲自由，我们也讲自由，但我们讲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并不是一个东西，从形式上看，还是自由这二个字，但怎么自由，和资产阶级抽象的自由根本不同，我们是又有纪律又有自由，自由和纪律是结合的；而资产阶级形式上是讲自由，但和纪律完全相反，是对立的。恩格斯提出关于继承问题的理论原则，具体的我们要作很多研究。

“应该说这事的本身就已经和‘法律概念’有着矛盾了。”法律概念既然是反映经济基础的，就应当一点一滴地反映经济，但是它又不能完全反映。“1792 年到 1796 年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的彻底的法律观念，在‘拿破仑法典’里面已经有了许多方面的伪装。”1792 年那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律，倾向性比较明显，到了“拿破仑法典”里面就更明显了。“而所有在法典里面体现出来的那些，还要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成长，每天每天各式各样地减弱下来。但这并不妨害‘拿破仑法典’这个法律典籍成为整个大陆上的一切法典编纂的基础。因此，‘法律发展’的进程主要地不外就是这样，首先是企图要排除那把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时所发生的矛盾，并建立起一种调和的法律体系；接着是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不断地把这体系冲破，于是，又把它卷入新的矛盾里（我在这里暂时只是就民法来说的）。”（第 87 页）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断矛盾，不断地扩大矛盾，发展矛盾，解决矛盾，不但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封

建社会也是这样，上层建筑中的法律学说，道德学说的基本精神不变，而个别部分是经常变的。

“经济关系之在法律原理上的反映，也必然同样是一种头脚倒立着的东西、它的出现并不为当事者所意识到，法律家总以为自己是根据着先验的原则行事，而不知道一切只是经济的反映——于是一切都头脚倒立着了。”（第 87 页）

上层建筑专家没有这种自觉性，不知道是在反映经济。“而这种颠倒，在它还没有被人认识的时候，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而它之能够反过来对于经济基础给以反作用，并且在一定的限度内还能够变更经济基础，这对于我们好像都是自明之理。”（第 88 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他的意识形态是独立发展的，是反过来影响经济的，把第二性的关系当成第一性关系。

“就家庭发展的同一阶段来说：继承权的基础是经济的。可是，好像在英国有着绝对的遗嘱自由，而法国对于这自由却有着严格的限制，这就很难说它们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这就有法律中的相对独立性起作用了。“然而两者都非常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因为他们影响到了财富的分配。”（第 88 页）

“至于说到那浮悬在更高的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如宗教、哲学等，那么，这里面还有着一种史前的、从历史时代中发生和继承下来的内容，这内容在今天我们把它叫做是荒谬思想。这些各种各样的关于自然、关于人类性质、关于精灵、魔力等等的虚伪的表象，大都只是消极地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史前时代的低度的经济发展，把关于自然的虚伪的表象当做了补充，有时也当做了条件甚至于原因。”（第 88 页）

这里，恩格斯把宗教、哲学和法律加以区别，法律包括道德，比较直接反映阶级利益，所以，它更直接决定于经济，继承性比

较少一些。新的宗教、哲学跟史前时代的关系更多一些，新的宗教或者是新的哲学，差不多都要利用旧的哲学思想，旧的宗教神话建立起来的。西方的宗教哲学和东方宗教哲学是两个系统，形式上有很大不同(当然最重要的东西是共同的)。西方哲学受基督教的影响大一些，中国的哲学一般说宗教的影响少一些，特别是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就哲学方面来讲，宗教概念、神话概念比较少一些，孔子不讲鬼神，他也相信有鬼神，半信半疑，但不怎么讲鬼神。儒家学说不谈神的问题，只讲天，实际上唯心主义的，儒家的“天”就是神。西方哲学讲上帝，这是受宗教影响，这里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关于自然、关于人类性质、关于精灵、魔力等等的虚伪的表象，大都只是消极地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由于早期经济不发达对于自然界的规律不能认识，因此就用一些精灵、魔力来作消极的解释。

“但是，虽然经济的需要曾是，而且愈来愈更显著地成为前进着的自然认识的主要推动力，但如果有人想给这一切原始的荒谬思想都找到经济的原因，那就未免迂腐了。”(第 88 页)

这种荒谬思想有时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产生的，不是由于经济原因。

“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荒谬思想渐渐被排除的历史，是它被新的、荒诞性日愈减少着的荒谬思想所代替的历史。承担这个任务的人们，就又是从属于特殊的分工的领域，而在他们看来，好像自己是在一种独立的领域里工作着。在社会分工的内部他们愈更形成一种独立的集团，那他们的生产物，以至于他们的谬误，对于全社会的发展甚至于经济的就愈更会发生反影响。但不论如何，他们本身仍然是处在经济发展的支配的影响之下的。例如就哲学来说，这种情形在资产阶级的时代就最容易得到证明。霍布斯是

最初的近代唯物主义者（在18世纪的意义上），但又是当时的绝对专制主义者，当时正是绝对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的全盛时代，而在英国正是开始与民众进行斗争的时代。”（第88—89页）

霍布斯是英国的一位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17世纪人，他的唯物主义是带有18世纪性质的。他在政治上是绝对专制主义者，拥护君主专制，可是他的唯物主义是18世纪的，就是说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这说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性，在阶级立场上可以站在封建贵族立场，可是作为哲学家，他向前走了一步，在哲学上和资产阶级一致了。

所以，我们研究哲学史不要简单化，阶级立场反动的哲学家，不一定哲学上都是反动的；有了进步政治思想的哲学家，不要毫无根据的一点材料都没有就说他的阶级立场一定是进步的。有一些人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因此就一定要凑一点材料把老子说成是劳动人民的代表者这是荒谬的。他是周天子的史官或者是图书馆长这一类人，如果说那个时候是奴隶制度，他就是和奴隶主站在一起的。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他的立场是同情贵族的，但他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哲学家可以自相矛盾的，他作为一个阶级是落后的，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要概括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在哲学上研究出来的东西是唯物主义的，可是在政治方面是代表贵族方面的。文学上也是这种情形，比如有的作家，作为阶级代表人是站在贵族方面的，但是作为文学家是好的文学家，是反映现实的，他反映封建贵族的没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的立场是同情贵族的，而他的文艺作品是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他自己就有矛盾。这个矛盾说明搞意识形态的人是有相对的独立性的。赫拉克利特在哲学上对于贵族奴隶主有相对独立性，他的哲学实际上是和工商业奴隶主站在一起。

冯友兰解释老子是荒谬的，他说老子是贵族奴隶主的代表，是反动的，他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为什么？因为立场最反动，哲学最进步，好像只有反动的立场才能够有进步的哲学。他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因此不会解释这个问题。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已经出版了，就是讲这一套的。立场越反动怎么会哲学越进步，进步哲学是反映他的反动立场的，反动阶级已经没落了，没落就绝望，绝望就讲辩证法。他的解释大体是这样的意思。“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 1688 年的阶级调和的产儿。”(第 89 页)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采取了调和方法。霍布斯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英国革命的时候他跑到法国，等到英国革命胜利了，又回到了英国，和资产阶级妥协了。洛克是反映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儿，他的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有一点二元论的因素。

“英国的无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即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法国唯物主义者甚至于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哲学家。在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里，显现着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人性质——时而积极地，时而又消极地。”(第 89 页) 这是指向封建势力妥协的那一种资产阶级。“但是，作为特定的分工领域，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把一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这材料是它从它的先行者继承下来，而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事：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倒能够奏起第一把提琴来：例如 18 世纪的法国对于英国（法国人就是立足在它的哲学上的），后来的德国对于前两者。”(第 89 页)

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打先锋，不一定直接反映经济，只要能够综合一些材料然后就能向前进，例如 18 世纪法国对英国，18 世纪法国比英国经济落后，但是法国的唯物主义比英国高。德

国也是这样，经济比英国、法国落后，但是在19世纪初期，在哲学上比它先进。

“但不论在法国或在德国，哲学，就像当时一般的文学的繁荣一样，仍然是一种经济的高涨的结果。”（第89页）归根到底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尽管是落后，但是在落后基础上高涨，从绝对意义上来讲是落后，但从相对意义来讲是高涨。

“我认为就是在这些领域上，经济发展的最后的至上权仍然是无可辩驳，不过它要表现在该领域本身所规定了的条件之内”即有条件地反映经济。“例如在哲学里就表现为经济影响对于先行者遗留下来的现有哲学材料所起的作用（它多半又是首先在政治等等的外衣之下起着作用的）。”（第89—90页）

先行者遗留的材料一大堆，哲学家要在这一堆材料里面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哪一些对他有用，这最后决定于经济，决定于阶级斗争。

“经济在这儿并没有重新创造出什么东西，它只决定着在现存思想材料的变更方式和更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这决定作用也多半是间接的，当它是作为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而对哲学发生着重大的直接作用的时候。”（第90页）

经济往往通过政治、法律然后影响哲学，正因为这样，哲学内部矛盾才会突出，哲学家从阶级立场上反映他的阶级，在哲学上可以因为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的前哲学的影响，比如当前哲学思想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影响，使得他的哲学表现和阶级立场、政治立场有矛盾。这种问题都需要具体分析。所以研究上层建筑问题很复杂，尤其是更高的上层建筑更复杂，特别是哲学史，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化。现在有些同志简单化，哲学史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很复杂，有很多简单化的东西，要完全搞清楚还需要做很

多努力。

下面几段没有什么，不念了，最后一段念一下。

“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就是辩证法。他们常常只看见这里是原因，那里又是结果。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不知道在现实世界里，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只存在于危机时期，不知道整个大的进程是表现在相互作用里——虽然是极不相等的力的相互作用，虽然经济的运动在这里一直都是最强力的、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性的——不知道这里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里面有绝对，第一性与第二性是绝对的。“这事他们一点也看不见，对于他们，黑格尔是不曾存在过的……”（第91页）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

## 五、第十七封信、第十九至第二十一封信的概略讲解

现在回过头来讲第十七封信：恩格斯给布洛赫

——1890年9月21至22日于伦敦

这封信没有很多可讲的，主要还是开始那几句话。可以读一下。

“……依据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解，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论马克思和我，都没有主张过更多的东西。倘若有人作这样的曲解，说经济的因素是惟一决定的东西，那他就会把这个原理转变成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第78页）

有些讲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了。经济是最后的决定原因，但不是惟一决定的东西，上层建筑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是有区别的，要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接近

还是稍微远一些，比如道德和法律，直接决定于经济，决定于阶级，更接近经济一些；哲学、宗教、文艺离经济间接一些。上面我们说过，哲学家的阶级立场和他的哲学思想发生矛盾的情形，在道德形式、法律形式里面一般看不出来。阶级立场是封建贵族的，但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情形在道德、法律里面一般是没有的，因为道德、法律直接反映经济，直接反映阶级。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胜利的阶级在战胜之后所创立起来的宪法之类——法律形式，以及这一切现实的斗争在斗争成员头脑里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学说，宗教的观念以及这观念之进一步发展为信条系统等等。"（第 78 页）

经济产生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产生斗争的政治形式，斗争的形式再产生新的阶级斗争，统治的阶级就把政治固定为法律。另外，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上又有意识形态的各种学说，这种政治、法律、哲学学说、宗教概念又反映阶级斗争。所以第一是经济，第二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法律，然后意识形态又反映阶级斗争，反映政治。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讲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意识形态又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意识形态又反映经济、又反映政治。毛主席概括得很好，比斯大林在《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里面的说法完全一些。斯大林说，上层建筑首先是产生于经济，经济反映为上层建筑的各种观点，然后这种观点又产生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的制度。好像先是经济，经济变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形成政治制度，这种提法有可以考虑的地方，值得研究。

"这些因素对于历史斗争的过程也会发生影响"（第 78 页），这是讲意识形态对于历史斗争发生影响，这就是反作用。原来意识

形态是反映政治的，现在反过来对政治发生影响。发生什么影响？“而且在许多场合对于它的形式还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同上)

上层建筑中间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反映基础、反映政治，而且能够反过来影响政治，并且在一定情况下对于政治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这是讲在政治斗争的形式方面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而不是讲对它的内容，上层建筑不能改变政治斗争的内容，只能反映政治斗争，然后又影响政治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但是不能把它的本质改变了。可是对于它的形式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决定政治斗争是采取这种形式还是采取那种形式，是采取宗教形式还是采取法律形式，或者是采取别的什么形式，或者是采取不同的学派形式、党派形式。比如我们中国从前有党派形式，明朝有东林党，从形式上看是学派。

“这里存在着一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经济的运动是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限大量的偶然性（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事物和事件：它们相互间的内在关联是那么疏远，那么难于确定，使得我们可以把它撇开，把它看做并不存在的东西），而最后地为自己打开道路。”(第 78 页)

这封信主要的是这些，后面所讲的都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自己看。

* * *

第十九封信：恩格斯给梅林

——1893 年 7 月 14 日于伦敦

第十九封信的内容多一些，原来决定把第二十一封信念一下，看起来二十一封信的内容不那么多，所以第十九封信多讲一些，把原来的程序改变一下。

这封信也是讲观念形态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的。这封信的第

二段要注意一下，这不是涉及哲学本身问题，但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恩格斯的谦虚态度，要好好读一读，值得我们学习。他对梅林说："你把超过了我的分内的过多功绩归到了我身上，尤其是当我想到，有许多东西，看起来好像有时是由我独立地发现的，其实在我之前，早已由眼光更深刻和视野更广阔的马克思所揭示出来了。"这很使人感动。虽然不是哲学本身的东西，也应当注意，特别是我们研究理论的人，谨防自己好像写出一点东西，好像是自己创造了什么东西，要警惕这一点。恩格斯始终把马克思称为巨人，把自己当做帮手，这种态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段可以念一下，这是对梅林的书的意见。

"此外还有一点遗漏，这一点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我的文章里通常地强调得不够，而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都同样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最初是把主要的着重点放在政治、法律以及其他思想体系的观念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以及作为它们的基础的经济因素如何对它们发生制约作用的问题上——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为了内容的缘故，竟忽视了形式的问题，如：这些观念的形成是经过什么途径的？这就使我们的论敌找到了所期望的口实，来挑起误解以至于进行曲解，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保尔·巴尔特。"

梅林这本书里面对于上层建筑观念形态的独立性没有太注意，所以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对梅林提出意见要注意这一问题，但是他提意见的时候是用自我批评的形式提出来的，我自己强调得不够，只注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念形态，没有注意上层建筑观念形态有它的继承性、相对独立性。上层建筑内容一定是反映经济，反映阶级斗争的，但是上层建筑形式只是从以往历史遗

留下来的材料发展起来的。《反杜林论》也讲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内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就它的形式来讲，是18世纪那一些思想家，一些思想材料的继承。所以讲继承性是讲继承的什么形式，如果讲内容，新的意识形态和旧的意识形态有原则的区别，特别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以前的意识形态根本是决裂的关系，但就形式来讲不一定。我们也会利用一些以往观念形态的材料。继承性问题要从内容和形式的区别方面来着眼、来考虑、来研究，才能解决问题，不要笼统讲我们是继承或者是不要继承，不加以分析笼统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下面一段和前面的意思差不多，还是讲思想家主观上的观念形态有它独立发展的过程。

“思想体系是一种过程，这过程虽然是凭借着所谓思想家的意识来完成，但所凭借的是虚伪的意识。推动着思想家的那真正的原动力，在思想家是不知道的，不这样它就不会成其为思想体系的过程。”(第 93 页)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知道的，这是写以前的思想家。“这就是说，思想家自己所想像到的只是假的或表面的原动力。因为它是思维过程，所以不论它的内容或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里引导出来，或者是从思想家自己的或者从他的先行者的。”(第 93 页)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形式来说，是从德国哲学引导出来的，从英国经济学引导出来的，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出来的。

“思想家仅仅是凭借着思想上的材料来工作，他毫不踌躇地把这材料当做从思想里产生的东西，而不再进一步去探究比较远一些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源泉，这样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好像是自明的，因为他们以为，既然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思想为媒介的，那么归根到底它的基础也就应该是思想了。”(第 93 页)这不需要解释

了，念一念是表示它的重要性。

“历史方面的学者（这里说的历史方面，是简单地概括了政治、法律、哲学、神学的领域，一句话，即属于社会而不是只属于自然的一切领域）——历史方面的学者”（第 94 页）。这不是讲一般地写一写历史，是研究社会方面的学者，“在每一科学领域里都保有着一定的材料，这材料是从前一辈的思维里独立地形成起来，并在这些相互继承下来的后辈的头脑里构成一种独立的、特有的发展系列。”（同上）这些都是一些思想家自己主观的错觉。这都不需要解释了。

另外注意一下第 95 页第二段，恩格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

“对于事情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对它只能略微提到）”，指思想观念形态有相对独立性方面。“我觉得我们都没有给予它所应该受到的重视。这是一个旧的典故：在开始时常常因为内容而忽视了形式。如像已经说过的，我就是这样做了，而缺点常常是在事后才看出来。因此，我不仅仅要避免为这种事向你提出责难，——相反地，像我这样一个在更早时候就负有同样罪责的人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我只是希望你在将来对于这一点提起注意。”（第 95 页）

下面一段前几句话可以念一下：

“与这相关联的，还有些学者们的荒唐观念：说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体系部门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因此也就否定了它们对于历史的一切作用。”（第 95 页）讲两个意思，一是思想体系的独立作用，一是思想体系对于历史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有一些人就曲解了。“这种看法的基础乃是那呆板的，把原因和结果当做僵硬地互相对立的两极来看的非辩证法观念，是对于相互作用的绝对忽视。”（第 95 页）下面是说一些例子，“这些

先生们常常故意忘记了：当一种历史的现象被其他的、归根到底被经济的原因推动到世界上来时，它就能够对于周围环境甚至于它本身的原因发生反作用。”（第95页）不仅对于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反作用，对于自己本身还有反作用，形式继承性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作用。

这一封信就是这几点要注意，意思都讲了，没有什么别的要讲。

* * *

第二十封信：恩格斯给丹尼尔逊

——1893年10月17日于伦敦

这封信是讲农村公社问题。这封信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我上次讲过，这封信等于批判了俄国的民粹派。民粹派认为原始公社可以进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了这一点，他说：“我还要更进一步说，在俄国，也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不可能由原始的农村共产主义发展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如果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不曾在某些其他的国家里已经体现于生活中并可以引为范例的话。”（第101页）这一句话是反对民粹派的重要的话，这还是一分为二的，不是死板地只讲一点，农村公社不可能发展为高级社会形式，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怎么才可能，怎么才不可能，是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都要看条件，一切都要看到它的相对方面。民粹派在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原始公社要发展为高级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没有范例。但是这个问题在俄国革命以后就不能这样说了。比如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有一些少数民族是原始公社末期，它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因为有了范例，有了党的领导，才能这样做。

* * *

第二十一封信：恩格斯给斯他尔根堡

——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

这封信有一些需要解释的问题，有一些复杂、不明确的问题，念一下。

"一、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关系（我们把它看做社会历史的决定基础），是一定社会的人类在生产他们的生活物资和互相交换生产物（在分工存在着的情形下）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方式。"（第103页）

交换和分工分不开，没有分工不会有交换。这里讲的分工是社会分工，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的分工就不是交换。社会发生了分工以后就有了交换，我们讲的经济关系是在生产生活资料的时候和互相交换生产物所采取的方法和方式，所以经济关系是讲生产关系，不是讲别的关系。

"因此它里面包括着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依我们的见解，这技术又决定着交换的方法和方式，然后又决定着生产物的分配，从而，又在氏族社会解体以后，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支配和奴役的关系，从而又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第103页）

可以引起这样的误解：恩格斯是不是把技术也当做生产关系看待？从字面看的确可以做这种解释，因此，有人批评恩格斯在这里搞错了，把生产力要素和生产关系混淆起来了。现在恩格斯不在了，没有办法去问他，只有我们自己来研究。在我看来，在这里，恩格斯没有直接把技术当做生产关系，只是说经济关系里面包括着技术，它不能脱离技术。要了解生产关系要注意到技术，研究经济关系要考虑生产力。为什么？他解释说："依我们的见解，这技术又决定着交换的方法和方式"，不是说技术等于交换的方法和方式。他上面讲的经济关系是讲交换的方法和方式，并没有讲

技术交换的方法和方式包含生产关系的意思。和马克思给安能科夫的信一样，生产和交换方式不是一个意思。当时使用名词没有严格按照他们后来确定的名词使用，他上面写的可以解释成恩格斯把技术当成交换方式，而后来的解释是把技术和交换方式分开，和阶级关系更有分别。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恩格斯在这里没有错，至少是基本上没有错，只是用词、用概念不很严格，也可能是写一封信因匆忙而随便一点。当时写这封信是1894年，当时恩格斯已经很老了，身体也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写一封信不很严谨是可以理解的。大体上来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交换方式，决定分配，决定阶级，决定国家和政治。

下面这句话也是有误解的："此外在经济关系的概念里所包含着的，还有经济关系依以活动地理的基础，还有那在事实上遗留下来的以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残余之能保存下来常只是由于传统或隋性力），自然也还有那从外部把这个社会形式包围起来的环境。"（第103页）

如果照那一种解释，恩格斯把地理、旧社会的残余都包括在生产关系里面，那恩格斯就犯了大错误，是根本性的错误，我看恩格斯不至于这样。恩格斯的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地理的基础就是经济关系，只是一种条件，就是说，在研究经济关系的时候要研究地理条件，这是要防止简单化的意思。马克思《资本论》里面也讲了很多地理条件，资本主义最初发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新大陆这有区别。在新大陆发现以前或是发现以后，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地理条件使得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它的特点。恩格斯也没有把地理条件归入生产关系，这只是条件。从外部把社会包围起来的环境是一些自然条件，这要考虑。这里不是只提出地理，而且还提出各种自然环境和以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更用不着

解释了，没有什么可以误会的。所以，恩格斯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只是用语上不够严密，这种问题可能是有的。

“倘若如你所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的状况，那么，科学就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从属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倘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技术上的需要，那就比十个大学还更能推动科学前进。”（第103—104页）

这里有这样的问题：究竟是科学决定生产，还是生产决定科学？照恩格斯的看法，是相互关系，在相互关系里面有第一性、第二性。其中有生产和科学的关系，又有技术和科学的关系。技术决定科学，这是第一性的，科学又决定技术这是第二性的。这是辩证法里面相当普遍的问题，到处都有相互关系，相互关系里面都有第一性、第二性的分别，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辩证规律。我们看问题都要这样看，特别是研究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太复杂了，所以只看因果关系是片面的，要看相互关系，单看到相互关系也有一些片面性，在这相互关系里面又要看到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要抓住这一点。

“二、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历史发展中最后的决定条件。但种族也正是一种经济的因素。在这里有两点是不能忽视的……”（第104页）是不是会有人把种族看成是经济关系？不能这样解释。民族特点也是一种经济的因素，是影响经济产生特点的条件。下面都是一些具体解释，不一定要讲了。

这一本书就讲到这里，以后有疑问可以提出来。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1964.4）

## 第一次讲课

（1964.4.16）

今天，给党史专业的同志们讲一讲毛主席这两篇哲学著作，准备分为四个问题来讲。

一、毛主席在当时为什么要写《实践论》《矛盾论》？

二、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提出的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谓提出的任务，简单地说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

三、从认识过程上来克服主观主义。

四、从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

第三个问题主要讲《实践论》，第四个问题主要讲《矛盾论》。

---

* 1964年4月16、17日，中央高级党校“秀才班”（“59班”、“60班”、“61班”）党史专业班进入专业学习，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和学员的要求，艾思奇从党史的角度讲解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主要阐述了这两篇著作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我们便用这个中心意思作为标题。讲稿按速记稿整理，在个别地方有所删节，基本上保持原貌。

大家要求我把《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内容讲一讲，第三、第四是讲主要内容的。这和哲学课不同，哲学课是要把内容中的各个方面都讲一讲，现在是讲党史课，结合党史讲最主要的内容，和实际工作中最有密切联系的内容。

## 一、毛主席为什么要写《实践论》、《矛盾论》？

这个问题总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为了要在革命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进行革命斗争作思想准备。所谓新的历史时期，在当时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这是1937年，大概是八九月这个时间。我是9月底（或是10月初）到延安的。这时毛主席刚把《矛盾论》讲完，我很遗憾，没有听。当时是给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我到延安以后，得到了毛主席讲课的提纲。

这个时期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基本上从“七・七”事变就算结束了，或者说早一点是“双十二”事变（1936年）放了蒋介石就基本结束了。但还有一些残余，后来还有一些小冲突。到了“七・七”事变，日本进一步进攻，这时国民党正式宣布抗战。八九月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正式宣布向日本抵抗，他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抗战之责，这话是在庐山会议上宣布的。这对我们有利，地无分南北，我们在北方，什么人都有抗战的责任，我们也有。抗战正式开始是“七・七”事变，“七・七”事变以后庐山会议正式宣布，国民党代表中国向日本宣战。

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有一些空隙。内战停止了，内部的斗争不用太忙了，毛主席有时间读了很多哲学书。搞哲学这样的理论，一般地搞当然随时都可以，但要系统地搞，像毛主席这样写出讲义，

是要有一些时间的。所以这是为了更好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进行革命斗争，为了在新的革命斗争里面少犯一些错误、少走一些弯路。毛主席考虑到要使全党作思想准备，这个思想准备工作，就是要我们的同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能够学会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新的历史时期的问题。所以，毛主席亲自教育我们的党，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主要是长征以后集中起来的骨干，有了长期锻炼的干部，对这些干部进行世界观的教育。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思想准备？提出这样的任务，也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结果，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觉得有必要做这样的思想准备。这不是毛主席自己要做准备，毛主席自己是有准备的，是讲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准备。因为，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我们干部没有准备，尽管我们有很忠实的干部，尽管我们在斗争中非常英勇，非常坚决，但是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都犯了大错误，都走了很大的弯路。应该说，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有伟大的成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打垮了北洋军阀，这是很大的成绩，后来失败了，但是，共产党发展了，由小组发展到很大的队伍，有几万人。失败以后还有几千人，而且共产党的力量表现出来，并且取得了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入了农村，取得了农村革命的经验，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创造了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条件下怎么进行革命斗争的规律，这个规律当时仅仅适用于中国，在当时是一件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怪事。毛主席讲只有中国有这个条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只有中国才能在整个白色包围下，出现红色小点，能够在农村里面建立根据地，当时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能有这种情

形，所以，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都说成是中国的特殊规律。

今天看起来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形势发展了。当时要想在非洲，要想在马来亚，要想在拉丁美洲出现农村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资本主义稳定时期。那时帝国主义在大战以后，在俄国革命以后，能够空出手来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所以，俄国革命以后，许多国家的革命都被镇压下去了。时间最长的是非洲的摩洛哥革命，打了好几年，最后也全部被消灭了。欧洲也有好几个国家爆发了革命，都失败了。只有俄国一个国家胜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不可能出现农村革命根据地，所以在那个时期来说，是全世界一件怪事。怪事这是个形容词，其实也不是怪事，是中国特有的情形。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其他殖民地国家是一个帝国主义控制的，内部没有几个帝国主义争权夺利，没有军阀内战，比如印度就没有这种情形。我们中国是半殖民地，就不同了。许多帝国主义要争夺这一块地方，帝国主义的争夺反映在国内，出现了军阀混战，反动派不能集中起来，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人民革命，他们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因此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矛盾、军阀矛盾中间找到发展的地盘，可以利用这个矛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创造了这么一条无产阶级的新道路，摸到了这么一个新规律。这一条道路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就不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能够有一个时期空出手来镇压别国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不同，我们中央最

初有一种估计（这是一个假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革命要遭殃，可能要被镇压下去。这个事实也有，但结果不是这样，这个假设后来改变了。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我们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没有一个时期停止过，资本主义没有一个时候稳定，资本主义世界（就世界范围来说），相对稳定不存在了。革命是此起彼伏，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早胜利的是中国、朝鲜、越南，古巴是比较迟的，这是讲社会主义革命，其他一般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斗争胜利的有阿尔及利亚，它现在不是社会主义，没有走社会主义方向，而群众有一大部分要走社会主义方向，领导者是资产阶级，不大愿意走，但有人民的压力，不能不有所进步的表示，能不能做是另外一个问题。没收外国的企业，没收大企业，没收大庄园，声明分配土地给农民，他分配土地想用恩赐的办法，不是用发动群众的办法。革命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现在还在不断地爆发，武装斗争不断地出现。有的地方被镇压下去了，比如刚果，有的地方起来了，比如南非、委内瑞拉就是最明显的，方针、方向清楚。拉丁美洲有一些党的领袖想搞和平过渡，但是不断出现左派，巴西的领导想搞和平过渡，但是党分裂了，也存在农民战争。所以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有能力来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它更衰落了，力量更削弱了，削弱很多，使得它没有力量能够把各国此起彼伏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在这种情形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种特殊怪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普遍规律，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许多国家进行革命的一般道路。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人民革命力量最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锁链中间最薄弱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农村

武装斗争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通过农村的武装斗争进入人民革命，一直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条道路成为现在人民革命的一个基本道路。能不能算是基本道路，没有文件可查，我觉得是这样，可以这样说。我们讲问题可以多少加一点创造，如果错了，我收回，如果是对的，是创造。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在今天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通过农村武装斗争，有了这么一点发展。

从前十月革命的时候，曾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是要从城市搞起，后来变成了一种教条，在“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妨碍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经验证明，不能把它作为教条。现在，通过城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把城市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这个教条实际上成为修正主义议会道路。因为你一定要在城市里面搞，而城市里面敌人的武装力量是最强大的，一般情形下在城市里搞暴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历来的经验都证明这一点），就是由于对外或对内战争中，反动派的武装垮了，比如巴黎公社为什么能在巴黎搞起来？因为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打败了，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垮了，在这个条件下，城市里面搞起来了。俄国革命也是这样的。沙皇的军队在东线总司令兴登堡领导下在一次战役中打垮了，被俘虏了二十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革命有可能搞起来。在平时，反动统治者没有因为战争搞垮了军队，你在城市里面搞，要取得革命胜利一般是不可能的。眼睛里面如果只看到城市，结果是议会道路。这次中央很明确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革命首先在这个地方搞起来，这个地方就整个世界来说，是世界的农村，而革命，多半是从农村搞起来的，古巴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阿尔及利亚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南非也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委内瑞拉正在农村里面搞，巴西也正在农村里面搞。现在没有一个

国家革命是首先在城市里面胜利的。所以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认为讲时代要看到现代的新情况，实际上它根本没有看到现在的新情况。

中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找到了这样一个农村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找到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条革命道路，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创造。所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成果也是非常伟大的。抗日战争以前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首先应该肯定有伟大的成果。

但是，也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犯了很大的错误。遭受挫折的原因是犯了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错误很大，使得革命功败垂成，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打到南京，结果垮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建立了很多根据地，已经相当巩固了，又垮了，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都垮了。损失是很大的，挫折也很大，很痛心。原因就是党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也就是没有思想准备。经验总结为思想、理论，才是真正有经验，有了思想准备。所以，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成功和失败，就要考虑到重新给党做一些思想准备工作。如果有了思想准备，进一步革命就会搞得更好了。当然，革命总是曲折的，不能希望革命的发展是直线式的，一帆风顺的，即使有了思想准备，即使指导思想已经完全正确，干部也能够领会正确的指导，但也不一定就能够避免曲折，也不能希望一点错误、一点损失也没有，要是这样希望，就是幻想，没有这种可能。一切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革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所以，曲折是免不了的，但是如果有思想准备，就可以做到少犯错误，特别是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避免犯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

没有思想准备，就会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犯全党性的、战略性的错误。从中央的领导起，陈独秀是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路线就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来有李立三、王明、博古、瞿秋白同志很短时期的盲动错误，也是多少带有全党性的。本来是已经有了毛主席，但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能够成为党的路线，没有被全党干部接受，而多数干部接受了陈独秀、李立三或者是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就是全党干部没有思想准备，多数人不能分清是非，因此多数人跟着错误路线走，而正确的路线反而孤立了，在这种情形下发展为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如果党的干部有了思想准备，即经验经过了总结，那么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也就是大的错误就可以避免了。

抗日战争以后，我们党还是犯了许多错误的，但都没有成为全党性的，到现在一直还有错误，但都不是全党性的，包括前几年的“五风”错误，这是普遍的错误，但你不能说这是全党性的错误。不能说是中央的，因为中央及时看到了错误，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毛主席看到了这个问题，开了郑州会议，如果坚持下去，可能是路线性的。个别地方可能是路线性的，但全党来说不是路线性的。所以，如果有了思想准备，像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可以避免犯很大的错误，可以少犯错误，可以在某些问题上不犯错误。一点错误不犯也不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党，怎么能一点错误不犯呢？但是我们可以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不太大，即使犯了错误，能够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如果能够这样做，就能避免大的曲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少绕大弯路。完全不绕弯路是不可能的，因为，弯路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客观的，不可避免，如果敌人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这时你不走一点弯路怎么行？有

的时候，弯路是要走的，曲折是要经过的，我们不能避免一切曲折。但是，可以避免太大的曲折，太大的失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而且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有这种必要，而且有这种可能，只要是革命的，应该提出这种要求，也可能实现这种要求，条件就是一个：要有思想准备。中央指导正确，全党有思想准备，至少是主要干部要有思想准备。

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8 年六中全会有一个“论新阶段”，进入了这个新阶段应该要求我们搞的更好一些。过去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没有搞好，中途失败了，挫折很大，现在进入了新阶段，我们应该避免以前那种失败，凡是正确的领导者，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提出这种要求，应当担起这个领导责任。毛主席在进入新阶段以前，就考虑到这个问题，考虑的结果认为应该要使党的主要干部有思想准备。

怎么才能使党的干部能够有思想准备，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关键要借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特别是向错误学习，也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学习就是总结经验，学习的基础就是经验。当然要学习理论，但不通过总结经验来学，是没有办法学好的，我们已经有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很够我们干部学习的，我看那时毛主席的想法就是要教育党的干部向错误学习，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可以从各方面总结，可以从政治方面总结，可以从军事方面总结，也可以从经济方面总结。在当时党的历史上有这种情形，军事方面的总结比较早，1935 年在遵义会议上做了军事总结，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追在屁股后面，生死存亡问题要决定，“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已经垮台了，不能不

总结，并且不能不依靠毛主席来总结，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把军事问题做了总结。我们看遵义会议的总结里面对政治方面还是有保留的，没有总结，那时要把政治问题提出来总结是不行的，做不到，因为当时的领导集团除了毛主席以外，王明、博古、张闻天都在，如果把政治问题提出来总结，在遵义会议时说在政治路线上也错误了，全党要大吵起来，时机不成熟。在这方面要学习毛主席，解决问题要一步一步地解决，时机不成熟要等待。政治上不是没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并不仅仅是军事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且主要是政治问题。按照道理来讲，应该要在政治上解决才能最后根本解决。一个党发生了根本问题，要在政治上解决，在路线上解决。比如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最后还是政治上解决。因为，这个斗争最主要的是政治斗争，但最难解决。最不容易妥协，最不能调和的也是这个问题，其他枝节问题搞一些让步容易，政治上根本路线问题不能让步，对修正主义不能让步，我们也不能让步。党的问题，革命问题，最主要的、更根本的是政治问题。可是，在遵义会议上不能解决，但是，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全党统一不起来，党的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在政治路线统一的基础上，组织上统一，然后其他方面才能统一。在遵义会议上时机不成熟，所以毛主席在等待，只把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军事问题，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能得到全党接受，教条主义者也不能不接受，张闻天就比较快地接受了。政治问题就很难，“七大”的时候，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接受了，后来有的人又犯教条主义的老毛病。所以政治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如果一个人犯了根本性的政治错误，很不容易解决，当然，不是不能解决。所以，要注意不要犯政治上、路线上的错误，要经常警惕这一点。

要根本解决问题，全面解决问题，必须从政治上解决，必须对全党的经验，革命的经验做政治总结，这个政治总结在遵义会议上是做不了的，什么时候做的呢？在1945年“七大”的时候才做了，从1935年至1945年是10年，毛主席从遵义会议开始等待了10年。在遵义会议上，军事上做了结论，政治上做了保留，遵义会议决议初稿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肯定了两句，后来“毛选”上没有了，因为那时是一种暂时的让步，“毛选”出来应该删掉。

要做政治总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必须对全部历史经验做全面分析，必须对党内各种历史上的争论加以全面清理，从各方面分清是非，不但要分清是非，而且要搞清楚为什么是，为什么非，分清是非，必须把为什么搞清楚，不然，还是等于没有分清是非。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需要有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就要使党的干部能够掌握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所谓思想准备，就是指的这个东西，就是使我们党的干部能够掌握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他掌握了这个武器，就会总结经验，不掌握这个武器，虽然有经验也不能总结，有同样经验的人，他的思想武器不同，世界观不同，立场、观点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结论。不要以为有了经验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有了经验，自己就背起了包袱，我是老经验、老资格，我就是一定正确了。不见得。有了经验，没有一个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样会犯错误，甚至会犯的更大一些。因为他有了经验，他可以拿经验做武器，有经验也可以吓唬人。有经验是好的，但运用的不好，可以吓唬人，可以俘虏没有经验的人，可以使一些没有经验的人盲目服从。这种事情不少，赫鲁晓夫你说他没有经验？他还干了几十年的革命，但他是修正主义。他是在苏联党里面长期做

中央负责工作的人，不能说没有丰富的经验，现在是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那还会有错误？有错误还能做部长会议主席？还能做党的总书记？青年小伙子一定会这样想。不但是青年小伙子，就是老伙子也还是会这样想的，因为它是列宁的党、苏联有40年的革命经验，怎么会错呢？现在有很多人是拿这一块招牌，它是40年的党，列宁的党，怎么不听他的话？怎么不服从他？所以是非的标准，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首先要掌握起来，不掌握起来，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不可能真正分清是非。

是非的标准是实践，搞革命失败了，那你就是搞的不对。所以遵义会议的时候，军事工作的决议能够做下来，因为实践就是一个标准，不管你吹的多好，打了败仗，敌人追打的你没有办法，谁也不能不肯定这一点。有了实践作基础，就可以初步分清是非了，只要有了一些经验，哪一件事办的对，哪一件事办的不对，逐步可以了解。但是，并不等于就能够了解为什么是，为什么非。只有实践的经验，可以大体上知道是非，但是如果对实践经验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是非还不能够最后分清，因为原因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斯大林后期在肃反问题上，党内生话问题上，还有在农业上出了一些问题。肯定地说，斯大林是有一些事情做的不对的，但是，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可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修正主义的解释，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这个错误的经验发展修正主义；莫洛托夫不会否认有些事情做错了，但是他没有发展修正主义。所以仅仅凭经验初步分清哪一件事情是，哪一件事情非，如果不进一步说为什么是，为什么非，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还可以产生错误的想法。所以，解决问题不是只靠经验，而要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这就是说，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从立场、观点、方法方面解决

问题，没有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真正总结经验。王明、博古也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他不是没有读过这种书，但是他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不能掌握，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口头上的，不能成为武器，用莫斯科宣言的话来说：不能把它运用到实际工作里面去。就是言行不一致，说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做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德波林学派错误的特点就是这样，讲辩证唯物主义，但不能在实际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只是讲的是这种武器，但不能掌握这种武器，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工作中、实践中的问题，不能说明一二个实际问题。讲是讲得好的，但说明一二个问题就错误了。这种情形，还是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

所以，要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要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在实际工作里面，才能够正确地总结以往的经验，也才能正确的观察当前的问题，预见将来的问题，才能对革命工作的当前情况，发展的前途，做出正确的观察和估计。所以，毛主席就考虑这个问题，要使我们党的这些有经验的干部，不仅仅是有经验，而且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武器，来总结这些经验，这样我们党的干部，对革命工作得到一种思想准备。因为有了这样的考虑，毛主席就写哲学提纲，写《实践论》、《矛盾论》，对党的干部进行教育，这样做才能真正把经验很好地总结起来，才能真正从错误中间学习到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也才能真正克服错误。这样来批判错误，才能得到积极的结果，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一点也是有经验做根据的。在抗日战争以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对错误不是没有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曾经受了批判，盲动主

义受了批判，后来立三路线又受了批判，结果还是犯错误，不但犯更大的立场、路线的错误，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又犯陈独秀的错误。为什么已经批判过的错误又重新犯呢？为什么不能克服这些错误呢？以前不了解，后来了解了。这些错误虽然经过批判，但不能真正克服，原因是对这些错误的分析，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基础，没有真正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分析这些错误，批判这些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批判过，这个批判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没有分析为什么犯错误，没有把错误的根源搞清楚。盲动主义批判了，是"六大"批判的，但是"六大"决议里面有许多新的错误的因素，以后又出现了立三路线的错误，还是一种盲动主义。"四中全会"又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可是又犯王明、博古的错误，错误更大了。这是更大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一点在1941年、1942年整风的时候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党在整风的时候已经讲过为什么过去批判了的错误没有解决，就是没有把错误的根源搞清楚。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所以重犯这种错误。大家可以看一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就讲了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民主革命进入抗战新阶段的前夜，这时毛主席对党的干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全党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对解决党内问题，解决是非问题，对克服过去的错误问题，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上起这样的作用，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为了分析过去的是非，为了使党善于向错误学习，真正能够克服错误，为了这个目的，抓住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党的主要干部的思想

准备问题，就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武器问题。在当时凡是我们正确的领导者，我们英明的领袖都不约而同地考虑到这个问题。比如少奇同志在当时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人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以后不久，内容就是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为了要使我们党的干部对党的革命工作做思想准备，使我们许多同志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样是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所以刘少奇同志是毛主席伟大的帮手、伟大的亲密战友不是偶然的。同样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真正考虑每一个时期的革命问题，每一个时期的关键问题。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使党员有思想准备，是我们党善于学习经验的关键问题，这一点不仅仅是当时理论上的考虑，也是有历史经验证明的。毛主席为什么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始终正确？经验证明，毛主席之所以始终正确，是毛主席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间一直注意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问题，随时注意反对主观主义。为什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能够考虑到首先搞农民革命运动?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反对陈独秀的主观主义，从中国的实际经验出发，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共产党要靠工人，如果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眼睛就看到工人、城市；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知道共产党要有同盟军，要到农村里面找。为什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毛主席首先到井冈山?古田会议决议很明显地说明这个问题，“决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实际的工作里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不要搞唯心主义。在这样一种根本思想指导下，所以毛主席始终是正确的，和王明、博古这些人的路线斗争的时候，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群众路线的思想当时

就有了，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问题，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根本环节上去掌握问题，所以，毛主席不仅仅是在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才考虑到党的干部的思想准备问题，才考虑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问题，而是在以前，在指导革命的时候，一贯注意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因此他的指导没有犯根本性的错误。当然，小的错误不能说没有犯，毛主席自己也讲，小错误也是有过的。干革命工作，一点小错误都没有，不可能。我们说毛主席一贯正确，就是因为他的路线始终是正确的，世界观是正确的，因此不能因为暂时问题，一个时期的问题，材料不够、经验不够、看的稍微偏一些，就说他不是一贯正确。我们现在的中央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这是应该肯定的。列宁说他犯过个别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也说犯过个别的错误，你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一贯正确，列宁不是一贯正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一贯正确的，斯大林后期在许多大一些的问题上不能说是一贯正确的，因此，一贯性就取消了。他的错误是比较大的，不是个别的、暂时的，是好几年，而且这个错误涉及到部分世界观问题，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主观性、片面性，所以，他的一贯性就有缺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因为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暂时的看法稍微不合实际一点，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也不可避免。这些经验也证明，抓世界观问题，是党的思想准备，搞好党的工作，善于学习经验，是克服错误的关键问题。毛主席在 1937 年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向党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教育，不是偶然的，是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做基础的。

根据上面讲的这些，我们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了这个哲学问题，号召党员干部来学习，这一件事情的

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这就是说，两次国内革命战争说明有这个必要，两次革命战争中间发生的屡次错误与失败，说明党的干部需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要不重犯错误，必须有这个思想准备，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定要重犯错误。所以，毛主席对党的这些主要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的写作不是随便凭空想出来，不是一般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都要学习哲学。这种考虑也是有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迫切需要这一点。

为了抗日战争搞的更好，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抗日战争的问题更复杂，抗日战争中间要抓住的矛盾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比前两个时期要复杂一些。因为，以前都是国内战争，以后变成了民族战争。当然，国内还有斗争，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要想在抗日战争里面，使工作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是很困难的。我们在座的干部基本上都经过抗日战争，有许多同志两次国内战争没有经过，但抗日战争都是经过了的，抗日战争工作的复杂性，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是了解的。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观点来处理这些问题，哪里能处理得了。国外有矛盾，国内也有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有两种：一种是同汪精卫政府的敌我矛盾；一种是对蒋介石政权的敌我矛盾。敌我矛盾中有统一战线，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民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是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一个时候是敌我，一个时候是人民内部，性质非常复杂。一个国家分为三个政府，一个是重庆政府，一个南京政府，一个是延安，一个姓汪，一个姓蒋，一个姓共。实际上也是一个“三国演义”，在中国有两次“三国演义”，1500年前有一个“三国演义”，1500年后又有一个“三国演义”。我们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毛主席不做《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报

告，不写这样的著作，不根据这些著作对党进行整风，抗日战争的 8 年能不能得到胜利，是很可以怀疑的，甚至于可以肯定不可能得到胜利，可能又要遭受一次失败，蒋介石的天下可能稳下来，现在蒋介石不是在台湾，还是在南京，这是很可能的。

“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中几次出现，初次出现是王明带来的，后来又出现也是外国带来的，最后到我们反攻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右倾的企图，还想我们不要和蒋介石打仗，这是国际上的意见，国内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同意的，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人同意，因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前有一个时候，有些人有和平幻想。资产阶级、右派、国际上有这种意见，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很希望我们搞南北朝，甚至于搞所谓中间路线，让民主人士当总统、学习捷克的贝纳斯。捷克在解放后，最初是中间人士当总统，那个时候，捷克没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要复辟，把它打垮了。要是没有毛主席给我们党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以后的前途是不能设想的，不能设想有今天这样好的前途，这一点要充分估计。

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一定要充分估计它的作用，不要把这两篇著作简单的当成是哲学教科书，而应当看成是党在紧要关头，毛主席对党的贡献，非常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对以后的胜利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仅仅有这两篇文章也不行，如果没有后来的学习、没有发展成为整风运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哲学思想没有掌握群众，也不能起这么大的历史作用。这个著作之所以起作用，毛主席不但讲了，而且把它变成了实际行动，掌握了我们的干部，以后通过干部掌握了群众，所以发生了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

《实践论》、《矛盾论》本身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教科书式的著作，

是我们中国革命经验的正确总结。经验总结可以从各方面总结，军事方面、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思想方面总结的最高点，是哲学总结，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哲学的总结是政治总结的准备，没有世界观水平的总结，政治总结也是搞不好的。《实践论》、《矛盾论》为后来的1942—1945年的整风运动，以及对这个时期的整个党的经验的全面总结，打下了思想基础，打下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从革命中吸收新的经验，使自己丰富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这样的。《实践论》、《矛盾论》又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通过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使自己丰富起来，使哲学丰富起来，这两篇著作不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简单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上的词句，而是把马克思、列宁，甚至把斯大林时期哲学发展成果，这一普遍真理结合到中国实践经验上来，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发展，大家看一看这两篇文章就知道了。的确是发展了，而且是在很重要的问题上发展了，因为以前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是这样的意思，相反地，是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伟大，他们所发现的这些观点，他们奠定的世界观，能够不断地在新的实践经验里面得到证明，不断地在新的斗争中能够发展，永远有生命力，永远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有力的战斗武器。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比较，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写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里面稍微一般一些、原则一些，但在毛主席的著作里面，就充分展开了。

毛主席写这两篇文章不是随便写出来的，花了很大的功夫，看了很多书，在写这个文章以前，考虑了几个星期，好几天睡不着

觉，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写。毛主席那时四十多岁，精力很旺盛，精心创作，花了很大的力量写的，所以，他的著作到现在越来越感到正确。最初我们读的时候，对它的意义看不出来，今天来看它的意义，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在反修正主义斗争来看，它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所起作用是很大的。我们有些同志写哲学文章，随便考虑一下就写了，隔上二年看起来，就有许多毛病。毛主席这两篇著作已经是二十多年了，到现在还是值得我们学习，还可以看出许多新的东西。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有这个特点，你碰到新的情况，再去读它，又发现新的东西。《共产党宣言》到现在这么多年了，现在读还是有新的东西，经典著作是不朽的，它有这种不朽的特点。

## 二、毛主席这两篇著作所提出来的任务

讲理论总是先把要讲的内容首先点一下。写理论文章都有一个一般的规律，开头总是要把中心意思点出来，一开头就看出要解决什么问题，就使人想看下去，写文章是这样，讲理论一般也是习惯于这样讲，现在把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说一下。

这两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来说，是要教导我们党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在实际工作中反对主观主义。毛主席写这两篇哲学著作所提出的任务是这样的，要求我们解决这样的任务。三句话可以重复一下：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是莫斯科《宣言》里面的话。在实际工作里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里面反对主观主义。

毛主席写哲学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讲的，不是无的放矢。我

们有一些人写哲学著作，也不是无的放矢，不过目的有一点不同，是换一点稿费。当然也不是说所有写哲学文章的都是这样，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马马虎虎一写，在报纸上发表，换稿费，不是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情形从来都有。这也是有的放矢，但这是另外一种，是个人主义的有的放矢，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有的放矢。还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有的放矢，就是要吓唬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都不是有的放矢。写文章换稿费、写文章吓唬人，都不是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是为了实际工作，“的”是针对实际工作，实际工作就是它的“的”。为了指导实际工作，为了克服实际工作里面的错误，《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实践论》就是要告诉我们干部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犯错误？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为什么是？为什么非？使我们干部学会正确分清是非，学会区别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错误的路线，学会总结经验。从总结经验里面找出来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为什么错误，为什么正确，正确和错误怎么区别。

毛主席在《实践论》、《矛盾论》里面给我们以回答。就是说，凡是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路线，从思想上来说，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主观与客观能够求得一致，为什么是错误的？就是主观与客观分裂。《实践论》里面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错误的原因在哪里，一切错误思想的原因是什么，陈独秀为什么会错误？王明路线为什么会错误？立三路线为什么会错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就是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反过来说，正确的思想，马克思思想、恩格斯思想、列宁思想、毛主席思想的特征就是主观与客观不分裂，主观与客观经常能够取得一致。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得到了一个什

么结论呢？要克服错误，就是要努力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求得一致，使认识与实践不要脱离。克服错误的方法，就是克服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克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总的来说是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实现这样的任务，做思想准备就是要准备我们的思想能够实现这个任务，准备我们在新的革命斗争阶段，努力使主观认识与客观求得一致。并且发现某些有分裂的地方，努力克服这种分裂，随时注意不要使我们的认识脱离实际。这就是《实践论》、《矛盾论》向我们党的干部提出来的要求，也就是提出来的任务。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怎么改造世界呢？就要通过一个方法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能够经常取得一致，使我们的认识经常不要与实践脱节。求得主观与客观一致，认识与实践不要脱节，并且要努力，不努力是不行的。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呢？因为主观与客观是一个矛盾，主观与客观经常有矛盾，认识与实践也经常有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努力克服矛盾，求得一致，这样才能克服分裂。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有点不同。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共同点，都肯定正确的认识是主观与客观一致，主观正确反映客观。因此，要克服错误也就是要克服主观与客观的分裂。这是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注意到的问题。克服错误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分裂，努力使主观认识能够反映客观。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告诉我们主观与客观为什么会分裂？因此怎么克服分裂这个问题他也不能解决，因为他找不到原因。原因找不到，也就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一种错误，凡是找不到原因，也就没有办法解决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批判以后没有

找到原因，所以没有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批判了，也没有找到原因，也就没有克服。旧唯物主义有一个缺点，虽然认识到认识应该正确反映客观，错误就是因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践分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分裂，所以旧唯物主义不能完全解决（部分解决也可能的）怎么克服主观与客观分裂的问题。我们说他不能完全解决，就是说他也可以解决一些，不是完全不能解决，如果完全不能解决，旧唯物主义在历史上就没有作用了。旧唯物主义还是能够解决一部分的，因为它肯定了主观应当反映客观，因此它也指导人们努力研究客观世界，在历史上也起一些作用。它提出这个原则，使人有一个努力方向，有了这个努力方向，多少总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过去的旧唯物主义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也起一些作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唯物主义帮助了资产阶级认识了一部分社会规律，认识到应当革命，打破了宗教思想，打破了唯心主义，认识到传统思想是不对的，应当搞革命，比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起了作用，但只能起一部分作用，暂时的作用，法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认识方向就错误了，它不知道社会还要发展，认为资本主义永久不变。因此旧唯物主义不能长久起指导我们认识的作用，不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指导我们不断进行革命。26年前，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指导我们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又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这两篇著作今天照样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我们不断地进行革命。但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只能指导一个时候的革命斗争，不能完全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分裂问题，不能长久解决这一问题。而《实践论》、《矛盾论》就能够解决问题，能使主观符合客观，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帮助我们不断地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比旧唯物主义高明的地方、优越的地方在哪里呢？高明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旧唯物主义的长处，与旧唯物主义正确的东西完全一致，但是，旧唯物主义的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完全克服了。旧唯物主义里面积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的；旧唯物主义中消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没有。旧唯物主义中正确的东西，马克思哲学有；旧唯物主义所没有的正确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

旧唯物主义缺乏什么呢？有一点是正确的，它肯定了人的主观认识应该反映客观，正确认识是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反映。这一点旧唯物主义是有的。但是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旧唯物主义却没有，就是以前的唯物主义它不懂得：第一，人的认识依赖实践，与实践分不开，是以实践为基础；第二，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主观反映客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两点旧唯物主义没有。旧唯物主义认为，正确的认识只要人偶然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就能够一下子认识一切真理，不了解正确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没有尽头。正确认识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到的，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逐渐正确起来。由不正确到正确，由片面到全面，由不知到知，由知道很少到知道很多，这是一个过程。旧唯物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因为它没有辩证法。不懂得这一点，也就不懂得正确与错误的原因，找不到为什么会犯错误的原因，为什么有时好像是正确的东西，忽然一下变成错误。常常有这种情况，有一个时候的的确确是正确的思想，隔一个时候变成了错误？这一点旧唯物主义不懂得。教条主义为什么会错误？不是因为他的教条绝对错误，他的教条的来源，原来是正确的，但是被教条主义者一用，变成错误的了。真理会变成错误，因为条件、地点

变了，运用错了，它就错了。在认识过程里面，这个时候它是正确的，在另一个时候运用不当就错了。所以，旧唯物主义不懂得这两点，但是这两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而旧唯物主义没有。

所以，旧唯物主义者不能完全解决分清是非问题。为什么是？为什么非？不能最后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够解决这一点，就能够完全弄清正确与错误的原因。我们说的这两点，集中起来主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统一的，用辩证法的观点来处理唯物主义的问题，处理人的认识问题，处理反映论问题。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心是肯定了主观与客观是有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是绝对的，是永远有矛盾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因为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绝对的，因此，人的认识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正确。也就是说，主观与客观不可能绝对一致；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客观实践的一致，也不是绝对的。就是最正确的认识，也是在不同程度上与客观实践有不一致的地方，最正确的认识也有某些不正确的地方。列宁曾经反复讲，人的主观认识，最多也不过是与客观实践近似而已。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实际上是近似的反映。有没有绝对的反映，正确到主观与客观不是近似，简直是一个东西了，没有这回事。凡是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当肯定这一点，不要把这当成一个缺点，这是真理。人的认识对于客观实践只能是近似的，能够最大限度的近似，就算是最正确的认识，因为不管你怎么正确认识，比较起客观实际来总要少一些东西，因为客观实际总要比你的认识丰富一些，再怎么聪明的人，脑子里认识问题，总没有客观实际这样丰富，任何时候总有一些东西还没有认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肯定这一点，不肯定这一点，就会自满了。

过去哲学界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会自满，连黑格尔这么著名的人，这么大的哲学家，认为自己的哲学达到了顶点，世界上的哲学问题被他发现完了，从此不要再努力了，以后的人不要再学习了，这是错误的。一个人一到认为自己的认识已经到完全与客观一致了，有了这样的思想，就不能进步了，也就没有办法进步了。你研究一下，我们过去犯错误的人，是不是有这种毛病。王明认为自己的思想绝对与客观一致。这些人不能批评，你批评他，他就大发雷霆，就打击你。

我曾经和王明有过一些接触，有一个时候我翻译列宁的《谈谈辩证法》，他也翻译，他翻译后把稿子拿出来给别人看，我觉得他翻的不错，有的比我好，但在个别地方，有些字我看是翻译错了，就是在讲到肯定发展是对立的统一，因此才能够认识到发展的源泉。"源泉"这两个字他翻成"钥匙"，这两个字本来俄文是双关，钥匙与源泉可以通用，但是按照德文、英文是"源泉"，他翻成"钥匙"。我提意见说，你的稿子总的比我翻的好，我有很多地方要向你学习，但这两个字是不是考虑一下，把它翻成源泉好一些。我这个态度是非常客气的，但这意见一提，很快就挨了一个批评，是一个很大的帽子，好像是成为"二元论"，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王明已经被批判了，我的胆子也大了，我说，你是错误的，按照英文、德文原意，从全文来说翻成"源泉"还是好一些。这人不懂得认识论，自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认识的真理，一个字都不能批评，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在政治上根本不能提出意见，当他领导的时候，你不能提批评的意见，每一个字都必须服从。你们想一想赫鲁晓夫是不是这样的人，他所说的话，你们谁敢对他哪个字批评一下，你试一试，当然我们不是苏共党员，没有这个机会，假如有这个机会，你试一试，不

挨棒子才怪呢。这些人的脑子里没有辩证法。

应当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应当听取群众任何一个微小的意见。当然，群众的意见也可能是错误的，要分析，但有时是对的。古人比赫鲁晓夫、王明聪明一些，中国有句古话这是千古不朽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也是辩证法。这些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就没有辩证法，他以为自己是智者，智者千虑绝无一失，愚者千虑绝无一得。他们的逻辑、认识论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应当肯定主观与客观的一致不是绝对的，最大限度也只能是近似的，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讲了这个问题。

认识既然是近似的，是不是总是要有错误呢？小小的错误总是有一点的，有一些不叫错误，就是主观有某些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想问题，有一些地方和客观不一致，这不是错误，这是某些不一致，这是必然的。所以，正确认识是什么呢？我们说，没有一个人的认识是一贯正确的。我们说中央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贯正确，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我们的领袖人物，我们这些经典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使他的主观认识不断地接近客观实际，不断地深入事物本质，不断地由片面到全面，由表面到本质，由不知到知，经常能保持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最大限度的接近，最大限度的近似，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到这一点就了不起，能够永远做到这一点，经常做到这一点，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人估计问题能经常八九不离十，就是了不起的。一个人估计问题经常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能经常做到八九不离十就了不起了，这就是一贯正确，党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这一点，当然，还有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中央一批成熟

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说是这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这样的，斯大林差一些，到了后期不是八九不离十，是三七开，变成了六七不离八。我们这些人估计问题能够四五不离六就不错了。我们能够做到四五不离六，或者五六不离七，就很不简单，能够经常做到这样，就很不错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水平就可以了，而是说现在的水平，努把力还是可以提高的。毛主席不是不能学习的，长期努力可以提高，可以接近的。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司马迁赞扬孔子，从前人的眼睛里面的孔子，就是现在我们眼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这话很好，意思是，孔子是一座很高的山，我们仰望他呀，不断向他走去，不断地努力接近他呀，虽然还不能到他那一步，我们的心总是不断地向他努力。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虽然不能到他们那一步，但总是努力向他们学习，努力接近他们，心里不断地向往着他们。

反过来说，错误是什么呢？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呢？正确的认识是在认识过程里面不断接近客观实际，不断地保持近似。错误是相反的，我们在认识过程里面，不是不断的接近客观实际，而是在一个时期忽然离开了客观实际，甚至不断地越离越远，错误就是这样发生的。往往是开始认识是正确的，是接近客观实际的，但是，在认识过程里面脱离了实践，不注意保持近似，结果实践发展了，客观实际发展了，而我们的主观认识还是停顿不前，结果是主观与客观分裂了。不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是实践、认识之后停顿了，不再实践、不再认识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原来是正确的认识，经过一个时期，变成了错误。得到了一个正确思想，如果努力下去，不断丰富，原来的内容还是保

持着，经过了丰富，还是正确认识，只要它不断的发展，原来正确的认识还是正确的。但是，原来的认识只有这么一点，不再丰富了，实践发展了，它本身贫乏，就离开了正确的认识，就变成了错误。这个错误，不是在最初出发的时候就错的，不是一开始就错，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比起发展的实践来说，是分裂了，所以就错误了。马克思的某一句话原来是正确的，后来也应该可以是正确的，只要是补充新的内容，他的话永远可以有生命力，但是，不补充新的内容来处理新的问题，就分裂了，就错误了。这不是原来正确的东西本身变成了错误，不是真理本身变成错误，而是真理本身要发展，你不让它发展，就变成错误的了。所以原来是正确的东西，在认识过程中不去努力进一步接近客观实际、脱离实践的发展，就变成了错误。要保持原来正确的东西永远正确，你必须要丰富它，否则，就可以和客观分裂，就变成了错误，甚至于变成荒谬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规律，《实践论》也是告诉我们这个规律，要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每一个循环都使我们的认识达到高一级的程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一贯正确。中央和毛主席认识问题就是这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个正确的认识，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的其他著作里不断地发展，不断充实，不断丰富，革命每发展到一个段落，总是添上一些新的内容，所以他一贯是正确的。如果毛主席仅仅靠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指导中国几十年的革命，一点也不加新的内容，会不会犯错误呢？肯定是会的。但是，毛主席不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是一贯正确的。

不断向新经验学习，不断吸收新经验来丰富我们原来的认识，

任何时候防止主观认识停顿起来，这样保持我们中央的思想一贯正确。我去年讲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主观主义，没有唯心主义，但有人不同意。我今天再一次肯定这一点。应当承认中央的领导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因此，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错误是个别的，凡是一贯正确的东西，一贯正确的领导所做出来的工作，一定是成绩为主，而且我今天还要肯定这一点，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去年有一点不敢讲这话，那个时候讲大受反对，你说成绩是主要的可以勉勉强强的接受，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是不大容易接受的。当然我这样说，没有中央文件做根据，因为今天中央还没有这样讲，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我认为可以这样讲，大家考虑考虑，错了我收回。为什么我今天可以这样说呢？去年不能这样说，是因为以前的三年直接在困难中，直接感到大量的缺点与错误，不能充分理解成绩为主，因为看的缺点太多了，困难太多了，根据直接经验，你说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原则，脑子里有一点想不通，你现在根据情况好转的这样快这一点来看，我们现在可以重新肯定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个原则，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大的天灾、犯了这么多的错误，能够在很短时间里面把它转过来。从困难转变的这样快这点来看，不能不肯定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个理论。我们相信，以后日子过的越长、越能够肯定这一点，再过一年，到了秋收以后再看。六亿多人的事，要想在一年就看出它的是非，看出正确与不正确，是不可能的。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看出，现在已经看出这个苗头来了，我想现在重新肯定一下毛主席这个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指示，我们不妨敢想敢说，错了我们收回。现在有“三不”原则，大家不会给我戴“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

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来了解中央的指导为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毛主席一贯正确，他之所以一贯正确，就是他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发现的人的认识规律，指出要使人的主观认识不断保持对客观实际的近似状态，不断接近客观实际的发展过程，不断从经验里面学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循环往复，每循环一次，都使我们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实践论》的中心思想。大家要我讲一讲中心思想，这就是它的中心思想。这是指导我们的思想，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方向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说的没有这么完全，没有概括出这样一个公式来。如果大家一定要说我是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是宁愿戴这个帽子的。列宁也只是概括一些，由感性、直观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列宁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同时，在实践上也包含毛主席讲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但是列宁的著作中没有展开，毛主席的《实践论》把它展开了，所以就更明确了。这并不是说列宁就错了，列宁对这个规律已经掌握了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里面也有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讲了，但还是萌芽状态。毛主席的发展，并不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根本观点里面，加了什么另外的东西，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思想进一步展开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那些，并没有另外的东西，不过他展开了，就像一棵小树，从前是小树，现在变成了大树。树还是那棵树，并没有变成另外的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树，经过了几十年以后，变成了大树，原来是一棵小松树，现在变成了大松树。这里面没有什么贬低不贬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这样生长发展的。毛主席就是能够掌握这样的规律，能够认识

规律，不只是在思想上认识这个规律，不是口头上说，不只是在文字上写出了一本《实践论》，而是把规律运用在实际行动中，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就是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永远保持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处于最大限度的近似状态。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所有党的历史经验都证明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里面去，因此才能正确指导我们党的工作，正确指导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来进行革命，能够比较迅速地得到胜利，能够避免犯根本性的、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能够经常保持一个正确的路线，有了错误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比任何人更快地发现错误，比任何人更早地提出克服错误的办法，这是毛主席在工作中的特点，这就是一贯正确，这里面没有什么主观主义，没有什么唯心主义的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肯定，如果去年还有同志不了解，不能接受这一点，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思想清理一下。

这就是《实践论》、《矛盾论》的中心内容。

## 第二次讲课

（1964.4.17）

今天接着昨天的问题讲下去。昨天把第一个问题基本上讲完了，但还没有完全讲完。所以还要讲一点。昨天主要是讲《实践论》、《矛盾论》的任务，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坚持哲学的党性。

什么叫主观主义呢？

昨天也讲了，主要就是主客观分离。分离的原因，往往不是

一开始就分离的，是在认识的过程中分离的，在认识过程中，主观认识逐渐脱离实践，这样，就不能够使认识不断地接近客观实际。人的认识总是和客观有些矛盾的。所以某些主观和客观不符合的地方总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部分的错误也总是免不了的。问题就是要看认识能不能越来越更接近客观，能不能经常保持认识和客观实际情况最大限度的近似状态。

我们讲的反对主观主义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主观主义是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很大的错误，根本的错误，也就是路线性的错误。陈独秀的错误、王明、博古的路线错误，修正主义的错误，这些都是主观主义。我们这几年来刮“五风”的时候，某些地方、某些个别部门的错误是很大的主观主义。主观和客观发生了很大的分离，有时候分离到完全违反客观的情况，根本不顾客观情况去作工作。这一种叫主观主义。

至于我们的认识和客观实际有某些不符合的地方，甚至于有某些个别的错误，这不能说是不错，照习惯说法，基本上不错，根本上不错，但个别的部分、有些地方有些错误，那么这种情况能不能叫主观主义呢？能不能叫唯心主义呢？这种情形就不能叫做唯心主义，不能叫做主观主义。所以，要加以区别，要把主观和客观某些不符合同错误加以区别开来。个别的部分的不太重要的错误、不带根本性的错误，和根本错误有区别。就是说，不能把任何错误、任何主观和客观不符合的情形都叫做主观主义，都叫作唯心主义。如果不作这种区别，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也有唯心主义，列宁也有唯心主义，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那种个别的小一点的错误，他们也犯过嘛！不能因为有这种情形，就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主观主义，他们的世界观就有了问题，不能这样说。这个思想，我以前也反复讲过，大家在许多问题上也

注意到，我觉得还有重复的必要，因为涉及到这个问题，重复一下是为了使大家比较深刻地了解，为什么中央是一贯正确的，为什么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是反对的什么东西。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哲学上的党性，反对主观主义，目的是要照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说的，不要犯大的错误，犯小一点的错误，小错误犯了以后，可以比较快的看出来，及时改正。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算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经过努力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

唯物主义是一条认识的路线，就是在发展的过程里，在走的过程里，不断接近客观，主客观不要分离。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反对的是这样一种错误，就是在实践过程里不经常依赖实践，而在一定时候脱离实践，主观和客观分离了。这种情形，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就是反对这样一种主观主义。

主观和客观某些不一致，或者个别不重要的错误，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主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能够正确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在认识上就永远不脱离实践。所谓不脱离实践，就是要不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这是一个立场问题。阶级立场不对，那个实践也不对，那个实践的方向也不对。不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脱离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实践，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就是说，不脱离群众路线，能够经常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避免主观主义，就有可能避免犯大的错误。出了个别的错误，也能很快纠正，能够修正错误。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认识上结合实践，而且要结合阶级实践。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说一点也不能够脱离实践。实践性和阶级性是一件

事情的两个方面。实践就是阶级的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是有实践性的，有阶级性的。这种哲学要求我们经常注意到认识不能离开实践，要求我们在考虑哲学问题的时候把实践作为基础，而且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实践、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实践，要在行动上，在实际工作里，通过这条实践的路，才有可能克服主观主义。

《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中心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找到一条道路，找到一种正确的方法，在实际工作里克服唯心主义，克服主观主义。所谓找到一条道路，就是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永远结合阶级实践的路线，在认识上永远不脱离阶级实践的路线，方法上就是辩证法。《实践论》告诉我们的这一条道路，可以避免主观主义，避免唯心主义的道路，坚持哲学上党性的道路。《矛盾论》告诉我们一个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主要是要注意这一点，一条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一个坚持唯物主义的方法，学会克服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

下面具体讲两篇文章的特点。第三个问题是讲《实践论》的特点，就是要告诉我们在认识过程中克服主观主义。这是《实践论》的中心任务。第四个问题是讲《矛盾论》的特点，就是要告诉我们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

## 三、《实践论》的作用和意义

党史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就其错误来说，是根本性的错误，就其思想来说，是十足的主观主义，是主观和客观分离的典型表现。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取得了充分的经验。

到1937年的时候，我们党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根据实践所提供的充分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主观主义。因为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又犯过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还有局部的罗章龙、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各种各样的错误，提供了许多材料，告诉我们什么是主观主义。毛主席的《实践论》，无非是把这些经验加以概括。在《实践论》的文字里，没有写历史上的许多错误，因为这是哲学著作，不一定把具体事情讲的很多，而且在当时也不好讲，如果在1937年那个时候就写出来，三次“左”倾路线都是主观主义，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的，那也不行。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情况，当时说出来，很多干部不能接受。虽然有这样的事实，但对事实的本质，许多人不了解。有了经验，并不等于了解经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本质。知道陈独秀的错误，知道立三路线的错误，知道王明、博古的错误，但并不等于就能够了解这种错误的本质，而且在当时还有些人坚持错误。在没有总结以前，你在当时如果说王明、博古是犯了政治路线的错误，那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那要争吵不休的。所以，当时明确地写出来没有办法使人接受。另一方面，当时党还没有作结论。所以《实践论》、《矛盾论》里没有明确指出来。它举的例子是国民党到延安去的考察团，不举党内问题为例。但实际上它概括了以前的错误，并且从认识论上找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

单从《实践论》的意义来讲，就是在我们党经过了十几年的工作，取得了经验，犯了一些错误之后，能够从哲学著作上，从世界观的水平上，来概括这些错误，把这些错误的根源、原因找出来。《实践论》把过去那些错误总结出来两方面的根源。所谓两方面的根源，就是一方面从经验（感性）认识方面找到了根源；另一方面从理性认识方面找到了根源。两种根源产生了两种形式的

主观主义。这两种形式在后来整风的时候概括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实践论》里没有明白这样讲。但是,《实践论》已经从实质上讲到两种错误的形式。一种错误就是理性认识脱离感性认识,脱离实践。在《实践论》上讲,这种认识否认实际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从书本上得到的一点东西自称为"知识里手"的人,实际上是指的教条主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经验主义,只是满足于个人的局部经验,不上升到理性认识。

从革命工作的错误中做出哲学总结,找出错误两方面的根源,指出了错误的两种根本形式,指出了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这应该说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哲学的一个新的贡献。因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样的名词,以前的马列著作里也讲过,但那些讲法多半是涉及到一些纯粹学术上的理论问题,以前讲实际工作里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没有毛主席讲的这样深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句话从恩格斯起就讲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把理论当做教条呢?这个原因用专门的哲学著作来作系统的说明,这应该说是毛主席的贡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过去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的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脱离原来的基本原理来发展的。而是把原来的基本原理更展开、更深入地作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也批判了教条主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特别批判了经验主义。但是,对这两种主观主义的根源,作了系统的说明,这是毛主席的贡献。

为什么主观主义会有两种根源,会出现两种形式?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作了系统的分析。他的分析方法是把辩证法运用到认识论上来,把人的认识看做不断发展、充满矛盾的过程。人的认识是矛盾的过程,这个矛盾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主观和客观永远有矛盾。犯错误的人,是主观和客观有了大矛盾不能解决。不

犯错误的人，或者政治路线掌握得很正确的人，也不能够说主观和客观没有矛盾。矛盾是绝对的。没有矛盾，认识不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跟客观世界有没有矛盾？应该说有矛盾。如果说没有矛盾，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死后，就用不着列宁再来写《帝国主义论》了。《资本论》是正确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可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仅仅是《资本论》所说的那些东西，如果简单地运用到帝国主义时代，那就不够了，那就有矛盾。《资本论》解决了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客观发展过程和人的主观认识的矛盾。马克思用了几十年的功夫解决了这个矛盾。但是，到了20世纪，又发生了矛盾，所以列宁又来解决这个问题。

革命的主观认识和革命的发展过程也有矛盾。巴黎公社的时候，马克思最初的认识就跟巴黎公社运动有点矛盾，因为他开始时不大赞成巴黎公社的一些同志搞暴动，他感到要失败，所以不大同意。但是，巴黎公社已经搞起来了，他又赞扬巴黎公社，从巴黎公社里学到许多新的东西，学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这样就解决矛盾了。

到了20世纪，俄国革命出现了，如果列宁简单地按照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来指导行动，那就不够了。列宁最初在俄国革命以前，并不知道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列宁在主观上对这个东西是无知的。俄国革命逐渐酝酿起来，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列宁的主观和客观是有矛盾的。等到俄国革命开展起来，工、农、士兵创造了苏维埃，然后列宁才找到了克服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从运动中找到了苏维埃的形式，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的好形式。

后来，我们中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多多少少用教条主义的方式用到中国来，我们也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

是后来怎么样？苏维埃这个名字不大适合中国的情形。所以现在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是从苏联搬来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用了这个名字就完全错了。在这个名字之下，毛主席根据中国的情况，正确指导了革命运动。但是，在教条主义的领导下，把这样一种形式作了错误的运用。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研究。当时采取苏维埃共和国这种形式，采用这样的名字是不是妥当？至少可以这样说，采用这样一个名字，是当时没有很好解决主客观矛盾的表现，是教条主义理论还起作用的一种表现。不是说我们的共和国即当时的整个苏维埃根据地就错了，不是这种意思。在这种形式下，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当时所以不能不采取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名字，是我们党在历史上还没有解决主客观认识的矛盾，至少没有很好解决，没有充分考虑到在中国农村革命运动里，用什么名字更好，更接近现实，主观近似客观，用什么名义算是最大限度近似客观，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毛主席就叫做农村革命根据地，或者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叫解放区。教条主义者一定把它叫做独立国，叫苏维埃共和国。毛主席的著作里总是把它叫做根据地。因为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利用这种形式是不是完全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恐怕还没有。还有主观主义的影响。后来到了长征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苏维埃共和国的名字取消了。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根据地、解放区，现在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的。

认识的过程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矛盾。主客观的矛盾包含着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包含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也包含着正确和错误的矛盾，不知和知的矛盾，包含着各方面的矛盾。我们反对主观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认识与实践、感性和理性、不

知和知、正确与错误这些矛盾。总的来说，这些矛盾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分离，克服错误。从认识论上来说，克服主客观分离、克服错误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方法就是正确地运用、掌握认识的规律性。在人的认识过程里，正确地掌握认识的规律。不论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在自己的认识问题和考察问题的过程里，违背了认识的规律。

《实践论》就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不违背认识的规律。首先是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有一些什么规律。认识了这个规律，就懂得怎么样才能够不违背这个规律。《实践论》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规律呢？总的来讲，就是从实践中逐步取得感性认识，逐步取得经验，然后把感性认识加以总结，使它变成理性认识。按照《整顿党的作风》来说，就是把感性认识变成综合性的、有条理的知识，然后用这种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认识的基本规律就是这样的。这个规律，大家在学哲学的时候都反复学过了，用不着怎样解释了。这个规律，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实践论》里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系统地说明了认识的规律是一个反复不断的过程。我们用辩证法的名词来说，就是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然后重新又来一个循环。这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断循环的过程，是认识的根本规律。就是说，认识永远是按照螺旋形不断发展的。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个根本规律，而且也照着这个规律去考察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就有可能保证我们的认识能够最大限度地近似客观实际。如果我们的认识不能照这个规律做下去，就是说在螺旋发展中间有了停顿。认识规律是不允许有停顿的，要不断地从经验到理论，由感性到理性，又回到实践，要求不断反复，

不容许停顿，如果我们有所停顿，那就是违背了这个规律。主观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主客观分离是怎样出现的呢？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是违背了这个规律。就是在认识的过程上，认识不断上升的螺旋形发展过程里，我们在某一点上停顿下来，那么就从某一点起，开始主观和客观分离，就要犯更大的错误。如果你的认识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一停顿下来，正确的就变成错误的了。

历史上各个阶段的一些领导者所犯的路线错误，不管是“左”倾冒险路线，或者是右倾机会主义，不管是教条主义，或者是经验主义，你要找他的根源，都可以从这一点上来找。可以肯定，这些错误都是由于在认识不断发展的螺旋过程里，在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跟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前进，那么就犯这种分离的错误。为什么会出现经验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教条主义？根据这个规律来看，就很清楚。

经验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之所以是主观和客观分离的，就是有经验的人就局部经验范围内使自己的认识停顿下来，满足于已经有了的经验，满足于一知半解。经验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形式，是由于在认识的经验阶段（认识的感性阶段）停顿下来，不总结经验，不读书，不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来总结我们的经验，所以才出现经验主义的毛病。他们得到一点具体经验，从这里面作结论。说通俗一点就是这样的，根据一点局部的经验，就对问题作全面的结论。

我们说修正主义的观点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丢掉了普遍真理，而解释问题总是抓住某些个别事实把它夸大。大家可以看一看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文章，有一段讲到修正主义认识错误的

根源，他说：从科学方面来说（就是讲认识），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把一些随便抽出来的片面的事实弄得从表面看起来很像普遍的现象。他们不是把大量的材料加以分析，而是抓住一个经验就作结论，就把它说成是普遍的东西。在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里，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每一篇修正主义的文章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材料，脱离事情各方面的联系，只抓住某一点，比如说，古巴事件，作了那么一个卑鄙的让步，当时的确有这么一个现象，美国剑拔弩张的形势松了一点，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大战避免了。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呢？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修正主义者对帝国主义那样卑躬屈膝的让步，紧张形势多少松了一点，解除了当时那种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解除一切紧张，对古巴的包围依然存在。他们就抓住了这个事情做出了结论：这是他对和平的很大功劳。这是经验主义的主要方法。

在党史的过程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的是教条主义，当时的经验主义者是为教条主义服务的，做了俘虏。怎么样做了俘虏呢？从认识上可以得到说明，因为经验主义者常常总是看到一点，看不到全面的联系，对教条主义提出的主张，他可以从某些个别经验里去找到证明。教条主义者说，革命应该是进攻的，因而提出了冒险主义的战略，这种冒险主义的战略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可以根据他的一个战役，或者一个战斗的胜利，他可以做出结论，说教条主义的战略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你看我们这个战役把敌人打垮了嘛！这说明我们可以进攻。在一个战斗上，一个战役上，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的确是进攻过敌人，消灭了敌人。他就根据这一点来为教条主义服务，他根据这一点把他夸大，做出结论，认为在整个的战略上可以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教条主义根据外国的经验，提出了这种战略上进攻的方针。

经验主义者根据一个战斗、一个战役的胜利事实来为他服务。他之所以是经验主义，他停顿在局部的经验之下，根据局部经验就做了一般的结论，不继续研究各方面的经验，不分析总结各方面的经验。这就是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就是自己的认识停顿在理性认识的某一点上，从认识的规律来说，在认识过程的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再去注意新的经验，就是在理性认识环节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在新的革命实践中继续吸收新的经验，这样使主观和客观分离，这就是教条主义。这个比较容易了解。王明、博古这些人，从外国书本上一些国际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就是形成一种书本上的理论），把它简单地搬到中国来，却看不起中国的经验，轻视农村革命新的经验。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这句话就是教条主义者停顿在书本理论的某一点上，不继续吸取新的经验一种教条主义的典型口号。

《实践论》指出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和两种形式，这是《实践论》的要点之一、中心点之一。指出主观主义两种来源、两种形式这一点，也就使我们懂得了怎么样去克服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使我们懂得了从两方面去克服主观主义。

我们大家知道，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当时，党内领导的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教条主义，遵义会议以后有所改变，一般还是在军事问题上有根本的改变，其他问题上还没有根本改变。当然也有一些改变，毛主席的威信树立起来了，但是在具体问题上许多干部还有迷信教条主义的情况。一直到抗日初期，王明回来以后，还有很大一部分同志跟着他走，项英同志就是。教条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占了很大的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主要是在遵义会议以前，遵义会议以后有所改变。教条主义占党的

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所以当时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因此，毛主席著作的主要批判锋芒是对着教条主义的。但是，毛主席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的，因此是全面的。所以从《实践论》、《矛盾论》里不但可以找到克服教条主义的武器，而且也找到了克服经验主义的武器。

当时，教条主义为什么会占统治地位呢？

主要原因，我们党是处于一个幼年的阶段，一般说来，是缺乏足够的经验的，除了少数人（像毛主席）以外，一般党员是缺乏足够经验的。这就使得教条主义得以占统治地位。当时我们党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经验，非常相信国际上的经验，非常相信苏联的经验。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我们党跟印度党很大不同之点，就是非常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但不是所有的党员都是这样的。可是，由于我们幼年的党非常忠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苏联的经验，教条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来使自己占统治地位。因为他们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有些书本上现成的知识，而我们许多同志没有读多少马列主义的书，书本知识比较少，又缺乏足够的经验；另一个是还有外国的指挥棒。教条主义的来源有两方面，书本上的现成知识，外国的命令，这两个东西，在当时，我们处于幼年的党的一般党员，都是非常相信的。教条主义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特点，也是个弱点，篡夺了党的领导地位。

那么，当时的教条主义，是不是只限于“左”倾冒险主义呢？

还不是这样的。当时就有右倾机会主义，主要也是教条主义。陈独秀的思想是经验主义还是教条主义呢？恐怕还不能说是经验主义。他也没有多少经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旧的狭隘的教条把资产阶级革命理论

片面化了，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够由资产阶级领导。这个思想在当时是反对列宁的。列宁的著作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应该由无产阶级努力夺取领导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但还没有明确提出来。列宁的著作明确提出来了。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领导权。当时的教条主义是反对列宁主义的。利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个论点，结果就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教条主义性质，是很明显的。李立三阐明的是城市暴动的路线。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路线是很明显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就是陈独秀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看恐怕也是教条主义。把书本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片面化了，把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的东西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虽然不很明确，但也有无产阶级要夺取领导的因素。在 1848 年的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来了，无产阶级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路线，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走。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讲到要领导，但实际上有这种意思。这种革命的成分，右倾机会主义把它取消了。

另一个就是陈独秀从外国搬来了教条，外国的东西就是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革命的东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要领导民主革命的观点。托洛茨基又是冒险主义，又是机会主义。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深入研究一下，我没有搞这个专业，提不出很充分的材料来。据我的了解，我觉得可以这样说。经验的成分也有，比如害怕资产阶级离开革命。因为资产阶级经常威胁着要分裂。从经验中也可以看出来、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里，总是要分裂出去的。陈独秀恐怕主要的还是教条的问题。所以，教条主义不一定就是

“左”倾冒险主义。把教条主义跟“左”倾冒险主义等同起来，是错误的。

现代修正主义提到的教条主义同时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他们把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当做一回事。实际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本身也有教条主义的来源。修正主义主要世界观的基础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这是他们主要的东西，而不是教条主义。因为他们把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取消了。他们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到他的有力根据。因此，修正主义者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借口就是经常强调新的经验，强调实践。所谓实践，有两种解释：我们的解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修正主义者讲的实践，讲的经验，是某些个别的经验，个别的事实，他要我们注意某些个别暂时的事实，暂时的现象，丢掉了远大的东西，全面的东西。列宁已经说过，修正主义的特点，是迁就眼前的事变，为了无产阶级的眼前利益，就丢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现代修正主义者有这么一种提法，你看，和平过渡有可能，为什么有可能？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民主、有议会选举，共产党还可以到议会里取得议席。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呢？的确有这个事实。他就根据这个片面的事实做出了结论，说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取得政权。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文章，对于这一点有很明确的反驳。他说：修正主义者看不到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他只看到议会可以使无产阶级的代表有点席位，他不知道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结果，最后会引起比先前更激烈的暴力革命，他看不到辩证法规律发展的前途，只看到资产阶级革命眼前某些好处，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修正主义一般的哲学基础，都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也有两种。毛主席批判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那种经验主义，还不一定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形式。我们过去有很多好党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英勇斗争，取得了许多经验。这种经验，的的确确是斗争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不是主观幻想，不是个人脑子里随便想出来的。一般说我们认识的经验主义是这一种，他的缺点就是狭隘一点。他的经验是局部性的，没有很广泛的基础，但他的经验的的确确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我们说的经验有这种问题。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的另一种经验主义，就是把经验看作主观自身的东西，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那就是马赫主义的经验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经验主义，基本上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就是从主观出发产生经验，这一些经验根本不能够反映任何客观事实，就是从主观要求出发生造出来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从主观利益出发的主观幻想，是个人主义的，也叫唯我论，我认为对就是对的，对我有利的那就是对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有那些修正主义者，那样喜欢和平过渡，为什么那样害怕革命，就是从自己的主观利益出发。他们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不搞革命，他可以做官，可以在议会里面每年有很高的工资。在意大利，不仅可以在议会里做官，而且也可以在地方政府里做官。这些人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考虑经验问题的，所以他很害怕革命，不但害怕国内革命，而且害怕国际上紧张局势。因为国际上一紧张，本国的资产阶级搞法西斯主义，一搞法西斯主义，他的议会议员就干不成了，官也做不成了。为什么这样怕国际战争？当然我们不要世界战争，但是战争来了也有办法对付，有什么可怕的！修正主义就怕，修正主义的许多言论里清楚地讲到这一点，如果战争起来，资产阶级国家就要法

西斯主义化了，他们的所谓工人运动就要受很大损失，就是他的议会官做不成了，和平的官做不成了，要到“地下”受苦了。唯我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基础。

我们党史上像毛主席批判的经验主义，不是这一种，虽然也是错误的，但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他的经验是客观斗争的具体反映，或者是个别的、有局限性的、局部性的经验。在过去，我们党的干部中有没有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呢？也有，但是少数。党内有个人野心的人，从个人野心出发找事实、找材料，来证明他的机会主义。

经验主义怎么样为教条主义服务呢？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顺便解释一下。经验主义为教条主义服务，是通过一种办法，就是用局部的经验为教条主义服务，用局部的经验来证明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那么经验主义者也根据一个局部经验，比如某个资产阶级领袖在某个个别时候，的确做了一篇演讲，的的确确要革命。蒋介石在广州政府时大讲世界革命，有时个别的行动也像是革命的，在个别问题上也要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也有事实。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也在行动上有个别部分的表现。经验主义就根据这种个别的、暂时的事实，就来肯定教条主义的教条是正确的。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俘虏经验主义，就是因为这样。教条主义能够用教条吓唬人，而经验主义能够用局部经验证明教条主义。所以，有经验的人如果不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不吸收更多的经验，那总是可以被教条主义俘虏的。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占统治地位，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些经验主义者拥护他。没有经验主义者的拥护，他的教条主义的统治地位也站不稳。这是我们历史上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实践论》的主要贡献，就是指出了主观主义两种危险、主客观分离的两种来源，指出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因此，也就使我们找到了克服经验主义、克服教条主义，即克服不同形式的主观主义的方法。经验主义来源于两方面，形式是两种。所以要从两方面克服经验主义。当时，毛主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着重指出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不论是《实践论》，还是《矛盾论》，都是这样的，比较着重于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实践论》、《矛盾论》以外的著作，也是多半针对教条主义的。毛主席一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这个口号坚持了好多年，这个口号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这就是说，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就是要认识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要经常从实践中吸取新的认识来源，不要使我们的认识停顿在局部的经验方面，不要随随便便根据个别的经验来对问题下判断。经验必须总结，必须有大量的材料来丰富经验。不经过总结就来对问题作结论，那么一定要成为经验主义。毛主席说，克服教条主义，要重视经验；克服经验主义，要总结经验。这些理论问题，从前讲哲学的时候对大家讲过，大家也了解。

总的来说，不管克服经验主义也好，或者克服教条主义也好，要避免主观主义，避免犯大错误，总的方法就是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不断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方法和观点的问题，也包括我们的立场。我觉得斯大林的一句话是对的，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句话里就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有它的立场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

点，就是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它的阶级性的特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没有阶级性呢？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其他哲学也有阶级性，任何一种哲学都有阶级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特点，是公开承认阶级性的；而其他哲学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实践论》里讲的这句话，跟斯大林那句话是一致的。修正主义就要修正这一点。老修正主义修正了这一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一定要辩证唯物主义，也可以要康德主义，也可以要马赫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也照样重复老修正主义的精神，就是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他实质上是这样做的。

苏联的哲学当然也讲辩证唯物主义，可是他们就有一个特点，他们现在所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闭口不提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不特别提出来。现在他们怎么样提呢？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的哲学，真正人的世界观，所有的人都接受的世界观。这是他们口头上的提法。苏联库西宁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里面一部分讲唯物主义的发展，没有一句话讲到唯物主义的发展跟阶级联系着，很突出。讲唯物主义的发展，从古代到马克思主义前，全是讲唯物主义跟自然科学的关系，不讲唯物主义跟阶级的关系，不敢公开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性。这是他们理论上、口头上的提法。在实践上，现代修正主义实际上是丢掉了辩证唯物主义，采用实用主义。所谓实用，凡是与我有利的就对。“左”倾冒险主义也好，右倾机会主义也好，都认为对我有利的就是对的。一切以我的利益为标准，我认为有利的就是对的。

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问题、解决问题，

来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这是我们克服主观主义总的方法。这里指的方法有两方面，如果对教条主义来说，就是要立场、观点、方法跟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经验主义来说，对自己的经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总结。对教条主义者来说，就是要注意实践，注意经验；对经验主义者来说，要着重读马列主义的书。这是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里讲的，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问题，来总结经验。这种做法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在认识过程上克服了主观主义。

《实践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这样一些。

## 四、《矛盾论》的作用和意义

《矛盾论》的主要意义，就是帮助我们党从方法方面来克服主观主义。辩证法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唯物主义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最近，有些人批判斯大林，说斯大林把理论和方法割裂了。这个批判在日本也有，在法国也有，在苏联也有。我觉得这种批判是不对的。因为斯大林并没有仅仅把辩证法看做方法，也没有忽视唯物主义这个方法的作用。那完全是断章取义。因为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第一句话就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如果没有这个世界观，你就不能算是无产阶级的党。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是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它虽然名字叫无产阶级政党，实质上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它已经失去了无产阶级党的世界观。所以，斯大林的第一句话就把辩证唯物主义当做一种世界观提出来的。毛主席的《矛盾论》也是把辩证法当做世界观来提的。斯大林不仅仅把它当做方法提出来。

有些搞哲学的人，之所以说斯大林把辩证法仅仅看做方法，把唯物主义看做理论，是因为斯大林曾这样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其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所谓了解，也就是一种方法的意思。我们在了解事物的时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斯大林的哲学是有些错误的，但在这一个问题上是没有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批判他，那是一种无的放矢。这是不正确的批评。

修正主义想取消辩证唯物主义党性的特点，他不敢承认哲学的阶级性，而且也不敢公开承认党性。所谓实践性，就是指的这个哲学把实践当做自己认识的基础。这个哲学肯定人的认识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我们这里说《矛盾论》是帮助我们党从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这个意思不是说辩证法仅仅是一个方法，这是讲它的作用。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掌握考察问题、分析问题、总结经验的正确方法。至于辩证法本身，首先是一种世界观，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所看到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眼中的实践，应该是辩证的，是永远发展的，是不断革命的。永远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任何时候停顿在一点上，没有任何时候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任何时候都是不断革命的。这是我们眼睛中的实践。这种看法作为方法来考察一切问题，分析、解决一切问题，来总结我们的经验。

我们学习《实践论》时，就学到一个原则，就是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我们的认识的方法，是从实践中取得经验，然后加以总结，变成理论，变成思想，变成全面性的、有条理的、综合性

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内容就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客观事物内部的联系。经验主义的经验知识，是不能够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反映它的内部联系。根据议会里面可以允许共产党作代表这个事实做出结论说，和平道路有希望。这种经验主义的讲法，能不能反映事物内部的联系，能不能反映资产阶级民主的规律性呢？那是不能够反映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们都是英勇斗争的，但是有少数同志被困难吓倒了，他们根据某些困难就做出决定来，说革命没有希望，或者做出结论说应该跟资产阶级妥协，应该跟资产阶级走，这些人做出的结论就是经验主义的解释。这些结论能不能反映革命实践的内部联系呢？能不能反映革命的规律呢？不能反映。革命的规律是经过困难达到胜利。不能由于困难就说革命没有希望，不能由于困难就向资产阶级妥协，跟资产阶级走。为什么王明的教条主义得到经验主义者的支持。因为这种经验主义者根据片面的困难经验做出了应该跟资产阶级走的结论。比如，项英同志牺牲了，牺牲了的同志我们说他的坏话不大好，他可以代表这些有些经验的人，在经验中有点吓倒了，因此觉得应该向资产阶级妥协。这就支持了右倾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为教条主义服务，经验如果不总结，就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

要使我们的认识能够反映事物的规律性，就要总结经验。总结经验的“总结”两个字，首先是你不能够片面，不能把局部的经验拿来作结论。你把许多经验综合起来，然后才能叫总结。认识的任务就是要达到理性认识。《实践论》里面讲过，达到理性认识的方法就是总结经验。可是，总结经验就有一个问题，你怎么样总结？有会总结的，有不会总结的。不会总结就会做出错误的结论，尽管你有很多经验，不会总结就要总结出错误的结论。也

可能你的经验不是很少，而是很多，经验很少做出的结论会犯错误，经验很多如果不善于总结也照样会犯错误。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不对，尽管你有经验，但也总结不好。善于总结经验，就是要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能够掌握到一种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分析矛盾的方法。就革命的经验来说，民主革命也好，社会主义革命也好，就拿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来说，辩证法主要是分析阶级矛盾的方法。当然也要分析其他矛盾，要分析各种矛盾。但是，中心问题，各种矛盾的中心点，是阶级矛盾。毛主席在《农村调查》序言里讲到我们要作调查，对一切事物作周密的调查研究。调查采取的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在历史上的运用，在社会运动中的运用。

《矛盾论》这篇著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导我们懂得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当然它也是教导我们懂得辩证法的世界观。但是，这个世界观对我们搞革命工作的人来说，它的意义就是要我们能够掌握辩证法的方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学会掌握辩证法的方法，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善于总结工作的人，就是不善于用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能在大量的经验里去研究它的矛盾，分析它的矛盾。根据分析矛盾的结果，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是辩证法的主要任务，也就是《矛盾论》的主要任务。这个思想，在《矛盾论》第一节最后一段就讲过这个问题，以前讲过，现在不念了，无非是讲我们学习辩证法的宇宙观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主观主义为什么成为主观主义，为什么他会犯错误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不重视直接实践的经验，第二个是不善于总结实践的经验，不能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能把我们经验里所

暴露出来的客观事物的矛盾，作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就我们中国过去历史上的问题来说，不管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从方法上来讲，主要的是不善于分析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善于分析阶级关系。就是违背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原则，即是要根据阶级分析的结果来分清敌友，分清敌友之后，就可以正确地决定战略、策略。毛主席之所以始终是正确的，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注意到对我们国家的问题采用辩证的方法考察问题、总结问题。从他的著作里的第一篇文章起，就开始努力对我们国内的阶级关系作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毛主席的著作和其他那些有错误的人的文章最根本的区别，就在这一点。不管是陈独秀也好、王明也好、李立三也好，我们把他们写的东西拿来跟毛主席的著作作个比较，其中根本的不同点：一个是不懂得掌握辩证法、不会分析阶级；一个是充分掌握辩证法，善于分析阶级，这种分析跟国内现实的阶级关系达到最大限度的近似程度，最大限度地反映我们真实的阶级关系。毛主席的特点就在于这一点。一直到搞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还是紧紧抓住分析阶级这一个环节。有些地方，有些人觉得现在已经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毛主席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比如对于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农民，有一个时期，我们好多人有这种观点：土地改革以后，在中国的条件下，没有多少富农，就是中农了；再进一步合作化以后，都是集体农民，都是社会主义农民，还有什么阶级！关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个新问题，现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讲社会主义的农村没有阶级问题。只有我们中国，毛主席在1955年底，把我国的农民分成上中农，下中农，把农民分为阶层来了解，然后解决了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

党的历史上，毛主席之所以能够一贯正确，就是因为他始终准确地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列宁曾经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看马恩通信集，如果要问他们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一点，始终如一地贯彻辩证法。不管教条主义者或者经验主义者，在方法上来说，都是不懂得分析矛盾、不懂得分析阶级。当然，教条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也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读过几本书，马克思主义是主张阶级斗争的，因此，他们写的文章当然也谈到阶级。如果你说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不谈阶级，这也不是事实，谈还是谈的。如果一点不谈阶级，那就不能把自己装成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要假装马克思主义，不采用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是过不了关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著作里，完全不谈阶级是没有的。过去党史上的主观主义者也讲阶级，也讲辩证法。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是真正认真地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认真掌握分析阶级的方法，相反，把分析矛盾、分析阶级的方法加以个人的曲解。曲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谈阶级，但尽量把某些阶级矛盾掩盖起来。比如把敌对的阶级矛盾说成不是敌对的，甚至说成虽然有阶级，但是没有矛盾。另一种，对阶级矛盾虽然也加以承认，也肯定，但对这些矛盾只作片面的、表面的分析，不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不做深刻的分析。用这种方法来观察问题、解释问题、总结经验，结果就会歪曲阶级的真实关系，使得我们主观的认识和客观阶级关系的真实情况发生分离。在党内，或者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在谈阶级的时候，多半是这两种，口头上谈阶级，实际上否认阶级矛盾，或者口头上承认阶级矛盾，但不作全面的分析、了解，只作片面的、表面的分析。这两种错误方法产生两种机会主义。大体上第一种方法多半是右倾机会主

义的基础，第二种方法多半是“左”倾冒险主义的基础。

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多半是在方法上掩盖阶级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也有两种掩盖的方法：

一种是承认有阶级存在，也看成有阶级矛盾存在，但尽量把这个矛盾看成不重要的东西，甚至把一切都看成已经没有矛盾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就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成是不重要的，至少在民主革命运动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应该没有矛盾，具体在政治上来说，不需要跟他争夺领导权，无产阶级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关于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的战略、策略当做自己的战略、策略。现在印度的丹吉完全把尼赫鲁的观点当做自己的观点。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党跟国大党一样，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陈独秀主张给资产阶级抬轿子。无产阶级既然给资产阶级抬轿子，你组织党干什么？组织党是为了跟资产阶级作斗争。你不跟他作斗争，反而还要给他抬轿子，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意大利的党就有这样的问题。加入你这个党，不如加入社会民主党。加入你那个党不过是为了争取选票而已，加入社会民主党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你不给我当议员，我肯定加入社会民主党，也许他会给我。这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没有矛盾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这样的，口号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所谓通过统一战线，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通过“蒋委员长”。一切通过他，好像共产党存在的必要就没有了。从历史上总结一下，看来，右倾机会主义就有这个问题，尽量掩盖阶级矛盾，掩盖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矛盾看成不重要的，把对抗的矛盾，看成非对抗的矛盾，甚至看成没有矛盾。

掩盖矛盾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阶级矛盾偷换为另外的矛盾。

你们可以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研究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现代修正主义在很多地方采用了这种方法。比如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他把它换成另外一种矛盾，叫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矛盾、先进国家和非先进国家的矛盾。现在世界上的修正主义有这么一种世界观，人类世界已经没有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只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所谓先进包括帝国主义，包括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来，苏联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没有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没有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没有了，只有一个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的矛盾。用这种方法来掩盖矛盾，在形式逻辑上叫这种手法为偷换概念的方法。你不细心研究，看不出毛病来。的确好像有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跟殖民地有发达不发达的区别，从生产力来说，有这种情况。你说没有事实根据，也有一点。实用主义者总有点事实，单单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这种区别就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不像一个阶级矛盾的问题。他把生产关系丢开了，社会制度丢开了，想用生产力方面的区别来取消生产关系方面的区别。用这种方法掩盖了阶级矛盾，这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种手法。一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取消辩证法。

"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还不一定是掩盖矛盾，掩盖矛盾就不会成为冒险主义。冒险主义还是要斗争的。要斗争，就要承认矛盾。问题是他对矛盾的分析是片面的、表面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在表面上把矛盾看做不重要的，一个时期看起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以妥协了，表面看起来好像一团和气，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坐下来谈判，我们曾经和尼赫鲁在一个时期搞得很好，尼赫鲁来中国，我们去几十万人欢迎；周总理去，他们也是几十万人欢迎。万隆会议，和他们谈得很好。如

果只看到这种表面现象，看不到深刻的对立，也可以做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结论。冒险主义在分析矛盾时，一般是有表面性、片面性的。比如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毛病，就是没有注意对中国力量的分析。这一点是跟斯大林的教条有关。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里把打击方向指向中间分子。教条主义把这句话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对中间阶层，他不去争取，而且把他看做主要危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博古的文章经常有这样的提法，认为中间分子比反动派更危险。这种提法，在当时的一般党员来说，还是相信的，我那个时候也有点相信。他也有理由，因为他是站在中间，容易欺骗党，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站在中间跟无产阶级对立，你看不出来。如果你看不出民族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的矛盾，当然会变成右倾机会主义。可是，你把民族资产阶级看得比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危险，看不出他的两面性，不去争取，相反却去打击他，那就会出现冒险主义。王明那时的思想，可以说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教条主义。

斯大林这个人，我们党已经肯定了，他是三七开，主要还是对的。他在 1927 年前后一直到 1930 年，把反对托洛茨基、反对布哈林的斗争搞成世界性的斗争。我们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肯定了斯大林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很大的贡献。这一点不能否认。我们中国反对陈独秀主义，也是跟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有联系的。大概斯大林在 1926、1927 年前后，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主要正确的地方有两点：一点是肯定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第二点是无产阶级要发动农民。这个思想基本上跟毛主席的思想是一致的，而跟陈独秀、托洛茨基派相反。所以，在这一段时期，斯大林对世界革命是有贡献的，对中国有贡献。斯大林后来在 1936 年

反对德波林主义时（那是在哲学问题上），也是有贡献的。在政治上批判托洛茨基、批判布哈林，在哲学上批判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在哲学上也是有功劳的。这个斗争后来也对中国有贡献。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时，也综合了当时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成果。《矛盾论》特别明确提出反对德波林学派。但是，斯大林有一个缺点，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三七开。他早期还是正确的，但已经有缺点，到了晚期，主观性、片面性就发展了。他打击中间派这种思想那是早有了的。《列宁主义问题》是在1924年写的，他在1924年分析阶级这一方面就有不彻底性，就有片面性。当然，他这个思想是根据列宁的著作来的。列宁的"两个策略"中，主张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跟资产阶级斗争到底，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列宁这样提出来是对的，也应该参加民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跟资产阶级联合，同时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像资产阶级那样不敢搞彻底。资产阶级不愿意把民主革命搞到底，无产阶级一定要搞到底，用搞到底的办法跟资产阶级斗争，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列宁是这样提的，斯大林的思想是根据列宁的观点来的，但是过分夸大了。他把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到底，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改成打击资产阶级，把打击目标指向资产阶级，就过火了。本来是真理，他说多了一点，就变成错误的。民主革命的打击对象，怎么是自由资产阶级呢？应该是封建势力，应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够把自由资产阶级当做打击的对象。列宁没有提出这样的思想，因为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反动的，不能够说有革命性，向封建势力妥协是主要的。所以，在俄国革命时提出又联合又斗争，是不恰当的。在向沙皇政府进攻的时候，暂时搞一点统一战线也是有的，但一般不提又联

合又斗争。因为这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同，俄国本身是帝国主义。斯大林对列宁这种思想，把资产阶级当做全国的打击对象，说得过火了一点，这就错了。斯大林很早就有片面性，分析阶级时就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被王明、博古当做教条用到中国来，在中国也要打击中间势力，那就犯了更大的错误。斯大林那时是在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之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的错误，只是限于理论方面，把教条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这个错误就变成行动了。这样一种不顾客观事实的片面分析，就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的"左"倾冒险主义，就使当时党的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发生很大的分离，造成很大的错误，很大的损失。斯大林主要是有功的，但是有缺点。他的缺点被教条主义者发展了，所以造成了1930年以后两次特别是第三次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个冒险主义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当时毛主席早就看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矛盾论》里又讲了，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是和德波林学派有关系的。这又怎么说明这个问题呢？本来教条主义大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为什么又说和德波林学派有关系呢？斯大林反对德波林学派，教条主义又是德波林学派，那么教条主义也反对斯大林了？恐怕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会有疑问，要解释一下教条主义又是德波林学派这个问题。

斯大林在1929、1930年反对德波林学派是有功劳的，但是后来斯大林自己的思想也陷入了德波林派的错误，他自己的片面性、主观性到后期发展了。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原因是这样的，德波林派的主要特点，不是不讲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讲辩证唯物主义，主要的特点是理论脱离实际。当时斯大林批评德波林学派，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他的唯心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脱离

实际，是空讲理论，抽象地讲理论。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丝毫不去研究，不注意当时的革命实际经验。这个毛病，后来斯大林自己也逐渐逐渐发展了，特别是在集体化得到胜利以后，从1932年起，特别是1936年以后，斯大林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实际生活里面阶级斗争也不断出现。但是，在1936年他就作了结论，说阶级斗争不存在了。阶级没有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这个结论是德波林主义，是主观主义的，是脱离实际的。对于中国的问题，斯大林到了后来的看法，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仅仅是对中国，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指导，他不顾实际情况，有时对阶级观点作了右的分析，有时候作了"左"的分析。对王明、博古那时的关系来说，对中国阶级关系，是作了"左"的分析，打击中间力量。

到了后来，从1935年起，主要转折点是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季米特洛夫领导的，代表大会规定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对的，但那里面开始出现了右的东西，一切通过人民阵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个思想，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存在了。斯大林右的思想，在苏联国内来说，是从1935年到1936年开始的，肯定苏联没有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忽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看见广大人民跟法西斯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看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次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时候没有看出来，是不对的。那时提出一切通过人民阵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季米特洛夫组织的那次大会，总的来说，是对的。但里面有主观主义，有些片面性，所以王明在抗日战争开始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有来源的。这个来源，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就有

了，是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搬来了教条。“左”倾冒险主义一般有片面的分析，右倾机会主义也有片面的分析。我们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左”倾冒险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对矛盾作了片面的分析，关键问题是对中国阶级的作用没有正确的估计。

所以，《矛盾论》的中心内容，是在方法论上揭发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和两种形式。就是从分析矛盾这个问题上揭发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两种形式。一个来源，是掩盖矛盾，因而就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另一个来源，是分析矛盾有片面性、表面性，因而就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当时来说是这样的，后来也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的形式是这样的，从认识论上，从认识的过程上来说，主观主义有两种形式，即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从方法上来说，又表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掩盖矛盾，即右倾机会主义的形式；一种是片面地分析矛盾，即“左”倾冒险主义的形式。片面地分析矛盾，也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形式。

我们还记得，1953 年有一个时候，高岗问题发生前后，毛主席曾经讲过一段话，说现在有新的主观主义的形式。两种主观主义的形式，一种是急躁冒进，一种是保守主义。这是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急躁冒进和保守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又是主观主义的不同形式。这种不同形式的方法上的来源，对矛盾的分析，对辩证法的掌握，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否认矛盾，或者是反对辩证法，或者是不能真正掌握辩证法，出现了片面性。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矛盾论》，帮助我们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主观主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形式，因此

我们也根据这个理论上的贡献，就可以找到克服主观主义的另外两方面的方法。两种根源、两种形式，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克服主观主义。这两种方法，《矛盾论》本身已经有了，一种是针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观主义，在方法上要强调矛盾的普遍性，要强调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性。《矛盾论》里关于矛盾的普遍性这一段，是我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主要武器。修正主义的病根、它的危害，在方法论上就在于否认矛盾的普遍性。修正主义要假装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口头上也不会完全反对辩证法，不完全否认矛盾，他也要讲讲辩证法，讲讲矛盾分析的问题。但是，他搞修正主义是抓住了这么一点：就是把矛盾说成不是普遍的，把阶级矛盾说成对有阶级社会来说，不一定是普遍的，在某些情况下就没有矛盾，某些情况下没有阶级。或者是有阶级，但这种阶级矛盾也不重要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要病根，就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

德波林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矛盾不是自始至终存在的，事物的发展某一个阶段上有矛盾，而在另一个阶段上又没有矛盾。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者，他就是这样运用德波林学派这一点。陈独秀也不是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矛盾，他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里面，无产阶级完全应该跟资产阶级走。他从这一点来反对辩证法，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在事实上就等于否认了辩证法。因为承认辩证法，就一定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你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就认为辩证法不是根本的规律，对立的统一不是根本的规律，那么也就否认了辩证法。针对右倾机会主义，针对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特别强调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之所以后来犯右的错误，由于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矛盾。否认了这一点，就走向右了。铁托之所以是修正主义，他主要是否

认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否认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反对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种修正主义的手法，要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的普遍性，阶级分析的方法的长期性。要肯定这一点。反对修正主义把阶级矛盾偷换成另外的矛盾，这是《矛盾论》给了我们一个反对主观主义的一方面的武器。

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着冒险主义，针对着教条主义，要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就应该特别强调矛盾的特殊性。所谓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强调在分析矛盾的时候，分析阶级的时候，要作到最大限度的全面性、具体性，尽可能作深刻的分析。因为"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在方法上的主要毛病是缺乏这一点，即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忽视了对矛盾作全面的、具体的、深刻的分析。

《矛盾论》这篇著作，在党史上主要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所以毛主席在这里面特别是对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讲的多一些，并且讲到要用更大的力量来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因为当时许多同志都作了教条主义的俘虏，不大注意对中国的矛盾的研究，对中国的阶级特点不大注意。所以毛主席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是它在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而对普遍性这一方面讲得少一些。如果我们在研究辩证法、运用辩证法、运用矛盾的分析方法的时候，能够既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又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就能够得到克服各种机会主义的好处，既可以克服右倾机会主义，又可以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因此，研究辩证法要全面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要把普遍性的观点和特殊性的观点结合起来，不能偏废哪一方面，不能只注意普遍性而不作具体分析，也不能借口具体的特点而把矛盾的普遍性否认了，偏于哪一

方面都会犯错误。只有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完全克服主观主义。

所以，毛主席的《矛盾论》里有一句话：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是辩证法的精髓。所谓掌握普遍性，就是任何时候都要肯定事物是有矛盾的，社会是有阶级矛盾的，在分析以前，我们脑子里先作这种准备，就不会犯错误，这是矛盾的普遍性。这一点要坚决不动摇。有了这个坚决不动摇的观点，在进一步分析矛盾的时候，就要注意全面性，尽可能深刻的分析，不要抓住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能够这样做，就能够正确掌握辩证法的方法，就可以把我们的世界观正确运用到工作上来。《矛盾论》本身就是全面注意到这两方面，虽然它比较偏重强调特殊性，由于它的目的是要解决当时教条主义统治的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当时的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为了反对这个主要危险，所以比较多地强调特殊性。但是，我们在学习《矛盾论》的时候，要注意它是全面的。《矛盾论》教导我们，一方面毫不动摇地肯定矛盾的普遍性，毫不动摇地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分析的全面性，注意尽可能全面的具体的分析特殊矛盾问题。真正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也才能够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在考察问题的时候，真正能够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它的矛盾，这个行动本身也就贯彻了矛盾的普遍性。所以，主要还是能够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你对特殊性的认识够了，那自然而然就贯彻了普遍性。因此，就是现在我们用更大的力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还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不是主要反对冒险主义。我们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当然是反对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一点。但是，在分析国际国内的问题上，能够很好地做具体的分析，做全

面的分析，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坚持了矛盾的普遍性。克服修正主义，不仅仅是坚持普遍性就够了。要彻底克服修正主义，还是要对世界矛盾、国内矛盾做全面深刻的分析。我们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文章，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第一次对当前时代的世界矛盾做了比较最全面最深刻的分析。将来有些著作里，当然还可能做进一步深刻的分析。

怎么样才能做到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呢？《矛盾论》也给我们指出了一些最根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对一个矛盾我们应当怎么样掌握它的特点，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如果同时有很多矛盾，我们怎么样去掌握它的特殊性？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需要从这两方面来研究，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如果只有一个矛盾，我们怎么样掌握它的特点呢？这个方法，首先是对矛盾的双方（即对立的双方）的特点先做研究，了解了对立的双方的特点，然后综合起来，那么对整个矛盾的特点也就了解了。比如在我们过去的民主革命里，如果把反动派、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特点弄清楚了，又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势力这一方面弄清楚了，那么对民主革命的矛盾特点也就弄清楚了。当时的反动派，无非是国外依靠帝国主义，国内霸占农民的土地，靠土地来剥削农民。而另一方面，民主势力则是要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两方面的特点都弄清楚了，那么整个矛盾的特点也就清楚了，就是人民要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个矛盾。不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搞民主，要实现民族独立，就是民主和反民主、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的矛盾。任何一种矛盾，要把它的特点弄清楚，首先要把两方面的特点弄清楚。不弄清楚这一点，你解决矛盾时就会犯错误。比如，如果弄不清当时矛盾的一方是要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是从资本主义压迫下

解放出来，就可能在当时的革命中要反对资本家。“左”倾冒险主义就有这个问题，打击中间力量，就是打击资产阶级，就把革命的阶段性搞混乱了。这样也把革命战略、策略搞错了。

王明、博古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对苏区来说，要反对什么富农路线。当时革命的人民只要求反对地主，而他的打击对象把富农包括在内。把革命的阶段搞错了，也就搞错了战略和策略，就是对矛盾的双方没有搞清楚，因此对整个矛盾总的特点没有搞清楚。这是一个问题。毛主席的《矛盾论》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这一大段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心思想是要我们注意分析矛盾各方面的特点，然后再综合起来看矛盾的总的特点。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矛盾很复杂，同时有许许多多矛盾交错在一起，那时应该怎么去掌握这许许多多矛盾的特殊性呢？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找出主要矛盾。因为主要矛盾是决定许多交错复杂矛盾的共同特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矛盾，能够规定其他矛盾发展的一种矛盾。要善于分析矛盾，不但要注意一定矛盾的具体特点，而且要注意从很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主要矛盾的特点，掌握主要矛盾的特点。这个问题，是党的历史上很重要的问题。“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之一，就是不知道这一种变化，不懂得掌握主要的矛盾的问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九·一八”以后，我们革命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由国内矛盾转到民族矛盾方面来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国内矛盾是主要矛盾，全国人民跟蒋介石统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在“九·一八”以后，国内矛盾逐渐失去了主要性，日本帝国主义跟中国人民的矛盾转变为主要矛盾。这个变化，教条主义者不理解，因此他就要打击民族资产阶级。他不把联合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看做主要的战略任务，而提出另外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反动

派和革命派的最后决战。把它当做主要的口号。教条主义者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看不清楚主要的矛盾。所以《矛盾论》里特别专门讲了主要矛盾，解决了当时历史转变关头的一个重大问题。后来《毛泽东选集》里面《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两篇文章，是以掌握主要矛盾的思想为基础来分析全国的矛盾的。

所以，《矛盾论》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形势，使我们找到这样一种武器。这个武器里的主要东西，要我们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抓住矛盾的特点，对矛盾做具体深刻全面的分析，找到复杂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一个方法，是毛主席不仅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普遍真理（只有教条主义才从书上抄来真理），而且是结合中国十几年的革命经验，总结了这些经验，然后提出辩证法应该怎样运用，特别是要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掌握主要矛盾。这个思想在后来我们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成为我们的主要武器。首先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帮助我们党掌握了正确的战略方向，帮助我们抓住了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又注意到在解决民族矛盾这个大前提下来解决第二类矛盾，包括我们国内跟蒋介石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时，又注意到这些矛盾的特点。不像王明那样，忽视了矛盾的对抗性。虽然注意到这个矛盾是第二类的矛盾，但也不忘记它是对抗性的。抓住了主要矛盾，又抓住了每个矛盾的具体特点，这样就使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搞得很正确，使得我们革命能够比较顺利的发展，我们的胜利是比较快的。这个思想在当时帮助我们中国革命发展的更快，避免了全党性的路线错误。《实践论》、《矛盾论》出现以后，我们党还犯过错误。但是，全党的路线性的错误避免了。一个时

期因为没有克服教条主义，部分的右倾机会主义出现了，可是没有影响整个中央，没有影响全党。抗日战争时期是如此，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部分的错误、个别性的错误也有一点，“左”一点的也有，只有部分暂时的偏差。暂时的错误不算主观主义。总的领导不能算主观主义，这是在运动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不可能避免，有时是可以避免的暂时错误。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很顺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几年来，也不能说出现过什么全党性的错误，个别地区也许可以说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全党性的错误则没有。前几年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对初步搞起来有经验，因为苏联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怎么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这件事，全世界都没有经验，苏联始终停顿在集体农庄的水平上不能前进。如何前进？要靠我们自己创造，我们一点经验没有。1958年以来这几年虽然有这么多的损失，有错误，有缺点，甚至于死人，但我们摸出一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没摸出来的道路，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像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一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今天看来，价值也很大。对亚、非、拉美的国家来说，很有价值。古巴的胜利，不是因为看了毛主席的著作才取得胜利的吗？其他亚、非、拉美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参考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那个时候，也有牺牲，也有困难。现在看来，那时的错误、缺点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如果归结于思想上的原因，要归功于毛主席给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

应该说，《实践论》、《矛盾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在我们党的建设方面、革命思想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应该作充分的估计。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和他的哲学思想*

(1964.4)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自由的事业，他生前虽然没有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但他的斗争，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一切伟大的革命家都抱有某种进步的哲学世界观。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他的革命活动，也是有他的哲学世界观作为指导思想的。但是，要了解孙中山先生的哲学世界观，又必须研究他的革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坚决、勇敢的革命家。为了中国民族的解放，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他经历了40年的奋斗，遭受过许多次失败，在一条曲折、复杂、困难的道路上摸索前进，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定性。

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这时，旧中国在美、英、法、日、德、俄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下，逐渐沦陷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腐朽封建势力狼狈为奸，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旧中国

* 这是艾思奇同志1964年为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非科学讨论会所写的报告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广大人民，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国家的危亡，使中国人民不断地起来反抗，先进的人士，鉴于旧制度的衰败，就向西方学习新的思想武器，来指导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他们最初都是向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学习的，其中最著名的有领导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洪秀全，提倡通过上层统治阶级实行民主改良的康有为，然后是领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 1866 年 11 月 12 日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目睹中国日益灾难深重，早在青年时代，即在 1885 年中法战争失败之后，他就立志要改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开始，他也曾想走通过上层统治阶级实行民主改良的道路。他于 1894 年上书李鸿章，希望利用清政府的大官僚的力量来实行改良，挽救中国，但是，这个尝试完全碰壁了。1894 年中日战争失败，孙中山看到了中国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意识到要依靠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无法把中国从垂危中挽救出来，决心抛弃了改良的道路，选择了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政府的方向。

于是他在 1895 年离开中国到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希望在海外华侨中找一个基地，来进行救国的工作。兴中会发表了一个宣言，斥责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宣言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邻，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在会员的誓词中，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国政府"的革命口号。

兴中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先生依靠一部分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又利用民间旧有的反对清朝政府的会党组织，采取武装起

义和军事政变的方式，来谋求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的封建统治。1895年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到1911年3月的再一次广州起义，中间经过16年，先后举行了武装斗争共10次之多，这10次起义都失败了。但到1911年10月10日，又爆发了武昌起义（又称辛亥革命），这一次终于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仅只是推翻了清封建皇朝，并没有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消灭。清皇朝推翻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加上革命队伍中软弱的资产阶级代表的妥协，使清皇朝的遗孽、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重新树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辛亥革命终于又失败了。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民主革命的活动。他曾经希望取得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利用某些地方军阀力量的支持，来组织南方政府反对北洋军阀，试图以此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和反动的封建军阀怎么能够容许民主革命得到真正胜利呢？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里，这些反动势力几次组织了阴谋叛变，使孙中山先生遭受失败。这样，孙中山先生想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法挽救中国危亡的一切尝试，都完全落空了。

1917年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坚持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在绝望的境地上，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看见了新的光明。他开始努力向俄国革命学习，并终于决心“以俄为师”，放弃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为各革命

阶级的联盟，走上了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人民的力量来进行民主革命的新道路。为了实现这些新政策，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他以前提出过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按照这个新解释，民族主义就是要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权主义就是要建立为平民所共有而不是少数资产阶级所得而私的民主制度，民生主义就是要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由于依靠了工人农民的力量和共产党的合作，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生气勃勃的发展，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在世时，革命在广东就显示了很大的威力，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出现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从广东出发的北伐的革命军队取得了势如破竹的胜利，很快就打垮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927 年，当北伐军进到南京上海的时候，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举行了反革命叛变，使中国大革命遭到了暂时的挫折，但是，中国广大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经过了一个艰苦的、曲折的斗争过程，特别是经过了长时期的农村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沉重的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使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完成并发展了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孙中山先生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功劳是不能磨灭的。研究和总结他的思想和经验在我们今天也是很有意义的。

孙中山先生一生，是在艰苦、曲折、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前一段时期中度过的。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为着求得中国人民的解放，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表现了百折不挠、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孙中山的伟大还在于，在和反动势力斗争中，不仅没有被多次的失败所压倒，而且还能够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努力学习新的革命方法，继续前进。这在一切民主革

命家中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活动的特点也反映了中国革命本身的特点。中国革命，由于它的特殊条件，经过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长期的、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共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获得了民主革命阶段的彻底胜利。这种客观过程，反映在人的认识上，反映在中国革命者对于革命规律知识的掌握上，也就表现为长期的摸索和试验的过程。为着这种摸索和试验，中国各民族人民曾付出了它的千百万优秀儿女的头颅和鲜血。毛泽东同志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毛泽东选集》1951年版，第3卷，第795页）这些话生动地概括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的情景。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开始，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找革命真理，经过千百重苦难，不断地在斗争中摸索，从太平天国采用西方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起，到"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止，中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漫长历程，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这一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页）这个千辛万苦的思想上的长期摸索过程，和艰苦卓绝的革命的发展过程是互相照应的。

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特点，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和曲折的特点，反映了这个进步的革命家在这个复杂、曲折的革命道路上艰苦摸索的特点。孙中山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彻底的

唯物主义世界观，他的思想有唯物主义方面，也有唯心主义方面，他的革命政治生涯中的一切积极的、宝贵的东西，都表现在他的唯物主义方面。

孙中山先生学过自然科学，原来是一位医生，他相信自然科学的成果，他特别推崇进化论。他说："自达尔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1页）孙中山先生有着许多自然科学家们所共有的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相信整个自然界是物质的，人类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

进化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中国的先进人士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把进化思想作为旧社会必须改革的主要论据。孙中山先生也是如此，进化论思想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部分，他把这个思想应用来观察社会，相信世界是不断进步的，中国是必须进步的。这种关于社会的进化思想，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发展观点，而不是辩证法的发展观点，甚至于不能成为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它还没有指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指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但这个思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来说，也启发了他们的一种要求进步的精神，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活动也曾是受到这样的启发的。

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主要地表现在他的"知难行易"的学说里。"知难行易"学说是孙中山先生对自己的前期革命活动所作出的哲学上的总结。

孙中山先生亲身经历了摸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而痛苦的过程，他意识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困难，这使他提出了"知难"的思想。正因为自觉到认识的困难，他也就能够不断地努力

向前进步，探求新的革命方法，抛弃旧的方法而不固步自封、停滞不动。从他一生的革命斗争来看，他在革命道路上通过了两次大的转变和发展：第一次转变和发展，就是从改良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即从企图依靠满清政府某些大官僚来实行民主改良，进到采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第二次转变和发展，就是从依靠少数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秘密会党及军队士官举行武装起义和政变，进到依靠最广大的工农群众进行武装的人民革命斗争，也即是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到新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在这些转变的过程中，曾经和旧资产阶级队伍中代表妥协、保守倾向的人们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辛亥以前，反对立宪派、保皇党，辛亥以后反对同袁世凯北洋军阀妥协，和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时又反对西山会议派）。就这样，孙中山先生在每一次革命失败之后，就毅然抛弃实践中已证明无效的旧的革命公式，进一步探求新的革命方法，这使他能够不断前进，逐步接近完全正确的革命道路。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哲学思想，就有着极其可贵的、进步的唯物论的因素，有着符合科学的、能够反映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的因素。这个因素使孙中山先生对于新事物、新知识始终保持不断追求向往的精神，而在革命斗争中始终保持着不向敌人妥协、不在失败面前灰心丧气的坚毅精神。这是在他以前和与他同时的许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远远不能比拟的高尚而伟大的品德。

孙中山先生说：“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渐即于老朽颓唐，灵明日锢，是以智之反面则为蠢，为愚。”（《军人精神教育》）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思想，这个思想说明人的“知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不是什么聪明人的头脑里生来就具备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思想，说明人

类的认识要跟着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能停止在任何一个旧的立脚点。这个思想在孙中山先生的世界观的基本的积极的方面，是他思想中的精华。正是由于有着这个可贵的思想，才使他能够由一个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走上和广大人民联合的道路，使他在中国革命和对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某些重要问题上，得出了同中国共产党基本一致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 1949 年说过：中国共产党“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论人民民主专政》）“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是孙中山先生对自己一生革命经验的最高的总结。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这个经验得到了大大的丰富和发展：说要“唤起民众”，这就是要在国内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经过武装斗争的道路，摧毁和打碎反动的国家政权，达到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说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就是要联合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

上面就是“知难行易”学说中的进步精神和积极因素。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个学说还带有某些消极的因素。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是十月革命前写的，他是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立场和观点，来总结自己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因此，这个学说基本上没有超出旧的资产阶级启蒙哲学的范围。它

具备着启蒙哲学的进步方面，那就是对于世界的一般的唯物论的理解，对于科学的客观的合理的知识的重视。但它同时也有启蒙哲学的弱点，那就是对于社会和革命的认识，不能贯彻唯物论的观点，而终归是唯心论的观点。

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不能从物质的经济基础上去看社会的变化，不能依据社会阶级的科学分析方法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因此，他对于自己的革命经验所摸索到的结论，既有着正确的肯定的东西，也包含某些错误的消极的方面。他对于辛亥革命的估计是：在破坏方面已经成功，只差建设方面还需要努力，却不知道，辛亥革命仅只推翻了满清皇朝的君主政体，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根本没有被动摇，既没有把封建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也没有剥夺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和经济企业。辛亥革命既然没有动摇旧的经济基础，因此对于旧社会的破坏，从根本上说也并没有成功。经济上的破坏既没有成功，那么，政治上的破坏也不会真正成功：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统治，实质上仍然是建立在旧经济基础上的、披着共和国外衣的变相的君主专制政权。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孙中山先生把它的原因单纯地归结到人的“心”的问题，单纯地归结为人们对于革命的道理“‘知’与‘不知’之故”。事实是，辛亥前后革命所以不成功的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坚强的革命阶级作为基本的动力，是由于革命所依靠的只是一些软弱、动摇的资产阶级分子，是由于他的革命营垒中混入了许多反动阶级的军人政客和这些家伙的破坏行为（这些反动分子之所以要破坏革命，并不是由于不知道革命，而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使他们一定要反对革命）。总之，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旧民主主义的道路不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工人农民群众）共同起来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

争，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法与纲领已经过时，已经无力，并不是由于人们“不知”这一套旧方法、旧纲领的缘故。

“知难”思想的消极一面，就是过分夸大“知”的困难，以至于认为广大群众与知识无缘，只有少数贵族、某些高级知识分子才能掌握正确的知识。孙中山先生把人们分为三类，第一是“先知先觉”的人，这是极少数的人，其次是“后知后觉”的人，这也是比较少数的人，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则被看做是第三类“不知不觉”的人。这个片面的观点，使孙中山先生在他40年的革命活动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始终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相脱离、相隔绝，误认为只有少数的政治上层人物才能作为革命的依靠。直到他的革命生涯的最后两三年，由于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才逐渐认识到“唤起民众”的必要。其实，把人民群众看做“不知不觉”者，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的广大人民，通过他们在旧中国所亲身遭受的苦难，完全能够知道革命的必要，知道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必要。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他们对这种必要性的认识，比许多上层人物还了解得更深刻，感受得更真切。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广大工农人民不仅仅能够一般地知道革命的必要，而且当他们一旦被发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时，他们也能学会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斗争方法，他们不但懂得劳动生产，而且也能学会武装斗争、管理政权，能够根据他们所熟悉的周围条件，创造各种新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必须常常向群众学习这些新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集中，再用之来指导群众的斗争，这样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事实是和孙中山先生的观点相反，人民群众才是先知先觉者，向群众集中他们的经验的领导者，

则是一定意义上的后知后觉者；而脱离人民群众、用主观主义的方法来指导工作的所谓领导人，恰恰是不折不扣的“不知不觉”者。

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不知道有这样的唯物辩证法：革命指导者应该既是群众的学生，又是他们的先生。领导者只有向人民学习，才能体会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才能吸取他们的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是给人民当学生；领导者将人民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思想、感情、要求总合起来，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化为集中的有系统的理论、纲领、方针、政策、办法，再拿了去向人民作宣传，并使之见于行动，这就是向人民当先生。只有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孙中山先生强调当先生的一面，不知道当学生的一面，所以陷入了历史唯心论的观点。

“知难行易”学说对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也是解决得不正确的。

所谓“知”“行”，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解释，“知”就是认识，“行”就是实践。认识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而这种反映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所以认识首先是实践的产物，其次是实践的指导，同时又须受实践的考验，并在实践中发展。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或“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是在实践或“行”中产生的，即在广大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形成的。人们在实践中，通过眼、鼻、耳、舌、身和客观事物接触，于是产生了感性认识或经验，感性认识只能反映事物的表面的、片面的现象，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人们的思考能力把感性认识作为基础，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使自己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样就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规律性，这就是

认识过程或“知”的过程的第一个飞跃，也即从实践到认识，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认识过程还有第二个飞跃，即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就是把在实践中取得的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

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里没有这种完备的知行统一观，没有明确肯定“行”是“知”的基础，特别是没有看到“行”即实践的主要内容，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而一切认识或“知”的根本的来源，乃是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变革世界的实践。哪怕是领袖人物、英雄豪杰、科学专家，他们的“知”，他们的对事物的认识、思想、观点，他们对于工作和斗争的意见、办法等等，都是直接、间接从这三项变革的实践中，归根结底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中发源的，他们的功绩，只在于把这些经验材料作了进一步的思想的加工，使它由比较分散、片面、缺乏条理性、综合性的、只能反映事物的局部现象的认识，集中成为有条理性、综合性的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真正革命的领导者，只有善于通过这样的道路，不断地把人民群众斗争中的经验加以集中和总结，才能保证经常把握正确的领导思想，才能把领导工作做得很好。“知难行易”学说看不到领导和群众的这种有机的联系，片面地把领导人物说成是“先知先觉”，把群众说成是“后知后觉”，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的观点。这是“知难行易”学说的消极方面，这个消极方面后来曾被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集团加以利用、歪曲和夸大，用来制造出他们的一套法西斯主义哲学，即所谓的“力

行哲学”。这个法西斯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硬要人民承认自己是完全愚昧无知的蠢材，他们决不应该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行动，而只应该诚心诚意地、也就是盲目地追随那些自封为“先知先觉”的法西斯统治者，如蒋介石之流的人物。这个法西斯主义的“力行哲学”，实际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相勾结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人民、反对革命和反对领导人民革命的共产党的愚民哲学。

我们指出了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的这些弱点。这丝毫也不是要贬低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做出过的辉煌贡献。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已做了在他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业绩。他的学说的这些弱点，只是反映了他的一生革命活动所受到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认识了这个限制，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新的革命时期学会超出这些限制，正视和研究这些弱点，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思想和工作中善于避免重复同样的弱点。所以，孙中山先生的学说的消极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可供我们学习的一部分历史财产。

还应该再强调的是，“知难行易”学说是在俄国革命以前形成的，它的弱点，主要表现为旧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弱点。因此，这些弱点，当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并且联系了革命行动的新方法之后，就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所克服了。例如在改组国民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检讨过去的失败经验，已不再认为主要是革命党人“不知”的缘故，而肯定是由于国民党内有反革命分子“能乘隙以入”“卒至破坏革命事业”的缘故。又如在他的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的政策，他的临终遗嘱里提出了“唤起民众”的主张，则是在实际上把他的脱离群众的关于“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唯心主义公式基本否定了。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和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一切进步和积极

的因素，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才能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而其消极的方面和唯心主义的弱点，也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和思想中才完全克服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中国来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指出辛亥革命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和帝国主义相结合的封建制度仍然存在，因此，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推翻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接受了这个纲领，使他的三民主义充实了新的内容。根据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一部分是大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他们已成为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反动势力，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要求，但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很软弱，不能成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强的力量，要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主要地必须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尤其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这一个思想的某些要点，在改组国民党后规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走上一个新的阶段，获得了真正坚强有力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结合过程，也就是跟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工农群众、广大人民的斗争经验的结合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和广大的人民在一起，发动人民积极斗争的精神，并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从群众中学取领导革命的知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者，决不以唯心论的“先知先觉”自居，坚决反对把人民群众看做“不知不觉”的愚氓，共产党人相信广大人民群众有着伟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肯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 1053 页)，才是一切真正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力量的主体。同时，共产党人又知道，人民由于长期处于反动统治下面，造成了文化落后，而人民的意见与力量又是分散的不集中的，所以，人民迫切需要有自己的政党，自己的领袖，自己的先锋队。这种政党、领袖、先锋队，不是高居于人民之上，而是处在人民之中，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向人民学习，又教育人民。这样的政党、领袖、先锋队，在中国的革命中就是中国共产党。

今天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伟大成就已充分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结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中国人民的命运的结果，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和思想中的积极的东西，已经在更高的阶段上和在千万倍光芒的情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道路上，领导中国人民克服了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重重困难，打倒了北洋军阀，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在这个政权领导下又完成了土地改革，打败了侵略朝鲜的美帝国主义，在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的基础上，又继续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并且于 1956 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个贫穷落后的、受人欺凌的旧中国，已经造成为一个前途灿烂的无限美好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事业，都是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到了今天，事实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发展了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才是惟一能够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不断引向胜利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 关于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布置*

(1964.5)

今天布置新的阶段的学习。按照原来的计划，明天开始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就算结束了。

## 一、关于学习的程序

这段的学习时间从5月20号到6月底,或者还多几天。为什么要多几天呢？本来这段学习计划是十六七号开始,因为《哲学笔记》这一课延长了两三天,所以这个学习也就推迟了两三天。如果6月底学完就算了,学不完就延长几天,尽可能6月底学完。

这个计划已经跟各支部商量过了，第一个星期（20号到26号），按照历史顺序学习毛主席有关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中心还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三篇文章。这阶段可以说是复习毛主席著作，着重研究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第二段，从5月27号到6月5号，这个星期着重研究《实践论》里面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当然不是

---

* 1964年5月，中央高级党校“59班”和“60班”哲学专业，进入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阶段。艾思奇按照党校的教学计划，于5月19日作了具体的布置，讲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针和方法，概要地讲了毛泽东同志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小标题是我们加的。

只学《实践论》，还要再研究一下毛主席著作里面有关认识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目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头的那一段。我们要着重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

第三段，从6月6号到23号，以《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学习主席关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6月23号到6月底，这个星期写学习心得。希望大家在第三段的时候开始酝酿，按照个人准备的专题，自己着重研究。一方面研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一方面多研究一下自己要研究的问题。6月23号以后，大家就可以写心得，写到6月底，如果写不完，可以延长几天。

关于辅导的安排，今天布置了以后，大家就去学习，学一个星期，根据大家在读书中有些什么问题作些辅导。第一段到5月27日就可以讲讲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的问题。6月6号到23号可以讲讲关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问题。辅导课主要是这两次，希望作为解答问题的形式来讲，这就要看大家提的问题多少，问题多也讲，少也讲，没有问题也讲，反正我们也要学习，没有问题我们也参加考试，讲讲心得。希望在这一段大家多读书，多想问题，多组织一些讨论，多讨论可能问题就多一些。哲学教研室的同志如果有时间可以多参加讨论，了解大家的情况。

关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杨老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所要讲的也就是以前讲过的，今年写了一个学习“双十条”的提纲，大家都看过了，现在了解的东西，基本上是提纲上的东西，当然也有些发展。提纲写得很简单，研究得也不够，如果大家不提什么问题，还让我讲，只能讲提纲上的那些东西，当然也可以多讲几

次。如果要问毛主席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在历史上有什么发展?我只能讲提纲那些。毛主席的发展可能不止这些，一方面因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有限，只能讲这些；另一方面，毛主席思想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不能给毛泽东思想加上一个框子，说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面讲的辩证法问题就超过了过去的。特别是1957、1958年大跃进以后，毛主席自己也讲，这些年辩证法大发展了。当时我们对他说的这些话也不很了解，现在比较了解一些了。什么叫辩证法大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发展，甚至于毛主席自己的辩证法也有发展，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我们不可能把毛泽东思想讲成固定不变的东西，好像就是那几点发展了。现在可以肯定毛泽东思想在哪些方面都有发展，我们讲课就是根据自己的了解提一些意见，供大家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辅导就是这样两段，两段不一定是讲两次，一段可以讲几次。另外可能还有一些知识方面的问题需要辅导，在学习过程中再定，如果大家提出什么要求，有必要的话，教研室其他同志还可以讲一讲。

大体上学习程序就是这样。有的同志提出这段学习时间是否可以长一些。这个要求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好短一些，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按照大家的要求是两个月或者两个半月，现在就缩短一些。好在大家学了好几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从上半年到现在，学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后三章。学了这些著作以后，可以对马、恩、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比过去知道得多一些，有一个更明确的了解。特别是列宁在辩证法方面有什么新的贡献，学习了《哲学

笔记》以后会比较清楚了。虽然时间短，但是可以把毛主席著作和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相比较，这样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就比较清楚比较容易一些。所以，虽然时间短一些，只要大家能抓紧时间是能有所得的。

## 二、关于学习的书目

现在讲一下要读的书。学习书目基本上是从《毛泽东选集》中选出来的，一共有 26 篇文章，有些全读，有些读一部分。

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全读。这是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

第二篇文章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不需要全读，只读“（一）国内的政治状况；（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这两节。

第三篇文章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只读“关于主观主义”这部分。这是毛主席第一次直接讲唯物主义的文章。前两篇毛主席要是讲阶级分析、矛盾问题，这篇主要是讲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

第四篇文章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很重要，可以全读。这篇著作的哲学意义很大，对矛盾作了详细的分析，还讲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现象和本质的问题。在那时能提出现象和本质、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很高的哲学水平是不能设想的。这说明当时毛主席的唯物主义观点非常坚定，非常明确。

第五篇文章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也是哲学意义很高的。有些具体战争问题可以不读，着重读第一、三、四章。

第一章是直接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也在这一章里作了明确地、有发展意义的论述，这样清楚地讲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少有的。里面讲到如何去掌握，惟一的就是通过实践，要在做的当中学习，在干的当中学习。这些都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很重要的思想。另外，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围剿反围剿的问题，阶级分析、矛盾的分析，这都是辩证法问题。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围剿反围剿的不断反复，不断的斗争，引起向对立面的不断转化，这些都在战争问题上展开了。这篇文章是很全面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各方面都涉及到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后要读的两篇文章，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时的著作，也是抗日战争开始的著作。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实践中认识经验的全部总结。哲学著作主要的总结是认识经验，不过认识经验还是以实践的经验为基础，实践的经验是自有共产党以来，一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中国革命所取得的经验总结，这个经验包括成功的、失败的、正确的、错误的，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得到《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毛主席的著作不只是毛主席自己写的，还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所产生的，形式上是用笔写的，实质上是用血写的。实践的经验就是政治经验、军事经验、经济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都跟全国人民的流血斗争相结合的。所以，得到这些著作不容易，是血的经验产生的。

这是第六、七两篇。

第八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篇是1937年5月抗日战争准备时期写的，主要读前几段，后面的政治问题

可以不读。在这篇文章里面第一次提出了主要矛盾问题，所以一定要读。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矛盾论》中把主要矛盾问题看得很重，我们在认识上要注意抓主要矛盾。这个思想毛主席在 1937 年以前已经有了，这是在 1937 年 5 月的中央会议上作为结论写出来的，虽然是政治文章，但是可以看做是辩证法的发展。

第九篇文章是《论持久战》，这篇著作只读几段就行了。“问题的提起”，“问题的根据”，这两段是分析矛盾问题的。“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这两段，值得特别研究一下，这里涉及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怎样变化的问题。这个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有，战略怎样由防御转为进攻，这跟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关系。

另外，还可以读“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这两段，这些都是有关哲学问题的。然后再读“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这些段非常重要，辩证法思想掌握得非常深刻非常具体。怎样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段里都有了。“能动性在战争中”和“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是学习唯物主义很重要的章节。认识论中的主观能动性怎样掌握?怎样发挥?“能动性在战争中”就是讲什么叫能动性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是讲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如何认识世界，如何改造世界，这个问题在这里讲得非常深。

关于《论持久战》就读这几节。

第十篇文章是《战争和战略问题》，这篇也可以看，也可以不看。因为这里讲的有些问题在《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面都有了。要看就看第一节“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

第十一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是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很重要的著作，可以说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有所发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在民主革命阶段怎样搞阶级斗争，怎样搞政权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第一次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亚、非、拉国家还在运用这个思想。这篇不一定全读，只着重读第三节“中国的历史特点”，第四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五节“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再加上第六节“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如果对文化问题有兴趣，也可以读一下有关文化方面的那几节。第十一节“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部分也可以参考。“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四个时期”这两节也可以读一下。为什么需要读一下呢？关于上层建筑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部分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中央最近提倡演现代戏，少奇同志提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问题，说到我们现在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我们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说，现在我们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现在的文化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不是新民主主义的。现在演的一些戏，所谓推陈出新，推出一些新民主主义的东西来，没有社会主义的，没有活人的东西。现在的活人是搞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最好的也就是民主主义的，有的甚至是封建的牛鬼蛇神的东西。因此上层建筑和基础不能适应，这样的上层建筑也不能为基础服务。多少演一点“梁山伯与祝英台”也还可以，如果变成我们舞台上的主要力量就不好了。古代人、死人占领了舞台，我们上层建筑的主要方面就是旧的，我们的基础是新的，但是旧的上层建筑占了主要地位，怎么

能不跟基础矛盾！为了让上层建筑为基础很好的服务，所以要让现代人在舞台上占主要地位，就是让活着的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在舞台上占主要地位。“芦荡火种”这个戏演得很成功，最好都看一下。这在京戏中是一件大事情，京戏很难演现代戏，过去改编的都失败了。这次赵燕侠演得很成功，也许还有缺点，我还没有看过。上层建筑能有这样的改变，这在京戏里面是一件大事。因为京戏过去完全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而且达到了最高的水平，所以它很难改。现在改了，现代人变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一个革命。

关于《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读这几节。

第十二篇文章是《论政策》，这篇也不要全读，只读前四页多就行了，以后关于各项具体政策可以不读。这篇文章是一分为二分析方法最集中体现的文章。如何运用矛盾的具体分析，矛盾的一分为二，敌我的一分为二，这里都讲了。我们这方面有顽固派，有革命的中间派。顽固派又可以一分为二，有抗日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顽固派、中间派、进步派，每一派又可以一分为二。敌人也可以一分为二。一分为二的方法用得最集中的就是这篇文章，所以特别值得学习。如何用辩证法、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解决政治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也讲到了。世界上任何国家最复杂的问题，也没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复杂，又是直接敌人，又是间接敌人，又是直接朋友，又是间接朋友。就是现在的亚、非、拉也没有这样复杂的情况。当时一个国家分为三个国家（汪精卫的国家、蒋介石统治的国家和解放区），现在最复杂的是分为两个国家，像老挝。三个国家也就是三种情况，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区，汪精卫是殖民地，蒋介石是半殖民地，解放区是完全独立的。当然现在亚、非、拉的国家也还有不同的问题，如南越打仗

可以打到海里去，我们那时就没有那么打。南越国家小，更困难一些，所以他的游击战有发展，只讲我们的情况也未免有点“大国沙文主义”，还要承认他们的发展。

第十三篇文章是《改造我们的学习》。

第十四篇文章是《整顿党的作风》。

第十五篇文章是《反对党八股》。

这三篇文章基本上可以说是哲学性质的著作，要全读。

第十六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研究上层建筑很需要的东西，这里谈到上层建筑怎样为基础服务。有时间可以看一下，时间少也可以不读，也可以摆在后面读。关于文艺上的阶级斗争，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人性论问题，这几段都可以读一下。我们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提出的一些问题，这里毛主席在原则上解决了。还有歌功颂德……这几段也可以读一下，对上层建筑究竟应该怎样看，是歌功颂德呢？还是暴露。这些都谈到了。“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这段也要读一下。动机和效果问题，这是认识论的重要问题。还有“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文艺工作者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也可以看一看。

第十七篇文章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全读。这篇文章又是工作方法，又是思想方法，基本上是哲学性质的文章。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结合在一起了，群众路线是我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同时也是我们的认识路线。这些基本思想在这里都有了，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很重大的发展。认识要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更具体了，直接跟我们的革命工作方法结合起来了，这是很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这也是以前马克思主义著作里面根本没有发挥过的问题。

第十八篇文章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全读。这是在新的时期，再一次的阶级分析，从这里学习辩证法，学习唯物主义。主要的是辩证法，阶级分析的方法。一般的同志往往到形势一改变就忘记了阶级分析的方法，特别是好形势来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模糊了。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有许多同志头脑昏了，在延安有些人把草席子烧掉了，认为很快就可以到大城市过舒服日子了。但是毛主席不是这样，还没有听到日本宣布投降，马上就想到“蒋委员长”要下山摘桃子，马上给那些胜利麻痹思想打了一下预防针。每一个顺利的时期，都会片面地看到好的方面，忘记了困难。实际上当时并不怎么顺利，就是因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胜利了，于是就忘记了困难。

第十九篇文章是《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全读。这是对国际上的阶级矛盾的看法，毛主席那时已经预见到东风压倒西风的问题，所以就提出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纸老虎的真面目还没有显出来，但是毛主席那时就看到这个东西。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毛主席作了结论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经过 10 年出现了这个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法西斯，为东风压倒西风造成一个条件。当时资本主义四分五裂，法西斯垮了，那时毛主席嘲笑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是算小账，蚀大本。美英法和德意日法西斯打仗得到一点便宜，就整个世界形势来说，这是小便宜，但是整个资本主义垮了，这是蚀了大本。美英法和德意日法西斯自己打自己，而人民胜利了。不过当时蚀的本还是比较小，只是垮了东欧那一块，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后来接着中国革命胜利了，朝鲜、越南，然后就是亚非拉革命不断地爆发，帝国主义要想压也压不下去。这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同，第一

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革命没有消灭，其他国家的革命压下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打垮了法西斯，没有把跟着起来的革命压下去，特别是中国革命一胜利，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再加上这几年，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基本上形成了。也可以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基本上出现了，更显著的时期是1956年、1957年以后，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时期，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个50年。第一个50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的时期，那时是资本主义自然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备时期。第二个50年是从1898年开始，到1948年结束，这是资本主义的衰亡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胜利的时期。但是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期，基本上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有两次大论战。1949年以后就是新的时期，是第三个50年，世界的基本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面临胜利的时代。再过40年，世界革命在很多国家取得胜利，不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是世界革命的胜利。所以，毛主席对斯特朗的谈话，可以说是为世界新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时期的形势，提出了一个初步正确的结论。这篇文章很值得读一读。

第二十篇文章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是1947年写的，当时宣布全国革命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人变成劣势，我们要进攻，是这样的形势。从中国来说，是中国的东风压倒西风。1947年以前，中国革命战争基本上是战略上的防御，战术上的进攻，1947年开始，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是进攻的，主要矛盾方面发生了变化。这篇文章只读第六节就行了。这一节主要是对当时中国的阶级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提出革命对象是什

么？当时有三大革命对象，特别对官僚资本做了新的规定，消灭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这个文件思想的发展。这里还讲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个思想在这里很清楚的提出来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节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对全国胜利以后我们国内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也基本上讲到了。胜利以后，革命开始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这个文件里已经开始有了萌芽。我们当时看不懂，对这个文件的重要性也不大清楚。这里已经把新中国的经济成分讲清楚了，全国胜利以后，我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大体上是这种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提得很清楚。

如果有时间还可以读一读第一、二两节，这是讲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优势转过来了。这对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非常深刻。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人民算是出了一口气，很深刻地描写了主要矛盾变化的情况。我们说的矛盾有两种，一种是具体的，比较小的，像丰福生运用在伙房里的；有的是大的，毛主席运用在全国革命中。所以我们研究哲学不要干巴巴的，要活的来看。

第二十一篇文章，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第二十二篇文章是《论人民民主专政》，这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理论有许多发展。

第二十三篇文章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说明什么叫历史唯心主义，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有阶级分析，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我们平常总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主义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唯心主义的。当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

结合我们的实践斗争，结合政治来看，太强调这点也不利。如果只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不能讲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没有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不只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根本问题有三个：一个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是阶级斗争、阶级分析问题；一个是人民群众问题，核心还是阶级斗争问题。所以这篇文章很重要，这篇文章批判历史唯心主义不着重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着重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

第二十四篇文章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读。

第二十五篇文章是《关于目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里有认识论问题，有阶级分析问题，有辩证法问题。这十条基本上全读，或者只读前半部分，后面有些具体政策可以不读。

第二十六篇文章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不一定全读，可以读前几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面有阶级的问题，反对他们的全民党全民国家。

大体上就是学这些文章。也还可以考虑读一下毛主席在1955年讲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在这里主席对农村阶级作了新的分析，这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所没有过的。把农民分为上中农、下中农，这是新的分析方法，也可以读一下。

这些文章如果全读，有五百多页，一个星期读不完，如果有选择地读，有三百多页，可以读完。因为全书都读过了，脑子里有了印象，所以读一部分也可以。

## 三、关于学习的方法

现在讲一讲学习方法 。我们现在安排的学习程序也和学习方

法有关系。为什么要从毛主席著作中挑选这些篇来读？也是从方法上考虑的。现在这个学习方法，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用历史的观点来了解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是说，不要把主席的哲学思想看做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不要看成是现成的公式。好像他一开始就把哲学发展成这几点，以后就按照这几点去解决问题，去做工作。事实上不是这样，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是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主席也是一样。列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个50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个50年（主要的是第三个50年），实际上在这以前也有发展，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就一步步在发展。我看有两次大发展，第一次是民主革命时期有一个大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发展的中心标志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出现。如果再加点什么东西，整风时的几篇著作也可以算，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哲学思想发展的标志。毛主席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性的著作，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产生这两篇著作的时间也很值得注意，1937年出现这两篇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大发展，而在国际上来说，恰恰是苏联的1936年以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发展了，而是停顿了。斯大林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坚持唯物主义，坚持辩证法的，他的代表性著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是这个著作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有点停顿，特别是辩证法停顿了。主要是辩证法削弱了，或者是辩证法有些地方不能坚持了，被否定了。这本书多数原则基本上是正确的，而

且解释通俗、鲜明，是一本初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很好的著作，应该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之内，苏联的哲学家没有人能写这样的著作。有些人攻击他把辩证法的标准说成四个特征，违背了列宁的三个规律的思想。这没有什么，只是一种写法的问题，列宁写十六要素还不是一种写法！要根据实际的需要，特别着重写几点是可以的。恩格斯根据当时的论战需要，特别强调黑格尔的东西，写了《反杜林论》。那时反辩证法的思想很厉害，反黑格尔，强调康德，这是哲学界的一种分歧。所以，当时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黑格尔。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讲：我宁肯做黑格尔的学生。当时要强调黑格尔的哲学的辩证性质，所以就强调黑格尔贡献了什么东西，黑格尔讲了三个规律，马克思把它改造了，这在当时是需要的。斯大林讲四个特征。也有他的重要性，不但不应该攻击，而且这样的提法在当时应该肯定，他是结合实践的需要，而强调实际意义的。所以，修正主义那样批评他是不对的。斯大林这个小册子的毛病就是辩证法削弱了。否定之否定没有谈，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唯物主义也讲得简单了一些，也是个缺点。如果讲他的错误主要有一点，就是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否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取消了矛盾的普遍性，取消了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运用矛盾规律。而恰恰矛盾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这是比较根本的问题，要批评他着重批评这点就够了。所以说辩证法是三个规律也好，四个特征也好，或者是十六要素也好，但核心是对立统一的规律。如果说辩证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一分为二的方法，其他两个规律不讲也可以。毛主席就是这样的看法，归根结底是对立统一的规律。《矛盾论》的意义就是把辩证法归结为矛盾的规律，用矛盾的规律来说明辩证法。以后苏联的辩证法基本上没有发展，哲学著作都是解释斯大林的著作，做

注释工作，文字上有些进步，内容实质上没有什么进步。

恰恰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把辩证法发展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当时只看到国内意义；现在看起来，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具有普遍意义。从1936年37年以后，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且发展了，是毛主席。斯大林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是出了毛病。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第一个大发展。

1957年产生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代表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次大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直接有国际意义，直接指导了世界革命。现在我们回忆一下历史，从世界上的哲学著作来看，还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有新的发展，但是没有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直接起作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直接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在这篇著作里面第一次提出修正主义是主要的危险，后来两次莫斯科会议上都规定了，这个意义很大。因为这是进入第三个50年论战，所以它的意义更大了。

因为毛主席的著作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死的公式，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他的哲学本身就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就结合好了，不是一下就完成了，而是一步一步地完成的。而且一个时期完成了，也不等于结束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完成了第一个时期的结合过程，但并不等于结束，完成了这个过程又发展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要重新结合，又要发展。普遍真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来的，特别是从

列宁那里来的。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最早的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但是更直接、更多的是接受了列宁的哲学思想。然后，毛主席又结合中国的实践，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一步一步地发展。所以，我们要研究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如果不按照历史顺序来学习，永远也学不好。

我们现在的安排，就是按照历史顺序，把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在脑子里找到一条线索，他在某个革命时期发展了哪一方面，强调哪一点，另一个时期又发展了哪一点，他不是在一个时期什么都发展，而是这方面、那方面逐步发展的，然后再作一个全面总结。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毛主席就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跟中国的实践结合，毛主席的每篇文章都反映了某个方面的结合，经过16年的实践，作了全面的总结，这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所以，我们读《实践论》、《矛盾论》时，要看做这样的著作，就是说这个著作是16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就是16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人的认识经验的总结。

我们党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呢？党的历史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这个结合是一个解决矛盾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是有矛盾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表现，因此需要解决这个矛盾。党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不解决这个矛盾就犯错误，就不能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过程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就有不同的情况，有的人解决得好，有的人解决得不好，解决得好就能使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解决得不好就会出现错误。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

程中，也有一分为二，也就是有矛盾解决得正确的方面，有解决得不正确的方面，于是就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的斗争。

党的历史就是一个认识过程，对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矛盾有的解决得好，有的解决得不好。犯错误的人主观上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管陈独秀也好，还是王明也好，他们都自以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明一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就不要马克思主义，比如张国焘。主观上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主观上想搞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主观上想搞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矛盾解决得不好，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又慢慢变成公开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历史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是必然的。因为整个过程是一分为二的过程。现代修正主义抓住这点大作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制造分裂的理论基础。分裂是客观事实，是一分为二的，不是我们要制造分裂的理论基础，因为客观上有分裂主义要和马克思主义分裂。所以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始终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正确的认识路线和错误的认识路线斗争的历史。正确的认识路线就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错误的认识路线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那就是唯心主义的路线、形而上学的路线、历史唯心主义的路线。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互相结合的，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就是这样的斗争，在认识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的斗争。错误的路线在形式上自以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际上已经反对辩证唯

物主义了。我们研究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要研究我们党史上的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是怎样发展的。因为时间不多，不能把反面材料拿来读，有正面材料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反对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时，就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从那时开始就有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唯心主义就是主观主义）。

我们读毛主席这些著作的时候，要注意摸这个线索：在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上毛主席的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是怎样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怎样导致错误，毛主席怎样纠正错误。这个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创造了一种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毛主席再加以总结，这样就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的文章。我们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一定要看到这两篇文章的写作的历史条件。毛主席是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同时在解决实践问题中独立的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哪些方面，在这个时期发展了这些方面，在那个时期发展了那些方面，最后总结成系统的东西。1937 年以前可以说是《实践论》、《矛盾论》的酝酿时期，经过 16 年到 1937 年成熟了。这两篇著作标志着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完成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一定要这样学习，才能了解《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什么阐明这样的问题，阐明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不结合实践，不结合历史，就不知道意义何在。

有些人批评《实践论》、《矛盾论》，批评得乱七八糟，因为他根本不结合实践。日本有一个人批评《实践论》没有讲辩证逻辑问题，他说：辩证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很重要的东西。这些批评是无的放矢，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内容。有人批评说，

把认识分为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不合理，因为人的思想不都是理性的，人的认识还有悟性认识。还有人说：康德的时候就把人的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这不是又退到康德那去了吗！这完全是书呆子，是乱扣帽子。

马克思、恩格斯都不强调把理性认识分为理性和悟性两部分，因为意义不大。理性认识本身也有发展过程，它的内部也有小的阶段，要分也可以，不分也可以。要作专门的详细的研究也可以分一分，也可以分为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第一步比较抽象，然后搞得更具体，也可以分为两个步骤。在毛主席著作里面不需要谈这个问题。所以不结合实践根本不能了解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意义，那些批评的人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他也不想承认中国的伟大革命运动。修正主义者怎么愿意承认，他就是要乱来，只要能抓住一点理由，不管什么都可以。所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要注意到这是党的历史上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总结，对毛主席的每篇著作都应该这样看，这个著作是经过长期认识斗争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我们这段学习就是这样布置，从历史上把线索弄清楚，然后再分开研究几个部分。第一个星期先按照历史顺序把文件读一下，读的时候可以着重想一下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学，毛主席当时在认识上解决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讲，不这样为什么会犯错误。先去研究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然后再研究现在的问题。现在我们也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不但政治上有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认识上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就是一般的错误也是离开了正确的认识。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去研究历史线索。

第一个星期按照历史过程通读一遍，第二个星期分别研究几

个方面的问题，如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实际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很难分，《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著作也很难分。所以第三个星期就把这两部著作结合起来学，也就是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学，实际上只有两个阶段，可以作为两个部分来学。

## 四、关于学习中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我们学习中要重点研究的是：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方面的问题。下面我先简单讲一下。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就是代表著作。《实践论》这篇著作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路线和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斗争的总结。这两条路线的内容怎样理解呢？也可以按照列宁的提法来理解。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一般地讲到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这个提法完全对，但是现在看起来提得还不够。列宁讲："我们现在完全不是谈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列宁全集》第14卷，第30页)列宁区别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的斗争。这对不对呢？完全对，用来概括所有整个党的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可以这样概括。但是这个提法用来专门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有点不够，因为讲的是两条路线，包含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是专门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它的重点是解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这个概括专门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还不够。因此还必须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来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讲道："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句话可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路线）斗争的特点。这两条路线是什么路线呢？一条是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认识和实践相结合。毛主席的认识路线就是这样的路线。与此相反的路线，就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我们党史上的两条认识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还是相分裂，是认识和实践相结合，还是相脱离，这样来概括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比较完全的，比列宁概括得更具体一些。因为列宁只一般地概括了唯物主义，实践问题没有提，所以他只有一个物质到感觉和思想，或者是思想和感觉到物质这样的对立。讲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不同了，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仅要从物质到感觉和思想，只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而没有强调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如果说《实践论》有什么发展，在这些地方就是发展。列宁没有特别阐述这个问题。恩格斯和列宁都讲了实践问题，但是在讲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上，没有概括实践问题。

关于《实践论》发展了什么东西，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讲，现在不多讲了。

另外，《实践论》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或者是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结合或者是相分裂，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新的特征，就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直接结合到工作里面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多半是在哲学上从理论斗争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当然也间接和实际工作有联系，但是列宁所反对的不是实际工作

中的唯心主义，而是学术上、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实践论》中所批判的唯心主义就不是学术上的，而是实际工作中的，如陈独秀、王明。这也是一种发展。

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些公式的提出，都是发展，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得更具体了。

关于《实践论》的内容就讲这些。以后又发展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进一步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新的提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马克思讲过理论可以变成物质力量。毛主席进一步发展成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而且对解决实际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完成，这种思想也有很突出的发展。

刚才讲的是主要的几点。这几点说明毛主席在哲学思想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发展和丰富是经过牺牲多少人，是经过血的教训总结得来的。

在第三个星期以后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时，方法也是照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到我们党在历史上对认识论的问题上也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这个斗争归纳起来就是一条，不是什么四个特征或者是三个规律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一分为二，还是不要一分为二。要不要暴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特别是要不要分析阶级矛盾）。特别是在胜利的关头，这个问题就尖锐起来，一得到胜利就冲昏了头脑。1927年出现了这个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出现了和平思想。1957年三大改造完成了，又冲昏了头脑，认为阶级斗争过时了。每一个转变，特别是得到胜利的时候，就会出现需要一分为二的问题。

王明、博古的三次“左”倾路线也反映了这个冲昏头脑的问题。毛主席辛辛苦苦领导红军取得了胜利，他们就要搞全国总罢工，就没有考虑到全国的形势要一分为二。当时有的地方革命形势才刚搞起来，有的地方革命还是低潮，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个矛盾。对阶级矛盾是承认的，但是对阶级矛盾没有作具体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一律是阶级敌人，不一分为二，这种倾向经常发生。党的整个历史贯穿着这种倾向，要跟这种倾向作斗争。《矛盾论》是这种斗争的第一次总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再一次的总结，现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一次总结。因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出版了几年，我们有些忘记了，虽然嘴上不讲阶级分析过时了，但实际上已经不讲阶级分析了。成绩与缺点要不要一分为二，今年中央又有一个指示，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要一分为二，中央就来了一个比学赶帮运动。我们党有了这些决议以后，是不是成绩与缺点的一分为二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一定就解决。比如学习大庆，有的同志对大庆的评功摆好就很感兴趣，对四严就不起劲。前几天报纸上有一个通讯，讲到有一个人丢了一个螺丝钉，感到严重得很，想一切办法去找，到处找也找不到，但是他决心找下去，非找到不可，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么一个小的螺丝钉都这样严格对待。但是我们有时把严格和粗暴看成一个东西，其实严格可以不粗暴，我们要反对粗暴，但是不要因为反对粗暴而把严格丢掉了。所以现在学习大庆的时候还有这个问题，这里也有一分为二的问题。由于脑子里受旧的成见的影响，就妨碍我们一分为二。有的人认为整风不好，因为整风有点粗暴，就把整风完全否定了，这里有点经验主义，把整风中的缺点、错误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夸大了，因此一碰到整风就紧张。其实，整风也可以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也

可以不粗暴。当然，没有经验的时候，粗暴是不可避免的，有了经验就可以避免，这时就不至于或者基本上不至于重复以往的经验，就可以不至于紧张。所以，解决一分为二的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学习辩证法这部分，着重研究党在历史上要不要一分为二的过程，研究历史的过程对毛主席思想的发展会了解的更深刻一些。

《矛盾论》是对辩证法的全面发展，但更主要的是方法上的发展。在原理上也发展了，如在内因、外因问题上具体化了。方法上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最突出的发展；所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包含在普遍性和特殊性里面。这些问题大家先研究一下，将来我们再作进一步的解释。

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发展更多了，毛主席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最突出的、最主要的核心的东西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发展比较多。其次就是国家问题、上层建筑问题，包括意识形态问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这些问题都特别值得研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方面发展得比较全面，当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发表以前，这方面那方面也有所发展，但这篇著作是总结了所有的发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也是阶级斗争。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可以普遍地研究，但是要从历史过程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根本就是历史的方法，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要采取这种方法。不这样学，就有陷入教条主义的危险。

# 世界观问题*

(1964.5)

## 第一次讲课

(1964.5.25)

这次的讲题叫做《世界观问题》。这个题目是我准备时设定的，我想大体上还不错。内容想讲四个题目：绪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绪论想稍微讲得简单一点，主要的目的是想比较简单地、明了地说明一下如何通过“三论”来讲毛主席的世界观，如何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正确的世

---

* 艾思奇于1964年5月25、26、27日，分三次为中央高级党校“秀才班”（“59班”、“60班”、“61班”）学员的讲课，这是讲课速记稿。这个稿子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世界观；第二部分，是讲《实践论》，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和其他同一内容的讲稿相比，有自己的特点，有新的见解，讲得也较多；第三部分，讲《矛盾论》，主要讲了关于一分为二的理解和运用问题，是过去没有讲过的；第四部分，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是按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其中许多观点和当前党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不一致，所以，我们整理时删去了这一部分。速记稿只分三次讲课，标题是整理时所加。

界观。主要的方向是这样。

## 一、绪论——学习毛主席的世界观

有的同志问，什么叫做毛主席的世界观？要我讲一讲，现在就把这个问题作为绪论的第一条。就是：什么叫做毛主席的世界观。

这个问题的答复很简单，毛主席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不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外，还另外有一个什么毛主席的世界观。

这个问题一定要弄得十分清楚。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观点、方法就是世界观。

世界观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你从哪一个阶级立场上来观察世界、来看世界、来看一切问题。毛主席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其次，是你怎样理解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情况，用什么观点去看世界上的一切情况。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主要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世界。

方法也是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辩证法。用什么方法去看世界。

《矛盾论》中讲了两种宇宙观，就是两种世界观。宇宙观、世界观是一个名词。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都是一个意思，不需要三个名词。世界观就是人生观。因为，所谓人生观，就是你这个人活在世界上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是摆在无产阶级的地位上，还是摆在资产阶级的地位上？是把自己摆在革命的地位上，还是

摆在反动派的地位上？这就是人生观的问题。也是世界观的问题，就是立场问题。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际上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毛主席的世界观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什么世界观。毛主席的世界观，一点也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讲到一句话："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这句话也是说的毛主席自己。毛主席就是"五四"运动以后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人民的命运的这种先进人物当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人物。他所应用的世界观不是别的什么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同的就是毛主席应用的更好。在所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先进的革命领袖人物当中，毛主席把这个世界观应用的最好，把这种世界观和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实践联系得最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毛主席讲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也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来观察和解决中国人民的革命问题。

毛主席所以把这个世界观应用得好，没有什么别的特点，就是他和教条主义者不同，不是把这个世界观当做一个死的、现成的公式，来随便套中国的问题，而是把这个世界观当做方法，来分析中国的情况，分析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并且从这种分析当

中，又得到许多认识的经验。

如何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人民的命运？这件事情也要经验，在实践中去认识世界的事情。认识世界本身就需要许多经验。认识经验就是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经验，改造自己思想的经验。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毛主席就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命运的，他观察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取得了很多认识经验。毛主席又把这些认识经验重新综合起来，把这个世界观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如果说毛主席的世界观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话，也就是他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一步发展了，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了。

为什么能够发展？就是因为他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讲过的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原则，当做死的公式简单地照抄、照背，而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作为方法。着重抓住最根本的原则当做方法来观察中国问题。观察的结果是取得了很多新的认识经验。根据这些新的认识经验，把世界观进一步发展了，给世界观提供了更多的，更具体的内容。

所以，我们讲毛主席世界观的时候，一方面要注意到这个世界观一点也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以外任何特殊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这个世界观，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有了发展。

为什么能够得到发展?就是因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在中国革命运动当中我们的认识经验。但是，这不止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牵涉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仅是现在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不开，就是早期的阶段，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问题也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是分不开的。所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中国革命的认识经验，也就附带联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一般地讲，也可以这样说：在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的著作更多地、更主要地涉及中国的经验。而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就更多地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现在，中国革命的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是直接联系着的。

最后简单地讲，毛主席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进一步发展。用这句话就可以概括了。换句话说，毛主席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又把这个世界观进一步发展了。

所以，研究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一方面要研究毛主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理；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毛主席所发挥了的新的东西，进一步发展了的东西。要注意这两个方面。注意这两个方面，又必然要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认识经验联系起来。

现在，根据第一条来讲第二条。就是说一下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哲学思想是怎么样来的？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其他所有的著作一样，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用另外的话来讲，也可以这样说，毛主席的著作都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的产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就产生了毛主席的著作。

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直接或间接地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

联系，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在某一些方面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某些总结。在中国革命的前半期，毛主席著作主要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总结。如果我们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时期毛主席的著作，都不能得到完全的了解。

我们看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也是这样。不仅不能离开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也不能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还有一个和其他著作不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不但是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是革命运动的认识经验的总结。

我们如何去认识革命运动，如何去总结革命运动的经验？对毛主席的“三论”以及其他的哲学著作可以这样看：它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大家提出这样的要求：希望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来串一串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串一串《毛泽东选集》的其他问题，串一串中国革命的经验。这样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不注意去概括整个的中国革命的经验，不注意联系到整个毛主席的其他著作，那么就没有办法学得好，没有办法理解。

我这次来讲的目的也是想努力按照大家这个要求来做一下，但是很难，恐怕做不好。

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心来概括党史，在某些方面来概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然后再联系现在，联系我们自己，联系我们自己的思想，联系我们自己的认识方法、思想方法，跟我们自己的思想做一下比较。这是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正确方法。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要用这样的基本方法才能学得好。

因此，我们现在研究毛主席著作，现在我讲毛主席的著作，也应该按照党史的顺序来进行。因此，讲这个题目也应该是基本上

分两段，一段是《实践论》、《矛盾论》，一段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我们的实践经验、认识经验第一次完整的总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的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认识经验加以总结的结果。所以，“三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我讲的计划也是分两段。先是《实践论》、《矛盾论》，然后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是绪论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条：《实践论》、《矛盾论》在我们党史上的地位。这两篇著作和1937年前后的其他著作一样，是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16年（从党的成立到1937年）的实际斗争的历史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总结。遵义会议是党领导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全部政治总结是1945年七大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里，军事、政治、组织、经济的总结都有了。《实践论》、《矛盾论》是一个哲学上的总结。着重总结了认识的经验。

这里讲一讲什么叫认识经验？

我们党在1937年以前的16年当中，始终是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有右的、有“左”的。以陈独秀、王明、博古还有其他人（如张国焘，罗章龙）为代表。所有这些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我们党领导革命中间的、党内最主要的斗争。

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有

密切的联系。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世界观方面就表现为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党从成立以来，不只是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认识上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密切联系。

所谓认识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哪两条路线呢？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另外一方面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

毛主席的认识路线始终是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始终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一开始，毛主席就坚持这个路线。就《毛泽东选集》来说，第一篇文章就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什么呢?这在后面要详细讲，这里简单地讲一讲，就是一要认识客观现实；二要分析矛盾。毛主席在第一篇文章，第一段一开头就讲到要认清敌友，不能混淆敌我。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坚持唯物主义，反对那种混淆敌友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首先要认清敌友，这是唯物主义。其次是如何认清敌友，这就要进行阶级分析，分析阶级矛盾。毛主席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一开始就掌握了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另一方面，毛主席一开始就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路线斗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要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反对敌友不分的唯心主义，也就是主观主义；反对那种不能正确分析矛盾的形而上学。那时候，形而上学主要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就是不分析矛盾，特别是不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所以，我们的党史，在政治上是始终贯串着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认识上也始终贯串着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我们党成立起就是这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我们的实践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错误的认识路线就产生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在实践中使我们的革命斗争遭到挫折，遭到失败。毛主席的正确认识路线产生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认识路线和政治路线指导我们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和革命的胜利、失败是密切联系的。所以认识经验是什么经验呢？就是认识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政治上的经验也是这样。

我们说我们有政治经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经历过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对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熟悉，能够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不是只有正确路线经验，而是正面、反面的政治经验都有，这才叫真正有了政治经验。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对修正主义的经验，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然后才能够说我们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经验。认识经验也是这样。有正面经验，又有反面的经验。正面和反面互相斗争的经验都有了，才能叫做真正有经验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后到 1937 年，经过了 16 年，我们许多主要的干部大体上取得了两条路线的政治经验，又取得了一些认识的经验。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的领导确立了。为什么能够确立？因为这时我们的干部能够分辨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了。为什么 1927 年毛主席的领导就确立不起来呢？因为许多干部还没有经验。不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陈独秀是错误的。很多人跟着陈独秀跑。三次“左”倾路线的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很多干部没有取得正面、反面的经验。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许多干部对于正确路线产生了什么结果，错误路线产生什么结果，有了实践的经验证明，有了革命胜利和失败的亲身体验。有了经验，相信毛主席的正确，所以毛主席的领导就确立起来了。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十几年的认识经验的总结，是认识上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路线的相互斗争的经验的总结。16年的经验证明，毛主席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陈独秀、王明、博古所采取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是错误的。十几年来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实践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路线的正确。同时，经过16年新的实践，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进一步充实、发展了。

学习毛主席这两篇著作，我们要把它看成概括了16年两条政治路线和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

关于绪论，最后再讲一点，就是毛主席这两篇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

在1937年时，我们中国党主要是忙于中国革命，恐怕是只能管中国革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我们也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那里的工作。但是，那时候我们的地位还不像今天。在今天，可以说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毛主席的思想是起着基本上的指导作用的。其他国家当然也还有它自己的经验，有它自己的新东西，不能说完全是我们的东西，但是基本上是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今天的地位。

1937年我们就没有这种地位。但是，我们的斗争、我们的思想上、政治上、哲学上都和国际共产主义有联系。我们的革命一开始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十月革命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从开始领导革命一直和国际共产主义有联系。所以，毛主席当时的著作，主要是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但是，也同时在某些方面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共产国际当时经常干涉我们中国的事情，有时指导得好一点，有时提出正确

的意见，有时不正确，有时搞出错误。我们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联系，陈独秀就是和托洛茨基有联系。所以，我们反对陈独秀的斗争和苏联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哲学上的问题也是这样。《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著作，不是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哲学思想孤立出现的，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认识路线上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一些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同样有世界观方面、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最初是反对黑格尔。后来，列宁就批判主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批判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那些人就是孟什维克，就是修正主义。列宁在政治上反对修正主义，在认识上、哲学上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

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开展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这时主要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有认识上的问题，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认识路线就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不过，这两个斗争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不是以哲学上的斗争为主。

在苏联，反对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后，接着又在哲学上专门进行了一次批判德波林派的斗争。反布哈林是从1920年开始的，以后就反对托洛茨基。1928年左右，反完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接着到1929年底，1930年就开展了反对德波林哲学学派的斗争。

德波林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普列汉诺夫开始对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有过贡献，但是后来变成修正主义者。德波林是他的学生，也是修正主义者。他在俄国革命以后，一直到1924年才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他开始是专门研究哲学的，在反对布哈林的时

候，他从哲学方面批判了布哈林的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因此，他的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有些人曾经认为德波林是苏联的哲学代表，1928、1929年世界上也还有这种看法。以后，发现他的哲学观点并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1929年底到1930年，红色教授学院的一些人经过研究，发现他的哲学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

德波林的特点，首先是专门捧普列汉诺夫，贬低列宁。他专门捧普列汉诺夫写的许多哲学著作，把普列汉诺夫的成绩表扬得很厉害。但是，对列宁的哲学著作却采取贬低的态度，甚至有时说列宁是普列汉诺夫哲学上的学生。又说列宁是搞政治的，在哲学上好像没有多大贡献。就是这样一种论调。所以，他在精神上、立场上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党性，他是没有的。

其次，他的哲学是理论脱离实际。那时，他写了许多哲学书，特别是关于辩证法的文章，但是，这些辩证法的文章都是讲空的理论。德波林不联系革命，特别是不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只讲历史的书本的，只讲抽象的概念和原则，不联系具体实践，理论和实际完全脱离。所以，虽然他在字面上也是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名词，但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理论脱离实际就是唯心主义。

所以，当时斯大林给德波林学派加上一个帽子，叫做孟什维克派的唯心主义。因为他贬低了列宁，又理论脱离实际，从这两点肯定了他的本质是孟什维克派的唯心主义。这帽子是戴得正确的，不是勉强戴上的，是他自己本来的帽子。

所以，苏联1930年的批判是对的。现在苏联想要替他翻案。前年替他作了80岁的生日，替他出书，实际上是想替他翻案。他在许多书里骂过马克思和列宁。苏联让他给他以前的著作写序言，

于是，他把他骂过列宁的东西偷偷删掉。德波林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里称赞二十大，说有了二十大我才翻身了。现在看来，当时的批判是对的，德波林是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

说他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不是说他一点不讲辩证法，他也讲辩证法。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他是取消辩证法的。口头上讲辩证法，实际上在关键问题上丢掉辩证法。主要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认为事物的发展在开始的时候和在最后的时候，在这两个极端是没有矛盾的。矛盾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间才开展起来的，不是自始至终存在的矛盾，而是开始和最后没有矛盾。因为这样看问题，所以他在关键问题上取消辩证法。另外一个是矛盾可以采取和解的办法来解决。可以采取调和的办法来解决，德波林曾经作过自我批评，承认自己认为矛盾可以调和的观点是不对的。

这些地方都说明他是继承了修正主义的传统，他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全部修掉，而是在要害的地方修掉一些。把最关键最关紧要的革命问题取消。修正主义的手法就是这样。一般的不是紧要的问题，他也可以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论，但是，在紧要问题上就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1930 年苏联开展的反对德波林的斗争，得到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也不是很满意的。因为后来写的一些著作比较粗糙。那时候，主要的人是尤金，尤金曾任驻我国大使，他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他根据批判的结果所写的教科书不是很满意的，教科书很粗糙。但是，有两点主要的成绩。第一，强调哲学上的列宁阶段，把列宁从前所有的哲学著作里一些宝贵的哲学思想统统地发

掘出来了。大量出版列宁的这些著作，列宁的哲学遗产在那个时候被充分地接受下来。第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哲学要为总路线服务，理论研究要为政治的总路线服务。要联系社会主义建设，要联系集体化、工业化的问题，反对抽象地讲辩证唯物主义。这两点是当时斗争的最主要的成绩。就这两点来说，成绩是不小的。

我们讲这许多，主要想说明一点，毛主席写《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候，他是充分地研究了当时苏联反对德波林的成果。反对德波林以后的著作陆续翻译到中国，到1936年差不多中国都翻译齐了。从1937年开始，毛主席花了很多功夫做了系统的研究，研究了国际上、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我们读《实践论》和《矛盾论》著作时，可以注意一下内容，里面对列宁的著作引用的比较多，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引用的更多一些。《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直接地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又加以发展的。这跟苏联第二次大论战有联系。

《实践论》和《矛盾论》里所讲的内容，不是中国一国孤立的现象，而是对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二次大论战的一个发展，是第二次大论战哲学成果在中国的发展，也就像在政治路线上反托洛茨基、反布哈林的斗争的结果一样，在政治上在中国也得到发展。

我想，我们在研究《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前，先要了解一下这些背景。

绪论大概就是讲这一些。

## 二、《实践论》——学习毛主席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现在开始讲一点《实践论》。《实践论》要讲八条意见。

## 第一条，《实践论》的基本内容

我简要地讲一下。

《实践论》是这样的内容：它阐明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或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所谓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也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路线。这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包括两方面的，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这两个方面，《实践论》都有批判，不过《实践论》里没有直接使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个名词。后来到整风运动的时候才使用这个名词，当时是批判了这两种主观主义的。

为什么《实践论》的内容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而题目却叫《实践论》呢？主要是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是把实践当做认识的基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所以，把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识规律都概括为《实践论》，这也是一种创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特点，加以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前马克思、恩格斯都谈到实践在认识论内的重要性，但是像这样突出地、系统地说明实践是认识来源的作用，这在以前的著作里还没有。

毛主席的《实践论》，还有一个自己的特点，和以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实践论》这篇哲学著作，是直接总结了实际工作里认识路线的斗争经验，把哲学问题直接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了。以前马克思的哲学著作，恩格斯、列宁的许多哲学著作，像《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些著作，直接处理的问题是理论斗争的问题，不是直接处理实际工作中的哲学问题。那些著作是总结理论界的斗争成果。当然，通过理论斗争也间接地可以起推动实际工作的作用，并不是

脱离实际的，还是有实际意义的。恩格斯当时反对杜林，是因为杜林在当时工人运动里有影响。所以在理论上把他驳倒，使他的机会主义起不了作用。列宁批判经验批判主义，也是由于许多主观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走了错路。因此，必须把他们的理论粉碎。中国有一点特别。中国的陈独秀、王明、博古没有很多直接的哲学文章或没有写过什么专门的哲学文章。他们错误的世界观主要是在实际工作里起作用，主要是在实际斗争、政治斗争里来起它的破坏作用。因此，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就直接地去总结实际工作中世界观的斗争。所以，在这一点上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

把哲学直接的联系到工作上去，把哲学直接用到实际工作里去，一直到现在，毛主席仍然很着重活的哲学。活的哲学也就是跟实际直接联系的哲学思想。现在我们许多工人、农民、战士学习毛泽东著作学得很好。廖初江、丰福生就是掌握了活的哲学，把哲学和实际工作直接联系起来了。这是毛主席创造的一个新的传统，就是一般地不经过理论斗争的环节就直接在实际工作里处理哲学问题。

这一种方法在苏联曾经是被反对过的。有一个时期，在苏联有一些搞哲学的人也曾经把哲学原则直接用到工作里去。另外有一些人反对说：这是把哲学庸俗化了。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也有这种成见。对于毛主席的这种方法——把哲学思想直接用到改造工作、改造思想这一方面来，苏联的哲学专家是反对的。有一个苏联专家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为什么大家要讲用哲学解决思想问题呢？专家说："我在中国听到这种话，我就不同意。用哲学解决思想问题，就是等于用大炮打麻雀，这是不必要的。"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相信这句话。前几年苏联专家还在中国的时候，有

人就相信这些话。所以，有一股教条主义的抵抗毛主席思想的潮流。现在也有，不是公开的，但也仍是一个潮流，它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消失的。

用哲学的世界观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突出的贡献。这样做，在实践上证明，是产生了很大的力量，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物质力量。现在更是一个证明，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学得好的，他的思想经过改造以后，他就会发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丰福生讲得好，他的报告是非常系统、非常好的。他是贫农出身，作为贫农，毛主席的著作他很能接受。但是，他的报告还告诉我们一点，接受毛主席著作，不是就等于真正的掌握了毛主席的著作了。你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觉得很高兴，但是，是不是就学到手了呢？不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到手，就是要改造思想。他是贫农出身又是工人，他在学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还要改造思想。他讲掌握毛主席的著作有三个方面：一是改造思想；二是指导工作；三是分析形势。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三个方面。第一是改造思想。他是贫农出身，后来又作了工人，还要改造思想。你如果不是贫农出身，不是工人出身的人，就认为用不着改造思想，那么，读了，懂了就算是学到手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恐怕不可以这么说。读毛主席的著作，第一要读懂，如果不改造思想就是还没有完全懂。因为懂得了，还要掌握，使之变成实际，要变成实际就一定要改造思想。

所以，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特点，就是用哲学思想直接联系实际工作。当然，这个联系如果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联系，也是不对的。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原理当做方法来分析工作中的问题，不是套现成的公式。你要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必须经常地警惕自己

脑子里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残余。因为我们经常要受到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抵抗。我们读这两本书是容易的，但是要变成实际就要经常受到旧思想的抵抗。这是《矛盾论》和《实践论》突出的特点。它里面没有和哪一个学者进行斗争，没有和哪一个专门的哲学家进行斗争，它只是和工作上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的特点。这一个特点是一个发展，但是并没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本身的一个发展。

## 第二条，哲学史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

这里不是讲党史上的、而是讲一般哲学史上的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

哲学史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跟我们党史上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基本上一致。我们党史上认识路线的斗争是实际工作上的，哲学史上的认识路线的斗争是理论上的。

为了了解《实践论》,需要了解一下哲学史上认识的根本对立。因为《实践论》是整个哲学史的继承，是哲学史上正确路线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论》里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继承了整个人类历史上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又进一步地发展了。

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对立，是什么对立呢？这个对立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

先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反映论的认识路线。任何一派唯物主义在这点上都是共同的，都是反映论。承认人的认识是从客观

的物质世界来的，人的认识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反映。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反映论的认识路线。简单地讲，一切唯物主义的核心也就是反映论。如果有人问：什么是唯物主义里最主要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回答：唯物主义里最主要的东西，它的核心就是反映论，就是承认认识是从客观世界来的，认识是人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相反，是否认反映论的，就是不承认人的认识是从客观物质世界来的，不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从人的意识本身来的，从人的意识、意志、精神本身来的。这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不是有这样两句话吗？毛主席说：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人脑子生就的？毛主席这两句话，就是指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唯心主义对人的认识的来源只有这两个回答。或者回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回答是人的脑子里生来就有的。

这两种答案都是唯心主义的。不过有一点区别，有一点什么区别呢？

一种就是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唯心主义叫做客观唯心主义。

所谓客观唯心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力量，或者叫做“世界精神”，或者叫“世界理性”，甚至于叫“上帝”、“神”。就是说，世界上客观存在着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这些精神力量是能够支配世界、创造世界的。因为世界是它创造的，所以它的名字可以叫做“世界精神”，也可以叫做“世界理性”或者就索性按照宗教的语言叫做“神”。之所以叫它

为客观唯心主义，就是它承认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是客观存在的，有一个创造世界、支配世界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在客观世界之外存在着，在个人主观以外存在着，这叫客观唯心主义。

这种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人的认识就是从这个伟大的精神里来的，是从"世界理性"或"上帝"那儿来的。那么，怎样得到完全的正确的认识呢？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要得到正确的认识，需要"世界理性"给我们以启发，或者受到"上帝"的启示。这种思想实际上等于宗教的思想。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同志们是不是有人接触过基督教？基督教的信徒有这个习惯，一碰到困难的问题解决不了，于是就祷告上帝：求上帝赐我以智慧，使我能够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他认为一切智慧、一切正确的认识都是"上帝"给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客观唯心主义就是这样。

另外一种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毛主席讲的认为认识是人的脑子里生就的思想，认为每个人自己就能认识一切，或者可能认识一切，生就有这种聪明。所以，要紧的是怎么样启发人自己把自己的正确认识发挥出来。主观唯心主义不承认有物质世界，也不承认有一个客观的精神世界。就是认为世界都在我的主观里边，都在人的主观里边。人活在世界上就像做梦一样，看到的各种东西都是自己主观的感觉。

如果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彻底地推论下去，那么世界上一切都没有了，只有我自己。我在这里讲课不是对谁讲课，而是对我自己的感觉讲课。我的感觉里出现了一个课堂，有许多人，因此我讲课的时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感觉讲话，因此一切认识都是在自己的脑子里。

这两种唯心主义理论是一种哲学理论，但是它在实际生活里

也是有的。比如在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中，有一种人并不是在理论上讲是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但他是按照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原则行动的。

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批评的那种人，他们就是按照想当然来指导工作，自己的脑子想当然如此，于是就如此来做。这种人的认识路线，就是认为认识是自己脑子里生就的，世界可以由我自己的主观来任意支配的。这种人他也不一定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可是他看问题就是凭想当然。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有些人认为人的思想是头脑里生就的。毛主席的话不是偶然写的，都很有分量，都是大量经验的总结。他提出这问题就是批评一种人，这种人不但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钦差大臣里面有，现在还是有的。这种人就是按照想当然办事情，把正确认识看做是自己脑子里生就的。我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另外，认为人的认识是天上掉下来的这种人也是有的，教条主义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一派。他有一个上帝，从前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种人，比如，宋江搞农民起义时，出现了一个天书，挖出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天书，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思想，指示宋江应该作皇帝。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思想。这种天书也就是上帝给的思想。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做天书来看，是天上掉下来的，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翻一翻书来解决。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看成是上帝。这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实际上是一种侮辱。不要实践，不要调查研究，只要靠两本天书，一切智慧都有了，一切正确的认识都解决了。这种教条主义现在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前几年苏联专家对我们不也很有影响吗？不也是天

上掉下来的吗？所以说，实际工作里边也有这两种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决地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历史上唯物主义的路线，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坚决地继承发展人类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这样的，都是坚持了反映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明显地讲反映论。马克思、恩格斯讲了反映论，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讲了反映论，越来越坚持。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和唯心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发展时期，在认识路线上都受到唯心主义的抵抗，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是对唯心主义的这些抵抗进行坚决的斗争。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批评了当时的唯心主义。

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在哲学上都用唯心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这样。从有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有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在列宁时期的修正主义者是考茨基、伯恩施坦；他们都是搞唯心主义，俄国的经验批判论也是搞唯心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对唯物主义有动摇，他前一段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有动摇。斯大林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基本上是坚持唯物主义的，他临死的前一年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是坚持反对唯心主义的。他一开始就反对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是哪派呢？有点类似是人的脑子里生就的这一派，认为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可以任意改变规律，消灭规律，创造规律。认为人可以任意改变规律，创造规律，任意消灭规律，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斯大林最后还是基本上坚持唯物主义的，但不能够彻底，主要是后期没有彻底坚持辩证法。他领导批判了德波林，但是后来他自己有些思想也是德波林式的。比如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王明、博古这些人的思想就是从他那里来的。轻视中国革命实践，理论脱离

实际，那就是德波林的思想。《矛盾论》批评的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也是和德波林学派有关系，因为，实际上德波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联系。

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世界观继承了、坚持了人类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路线，也继承了、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坚持的唯物主义的路线，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继承了、坚持了、发展了人类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反映论的路线，毫不妥协地反对认识上的唯心主义路线。

毛主席的特点是把这个问题直接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在实际工作中自始至终地进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毛主席都对当时遇到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下边举几个例子。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一开头就讲到要认清敌友。认清敌友和混淆敌友，这就是在认识上的两条路线，认清敌友就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你要正确地反映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就不能离开这个客观实际任意去设想。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形。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没有直接讲哲学，但是也有认清敌我的问题。谁是革命的先锋？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整个文章贯彻了唯物主义的精神，贯彻了分清敌友，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精神。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著作就直接用哲学的语言提出了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反对唯心主义路线的问题。最明显的如《井冈山的斗争》中的反对想当然，这还不是直接讲哲学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有专门一节讲反对主观主义，这是

直接讲到了哲学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边关于坚持唯物主义方面，主要是讲到关于认识现象和认识本质的问题。不要只认识表面的现象，而要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只是我们认识的敲门砖，只是我们敲门的一个工具。现象本身并不等于门里面的东西，要认识本质。当时革命力量很小，革命很困难，但是，不要只看到这个现象，要进一步反映本质。这里就有现象和本质的问题。唯物主义要求反映本质，不能只看现象，因为现象往往是表面的，纯感觉的。只看现象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把感觉看做一切，把表面感觉误认为是客观事实。认为正确的认识就是自己的感觉，正确认识就是在自己感觉里边生就了的。我们要批判这种只看现象的唯心主义。

毛主席在1937年前后，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也是直接的哲学的语言，这是明确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没有对客观事物进行调查，就不能发表主观的意见，你的发言权只能是反映客观事实。谁给你发言的权利？只有经过调查才能有这个权利。没有经过调查就没有这种权利。唯心主义就不是这样看，他认为没有调查研究也可以有权利，唯物主义则不允许有这种权利，唯物主义的权利只能是从调查研究来的。

我们再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1936年写的，在这里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又进一步发展了，哲学语言写的更深刻了。这里讲到要认识战争的规律。这一个著作的哲学部分很多，里边明确讲到人的主观要符合于客观情况。在“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那一段里边，讲到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战争规律的问题？就是因为主观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但要认识一般规律而且还要认识具体的规律，特殊的规律。这就使唯物主义进一步深化了、发展了。

从历史顺序上来看，毛主席自己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也是发展的。就是根据当时的斗争的发展，一个一个地具体化、深刻化、发展了。《实践论》就是在 1937 年写的，它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起一直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十几年以来，毛主席自己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的一个成果，一个最系统的综合的成果，也是以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实践论》里边有许多思想，是在以前的十几年中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突出了，一个时期另一个方面又突出了，情况不同，突出的方面不同。碰到一个钦差大臣是搞想当然的唯心主义的，他就批判想当然；《井冈山的斗争》是碰到有些人只看到现象不看到本质，就提出认识本质的问题；遵义会议以后，他总结了战争问题，提出了规律问题。总的来说是反映论。要着重反映什么东西？这就要看情况，看一定的斗争情况。唯物主义就这样在十几年中间一步一步、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逐渐积累起来，最后才有了《实践论》。在《实践论》中，有现象和本质的问题，规律的问题，批判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问题，调查研究的问题等等，都综合在里面。

关于哲学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写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主席，是坚持了历史上两条认识路线斗争中的唯物主义路线。《实践论》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反对唯心主义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

### 第三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路线的特点

我们刚才讲的只是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者也坚持了一般的唯物主义，但是，不仅仅是一般的唯物主义，如果我们只有一般的唯物主义，只讲认识是反映、认识

的来源是客观物质世界，那么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是坚持这一原则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不在这里，如果单讲这一点，就和以前的唯物主义没有区别。

所以，要了解《实践论》，还得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特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路线不只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路线，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这个唯物主义上面有辩证法三个字，或简称辩证唯物主义路线。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这个特点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人的实践和人的认识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来认识世界的，不是离开改造世界的活动，不是仅仅坐在房子里东看看、西望望就能认识世界的。《实践论》批判了以前的一种说法，什么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坐在房子里，不出门，不活动，不改造世界，就知道天下的事情，这个话是不对的，是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人是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的，不是坐在房子里边随便东张西望就可以把世界认识清楚的。《实践论》的第一句话就是讲这一点。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以为坐在房子里边就可以认识一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和人的历史活动是分不开的，所以认识是跟着人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同一个时期的人，由于在实践中的地位不同，认识也就会不同。实践中的地位不同就是立场不同，你是真正改造世界还是反对改造世界，这就是实践的立场不同。改造世界是实践，阻碍别人去改造世界也是一种实践。这两种实践可以规定人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古代人的认识没有我们现代人的认识多，这就是由于古代人的实践发展的水平比较低。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实践前进了，认识也就前进了。

我们说的实践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改造社会的实践；一种是反对改造社会的实践。实践这个名词是包括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在内的，其中有一种活动是最重要的，就是改造世界。不是任何一种实践都能保证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只有改造世界的实践，才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的认识是从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得来的，这种实践叫做变革的实践，也就是革命的行动。只有改造世界的实践，有变革的实践，革命的行动，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反对改造世界的人是不是完全不能认识世界？当然也不是。但是，他的认识总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反动派对于世界发展的最主要的东西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比如，反动派是不是一点也不了解战争的规律呢？反动派是不是一点也不懂得战略策略的原则呢？也不是，有些战略、策略的原则一般地也可以知道一些，但是最主要的东西他不会知道。比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讲的我们革命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我们公开讲出来，反动派也没有办法掌握。小的战略策略他会掌握，个别的局部的一些东西他可以掌握。但是每一个时代最完全的、最高的正确认识还是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人才能完全掌握。所以，只有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才有可能掌握最正确的认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不是一般的反映论的路线，而是能动革命的反映论，反映论加“能动的革命的”这两个词。能动性、革命性，就是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要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当中，才有可能得到最正确的认识，所以叫做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提法也是毛主席的创造。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第一次提出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概念，不过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这样具体地加以概括，没有在哲学上作过这个概括。所以这也还是一个贡献，是在哲学上的一个贡献。

《实践论》讲到，我们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所以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我们对我们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首先是反映论和反对反映论的斗争，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但是，不仅仅是这样的内容，不仅仅是一般的反映论和反对反映论的斗争的问题。

我们对于党的历史上在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怎样了解呢？这个问题要根据《实践论》作进一步的说明。

《实践论》倒数第三段开头两句话帮助我们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95页）毛主席所反对的错误的认识路线，就是这种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路线。辩证唯物主义所坚持的路线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路线。或者可以说，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路线。认识一点也不能脱离实践，这是《实践论》上讲的话。要保证认识能够正确，主观能够很好地反映客观，就必须时时刻刻使认识和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实际工作里面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斗争，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路线，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路线的斗争。

主观和客观相分裂，有种种的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也有种种的脱离。有的人是"想当然"就脱离了，有的人"只看到表面现象"就脱离了；有的人只讲一般规律，如战争的一般规律，

不讲中国战争的特殊规律，这是通过教条主义方法脱离了。所以说，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有种种的路线，一不注意就脱离了。

毛主席的伟大，就是在于他在整个实际斗争中，对各种各样脱离的道路经常保持警惕，经常坚持不脱离，只要一发现某些人的认识从哪一条小路上脱离了，马上就提出警告。

在井冈山的时候革命很困难，有人只看到表面现象忘记了本质，毛主席就马上提出了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本质的警告。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文章中讲到，有时有些同志间互相批评都是没有根据的主观主义的随便乱批评。毛主席指出，这些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主观主义，指出这样做会破坏自己的团结。

革命战争中的教条主义者讲什么一般战争规律，甚至讲第一次世界战争的规律。那时搬了一个外国人（德国人）来，他自以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那么一点知识，就想搞一点一般战争的知识来指导中国革命。毛主席就提出警告，这是没有调查研究，是和中国实践脱离的。

人的认识脱离客观、脱离实践，是很容易的。没有高度的唯物主义自觉性，就不容易完全防止这种分裂和脱离。我们现在由于有了政权，坐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多了，就从办公室这条小路离开了实践，离开了客观。这叫做官僚主义。有了政权，最危险的就是官僚主义。没有政权以前，脱离实践，脱离客观的主要危险恐怕还是教条主义多一点，其他方面也有，但教条主义是比较最大的一种力量，最主要的一条道路。因为它最容易吓唬人。第三国际是苏联人、外国人，我们当时是半殖民地，自己有自卑心理，很容易迷信，由于迷信，就脱离了。有了政权以后的问题，就是

官僚主义比较多。斯大林批评的主观唯心主义也是一种官僚主义。他主要批评苏维埃政权领导者能够任意改变客观规律、创造规律。斯大林也看到了掌握政权容易跑到主观唯心主义方面去。

所以，要注意，脱离客观、脱离实践，是有各种各样的路线，各种各样的小路，有政权时候最危险的是官僚主义。

1937 年可以说是我们的民主革命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告一个段落的时期。政治上、军事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告一个段落，在认识路线上也大体上告一个段落。毛主席在那时候就做出这样的总结，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一方面是中国革命的认识经验的总结；另外一方面也继承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经验、认识斗争的一些结论。所以，这两篇著作不仅仅有中国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当时主要是有中国意义。因为那时候国际上也不一定就承认它有什么世界意义。那时候国际上是斯大林为主要旗帜。可是我们也要注意，正是那时——1937 年——斯大林的唯物主义也有所削弱。这时斯大林领导了反对德波林主义的斗争，但是后来德波林的某些方面又成为斯大林自己的弱点。1936 年、1937 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建成，这一宣布就使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践。

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的哲学成果，还是中国继承发展了。就以 1936、1937 年反对德波林斗争的成果来说，真正发展了的还是中国，是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就是继承了列宁思想，并进一步加以发展了，而在苏联没有得到真正很好地发展。苏联反对德波林的成绩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理论不能脱离实践。

列宁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普遍真理，是一个方向。毛主席抓住了这个方向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了。

我们说，1937年两条路线认识的斗争告一个段落，这有什么意义呢？所谓告一个段落，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是正确路线占主要的方面。以前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虽然指导革命战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没有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正确路线没有在全党取得主要地位。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37年以后，毛主席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成了当时党内的主导的路线。他的领导地位确定了，他的认识路线已经成为主导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斗争告一段落。这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斗争了。所谓告一个段落，就是正确的认识路线占主要地位。错误路线并不是完全没有了，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永远会有的，现在还是照样有。所以，《实践论》的思想，现在照样可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的思想，也是从《实践论》的思想发展来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思想，在《实践论》里就有的。

所以，认识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告一个段落，并不是结束了，而是正确路线占了主导地位。从1937年以后，大体上可以这样说，辩证唯物主义路线、毛主席坚持的路线，基本上成为我们党的主导的认识路线。但是唯心主义路线还是经常起来抵抗，反对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是不断地存在，现在也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而且现在的斗争还扩大了，从前主要集中在党内，现在扩大到世界范围。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二十五条”里面，不是专门讲哲学，但是也有一条，就是反对用主观臆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修正主义就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实用主义是唯心主义里面的哪一派？就是认识是脑子里生就的那一派。赫鲁晓夫就是代表。他认为正确的认识就是他脑子里生就的，他说的

话是不能批评的。

## 第四条，《实践论》的中心是讲实践

我想特别要说一下这个问题。

什么是变革的实践，什么是改造世界的实践？这个问题《实践论》里作了最具体、最全面的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了变革的实践，但是变革的实践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哲学著作里还没有集中加以说明。毛主席《实践论》的贡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作了集中的说明。现在对我们来说，已变成了常识。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讲到，最基本的实践是生产，其次是阶级斗争。所以，变革的实践最基本的东西是生产，其次是阶级斗争，然后就是和生产、阶级斗争有关系的科学实验。这样就集中地概括了变革实践的主要内容。

这个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都有，列宁的著作里也有。他们也讲了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但是在一篇哲学著作里集中概括起来，这是毛主席《实践论》的一个贡献。根本思想、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样地集中，就又有了发展，就有了很大的意义。对我们现在工作的指导有很大的意义。比如官僚主义，这是我们有了政权以后最容易出毛病的问题，就要通过三大革命的实践来克服。其重要性就在这里。集中起来以后对行动的指导、工作的指导，特别起作用。

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里告诉我们，人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知识，一种是社会知识。自然知识就是改造自然斗争的经验总结，社会知识就是改造社会斗争的经验总结。这两种知识再加以总结就成为哲学知识。不管是自然知识或社会知识都是从

这些最基本的实践里来的，或是从生产斗争里来的，或是从阶级斗争里来的。所以，一切知识的来源最后就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改造自然的革命的实践；另外，在生产中就要发生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进行生产的时候就要改变人的社会关系。我们为了使农村进行比较大规模的生产，就不能不改造个体经济，把它变成合作社、公社，就不能不改造社会。生产本身又是改造自然的实践，又是改造社会的实践。

阶级斗争主要是改造社会的斗争。它的实践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革命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对社会的正确认识的来源主要是在革命的阶级斗争这方面。所以，我们要认识自然的规律就一定要参加生产的实践；要认识、改造社会，也要参加生产实践；改善人和人的关系，也要参加生产实践。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一定要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说，要站在革命的阶级立场上进行斗争。中央号召我们参加阶级斗争，并不是要我们随便站在哪个阶级立场去斗争。你站在富裕农民那里，也是参加阶级斗争。那不是中央所要我们参加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我们站在贫农、下中农方面。归根到底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领导贫农、下中农对富裕农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

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里提出的思想，在《实践论》里基本都有了。《实践论》里讲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也讲到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里的实验，也包括我们改造社会的典型试验。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典型试验，也是科学实验。所以那时候《实践论》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毛主席已经根据十六年的斗争经验看出我们有许多干部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脱离生产，脱离革命的阶级斗争。教条主义者是最明显的

例子，长期住在莫斯科，偶然回来一下发号施令，根本没有接触阶级斗争，当然更谈不上接触生产、科学实验了。

调查研究包括自己亲身参加的斗争在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不亲身参加斗争，没有自己的经验作基础，你的调查研究也搞不好。所以，首要的问题是要参加生产，参加阶级斗争。而且参加阶级斗争还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也有人参加了阶级斗争，但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那么他也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

所以，实践的问题同时也是立场的问题。《实践论》不只是讲唯物主义观点的问题，也讲了立场的问题。你能不能参加斗争这一件事情，就是立场问题。不参加生产，脱离生产，就有脱离劳动人民立场的危险。长期不参加生产，不关心生产，就有不知不觉变成官僚主义者的危险。参加阶级斗争，也要真正把心放在贫下中农方面，然后才能真正成为改造世界的人。教条主义者本来想在莫斯科发号施令，但太远了，后来跑回上海来发号施令，把上海搞得一塌糊涂，蹲不住了，只好跑到江西一带去发号施令。到了江西可以说是参加到实践和阶级斗争里面去了。你说他主观上不要斗争？不是的，他主观上也是要阶级斗争，也要革命的，但是他的心不是完全摆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摆在个人方面多一些。所以他就不能真正参加革命的实践。他也指挥了群众，搞了演讲，但就是没有真正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他只懂得照搬条条，不了解实践。

所以，要坚持唯物主义，要真正坚持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首先还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有了无产阶级立场，有了真正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才会真正参加生产，真正搞阶级斗争，真正懂得实践。因此，也才能够真正认识社会

情况，认识当前形势的本质，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

要学好毛主席著作，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立场问题。

廖初江讲到，要革命就要学毛主席著作。反过来，不革命就用不着学毛主席著作，学了也是白学。首先要革命。廖初江问雷锋："你学好毛主席著作的秘诀是什么？"雷锋一针见血地说："就是不要忘本！"

丰福生所以能够很容易地领会毛主席著作，他看毛主席著作后体会得那样深，是因为他觉得主席的话讲到他心里去了。他是贫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一些问题，他一看就感到是讲他自己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实践，这就是说明了立场和观点是分不开的。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没有真正的革命热情，你搞调查研究也是白搞的。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你说他一点调查研究也没有？那也不是。也有调查研究，也有材料，能讲一套，也是从生活里来的。但结论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是相反的。我们工作中有许多困难，有许多缺点，也有许多错误。你批评的这些错误的确是事实，问题是经过批评以后得到什么结论，同样的批评可以得到积极的结论，也可以得到消极的结论。这就是看你的立场站在哪一方面的问题。

毛主席的《实践论》，从历史上说明了实践是我们认识的基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首先认识的来源是生产实践，然后就是阶级斗争。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有时候也是革命的，有时也有进步的剥削阶级。但是因为他们是剥削阶级，总有一些偏见。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社会发展规律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认识。不是说剥削阶级一点认识也没有，这也要一分为二。剥削阶级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也有革命的实践，也可以认识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是剥削阶级，他总有偏见，没有办法使认识正确，特别是不能够全面地认识。至于反动阶级，那就根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的本质，他的方向，他的认识，都只能是一些错误的荒谬的东西。现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使得他们不愿意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使他的思想不愿意正确地反映世界发展的规律。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把思想当做反映客观世界的工具，而是把它当做一种阴谋威胁全世界的工具、利诱的工具。最近赫鲁晓夫在阿联讲了几句话，他有一套理论，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要纳赛尔最好不要按照宗教的民族来联合，最好还是联合工人、农民，联合劳动者，和欧洲的劳动者一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这一套话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漂亮，好像是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样子。但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实际上是对纳赛尔进行威胁的手段，意思就是暗示纳赛尔：你不要搞亚非团结，要跟我苏联走。他并不是真正讲马克思主义，和纳赛尔这些人就不能讲这些话，只要像周总理那样，讲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就可以了。这样他也愿意接受。当然，在纳赛尔来说他也是实用主义。但在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对这些人只要能够争取他反帝反殖民主义，那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了。现在我们的目的是搞反帝、反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跟他们讲阶级斗争怎么行呢？实际上赫鲁晓夫不是要纳赛尔讲阶级斗争，而是要利用这种表面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压纳赛尔，叫他跟苏联走。赫鲁晓夫这些人是把思想言论当做对全世界威胁、利诱的工具，这就叫做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把思想当做实用的工具。不是把思想

当做反映客观世界的一面镜子。他的阶级利益要求他这样做，所以他绝不可能认识客观真理。

关于实践问题就讲这些。《实践论》的中心问题是实践，所以这里要着重对这个问题作一点研究。实践中特别重要的是革命实践，只有革命的实践才能保证正确的认识。这是基本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根本的思想。

# 第二次讲课

(1964.5.26)

现在讲《实践论》的第五条。

**第五条，关于认识的总规律**

这条讲一讲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也就是实践里边所提出来的关于认识的总规律。规律就是关系，就是联系。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认识的总规律。这条是毛主席《实践论》的总贡献。

如果要讲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上有什么主要发展？有些问题的发展，昨天已经讲了，比过去讲过的更明确了，更具体了。但是讲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里边最主要的东西，毛主席发展了什么？我看最主要的东西是贯彻了一条关于认识的总规律，就是把认识和实践的内部关系、辩证关系作了一个全面的概括。这个总规律就是《实践论》的最后一节所讲的那些问题。《实践论》就是认识的总规律。《实践论》这篇文章的总结论，也就是这一小节，可以念一念："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

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96—297页）辩证唯物论全部认识论就是用这几句话来概括。

所以，我们学习《实践论》只要把这几句话学透了，了解透了，而且结合实际能加以掌握，在实际中能掌握这里所讲的原理，就算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段是值得反复地加以研究、反复思考，并且结合实际来运用它。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以前没有这样全面而又简单明了地概括过。能动的革命的反映，就是它的内容，就是这几句话的概括。这是毛主席在哲学上很大很大的贡献。这样概括以后，就便利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在前面所解释的许许多多，都是包括在这里边。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关系、这个规律，列宁也曾经探讨过，但是，他谈的很简单。就是在他的《哲学笔记》里边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182页）所谓直观，就是感性认识，能动地直接观察就是直观，直接观察就是感性认识。由生动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再到实践，这就是辩证法的认识论的规律。列宁关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就讲过这句话。列宁在别的著作中讲到：“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恩格斯也讲过这样的话：“真理要靠实践来检查。”马克思也讲过：“真理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都讲得

很简单。只是毛主席全面地展开了，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要通过实践来发现真理。真理的认识是通过实践从客观物质世界来的。然后又通过实践去证实和检查真理。那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毛主席讲通过实践发现真理而又在实践中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证实真理里面包括检查真理。真理性的认识中肯定有正确的，也可能有错误的，这是认识真理的一个辩证过程。用辩证法的规律来说，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由实践到真理的认识过程，这是一个否定，真理再到实践，是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循环，一个波浪。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或者是循环式的、螺旋式的。认识真理也是这样一个螺旋、一个螺旋；或者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实践到真理，再由真理到实践。

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里的话来说：就是由物质变精神，再由精神变物质。这和实践变认识，认识再变实践，都是一样的，名词不同，它的方面不同，都是一个认识过程。认识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地前进，或者是一个螺旋、一个螺旋地前进。这个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向对立面的转化，向对立面转化两次，就成为一个波浪，成为一个螺旋。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的，我们日常生活也是这样，每天有学习、有休息。白天工作，晚上就睡觉。明天再起来工作、学习，晚上再睡觉，都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地前进。人的认识就是经过这种螺旋式的前进过程，或者是波浪式的前进过程，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步一步地发展，两次否定，或者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面的话，就是两次飞跃，都是一个意思。两次否定，或者是两次飞跃构成了认识发展的一个步骤。每一个完整的步骤都是经过两次否定、两个飞跃。从实践到认识，这

是认识的一半，认识还要在实践中经过检查，然后才算完整的一步。就像人走路，什么叫一步？两条腿左腿走一次，右腿走一次，这就是一步，只有一只脚走了，只算半步。我国的度量衡叫做五尺为步，为什么不叫两尺为步？而叫五尺为步？我们生活习惯上很自然叫五尺为步。一只脚走了，是肯定，再走一只脚，是否定，两次飞跃才能成为一步。

由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或者是由物质到精神，再到物质，两次飞跃算是认识的一个步骤，这种步骤是没有止境的。不断反复，不断循环往复，这是人的认识过程。为什么一定要两个步骤才算一步呢？这很容易理解，就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这个认识到底确实不确实？很难判断。从实践里边开始得到一点认识，这个认识有了，但是这个认识究竟正确不正确？或者有几分正确的，有几分错误，单单靠自己本来的认识不能做结论。一定要再拿到实践里去检查，然后才能够分辨出来你所得的认识，是不是正确，或有多少正确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由实践到认识、认识再到实践中去检查，才算走了一个完整的步子。如果有了一点认识，不经过检查，自以为是绝对正确了，不再拿去检查，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会使得主观和客观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就走向主观主义，马上就变成了唯心主义。要坚持唯物主义，一定要不断地用实践检查自己的认识，实践是比认识更高的，实践比理论更高，因为在实践中可以检查理论的普遍性，理论能不能使用，有没有普遍性，可以作检查，同时又能检查理论有没有现实性。列宁有一句话大家觉得很难懂，就是实践比理论高，因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有现实性的品格。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了理论认识以后，你一定要拿到实践当中去检查才能够体会这个认识有没有普遍性？有没有现实性？理论的现实性、普

遍性，只能在实践当中才能体会到，就是这种意思。

在实践中检验认识起什么作用呢？这个作用有两点。

第一点，在实践中可以肯定认识中的正确东西。认识正确了，在实践当中必然得到一定的结果，那就首先可以肯定认识中正确的东西。其次实践可以帮助改正认识中错误的东西。检查错误，改正错误。肯定正确，改正错误。这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确实实现。

第二点，通过实践可以发展新的认识。因为认识到了实践中去检查的结果，发现实践里边是有新的东西我们原来没有认识到，就可以丰富原来的认识，发展原来的认识。这里毛主席讲到的通过实践来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证实包括两方面，证实正确的和证实错误的。另外一方面是发展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在不断地实践当中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此也是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我们读《毛泽东选集》就是要用这样的眼光来读，把整个《毛泽东选集》当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一步一步前进的这样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不要在《毛泽东选集》里去找什么永久不变的现成公式，不要希望从《毛泽东选集》里边找一些绝对不变的东西，不要以为一拿到手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学习《毛泽东选集》是学习它不断前进的认识方法。当然，毛泽东思想里面有普遍性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革命的最基本的原理。但只讲基本的东西是不够的，要真正能够认识现实或者解决实际问题，那就要不断地在实践过程里边补充和发展很多新的东西。

比如：拿阶级关系来说，我看《毛泽东选集》以及我们党史的中心问题是阶级斗争，从民主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

主席的著作始终抓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认识这个核心。阶级斗争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所以，对中国的阶级问题，毛主席的整个著作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发展，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毛主席在 1926 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这个分析从哪里来的？从 1921 年党成立以后，毛主席的思想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后，经过四五年阶级斗争的实践，这四五年间，我们读党史，毛主席领导了湖南农民的斗争，领导过工人的斗争，领导过矿工的斗争，在农村里边也组织过农民的斗争，后来又代表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接触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经过接触小资产阶级阶层，这是有了这些年的实践，在实践当中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打过交道，都有过斗争，有过联合，积四五年的经验，然后才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就是从这几年的实践当中得到认识上的总结。几年以前，他是零零碎碎地接触，一个时候接触工人，一个时候接触农民，一个时候接触资产阶级。到 1926 年把所有的经验概括起来，总结起来，把各阶级的特点都概括起来。所以，这个分析都是有生动的材料、典型的材料来概括的。比如说讲到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抓住了戴季陶。戴季陶当时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后来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他叫一个口号，“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民族资产阶级接触的很多，戴季陶是代表人物，他的代表性还可以代表资产阶级的特点。把民族资产阶级一分为二，其他各阶级都有特点。小资产阶级分为几个阶层，农民是可靠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主力军，这些都作了分析。这是第一次由实践到认识。

然后，北伐开始了，农民运动高涨，毛主席又去湖南去考察

农民运动，在农民运动里边进行调查，检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检查的结果，得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在这个系统的认识里，如果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比，就可以知道有很多新的东西。基本东西没有变，但是有了新的东西。特别是对农民的看法，这是肯定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正确的东西，批判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比如肯定了贫农是革命的先锋，这点得到了正确的认识，打破了原来的认识，认为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就批判了革命中的错误思想，批判了把农民运动说成是“痞子运动”的观点，肯定了农民运动是好得很，批判了“糟得很”的谬论。在实践当中肯定了正确的东西，抛弃了错误的东西，同时又发展了一些新的东西。农民办了十四件大事，这是农民运动高涨起来以前没有的，农民运动高涨起来以后才出现的新事情。批判了错误的，同时也就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分析的正确。资产阶级是动摇的，群众起来它就害怕。这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这样的反复。这就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实践是1925年以前，1926年得到一个认识，然后再拿到实践里边，农民运动里边去做检查，得到了正确的认识，错误受到了批判，又得到了新东西，又发展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问题也是一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几篇文章，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几篇文章的阶级分析基本上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样的，基本分析是在新的实践里边照样得到证实，但是这个时候也批判了某些错误的东西。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跟反动派没有矛盾。在《井冈山的斗争》里边讲到工

商业者也是受排挤的，指出了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他虽然动摇，但还是受排挤的。进一步证实了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尽管是革命的低潮，情况比较困难，到农民比较觉悟的地方，同时要有一些新的条件，就是要能在不是大城市、又不是太偏僻的地方，两省交界的地方找到这种地区，又找到经过大革命的那种农民的地方，像江西、湖南这些地方经过大革命，农民有觉悟，到这些地区去，无产阶级搞革命也能够站得住脚。要坚持革命，只有依靠农民同盟军。尽管是革命的低潮，反动派的力量很大，但是你可以找到地方立足，主要的根源就是有革命觉悟的农民。凡是有这种农民的地方，再有适当的地理条件，就能领导农民斗争，就可以站得住脚。又一次证明了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批判了当时有点悲观情绪的那种思想，怀疑红旗能不能存在下去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同时又发现了新的认识，新的认识就是在农村里边能使革命站得住脚，在农村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一个好的办法，是一个新的办法。这样，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又做出了新的贡献。向来认为革命要从大城市里边搞起来，现在发现依靠农民在农村里可以先把革命搞起来。

到了革命的第三个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就是1931 年以后，民主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过渡，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但是 1931 年有了“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向抗日战争的方面发展了，所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和后期是不同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就有了一些新的实践。这时，在新的实践当中有各种意见，主要是毛主席跟一切错误路线，特别是跟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由 1931 年到 1935 年，这是一个实践的阶段，这是检查究竟是毛主席对，还是王明、博古对？经过四五年的实践得到了一个新的认识，这

个认识主要表现在毛主席1935年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写的)，那是洛川会议的决议。概括了1921年到1935年的实践，这是在政治上的总结。军事上的总结是遵义会议，以后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什么叫做政治上的总结？政治上的总结就是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总结。在新的实践当中，再一次认识中国阶级。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就是经过五年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是对的，还是帝国主义是敌人，封建势力是敌人，买办势力是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农民是同盟军。但是，证实了正确的东西，同时又批判了错误的东西。这几年来，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愿意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这种左倾路线的错误。所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这个错误作了批评，在结论上作了批评，并且用实践来证明资产阶级是两面性的，这里特别提到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一方面跟着国民党打共产党，三次围剿的时候主力是陈铭枢带头，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来，十九路军又带头抗战，说明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这一个证明和检验肯定了以前的正确的认识，批评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民族危机前面，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面前，可以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应该放手和他联合。蔡廷锴来打共产党，不可以和他握手，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们心里很不高兴，但我们必须和他一起来打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又有了新的东西，肯定了正确的，批判了错误的，又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毛主席的思想就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先是军事方面、政治方面、最后是哲学方面，在哲学上写了《实践论》。

《实践论》本身就是自有共产党以来认识的反复的一个概括。十几年来，就是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逐步前进的，这样逐步前进，证明了反复的规律。因此毛主席就在《实践论》中，把这个规律加以全面的说明。所以，这个著作就证实了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它本身不是脑子里想出来的，不是现成的天书里造出来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概括的。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的认识经验基本上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反复的经验。把我们自己工作中所体验到的这种实践的经验加以概括，所以才写出这篇文章，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毛主席写出这篇文章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没有写过的，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写不出来。不是说列宁不伟大，列宁没有这十几年的经验，他就不能写出来。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写出《实践论》是不合理的，他们的实践经验不能写出这个东西来。以后进一步的革命发展过程也是证明这个认识的反复过程。

我现在只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实，全部《毛泽东选集》的文章都可以这样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件，包括毛主席的著作也可以这样看。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是认识的一个步骤。认识的一个步骤并不等于认识的完成，某一种正确认识的完成，要经过好多步骤。看问题的大小，如果问题小一点，简单一点，走几步就可以认识完全；如果问题大，很复杂，完全是新的问题，就要反复走很多步。

也有这种情况，主要领导人的认识完成了，但要使干部完成这个正确的认识，就要走更多的步子。主要领导人可以少走几步，一般干部认识完成还要多走几步。比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毛主席在1926年就基本上认识清楚了，

再加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问题也认识清楚了，就毛主席来说，正确认识完成了，问题是更丰富了，没有要纠正的错误问题，而是更丰富它的内容的问题。但就一般干部来讲，而且也不一定是一般的干部，对陈独秀、王明、博古、罗章龙这些革命领导人来说，他们就没有完成。王明，博古根本没有实践的问题，陈独秀实际上也是脱离实践，脱离农民。但是，像这些主要领导干部之所以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主要是他们脱离了实践。因此，他们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思想，永远不能跟毛主席的思想一致。但是还有一般广大干部，特别是在实践当中这些人，要得到毛主席那样的完全认识，就要比毛主席迟一些，就要经过反复实践的过程。领导路线存在着斗争，跟谁走呢？又要选择领导，究竟哪一个领导是正确的，对一般干部来说，还是在自己的实践中体验才能了解。

所以，就全党来说，我们的干部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正确认识，最初是遵义会议完成的，大多数干部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完成的，但也不是彻底地完成，彻底地完成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整风，开了“七大”以后，全党干部才统一起来。所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反复，要反复多少次因人而不同。马克思主义水平高的人他可以反复的次数少一些，马克思主义水平低的人，他们的反复过程就要长一些，这就是说为什么毛主席思想早已经明确了，而全党还要经过好多年斗争，才能确立毛主席的领导，才能够全党一致的跟着毛主席的指导走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规律，还要扎根在我们的脑子里边，把这个规律掌握好了，我们肯定可以缩短这个反复过程。学习认识论的重要性，就是帮助我们缩短这个反复过程。现在我们学了认识论，了解了这个规律，我们能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运用这个

规律的目的何在呢？就是使我们能自觉地注意到在任何时候不要使我们的主观认识脱离实践。我们脑子里有什么认识的时候，要很快拿到实践里去检查，而且虚心地接受实践的检查，在实践里感觉有不对的地方，就马上改正。实践中证明是对的，肯定下来，坚持下去，在实践中努力发现新的东西，解决新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的干部都能这样做，那么我们的认识就会快一些，我们要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经过的反复就可能少一些，领袖和一般干部完成正确认识的实践的距离就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我们干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都掌握了，那可能使我们领会领袖的思想要快得多。所有的人要立刻完全领会也不可能，但是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人多一些，领会的就会快一些。这就是认识总规律，重要性就在这一点。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实践论》所提出来的认识总规律，也还不是最后的，不是到此为止就没有发展了。毛主席对自己的这个思想，后来还是继续有发展，特别显著的发展是抗日战争时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我们学《实践论》时需要读一下的，也不要全都读，就是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那几段。《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思想，在写《实践论》的时候还没有，到了抗日战争的这个时候，又经过一些实践的经验，毛主席把这个认识规律加以发展，把认识规律发展成为领导方法的规律。领导艺术跟认识的方法分不开，正确的领导就应该有正确的认识方法，正确的领导路线必须跟正确的认识路线相结合，这篇文章的意思主要就是这样。

领导者怎么样才能领导得好，领导好就要掌握这样的规律，首先他的领导思想必须是从实践中来的，而所谓实践就是群众的实

践。《实践论》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实践不能是一个人的实践，当然首先个人应该参加实践，领导者个人应该参加生产，参加阶级斗争。首先自己应该有亲身的经验，但是不能仅仅限于个人的实践，因为个人终归是有限的，再伟大的个人的经验终归是有限的，你比起几千万群众来，再聪明的人也比不了那么多的经验。所以毛主席说：群众往往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领导者首先应该向群众当学生，学习群众的各种经验，由实践到认识，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说，就是将群众的经验变成领导者的经验，变成领导的知识，由群众实践的经验变成领导者的认识。由群众到领导，这就叫做集中起来。为什么一定要集中起来？把群众的经验现成地拿过来行不行呢？还不行，群众的经验需要集中，因为群众的经验是分散的，几千万群众集合起来，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就一个个群众的经验来说是片断的，而大量的群众的经验汇合起来就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领导的艺术就是要集中群众的经验，把群众大量的经验加以综合，加以分析。群众经验也要一分为二，它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以，领导者首先要向群众学习，但也不是无条件地跟着走，也不是做群众的尾巴，一方面要当学生，但又不能当尾巴。要学，但学了的东西要分析。好的经验要集中起来，错误的经验就抛弃。所以，集中起来的过程就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群众的大量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的，属于感性阶段，分散的，片面的，有些是表面的，抓不到本质的那就去掉。把群众的经验加以研究，研究这些经验不一定几千万群众的意见都去研究，抓住一些典型加以分析研究，去粗取精，粗糙的东西不要，非典型的不要，抓住几条典型的经验，典型的意见。群众说了一些什么典型的话，创造了一些什么典型的经验？发现了，抓住几

个麻雀来解剖。然后再去伪存真。有些话是假的，用科学的态度把真实的材料掌握住，然后再根据这些确实的材料，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各种材料之间的关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个联系就搞清楚了。联系无非就是联系彼此的矛盾，就是联系彼此的斗争，互相排斥，互相联合，由此及彼的彼此斗争的关系，彼此的联合关系，彼此相互的地位。各种问题弄清楚了，然后就做出总结。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某些农村的调查，也不是在所有地方，所有农村的调查，是选择领导干部，选择某些有经验的群众开调查会，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开调查会，抓住了一些干部，这就是接触下级，然后反映各种意见。反映出来的意见有真的，有假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肯定的就肯定。

这些意见关系到农民对地主采取什么行动，贫农跟地主的关系，中农跟地主的关系又怎么样，富农跟地主的关系又怎么样？这样就集中起来，正确的东西就拿到群众中去坚持，坚持中又要检查，我们所要坚持的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肯定正确的，修正错误的东西，然后找出新的东西。领导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领导的最根本的方法也是我们认识的方法。或者是正确的领导方法要以正确的认识方法为基础，领导的方法要符合认识规律。所以把认识方法发展成为领导方法，这是很突出的创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种不可估量的贡献。

这个群众路线，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名词。但是，知道这个名词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掌握。现在我们人人赞成群众路线，但是不是人人能真正地走群众路线？那也不一定。如果对认识规律没有掌握，虽然口头上往往讲群众路线，但

实际上还是没有掌握群众路线。要真正能掌握群众路线，就能掌握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这样一个认识规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就叫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或者甚至可以这样说，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一个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也是认识路线。群众路线一离开政治路线，就没有思想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成为群众路线，这是毛主席的很大贡献。是马、恩、列、斯没有过的。斯大林就不知道群众路线这个名词。

现在我们讲群众路线讲的很多，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讲这个名词，他们有时写文章运用这个名词时打个括弧，认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形。现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在认识水平上，比起毛主席的思想要落后得多。所以它出现修正主义也是难免的。当然，东方这些国家不同，他们也学习毛主席的认识论，也走群众路线。

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我们解放后几年来，毛主席又发展成为逻辑的路线。有些人曾经问，好像毛主席不大讲辩证逻辑，其实毛主席讲辩证逻辑讲的非常好。主要就是在《关于工作方法的六十条》中，这是 1958 年写的。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一条讲到概念、判断、推理的形成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写文章的过程，用文章来表达领导的思想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逻辑是怎么来的？逻辑也是从实践当中来的。实践里边观察许多材料，有了许多感性认识，把这些感性认识集中成为各种概念，对问题下判断先找群众谈问题、谈意见、谈情况，谈了以后，然后找出概念，说这种意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那种意见是反映农民的意见，还有那种意见是反映贫下中农的意见，把那些意见

概括成为一个概念，资产阶级的、富农的意见，农民的意见，贫农的意见，就是概括起来的概念。有了这种概念就可以研究这个概念对不对？这个概念正确，那个概念错误，做出判断，又可以根据这些判断作推理，既然这概念是错误的，就应该反对，这就是推理。这个意见对，我们就要回到群众中坚持。所谓概念、判断、推理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所谓辩证逻辑，就是一种发展的，从实践当中发展出来的，把逻辑当做一种发展的东西，不是现成的。逻辑就是理论，就是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先要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是现成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辩证逻辑就是从发展中看理论，把它看成是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怎么样形成这个逻辑？就是从群众里边形成的。形成了逻辑以后，我们就把逻辑写成文章，表达出来，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表达出来的文字就要回到群众中去，写文字就是为了回到群众中去，所以表达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领导人怎样才能到群众中去，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字把这些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怎样才能把文字写得准确、鲜明、生动？那要在表达的时候，在写作的过程中，反复考虑，不要一下子写出来就拿出去。

在《毛泽东选集》中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面有一条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也有这样的话，“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441页）。这也是一种领导的方法。把领导的思想表达为文件拿到群众中去，征求下级意见的过程，先在内部征求意见，这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写文件也是一种领导的方法，怎么写？这也是

一个逻辑问题。那么，怎样把逻辑搞的很准确，很严格，真正鲜明、生动，那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把写出的文件再拿到群众中去进行考验，坚持正确的，修正错误的，吸收新的东西。这样能使这个文件搞得更好，这个办法我们党现在普遍地用。两个十条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表，不发表当然还有一个政治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字问题。但有许多东西是文字问题，发下来以后征求意见。工作方法六十条，发展农业生产的什么四十条纲要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这就是涉及到内容是不是完全准确的问题。四十条纲要中有些指标是不是就那样定？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些条是不是就那样定？这些东西都还要考虑。

所以，《实践论》的思想本身也是不断地发展。例如，我们现在讲的就有两个发展，一个发展是认识的总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发展成为领导规律，领导路线，就是一个发展。后来发展成为逻辑路线，由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发展成为逻辑路线，发展成为写文章的路线。怎么样写好文字，怎么样总结好工作，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到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又进一步发展成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两个飞跃，一个正确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实践才能完成，这样一个鲜明的认识，应当说是一个新的发展。

思维与存在是不是对立的统一？根据从《实践论》一直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文件我们可以肯定是对立统一的。为什么是对立的统一呢？思维和存在就是对立面，物质和精神就是对立面。为什么是对立的呢？这是因为主观的精神很容易脱离客观、脱离物质的。人的主观意识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本身是客观的反映；但你只要不注意，它就会自己活动起来，它会自己用主观的一些材料拼来拼去拼起一些东西，主观幻想就是脱

离客观。人的主观意识经常存在着脱离客观、脱离实践的倾向，这就是它的对立性。这个倾向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思维究竟是思维，它有自己的规律，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做梦的时候，就可以把许多材料拼起来，梦见一些荒唐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就可以长着翅膀飞上天。人的主观有这么一些主观活动，做梦只是一种极端的例子。所谓主观主义就是脱离了客观、脱离了实践，自己随便拼凑一些想法。

主观脱离客观是很容易的，稍微不注意就能脱离，主观总是落后于客观，总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反映了以后就满足了，只要一觉得满足了就脱离客观；做工作有了一点成绩，自己就以为很不错了，结果工作里面又出了毛病，稍微有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就容易脱离客观。所以思维和存在是对立的，思维要经常能正确反映客观需要条件。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叫做思维和存在对立面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有条件的，条件是：

首先，要能够参加实践。

第二，是还要能够跟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认识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

第三，你还要经常把自己的思想拿到实践中去检查，要有一种虚心的态度，一分为二的态度，而且能够经常这样做。

要保证坚持这几个条件，才有可能使思维和存在经常得到统一，比较经常地得到统一。因为这个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认识也只是近似地最大限度能够正确反映客观。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正确，无非是保证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客观情况。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己是绝对正确了，说自己任何一点错误都不会犯。错误是难免的，而且犯了错误能很快发现，很快改正。这样，能使自己的认识经常保证最大限度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情况，最大限度

地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正确的反映是讲本质，讲规律性。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做到这一点，人类认识也只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我们讲的很多，这是《实践论》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要问题。

有的同志问：现在报纸上争论《桌子的哲学》，这个问题怎么看？根据毛主席的《实践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实践论》讲：我们的认识有两个飞跃，一个是由物质到精神，再一个是由精神到物质。《桌子的哲学》的争论问题，是不是说思想在物质之前，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以前。王若水同志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肯定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之前，就引起了争论。因为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在先，精神在后，现在你说精神在先，物质在后，那不是唯心主义吗？所以，有的同志给他戴了唯心主义的帽子。大概王若水同志文章在文字上有些毛病。我对这些问题没有仔细研究，有些争论的文章也没有仔细看，现在要解答，恐怕不一定做出合适的解答，要表示一下个人的意见，我看，物质在先是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过这个根本原则要注意怎么来理解。

物质在先的根本原则就是说，最初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第一性的。所谓第一性，这两个字外国文翻译成中国文，应该翻译成“太初”两字，就是最初最初的东西，没有比它再太初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东西。所以，物质是第一性就带有最根本的性质，最先的东西，第一性是这样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排斥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这个循环过程中，在某一个环节上，精神在物质以前。因为认识是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物质到精神，第二个飞跃是精神到物质。第一个飞跃很显然是物质在精神以前；第二个飞跃又很明显这是精神在先，这是辩证法的相互关系。从辩证法关系来说，在螺旋式上升的后半截

又是精神在前，所以说，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以前，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完全不可以的，如果根本不讲精神在先，那我们现在强调思想第一，在唯物主义里面找不到理由。

我们现在强调思想第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思想指导工作。思想对不对？是首先重要的问题，但是讲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强调认识发展过程里，后一个环节是精神在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决不要把这个东西看成是最后的问题，决不要说精神是最初的，归根到底最初的还是物质在先，最初的实践还是物质在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循环，最初环节还是物质在先，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是最原始的、太初的、最初的最初，没有比它更初的。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是后来才有的，以前就只有物质。最早的时候就没有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就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后来出现了高等动物才有物质到意识。这种情形在低等动物中，一般禽兽，还谈不上认识，只能说是简单的神经反应，不是意识。

人的认识是包括能掌握规律，掌握事情的本质，对于事物的发展方向能多少看得远一些，事情没有出现以前就能预见一定的结果，没有这些就不能叫认识。比如：赫鲁晓夫的那种思想算不算认识？只是一种阴谋诡计，那不是什么认识。他的那个共产主义建设，是不是真正预见了共产主义的结果呢？没有的，那是一个诡辩、阴谋诡计的手段，那是一种实用主义者使用的工具。真正的认识是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本质。这种认识，掌握了规律，掌握了本质，这个认识就可以改造世界了，就可以成为改造世界的原因。原因就是在结果以前，人怎样能有效地改造世界，先要有对世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有了认识世界发展规律的知识，就能正确的指导行动，有效地改造世界。在这种意义上说，意

识在先。当然这个意识也可以指导错误的行动，但是结果碰钉子，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它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原因，它不能产生它所需要的结果，它所希望的结果。

我们讲思想第一，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思想第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所以在指导革命行动的这个问题上，革命的理论第一。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思想要去指导行动，要把思想当做中心环节。物质还是第一性，精神还是第二性，决不能说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因为第一性是讲最根本的东西。但是，讲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并不排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这个波浪式的第二环节上认识在先，思想在先。

这个意见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如果不对还可以批评。

主要的基本上讲完了。下面还有几点。

## 第六条，主观和客观的分裂问题

我们刚才讲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很容易分裂和脱离。它有各种各样的路子使它脱离，你一不注意它就从一条小路跑开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都容易脱离。从基本上来讲，认识必须跟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才能不脱离。认识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实践在先，认识在后。归根结底是实践在先，物质在先。总是先有一点实践而后才能得到一个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5年以后才写出这样全面的文章。认识总是落后于实践的，精神总是比物质出现在后一些。第一个循环，第一个飞跃，总是物质在先，实践在先。

主观和客观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即使已经得到一定的认

识以后，如果不继续跟着实践前进马上就会脱离了。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但是我们有了认识以后实践又前进了。总的来说，就是认识只要稍微一停顿，不去跟上实践，就会脱离实践，就会脱离客观。脱离的根本原因，就是主观总是比客观落后一些，认识总是比实践落后一些。稍微落后一点并不等于脱离，问题是认识如果停顿了，即使是稍微一停顿就会脱离。要希望认识和实践绝对一致，主观和客观绝对一致，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最大限度的近似，多少存在一点不算是脱离。比如我们做一个决议，如果能够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情况就不算脱离，就算是正确的决议，哪怕是有一点毛病。比如说 1958 年的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有没有毛病，可以说有一点毛病，但不能说那个决议是脱离实践，脱离客观的，应该说那个决议在当时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我们的发展情况。所以，是正确的决议，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它在根本问题上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情况，有一点缺点的决议、文章、言论不一定就是脱离。只要在当时条件下，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就不算脱离。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践，是讲实践前进了，新的东西已经出现了，而认识没有跟上去，这样就是脱离。这是一种脱离。

还有一种脱离就是主观上任意空想，主观相对性发挥到很大的程度，任意胡想，那就完全是脱离。修正主义的言论纯粹是主观臆想。苏共“二十二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完全是主观幻想。究竟那个共产主义怎样建设，规律怎样，一点也摸不到。所以，那是一种完全脱离的、完全主观臆想的。

原来的认识是反映了客观情况，但实践前进了，而认识没有跟上前进，于是就脱离了。我们现在不讲修正主义的那种纯粹臆想的脱离，只讲我们一般的容易脱离的现象。这个问题《实践

论》里已经讲了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脱离，一种是经验主义的脱离。

教条主义的脱离，就是把原来正确反映客观情况的一些理论，原来是从实践中来的理论，拿来机械地用于新的实践斗争中去。新的斗争有许多新的东西，但教条主义者不注意，这样，就产生了教条主义的主观和客观的脱离。将外国书本随便抄来想直接解决中国问题。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读毛主席著作，不是学习他的精神实质，不是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想从毛主席书里找出几条现成的公式，来直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这就必然产生教条主义的脱离。所以，有时候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我们今天不能适用了。这种想法就有教条主义脱离的倾向。这种想法产生的原因是这样来的：想从《毛泽东选集》四卷里找出现成的公式，来直接解决今天的革命问题。谁要是存在这样的心理学《毛泽东选集》，就达不到目的。因为《毛泽东选集》四卷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是民主革命实践的反映，而今天我们又有许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毛泽东选集》四卷里没有直接讲到。当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后面几篇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有些原则是能直接解决今天的问题，但也还不够，也还比较简单。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么搞？那里面就没有一篇文章写过。所以，要有这想法来学《毛泽东选集》，抱着这种希望来学《毛泽东选集》，就会感觉到《毛泽东选集》对我们没有帮助。如果丰福生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毛泽东选集》，那么《毛泽东选集》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他搞的是大师傅工作，《毛泽东选集》没有一篇文章讲到如何当大师傅的，找不到现成的公式。但是，他掌握了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可以用到他的伙房工作中

去。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必然要脱离实践，脱离客观。想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公式直接解决问题，就一定要造成主观脱离客观的错误。这种脱离就是生硬地把书本词句，拿来想直接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解决不通了，就对马克思主义失望了，对毛主席著作也会失望。所以，我们要避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产生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问题。

另外，《实践论》里也批评了经验主义的脱离。经验主义的毛病，就是满足于狭隘的经验、旧的经验，不去吸收大量的群众的新经验，不去学习群众的新经验，主要是依靠个人的直接经验来解决一切问题。以前大家有一个很恰当的名词叫做“经验随便搬家”。自己有那么一点经验，经验本身是好的，经验本身是从实践中来的，就那么一点范围来说，它本身是和实践不脱离，和客观是一致的，问题是一搬家，搬到新的实践里面、新的条件里面，它就脱离了。

这是我们经常要注意的，就是这两种脱离。

在《实践论》里概括了这两种脱离：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践这两种主要毛病，两种主要现象。这两种脱离本来主观上是想搞好的，不想胡思乱想，也以为自己不是胡思乱想。这跟实用主义者的纯粹按照自己的临时需要，根据自己的阴谋的需要，来任意指导思想的情况不同。不论教条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它的教条或经验的来源，本来是正确的，因为来源正确，是好的，所以他自以为是能够搞好事情的，自以为能掌握正确思想的，主观上以为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现成的公式，这是用教条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分析，不做真正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结果。

《实践论》里讲到机械唯物主义，也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分裂，

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这是指什么东西呢？

机械唯物主义在认识上就是经验主义，只强调由客观到主观，不强调主观反过来又拿到客观里去考验。因此，它原来是唯物主义的，原来认识是从客观里来的，但是，客观事物发展以后它就脱离了。机械唯物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在进一步运用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就变成了唯心主义，在实际行动中就变成了唯心主义。我们一般干部的经验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带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它的最初经验的发源是唯物主义，它的经验的发源是实践。经验的确是反映了客观一部分情况的，是所谓由物质到精神，有一点唯物主义性质；但是进一步运用经验时，就脱离了物质，脱离了客观，脱离了实践，就在工作里变成了唯心主义，这就是经验主义。所以，机械唯物主义不能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但后来就变成了唯心主义，它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历史上的机械唯物主义都有这样的性质，都是不能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到解释社会问题就变成了唯心主义。

我们的经验主义的经验的来源，是唯物主义的，但一到运用经验时就变成了唯心主义：脱离客观，脱离实践。脱离客观，脱离实践有各种各样的路线，但主要的有两条大的路线，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我们一般容易犯的毛病。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有革命的要求，我们不会胡思乱想，任意昧着良心根据临时的需要任意制造一些胡说八道的思想。我们在主观上不会这样做，那种主观唯心主义我们一般地还没有。

实用主义也是一种经验主义，但是那种经验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因为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是承认经验要反映客观事物的，所以经验的来源还是唯物主义的。而实用主义的经验是另外一种经验，是主观主义的经验。他把经验解释成为人的主

观需要、主观的利益、眼前的利益。把这些主观需要、主观利益和眼前利益，作为他的主要经验来源。所以，这种经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我们讲的一般是《实践论》里面所批评的那种经验主义，是从客观来的经验，反映客观实践的经验，反映某些局部的斗争经验。那种经验是带有唯物主义性质的。

实用主义的经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他认为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的需要、眼前的利益就是一切最根本的东西。一切从眼前利益出发，从个人利益，从临时利害需要出发，从阴谋诡计的需要出发，来制造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是主观唯心主义。

毛主席批评的经验主义其实也是批评两种经验主义。《实践论》里批评的一般是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经验。还有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经验主义，我的需要就是一切，我的主观要求就是一切。赫鲁晓夫的这种经验主义，就是实用主义，就是一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经验主义。有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就根本不能结合实际，根本不能结合革命实践的问题。但是，如果讲实践他也有实践，实用主义者的个人活动也是一种实践，但不是革命的实践。我们讲的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要求的实践，是能够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实践，这种实践只能是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的实践，是革命的实践，不是那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各种社会活动。资产阶级政客的阴谋诡计也是一种实践，但是那不是革命的实践，那是反革命的实践。这些资产阶级政客、实用主义者，他们的认识不是脱离实际，而是根本不联系革命实际的问题。

我们所要防止的是脱离革命的实践问题。教条主义本来主观上想要革命，但实际上脱离了革命的实践。经验主义主观上也是要革命的，但是结果也是脱离了革命的实践。因为他们是经验主

义和教条主义。我们一般的同志经常警惕这两种脱离就行了。

但是，修正主义的那种主观和客观分裂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注意，这种危险也要注意。教条主义也可以变成修正主义。如果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改变的话他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经验主义者也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中有许多人就是教条主义。从前王明、博古那种教条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天书。现代修正主义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当做天书。最典型的是法国的多列士，赫鲁晓夫每一句话他都要跟着重复。多列士原来是反对戴高乐的，最近当赫鲁晓夫派人到法国搞外交，多列士对戴高乐在某些问题上又表示支持，每一件事情都跟着赫鲁晓夫走。修正主义也有他的教条主义，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是危害革命的，我们的教条主义也是危害革命的，但他原来主观上还不是反对革命的。他最初主观上肯定还是要革命的，错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首先就是立场错了，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首先应该有正确的立场，就是要有革命的实践，参加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站在革命阶级的方面，要把心摆在革命阶级的一方面，把自己的心贡献给贫苦的工人、农民。如果立场错了，就根本错了。

反对革命的问题，不只是一个错误和正确的问题，那是敌我问题。错误有两种：一种是敌我问题，一种是是非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有是非问题，但是主要是敌我问题。单纯的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我们内部的是非问题。所以，要防止错误，第一要紧的是避免立场站在敌人方面。立场基本上没有问题，就要解决是非问题，解决主观和客观脱离，理论和实践脱离。避免理论和革命实践脱离，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毛主席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我们好

像都以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讲的，实际上他早就讲了。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讲到："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其次，在革命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444页）分清正确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也很重要。要避免错误首先要分清敌我问题，首先要端正立场，站稳立场。站稳立场，就能划清敌我界限。当然，划清敌我界限，不仅仅是基本上有了革命的立场，参加革命的实践，还要经常防止认识和革命实践脱离。这样，才能完全解决是非问题，才能避免错误，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第六条就讲这些。

## 第七条，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不想讲很多，也不希望大家研究得很多。因为这个问题研究多了，就容易钻到名词里面出不来了。这个问题只简单地说明一下就行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所谓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两个概念是有自己的解释的。跟一切其他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绝对真理，不是讲一成不变的教条。过去的哲学家讲绝对真理就是讲一成不变的教条，永远不能发展，完成以后就再也不能增加一点。基督教的圣经是谁也不能批驳它一句的。中国孔子的书谁也不能说它有一句不对，永远是圣旨。从前的哲学讲绝对真理都是这样理解的：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什么伟大的人物，他一下子就能提出一个绝对真理，以后，人

们永远不要动脑子了，只要跟着他走就行了。赫鲁晓夫大概也以为他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的每一句话就是真理，都不错，不能反驳。

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绝对真理跟以前所谓的绝对真理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绝对真理，是人类对周围客观事物认识的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永远不停止的过程，这就是绝对真理。为什么这样才是绝对真理呢？因为只有这样一种认识过程才能完全反映不断发展的世界。世界是永远发展的，人的认识也应该是永远发展的。所以，只有永远发展，而且经常反映新的客观事物的这样的认识才算是绝对真理。人类有没有能力认识这个绝对真理呢？马克思主义者说，人类是有能力认识这个真理的。不过这种绝对真理的认识不是靠一两个人来认识，甚至不能靠几十、几百个人来认识，而是要靠人类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一代一代地增加认识。因为个人的认识或几十、几百个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人都是要死的，他不能永远跟着事物发展，光靠个人的认识是做不到的。但是，从整个人类来说，人类是有这种认识绝对真理的能力的。这就是绝对真理。

相对真理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有密切联系的。相对真理就是在人类认识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某一方面的认识。在整个发展过程里的某一阶段认识都是相对真理。为什么叫相对真理呢？就是说个别人的认识或一个时代的认识，都是受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的，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所以叫做相对真理。它不是无限地发展下去，不能把无限总是掌握在手里，它只能掌握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它只能认识无限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个部分、一个方面。整个人类是能够认识完全绝对真理的，但个别人就不能认识，就做不到。完全的真

理是要靠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断去认识。个别人只能认识整个绝对真理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个部分。所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两件事，而是密切联系的，相对真理不过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就是绝对真理的一个方面。所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统一的，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我们就认识了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只能认识一部分。我们的认识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的认识就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个人也只能认识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的认识既然有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认识只是相对真理。这就是说，我们也能够认识绝对真理，但我们认识的只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认识凡是正确的认识都可以说又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不过它不是完整的绝对真理，不是全部真理，是当时的相对真理，当时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那一个时期的相对真理，只是那一个时期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阶段的相对真理，也是列宁阶段的一部分绝对真理。

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这一个时期的绝对真理，也是相对真理。毛主席著作是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现代这个阶段的一部分绝对真理。因为它是一部分，所以它也带有相对性，只是反映了现代这个阶段的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就是这样。讲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无非是要我们有这样一种看法：要相信我们是能够认识绝对真理的，是能够掌握正确的认识的。民主革命阶段我们有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在当时是绝对真理，但是，又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的相对真理。这个相对真理的历史任务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路线是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现在的认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我们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因此不要满足已经得到的认识，还要不断地前进。

归根到底，讲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无非是要我们注意要努力使我们的认识经常跟着实践前进，经常从群众中去学习，然后又总结群众的经验，再拿到群众中去考验，而且经常反复地这样做，永远也不要停止，永远也不要满足于现状。故步自封，骄傲自满，任何时候都不要犯这种毛病，任何时候都要反对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毛病。否则，就是忘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就是忘记了人的认识要不断跟着实践不断前进。永远不要满足于现状，就是这意思。这个问题清楚了，《实践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容易了解了。

## 第八条，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

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首先要改造客观世界，要参加革命的实践。那么，是实践第一、还是认识第一？是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就根本来讲不能说精神第一。桌子在先还是桌子的概念在先？有时候桌子在先，有时候桌子的观念在先。归根到底是自然产生的桌子在先，没有人工加工的桌子在先。最原始时大家碰到一块石头、土堆，就围在一起，把东西放在上面，根本没有人造过桌子。这是自然的、没有人造的桌子在先。然后，前人对这种桌子的实践首先成为经验，然后这种经验再加以概括，就成为带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就能够制造一个桌子。所以，认识总是最后，实践在先。归根到底是实践在先，认识在后；物质在先，精神在后。就是首先要改造世界。

我们参加革命多年了，最初还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为了

解决生活困难的种种情况而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以后，除认识革命是什么东西，什么叫革命以外，首先是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认识世界就是改造主观世界，由不知到知。在改造世界时是不知的，后来经过实践变为知了，由不知到知，就是主观世界的改造。这时又有一个知得很少到知得比较多，知得不很正确到知得很正确的问题。这时还要解决是非问题，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所以，主观世界是这样改造的：在实践中首先是改造无知的主观世界变成有知的世界，然后进一步使知得很少变成知得很多的世界。知得很多中又有正确与不正确。所以，我们人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这种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地学习，就是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

客观世界的改造有没有止境呢？有没有尽头呢？是没有尽头的。因此，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也就没有止境的，也没有尽头的。就一个人来说，除非我们不参加革命，要参加革命就要改造客观世界到底，一直到死才算完结。就一个人来说，到生命结束的时候改造世界才算结束。同样，改造主观世界也是这个问题。个人的认识是相对的，所以，个人改造是可以有止境的，就是生命结束了就停止。除非我们不要作革命家，要革命，就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就不能有一点停止。因为我们没有第二个生命。但是，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等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就停止了，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还要继续下去，这是根本规律。当然，有人是反对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这是反动派，他们是人类的少数。人类的主流，大多数是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改造世界的看法。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是明确地提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

主观世界的结合。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只是一般地讲改造世界。《实践论》又把改造世界一分为二，分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要改造，主观世界也要改造。这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也是有的，但是没有这样集中地概括起来讲。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人类在生产中改造自己的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马克思是从生产、经济学角度讲的，但从哲学上作这样更高的概括是毛主席的贡献，这是《实践论》里面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我们整风的指导思想，成为我们全党教育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现在还只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比较充分地了解，不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都了解。现在有些左派兄弟党也能了解，也注意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的问题，也能够接受我们的整风思想。

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在《实践论》里已经开始打下了基础。为什么这几年对整风名义不好？就是对整风有误解。这是对整风运动里作的一些不恰当的方面，作了片面的理解。这个运动里是有些搞得不恰当的地方的，有一些粗暴的东西，实际上是不符合整风原则的。但这种现象被一部分同志夸大了，在主观上片面化了，因此就觉得整风好像是不好。所以，听到整风两个字就紧张。这就是在思想上没有一分为二，所以才出现这种误会。整风运动的基本精神和整风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两回事，要一分为二。能够一分为二就能够避免这种误会。所以，应当根据《实践论》里所讲的精神重新对整风做一个正确的估计。

整风运动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正确地决定的一种思想教育方法。它是教育全党、教育人民的一种非常正确的方法，一种科学的方法，

符合于人的认识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这就是关于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问题，也是毛主席思想的重要一环。

关于《实践论》就讲这些。

## 三、《矛盾论》——学习毛主席的一分为二辩证法

《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前已经讲过了，所以有些问题就不讲了。今天稍微讲一点，明天就可以讲完。

今天讲一个总的问题，是前面没有讲的。现在分几条来讲。

### 第一条，《矛盾论》如何总结了革命实践经验

《矛盾论》就是我们党成立以后16年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经验一个方面的总结。两条认识路线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也可以说是两种相反的观点、两种对立的观点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认识路线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两种思想方法的斗争。总的来说，都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两种认识论的斗争。把它分开来讲就是两种观点、两种方法，其中也有立场问题，是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的问题。立场问题主要是成为犯路线错误的人的问题。一般的同志忠心耿耿要革命，但思想上有一点片面性，有一点脱离实际，有一点经验主义，那不算是立场问题。在政治上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就是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陈独秀是资产阶级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立场，唯心主义观点，形而上学的方法问题。王明、博古三次“左”倾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后

来，到抗战初期又成了资产阶级的问题。分开来讲就是有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和方法问题。

《矛盾论》着重总结了方法上的问题，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两种方法路线问题。现在我们是用理论来说两种方法路线问题，就它的具体内容来说，就是要不要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要不要一分为二的问题，就是两条路线问题：一条正确的路线，一条错误的路线。毛主席从一开头就坚持一分为二这样一种认识路线、方法路线。另外一个方面是陈独秀、王明和博古反对一分为二。所谓反对一分为二，不一定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反对。例如，陈独秀、王明和博古写起文章来不一定否认两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和对立的名词，在他们文章里都有。他们是在关键问题上反对一分为二的。重要的错误都是发生在关键问题上反对一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根本错误。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这样的。修正主义一般地也不否认阶级和阶级矛盾的，但是，到了关键问题上他就要掩盖矛盾。所以，我们现在的斗争复杂就在这里。现在的斗争跟以前的斗争不同，以前形而上学在任何问题上都反对一分为二，但马克思主义是占了优势这方面。现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是公开的、一般地来反对辩证法，而是说自己要坚持辩证法，辩证法的假面具还要坚持，问题是在关键问题上。比如陈独秀在资产阶级问题上，就只看到资产阶级进步的方面、革命的方面，没看到资产阶级反动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不一分为二。“左”倾路线也是这样，在其他小问题上也不反对一分为二，而在关键问题上，比如在农民问题上，资产阶级问题上，就反对一分为二。陈独秀强调大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面，不分出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方面。“左”倾冒险主义只强调资产阶级的反动方面，不分出它革命的方面。关于农民问题也是这

样。陈独秀只强调农民的落后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革命的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当时对农民阶级里的富农、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跟反动派之间的区别不是一分为二，富农也反对，富裕农民也反对。

现在我们坚持辩证法的路线问题比较复杂，就是要善于在关键问题上是否是一分为二，做到这点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比如分析现在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不容易决定。修正主义要掩盖现代世界的主观矛盾——亚、非、拉的主要矛盾正在高涨。他在表面上也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但实质上他用种种诡辩的方法来取消这个矛盾。这些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毛主席一直是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的。不只是在一般问题上注意一分为二，更重要的是做到掌握一分为二的具体内容。在每一个阶段，辩证法的掌握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分不开。实践和认识的每一个反复都要对矛盾做一次重新的分析，因此，对辩证法的问题有新的发展，新的内容。实践每前进一步就出现新的特点，因此，就提出新的问题，就要做出新的总结。

《矛盾论》为什么要讲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要讲内因和外因、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些问题？为什么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著作没有讲这些问题？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结合16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来研究。这些问题都是从16年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矛盾论》不过是把16年来的革命实践一分为二地反复斗争经验作了总的分析。《矛盾论》里所提出的问题不是突然提出来的，是在16年实践中一步一步提出来的，最后才在这篇文章里作了综合，成为系统的文章。同志们自己串串历史

自己可以举几个例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大体上解决中国阶级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坚持阶级斗争的普遍真理，对中国的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最突出的是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再一个就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阶层的分析。还有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过去是封建势力，再加上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中国革命阶级的特点基本上解决以后，再分析中国各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基本上是坚持这种分析方法的。

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就出现新问题。比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那时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政治上有这样的问题：革命稍微得到一点胜利以后，我们革命在战略上是进攻还是防御的问题。如三次“左”倾路线都有这个问题。毛主席辛辛苦苦地在井冈山打了两个胜仗，上海的“左”倾指挥者看到那种胜利以后就说可以进攻了，就号召全国大罢工，进攻大城市。因此，在同“左”倾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要提出一分为二这个问题，既要看到主要方面，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只要在农村里打了两个胜仗，那么主要方面是在革命方面，因此，就采取进攻的手段。从李立三到王明、博古都是这样。王明、博古反对李立三，但他们比李立三的片面性更厉害，问题搞得更糟。所以这时候，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新的具体特点，要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能一般地了解谁是敌人，而要了解敌人和我们谁占主要方面，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谁占主要方面。当时，在大城市里敌人是统治者，敌人明明是支配者，是主要方面，但“左”倾冒险主义者却在大城市搞进攻，不采取积蓄力量和防御的战略，不采取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配合、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相配合的这种灵活战术，而一味搞公开斗争，搞公开反对斗争。在

这时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的政治斗争提出了主要方面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规定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这在《矛盾论》里讲得很清楚。

再进一步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即“九·一八”敌人打进来了。这时候跟“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斗争就提出一个主要矛盾的问题，要不要解决主要矛盾的问题。还有，在党内斗争中有一个肃反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提出了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实践要求党提出这些新问题，这种新问题是以前别的国家在比较简单的革命斗争中提不出来的。由于我们中国有这样复杂的斗争情况，就提出这些新问题。所以，到了1937年毛主席写《矛盾论》时，就总结了正确与错误经过一个实践过程都得到了证明，然后再把实践变成认识，把物质变成精神，得出这个结论。因此，《矛盾论》就包含这几章。

同一性和斗争性也是在跟“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要不要又联合又斗争，或者是只联合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联合的问题，都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然后经过几次实践和认识的反复，最后在1937年完成了这个认识。所以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正确认识的完成，但是，完成并不等于认识最后结束，后来是有发展的。《矛盾论》的特点就是这样，他是把实践经验加以总结而成的一本著作。

## 第二条，关于如何理解一分为二的问题

是不是一分为二是惟一的方法，可不可以一分为三？因为有同志讲我们分析问题总是要分两头和中间；左、右和中间，这不是一分为三么？现在，我可以简单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分为二还是一分为三？中间的东西还是要一分为二的，归根到底还是一分为二，不是一分为三。一分为二就是先分成两个极端，除两个极端之外还要注意中间的东西，中间的东西再一分为二。因为中间的东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是左、右摇摆的，中间派就是左、右摇摆的。要看它怎样摇摆，要看斗争的情况，“左”派坚决，它就动摇到左边；如果“左”派不坚决，中间派就要动摇到右派方面去。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跟我们斗争的，他要争取中间力量。修正主义也是争取中间力量。我们的办法就是坚持我们的路线，表示坚定的态度，中间力量就会摇摆过来。

这次亚非筹备会议不是证明了吗？陈毅副总理坚持不要苏联进来，原来中间想动摇、想推到亚非外长会议去解决，那样的结果不就等于承认苏联可以进来吗？由于陈副总理坚持主张不让苏联进来，这样中间力量就过来了。中间力量是不坚定的，如果陈毅副总理也不坚决，如果会议始终是苏班德里约掌握，苏联修正主义就胜利了，中间力量就动摇到那里去了，实际上苏班德里约是中间派，他也抵抗不了修正主义的压力。

所以，一分为二就够了。

一分为二就是辩证法，如果把一分为二换成一分为三，又降低了一分为二，又把原来可以一分为二的东西变成了独立的东西，又把二合为一了。我们反对“合二为一”，而坚持一分为二。因为中间派总是想把它调和起来，但是矛盾是不能调和的，而要暴露矛盾，揭露矛盾，经过斗争解决矛盾。一分为三实际上是一分为二的一部分。所以，要坚持一分为二。我们要把一分为二坚持到底，这就是辩证法的方法。

# 第三次讲课

(1964.5.27)

今天接着讲《矛盾论》部分。《矛盾论》部分有些问题以前已经讲过了，昨天也联系历史讲了一点，所以，联系历史这一部分可以不必多讲。今天只着重讲一下大家提的问题和与当前有关的问题。

现在继续讲第二条关于如何理解一分为二的问题。

在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里，实际斗争里，运用一分为二辩证法主要抓一些什么问题？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昨天已经讲了，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就是一分为二的方法。一分为二的方法的提法，开始是在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里面谈到的，这就是统一物一分为二的问题，列宁当时是作为一般真理讲的。最近，毛主席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通俗的普遍应用的方法提出来，作为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方法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分为二，使得辩证法的方法能够很通俗、但又很深刻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联系实际上，用这样的表达方法更有深刻的意义。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里就是不容易坚持一分为二。就我们这些年来说，我看在认识上所发生的毛病，在方法上恐怕都是由于对一分为二的方法搞不清楚。在一些大问题上，不能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忘记一分为二的方法，认识就出毛病。

对社会问题来说，对我们的实践的问题来说，一分为二首先是阶级问题。在阶级问题上要一分为二。我们多年来，恐怕从民主革命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出的大问题，带路线性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来，都是对阶级问题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从陈独秀起一直到我们这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我们仔细想一想，很大的路线问题，在方法上都是关系到在阶级观点上不能掌握一分为二的方法。政治路线问题本身就是阶级问题。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一开头就讲分清敌我，就是分析阶级的问题，通过分析阶级来分清敌我友。所谓政治路线无非就是阶级斗争的路线，就是分清敌我友的问题。陈独秀搞不清敌我友，王明、博古搞不清敌我友，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有好几次。

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阶级分析。这里面有右的、有“左”的。右的错误是忘记了跟资产阶级的界线。“左”的原因之一是把工人和农民的界线分不清楚，在农民中间想贯彻工人的要求。1958年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讲过：农民还是农民。那时候我们有些人忘记了这点。有时候，甚至有人认为农民比工人还先进。究竟是工人领导农民，还是农民就等于工人呢？这个问题弄不清楚。这是路线上的问题，根据这一点可以把从陈独秀以来所有关于路线性的问题串起来。

其次，是在形势问题上不能一分为二。刚才我们是讲在历史上对大的问题不能一分为二，因而发生毛病。首先是在阶级问题上不能一分为二，其次就是在形势问题上，不善于一分为二。

形势问题不能一分为二，这个问题也讲过。就是在顺利的时候不能一分为二，不能找到和警惕可能发生的困难；在黑暗的时候，对困难不能一分为二，对坏事不能一分为二。出现一些困难就以为不得了，看不到出路，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惊慌失措。修正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坏的，但是修正主义是我们的反面教员。这个问题的一分为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这个问题

也可以串我们的历史：顺利的时候就盲目乐观，困难的时候又悲观失望。这都是盲目的，头脑不清醒。这也是常常在关键问题上、在关键时期发生错误的原因。

第三，就是对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不能一分为二。看到成绩就以为一切都好了，抓住人家的缺点就以为一切都不好了。这是我们的内部，讲我们自己的工作。不是讲形势、阶级斗争，不是讲敌我问题，是讲人民内部的问题，对待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不能一分为二，这是历来都有的。对待人的错误，批评起来就是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要讲成绩就生怕讲缺点，只愿意讲自己是正确的，不愿意讲自己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面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最后一段就是讲要划清两种界线：革命还是反革命，正确还是错误，成绩还是缺点。毛主席始终坚持这种一分为二的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早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讲到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这个问题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缺点，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一个根本的估计。如果他的成绩是七分，错误是三分；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错了。

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毛主席还是坚持。最近，在我们的工作上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在这个问题上也提出了一分为二的方法。在进行一般的工作、发展生产的问题上，要一分为二。现在开展的比学赶帮运动，就是以一分为二的思想作基础。如果不能在成绩和缺点、错误和正确方面一分为二，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比的了。如果自己以为都是成绩了，那么就和别人没有什么可比

的了，就自满自足了。就是因为有成绩也有缺点、有正确也有错误，所以才能比。一方面和别人比，另一方面自己也要比。首先是把自己的内部比一比，把自己的成绩和缺点比一比，是三分还是七分，把自己分析一下，分析以后再跟别人比。不比就没有办法学，没有一个比较，你学什么呢？那也就无所谓赶，无所谓帮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应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在我们一切工作中间最大的是这三个问题，也还有其他问题。阶级方面一分为二，不但不同阶级要一分为二，同一个阶级也要一分为二。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一分为二，一个是农民的一分为二。我们无产阶级也要一分为二，无产阶级也有先进和落后。党也是这种情形，党内也有一分为二的问题。

阶级一分为二、形势一分为二，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一分为二。这三个问题恐怕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这是我们整个历史上一直到现在比较普遍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这几个方面是对我们的工作到处都有影响的，所以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是不是着重在这三个方面来坚持。

## 第三条，关于如何进行一分为二的问题

有人说，有些问题好像不好一分为二。比如：最反动的人物怎样一分为二？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好解答。毛主席就经常对最反动的人物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最显著的就是讲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这就是一分为二。如果希望对帝国主义像对我们自己一样来分，就不可能。我们自己内部一分为二，一般是这样分，就是我们有先进思想，也有一些落后的思想；有一部分人比较先进，有一部分人比较落后。就一个同志来说，既有无产

阶级思想，也往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先进的方面，也有落后影响的方面。这样一个两分法，如果用到反动派当然用不上了。

有人说有些事难分，我想就是因为又把一分为二公式化了。以为一分为二，就是分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反动派是不是也有成绩和缺点呢？拿这个死的公式到处去用，就用不通了。把辩证法当成一个现成的公式，变成万金油，那就搞不通了。你说它包医百病，实际上有许多病就医不了。所以这里就有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一分为二要针对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形用不同的分法。对不同的对象就有不同的分法，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分。不能主观上决定一个公式，就按照这个公式去分。一分为二仅仅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普遍的方向，这叫矛盾的普遍性。

到处都是一分为二，但是，在分到反动派头上就不能用在我们自己内部的方法来分了。对帝国主义只能这样分：它又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在战略上是纸老虎，在战术上又可能是真老虎。并且对帝国主义的分法也不只是这一方面，毛主席单单就纸老虎问题就有两种分法。毛主席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这样讲：“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政权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9页）后来它的统治要没落了，那时候它才变成纸老虎。所以，对于统治的剥削阶级，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战略、战术的分法以外，还有一个历史的分法。它上台前后和它没落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尽管它是剥削阶级，它在初上台的时候是真老虎，它是有真正作为的。等到它的政权要垮了的时候，就没有作为了，就成纸老虎了。可是这个纸老虎在战术上可能还是真老虎。

这又是一分为二。所以在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上，有两种分法：历史分法和战略、战术的分法，就是纵的分法和横的分法。

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分法呢?因为对象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分了，不是我们主观上分的。毛主席这种主观上的分法，无非是经过调查研究把它的历史调查了，现状也调查了，然后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把它的情况如实反映到脑子里来。所以，两分法实际上是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反映，并不是主观上有那么一个公式，把反映的对象人为地分成两部分，而是按照事物的特殊情况正确地反映事物自己的对立面。

又比如说，帝国主义有两手，这也是一分为二。帝国主义是反动的，但是它的反动有两手：有暴力的一手；有和平的一手。这两手对蒋介石也适用。蒋介石从前对中国人民也有两手：暴力的一手；欺骗的一手。公开压迫的一手，笑脸欺骗人民的一手。同一个对象，它有各方面的对立面，所以你可以从各方面来一分为二。蒋介石对人民有欺骗和暴力的两手，对美帝国主义也有两手，又依靠美帝国主义，又和美帝国主义有矛盾。每一个走狗都有这样的特点。吴庭艳、朴正熙都是这样，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又跟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有矛盾。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联蒋反美的。金门打炮就有这样的意义。隔日打炮，打一下拉一下。结果炮是打在美帝国主义身上。打炮单日双日分开，这也是一分为二。这样做，符合情况，符合需要。

所以，既要坚持一分为二，又要能够实事求是地注意事物特殊的性质。如果能够经常注意这样做，我们对待工作，对待斗争，就能够很好地处理问题。

就是对最反动的人也可以一分为二，不过只是分法和对革命

人民的分法不同。

修正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坏蛋、是反动的、反革命的，但是他又是反面教员。这也是一分为二。

我们党是最幸福的。毛主席把辩证法用到了最高的程度，处处应用，时时应用。这给我们很大教育，很多问题过去想不通，今天一分，就想通了。坏事可以变好事，从前谁敢这么想！反动派可以作反面教员，从前谁敢这么想！经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讲，我们就清楚了。

地主阶级要打倒，但要一个不杀，这也是一分为二。对地主和他的子女一分为二，对他的子女家属又要一分为二。对于被打倒了的地主又要限制他们，又要改造他们。要消灭他，但又不杀他。我们对剥削者采取改造的办法，这也是一分为二。剥削者是人民的敌人；但是在我们的政权下，剥削者又可以改造为一个劳动者。在他们统治的时代，他们不是劳动者。我们把他们打倒以后，在我们的统治下，一方面把他们看做剥削者，另一方面也要把他们改造成劳动者。

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最好的东西可以一分为二，因为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不是就好到尽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因为任何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既是普遍真理，又是具体实践。列宁在列宁的时代，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没有人能超过他。但是，列宁还是受到了限制，列宁的许多思想还要毛主席来发展。列宁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但并不是尽头，这也是一分为二。最好的东西可以一分为二，最坏的东西也可以一分为二。

总之，一分为二这是最普遍的宇宙规律，也是最普遍的方法。

不能有任何例外。如果有例外，那就是我们主观上没有很好地理解，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有什么例外。这个问题要很好地、深刻地理解。不管什么样的客观事物都包含各不相同的方面，没有任何事物不由许多不同的方面组成。它的不同方面就是它的内部差异，差异就是矛盾。

一张纸也有两面，两面就是矛盾。我们用纸的时候总是用正面，不去用反面。而正面和反面又是互相排斥的作用。任何东西，它有它的各方面，它的各个方面都是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面。身体上有左手和右手、左腿和右腿、左眼和右眼。鼻子虽然是一个，但是有两个孔。它们都是一组一组的对立面，都是对称的。你找不到没有对称的东西，找不到没有对立面组成的东西。所以不要以为任何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矛盾。一件事情它有许多方面，许多组矛盾。不过有些矛盾不重要，有些矛盾重要。

我们处理人的问题，主要抓思想问题，不是抓两只眼睛、一只鼻子的问题。在工作中、行动中，最主要的矛盾是思想问题。有些不主要的矛盾，可以撇开不管，在日常生活里自己就可以解决了，没有什么大妨碍。在行动中，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矛盾，我们必须抓住。

列宁讲过，每一个事物都有许多方面、许多联系。这种说法是不是和对立统一规律有点不一致了？好像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好多方面。

对列宁这句话不能这样理解。列宁讲的是一个事物的内部有许多矛盾、有许多联系。人类有生理的矛盾，有社会的矛盾；要吃饭，就和饭有矛盾；要呼吸空气，就和空气有矛盾。但是人的生活主要是社会生活，主要是人和人的矛盾。有各个方面的矛盾，要研究各个方面的矛盾。生理学家要研究人和周围自然界的矛盾。

因此，矛盾是有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每一个个体内部的各个方面互相发生的矛盾，和外部发生的联系，又有外部的矛盾。所以研究这个矛盾要有全面性。凡是起作用的、重要的矛盾都要作全面的研究。我们讲要全面分析矛盾，不是指对每一件事情的所有矛盾都研究，而是对起主要作用的矛盾作全面的研究。

刚才我们讲的三类大矛盾，从历史到现在，对阶级和形势、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这些矛盾随时都要注意。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研究了中日的民族矛盾以及中国和日本战争与地理条件的矛盾，研究了这些矛盾之后，还要研究国际关系的矛盾。内部矛盾就是进步与反动的矛盾。我们是真正进步的正义战争，日本是反动的战争。其他的地理条件，如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这是说自然条件的矛盾关系。还有国际关系。我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日本就要逐渐孤立。这里研究了内外部矛盾。一分为二要做具体的分析，不是只分析一组矛盾，而是以一组矛盾为中心，它的主要联系也要研究。中日两国谁进步、谁反动的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地理条件、国际环境。这是外部联系。内部条件加外部联系，凡是起重要作用的都加以研究，这样把事情的规律就弄清楚了。

规律是什么东西?规律就是矛盾斗争的结果。矛盾的情况、斗争的情况，又决定了事情发展的基本过程，这种基本过程就是规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三个阶段，这是规律。这个规律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敌人是反动的，我们是进步的；敌小我大；敌人是会孤立的，我们是会得到援助，从这样一些矛盾的研究和综合得来的。矛盾弄清楚了，根据矛盾的斗争情况，就可以预见到事情是怎么样发展的，那是必然的。矛盾的情况不同，它的发展结果就不同。对立方面的力量对比、力量消长过程不同，事

情的发展也会不同。敌我力量的对比会有变化，开始敌大我小，敌强我弱；以后会变成敌小我大，敌弱我强。这些就是经过了对矛盾的比较具体的分析，对主要起作用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得到的结果。

我们现在讲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是因为帝国主义同我们的力量对比，在现在总的说来是人民占优势；另外一方面，帝国主义它是要没落的。现在它比较强大，但是它越来越没落。这种矛盾情况综合起来，可以肯定战略上帝国主义要垮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最后消灭，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规律。这规律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对敌人和人民两方面矛盾的具体情况分析的结果。掌握了矛盾，就能够掌握事情的本质，掌握事情的规律。

一般的事物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既要研究内部矛盾，也要研究外部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是相对的、有联系的。外部联系就是外部矛盾。在小的范围看来是外部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内看来又是内部矛盾。例如，一个国家讲国际关系，是外部联系、外部矛盾；但就整个世界讲，国际关系是世界内部的关系。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是相对的。但是，内部矛盾对发展起根本性的作用，外部的矛盾对发展起次要的决定作用。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这个原则也是毛主席在《矛盾论》里的一个贡献。

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外部矛盾能不能起决定作用？是不是只有内部矛盾才起决定作用？

我看这问题可以这样答复。这里面没有什么内外哪一方面不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外部矛盾也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有条件就起决定作用，不然就不叫条件。还有，我们经常这样讲，事物的发

展决定于什么条件，条件就是一种原因，原因对结果总是起决定作用的。相信原因能产生结果，这种思想叫做决定论。相信因果关系的，相信科学上肯定的因果关系，叫因果论。所以说，凡是原因对结果都起决定作用。外因既然是原因，也起决定作用，和内因一样，内因也是原因，也起决定作用。所以，问题不是哪一方面起决定作用和不起决定作用的问题，问题是内因起什么样的决定作用，外因起什么样的决定作用。《矛盾论》里没有讲外因就不起决定作用，《矛盾论》里只是说，内因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外因也不是说就不起任何决定作用。不过，外因不能起主要决定作用，最根本的决定作用是内因。

所以，要研究事物的发展，首先要把内部矛盾研究清楚。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首先把内部的阶级矛盾认清楚。中日战争，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断定中国人民一定胜利？胜利的根据在什么地方？《论持久战》里讲我们胜利的根据是：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反动派、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首先是一国内部，它是进步的。内部运动的斗争里，进步的力量占优势，进步的力量占主导。所以，它就成为我们最后胜利的根据。

这就是说，内因是第一位的，最根本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这些原因在一定的范围内起决定作用。所谓一定范围内，就是说，它不能对事物根本发展方向起决定作用，而只能对事物发展的快慢、速度、规模起决定作用。事物或事情最后得到什么结果，不决定于外因，而决定于内因。

分析事物各种内外矛盾的时候，要着重抓内部矛盾、着重抓内因。关于这个问题，附带着简单地解释一个具体问题。

有人问：为什么教条主义是“五四”运动的反动？这种现象在哲学上、在实践上怎样解释？

这解释还是很简单，就是把“五四”运动一分为二。“五四”运动是一个进步的运动，但是这个进步运动有它反面的东西。“五四”运动本来想打破封建的教条，根据中国的情况了解中国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在打破封建教条，学习西方，也学习苏联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教条。它一方面是前进的运动，但前进运动中又有落后的方面。这前进和落后两个方面，反映了“五四”运动本身有阶级斗争。同样是反封建，但有资产阶级反封建，有无产阶级反封建；有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封建，有胡适为代表的反封建，这是一分为二。同样是反封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还有一个是胡适，这里面又有一分为二。胡适带来了洋教条，陈独秀开始带来了我们的新的教条主义。陈独秀还说不上是完全的教条主义，但是有一些学托洛茨基。学托洛茨基是教条主义。许多问题都是一分为二可以解决的。

思维与存在也是对立的统一。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的，因为思维经常脱离存在。我们说它是对立的统一，就是说思维能够反映存在。但是，这个反映是有条件的。要参加实践，而且要参加革命的实践，要在实践当中进行调查研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说明一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这个问题，有时候说道理越说越不通，这问题是相当普遍的、常常有的，这个问题不如简单地说一下容易了解。

最简单的说法是这样：因为它是对立面，对立面当然都是互相排斥的。既然叫对立面就互相排斥，不然怎么叫对立面呢？所以对立面互相排斥是无条件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对立的东西，本性就互相对立。所以，它的相互排斥的作用，是没有什么条件的，是绝对的。既然对立面是互相排斥，要把它们联系起来，没有条件当然不行。没有条件怎么能联系起来呢？这就是统一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利益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是没有条件的。资产阶级要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这个对立是没有条件的。那么这两个阶级既然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要联系起来非有一定的条件不可。条件有各种各样，历史上的条件也是这样。资产阶级要掌握暴力，掌握国家政权来压制工人阶级，要在这种条件下他才能在一个社会里联系起来。资产阶级如果没有暴力作保证，它的统治就保持不了，统治也就维持不下去了。那么无产阶级怎么能够和它在一个社会里存在呢？这是有条件的。既然是有条件的，所以也是暂时的，这种条件能够维持也是暂时的。这个条件如果消失，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我们国家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性，是在另外一种条件下的另外一种统一性。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这样就有统一性。它不接受改造就没有统一性。如果资产阶级坚持不接受改造，就要被消灭，就要被镇压。根据事物的本性，根据逻辑，自然可以得到这一点。

事物的本性就是对立的，就是斗争。所谓斗争就是互相排斥。所以，互相对立、互相排斥这是无条件的。这种对立的东西要互相联系起来，总要有一定的条件。要使对立面联系起来，就要有一定的条件。发展主要是靠斗争。有时候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把某种对立面联系起来。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联合资产阶级，需要这种统一性。为了斗争，需要统一性。为了斗争既然需要这样统一性，那么就要寻找建立统一性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有一个适当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要保证我们的领导地位和独立地位，不去投降敌人，投降就不是联合了；又要保证资产阶级能够接受，使资产阶级也觉得它的利益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还要加上为了坚

持这个政策，跟资产阶级进行某些必要的内部的斗争。要用适当的斗争方法，不是对抗性的，又能够保证我们的领导，又能保证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政策。为了加强坚持这个政策进行斗争。这种条件找到了，统一战线就找到了，对立的联系能够找到，对立的统一性就可以找到了。有了这种统一性，就可以帮助我们壮大力量，进行斗争。有许多对立面是我们需要它联系起来，需要它有正确的、鲜明的统一性。这些统一性都是有条件的。

比如工业和农业。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工业和农业并举。使工业和农业能够很好地保持统一性。为了使工业和农业能够保持统一性，我们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来摸索这个条件。斯大林曾经摸索了一下，没有摸准。摸到一个叫做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是片面的。现在赫鲁晓夫也很想着重发展农业，反把工业削弱了。毛主席在 1953 年提出工农业并举。这个并举提出了一个原则，要使这两个力量很好地联系起来。但是，那时候究竟怎样联系还是摸不清楚。所以，从 1953 年以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是搞得不很好，总是工业和农业有些矛盾，或是太偏重农业，或是太偏重工业。恐怕前几年主要还是太偏重工业了，恐怕是有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太偏重工业就使得工业和农业的统一性不能很好地掌握和建立起来。这就是说，没有找到这个好的条件。为了找这个条件，从 1953 年毛主席提出并举的原则起，经过很多实践和认识的反复，到 1959 年，毛主席才开始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毛主席这个思想实际上很早就有了，但是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好像是在 1959 年（是不是？我记错了，大家可以纠正）。然后，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个原则找到了，然后按照这个原则在许多工作上努力再调整。这样，我们就能够基本上把工农业的对立统一规律掌握了。

世界上的矛盾有两类：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一类是要把矛盾的一个方面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比如说，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这种矛盾，是要把反革命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把错误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这种对立面是不能两立的，互相排斥的。这类矛盾多半是指新生和腐朽，这是一类性质的矛盾。

还有一类矛盾，它是前进道路上，前进事物中的相互关系。比如：工业和农业是我们社会主义进步事业内部的两个部分，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都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是，仍有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类矛盾的解决不是消灭一个方面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要使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结合是有条件的。

比如，领导和群众。首先要有一个条件，就是领导没有官僚主义。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够结合。而官僚主义很容易产生，因此矛盾经常出现，互相排斥也是经常有的。要建立统一性就必须很好地把这个联系建立起来，就要经常地努力把这个条件掌握起来。工业和农业就需要掌握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原则。在思想上要常有这个原则，还要在实践上采取具体办法能够贯彻这个原则，然后才能够很好地建立起来联系。就是建立起来了这种联系以后，也不是说能够绝对一劳永逸的，建立以后又会脱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时候领导和群众结合，问题解决了。过一个时候，可能领导又犯了官僚主义，或者群众里有极端民主，就又会脱离。任何一种矛盾，它的对立面要变成统一性，都是有条件的。

关于《矛盾论》的问题，我想就讲这些问题了。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略谈毛泽东对量变质变规律的贡献*

(1964.6)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又叫质量互变规律。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和质是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和转化，所以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化，也是最普遍的具体表现。量和质是最普遍的对立统一，普遍到任何事物里面都有，因为这两个对立性很普遍，人们用两个概念把它概括起来，一个是量的概念，一个是质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概括了宇宙万物最普遍的两个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之间有联系，有斗争，又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这两个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同时存在，同时又互相转化。

这些基本原理不讲了。根据大家的要求，在这里讲一讲毛主席著作里对这个问题有哪些主要的发展以及有哪些新东西，就我所了解的谈一谈。

---

* 这是艾思奇在1964年6月15日给中央高级党校“59班”、“60班”哲学专业所作的问题解答的一部分，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集中，所以单独抽出来独立成篇。这次问题解答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问题”已和另一次问题解答中相同的内容，合并整理成篇。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部分的问题解答，也已与另一稿合并。这个稿子是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未增加任何内容。大小标题是整理时所加。

## 一、发挥了事物多方面的量和质的原理

毛主席着重发挥了对于每个事物的量和质的分析，要注意到多方面，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多方面的质和多方面的量，不是一种事物只有一个质，一个量，量和质是多方面的。

这个思想在恩格斯著作里就有一点初步的说明了。我们学的《自然辩证法》里面就讲了这个问题。在马克思著作里讲了一事物有多方面的质，都肯定了，但在哲学上直接讲这个问题的只有《自然辩证法》。自然界里的一个事物有多方面的质，一种东西有化学的质，有物理的质。从前常常有人搞不清这个问题。比如水变成气，能不能算量变质？因为水变成气以后还是氢二氧一，化学成分没有变，怎么能说质变了呢？就是因为不了解水变成气以后，化学质没有变，但物理的质变了。

毛主席著作告诉我们，要分析多方面的量和质。在毛主席的著作里，直接提到这个问题的首先是《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里讲到三个阶段时，有这么一段话，我们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里第一个阶段是敌我力量的变化。毛主席说："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467页）他指出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中，我们这一方面是一个退却阶段。在这阶段我们要损失一些东西，但也要增加一些东西。毛主席将它归结为旧的量和质与新的量和质。我们旧的量和质要损失，就是说有些旧军队要瓦解很多（在数量上瓦解很多）。因此，旧的质也随着量的瓦解也损失很多，向下了；而新的量和质却要向上，我们人民方面，由于敌人的进攻，又加上有好的领导，数量不增加，而质有了提高，因为经过锻炼，人们的觉悟提高了，觉

悟的人民更多了。整个抗日战争中间首先可以分成两方面的量和质，旧的质和新的质，有旧的量和新的量。第一阶段主要是量的下降，生产受到削弱，土地也削弱了，人民遭受的压迫也更大一些，军队人的数量也减少了。这是量的下降，但旧的质也要下降。新的质在第一阶段上涨了，主要是质的上涨，新的量的上涨在后一阶段。所以，《论持久战》在量变质变问题上有新的发展，并要求我们分析旧的质和量及新的质和量，一个事物都有这两方面的质和量。

这个原则不仅可以运用在抗日战争上，也可以用在其他问题上。是不是对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说，在多方面的量和质中间至少有新的质和量、旧的质和量的区别。拿来运用到个人身上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多少？我们马克思主义进步的质和量有多少？处于什么地位？我们落后的思想又有多少？处于什么地位？或者是新的质和新的量有多少？处于什么地位的？我们落后的思想有多少，也就是旧的质有多少。我们每处理一个问题至少可以分成两个质和量。所以，《论持久战》中的这个思想，虽然是对战争的分析，但是也发展了量和质的普遍规律。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到毛主席关于量和质的辩证规律的新发挥。这是很明显的发挥。虽然不是直接的哲学著作，但是有哲学理论。

## 二、提出了部分质变的原理

在今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特别提到总的质变和部分的质变的问题，要注意到一个事物有总的质变和部分的质变。质变不仅仅是总的质变，还可以有部分的质变，这个变化也必须要经过量的积累才能转化。这个原理是十分重要的。

这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解决,有很重要的意义。

以前,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也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还要经过多次质变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并不是经过一个合作化运动、农民集体化过程就算完成了,以后就是一个纯粹建设的过程、纯粹的建设问题了。而且这一个建设问题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前是有这样的看法。斯大林特别提出逐渐过渡的思想。这样就把量变和质变搞混起来了。

斯大林的“语言学问题”中讲的思想,我们还没有听到毛主席明确肯定还有一种逐渐过渡的质变,但是也没有反驳。比如,语言的变化是逐渐的过渡,你要反驳还要作些研究。文字的变化,可以肯定是有突变的。比如,我们中国的文言文变为白话文,是“五四”运动时突变的。这个突变以前,就有渐变,以前就早有白话文了,《水浒传》是用白话文写的。但是,以前的白话文是被统治的。《水浒传》、《金瓶梅》各种各样的小说,都被看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些大胆的思想家,如金圣叹就称赞这种作品,敢于把它列为才子书,跟司马迁的《史记》摆到一起。但毕竟这个新的质、新的量是处在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到“五四”运动才是一个翻身,白话文才变成统治地位。白话文的统治,也还是我们解放以后,才真正形成。因为“五四”运动以后,解放以前政府使用的文字,实质上还是文言文。解放后我们政府的文字才用白话文,白话文才成为一种普遍的工具,而且成为统治的、使用的文字。语言本身的变化,它在什么时候突变,就难说了。它有一点道理,总结这一点道理就把它引申。所以,研究一些变化也是逐渐过渡,这也有问题。

斯大林在晚年时调查研究不够，虽然他主观上是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调查研究不够，所以有些问题看得比较简单，比较片面。还是毛主席这样解决非常准确。因为有总的质变，又有部分的质变。比如说，我们的过渡时期，由第一个过渡到第二个过渡可以说是总的质变。由三种经济成分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单一的经济成分，这是总的质变。这个总的质变里面是由许多部分的质变构成的。比如合作化，它由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就是由一部分一部分的质变构成了一个总的质变。

所以，提出这种部分质变原则，就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复杂的问题，使我们解决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比民主革命复杂得多。从前我们有点教条主义观点，以为三大改造完成了好像是万事大吉了。这就是受苏联的影响，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认为三大改造完成了就是社会主义完成了。脑子里没有问题了，以为无论如何比以前简单一点。实际上一搞，复杂得很，比以前更复杂，斗争更隐蔽，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分清楚就相当费劲。有时候敌我矛盾看起来是人民内部矛盾；有时候人民内部矛盾看起来好像是敌我矛盾。革命和建设的问题，还相当复杂，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前进。所以，这一点意义很大。

毛主席关于分析质和量要从多方面来分析的原理和部分质变的原理，是概括了我们的全部革命经验，包括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后，提出来的非常重要的思想。这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这个问题值得很好地研究。我们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以后，还要更进一步地、深刻地了解这个问题。

## 三、发展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

跟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联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证法上是量和质的互相转化规律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以前提出过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是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来的，就是革命得到胜利以后要不停顿地继续革命，不要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他那时已经有了这个思想。法兰西革命是民主革命，他的思想就是无产阶级参加的民主革命，接着就要准备把革命进一步发展，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这个思想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进一步发挥了。后来，托洛茨基把这个不断革命论作了曲解，把不断革命论解释成全世界同时革命。所以，不断革命论从托洛茨基曲解以后名誉就不好了，以后就不敢讲不断革命了。我们一讲这个原理，有些人就怀疑是不是跟托洛茨基的思想一样。实际上跟托洛茨基的思想一点也没有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不断革命的辩证法，在根本上就是量变和质变的规律。宇宙的发展总是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革命变化发展的，一次又一次的质变发展的，宇宙发展不只是渐变过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的质的飞跃的过程，这个飞跃就是革命的新的质的变化。狭义地说，革命就是政治革命。修正主义就是想把革命这两个字解释得很狭窄：解释成政治上夺取政权，解释成暴力革命。我们不这样解释，我们把暴力革命看做是革命性质变化的一种形式。但是，革命性质的变化不是只有这一种形式，一切质的飞跃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变化，这是根本的改变，根本的变化。根本性质的变化都是带有

革命的意义。

宇宙的发展，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质变构成的，而在两个质变中间有一个量变的间隔，这量变的间隔只是一种质变的准备。所以，一次质变以后就要准备第二次质变。两次质变都是不能混淆的。两次质变有一定的间隙。所以革命是有阶段的，不能把两次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这样做，不可能同时进行两次革命的变化，同时两次总的革命的变化、根本的革命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要把这两次革命的变化看成是没有联系的。第一次的革命变化为第二次的革命变化作了准备。这个准备可以长也可以短，但是必须有这个准备。

量的变化过程是相对稳定的过程。相对稳定实际上是再一次质变的准备，再一次革命的准备。在没有马克思主义以前，这两种质变之间的衔接是自发的发展。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以后，不是老是封建社会，发展几百年、上千年，而是自发地准备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革命以后也就会停顿了。革命的阶级也就不革命了。以后又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自发地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情况下就不同了。无产阶级参加了民主革命，就要把这种自发的过程变为无产阶级自觉地加以指导，促进这种发展过程。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来促进这个过程。

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都有主观能动性。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行动有目的、有计划。任何人都有这种能动性，但是这种能动性并不妨碍以前社会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尽管当时在行动上有它一定的能动性，可是它对客观规律并没有一个认识，它对资本主义规律没有认识，对资产阶级观点没有认识。所以，它的能动性就表现在眼前利益上。他们没有远大的眼光，因此不能

指导长期的革命，不能够高度的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他的行动整个是自发的、盲目的。归根到底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而不能掌握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者就要把这种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后，产生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克服行动的盲目性。资产阶级尽管有主观能动性，但是行动也是盲目的。他的市场是盲目的，生产是盲目的，他们的眼睛只看到眼前很近的一点，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首先是这个特点，只看到眼前的一点点利益。不能够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发挥到能够克服盲目性，发挥到能够自觉地用客观规律来指导长远的行动，它只能应付眼前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就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一个新的质的程度，就是克服盲目性，自觉地掌握客观规律，主动地长期地指导我们的远大行动。

能动性和主动性还不同，在《论持久战》里讲得很清楚。有能动性并不等于有主动性。有点理论、有点计划，并不等于自觉地掌握了规律，主动地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主动地用客观规律指导长远的行动。要把能动性发挥到主动性就要掌握客观规律，用这种规律指导我们的工作、行动，指导相当长久的活动。我们所谓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要这样发挥，不是像有些人那样盲目地硬干，即使你以为发挥了，实际上没有发挥。因为被动是要碰钉子，要受挫折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建立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把我们的革命理想、革命目的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认识了客观规律，经过调查研究，总结了这个规律，然后做出指导我们行动的计划和办法来。这样行动就主动了，避免了盲目性。那么，我们打仗就有胜利的把握，就可以使我们在战争中掌握主动，而使敌人处于被动。这样就有胜利的把握，即使不胜利也不会吃大亏。有时认识了客观规律，但对坏处想的不够也会吃点亏，但

不会吃大亏。所以有了正确的认识也可能失败，但是失败不会吃大亏。这个问题因为有人提出来，所以讲一讲。

上面讲的就是量变质变规律，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就要我们在量变和质变这个问题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指导革命，所谓把量变质变规律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总的来说就是要我们认识到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联系。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是提到不断革命论，没有把革命发展阶段论补充上去。毛主席的提法就更进一步，更全面地体现了这个规律。一方面我们不要混淆了两个阶段的质变；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在一次质变以后，接着就要继续准备第二次质变。民主革命胜利后就要立刻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第一个过渡，完成以后接着就要搞第二个步骤，准备进行第二个过渡，不要使革命中断，不要使革命运动中断。但也不是一次革命，以后没有一点量变的间隙。没有一点准备也不会有第二次革命。这就是量变质变规律，应用到不断革命问题上也是一种发展。在最近几年，不断革命论的内容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发展。

除了一次又一次的质变之间的联系外，还有一个是总的质变和部分的质变的联系。在一次总的质变以后，它要准备第二次质变，但是准备第二次质变并不等于第一次质变完成。在为第二次质变作准备的量变过程中，还要经常作新的部分的革命、部分的质变。所以，不仅仅是在一次革命以后接着就要主动地准备第二次革命，而且在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过程中同时进行部分的革命，进行部分的质变。这种思想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里是没有的。把质变和量变规律发挥的这样全面、具体，这是毛主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积一百多年来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积 40

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这是经过好多年才总结出来的。经过惨痛的失败，经过出现赫鲁晓夫这样惨痛的失败，才得到这样宝贵的经验，不是轻易得来的。辩证法不是轻易就发展的，但是得到这些新的发展，有了这些新的理解，反过来对我们分析问题，对我们的实践有了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可避免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因为我们有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作指导，我们现在在搞部分质变，不断革命。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思想，那么指导我们的工作就非常主动了。斯大林不了解这个思想，就是被动的。斯大林从 1932 年写《胜利冲昏头脑》文章的时候，恐怕就开始被动了。因为《胜利冲昏头脑》里说集体化出现了一点毛病，就沉不住气了，赶忙就压制，一压制就杀了和打了一些人。这一压制，富裕农民就得到支持。那时候是有些乱，但是贫雇农还是很有革命劲头的，有点过也是难免，但马上纠正。这样实现的一些合作化、农业集体化也就不彻底，成了夹生饭。以后在 1936 年肯定社会主义建成这一思想不是偶然的。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也就是说可以不要革命了。有些人用这种方法造成一种印象，不要革命了，不断的质变就不存在了。以后也就被动了，不是主动了。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主动性，那么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就有了主动性，所以赫鲁晓夫之流就开始上台。

## 四、把量变质变规律具体化为工作方法原则

大家翻一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篇文章的第七段，叫做胸中有数。这也是对量变质变规律的一个重要发展。

胸中有数，做工作要胸中有数，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了。不管是研究哲学也好，做实际工作也好，这一段话不能忘记。毛主席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442页）

如果不懂得事物的质量和数量的界限就会犯错误。质量数量的界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质量有一个数量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要变质。毛主席还说："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同上书，第1442—1443页）。1947年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这个问题研究的很多，这就必须有一个数量界限。还有打击面多少的问题，这跟革命的性质有关系。比如，搞土地改革，规定了只能打击百分之五，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能打击百分之五以上，甚至百分之十以上。为什么打击面只能这样一个界线？因为地主阶级的人数大体上是这么多，所以打击地主阶级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你如果超过了这个界线，那就会打击了中农，打击了富农。你如果打击了百分之五以上，甚至百分之十，不但打了地主、富农，而且富裕中农也打了，打了富裕中农就超过了民主革命的性质。1930年"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是连富农也打，富裕中农也打，就是混淆了反封建性质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严格控制了这个界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打击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其

他可以不打击的就不打击。

总之，百分之九十五一定要团结。这个数量界限和革命性质的界线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一般质量互变规律的运用。我们也可以说是发展。因为把它直接应用到实际工作里面变为我们指导一切工作的辩证法。具体化也就是发展，因为以前也还没有应用的这样具体。所以，应该说是发展了，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把哲学直接用在实际工作里边去，变成非常活的哲学。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辅导*

（1964.7）

## 第一次辅导

（1964.7.9）

今天开始辅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讲很多，但不一定都讲，我只着重讲几个问题。因为这本书是容易看的，而且前后有很多重复，所以没有必要一条一条讲。把最主要的讲一讲，我们大家就可以自己看了。像这样讲课，只是提供一种读书的方法，讲的当中，实际上就是解决如何读这本书的方法。所以，我希望讲了以后，大家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就可以自己读

---

* 1964年前，毛泽东提倡并带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们提出要求，请艾思奇作辅导。艾思奇根据自己的体会，作了两次辅导报告，共讲了七个问题，我们整理时，在前面加了一个“关于读这本书的方法问题”的小标题；删去了第五个问题“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问题”，又删去“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艾思奇在讲课中说，这两个问题是讲的国际问题，主要不是讲经济问题，他讲的也比较简单，所以，删去了。这里保留的是五个问题，加上第一个问题，共六个问题是所讲的主要问题，占全稿的95%以上。我们按当时速记稿整理。最后，附录了两段话，是艾思奇在1961年12月25日给干部轮训班作“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解答问题时讲的，与本文相关，所以做了附录。

下去了。

## 一、关于读这本书的方法问题

我想，先说一说读书方法。

读这本书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特别是这本书，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所以读的时候，方法是很重要的。对这本书来说，要多少带一点批判的眼光来读，不要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认为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

怎样来批判地读这本书呢？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以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做标准，来批判地读这本书。实践证明是对的，就肯定下来，实践证明是错的，就应该否定。对的、错的这本书特别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就不能这样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很难说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即使有，也是非常个别的，一般地讲，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是也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的著作里面，涉及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的言论都是原则性的，不很具体，也不可能具体。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东西，就可以做种种解释。而过去有些问题被人们不正确的做了解释，所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要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当前实践来做新解释。

在以前，我讲课中也谈过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不妨重复一下。

以前我举过两个例子：一个是讲列宁说："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句话，可以有种种解释。这句话是正确的，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很原则，它不能直接解决我们现在的

问题。把列宁的话如果解释成对抗完全消灭了，这种解释就不符合实际的情况。现在赫鲁晓夫还坚持这一点，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对抗。所以我们也要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当前实践重新解释。把苏联不正确的解释加以改变，加以改正。

还有一个例子是讲，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讲到由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形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也是非常原则的，是正确的。可是，因为他很原则，所以以后被人们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前，苏联把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就解释成由资本主义到初期共产主义的过渡，就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用这种解释就得到一种结论：苏联到了 1936 年，过渡时期就结束了，以后就不过渡了。这个教条支配了几十年，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只限于初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苏联到 1936 年，就宣布社会主义建成，这是斯大林时代的教条。这个教条在人的脑子里成为迷信，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迷信了好几十年。由 1936 年到 1957 年，毛泽东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才开始打破这个迷信，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不是初级的共产主义，不是到社会主义。要重新解释，就是要到高级共产主义。

所以，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就有这个问题。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问题。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中心来对某些重要问题重新作解释。就斯大林的问题来说，对某些问题还要修正他的错误。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般的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他们提出的许多原则性意见要重新研究。斯大林这本书是有错误的。有正确的要肯定，错误的要否定。这里可以得到学习马列主义的原则。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这个原

则不能怀疑。没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许多问题就不能正确解释，或者不能完全正确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都要读，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但是，另外一方面要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并且以毛主席的著作为中心，才有可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正确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相互关系就是这样，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来源，也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另外一方面，要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为中心来认真研究，才有可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正确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真正的遗产，真正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就不会被人歪曲。所以，读马列主义著作要以毛主席著作为中心，这点应该肯定。因为许多问题在毛主席著作里面才很具体地展开了，并且使我们了解得更准确，了解得更明确，就不至于被各种歪曲的思想所影响。因此，总的来讲，读这本书要注意两条：一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一条是结合当前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根据这两条来批判地读这本书。

斯大林的这本书，这里，我们是需要批判的。修正主义也批判它，修正主义攻击它，修正主义把它攻击得一钱不值。但是要注意到修正主义是从右的方面来批判，从右倾机会主义那个立场来批判，来攻击斯大林这本书。所以，修正主义者把斯大林这本书的正确东西也否定了。这本书的真正精华，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也否定了。这本书里面有错误的东西，他倒是把它坚持下来了，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我们是从左的方面来批评斯大林这本书

的，站在彻底的革命的方面，站在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对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接受下来，还有一些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的、片面的东西，我们加以否定，加以改造补充。

我想这样读，对我们会有益处，有启发，用这种方法读这本书是有价值的。肯定这本书是有可贵的东西。1952 年以前，只想他这本书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一些具有价值的意见。有些地方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在有些问题上总结得好。1952 年以后，特别是 1957 年以后，我们中国有了毛主席提出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就大大发展了。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出来以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思想比这本书丰富得多了。注意到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比斯大林那个时候知道的东西更多了，问题解决得更正确了。斯大林这本书受到很多限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受他个人思想缺点的限制。所以有许多问题解决的不好。关于方法，我就讲这些。

按照这种方法，我先讲几个问题，有些问题不讲了，大家自己可以读。特别是重复的东西不需要讲了。读的方法可以采取个人读的方法，也可以采取 1960 年中央提倡的方法，大家一起边读边议，读一段大家来发表意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现在就开始讲正文。先讲第一个大题目，书的大题有十节，我想主要讲五个大问题。

##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这个问题，分几个问题讲，讲七点。

##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①] 的客观性问题

从第一题的第 1、2 段开始到第 6 段[②]，这是讲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客观经济发展法则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是不是一个客观法则？或者这个话已经变了，人可以任意改造，或者制定、改变法则，甚至可以废除法则，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

斯大林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仍然是客观的，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苏维埃国家的领导者，不能任意制定新的法则，不能创造新的法则。斯大林肯定了这一点。这说明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坚持了经济学上的唯物主义。他批判了苏维埃国家可以任意废除现成的经济法则，能够创造新的经济法则。他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后来给一个人的信[③] 里面指出这种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是完全正确的。他所批判的那些的确是主观唯心主义。包括一些什么人呢？现在还在的那些人，最有名的就是现在苏联最吃香的一个哲学家叫费多谢也夫。这个人是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部长和前哲学研究所的所长。同时他是参加了苏共“二十二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的起草人之一。就是在“二十二大”时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这个人就是以前斯大林批评过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现在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者是赫鲁晓夫手下最主要的搞哲学工作的人。斯大林在

---

① “法则”一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后改译为“规律”（凡是这样的注，皆为整理者所加）。

② 这里所讲的“段”，是作者按书中大题目下划分的自然段。它有别于下面为读者阅读查阅方便起见，在括号内按不同版本页码注明的“段”。本讲稿采用的版本：“旧版”是 1953 年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 2 版；“新版”是现行通用的 197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39—612 页。

③ 《答 A·B·萨宁那和 B·Γ·温什尔两同志》。

这点上是对的。斯大林在哲学观点上抵抗了修正主义，坚持了唯物主义。

修正主义者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逐渐增加起来，他们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被斯大林揭发了。但是斯大林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斯大林发现了，尽管苏联已经建设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可是，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还要反对主观唯心主义。这一点说明斯大林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不够的。因为他还没有看出这是现代修正主义，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观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苏联社会里面新的表现。所以，他的认识是不够的。但是，主要的东西是对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他一个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还有主观唯心主义，也只有他有勇气讲这个话。

当时的苏联哲学界就有这个看法，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在苏联已经不成问题了。苏联只是同国外的修正主义斗争，国内没有什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问题。苏联哲学界对这个问题都是这样看的。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任教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了，内部没有什么反对唯心主义的问题了。那还是斯大林这本书已经出来以后，他还是这样地看。这可以说自有社会主义国家以来，第一次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反对唯心主义的问题。缺点就是没有揭发他的阶级基础，不知道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上层建筑上、在世界观上的一种表现，不知道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

斯大林所以有这个缺点，就是因为1936年他认为苏联已经消灭阶级了，他认为在国家内部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自

己定了这个教条，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把自己的脑子就限制住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揭发阶级基础，而实际上这种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苏维埃政权里面的反映。苏维埃政权里面有些人已经有了官僚主义，已经是脱离了群众，已经在搞修正主义了，已经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来废除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

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书的第 2 段还可以研究一下。他说："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下列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法则，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见旧版第 2 页第 2 段；新版第 539 页倒数第 1 段至 540 页第 1 段）

他的这些分析有一些对的。就是科学法则和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是两回事。那些主观唯心主义者把这两件事混淆起来了。但是这段话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他讲到，政府法令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法律跟客观规律不同，是可以创造的，但是这个法令的创造也不是依照人们的意志随意创造的，人们的意志是具有阶级性的。政府颁布的法令是政府所代表阶级的意志来创造的，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政府的法令也不是跟客观规律完全无关。政府正确的法令应该是反映客观规律的，不应该把法令跟科学法则绝对地分开。好像法律就是可以随便创造了，其实，就是法律，也不是随意创造的，也是决定于阶级。同时，正确的法律也是反映客观规律的。

后边第 3 段至第 6 段就用不着讲了。他讲人和客观规律的关系，规律既然是客观的，人们可以利用客观规律。这个思想是对

的，大家都可以看懂，所以不讲了。

## （二）关于如何运用法则的问题

现在讲第7段，算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运用法则的问题。

这一段首先肯定了经济法则“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法则。人们能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把某些法则所发生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阔道路的法则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法则或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见旧版第3页第3段；新版第541页第2段）这些话都是对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人们可以发现新的法则，并且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利用就是想办法限制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防止它们的破坏作用。这些都是对的。这是自觉运用法则，把客观法则运用到我们需要的地方去，不要让客观法则自发地起破坏作用。他这里说的“自发”① 两个字实际上应该这样理解，即不应该让客观法则自发地起作用，应该自觉地掌握它，使它在有利于我们的方向上去发生作用。他讲到水力的问题，就是水流动的作用，如果自发地起作用，就要发生危害。但是修起了水库就可以把这种自发的作用引导到有利于人民的地方去（参见旧版第2页第4段、第3页第3段；新版第540页第3段、第541页第2段）。

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法则是有作用的，价值法则如果自发

① 此处的“自发”两字，在1979年的版本中没有出现，只有“不可抗拒”的字样。

地起作用，那就要起破坏作用。但是像薛暮桥同志讲的，人们有意识地运用这个价值法则，掌握这个价值法则，就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得到很大的利益。

这些话的基本思想是对的，但是也要注意一个问题，斯大林在这里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能够认识这个法则，就能很顺利地掌握它，运用它来为我们谋福利。这个话是对的。但是只讲到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斯大林看不到，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要自觉地掌握这个法则，要避免这个法则自发地起破坏作用，要经过斗争。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使所有的社会法则被我们自觉地所掌握。要掌握这些法则，使它实现出来，是要经过斗争的。这一点斯大林没有提出来。

我们读这篇文章要肯定它正确的地方，但是也要看到他没有看到的地方。经济法则为什么会自发地起作用？是不是法则自己起作用的？不是的。它有一个阶级，有一个私有制。经济法则是客观的。但是经济法则的作用是通过人的行动起作用的。这个作用是两种作用。一种是自觉的、被人控制的作用，一种是自发的作用。这两种作用是通过不同阶级的人的行动来发挥的。

社会法则（经济法则包括在内）不能离开人的行动单独起作用。因为社会是人的社会，法则是通过人的行动起作用。所以讲到法则的作用，就有人的作用在里面。

这是第二个问题，如何限制，如何运用经济法则的问题，斯大林认为经济法则人可以掌握，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运用经济法则还要通过斗争。

### （三）自然科学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区别问题

第 8 段讲，自然科学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区别问题。这个问题

可以讲一讲。他说：“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法则与自然科学的法则不同，不是长久不变的；政治经济学法则，至少是其中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在此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法则。”（见旧版第4页第1段；新版第541页第3段）这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的。

自然科学法则对人类来说起作用的时间是很长的。社会法则是跟社会发展过程密切结合的。所以，它的某一种法则是在人类某个历史时期产生的。价值法则是在商品生产的历史时期起作用。商品生产如果完全没有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它就不起作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必然要发生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封建社会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资本主义复辟了就有了。像苏联，资本主义正在复辟，这个危机问题就有了。像我们这样正常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没有。我们1958年有些困难，不叫危机，不是生产过剩问题。是那一个时期生产的各种比例调节得不好。发生的困难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法则发生作用跟一定的社会历史联系的，这是对的。但是，这段话使人有一个印象，好像自然科学法则没有任何历史条件限制，这样看也不一定确切。自然科学法则不受人类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是对的。但是自然科学法则仍然受到自然界发展的历史条件限制。自然科学的每一个法则都是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才起作用的。在另外一个时期就不一定起作用。举一个例子，如最简单的水，到摄氏一百度就要沸腾起来，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受不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的，到了珠穆朗玛峰，这个规律就不起作用。那个地方，水可能在摄氏二三十度就沸腾起来。在西藏高原上，也受这个条件的限制。饭都烧不熟，因为水烧不到一百度。自然规律也不是绝对不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斯大林的这个分法有一点简单。

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受人类历史条件的限制，自然界规律受自然界发展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任何一种规律都是受一定条件的限制的，任何一种规律都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规律。除了辩证法规律以外，辩证法规律是普遍规律，是到处都起作用的。但是，世界上辩证法规律都是具体的。辩证法规律的具体表现，也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人类的对抗矛盾规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可能基本上没有了。有矛盾，但是，没有对抗性。现在是对抗正在消灭，不是已经消灭。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都是矛盾规律。但是人类社会的对抗矛盾规律限于在有阶级的社会。所以，即使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它实际上也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普遍规律是找不到的。实际生活里面辩证法规律都是具体的规律，都是有条件的。

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也从这里面得到解释。不管什么真理，科学真理都是有条件的，所以它是相对的，但又可以说是绝对的。为什么说是绝对的呢？只要有这种条件，这种规律就一定起作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只要具备这种条件，这种规律就一定起作用。

我们地球上有了资本主义，于是就有社会主义革命，就有无产阶级革命。只要有资本主义，就要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规律受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一定要有资本主义，才有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它的相对性。没有资本主义的地方会不会有无产阶级革命？非洲许多国家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资本主义发展，最后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绝对的。非洲现在没有，将来一定会有。非洲一些国家现在已经有了。有些国家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国

家，但实际上是发展资本主义，最后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问题。不光是地球上是这样的，就是火星上如果有人类，也是这样，有了资本主义，最后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太阳系以外，几万万年以后，哪个星球上有了资本主义，最后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绝对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这是它的相对性。有了资本主义，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在地球上也好，在地球以外也好，永远可以出现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绝对性。

我们讲《实践论》讲相对性时没有讲到，在这里我们顺便做一些补充。

凡是真理都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只要有这种条件，就起这种作用，这是绝对性。相对性就是在什么条件下起这个作用。这个问题不是这本书最主要的问题，但是跟以前讲的有联系，所以讲一讲。

## （四）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问题

下面讲第 13、14、15 段，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问题。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来说明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如像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样，而是消灭了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见旧版第 5 页第 2 段；新版第 542 页第 5 段）这一段话要注意一下。苏维埃政权和我们的政权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这是对的。我们不是用一种新的剥削代替另一种剥削，而是消灭剥削，这是对的。不过这里面斯大林讲

过了一点，就是消灭了任何剥削。要是讲我们正在消灭剥削，就没问题，他讲已经消灭了任何剥削，这就过了一点，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这就是把苏维埃政权的过渡性取消了。马克思讲：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都是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专政也就是过渡时期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照斯大林这个说法，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过渡已经完结了。

第二个说法，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可以说是“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个话我们也可以说的更确切一些。的确，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就生产关系来说，是可以说的。但就生活条件来说，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有了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现成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着重于生产关系上这样来理解，不能说斯大林这样说就不对。因为，他讲经济萌芽的经济，主要是生产关系，我们理解时要注意。任何经济萌芽，生产力的条件也没有了，不能这样说。苏维埃政权可以说是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经济形式，这个话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也要注意，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时候，马上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革命胜利以后马上就有了这种经济基础。不是先把政权搞起来，然后慢慢地把经济形式搞起来。无产阶级主要的革命基础，就是在革命胜利的同时，就要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一进大城市，马上就把银行、铁路、邮政等主要大企业掌握起来，你不掌握起来，这个政权就维持不了几天。政权要有经济来源，所以它从旧社会接受一批旧的东西，立刻改变旧的经济基础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如果真是从“空地上”来创造新社会也不一定很确切。巴黎公社马克思批评他们有一个错误，就是他们掌握政权以后，没有立刻把银行抓到手，这

跟后来政权不大稳固有很大关系。政权在手，就要立刻掌握自己主要的经济基础，然后逐渐扩大这个基础。从各方面来改造这个基础。我们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官僚资本，那么，我们得到胜利以后，马上就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官僚资本把主要经济集中了，所以，我们一到大城市，没收官僚资本，马上建立一个主要经济基础，巩固经济基础，掌握经济命脉，我们就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下面是讲苏维埃政权要运用经济法则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思想也是正确的。他说："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似乎消灭了现存的经济法则，'制定'了新的经济法则，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在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见旧版第 5 页第 4 段；新版第 543 页第 2 段）这段话基本上是对的。

我们改造生产关系，使它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这个思想是正确的。到现在我们还是这样。这几年来，我们也经常谈这个问题。前几年我们有一些毛病，还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斯大林这段话对我们起过作用，这是很正确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些话有些不足的地方，就是他讲苏维埃政权"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些话有些片面。因为第一，苏联生产资料并不都是公有化，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

农村的集体农庄是集体农民的财产，而不是全体人民的财产。这句话容易使人理解成苏联的财产都是全体人民的财产。这是现在的事情、还是将来的事情？这个话没有说清楚。应该是将来的事情，但是看起来又好像是现在的事情。说消灭了剥削制度，是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了，还是就要消灭？这些地方都是有毛病的。

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做文章，做文章怎样表达得准确，反映客观情况怎样反映得正确，那些话用来表达当时的苏联情况是不准确的。把生产资料公有化是对的，但是说成是全体人民的财产就夸大了。

公有化有两种，一部分是全体人民的财产，一部分是集体农民的财产。还有一小部分仍然是个人私有财产。斯大林所讲的"全体人民的财产"的话没有分析，没有一分为二，写文章也要反映客观情况。我们要一分为二，把公有化分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和集体农民的财产，而集体农民的财产，还要分主要是集体农民的财产，部分是个人的财产。自留地是个人财产，我们农业六十条规定，小型、中型工具归个人所有，或者小牲口还是个人的。斯大林在这本书里面写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生产资料不是私有的，生产资料一定是公有的。这本书里的主要毛病就在这里。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了，甚至集体农庄也不是集体农庄的，生产资料都是全体人民的。这些提法都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除有公有化之外，还有私有制；除了全民所有制外，还有集体所有制。他也没有绝对否定，但是许多地方的语言是这样表达的。

## （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问题

第16段，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观点，我们

也还要研究，这个话这样说是不错的，是有这个法则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因为生产力要有跟它适合的生产关系，它才能够顺利地发展。因此斯大林提出这个法则，这是他的创造。以前没有这样的提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种提法是这本书的一个创造，是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有这个原则，使我们知道建设社会主义要注意运用这个法则，实际意义是很大的，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创造。

但是，我们讲这个法则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适合又矛盾。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法则，只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适合又矛盾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应该作全面的理解。就是毛主席讲的又适合、又矛盾。适合是相对的，矛盾是绝对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总是个过程，你把旧的生产关系加以改变，使它适合新的生产力的性质，但是刚刚适合了，生产力又发展了，又开始有新的矛盾了。

矛盾是绝对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分为二也是绝对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合是相对的、暂时的，它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适合。

我们自解放以来，生产关系改变了多少次。合作化以后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又有了几次调整。我们一定要努力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但是不要因此产生一个幻想，就是想用一个办法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以后就不矛盾了，以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事实上，生产关系的调整，年年要做，经常要做，因为旧的生产关系要经常抵抗，多个环节经常会产生矛盾。调整的好，基本上适合了，接着又要

发生矛盾。发展的总的趋势总是螺旋式的，不是适合了就可以长久适合。

一分为二是暴露矛盾，矛盾暴露了就努力解决，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适合。适合了又要暴露新的矛盾，这样不断地出现新的矛盾，解决矛盾，然后又出现新的矛盾。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发展，不是出现矛盾把矛盾调和起来，就太平无事了。发展，是暴露矛盾，通过斗争解决了矛盾，然后又出现新的矛盾，又要在新的阶段进一步解决。如果适合可以一劳永逸，那就没有发展了。所以（斯大林在《答A. N·诺特京同志》中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这个公式是形而上学的公式（参见旧版第46页第2段，新版第577页第6段）。完全适合那还有什么可斗争？有什么矛盾需要解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讲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我们解决矛盾的要求并不等于说发展只有一个适合的问题，不是得出一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这个结论。

经济发展要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解决矛盾会阻碍发展。解决了矛盾，还会有新的矛盾出现，这才能发展。解决矛盾是发展告一段落，这个段落解决以后，如果没有新的矛盾出现，就不能发展，只有不断揭露矛盾，才能不断前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法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由这个法则得到一个结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可以完全适合，那就变成了形而上学。

究竟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适合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事实上还是矛盾是根本动力。暴露矛盾，解决矛盾，然后又出现新的矛盾，这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不暴露矛盾，如果脑子里有一个幻想，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以后矛盾不再出现，

结果，矛盾在客观地发展，矛盾的发展会出现我们自己所不愿意出现的东西。如果不努力暴露矛盾，解决矛盾，让它自发地发展，它的必然趋势是倒退。所以斯大林在 1936 年以后，认为社会主义建成了，使他在思想上睡觉了。这是后来出现那样大的困难的根本原因。认为没有矛盾了，完全适合了，头脑就不清醒了，客观矛盾看不见，不能自觉暴露矛盾、揭露矛盾，经过斗争解决矛盾，不能像我们党这样特别警惕矛盾，所以他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很严重，就出现了赫鲁晓夫的上台。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法则我们怎么样运用的呢？运用这个法则就是要经常注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又适合、又不适合的情况，而且要注意不断揭露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经过斗争解决这个矛盾。自觉地揭露矛盾，然后才知道正确的斗争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斗争？敌我矛盾如何斗争？找到正确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矛盾。解决了矛盾又要去揭露矛盾，经常自觉地这样做，能够这样做才能谈得上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法则。如果不能这样做，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法则就变成了一句空话，就没有办法掌握。

斯大林也讲到运用这个法则会受到衰朽力量极强烈的反抗。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多多少少感觉到了一点阶级斗争的必要，他是多多少少意识到社会主义法则是需要阶级斗争的。他在这书里讲到："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经济法则的另一个特点。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法则是或多或少顺利地进行的；与此相反，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则，却要遇到这些力量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必须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在我国，已经有了这种力量，其形式就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在其他国家、即资

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这种力量。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了旧的社会力量，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之所以在我国获得了发生作用的充分广阔场所，其秘密就在于此。”（见旧版第 6 页第 2 段；新版第 543 页第 3 段）这段话说明斯大林也意识到运用经济法则也有阶级斗争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要依靠工农联盟来反对社会的衰朽力量的反抗，这个精神还是正确的。但是这段话斯大林没有明确地讲出来，说我们用工农联盟的力量来粉碎旧社会的力量，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他没有明确说出这点。按照我们今天的实践，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来说，应该明确这点。不明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以前有一个教条，认为阶级消灭了，思想不是很清醒的，逻辑不是很清楚。一方面认为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谁战胜谁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要粉碎旧社会力量的问题。这本书反映斯大林的思想有矛盾。他在 1936 年已经做了决定，认为没有阶级，没有矛盾，但是到他临终的前一年感到有矛盾，意识到有矛盾，但是旧的思想限制他新的思想，他没有决心把这个问题揭露清楚，没有把矛盾清楚地暴露出来。所以这些话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也可以解释现在苏维埃政权就是要依靠工农联盟，跟资本主义斗争，也可以解释这个斗争已经完结了、粉碎了，就是说斗争已经没有问题了，已经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们要重新解释这个问题。有许多可贵的东西，但是要重新解释。要使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就要解决两个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要揭露这个矛盾，要经过斗争来解决这个矛盾。这个矛盾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了，应该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衰朽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的力量。斯大林已经感觉到了，可是不能把它

的思想明确地表示出来。所以这本书表明他有些辩证法思想，或者可以说已经想要恢复他原来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恢复得不彻底，很多地方是形而上学的。

## （六）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问题

下面再讲第 17、18 段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

以上是讲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发展法则。下边再讲苏维埃政权的另一个法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法则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制定各年度计划作为两点分开来看，这是对的。法则是客观的，有计划是一个客观的法则。这个国家的计划就是要人在主观上反映这种法则，运用这个法则。

苏联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政府制定了这个计划就等于客观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计划并不等于客观法则。计划只是反映客观法则的，如果它反映了就是好的计划，如果不能反映客观法则就是错误的计划。计划可以由人制定，客观法则则不能由人制定。人制定的计划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标准是能不能反映客观经济规律。所以要制定正确的计划，就要把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内容弄清楚。

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个客观法则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特别是比例，比例依什么为标准？拿什么来比？这个问题以前苏联经济学没有搞清楚。

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是有发展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个原则就是农、轻、重的原则，各种比例以什么为标准，首先是以农业为标准。比例计划的基础是建立在农业上的。这

次中央工作会议，谭震林同志也讲计划首先要从农业搞起，先看农业搞多少，然后再看轻工业、重工业搞多少，计划有这个顺序，就是农、轻、重。因此，多少的问题不是重工业比轻工业多，轻工业比农业多，问题是计划的顺序，比例的顺序，是要以农业为基础。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是工业的市场基础。从国家计划来说，又是计划的基础。农业能生产多少粮食、多少原料、多少经济作物，这些农产品除了农民人口消耗以外，能够拿出多少来供给城市、供给工业。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重工业发展多少？轻工业发展多少？城市人口控制到什么程度？文化教育要发展多少也就清楚了。因为，不管轻工业也好，重工业也好，文化教育也好，你首先要解决人的吃饭问题。经济建设，首先要考虑人民生活，要看有没有这样多的饭吃？有没有这样多的衣服穿？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毛主席说：有许多人不懂得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所以有时候连很简单的问题也看不清楚。抓住要害问题，抓住本质问题，才能解决。

斯大林在这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以完备的知识去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见旧版第 7 页第 1 段；新版第 544 页第 1 段）必须研究这个计划，把这个计划弄清楚。这些话都是对的，都有指导意义，是精华。不过，斯大林那个时候对有计划发展的经济法则没有完全弄清楚，知道有这个法则，但是对法则的内容没有弄清楚。

我们说以农业为基础，修正主义就反对我们，说："中国现在要放弃工业化了"，修正主义说话是互相矛盾的。有时候说我们只要工业，只要原子弹，不要农业，不要人吃饭，有时候又说我们要放弃工业化。前后矛盾。我们自己搞计划的时候也要斗争，这

个斗争有时候是各个部门相互之间的矛盾，这不是阶级斗争问题，这个部门想多搞一点，就跟那个部门有矛盾。也有阶级斗争，有的是资产阶级想来破坏这个计划，他就想一些另外的东西。农业上也有斗争，比如制定一个分配计划，富裕农民按照他们的要求提出一个分配计划。贫下中农是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制定计划。要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能够被我们运用，所以掌握计划有两条：第一是把这个法则弄清楚，能够使计划正确地反映法则。第二是有斗争。这个斗争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各部门之间的调节问题。

关于前面讲的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问题，还要补充点。斯大林讲了两条，一条是，旧本子是“消灭了任何剥削”，新的本子是“必须消灭任何剥削”，必须消灭任何剥削就准确一些，而“消灭了”剥削就有点毛病。所以，就新本子的提法来说还是对的。(见旧版第 5 页第 3 段；新版第 542 页第 6 段）不过后面斯大林仍然是肯定了苏联已经“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这点新的版本也没有改变。(见旧版第 5 页第 4 段；新版第 543 页第 2 段）所以，就这点来说他的提法还是有些不准确，还要研究。前面只是讲原则上消灭了任何剥削，后面讲苏联情况。直接讲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所以刚才我的那个解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只不过有些字句上有差别。

从 1936 年到 1952 年经过十几年，苏联社会的矛盾多少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暴露了，但还有 1936 年公式限制了他的思想，同时他对现实的了解还不很够，所以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发现了一些真理，本来可以说对的，但由于不能根本推翻 1936 年已经决定了的论断，所以新的思想也就说不明确，新的思想也不能真正完全展开来说明。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法则，连价值法则也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法则。这也是不对的。法则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法则，那也就能消灭法则，而以另外的法则去代替它们了。‘改造’法则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法则的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虽然关于改造经济法则的公式，早已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发生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法则。”（见旧版第7页第2段；新版第544页第2段）斯大林这里讲法则只能是限制它发生作用的范围，防止它发生破坏作用，不能“改造”和“消灭”，这是对的。值得研究的是对法则问题是不是就是限制它发生破坏作用范围的问题？这是值得研究的。我们可以认识法则，以后使它按照我们的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它的作用。比如黄河决口，它的水到处发生作用，那就不好了，如果我们把水利修得好一点，那么水的作用就按照一定的范围发生作用，这都是对的。不过我自己考虑这样一个意见，是不是可以更广泛一点呢？我们对法则主要是防止它自发地起作用，认识法则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自觉地掌握它的作用，包括发生作用的范围和限制破坏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就要使法则不至于自发地起作用，要能够使作用由人类来加以控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能把法则认识清楚，才可以掌握它的作用。除了认识以外，还有一些其他重要条件必须记住：

第一，我们要有政权。无产阶级要掌握政权，人民要掌握政权，只有掌握了政权才可以大规模的创造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条件来运用这个法则，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这个条件，就

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政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人民手里，才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来创造条件。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掌握政权的问题，联系群众的问题。

第二，还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掌握政权就要跟资产阶级斗争，这本身就是一个斗争的问题。资产阶级要破坏你创造条件，要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把社会主义社会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政权和人民要创造条件，他就要破坏。所以，这里面有阶级斗争的问题。要能够自觉地运用客观经济法则，这些条件不能不抓紧；政权必须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人民手里。这是一个使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经济法则、控制经济法则的根本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保证，经济建设的保证。这些问题，斯大林在书里都没有提到，没有注意。

研究经济问题，不能不涉及上层建筑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跟上层建筑问题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要无产阶级国家来自觉地建设，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涉及上层建筑的问题就比较少，《资本论》里面讲上层建筑问题也有，也不是太多。比起社会主义社会涉及到上层建筑问题就比较少，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靠上层建筑来保证的，非常重要，政权真正是无产阶级的，真正是人民的。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复辟的现象，就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上层建筑的保证没有解决。斯大林的时候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出现了赫鲁晓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的政权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另外政权不仅仅是中央机关的问题，还有地方问题，有企业问题，企业里面设政治部就是要解决地方企业领导权要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斯大林在

这本书的第四个题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消灭工业和农业对立的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参见旧版第 23 页第 2 段；新版第 558 页第 2 段），这个原则上是对的。实际上在组织上没有解决问题。原则是看对了，实际上怎样做法，斯大林还是没有搞清楚，没有解决。

## （七）为什么要讲经济法则的客观性问题

最后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谈经济法则的客观性问题。“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众所周知的，可是其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而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述众所周知的真理。当然，在这里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述我们所熟悉的若干真理，那就不对了。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的新干部来接近我们这个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强烈的愿望要显示自己，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讶，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它能消灭科学法则，能制定新的法则。我们对于这些同志该怎样办呢？”（见旧版第 8 页第 2 段；新版第 544 页第 4 段至 545 页第 1 段）

这段话有些地方可以研究。首先是斯大林感觉到要注意接班人的问题，注意到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思想。另一方面，他认为错误的观点、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来源就是青年，青年人没有经验，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无所不能，做什么都不费力。把这个主观唯心主义错误的责任推到青年身上。其实这个论断不大确切，好像老年人就没有主观唯心主义，实际上应该肯定，苏联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么长的

时间还出现主观唯心主义，就不只是青年人的问题，是政权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作风影响的问题。

这一点，斯大林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现在要看到这点：我们国家也会出现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我们有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必然要乱搞一通。认为自己有了权力就可以“制定”法则，“改变”法则，“改造”法则。形而上学、主观唯心主义就是从官僚主义来的，从资产阶级作风来的。这一点需要我们重新认识，要在斯大林已经有了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地加以认识。我们如果这样看，就可以说斯大林说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这也不确切。主观唯心主义当然可以说是一种旧观点，哲学史上早就有了，但是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新问题。所以，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这个观点跟旧的观点有一致性，但是这个观点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它的形式来说是新的形式。从来哲学书里的主观唯心主义也没有这样讲：有了政权的人可以“制定”法则，“消灭”法则，“改变”法则。

主观唯心主义过去有，但没有上面说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大家学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在那里批判过那么多的主观唯心主义，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所有那些主观唯心主义都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也是一种新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问题看成是简单的旧问题。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官僚主义的出现，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结果。或者更具体地说，脱离三大革命的实践，脱离生产斗争，脱离阶级斗争，脱离科学实验。领导机关脱离三大革命实践就会产生主观唯心主义。这不只是青年的问题，青年如果不脱离三大革命的实践，他比老年人更懂得马克思主义。高级干部脱离实际，脱离阶级斗争，脱离科学实验，就会产生主观唯心主义，甚至右倾机会主义，进而变成修正主义。把

责任推到青年无知是不公平的。斯大林在这点上没有看清楚。关心青年是好的,但是认为老年人就是真正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那就不一定确切了。不论老年人、青年人都同样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问题是不要脱离革命实践,不要脱离群众,不能有官僚主义,不犯这一条就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这是新问题,是新形式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以前的主观唯心主义不同。以前的主观唯心主义在理论上批判就行了,写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驳得体无完肤就行了,现在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要把它打倒,就要坚决贯彻领导干部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问题,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这就困难得多了。

关于第一个问题就讲这么多。

## 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第1段(见旧版第8页第4段至第9页第1段;新版第545页第4段)是斯大林反对有些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应该消除商品生产。他批判这种观点是对的。他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仍然要保存商品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而不是消除商品生产。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正确总结。

关于消除商品生产的问题,我们回忆一下1958年不是曾经有些同志也想这样搞吗?也有认为可以消灭商品生产的吗?那时候毛主席就批评过这种观点。我们到有些公社参观,看到他们什么都包了,货币也不要了,自己就发了流通券来代替国家的货币。这完全是错误的。这要破坏国家整个社会主义的统一经济。商品交换也不要了。那时,毛主席就批判了这种错误。斯大林这本书的观点,肯定保存商品生产这个观点是对的。

第2段至第6段（见旧版第9页第2段至第6段；新版第545页第5段至546页第1至4段）斯大林讲到某些同志引证恩格斯的一句话“不明确”，说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斯大林说：“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了解成这样，也可以了解成那样。”他说恩格斯这个公式不明确，这是对恩格斯的批评。我觉得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也可以不批评，因为恩格斯讲的是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末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不过斯大林的这个分析还是对的，就是说，要搞清楚所谓占有生产资料是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还是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如果是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就是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当然可以消灭了；如果只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比如是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商品生产还不能消灭，还要有商品生产。这个分析是对的，实际上是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性质。他承认了这点，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带有过渡性的。因为它没有把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而仅仅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还没有完全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所以，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是有过渡性的，他又不承认。可是既然已经说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把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那就是还要过渡。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不是很明确的。有正确

的观点，但又不很彻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在没有完全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前，不能不要商品生产。就这点来说，也说明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商品生产还存在，这就是过渡性的一个表现。这些地方也说明斯大林的分析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是表现得不很明确、不彻底，要表达得彻底就要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并没有宣布为全民所有，商品生产依然存在。所以，应该明确承认这个过渡性。

第7段至23段。段落多，读时注意两点：斯大林承认苏联社会存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这就肯定了要保持商品生产的出发点，但是他没有明确承认苏联社会的过渡性。

“甚至，不仅在19世纪末叶，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是已经达到了像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程度。至于说到其余的国家，虽然那里的农村中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农村中却还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这些人的命运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应该予以确定的。”（见旧版第10页第3段；新版第546页第7段至547页第1段）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个国家内，也曾在我们国家内，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已把生产资料如此集中，以致可以剥夺它们，把它们转归社会所有，可是那里的农业，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因有人数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而仍然如此分散，以致没有可能提出剥夺这些生产者的问题，那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该怎么办呢？”（见旧版第10页第4段；新版第547页第2段）

这两段斯大林讲得肯定一点，即使一个国家的工业里有了社会主义的条件，农业虽然落后，还是可以夺取政权的。这个论断是对的。他反对有些人认为一定要等到农业非常集中，非常发展

时才能够夺取政权。这是对的。但是这段也就是承认了工业和农业有很大的差别：工业已到了可以剥夺资产阶级的程度，但农业还是小生产占统治地位。因此，要改造小生产者不能像推翻资产阶级那样把它集中起来，加以剥夺，只能通过搞合作化。就是说，苏联现在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更不是成熟的共产主义。苏联这个社会主义也还要过渡。不过他没有明确承认这点就是了。

下面几段都是讲这个问题的。

斯大林肯定了在苏联也有城乡的根本差别；工业和农业的根本差别。这是本质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城乡差别仍然存在。他肯定了商品生产要保持的出发点就是承认城乡差别的存在和工农差别的存在。这也说明了苏联社会的过渡性。

上面这个结论在第 21 段（见旧版第 12 页第 5 段；新版第 548 页第 8 段）说得更明确："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惟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这说明商品生产仍然存在。有工农业差别、城乡差别，农民惟一可以接受的是商品生产的形式，这也说明农民的私有性并没有完全消除，农民私有制的特点没有完全消灭，尽管是集体农庄，是集体农民，但只能接受商品生产这样的形式。斯大林在这里说，通过买卖的形式交换就要讨价还价。城市和农村的交换关系就是国家和集体的关系，也包括国家和农民个人的关系，国家和集体的关系，或者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还要讨价还价，这不是过渡性是什么呢？

第 24—26 段。"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

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非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资本家能够购买它并在生产过程中剥夺它，因而只有在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时，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没有这种情形，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见旧版第12页第8段至第13页第1段；新版第548页第11段至第549页第1段)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不应当引导到资本主义，这里有些话是对的，就是商品生产并不等于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对的。但是根据这些话做出结论，说在苏联的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那就片面了，所以要根据我们的新经验来重新解释。

接下的一段里他说：“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见旧版第13页第2段；新版第549页第2段)他肯定这点，就是认为苏联搞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是片面的，要根据我们新的经验重新解释。不能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会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对的。但是由此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生产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就不对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商品生产不一定就产生资本主义，但是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我们要补充这点。我们的商品生产如果运用得好，可以不产生资本主义，可以使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掌握在集体手里，成为国家的工具，成为建设集体经济的工具。搞得好的话就可以避免产生资本主义，

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商品生产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资本主义残余。商品生产（即使是国家的商品生产）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上层建筑巩固保证这个商品生产，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在国家经济里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在集体经济里就更用不着说了。在集体经济里，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如果没有贫下中农的认真监督，集体中的商品生产也可能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这段我们要做新的补充。

第27—31段。斯大林论证了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是有作用的。

斯大林说："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见旧版第13页第4段；新版第549页第4段）

"这也是不对的。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做全民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由集体农庄当做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不过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见旧版第14页第1段；新版第550页第1段）这段有一些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比如斯大林在这段里肯定在集体农庄中生产资料属于国家，只有产品属于集体农庄的。这个问题比较片面。因为当时苏联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机器、拖拉机）是由国家供应和管理，拖拉机由拖拉机站来管理、是国

家管理的，所以主要的机器是国家的。但如果说生产资料都属于国家的，恐怕也不完全确实。因为农民除土地、机器以外还有其他生产资料，就是小一些。农民还可以有牲口，还可以有一些小工具，这些生产资料不仅属于集体农庄所有，而且有些还属于农民个人所有。简单地说，生产资料属于国家，只有产品属于集体农庄，这种分析恐怕不是完全的，那个时候农业机器不卖给集体农庄，后来斯大林才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了。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把一些机器卖给公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集体农民还是可以有生产资料的。所以这点他概括的不完全。种子也是生产资料，土地在中国是集体所有的，所以他的概括是不完全的。如果把他的概括当做教条来搞社会主义，那就要出问题。

斯大林著作的缺点就是比较简单，好处是简单明了，抓住本质，但是有时候缺乏具体的分析。

这是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集体农庄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但它的生产资料不是全民所有，因此，集体农庄、合作社甚至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都不是共产主义，甚至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第一它是集体所有，但是不完全，第二，里面有个体所有制残余，所以也不完全。

下面一段："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见旧版第15页第2段；新版第551页第2段）这段话也是不完全的，如果说，当时苏联的商品生产基本上是特种消费商品的生产，是没有资本家

参加的商品生产，那末在斯大林活着以前可以这样说，但斯大林以后就不能这样说，赫鲁晓夫这时的商品生产就根本不能这样说。斯大林以前可以说基本上是这样，但也不能说在商品生产里一点资本家参加也没有，这是一点。其次，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是不是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恐怕这也不完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小农具的生产，是不是苏联在那时候都是由国家生产了？都不是作为商品卖给农民？农村里面就没有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了？恐怕也不见得。我们现在的工业为农业服务，怎样服务？制造许多生产资料商品卖给农民，当然有一部分是商品生产的，有一部分是供应农民使用的，这也是为农业服务，但不是商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如果把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简单地限制在个人消费品上，这是片面的，用这个原则指导生产会出毛病的，首先就不能很好地贯彻工业为农业服务的原则。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要由国家包起来，不作为商品卖给农民，这怎么能为农民服务？斯大林是坚决不卖拖拉机给农民的，这是过分的。当然拖拉机站还是国家管理好一点，农民要办，技术条件准备不够，就有浪费，国家经管在维修、拆换、拆修上，比较方便。斯大林说让国家搞好，有力量换机器，农民换不起，是有道理的。国家经管比较好，但有些机器还是要卖给农民的。排灌机器如果不卖给公社，一定要用国营排灌场，也不一定好。拖拉机小一点的，还是可以卖给农民的，他们使用起来很方便。我们北方是种麦子，可以卖给农民，大型的卖给农民不大好办。

第 32—36 段。讲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剩余劳动的概念。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写书写文章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有剩余劳动、雇佣劳动。斯大林给予了批评，反对这种观点。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对的。

斯大林说:“我以为,也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就中我是指这样的一些概念,如‘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与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见旧版第15页第4段;新版第551页第4段)这个思想对不对呢?又对又不对。对的地方是不能说社会主义有什么剩余劳动。总的来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是生产剩余劳动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出来的东西归劳动人民共同分配,或者是归工人共同分配,或者是归集体农民共同分配。这个共同分配没有剥削。因此,这个劳动都是必要的,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原则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里面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问题根本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已经根本消灭了,那就错了,那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过渡性了。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努力消灭剥削,消灭剩余劳动,因为消灭不消灭不是我们主观上的问题,而是客观上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因素还存在,除非我们否定这个因素的存在,如果不否定资本主义因素还存在,就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剥削和剩余劳动是逐步消灭的,而不是一下消灭。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好的企业,我们说剥削和剩余劳动是没有的,但建设不好的企业、公社、集体农庄、合作社里面还会有剥削和剩余劳动的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就要作这种分析。

斯大林在这方面就片面了,这些片面性都是由于他在1936年

说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了，把剩余劳动说成已经消灭了，做了这些论断以后就改变不过来了，因而对许多问题的论断都没有办法说清楚。虽然他已经看到一些社会主义过渡性因素，商品生产存在，城乡的差别还有，可是做不出过渡性的论断来。不是一分为二，不能从许多问题里看出资本主义的因素。所以，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斯大林在这本书里总的缺点。

# 第二次辅导

(1964.7.10)

## 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关于这一题总的意见是这样：苏联有一些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法则可以取消了。有一些经济学家有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和上一段讲的有联系。有这么一些经济学家，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有商品生产，因此，也否认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斯大林就反驳这种观点，主张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是存在的，仍然是起作用的。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价值法则的作用范围是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否认价值法则是不对的，否认价值法则就会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搞乱。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中国在 1958 年下半年出现过的问题。那时候在实际工作里面，有些同志处理经济问题就不顾价值法则，出现了这种情形。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些生产由于需要的原故，即使蚀本也要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定要赚钱，不赚钱

就不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一些必要的企业就是让它蚀本，明明知道蚀本，还是要生产。但是对于这种企业也不能完全忽视经济核算、成本核算。所以还是要用价值法则来做工作，特别是整个总经济计划，就是要使我们的生产有盈利，个别企业可以蚀本，整个生产按总的计划计算起来应该有盈利，不然积累从哪里来呢？积累就是靠每年生产的产品超过价值，要能够创造一些新的价值，有了新的价值，才可以作为我们扩大生产的基础，作为进一步积累的基础。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里，价值法则是应该存在的。

什么叫做价值法则呢？价值法则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法则：就是用社会平均劳动来决定价值。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用社会的平均劳动来决定的，就叫做价值法则。

例如：生产一个茶杯，大概要多少劳动日。各种不同的劳动者，生产茶杯所需要的劳动日不同。熟练的劳动者一天就可以生产一个茶杯，非熟练劳动者三天才能生产出来一个。那么杯子的价值由什么来决定呢？决定于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价值的平均数，比如大体上一个杯子要两个劳动日生产出来。就是说拿到社会上论它的价值的时候，就值两个劳动日。尽管有的人是花了三个劳动日，可是拿到市场上来卖，它的价值只能定两个劳动日。所以，熟练劳动者一个劳动日生产出来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卖，它的价值可以定两个劳动日。如果产品是他自己的，自己拿出来卖，熟练劳动者就占便宜，非熟练劳动者就吃亏。因为非熟练劳动者他劳动三天，可是实际上拿回来的是两天的劳动价值。价值法则实际上就是按照社会平均劳动日来定价的。这是价值法则的第一条。

我对经济学不很熟，根据我的了解，价值法则的含义有三条：

一条是根据平均劳动日来定价;第二条是商品拿到市场上交换,按照平均劳动日等价交换。你的杯子是两个劳动日的价值，那么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的时候，大体上可以换回两个劳动日的报酬。它换成别的商品也好，换成货币也好。货币是商品的代表，用拿回来的货币买别的商品，所买到的东西大体上也是两个劳动日，所以非熟练劳动实际上把三个劳动日的东西卖出去，只能买回两个劳动日的商品。换成货币只能换成两个劳动日的货币。这叫等价交换。等价交换不是你劳动多少天就得到多少天的报酬，而是按照平均劳动为标准进行交换，所谓等价交换就是这样的交换。价值法则就是按社会的平均劳动日等价交换。按照生产的产品所包含的社会的平均劳动日来进行交换，这就叫做等价交换。

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是按照你每天的产品所能包含的社会的平均劳动日（作了经济上的必要扣除）给你报酬。计时工资名义上是计时，实际上工资的规定不是真正按照实际工作的时间来规定。因为计时工资有等级，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同样的工作时间得到的工资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就是因为你每天贡献的产品里面所包含的劳动日有所不同。同样是计时工资，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就低，熟练劳动的工资就高。为什么要有这种等级呢？就是因为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在同样一个时间里所生产出来的平均劳动日的多少不同，价值不同，所以报酬也就不同。如果计时工资不是按劳分配，不是等价交换，那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里是没有工资的，如果说有工资，就是按照你劳动多少时间给你多少工资。不管你熟练不熟练。到了共产主义，熟练和不熟练之间的差别也不多了。

再一点，就是价格基本上是决定于价值的。价格是会变化的，每天的价格不一定一样，价格的变化，归根结底大体上是符合于

价值的。用货币表现出来的价值就是价格。那么市场上的价格经常有变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市场上的商品价格经常起变化，这个市场价格的变化是不是等于价值的变化呢？不能。因为价值本身的社会平均劳动日（相对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水平）是不变的，但是市场上价格常有波动，波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有时候某些东西太多就跌价，东西少了就涨价。有时候涨价会涨到价值以上，跌价跌到价值以下，一涨一跌不断波动。长期作过一个统计，平均起来，价格大体上和价值差不多。价值法则的内容就是这样。

现在就要问，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价值法则起不起作用？我们规定社会主义产品价值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按照社会的平均劳动日来定？能不能废除这个法则？不要按照社会的平均劳动来定，而是按照你实际做了多少天来给你价值。如果废除价值法则，按照实际劳动来定，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形呢？会出现这种情形：劳动的人要偷懒。因为一个杯子，熟练劳动者一天搞出来，非熟练劳动者三天才搞出来，如果按照三天的劳动日来定价值，熟练劳动者就要磨洋工了。熟练劳动者三天生产三个杯子得三天的工资，非熟练劳动者三天生产一个杯子也是同样得三天的工资，那么，这样一来，熟练劳动者就不愿意一天生产出一个杯子来，他会觉得吃亏。所以，就不能按照实际劳动日来定价值，而是按照劳动产品所包含的社会平均劳动日给你报酬。这样给报酬，非熟练劳动者就要吃亏一些。因为他吃亏，他就努力使自己变成熟练劳动者，熟练劳动者按照产品的平均劳动来拿报酬，他一天可以搞一个杯子，而杯子的劳动价值是两个劳动日的价值，所以，他一天可以得到两天的报酬，因此他的积极性就得到了鼓励。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需要这样的价值。因为有熟练劳动与非

熟练劳动的区别，有城市和乡村的区别，有工人和农民的区别，农民和工人又有生产力水平高和生产力水平低的差别。正因为有这样一些差别，就需有平均劳动来计算价值比较合适。既然是用平均劳动来计算价值，需要有等价交换，不能不实行等价交换。

另外，谈市场的价格。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市场价格，国家是可以设法控制的，至少主要的必需品的价格可以控制。但是，控制价格的时候，有什么原则呢？如果国家的价格很低，低到价值水平以下，如收购农产品规定的价格很低，在农业平均生产价值以下，那么，就是要农民蚀本，即使不蚀本，农民也赚不到钱，得不到赢利或者赢利很少，不能够搞积累。如果国家这样子搞，农民的积极性就要大大地降低。苏联有一个时期就有过这个问题。所谓“剪刀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太低了，低于工业品的价值以下，使得农民除了收回成本以外，赢利很少，甚至于几乎没有赢利，这就对农业的发展不利。但是，如果你把价格规定的过高了，高于价值太多，那么，国家就要大蚀其本。国家蚀本太多，国家就不能积累。

所以，国家控制价格的原则，是一个总的原则，不是具体问题。总的原则是：大体上要使价格适应价值，基本上和社会平均劳动差不多，以平均劳动为标准，可以高，可以低，具体情形可以有变化。比如，有些是国家急需的东西，可以抬价收买，国家可以蚀一点本，那是个别的、特殊的。有时候，有些东西国家不需要，就可以降低价格。不过社会主义的国家要照顾一个原则，降价，不能使生产者破产。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上有时候供给过多了，要降价，使生产者破产。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这样做。我们现在的鸡蛋和肉多了，收购价格要降低一点，但是不能够降得太厉害了。在旧社会里，丰收的时

候就大跌价，跌到价值以下，结果使农民破产。我们是降到适当的水平。以前因为缺少这种东西，所以提高它的价格，使得它的价格高于价值。现在降下来跟价值差不多，有时候比价值稍微低一点，也没有关系。

还有一点，城市和农村应该努力作到等价交换。苏联的“剪刀差”，主要就是一般工业品按照价值定价格，甚至于比价值还高一点。农产品在价值以下，成为不等价交换。不等价交换在旧社会是一个基本规律。城市剥削农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一个基本规律。用城市剥削农村的方法，使农民出售一部分产品低于它的价值，低到把剩余劳动完全搞干净，甚至于除了剩余劳动以外，把必要劳动也剥夺了一部分。资本主义社会城乡之间经常是不等价交换，而且是极端不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初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在工业上能够掌握大量的积累，所以就多多少少搞一点不等价交换。苏联就是因为搞重工业，或者是为了快一点搞重工业，所以就压低农民的生活，使农业和工业的“剪刀差”相当大。当然，比起旧社会来说可能还是小一些。这是讲斯大林那个时候。现在，赫鲁晓夫就不同了，恐怕他在名义上是为了农民，要提高农业的生产价格，实际上从其他各方面把农民生产的东西剥夺了。所以，他的农业衰退比斯大林时候还厉害。

价值法则，是不是就是这么几条原则，学过经济学的同志可以研究，可以考虑。这是我的意见，一个是按照社会的平均劳动来决定价值，另一个是市场上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再一个是价格要波动，价格波动的总方向是跟价值适应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波动是自发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价格的升降，可以由国家控制，自由市场多多少少有点自发的，但是国家限制它的自发性，用国家的力量来控制价格的涨跌，使之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利

于集体为原则。国家如果需要某一种产品，很需要，但是没有，这时候就可以提高价格，蚀本来收购。前两年的蔬菜，我们北京就蚀本收购。在市场上一分钱就买一斤西红柿，而实际上收购西红柿不是一分钱一斤，而是好几分钱一斤，国家为了发展生产，可以使价格高于价值，高得很多。那么，蚀本怎么办呢？蚀本就在别的地方补，由生产比较多的商品中赚钱，或者有些产品搞高价，如古巴糖、高价点心等。这一方面蚀本，那一方面赚钱。总的来讲，国家付出的价格跟总的生产品的价值差不多，这样自觉的搞平衡。资本主义社会是自发的平衡。是不是就是这么几点，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据我自己了解，价值法则就是这几点。价值法则的这几个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是不断起作用的，而且我们要自觉地利用它。

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价值法则是肯定起作用的，这一点不能够有任何怀疑、误会。斯大林肯定了这一点，斯大林是对的。那些反对他的经济学家是错误的。说斯大林有缺点和不够的地方，是说他没有进一步地提出中心问题是价值法则自发地起作用呢？还是我们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自觉地加以运用它呢？他只是提出了这么一个原则，就是限制价值法则的作用范围问题，这是对的，但是，单这点还不够，不是全面的，没有把中心问题提出来，限制作用范围也是一种自觉的控制问题。

这一章的中心内容就是这样一些，正确的和不够的地方大体上就是这样。

我们再把这一节的文字说一说。

第 1 段，第 2 段，第 3 段的文字肯定了价值法则是起作用的。(见旧版第 17 页第 1—3 段；新版第 552 页第 6—8 段)

下面第4段。（见旧版第17页第4段；新版第552页第7段至第553页第1段）

“但是，价值法则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法则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作用，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在于，为了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受价值法则影响的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这一段是讲的这么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价值法则的作用范围是什么？第一，在商品流通的范围内，价值法则是要起作用的。第二，在生产范围里面价值法则也有影响（有影响也就是有作用），所以，在生产范围内价值法则有作用，而且受影响的这种生产主要是指消费品。

在这里面，斯大林有这么一个思想，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只有生活的消费品才能够当做商品来生产（当做能够拿到市场上买卖的商品来生产），生产资料是不能拿到市场上卖掉的。生产资料是不受价值法则的作用。斯大林的这个思想恐怕要做一些修正。当时在苏联可能就实行这种政策。比如：生产资料，像拖拉机这些东西，只能由国家调拨而不能出卖，所以不是商品生产，因此它就不受价值法则的作用。可是，消费品要拿去跟集体农民交换，要卖给工人，所以消费品也是商品生产，因此只有消费品才受价值法则的作用。这个思想恐怕就是受到苏联当时政策的限制，所以有一点片面性。

现在看起来，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生产资料恐怕还是要受到价值法则的影响，价值法则也起作用，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提出工业为农业服务，我们大量制造农具去卖给农民。我们不只是制造拖拉机搞国营农场、搞拖拉机站，拖拉机还可以卖给公

社。还有排灌机器，甚至于有小的电动机。另外，有中小型的农具，我们大量生产，这些都当做商品生产拿去和农民交换，所以就不能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完全不能作为商品生产，只有消费品才能作为商品生产，不能这样说。他这里这样说是片面的。

另外，是不是价值法则在我们生产里面没有调节作用？斯大林讲的这种调节作用，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自发的调节作用，就是生产的东西过多了，在仓库里堆积起来，可是没有人买，那时候价格就降低了，价格低于价值。所以，这种商品的生产者、资本家就不愿意再生产这种商品了。他就停止生产了。

所谓价值法则的调节作用，就是价格降到价值以下，就使商品减产。反过来说，如果一种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就涨到价值以上，生产企业就急于生产，很多资本家就投资生产。生产一下子就多起来了。所以，价值法则调节生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是这样调节的，就是生产过剩了，价格跌到价值以下，就会引起减产，引起生产缩小，反之，生产不足了，在市场上引起供不应求，价格就涨到价值以上，这样就会大大的促进生产，这就是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调节作用。

这种价值法则，实际上是价值和价格的关系法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种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当然没有用。但是，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种调节作用呢？可不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国家的力量，自觉地利用价值和价格的关系来调节生产呢？利用价值法则来调节生产，这种调节作用有没有呢？我看还是有的。大家仔细研究一下薛暮桥同志的报告（《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载《红旗》1963年第7、8期），他讲到过这个问题。在那个报告里可以找到我们国家的价格政策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我们

国家自觉地对那些生产不足的东西设法提高收购价格，使得它的生产增长起来，对那些生产过多的东西，国家可以在收购价格方面加以限制，甚至对坏产品可以不收购。现在，我们规定一条，凡是验收不合规格的，我们就不收购。这也是一种调节。这种调节是自觉地调节。认识了价值法则，利用价值法则去调节生产。

斯大林这里讲的还是有点片面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里面的价值法则没有调节作用，恐怕有点片面。问题不是有没有调节作用，而是那种调节是自发的，还是认识了价值法则以后自觉地用国家的力量，来统筹兼顾，自觉地加以调节。从6亿人口出发，从国家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用价值法则来自觉地调节生产。我看这种情形是有的，而且不仅是在生活资料方面有，生产资料中有一部分可以这样做，就是国营企业里面，有时候也要用价值法则来调节。你不用这种价值法则来调节，有些生产部门为了赶任务，搞出许多不合格的东西来要你收购。国家花了很多钱，买了不能使用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人不用点价值法则的力量来限制他，那也不行。当然必须强调政治挂帅，政治教育。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里面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样高的觉悟，在思想上一方面要政治挂帅，提倡保质保量，搞比学赶帮运动；另外一方面也要适当地利用价值法则来进行调节。

刚才我们这段还没有念完。“……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法则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法则的。”

斯大林在这里讲价值法则没有调节作用。但是在企业里面，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可以利用价值法则，这是对的。你怎样核算呢？

当然是按照价值法则来核算。因为整个产品要按照社会平均劳动来计算价值，所以，企业内部也只能按照价值法则来搞经济核算。

下面第5段（见旧版第17页第5段至18页第1段，新版第553页第2段）就用不着再解释了，因为都是讲这个问题，企业里如何降低成本，如何提高生产？搞经济核算要用价值法则。

再下面第6段（见旧版第18页第2段，新版第553页第3段至554页第1段）用不着讲，主要是批判了苏联一些人不懂得价值法则。

“糟糕的并不是价值法则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法则所发生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下面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价格不能乱定。怎样规定价格呢？要由价值来规定，不懂得这一点就会在经济上起破坏作用。

规定价格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薛暮桥同志在一次报告里提到国家定价也是有点斗争的。每一种企业都希望自己的产品价格高一点，所以各方面都有斗争。所以，国家要有一个统一的价格机关来平衡各个生产部门的价格。每一个部门都想争自己的价格，有时候争得过分，会出现本位主义，甚至会有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服从国家的整个计划的控制，不照顾国家的大局，只注意自己这方面的利益，就会出现影响全局的问题。比如，你向农民征购农产品时，如果农民的这种产品很多，市场价格很低，如果他一定要国家服从他的利益，还要用很高的价收购，一点也不肯减价，有时候可能是本位问题，有时候是是非问题。本位主义发展了，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问题。只顾自己的小利益，不顾国家的大利益，如果国家过分照顾他这点，他就会利用这点发展资本主义。

再下面第7段。（见旧版第18页第3段至第19页第1段；新版第554

页第 2 段）

“然而，这一切是不是说价值法则在我国也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广阔的发生作用的场所，价值法则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

这一句话也是又对又不对的。价值法则在我们国家，在有些企业里面是不能够成为生产调节者的，特别是国家特别需要的尖端企业，不要因为它蚀本就不搞了，即使要蚀本也要搞。价值法则成为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有些地方，有些范围里是没有的，这是对的。但他概括得太广了，好像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里面任何调节作用都没有。这一点恐怕还是有片面性的。

他在这一段最后说：

“……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能不限制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对生产的影响程度”。

这些话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些话说得过了一点，一点自觉的调节都没有了，恐怕还不能这样说。这里面有一句话：“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这是讲苏联当时的情况，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点，我们现在完全清楚了。

下面第 8 段、9 段（见旧版第 19 页第 2、3 段；新版第 554 页第 3、4 段）讲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法则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法则是对立的。这个话说得很对。

“在这方面起限制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这个法则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

“在这方面起限制作用的，还有我国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一般的整个的经济政策，它们都是以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法则的要求为依据的。”

这两段是讲我们的计划是以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法则为依据的。这大体上都是对的。

下面第10段（见旧版第19页第4段；新版第554页第5段）有一点缺点。

“这一切就使得价值法则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这段就说得过了一点。他的理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基本法则之一，就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法则。因此，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了。我看，如果把“生产调节者的作用”改为“不会起自发的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这样说就确切了。而且这也是从总的方面来说是这样。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地方自发的调节作用就仍然存在。

第11段（见旧版第19页第5段；新版第554页第6段至第555页第1段），讲苏联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高。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法则在我们中国有了一些发展，就是加上一个高速度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发展应该是这样：既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又是高速度的。高速度是对资本主义来说，比资本主义的速度要高。赫鲁晓夫上台以前，苏联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中国现在发展也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发展比资本主义社会是快得多。

下面第13、14段（见旧版第19页第6段至第20页第2段；新版第555页第2段至第4段）斯大林批驳了一种观点。

“有人说：价值法则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恒久的法则。如果价值法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为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末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为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

的调节者的效力”。

斯大林否定了这一点。认为将来不会有价值法则起作用。到共产主义社会价值法则就不会起作用了。这个思想我们应该肯定，我们现在应该同意斯大林的这个思想。但是，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里面，是不是马上就会消灭一切价值法则的作用呢？我们说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经过三个过渡：第一，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三种经济成分过渡到统一的经济成分。第二，由两种所有制的社会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三，由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价值法则的作用马上就消失了？这个问题恐怕还不能断定，恐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价值法则的消失也可能还要经过一个时期。根据我们过去对许多问题的经验看起来，过渡不会那样纯粹。所以，恐怕也要有一点保留。

如果照斯大林这样一种提法，就是在共产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价值法则的作用马上不起作用了。从原则上讲是对的，但是，如果要讲实际情况，实际的发展过程，恐怕不是这样简单，不是一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里面的东西立刻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了。毛主席在这次中央会议上讲过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那样纯粹，到了共产主义还可能有许多问题。首先，价值法则的影响恐怕还要有一个时期才能完全消失。因为各取所需不是一开始什么东西都各取所需了。到共产主义社会开始可能是必要的生活资料按需分配。按需分配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而是社会根据你的需要分配给你多少。

按需分配是采取什么办法来分配呢？也可能是采取交换的办法来分配，开始拿工资，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购买，或者到处设有仓库、商店，你要什么东西就去拿呢？还要有一定的过渡。过渡

到那种时候，你能说价值法则就干干净净的没有作用了？恐怕还不会这样子吧。

第 15 段至 22 段（见旧版第 20 页第 3 段至 22 页第 1 段；新版第 555 页第 5 段至 557 页第 2 段）斯大林在批判了上面的问题以后，下面他又批判了一种观点。

下面这个论断也是完全不正确的，“就是：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法则仿佛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去发展那比起往往赢利较少而且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说来是最能赢利的轻工业？”

这段话里说价值法则调节着各个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发的调节是有的。因为某种生产供不应求，价格高涨，资本家就大批投资生产这种东西。投资的结果就把劳动力吸引到这方面来了，生产力在这个部门就有所增加。另外一些部门，商品价格跌落了，资本家就不搞了，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就转移了。所谓价值法则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就是这样的意思。

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这种情形？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这种情形。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是按计划来调节生产的，不是价值法则自发的调节生产。所以，斯大林的这句话还是对的。有些部门尽管蚀本，但是只要国家需要，国家就投资，劳动力就吸引到这方面来了。这个劳动力是按照国家的计划分配的，按照国家计划调节的，不是按照价格的涨落来分配、来调节。

那么，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应该照顾价值法则，只要是国家需要的东西就拼命让它蚀本，这也是不对的。在蚀本的情况下要尽

可能地蚀得少一点，而且要尽可能地在别的地方有所补偿。一个资本家经营的大公司要采取这种办法，他在这方面蚀本，在另一方面赚钱来补贴。他的企业内部可以平衡。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大企业，国家可以做总的调节，而且这个调节还是要利用价值法则。在这一方面蚀本了，在那一方面赚钱。在蔬菜方面、粮食方面，国家要蚀本，在一些奢侈品方面或者比较稀有的产品方面就增大价值，这样子来补偿。补偿国家的损失，使整个国家总的来说还是收支平衡又有节余。节余从哪里来的？总的来说是利用价值法则。某些方面蚀本了，某些方面赚回来，平衡以后赚的还是要多一点。

所以，完全不用价值法则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是让价值法则自发地起作用，是自觉地利用价值法则来服务于计划的调节。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价值法则是自发的起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基本上是利用价值法则来为国家的计划调节服务的。价值法则不是完全不应该利用。不能说因为价值法则在我们的生产里不起调节作用，因此我们就在生产里根本不管价值法则了，不能这样子说。总之，认为价值法则对我们有调节作用，甚至起自发的调节作用，这是错误的。认为价值法则一点调节作用都没有，搞计划的时候不需要对价值法则加以利用，这也是错误的。斯大林这本书在这方面讲得不全面，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有很多是好的。

## 五、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第 1 段至 5 段（见旧版第 22 页第 3 段至 24 页第 1 段；新版第 557 页第 4 段至 558 页第 4 段）。斯大林在这个题目里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

里还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并且承认还有本质的差别；同时认为这种差别是对立。这个思想是对的，或者就他的基本内容来说是对的。（1）承认有差别是完全对的；（2）认为城乡、工农之间的差别成为对立的（他所讲的对立实际上包含着对抗的意思）。

有差别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对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城市是一面，乡村是一面，这是对立面。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也是对立面。

在这章里有个缺点，就是好像认为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对立已经消灭了。对抗好像已经完全消灭了。文章里写道：

"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对立的基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见旧版第 23 页第 2 段；新版第 558 页第 2 段）

这句话有缺点，这句话就否认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性。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解释成为：这种对立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里已经逐步消灭了。这样解释比较好一些。

斯大林的这本书受到他 1936 年自己规定的教条的束缚，否认了过渡性，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已经看出过渡性，但是他不能肯定这种过渡性。已经承认有差别了，但是又说对立已经消灭了。差别就是矛盾，矛盾包含对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简单地说已经是一种有利的关系了。

这第 3 段讲的："无疑地，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而城市和乡村利益的对立、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

这句话是比较对的，下面接着讲："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了的。社会主义城市，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的事业上所给

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基础,而有系统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见旧版第22页第5段至23页第1段；新版第557页第4段至558页第1段)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斯大林当时说的话到现在十几年了，苏联的情况还不是这样。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就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不可能，恐怕还很多。所以是对抗正在消灭，而不能说完全消灭了。

下面第6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关系也是这样。他说: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中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之间是存在着分裂的。大家知道，工人对待厂长、工长、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就好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的那种敌对的态度，就是在这个分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然，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利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也消失了。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个统一生产集体的成员，都极端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他们之间过去的仇恨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见旧版第23页第4段至24页第1段;

新版第558页第4段）

同样地，这段话我们按照刚才的说法来解释。这里的对立就是对抗的意思。就是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抗基本上消灭了。不是说现在赫鲁晓夫这样的社会，就是在他以前的社会也是说对抗已经基本消灭了。或者是完全消灭了，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样说有点过分。对抗只是在逐渐消灭，因为矛盾的差别仍然存在，对立面仍然存在，这点是应该肯定的。

下面讲关于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差别消失的问题。

第7段至13段（见旧版第24页第2段至26页第2段；新版第558页第5段至560页第4段）："例如，如果拿农业和工业的差别来说，那么在我国，这种差别不仅归结为农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业的劳动条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归结为在工业中我们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们却有着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情况引导到商品流通的保存，只有工业和农业间的这个差别消失时，商品生产及其一切后果才会随之消灭。因而不能否认，农业和工业间的这个本质差别的消失，对于我们应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段是对的，没有什么错误。工农业有一个本质的差别，主要就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差别。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消灭这个差别，实际上这就是过渡性。而且把这点当做"头等重要的意义"，也都是正确的。

怎么来消灭差别呢？是不是把工业和农业合起来呢？消灭差别的办法恐怕还是要以工业为主导，使农业工业化。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斗争主要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业是先进的，农业是比较落后的。所以消灭差别就是以先

进为主导来消灭落后。工业和农业的差别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别。集体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还是落后一些的。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但是工业是农业的主导，是消灭落后农业的对立面。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消灭一面来解决矛盾。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对立面的斗争。经过斗争的结果解决了矛盾，而解决矛盾是把对立面中的落后的一面消灭掉。不是把两个方面合在一起，总是要消灭一个方面。

苏联讲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可以用融合的方法来解决的。如果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矛盾是不对的。解决矛盾并不是对立面融合，而是要消灭对立面的一个方面。有时两个方面都消灭，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比如奴隶社会就是这样的。在奴隶社会矛盾发展到最后时，奴隶主和奴隶都消灭了，然后出现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又有新的对立面。封建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把封建主消灭，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封建社会发展的结果不是把封建地主和农民融合起来。把封建地主和农民融合起来的思想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幻想。在中国来说，是孔子学说的幻想，想把封建地主和农民折衷，永远保持他的封建统治。

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怎么解决？解决的办法是把落后的农业消灭。苏联认为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两种制度可以共同进入共产主义。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怎么解决？是不是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简单地结合起来？这样不能解决！现在我们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联合起来，建立了一种友谊的关系，但是还有矛盾，不能说矛盾就没有了。不能说对立面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还是有对立的。脑力劳动者要到农村或工厂劳动，相当费力，不是

很容易的事，动员下去以后，有时候搞的比较好一点，有时又回来了，又不好了，这种情形比较多，但是大多数是搞得好的。

对立并没有完全消灭，工作搞得好的，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掌握得好的，对抗可以基本上消灭。知识分子下乡，也可以搞得好，大多数是可以搞得很好的，可以消灭对抗。即使过去的仇视和不信任没有了，建立了友谊的关系，建立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但是要消灭差别，要解决矛盾还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方面要消灭体力劳动者的文化技术落后的状态，另一方面要消灭脑力劳动者的资产阶级思想。消灭这些东西以后矛盾就能得到解决。所以矛盾的对立面和平共处、互相融合这些东西是没有的。

斯大林在这章里讲到：如果将来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本质上消灭了，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切差别都消灭了，这点还是对的。工业和农业的两种所有制的差别消灭了，都是全民所有制了，那时候是否工业和农业就没有差别了？还是不能这样说。因为生产条件不同，工业有工业的条件，农业有农业的条件，总是有不同的条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还是有差别（参见旧版第 25 页第 2 段至 26 页第 2 段；新版第 560 页第 2 至 4 段）。

斯大林说的将来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本质上消灭了，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切差别都消灭了，在这点上讲得很对。为什么对？因为从这点出发，应该得到一个结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工作条件不同就有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条件不同就会有矛盾。所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先进与落后，甚至唯心与唯物的矛盾也还是会有的。可是斯大林没有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他的思想基本观点是对的。我们肯定他对的观点，同时还要进一步发展这个观点。

差别永远是存在的，这里所讲的本质差别，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上的本质差别。工业和农业工作条件的差别是不是也算本质的差别。也可以说是本质的差别，工作的条件就有本质的不同。将来共产主义社会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有没有本质的不同？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应该这样说。但是这个本质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本质是两回事。如果像斯大林所说的本质的差别被消灭了，那么这差别就不是本质的差别了。这个说法也是不全面的。因为本质有各方面的本质。生产关系方面的不同是本质的差别，工作条件的不同也是本质的差别。

现在讲下面几个题，这几个题的问题都比较简单。原书第五六两个题讲的是国际问题，主要不是讲经济问题，所以不需要具体讲了。

## 六、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这没有什么可讲的。斯大林肯定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总的来说，是剥削剩余价值的法则（见旧版第 34 页第 1 段；新版第 567 页第 5 段）。斯大林批驳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价值法则这一观点，他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见旧版第 33 页第 3 段；新版第 567 页第 2 段）。

其次讲到有人说，平均利润率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斯大林也反对这一观点，并给以批判。他指出“平均利润是最低限度的赢利”，现代的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它不满足于平均利润，要搞“最大限度的利润”（见旧版第 33 页第 5 段和第 34 页第 3 段；新版第 567 页第 4 段和第 568 页第 2 段）。斯大林的这个思想大体上是对的。

这些批判就不需要多讲了，主要讲一讲他所肯定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对不对。

“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见旧版第 34 页第 2 段；新版第 568 页第 1 段）

现代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有没有这个基本的经济法则？有没有这个主要特点？修正主义就反对这个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裁军剩下来的钱帮助落后的国家。可见修正主义是反对斯大林这样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我对于世界经济没有很多的研究，但是一般地看来起码斯大林的提法是对的。

垄断资本要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使他们破产、贫困。剥削大多数人，对少数人进行收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这是指什么人说的呢？是不是指大多数人民？不是。美国南方的人民生活非常穷。北方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好一点，是被收买的。

他们用剥削本国的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这三条我看都没有错。

1. 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使他们破产（个别的情形可以例外），法则就是讲总的趋势，总的趋势是不是大多数人民贫困破产？肯定是。

2. 奴役和不断地掠夺其他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的人

民，这肯定是事实。要奴役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美国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法国、德国，特别是落后的国家变成它的奴隶，听它的话，服从它的指挥。当然，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要奴役戴高乐，这是肯定的，但是戴高乐不听他的话。对于落后国家的人民，他是不是要奴役呢？肯定是这样的。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他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人民坚决反抗。

例如：在古巴问题上，美国是否不想奴役它呢？不是的。因为古巴人民坚决反抗它，使得它没有办法奴役。

3. 为了最高的利润，用搞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美国搞不搞战争？是要搞的。它是大仗不敢搞，小仗不断搞。用小仗来刺激经济。这里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搞国民经济军事化。没有哪一个国家有所例外。讲裁军是口头上骗人的话，实际上它哪里裁军！

就这几条，现在不但帝国主义国家这样搞，就是修正主义国家也这样搞。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是不是也这样搞呢？也是这样搞。所以应该肯定斯大林的这段话是正确的。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这个问题以前我讲过，但是讲得不太确切。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个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何在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见旧版第35页第7段至36页第1段；新版第569页第4段）

斯大林的这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提法有点片面。“用在

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从社会主义生产总的方向来说，可以说是这样要求的。总的要求是技术基础越来越高，生产不断增长，不断完善。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把这看做是一种到处都要这样，那就不一定对了。但是这点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在后面一句“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里的“最大限度”是有毛病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最大限度”也达不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按劳分配，不是“最大限度”的分配。如果是逐步满足社会主义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是可以的。最大限度的满足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经济法则要用毛泽东思想来重新考虑。

1942 年毛主席在陕北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这个原则是社会主义生产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原则是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发展生产、保证剥削。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当时我们的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解放区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因素。已经有公益金，这就有了社会主义性质。

毛主席主要是指的公益金，也是指的当时解放区的一般供给。

发展生产当然不是发展公益金，还是发展一般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这说明当时有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因素。生产的领导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而不是发展生产保证剥削。当然还是有剥削的，如吴满有是新富农，就有剥削，那时候提吴满有的方向是有点不对的。总的方向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而不是富农经济的方向，不能让它自由发展。那时最后两年有点右了，保护富农有些过头了。

现在，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

的原则，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这个原则是对的，是实事求是的。斯大林的所谓基本经济法则恐怕要修改。

有的同志问：社会主义社会有多少基本经济法则。我看考虑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处。苏联教科书写得不好。因为总考虑这个基本经济法则，从这个公式出发来解决问题。所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不要从基本经济法则出发。因为基本经济法则是讲他的总的发展方向，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怎么样发展的问题。具体的发展问题并没有解决。

要了解社会主义经济法则，具体了解它的发展，还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来研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怎么样又适合、又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怎么样又适合、又矛盾。具体来研究这些矛盾，就可以逐步把社会主义经济搞清楚，把经济发展的过程搞清楚。

所以过分注意基本经济法则不一定恰当。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还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适合、又矛盾的法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又适合又矛盾的法则是基本的？应该说，“两个”基本矛盾法则可以解决整个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也是指导我们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是要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是不断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适合，适合后又揭露矛盾，揭露后又解决，解决后暂时适合，适合后又出现新矛盾，再解决矛盾。

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主要是由矛盾来推动的，还是由适合来推动的呢？主要是由矛盾来推动的。如果适合是主要的，或者适合是绝对的，那么一适合就可以不进步了。问题是适合以后又不适

合了，又要重新调整，这样才能不断发展，不能一劳永逸。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只是暂时的解决了矛盾，出现适合的现象，但是以后又出现新的矛盾。不揭露矛盾就不能前进。所以一分为二是根本规律。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一定要适合，但是不能绝对适合，这是经济规律的一个方面。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永远要一分为二，不断地一分为二，经过斗争解决矛盾，暂时达到适合，然后又一分为二，不断地一分为二。

发展总的趋势是不断一分为二。斯大林的书的缺点就是缺乏彻底的一分为二思想。把社会主义的矛盾看的好像一切矛盾解决得差不多了似的。这本书是他已经看到了矛盾，但是受他的公式的限制。所以他的思想不能彻底的展开，辩证法是不彻底的。

在这本书的后面斯大林《答A·N·诺特京同志》的信里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但是仍然有完全适合的思想，所以辩证法不彻底。他从新的现实里看到了辩证法，但是首先讲的是公式、原则，不能彻底地发挥辩证法的思想。这点是根本问题。

斯大林在《答诺特京同志》中说："你断言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达到使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而在其他社会形态下，只能实现不完全的适合。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当资产阶级破坏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时代，无疑地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否则，资本主义就不会像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那样迅速地发展了。"（见旧版第45页第4段至第5段；新版第577页第3段至第4段）

原来是讲社会主义，现在是讲资本主义，讲国际运动。所以问题更进一步了。完全适合公式更扩大了。这段话里有正确的东

西，又有进一步的错误。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已经是不恰当了。进一步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有时也完全适合生产力，这是错误的。这个公式应该放弃。因为前面我讲了，生产关系不能与生产力没有矛盾，基本上有矛盾，怎么能说完全适合呢？所以最后一段他不能不作一点解释。

“那么，‘完全适合’这种说法该怎样来理解呢？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见旧版第46页第2段；新版第577页第6段）

他把完全适合解释成为这样，这与以前的解释有些冲突。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有时候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发生冲突呢？就是说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这种情形。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开始就是互相冲突的。最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到处捣毁机器，打坏机器不是冲突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工人破坏机器就是发生冲突。所以把“完全适合”解释成为不发生冲突是矛盾着的。不能这样解释。

完全适合是没有矛盾的意思，没有冲突的意思。如果承认有矛盾，就不能说是完全适合。

后面接着说“……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而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同上）

这里讲的惰性力量是什么呢？不清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但是不明白惰性力量究竟是什么？所以更清楚地解释还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本书。

惰性力量就是旧的力量，旧的习惯势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反对改变生产关系，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它是有矛盾的，既然有惰性力量，就不能说完全适合。

我原计划讲这些，有的同志要求多讲，多讲没有必要。前面的第一个问题正在写提纲，也可能是文章。总的还是关于“一分为二”的问题。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附录：**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这种提法是有毛病的，这个提法不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里提出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小册子里提出的，他在这本小册子里提了以后，就发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有的苏联哲学家就作了夸大的解释，夸大到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就没有矛盾了。在斯大林这本小册子出版以后，苏联很快就写文章来解释，像最有名的尤金也写过文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这种提法，在苏联相当长的时间在理论上引起了一种混乱，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没有矛盾了，这种混乱一直到1952年斯大林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的时候还可以看出来，经过15年苏联还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没有矛盾，持这种见解的是主要倾向，是占优势的，如果不占优势，这个问题就不成问题了，事实上它成了问题。所以斯大林就不得不在他最后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补救了一下，对他提出的原则，所引起的后果做了补救。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虽然完全和生产力适合，可是并不是没有矛盾。完全适合了，但

是又有矛盾。实际上，这种假定是互相矛盾的，逻辑上是有缺点的，既然有矛盾就不能说完全适合，既然说完全适合就不能说有矛盾。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里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矛盾，对他原来的提法有修改。

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没有矛盾，要根据毛主席的提法来作说明，……

摘自：艾思奇《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1961.12.25)，速记稿第2—3页。

总之，应该肯定这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这种提法恐怕要修改。斯大林关于完全适合的问题不但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运用到资本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到：资本主义初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完全适合的。对社会主义不能这样说，对资本主义恐怕更不能这样说。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适合的，但是，完全适合这种提法就不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规律不能解释为完全适合，因为这种情况不会有。矛盾是绝对的，是自始至终的，矛盾对任何事物总是自始至终的存在，不可能有没有矛盾的时候。德波林学派主张矛盾不是自始至终的，事物开始的时候没有矛盾，开始的时候只有差异。这个理论是错误的。1931年苏联的哲学家米丁、尤金等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批判了这个错误的理论，后来他们自己又不按照原来所坚持的正确原则来解释问题。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原则，就是：矛盾是自始至终存在的，社会主义初期首先是适合，但是也还有矛盾。

摘自：艾思奇《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1961.12.25)，速记稿第4—5页。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

（1964.11）

〔1964年的说明〕下面的文章，是1955年8月写的。写成这篇文章的经过，需要说明一下。

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现在的高级党校的前称）的教学干部在学习总路线的过程中，在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以杨献珍同志为代表的一方，主张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个综合的基础；反对杨献珍同志的一方，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包含着资本主义基础和社会主义基础，这两种对立的基础互相间进行着“谁战胜谁”的斗争。杨献珍同志的“综合基础论”，实际上是抹煞了这个“谁战胜谁”的斗争，表现为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

杨献珍同志把他的意见写成文章，交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向一些研究理论工作的人征求对于他的文章的意见，我

* 1983年收入《艾思奇文集》时，所写的题注是：此文写于1955年8月，发表于1964年11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用的标题是《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现恢复1955年8月的原题，并在《1964的说明》中删去了“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语。

就写了下面这篇文章。这个争论当时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已经公开展开了。但杨献珍同志拒绝把他的文章提出来公开讨论，因此我这篇批评文章也就没有发表。

杨献珍同志把反对他的人的意见叫做“单一基础论”，这是一种歪曲；因为反对他的人并没有说过渡时期只有社会主义一种基础。当时讨论中所说的过渡时期，是专指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点也必须向读者声明。

——作 者

我对于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在某些主要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供研究参考。

一

新中国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不是像杨献珍同志所谓的“综合经济基础”。应该承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指出的五种经济成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四种所有制，都包含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之内。但是，过渡时期的经济所包含着的五种成分或四种所有制决不能拼成一个综合的基础。在四种所有制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是日愈发展，日愈获得广大地盘的新生的东西，而其他两种——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和资本家的私有制，是日愈走向消灭境地的衰亡着的东西。前两种所有制日愈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逐步形成、逐步建立起来的过程，后两种所有制日愈走向消灭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衰亡的过程。过渡时期的经济之所以为过渡的，就是因为它还没有一种已经完成了的经济基础；它还并不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只是在形成中。在它中间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存在着，不过是在日愈消灭过程中，

所以，应该说，在过渡时期，实际上是存在着两种互相对抗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这两种经济基础都不是已经完成了的，它们相互间进行着生死的斗争（或“谁战胜谁”的斗争），它们不是和谐地共同综合成为一个定型的经济基础，而是相互处在尖锐矛盾和生死斗争的过程中，就在这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归于消灭。

我认为，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对于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的过渡性缺乏上述明确的观念。他笼统地把五种成分或四种所有制看做是构成一个统一的基础的各部分，而不很强调或者就没有强调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新生的，有一些是衰亡的，两者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和生死的斗争，它把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说成是一个统一的基础，因而模糊了事情的最重要的实质，即：过渡时期实际上是两种互相对抗的基础的矛盾运动和尖锐斗争的过程。由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观念，因此就发生其他若干带有原则性的错误。

举一个例说：该文谈到苏联过渡时期的问题时，有这样一句话：“苏联国家当时还是把个体农民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我认为这就是在原则上有错误的。如果个体农民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了，那么，为什么还用得着改造小农经济呢?这句话与该文前面所引的列宁的话完全矛盾。列宁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坚固的经济基础。（《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页）列宁曾说过小农经济每日每时不断地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里谈到个体农民经济时，是用这样的提法：即“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个体小农经济。”（《斯

大林全集》第13卷，第158页）自然，斯大林也曾指出，个体农民经济是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的经济。这是说，作为劳动者的个体农民，可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作为个体私有者的农民，按其生产关系的自发的趋势来说是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无论如何，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把个体农民经济看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意思。不仅一般地没有这样“看做”，就是在“当时”，即在苏联的过渡时期，我认为也没有这样“看做”。如果当时已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那么，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无需乎开展农业合作化或集体化的运动了。

## 二

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以什么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呢？是同时以四种所有制为基础呢？还是只能以正在建立中的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呢？杨献珍同志根据他所理解的“综合经济基础”的看法，认为我们的国家政权是同时以四种所有制为自己的基础的，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反对后一种说法，即我们国家政权只能以正在建立中的全民所有制及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他的文章批评这种看法，说它是反对党的路线政策的。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只看见事情的形式，不符合事情的实质。既然四种所有制应该归结为互相敌对并进行着生死斗争的两种经济基础，所以我们的国家政权就不是同时以四种所有制作为自己的统一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政权所依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正在建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它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我们不能同时以互相敌对的两种经济制度作为自己的基础，这是不难了解的。我以为这样看不

但不违反党的路线政策，而且只有这样看才能真正说明党的路线和政策；而杨献珍同志的“综合基础论”则正是违反了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过渡时期的政策。

首先要问，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什么性质的国家政权？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工人阶级专政的意义是什么呢？工人阶级专政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任务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不是以此为自己的任务呢？当然是的。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什么路线呢？这个总路线难道不是我国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党和国家政权来领导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消灭资本主义的路线吗？当然是的。毛主席说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什么生产关系呢？当然是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改变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个体经济，使社会主义的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构成统治一切的经济基础。要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政权的路线和政策的实质。这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政权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只能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虽然现在还正在建立中）为自己的基础，而不能以资本主义的和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自己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首先，我们只要把这样一个问题拿来考虑一下，就可以得到了解：目前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我们的国家政权是相当巩固的，可是我们是依靠了什么经济成分才能有这样的巩固呢？是依靠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还是依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呢？当然是依靠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才能有这样的巩固；首先是依靠我们有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其次是依靠广大农民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

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如果这些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不能发展，而资本主义的成分倒大大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还能不能保持这样巩固呢？肯定是不能的。能不能说我们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地依靠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得到这样巩固的呢？我认为不是。不错，我们在当前的过渡时期也利用了资本主义，这对于我们有好处。但利用是不是就等于依靠呢？当然不是。如果我们不首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激烈的斗争，反对它的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如果我们不依靠着强大的国营经济，依靠农民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支持；如果大多数农民不是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合作化的道路，而是一定要坚持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方向，能够设想我们可以战胜资本主义和利用资本主义吗？当然是不能这样设想的。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不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并和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斗争，就不可能利用资本主义，更不能对它进行限制和改造。因此，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不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地依靠了资本主义制度和个体经济而得到巩固，而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实现而日愈巩固的。既然我们的政权的巩固不是依靠资本主义经济，怎么能说资本主义和个体农民经济是我们国家政权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呢？

其次，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作用也能说明我们的问题：上层建筑是要为自己的基础服务的。斯大林说："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如果我们的政权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和个体农民经济为自己的基础，按照斯大林指出的这个原理，它就应该帮助后者的巩固和形成。但是，我们的政权的出现，难道是为着帮助

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巩固的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它是要“采取一切办法”帮助社会主义制度来根除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私有制度。我们的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采取“一视同仁”的立场，而是采取“有所不同”的立场；它决不是要为资本主义服务，而只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它决不是要使资本主义基础巩固和形成起来，而只是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形成起来。这个特点愈到最近就愈加明显，将来还要更加明显。这样的国家政权怎能设想它是同时把四种所有制都看做自己的经济基础呢？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在一个地方也提到我们的政权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但他竟没有根据这一点认识做出他应有的结论来，反而说我们的国家把四种所有制同时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并且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到“上层建筑不是为某一单一的经济基础服务，而是为整个经济基础服务的”。这是明显的逻辑混乱；并且就他的全文精神来看，他在实际上是不赞成他在前一个地方的提法的。这样的看法，是等于抹煞了我们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专政的实质，也忽视了如像农业合作化运动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具体政策日益胜利的明显的事实。

杨献珍同志认为按照党的路线政策来说，应该把四种所有制同时看做我们国家政权的综合的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从形式上来谈问题，而不是看到了我们的路线和政策的实质。当然杨献珍同志也知道并且提到党的总路线是要“逐步地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为着要证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我们政权的基础这种说法，他就把他的立论的着重点放在当前时期我们的政权对于这些经济成分的照顾和安排方面，而没有强调我们的路线政策的任务主要是在于改造和消

灭这些经济成分。他说:“党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所依据的原则，就是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看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要求各经济部门（如工业、农业、交通）之间，各地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需要和可能之间，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党批评了那种思想观点，就是只顾本部门、本地区，而不顾其他部门、其他地区，只顾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顾其他经济成分，或者只顾需要，不顾可能；党认为，在这种思想观点支配下，必然会使计划发生彼此脱节，互不衔接或互相抵触的盲目混乱现象。党指示，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应该是一个全面计划，既要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各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文教等），又要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如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个体的经济），既要包括大型的、集中的、现代化的经济，也包括小型的、分散的、落后的经济。”

我们的五年计划是不是照这些原则做呢?当然是的。但是，仅仅根据具体计划工作中的这些安排、照顾的原则，是不是就足够说明我们的政策、计划的主要实质了呢？我们的五年计划的主要实质是不是就在于“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呢？我认为五年计划的主要实质，并不在于简单地“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和加以一定的安排和照顾。我认为五年计划的主要实质，是包含在它的几项基本任务中，即：集中主要力量建设各项工业以“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我们的五年计划是我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具体化，而我国过渡

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要经过一些过渡的办法来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包括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它根本不是简单地“包括各种经济成分”。

杨献珍同志为要证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还提出了一点理由，说我们的政权要“管”，而且也能够“管”各种经济成分，好像说凡是我们要“管”和能“管”的经济成分，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这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自然，我们要“管”和能“管”各种经济成分，但我们对各种经济成分是如何“管”法呢？是一视同仁地“管”还是“有所不同”地管呢？当然首先是“有所不同”地管。我们的“管”也有“一视同仁”的地方，这只是侧重在生产力方面，而不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还没有消灭以前，我们一方面要“采取一切办法”来改造它们的生产关系，使之逐步走向消灭；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地利用它们的生产力。这个“一视同仁”，并不是第一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有所不同”。杨献珍同志的文章也提到我们的“有所不同”的政策，但它没有认真接触到这个“有所不同”的政策的实质。我们是怎样“有所不同”地“管”各种经济成分呢？我们是这样管的：我们“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要使它日益巩固日益形成起来；我们管资本主义，主要是要使它的生产关系日趋消灭，管个体经济也是这样。杨献珍同志不是不知道这一点，问题是在于他认为凡是我们要“管”和能管的都是我们的经济基础。我认为，不能说凡是我们要“管”和能“管”的都是我们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只有我们要加以巩固和形成的才是自己的经济基础。如果说要“管”和能“管”的都是自己的经济基础，那么，在新中国政权成立后最初三年间，我们曾在土地改革中“管”过封建经济，难道能说封建经

济也是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最初三年间的经济基础吗？

杨献珍同志引用了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和列宁的《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中的话，企图证明个体农民经济是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22页)

斯大林的这段话，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把个体农民经济当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呢？我认为是不能这样解释的，斯大林的意思只是说，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不是可以希望它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在改造个体农民经济的过程中建立起来。斯大林的着重点是在于：1．"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2．"调整城乡关系"；3．"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4．"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由一到四是一系列的改造个体农民经济的过程，也即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程。这并没有简单地把现成的个体农民经济看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意思。

列宁的话是这样说的："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列宁在这里说到"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应该怎样理解呢？是不是能说，依靠不经改造的个体农民经济，就能实现这个任务呢？当然是不

能的，如果只有个体经济，那么，既不能在农村中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所生产的农业生产资料（如农业机械等）和生活资料开辟使用和交换的地盘，也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也就是不能实现列宁所说的任务。不改造农民，逐步消灭个体经济，怎能建立起列宁所说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基础”呢？列宁说过“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制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8页），但决没有说过个体经济也会和社会主义一致。

根据以上各点，也就可以知道，当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个对立的基础上，建立在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上和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个体小农经济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58页）时，决不是意味着他已经把“个体小农经济”当做了（哪怕是不长久地）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这个政权所因以产生并反过来又要对它服务、帮助它巩固和形成的基础。不错，我们的政权并没有等到个体农民经济已经完全改造成集体经济之后才成立起来，相反地，我们是在个体经济还大量存在的时候就成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了。既成立了政权，就要生活，就要吃饭，而吃饭的来源，在最初一个时期内主要的就要靠个体农民的支持，而要取得个体农民的支持，就要鼓励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他们种种帮助，如贷款之类。苏联曾经是这样做的，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这一切，是不是等于把个体经济当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这完全是两回事情。我们帮助个体农民，主要目的是为着暂时从他们的生产力方面取得物质上的供给，而不是要对他们的生产关系加以巩固和发展。经济基础是指生产关系而言。我们没有把巩固和发展个体经济这种生产关系作为帮助个体农民的方针，相反地，我们对于个体农民的种

种帮助，只是为着使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盟，以便使个体农民易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上集体化的道路。改造个体农民的生产关系使它走向集体化，这才是我们帮助个体农民的方针。这样的方针，决不是要把个体经济当做我们的政权自己的经济基础，这是很明显的。由此可见，我们在一个时期必须从个体农民方面取得物质上的支持，并为此目的而要设法鼓励个体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并不等于要把它的生产关系当做自己的基础。

类似的情形在资本主义经济方面也存在着。我们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取得一批工业产品和一笔税收，苏联在过渡时期，一个时候曾从富农方面取得粮食。我们“利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这只是利用它的生产力所提供的物质供给，虽然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必须在政策上对它的生产关系加以适当的安排照顾；但如果认为这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做自己的经济基础，那就是根本的错误。

总之，我们的国家政权，对于资本主义和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个体经济，是要“采取一切办法”来加以根除和消灭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农业的合作化政策，就是我们所采取的适合于我们国家情况的根除和消灭这些经济成分的办法，所以这些经济成分决不是我们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 三

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过去曾有一种错误的混乱的意见，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方面，应该算做是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的指导思想的一部分；虽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部分，然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面的不可少的部分。这种错误的思想，经

过讨论后被否定了。我现在同意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我们国家政权的惟一的指导思想，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相适应的，而不是与资产阶级的观点相适应的。我们的政权中虽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但它的一切政策路线以及各种制度都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决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构成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也是正在建立中的）上层建筑。过去，在我们的学习讨论会中，在这一点上获得了一致的意见。但是那次讨论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上层建筑问题，也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后来又有了这样一种偏向，即认为在过渡时期，似乎已经是只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素则根本不存在了。我觉得杨献珍同志的意见就是这样，而这样的意见我认为也是片面的。领导权是不能分割的，说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方面可以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中分担一部分指导思想的责任是完全不对的，哪怕说的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不对的。因为第一，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方面和反动方面并不能机械地割裂开来；第二，我们的人民政权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说资产阶级思想可以在我们国家政权中分担指导责任，就等于说资产阶级思想也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这是很不合理的。所以，当时的讨论会上否定了这种意见是完全对的。但是否定了这种意见，并不能同时把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素的存在也完全否定了。因为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虽然是不完全的）既然存在，也就存在着它的上层建筑（哪怕只是一些因素，一些并未完全形成的上层建筑的现象），这不仅仅是逻辑问题，也是事实问题。资产阶级思想，决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的任何构成部分，但作为与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互相对

立、互相斗争着的思想体系，它是明明白白地存在着，并且非常广泛地每日每时不断地在活动着的。我们既然与资产阶级还有联盟的关系，各种政权机关和政治组织中既然还容许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就时时刻刻努力想使我们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适应于他们的思想观点，也就是努力想使我们的这些制度根本变质，使它们由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变为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在我们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松懈的地方，这种变质的情形难道不是在事实上存在着吗？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那么，我们的“三反”“五反”运动、司法改革运动，以及其他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激烈斗争又有什么必要呢？所以，在过渡时期，一方面有着正在建立中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也还有着广泛的活动力量，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单独存在，并不是风平浪静地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因素进行着生死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正是过渡时期正在生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正在衰亡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生死斗争的反映。我认为否认过渡时期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现象的存在，是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事实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不是单一的，而是两种互相敌对的基础的对立的统一；上层建筑也不是单一的，是占着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与它相敌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的对立的统一。如果说过渡时期只存在着单一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而没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素，那么，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岂不是都成为多余的事情了呢？

（原载《人民日报》1964年11月1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 学习《实践论》辅导报告*

（1964、1965）

现在讲讲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文章写的时间不同，性质相同。所以合起来一起讲。

## 一、两条认识路线

这两篇文章都是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个认识论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政治有路线，认识也有路线。一定的认识路线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是联系着的。在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政治路线的分歧，从世界观、方法论上说来，就在于认识路线的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科学的认识路线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结合着。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是与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结合着的。

---

*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艾思奇先后在中央高级党校内部和校外许多单位，作过多次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辅导报告这两篇稿子，是依据他于1964年至1965年期间，在中国文联、解放军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海军正师级以上青岛学习班等单位的报告速记稿整理而成。我们整理的原则，是把几个稿子作综合比较，吸收各个稿子中深刻的内容，删去一些明显不合适或重复的段落，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不增加任何观点，力求反映艾思奇的哲学思想。

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两条认识路线——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认识路线的问题。《实践论》是毛主席在1937年写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已16年。《实践论》是对16年来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主义两种认识论斗争的总结，是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总结。《实践论》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正确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一次总结了社会主义时期，包括民主革命时期，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再一次肯定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正确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我们学习这两篇著作，就是要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我们认识事物、做工作，要按这一条路线来处理，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要走到唯心主义方面去。

讲《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要讲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了解这种认识路线，努力学会掌握这种认识路线。

在讲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之前，先简单说一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

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什么区别，界限在哪里呢?

一般唯物主义在认识上都承认反映论，即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承认这一点；唯心主义否认、反对反映论。

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的反映——物质通过感觉变成思想。这就是物质变精神。先有物质，而后才有精神；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那本二三十万字的书，就是反复讲这么一个问题。这是当时斗争的需要。那时，主观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很多人都糊涂了，所以，列

宁写了这本书来解决这个问题。

唯心主义则相反，否认反映论，否认认识是客观的反映。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有两句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这就是指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叫"天降派"，这是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种认为认识是脑子里生来就有的，这是主观唯心主义。

什么叫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有的，不过这个客观世界是精神的（是个大精神），不是物质的。这个精神有的叫上帝，或者是神；有的就叫世界精神。这一派的哲学认为人的认识是由世界精神的启发而得到的。这种思想和宗教迷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什么是主观唯心主义？不承认有客观世界，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主观精神。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就是批判这种哲学的。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实际上就是唯物主义和这两派斗，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篇短短的文章里，就把哲学史概括了。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有它的弱点，是不够科学的。从前的唯物主义有一种叫做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者叫做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一方面是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反辩证法，免不了在这一个问题上或那一个问题上，变成唯心主义，所以与唯心主义斗争就没有力量，常常被唯心主义打败。以前的唯物主义，除形而上学缺陷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弱点是不懂实践。它们承认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是客观的反映、精神是物质的反映、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承认反映这一点，它是正确的，是和唯心主义相反

的。唯心主义不承认物质世界，因此，也就不承认人的思想是物质世界的反映。所以在这一点上，过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针锋相对的，而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可是这个唯物主义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它不了解人的主观反映客观需要通过实践。以前的唯物论根本不了解实践的作用、实践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反对一切唯心主义路线。《实践论》就是在认识上坚持唯物主义路线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到斯大林（他的前期），都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所谓坚持唯物主义，就是坚持反映论——人的认识一定要反映客观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坚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所反对的唯心主义，都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我们都读过《毛泽东选集》，从哲学的眼光来看，每一篇文章都是坚持反映论。有时实际上坚持，不说出来；有时直接说出来，反对主观主义。比如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坚持反映论——正确反映敌我关系。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开宗明义就要分清敌友，反对陈独秀敌友不分的唯心主义（可以说是主观唯心主义）。以后，革命每到一个关头就直接提出反对主观主义。

唯物主义的路线，就是客观第一，主观第二，主观是客观的反映，都是反映论。这一点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共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同以前的唯物主义又有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著作，深刻透彻地阐明了这个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在《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两篇著作中，许多关键的原则都是长期经验的总结。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即认识依赖于实践这个根本原则；一方面又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做出新的概括、新的发展。根本原则没有变，但有许多新东西，这同我们丰富的革命经验是分不开的。这些著作不是提起笔蘸一点墨就写出来的，而是千百万工人、农民、革命先烈流血流汗写成的活的历史。毛主席把这些活的历史写成文章，才有这两篇哲学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是这样来的。因此，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我们的革命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 二、认识依赖于实践

实践的观点，对于辩证唯物论者来说，是第一的、最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其他唯物论不同的一个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特点，就是在唯物论里加上实践的观点，以实践的观点作为根本的观点。其他任何一种唯物论都不讲实践，都跟实践脱离，都是离开实践讲唯物主义。离开实践讲唯物主义，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甚至只要对实践轻描淡写，不强调实践，这也会离开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先把这个概念搞清楚。因为“实践”这个名词几千年来就有，但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对“实践”这个名词有自己的定义。中国在封建社会就有“实践”这个词，意思就是按照某种道德标准来行动。一般使用这个名词都是认为按照某些思想为指导来行动，或者把某种思想见诸行动叫实践，有时候资产阶级把个人冒险也叫实践。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讲“实践”这两个字，主要是讲个人活

动、个人奋斗。资产阶级是个人主义者，都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用“实践”这个词，在《实践论》可以看出来，不是按封建道德标准行动，也不是搞什么个人活动，而是指社会实践。文章一开头就讲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当然也有个人的活动，但是是社会性的，因为任何人的行动都是社会性的，纯粹的个人活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人的活动都带有社会性，所以实践是社会实践。

所谓实践，就是社会实践、人的社会活动。广义的实践就是社会活动。人是通过社会活动来认识世界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决定人的本质、人的一切。为什么说人有社会性？人的认识有社会性？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特点是由自然决定的，自然生就的。老虎，自然界生就它有很尖锐的爪牙，生就它有很强大的胃，能消化大量的肉，它的特点是吃肉，是食肉兽。但是人的特点不是由自然来决定的，人的本质，是由社会、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人在社会关系中间所处的地位不同，它的本性也就不同。阶级社会中有不同的阶级，它的社会地位不同，阶级地位不同，它的本性就不同。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本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本性。本性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自然界来的，不是从母胎里带来的，而是在进入社会以后，在社会的影响下得来的，是在社会实践当中、在社会活动当中，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和特点，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认识也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同，认识也会不同。离开人的社会性去认识问题，便不了解人的社会地位能使人的认识发生区别，好像任何人的认识都是一样的，不会由于社会地位不同而有区别，不会因为人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而不同。抽象的人性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认为人人都是一样的，认识也是一样的，感情也是一样的。事实上，世

界上根本没有这种抽象的人性。资产阶级的文艺总想表现抽象的人性，实际上，抽象的人性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一般的人性，只有阶级性。

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分不开，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就有不同的社会性，人的认识也就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马列主义的认识论，首先就指出人是通过实践来认识世界的，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来认识世界。所以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所谓不同地位，有先进的地位，有落后、反动的地位。通常是站在先进地位的人比较能够正确认识世界。讲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首先要注意这个特点：人的认识依赖于实践。毛主席的著作，题目就叫《实践论》。

我想联系文艺上的问题也稍微提一下。文艺可不可以说也是一种认识？提出这个意见，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个人认为，文艺是一种认识，文艺就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从哲学上看，就是一种认识。不过文艺和科学理论不同，不是根本实质不同，而是形式不同。科学是用理论，用概念、判断、推理，用逻辑系统来认识世界。文艺则是用形象来认识世界，是用从人民生活中间提炼出来的典型的形象来认识世界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讲："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遍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所以文艺也是一种认识，只是形式和科学不同。既然是一种认识，所以也要通过实践来认识，也就是通过人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来认识。

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立场不同。社会地位就是实践立场，立场不同，对生活的认识就会不同。因此不同阶级的人，他所注意的典型也不会相同的。为什么以前的那些文艺作品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呢？因为作者都是这一类的人，所以使他们感兴趣的典型就是这些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艺，也有他们的典型人物。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与西方古典资产阶级文学不同。17、18、19世纪有个人主义的典型，俄国19世纪文学也是个人主义典型多。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是腐朽透顶了，所以他们在文艺中有兴趣的人物、典型，是杀人犯、强盗、诲淫诲盗。有的典型像疯子一样，英国的“硬壳虫”音乐，那典型不是疯子么？那是资产阶级没落的疯狂。我在一个影片上看到一个法国的现代芭蕾舞，从动作上看起来，人就像木偶，动作像机械，脸上毫无表情，就像是僵尸在跳舞。选择什么样的典型就表现作家的认识立场，文艺作家的认识是由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来决定的，所以，改造作者自己的实践立场是改造文艺的根本环节。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科学上，如果没有正确的概念，就没有正确的认识。在文艺上，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典型，就不能有好的作品；如果不能正确的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阶级的典型，也不可能有反映我们时代的好的作品，就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文艺。如果把中间人物当做典型，能不能使我们的文艺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呢？不可能的。你不能超过30年代、十八九世纪，因为那些年代有了它自己的最高峰，它确确实实反映了那个时代，有生活作基础，所以能创造那时的最高峰。你现在脱离了过去的时代，而要去学它，如何学得好呢？你不创造今天的先进典型，不可能有什么出路。不是说除了英雄典型以外，其他人物不能写。写是可以写的，但不要把它当做英雄，不要当做歌颂对象来描写。

有一个临时提出的问题，先简单说明一下。列宁说过这样一句话："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为什么高于认识？实践高于认识，主要是讲理性认识，这是把实践与理论比较起来讲的。理论有普遍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普遍应用，因为理论是反映规律的，凡是规律就带有普遍性。而理论是反映规律的，所以理论总是有普遍性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就叫实践。实践为什么高于理论？首先因为它有理论的普遍性，理论的普遍性都拿到行动当中去贯彻，所以实践本身就有理论本身所有的普遍性，但是在实践当中，又把理论变成现实。理论本身是没有现实性的，理论只书上写一写，脑子里想一想，比较抽象，实践就把抽象的东西，变成活的现实的，所以就有现实性。这个意思是说，实践比理论更确实，理论究竟对不对，终归要到实践中具体解决。比如实践可以创造典型经验，典型经验就比理论原则更具体，但是又表现了理论。实践里可以创造典型经验，理论本身就只能是原则。这是两者的区别，这区别也就说明高低有所不同。所以由理论到实践是一个飞跃，向更高一级飞跃。实践又要产生理论，要证明理论，要再飞跃到实践。这一句话跟另一句话是一个意思，"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就是强调实践第一，强调实践的观点。

不了解实践观点，就等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如不讲实践观点，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脱离了实践，就等于没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在马克思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讲到实践，但讲得很简要。列宁的著作里发挥了关于实践的思想，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但是也讲得较少。毛主席就专用《实践论》作题目，

突出了实践观点，深入系统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单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在《实践论》出版以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出这么一篇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系统的文章。

强调认识依赖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特点。要正确处理认识，使认识走在正确的路线上，就要注意认识与实践的结合。这个问题跟主观主义是针锋相对的，跟主观主义认识路线、旧唯物论是针锋相对的。旧唯物论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变成了主观主义。毛主席总结了多年的经验，简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著作里，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提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有两种答复，一种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答复：是从天上来的，或是脑子里生就的。毛主席否定了这样的答复，提出了另外一个答复，人的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大家不要看这话简单，这是概括了、总结了多年的经验，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根本的东西，既深刻又明了地指出来了。这好像很容易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做起来，往往很容易离开了这个原则，往往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毛主席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在认识上，首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斗争。人的认识是从天上来的，或脑子里生出来的，还是从实践中来的？有一种人就是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来的。大家也许觉得奇怪，共产党中还有这样的人？明白地这样讲，好像没有，从前陈独秀、王明没有公开讲，但实际上有人这样做。怎样来了解呢？天上本来不会掉下东西来，古代有人说掉下天书来，那是古代，现在没有这种人。但有这样一些人，他把某一个地方当做天堂，那里有他心

目中的上帝；或者是历史上某一个时代有他的天堂、上帝。譬如，有人就认为莫斯科是天堂，上帝就是赫鲁晓夫，所有的认识都要从那里来，那里的上帝说一句话，就照办、照抄。还有人把纽约当天堂，把什么艾森豪威尔，或者罗斯福、肯尼迪当上帝。搞自然科学的，也有的人把某一个自然科学家当上帝，他的认识不用自己脑子去想，专等那里降下天书，把天书照抄。大家想一想，这种“天降派”有没有？我看不但有，而且很多。文艺界有没有“天降派”？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自己不动脑子，就是等某处天堂里给我来一个东西，我就照办。那是上帝那里来的，不能超越，只能照办。各行各业都有这个问题，文艺界也不例外。古代就有人管印度叫西天，本来是地上，却把它当成天，那里也有上帝，到那里去取经。“天”是没有的，是人幻想出来的，他把地上某个地方当天堂，也有人把历史上某个时代当天堂。还有一种人，就是认为认识是脑子里生就的，做工作也不调查研究，凭自己脑子乱想，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文艺界也有这种人，凭偶然灵感进行创作。文艺界是不是这两种都有，天降派，脑子里生就的都有？有时这二者还混合起来，从哪里找来天书，脑子里随便想一想，然后就出现典型，这典型与社会主义劳动人民无关。这种人有没有？我不大了解，提出这样的问题，请大家研究研究。过去我国革命历史上凡是机会主义，你研究它的认识路线，不外这两种：或是莫斯科来的，或者他自己脑子里随便想出来的；或者两种混合的。

毛主席突出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实践规定得很具体，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的这个贡献，不是字面上的贡献，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结。过去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观主义者虽有“左”倾、右倾的不同，但

其共同特点，就是看不起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认识脱离实践，是德波林主义，德波林思想。德波林在中国不是没有影响的。王明等人认为认识不是从实践中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轻视毛主席在农村创造的经验，瞧不起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挖苦这种经验，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说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不论“左”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都有这种特点，脱离群众，脱离广大群众的实践，自己也不深入阶级斗争实践。陈独秀从前根本不参加农村的斗争，住在城里；王明主要是在莫斯科，到国内苏区时间很短。

毛主席提出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这三大革命运动中来，这一点，在今天更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要使认识得到正确方向，就一定要参加实践，参加实践就是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除了这些实践以外，别的社会活动不可能使我们得到正确认识。“实践”这个词含义很广，包括一切社会活动，但不是一切社会活动都能得到正确认识，只有参加革命实践才能得到正确认识。文艺工作者下去参加工农兵的活动，参加生产、阶级斗争，因此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只能通过革命实践才能掌握。每一个时代，凡是比较先进的认识，都是处于比较先进的地位的人掌握。每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比较好的，一般的讲，都是比较有进步思想的人，才能创做出来。个别的例外是有的，哲学上也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一点，就是：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最正确的认识。这个原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历史实践的总结。自从有人类以来，知识和生产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任何一个民族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和这个民族生产发展的

水平是相适应的。比如，对天文的知识表现在历法上，不同的生产水平，就有不同水平的天文知识。游牧民族的历法和农业民族的历法就不一样。我们汉族是农业民族，所以从商朝起就是按照太阳的运动来计算年月日和24个节气。这个历法对农业有帮助，哪个节气该种什么东西很方便。游牧民族就不一样，他们不大重视太阳运动的规律，比如西藏的历法就不是太阳历，而是按月亮计算的，月亮圆一次就是一个月，圆12次就是一年。所以，那个历法的新年没有一定的时候，有时在冬天，有时在夏天。维吾尔族历法也是一样。这是说的古代天文。数学也是从生产斗争中来的，那是几千年、几万年的总结。这都证明自然知识首先发源于生产，是总结生产经验的结果。

社会知识，一方面是从生产来的，一方面是从阶级斗争来的。在阶级社会里，革命的阶级对社会的认识，从来都比反动阶级的认识更正确一些。在统治阶级内又有不同的派别经常打架，有比较进步的，有比较反动的。进步一点的派别认识比较全面，反动腐朽的那一派思想必然是荒谬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候，就比封建地主阶级的认识要正确，眼界要宽些。所以，人的认识受阶级地位的限制。《实践论》讲："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剥削阶级总是有一定的偏见，所以，在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社会科学从来没有很好建立，没有一个系统的社会历史知识，只有对社会的某些问题有正确的观点。因为无产阶级出现以前，掌握知识的人都是剥削阶级。奴隶的文化太低，没有条件总结经验。剥削阶级因为专门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可以总结一些自然经验、社会经验，可是他们是依靠剥削阶级的，是为它辩护的，所以从来没有全面的社会知识，没有一个像样的社会科学体系。19世纪末，英国的经

济学比较接近社会科学，但也不完全科学。

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只有到无产阶级出现以后才有。无产阶级从事大生产，眼界很宽，他们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所以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社会知识。马克思、恩格斯所以能够创立社会科学，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所以，要有正确的认识，就要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搞阶级斗争。出身有一些影响，但并不起决定作用。决定的东西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保证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毛主席不管在哪一篇文章里，绝不一般地讲实践保证我们正确认识，而是讲要保证得到正确的认识，就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剥削阶级由于阶级立场的限制，又不参加生产劳动，所以他们要正确认识社会历史是很困难的。自然科学可以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实验室里搞；同时，由于剥削阶级本身的需要，他们可以掌握自然规律，比如美帝国主义就可以掌握原子能等很多尖端科学知识。自然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资产阶级可以养一批知识分子来总结生产经验，进行科学试验，所以，他们也能搞改造自然的斗争，不过也受一定的限制。

我们以前要搞民主革命，自然知识对我们的需要不是太大，当然战争也需要现代化的自然知识。但那时需要最大、最迫切的是阶级斗争。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同了，我们在生产上、科学技术上，要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对自然知识的需要比过去大得多，因此参加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革命实践，当然阶级斗争是我们向来坚持的革命实践。

在《实践论》里，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特点，就是阶级性和实践性。阶级性就是党性，实践性就是革命性，而党性和革命性又是一个东西。

实践有两种，有革命的实践，也有反革命的实践。反动派的行动也可以说是实践，因为这也是阶级斗争，但那是反革命的实践。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只有从革命实践中来。革命的实践有两种：一种是对自然的革命，就是生产、自然科学的实验；另一种是对社会的革命，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阶级斗争。这里就有个立场问题。毛主席讲阶级斗争是有分析的，讲阶级斗争是对我们有深刻影响的实践。从历史上看，剥削阶级是有偏见的。因此，剥削阶级不能帮助我们对社会取得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有可能对社会取得正确的、科学的认识。

在今天来说，我们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只有站在工农兵的立场，参加革命实践才能做到，不参加实践，就看不见今天的英雄，只有参加实践，才能看到。《创业史》这部小说为什么发生争论？作者在农村中长期生活，看到了农村中最先进的人物，写在小说里。批评家没有看到这篇作品里的英雄人物，没有在农村中长期生活过，所以争论。谁对？还是作者对，作者看到了这样的英雄人物。你只要到农村去生活一个相当的时期，你就会看到比中间人物高明得多的人物，而且这种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相当多。为什么毛主席说："遍地英雄下夕烟"，农村里确是遍地英雄。赞扬中间人物，有中间人物思想的人，就不认为是遍地英雄。谁正确？毛主席正确。如果不是遍地英雄，我们的困难怎么能克服得这样快？生产怎么能搞得这样好、这样快？抗美援朝如果不是遍地英雄，怎么能顶住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中国、朝鲜是遍地英雄，随处可以找到英雄。写这种英雄，是不是面就窄了？一点也不窄，英雄多得很。在革命高潮、阶级斗争高潮的情形下，有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有特性、个性，你如果真了解他

们每个人的个性，面就不窄，而是很广。《水浒传》就有 108 个英雄，那还是封建时代，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英雄，一部作品就可以写出那么多。今天的英雄为什么面还会窄呢？这种问题争论要得到解决，还要到实践中去。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个基本思想在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充分发展了、具体化了，把这种思想变成实际工作中的武器、人人能掌握的武器。我们学习《实践论》，就要学会掌握这个武器。

## 三、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实践论》全面而又深刻地阐明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更清楚地说明了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基本上没有谈到，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了一句话：人的认识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81 页）。列宁说了这句话，没有再进一步的解释。毛主席的《实践论》就把这句话写了一篇文章，具体地告诉我们如何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虽然讲的很简单，但有新的发展。

认识是从实践来的，认识是依赖于实践的。但是，认识怎样从实践来?认识怎样依赖于实践?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释。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就是辩证关系，就是互相转化的关系。实践转化为认识，变为认识；认识又转化为实践，又变为实践。这就叫做互相转化的关系，也就是辩证的相互关系。这个关系，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是两个飞跃的关系，就是由实践向认识

飞跃，这是第一个飞跃；然后又由认识向实践飞跃，这是第二个飞跃。互相转化是由两个飞跃构成的，这个思想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中，又有了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加了一点东西，除由实践变为认识，由认识变为实践外，又加了两点：由物质变为精神，由精神变为物质；由存在变为思维，由思维变为存在。实际上，这种提法是一件事情的三个方面。《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另外两个方面，把《实践论》里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展了。事情是一个事情，但是提法又从新的角度上展开了。为什么要有这种发展？为什么要进一步从另两个方面再来说明这个问题呢？这不仅是字面上的问题，不仅是话多讲两句的问题，而是概括了一些新的经验、新的问题，从实践问题一直到理论问题。

我们讲的两个飞跃，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都是能动飞跃。《实践论》上有两句话："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能动"这两个字很重要，我们平常说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包括这两个方面。人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能动和被动消极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叫做"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使用了这个名词。这个提法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这样提过。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叫反映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唯物论有不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唯物论没有注意到认识的能动性，他们不知道有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了解这一点的，实际上有这样的思想，但是没有使用这个名词。毛主席明确地用了这个名词。这

一点很重要，虽然是名词问题，但这是一个发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突出地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需要很好地了解。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不了解认识有能动性，他们总以为人的认识都是消极的、被动的反映外界的东西，像镜子一样。镜子反映周围的东西，只能反映表面，有什么反映什么，是消极的，它自己对外界的东西不能有创造性。照相也是这样，有什么现象就照出什么现象，反映表面的现象。人类的认识不那样简单，不像镜子、照相机把表面的东西反映就完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不能完全用镜子、照相机来做比方。但是从前的唯物论是这样了解的，认为人的主观像一面镜子。外国哲学家认为人的心像一张白纸一样，外界有什么影响，白纸上就有什么反映。事实上，人的认识不是这样简单。人的认识是能动地反映客观的，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所谓能动的飞跃，就是人的主观不是简单地把表面现象反映进来，不是看到什么反映什么。人的思想有一种能力，能动地把假象、不重要的东西丢掉，把本质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抓住。现象不一定暴露本质。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耳朵听到的东西，是不是事实？不一定，有的是事实，又可能是表面的事实，不一定是本质。本质是靠感性认识抓不到的。在感性认识中，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真的假的都有，有一些现象就是不能反映本质。

讲一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思维和存在能不能互相转化的问题，有没有存在变思维、思维变存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的问题。肯定思维和存在有这种相互转化关系的，就是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主张有同一性的人，就是承认有互相转化关系，因为同一性就是互相联系、相互

转化的意思。辩证法讲同一性，不是讲两个东西完全一样，而是讲两个东西互相联系、互相转化。承认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要肯定思维与存在能够互相转化，肯定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思维和存在有这种同一性，有互相转化的关系。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在这理论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要不要承认主观能动性？在社会主义建设里，要不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要不要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客观规律我们当然要注意，我们的认识要反映客观规律。我们不能忽视客观规律，问题是我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就要充分利用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我们的认识变成行动、变成物质。这一点对于我们是更重要的，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更重要的。

一切革命斗争，都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这一点。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能自发地产生。从前的社会，不知不觉就产生了。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在没有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在封建社会中，就自然而然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人脑子里先想到过有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先认识了资本主义，然后再建设资本主义制度。它不是这样做的，它是在封建社会中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这样子，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自发地产生，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自发出现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统治下是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修正主义者说，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是骗人的。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印度的国家资本也是资产阶级国

家的垄断资本，跟从前蒋介石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是一样的。其他英国、日本都有国有制的经济，但是那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国有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自然而然产生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有了政权以后，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的国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广大的干部、群众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如果自觉性削弱了，如果一个国家无产阶级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放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放松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面的经济还可能回到资本主义。农民有两重性，按照他自发的趋势，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如得到无产阶级领导，他也可以跟着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不但农民如此，甚至工厂里也是这样子，工厂里，党如果不抓紧领导，如果马克思主义削弱了，个人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那样一来，工厂里就会出现资本主义的东西，贪污盗窃呀，投机倒把呀，本位主义呀，就会出现这些活动。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间，自觉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应该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要提出政治挂帅的原则。政治挂帅的原则，就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也就是精神变物质，坚决用精神来改变物质，使思维变存在。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文章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有一个发展的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篇幅虽短，但概括了重要的经验，回答了重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实践论》，研究毛主席关于实践的两篇哲学著作，要着重了解两个飞跃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两个飞跃问题是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实践论》分三个部分讲，但其中的核心，就是两个飞跃问题。毛主席在这本著作中写得最多的，用篇幅最多的，也是两个飞跃问题。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首先是实践变认识，实践向认识的飞跃，同时就是物质变精神、存在变思维的飞跃。飞跃的过程主要就是这样的内容：通过实践，对我们来讲，就是通过革命实践，通过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首先由我们的感觉器官对物质世界、客观世界，取得一些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直接由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五官得到的。

毛主席解释说，人们在实践中，通过眼耳鼻舌身，睁开眼睛看一看，用耳朵去听一听，用鼻子嗅一嗅，用舌尝一尝，用自己的皮肤接触一下，认识必须首先通过五官得来的。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提出用眼、耳、鼻、舌、身，很有意思。提一下很必要，因为我们有些人做了官，这些器官都不使用了。

在实践当中，通过五官，直接得到一些关于外界物质存在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并没有实践飞跃。感性认识只是初步的认识，要实现实践到认识的飞跃，就需要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第一个飞跃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为什么感性认识不能算是实现的飞跃？其原因，毛主席讲得很清楚，感性认识只能给我们对外界的表面的认识、局部的认识。感性认识有时是一些假象，有时感性认识是会骗我们的，因为它是表面的、局部的。单凭感性认识，对事情不能得到正确的判断。比如我们参加革命斗争，最初的时候，革命力量总是比较小，总要碰到困难，甚至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时候，我们单凭感性认识，不可能认识到敌人是一定要垮的，革命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单凭感性认识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甚至在感觉方面，还感觉到革命势力

是站不住脚的。凡是在最艰苦的情况里，参加革命的人，会有这种感觉的。年轻一点的同志，就没有这种经验。年老一点的同志，参加过与反动派斗争的人，会有这种经验的。抗日战争，1941 年最黑暗的时候，从感觉上看不出是可以胜利的。还有原子弹，单凭感觉来看，不能看出它是纸老虎。你看它那影片，原子弹爆炸之后，破坏力不是很大么！凭感觉来判断，你就不能说它是纸老虎。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原子弹做出纸老虎的结论，单凭感性认识是不行的，那是理性认识的结果。

有的同志问：经验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没有总结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经过总结了经验是理性认识。我们讲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就是经过总结了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总结了的经验，是理性认识。我们一般所讲的经验还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中有没有包含理性认识？有时候是交错的。我们平常做工作取得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但是我们工作中也有理性认识，因为我们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来做工作。所以，我们的经验当中包含了一些理性认识。事实上，纯粹的感性认识是没有的。我们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分开，是为了把这些关系弄清楚。要承认我们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必须经过总结才能变成理性认识。这就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最重要的内容，最根本的规律准确地找出来。

有的同志问，错误的认识算不算飞跃？我说错误的认识也可以说是飞跃的一种结果。错误有部分的错误，有完全的错误，有主要部分错误，有次要部分错误，所以错误的认识也是第一个飞跃的一种产物。不过，错误的认识没有完成飞跃的任务，没有实现飞跃的目的。第一个飞跃是要取得正确认识，可是，有时可能不正确。不正确的认识来源有种种，来源之一就是立场根本不对，

那就会产生根本错误的认识。如果立场是对的，你也可能会出错误，这种错误有种种原因，或者是材料掌握的不够就作结论，或者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没有完全弄清楚等，但只要不是根本性的错误，通过实践的检验，改正错误，可以逐渐取得正确的认识。

我们研究认识论，要研究怎样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不要单凭一些片面的、表面的感觉，就对问题下结论，要避免这一点。学第一个飞跃，就要学会解决这个问题，要懂得实践变认识，就是把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就达到了物质变精神，存在变思维。怎样才能实现这个飞跃？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也讲得很清楚，主要的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有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材料，不要抓住很少一点材料，就来分析问题。第二就是在有了丰富的感性材料以后，对这些丰富的材料还要进行加工改造。所谓“加工改造”，毛主席指出了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十六个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四句话。

要实现物质到精神的飞跃，第一，要有大量的材料，不要随便抓住一点，就做结论。我们平常很容易随便看到一点，就轻率的下论断。我们自己想一想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情形？在农村、在城市，随便看到一点，就轻易地做出自己的论断。这种情形，对我们没有帮助，只能使我们犯错误。所以，对待任何问题，我们首先要搜集大量的材料。

为什么毛主席一定要我们参加革命实践呢？为什么我们去作一个观察家，走马观花一下不行呢？因为参加革命实践，才有可能掌握比较丰富的材料，特别是掌握真实的材料。你如果要了解农民的生活，而你不能多少在生产上或阶级斗争中和他站在一起，你就不可能从农民口里听到真实的声音。身体好的最好和他们一

起劳动；年老的，身体不好的，不能和农民一起劳动，也要跟农民站在一起。他相信你了，他就告诉你“心里话”，那你才可以得到真实的材料。大量的材料从哪里来？大量的材料要从群众中来。一个人的感性认识是有限的，我们认识问题，自己首先应有亲身的感性认识，但是单是个人的感性认识不够，还要集中群众的感性认识。向群众学习，毛主席自己讲甘心在群众面前当小学生。因为有许多群众知道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如果不毕恭毕敬地向群众学习，有许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特别是如果自己有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了架子，到群众中去，你永远也看不出群众中到处可以发现的英雄人物。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也是认识路线。要跟群众很好联系，才有可能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材料。这是第一条，取得大量感性认识的方法是要在革命实践当中，联系群众，有了大量的材料，就比较好办了，就是加工的问题了。

要实现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第二，还要对丰富的感觉材料进行加工改造。加工的方法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四句话。这是辩证法的方法，分析矛盾的方法，“一分为二”的方法，也就是把所有的材料加以分析。去粗取精，对正确的不正确的加以分析，然后着重掌握比较重要的材料，或者是比较典型的材料，不很典型、不很重要的材料可以放弃；除此而外还有真实材料、假材料、真象、假象，也要“一分为二”。感性认识不都是骗我们的，感性认识使我们看到一些现象，现象分两种，一种是假象，一种是真象。这是对现象的“一分为二”。到一个农村里碰到群众，他跟你谈话就有两种，一种是假话，一种是真话。要从贫下中农口里得到一些真相，就要费一点力。你到那里去，他要观察你，看你表现怎么样，看一个时候，他才能

够说出真心话。所以要有大量的材料，要“耳顺”，就是说，正面的话也听，反面的话也听；“要眼明”，要多看，仔细看，看各种现象，看得比较多了，然后再比较。经过比较、分析，然后再去伪存真，把假象毫不可惜地丢掉，着重抓住真相。

有了重要的材料，又有了真的材料，就容易解决问题了。把材料加以分析，分析这些材料中所包括的各方面事物的关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表面和里面，这都是些矛盾，凡是不同方面，都是有矛盾的。农村有富裕中农一面，贫、下中农一面；又有农民一面，地主、富农一面；还有干部一面，群众一面。工厂里，领导和群众，也是这一面，那一面；群众里也有不同的成分。同样是工人，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有出身于血统工人的，有出身于农民的，也有坏分子钻进来的。此一面，彼一面，就是这些方面的矛盾的相互关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把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加以研究。表面和里面，就是要研究有些人的表现和他心里面真实的想法，某些现象和实质的关系。掌握了大量材料，加以分析、研究，把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弄清楚了，就是理性认识。所谓总结经验，就是把问题各个方面的关系弄清，提高到理性的认识。所以物质变精神，或存在变思维，也就是通过感性认识，加以分析，把物质或存在中间各个方面的矛盾关系，反映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来，就是物质变精神。

在科学上，精神对物质、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是用概念、判断、推理的方法；在文艺上就是用典型的形象，但是过程是类似的。科学，就是把感觉提炼为思想，把在物质、存在中所得到的感觉材料，提炼为理论。文艺，就是要把从生活里面所得到的那些初步的艺术素材，提炼为典型的东西。两者都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把

物质变成精神，把存在变成思维。没有这个过程，也可以飞跃，但是会变成错误的飞跃。随便看到一些现象，就下判断，就形成概念，就推论，一定要发生错误。看到一个原子弹破坏力那么大，于是就做出这样一种概念来，以为原子弹就是人类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力量，原子弹一出现，人类就要灭亡。这就是抓住表面的、片面的现象，随便作判断，随便作推论。这也是飞跃，但这是错误的飞跃。我们要求的是要掌握正确的思想，要正确地实现认识飞跃。要实现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严格地贯彻毛主席讲的这两点原则，第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第二对大量的材料还要加工改造，根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原则进行加工改造，这样子就可以取得初步的正确的认识。为什么说是初步的？因为尽管严格地贯彻这个原则，但是我们的认识是不是完全正确，还不能自己证明，思想不能证明自己是否正确。思想是否正确，不是由思想自己来证明。要证明思想是否正确，那要再回到实践中去证明，所以还要有第二个飞跃。

第二个飞跃，在《实践论》中讲得很清楚，就是把我们主观认识拿到实践里去加以检查、执行。经过检查，原有的思想，可能需要部分改正，可能需要全部改正，也可能基本上不用改正，但还需要补充、发展。第二个飞跃是把人的思想拿去变为实践、变为物质，拿思想去指导实践。这一飞跃同时也是对我们思想的检查。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里，毛主席对第二个飞跃的思想，比《实践论》有了发展，毛主席说：“这次飞跃，比起前一个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在学习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要深刻领会这句话的精神。为什么第二个飞跃比第一个飞跃的意义更加伟大呢？这篇文章也说得很清楚。主要有两点：第一，只有经过第二个飞跃，才有可能证明我们的

思想是否正确，思想本身不能证明自己，只有在实践中经过第二个飞跃，才能证明；第二，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无产阶级认识世界，不是为认识而认识，满足于自己的认识，满足于自己知识丰富，欣赏自己的这些知识，不是这样的，而是为了革命地改造世界。

只有资产阶级才会把认识当做一种欣赏的东西，文艺界不是有一种“无差别论”么，就是说文艺没有利害关系，说我们搞文艺，就是为了达到一种“无差别境界”，没有什么斗争要求，没有目的。无差别境界是资产阶级思想，无差别就是无利害，不是追求什么，只是为了欣赏，为了简单地满足主观娱乐的要求。“无差别境界”实际上不是什么新思想，而是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就有的一种思想。这种观点，开始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是德国的康德，康德提出“无差别境界”，比较完整提出一套资产阶级美学理论。科学上也有这种观点，哲学上也有这种观点。刚解放时，我遇到北京大学讲康德哲学的一位教授，他很愿意进步，但是他自己表白：“我就是有点舍不得放弃康德哲学。”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这是一种享受呵！我讲康德哲学是一种享受呵！”我们搞文艺工作的，如果读康德哲学，恐怕读了会头痛的，而那个哲学家，他钻到那使人头痛的玄学里面，会感到是一种享受！资产阶级在文艺上也长期主张文艺是纯粹的一种享受，用这种思想来与马克思主义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就有一个思想反动的人，钻到我们里面来，主张反对功利主义，散布了这种观点，有一个时期，也迷糊了一些年轻的搞文艺的同志。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谈到功利主义，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认识世界，是有功利的目的，功利主义不一定就是坏的。资产阶级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他们

才是最坏的功利主义，用反对功利主义，来掩盖那种最恶劣的功利主义。我们公开讲功利主义，但是我们的功利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功利主义。

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人民的事业服务，为人民的利益改造世界。我们认识世界，就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再扩大一点，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造整个世界，要实现世界革命。要改造自然，也要改造社会。要改造自然，就要对自然界革命；要改造社会，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要使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认识世界，就是要把我们的认识变为物质力量去改造世界。这个意义就比第一个飞跃意义更大。

今天的无产阶级跟过去的人类不同，过去的人类改造世界，是很不彻底的。历史上发生的革命，也都是不彻底的。今天我们要把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加以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造。所以，在今天来讲，精神变物质、思维变存在、认识变实践的意义是大得不可估量的，我们要充分了解这个意义。解放军有这样一个口号，就是思想里经常要有枪杆子。我们要学习解放军，做任何工作时，思想上都要有枪杆子。我们要改造世界，消灭敌人，消灭阻碍我们改造世界的敌人。搞科学，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搞文艺工作，我看也要抱着这个目的。搞文艺工作，思想上也要经常有枪杆子。我们创作是为了什么？为了建立我们所要建立的东西，同时也要打倒我们所要打倒的东西。这就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搞科学、文艺的人，都是做上层建筑的工作，就是做思想、精神的工作。所以特别要重视这一点，要考虑我们的精神产品，能不能变为物质，能不能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如果我们的东西，拿到实际工作中去，不能成为这种

力量，那么就应该对我们自己的工作进行改造。第一是要改造世界，第二是要通过改造世界，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够质量，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如果在实践当中起了消极的作用，不是变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是成了阻碍世界改造的力量，那就说明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创作是错误的、不好的，应该及时改造。

有一个大家常常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讲的，在社会斗争中，有时候思想是正确的，但因为力量对比相差太远，还是会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阶级斗争和自然斗争不同，斗争对象是活的人，主动权不是完全由我们掌握的，我们有能动性，对方也有。有的同志说很难找这样的例子。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巴黎公社这个例子，有些同志不同意，我觉得这个例子还是适当的。因为巴黎公社的斗争是正确的，但是失败也是必然的。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没有搞之前，就先说清楚了，说巴黎公社如果搞起来必然要失败，因为力量对比不行，这是冒险的。等到巴黎公社搞起来以后，马克思认为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斗争，对工人阶级的损失会更大。他的意思是说，不斗争，那就是使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使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受到腐蚀而丧失战斗力，这种损失比流血失败还要大。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要失败，主要讲的是力量对比，不是说斗争不应当。马克思的态度同机会主义的态度相反。机会主义者认为本来就不应当斗争；马克思认为斗争本来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力量对比不行，失败也是必然的。巴黎公社是有一些错误，后来马克思在总结经验中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例如对敌人太慈悲，没有很快地向凡尔赛进军，没有没收银行，没有注意联合农民等等，但是根本的东西、主要的东西是正确的。如果这些错误都避免了，

全部正确，巴黎公社是不是能够胜利呢？也不一定。因为他没有经验，不能不犯错误。如果不犯错误，全部正确，巴黎公社是不是能够永远维持下来？如果不犯错误，可能延长一些时间，不会失败的这样快（只有两个月)，可能延长一年两年，可是按照当时的时代条件，还是要失败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时是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一个国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对巴黎公社，我们要看主要的东西，主要是正确的，根本方向是正确的，是因为条件不具备而失败，不是由于路线的错误而失败。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力量不够，所以失败了。

由此类推，很多革命斗争的失败都是这样，如俄国的1905年的革命，中国的广州暴动。广州暴动可能有些错误，但不斗一下是不行的。群众要斗，党也要斗，不斗也不行。泼冷水行不行？泼冷水是根本错误。斗了失败，也是正确的，长了自己的志气，给敌人以震动。广州暴动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还有许多具体例子。例如搞地下斗争，秘密暴露，被敌人抓住了，到了法庭，敌人审判，你斗不斗？一定要斗。斗了要杀头，不斗就投降，哪一条路正确？当然斗是正确的。斗了之后杀头，个人生命丧失了，但是他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事情做得正确，但是因为力量对比不行，就可能暂时失败，个别失败，社会斗争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对社会斗争的认识正确不正确要长期检验，反复检验，不是一次检验可以看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只从一次实践做结论。普列汉诺夫对俄国1905年的革命就是这样，他埋怨说斗争本来就不应当。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说法给了严厉的批评。

在军队工作的同志提出，怎样理解能动性和主动性的关系？能动性和主动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论持久战》20节里讲能动性，78节里讲主动性。能动性不等于主动性，因为反动派也有能动性，

但它不能正确发挥，他不能掌握正确思想，它的行动不能促进世界的发展。它有能动性，但它不能掌握主动。思想错误的人不能掌握主动性的。工作中、战斗中要掌握主动权，就是要正确地发挥能动性，要正确地指导、正确地指挥。主动性是由正确地发挥能动性来的。毛主席特别强调主动权是跟指挥的正确与不正确分不开的。他说："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就是说，指挥正确了，就会在战争当中掌握主动权；指挥错误就会被动。指挥正确就会得到优势，指挥错误就会失去优势而成劣势。优势和劣势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优势和劣势，就是双方军力的对比，力量大的就是优势，力量小的就是劣势。但还有一种是可以通过能动性而取得优势和劣势。如果客观比较劣势，但由于发挥了能动性，也会得到主动性。例如，过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力量上我们是劣势，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就处于优势，我们就有主动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把客观的劣势变为优势，可以掌握主动权。要紧的就是两个飞跃能不能掌握的好。第一就是在实践中调查研究搞的好，正确地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作中正确运用两个飞跃，就能够掌握主动性。

精神变物质，要通过一个环节，就是要通过群众。马克思说过，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这就是说，先进阶级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自然和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精神变物质，要通过被群众所掌握这个环节。毛主席经常讲，我们搞哲学，就要使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和课堂走出来，变成广大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群众掌握了某个哲学观点，用来指导他的行动，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群众学会了

“一分为二”，对自己的工作、生产“一分为二”，既看到成绩，也看到缺点，这样就能够发扬成绩，勇敢地改正缺点，这个力量就大得很。

我们的文艺工作，也是通过群众，使群众受到教育，变成改造世界的力量，变成物质力量。一个思想只在课堂里讲一讲，是不会改造世界的。文艺只在一个沙龙里念一念，也不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力量。但是一个革命的文艺作品，如果拿到群众中去，被群众掌握了，那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力量。《李双双》在农村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许多好的文艺作品，也在农村起了很大的作用。不只在农村，在工厂也是如此，不只是在国内，在国外也如此。首先要改造群众的思想，好的、正确的思想被群众所掌握，就改造了群众的思想。群众的思想改造了，就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改造世界。这样就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世界革命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学习《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要特别重视第二个飞跃。我们做的是意识形态的工作，我们就要经常考虑，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产品能不能很好地变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能不能被群众所掌握，然后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个问题要经常摆在我们的脑子里，这也就是思想上要有枪杆子。

这个问题是中心问题，讲得多一些。

## 四、人类认识的总规律

在《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文章中，关于认识的总规律，是从两方面来表达的。毛主席在《实践论》的最后一段话中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

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认识的基本过程，是两个飞跃；但是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就不只是两个飞跃，总的说，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循环往复，没有止境，每一次往复都使人的认识更提高一步，每一次循环，都更丰富、更深刻。有没有尽头？有没有一个最后的认识？没有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有一个最后的认识。任何时候，人的认识总是可以发展的，人的认识不能停顿。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认识已到顶，那就是形而上学，有了这种认识的人就没有出息，就不能前进，就没有前途了。

这个总规律，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又加了一个内容，就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也是认识的总规律。这是对《实践论》提出的总规律的一个补充。《实践论》只是讲，一般人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任何时候没有尽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又补充了一段，就是对一个正确的认识来说，也可以相对地有一点尽头，就是经过多次实践，可以得到完成。

认识的总规律，也表现在毛主席最近讲的一段话中，这段话，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过：“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世界上任何时候都是有矛盾的，阶级社会中有矛盾，阶级消灭了，还有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有矛盾，就要解决，解决了矛盾，就前进一步；矛盾解决了，还会有新的矛盾产生，还要再解决，再前进。有矛盾，就有问题，有问题，就要解决，解决了问题，就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我们党中央在1963年底提出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骄傲自满、故步自封是形而

上学的观点，认为自己的认识到头了，生产到顶了，不能发挥潜力了。这些观点都是形而上学，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规律的。

人的认识是不断前进的，要相信这一点。但是，问题是在你能不能经常参加革命实践，经常参加革命实践，你就可以经常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第一次实践，来一次认识和实践、思维和存在的互相转化，你就可以前进，每次反复，都可以有所前进。毛主席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大家看看他的著作，从《毛泽东选集》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思想不断地发展，《毛泽东选集》是按历史实践的年限来编的，在历史的反复中间，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的著作还没有全部出版，但是毛主席的思想发展，我们是很清楚的。

我们对民主革命的认识是经过几十年才完成的，党由1921年成立，最早到1935年遵义会议，全党开始承认毛主席领导、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经过十几年在全党主要干部思想上基本上完成了这个认识；到1945年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全党在毛主席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全党从1921年到1945年，经过二十多年才完成了对民主革命的认识。完成了这个认识，对全党起了极重大的作用。1945年开七大，1949年全国就解放了。对民主革命的正确的认识完成了。正确的认识为全党掌握，为人民掌握就形成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已经有了许多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农村、工厂在发展，原子弹爆炸这样快！世界上有些尖端的产品，我们也做出来了；其他各方面也将赶上世界水平。现在是个别的，将来就变成普遍的。艺术上也是这种情况。

艺术上也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总结。一个认识、一个创造都是要不断在实践中反复。我们现在的戏，就是要反复修改，这也是符合认识的总规律的。

由前面讲认识过程的问题，自然就提出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问题，这跟总规律有关系。所以，也很容易解释。有的时候觉得很难，实际上不太难。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所认识到的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这样。

所谓相对真理，就是讲人的认识受历史限制。人在一定的世界发展阶段，只能认识这个阶段所能够认识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天才，但是他们没有接触到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对抗非对抗的问题，列宁只说过一句话。这说明他们即便是这样的天才，认识的东西也是相对的，只能认识到历史条件允许他们认识到的东西。他们认识的东西不少，《列宁全集》那么多卷，可是是相对的，因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所认识的真理，在那个历史时代又是最正确的、最全面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的发展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最正确的，所以是绝对的。什么叫绝对真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情况的真理就是绝对真理。承认客观真理就是承认绝对真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都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斯大林就差一点，有一部分著作有错误，那就不是真理。但是，斯大林主要的东西还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

马、恩、列、斯的认识，毛主席的认识，只能是又绝对又相对，不能纯粹是绝对真理。因为它是客观真理，所以是绝对真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不断发展的，没有一个时候停顿，所以又是相对的。这两方面实际上是一件事，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是永远

发展的。从客观真理这方面来说，人总是可以用科学的办法把握客观真理。从客观真理永远是发展的来说，个人永远没有办法把握全部客观真理。即便是最高的天才，也只能把握绝对真理的一个发展阶段。所谓相对真理，就是指个人所把握的真理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阶段。所以，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分开成两个东西。从一方面讲，它是绝对真理；另一方面，它只是一部分，是无限发展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又是相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都是有阶段性的，每个阶段都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纯粹的、最完全的绝对真理，人有没有可能把握？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不可能靠一个人或一代人来实现，要靠整个人类无数代人不断继承下去。因为每一代人所了解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因为是它的一部分，所以也是绝对真理。

客观真理的本身，人的认识内容（只是内容），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在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许多自然科学的例子，有的举社会科学的例子。比如声波的频率，每秒钟130次就能听见，是不是绝对真理？又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是绝对真理，还是相对真理？这两个例子还是可以说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为什么是相对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当然是正确的规律。但是，它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只能适用于人类社会，所以是相对的。你不能讲自然界，比如蜜蜂，没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蚂蚁也没有这个问题。它只能应用于人类社会，所以是相对的。为什么是相对的？它是宇宙物质发展到人类阶段才会出现的规律。没有这个阶段以前，就没有这个规律。将来会不会取消这个规律，这就不能下判断了，这是几万万年以后的事。只要人类存在，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

矛盾还会有。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几万万年以后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没有出现以前没有这个规律。这个规律对整个宇宙来说，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规律，所以是相对的。但是这个规律又是绝对的。为什么？只要宇宙中存在人类，就一定有这个规律。如果地球以外的某个星球上，也有人类社会的这种组织，就一定也会有这个规律，所以这个真理是普遍的、绝对的。任何一种规律都是这样，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拿一个最平常的例子讲，水到摄氏一百度就要沸腾。这是个规律，是不是绝对的，有没有一点相对性？你要到珠穆朗玛峰，就不是这样。在西藏高原上，水到六七十度就沸腾了。所以是相对的。可是，这个规律又有绝对性，不管宇宙哪个地方，只要那里有一个大气压，水一定要到一百度就沸腾。不管是在火星、地球，也不管几十万万年以前，或者几十万万年以后，只要有一个大气压的条件，永远都是这样。不能把这只说成是绝对的，也不能只说成是相对的。一种规律总是一定条件下的规律，这是它的相对性；有了这个条件，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就可以出现，这就是它的绝对性。一般的社会规律、自然规律都是这样。

有的同志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绝对的。因为在现在的条件下只能绕太阳转。但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在宇宙中只是几十万万年以内的事，所以又是相对的。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宇宙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规律，不到这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都不行。凡是规律都是有条件的，所以是相对的；有这种条件，一定出现这个规律，所以是绝对的。因此，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

还有一些最普遍的规律，比如对立统一，一切事物都会发展

变化，这些算不算纯粹的绝对真理？也还不能这样说。就它们是最普遍性的规律这一点来说，是绝对真理，是无条件的。到处都是一分为二，所以，它的绝对性大一点。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世界上的矛盾（一分为二），都不是抽象的，没有纯粹普遍性的东西存在，任何一个事物里的矛盾都是具体的。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固然是矛盾，可是它是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不是人民之间非阶级的矛盾，和动物生存竞争矛盾也不同。对立统一规律总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存在一个纯粹的、抽象的对立统一规律。普遍的东西不会独立存在。比如人的概念，有老人、小孩、男人、女人。能不能找到一个既不是男人女人，也不是老人小孩？这是找不到的。当然，也有个别的是不男不女的，但是也有老小的区别。这是人的自然特征。如果讲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人，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人，二者必居其一。所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找到纯粹的对立统一。这些规律显然是最普遍的，但是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一定的特殊形式。毛主席说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就是这个道理。找普遍性总是在一个一个的特殊性中去找，把它们的共同点概括起来就是普遍性。普遍性包含在一个一个具体的特殊性里。对立统一规律的绝对性很大，是最普遍的，但是实际出现在世界上还是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的对立统一规律又是具体的。以前，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研究矛盾，是人民和封建地主、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研究矛盾，主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后还要着重研究人民内部矛盾。所以，矛盾规律的表现也是有条件的。凡是真理，本身既是有条件的，又是绝对的。真理本身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人的认识也只能按照它

的特点去认识，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普遍性固然是绝对性的一个表现，但是普遍性不能独立存在，一定是寄托在一定条件下的特殊性里。所以，任何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实际表现出来，都是有条件的，都是相对的。相对真理是整个宇宙的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

人类能不能把绝对真理完全认识得一干二净，能不能穷尽绝对真理？我们的答复是不能穷尽的。人类世世代代传下去，知识会不断增长，但是要穷尽世界，从此不要思考，这一天是不会有的。为什么？因为客观世界的发展不会穷尽，宇宙不会穷尽，因此人的认识不可能穷尽。客观世界不能穷尽，头脑的认识怎么能够穷尽？有人问：绝对真理人能不能认识？绝对真理可以认识，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认识，如此无限发展下去，就能越来越多地认识绝对真理。但是，要把绝对真理认识得一干二净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绝对真理在现在的世界上根本没有出现。比如人类没有出现以前，就没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规律。即使“神仙”也不会发现这个规律，因为世界上没有。世界上有了，而后才能认识。共产主义社会有些什么规律？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只知道一个方向。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知道这个方向。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估计。人对将来的认识只能对大体的趋势作一个估计。马克思研究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知道矛盾斗争的结果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将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有些什么具体规律，马克思搞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比马、恩、列、斯的认识多了一点，确确实实弄清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过渡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斗争等等。但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究竟还有些什么规律，我们认识不清楚，只能把现在能够认识的规律最大限度的摸清楚。我们能够估计到将来大体的发展方向，因为

客观事物有这样一个趋向。抗战的头两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就把抗战八年的大体过程估计到了。这是因为抗战八年的过程和抗战头两年的矛盾有联系。现在没有出现的矛盾，我们就不能估计。所以，要完全穷尽绝对真理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天比一天认识得更多，接近绝对真理，这是可能做到的。

有同志问，战争规律有没有阶级性？这个问题跟真理有没有阶级性差不多是一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真理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即客观存在的物质规律，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本身没有什么阶级不阶级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事实。阶级性的问题是在这个规律反映到人脑里的情形下才提出来的，是讲对规律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这就要涉及到阶级的问题。因为这不只是客观事实问题，而是客观事实被人掌握的问题，所以就要谈到阶级性问题了。

真理，从内容来讲，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主观意识不能任意改变它，你要想它不那样不可能。帝国主义一定要垮台，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世界一定要发展，妇女一定要生小孩，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从真理的客观内容来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不为阶级意志所左右的。另一方面，真理又有阶级性。真理也可以一分为二。从真理的认识和运用来说，是有阶级性的。人们对真理能掌握多少，是受阶级影响的，运用也是如此。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所不同。可以说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的人都可以掌握。例如物理学、化学，资产阶级可以掌握，无产阶级也可以掌握，可以作为一门学问、一门理论来全套地掌握。自然科学是自然界规律的系统反映，是自然科学的真理，人认识了才叫真理，人不认识就叫客观规律。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因为各阶级都可以系统地掌握它。所谓掌

握，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能够认识它，另一方面又能利用它为自己的阶级服务。掌握不是认识就完了。要掌握它就是要拿到手里能够用它。为什么目的应用？为自己的阶级服务。比如原子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可以认识，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也可以认识。区别在于愿意不愿意认识，这些是受阶级利益影响的。自然科学知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需要，但是也可以分析。有些自然科学，资产阶级不愿意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自然科学要求的程度是不同的。资产阶级考虑它的利润，有些发明创造妨碍它赚钱，他就收买发明权，放置不用。但是，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基本上是没有阶级性的，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科学才有阶级性。自然科学的运用是完全有阶级性的。原子弹，我们是用于防御，资产阶级用于讹诈侵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在认识上就有阶级性。所以，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有一点有阶级性，就是各阶级掌握自然规律应用的方向可以不同，各阶级是按照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来应用的。这一点要讲清楚。如何掌握自然科学，并应用在什么方向上去，就这一点来说，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社会科学就是社会科学真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社会规律作为客观事实来说，其本身也是无所谓阶级性的，但是，这个事实反映成人的思想，就有阶级性了。所以，社会科学真理本身是有阶级性的，它和自然科学不同。因为社会科学不是每个阶级都能同样系统的掌握的。譬如《资本论》关于经济学的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不能掌握。他可以掌握资本主义社会某一部分、某一个方面的规律，在不妨碍它的阶级利益方面，还可以发展它的科学。但是，像资本主义的总规律，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对于资本主义这样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

的经济学家就不能掌握。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利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材料，肯定了他们一些对的东西，但是他那个体系跟资产阶级的根本不同。所以，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各种反动阶级，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不能完整地加以掌握。部分地他觉得对他有利的还可以掌握。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演变这方面的规律，美国的杜勒斯就认识到了。现在美国对苏联、东欧国家的政策是杜勒斯制订出来的。杜勒斯是资产阶级很厉害的政治家，他看出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用和平演变的方法来把它搞垮。有这一方面的规律，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规律，只是一个方面的规律。这方面对他有利，他就会掌握。至于和平演变虽然会出现，但是一定会被克服，这一点他不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他不承认这个规律。他总是往他那一方面想，认为资本主义总可以保存下去。

战争规律也是这样。客观事实本身无所谓阶级性不阶级性，但是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变成学问、变成理论，就有阶级性了。我们有我们的毛泽东军事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资产阶级不能掌握。我们掌握的军事科学有些东西资产阶级军事学里也有，例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封建时代就有人懂得。这是军事规律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部分的东西有时资产阶级也是能掌握的，不过掌握的深度有不同（我们的知己知彼用得很彻底，因为我们有人民，特别是知彼这一点，任何阶级都赶不上我们）。但是，一个战争规律体系，成为军事理论、军事科学，这就有阶级性了。毛主席的军事科学只能由无产阶级掌握；十大军事原则只有我们能够掌握，资产阶级知道了也不能掌握。

关于认识的总规律就讲这一些。

《实践论》的部分，讲完了。我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主要是这几个问题，其他问题不是主要的，不必着重去研究。学习了这两篇文章，只要抓住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认识的总规律这三个主要问题应用到工作中就行了。其他问题，如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就是认识无止境的问题。这是包括“认识总规律”中，了解了认识的总规律，就了解这一点。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学习《矛盾论》辅导报告*

(1964、1965)

《矛盾论》这篇文章眉目很清楚，毛主席标了许多小标题，为了讲起来方便、并抓着要点，把几个问题合并了一下，讲以下四个问题。

##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有的同志问：恩格斯对辩证法提出三条规律，为什么不能并列，为什么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马克思、恩格斯讲辩证法，讲三个基本规律。那时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时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把辩证法各个方面的规律讲清楚。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有联系，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从黑格尔哲学那里吸收了一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归纳起来，黑格尔的哲学最有价值的是三个基本规律。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哲学并加以改造，他没有着重讲核心。列宁特别突出地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核心，这是一个发展。列宁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从实践中、斗争中来的。列宁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一方面反对修正主义。当时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是反对它的唯物论，一是反对它的辩证法，着

* 见《学习〈实践论〉辅导报告》题注。

重破坏它的对立统一规律。因此，列宁特别突出地讲对立统一规律。

毛主席的《矛盾论》，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列宁讲辩证法核心的时候，曾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需要说明和发挥"这句话，可以说是列宁在学习上的遗嘱。列宁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来得及系统地说明、发挥这个问题。毛主席的《矛盾论》可以说是实现了列宁的遗嘱，系统地说明和发挥了列宁提出的问题。

所谓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其意思就是《矛盾论》上讲的，我们只要能够把对立统一规律本身各方面的问题弄清楚了，那就基本上懂得了辩证法。学辩证法，不要按照教科书那样，枝枝节节地学许多具体问题，不要泛泛地去研究三个规律和一些范畴，而应该集中力量，研究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搞清楚了，其他问题就可以搞清楚。什么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就可以得到自然地解决。每个规律都是和对立统一规律有关系的。比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实际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规律，实际上就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由肯定转为否定，由否定又变为新的肯定，就是否定之否定。今天我们在这里听课是工作，算是肯定，工作一天要休息，又转化为否定，休息完了明天又工作，又是新的肯定。这就算是否定之否定。肯定和否定互相转化，也可以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所以，辩证法的规律、范畴，都是可以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

因此，辩证法的其他规律不能跟对立统一规律平列看待。其他的规律当然也是基本规律，但基本规律也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毛主席的著作着重发挥了列宁的上述思想。《矛盾论》里系统发挥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

要了解事物为什么发展，首先要了解对立统一规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一切事物发展的原因是它的内部矛盾。事物发展的原因，不能说是量变到质变，也不能说是否定之否定。有些反对辩证法的人说："辩证法就是否定的否定。"这是曲解。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事物的内部原因，除非你坚持形而上学，不承认世界上的东西会发展。如承认世界的一切都在发展，就得承认事物有矛盾，而且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承认这一点，事物发展就得不到说明。如果你说发展没有内部原因，而是外部来的，那就很危险，就有脱离唯物论而成唯心论，承认有神论、承认宗教的危险。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把整个世界发展看成为外来的原因，和尚、道士、牧师就可以钻这个空子说，整个世界发展是外来的原因，只有神仙、上帝才能推动世界发展。

所以，承认世界发展，要坚持彻底的唯物论，一定要肯定世界上一切事物自己本身有矛盾，而自己本身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原因。事物发展是由自己内部力量，内部力量即内部矛盾。彻底的唯物论一定是辩证法的唯物论。辩证法就是要承认一切事物运动发展都是由于事物内部原因，事物本身的原因而产生的，由事物内部的矛盾而产生的。没有矛盾，就没有动力；没有矛盾，还有什么发展？

如果一个人自己本身没有矛盾，自己的工作只有成绩，没有毛病，已经够了，那还怎样前进？没有矛盾，也就没有发展动力了，也就不能向前发展了。只有把工作"一分为二"，我的工作应当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改正什么，发展什么，然后才有可能看

到我要怎样发展。一定要承认矛盾，承认发展，要“一分为二”；如果你不承认矛盾，不承认自己工作有矛盾，就会停止前进，甚至倒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就是因为不承认矛盾，不承认自己的工作有矛盾，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很多教训。

不承认矛盾，就不能前进。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原因，是发展的依据。毛主席在《两种宇宙观》这一节里讲得很清楚，任何时候都是承认事物内部原因是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原因；外因也有作用，但不能成为根据，不能起最后决定的作用；只能在某种条件、时间、某种情形下起某种决定作用，但不能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方向。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内因。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外因，自我批评是内因。外因也是不可少的，批评是帮助，但是人的思想问题最后解决一定要靠自我批评。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没有真正的自我批评，别人的帮助也不能真正起作用；如果有认真的自我批评，对于自己的进步就会起很大的推进作用。

所以，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主要是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部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在思想工作中，首先要抓内部原因，当然也不能忽视外部原因。

所谓矛盾是“一分为二”，矛盾是对立统一，因为矛盾是一个东西内部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开始用过“一分为二”的提法，“统一物分成两个部分”。毛主席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观察事物、检查工作、解决问题，都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所谓“一分为二”就是暴露矛盾，看起来统一的东西没有矛盾，但是要把它暴露出来，加以分析。毛主席在合作化运动中把

中农“一分为二”，分为上中农、下中农。这个“一分为二”起了很大作用，过去认为中农是动摇阶级，而没有加以分析，现在把中农“一分为二”，对农村工作有很大意义。客观事物是“一分为二”，我们的方法也是“一分为二”。对任何问题都要“一分为二”。

党内的矛盾也是这样。团结——批评——团结，批评就是一分为二，第二个团结是在更高的基础上的团结。把错误分出去，然后才能真正团结。犯错误也是“一分为二”，一种是改正错误，一种是离开革命队伍转化出去，这都叫“一分为二”。我们党的历史也是这样，经过了两种“一分为二”，陈独秀分裂出去了，受他影响的跟他划清界限，跟党站在一起。张国焘几乎是一个人分出去了。发展是“一分为二”，是不断“一分为二”的过程，什么时候“一分为二”停止了，发展也就停止了。如果有人阻碍“一分为二”，就是阻碍事物的发展。

有的同志问，外因能不能起决定作用？凡是原因对结果都有某种决定作用。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着重讲内因的作用。内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的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最后的原因。外因也是一种原因。世界上的事物是联系的，问题不是决定不决定。外因如果没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就不叫原因了，就不起作用了。现在主要讲哪个是第一位的原因，这样提问题才好解决。毛主席讲内因是根据，是第一位的；外因是条件，是第二位的。条件有没有决定作用？我们常常讲，问题决定于什么条件。这样讲也不错。问题是外因能不能起主要决定作用？外因不能起最根本的决定作用，也可以说外因不起决定作用，这是名词问题，反正它不是根本的。内因也可以说是条件，但它是根本条件。外因，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不管怎么大，甚至起深刻的影响，但它不是最

后的。有些外因影响是很大的。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有深刻的影响。这是不是外因成了最后的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外因虽然作用很大，究竟起什么作用，不决定于外因；结果怎么样，也要看它内部矛盾的转化。俄国革命对世界革命有很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引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土耳其革命，苏联用很大力量帮助土耳其的基马尔，土耳其独立了，结果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旧民主主义革命还很不彻底，现在的土耳其仍然是很落后的。中国同时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是发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把俄国革命当做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吗？不能。不能说俄国革命引起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说促进了这个革命。中国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在于中国有比资产阶级先进的无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革命碰了许多钉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有各种各样的革命，譬如农民革命、改良主义革命、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革命都失败了。中国人民懂得，所有这些革命都不行，连孙中山都知道旧民主主义不行。有了这样的内部基础，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就出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本原因还是内部矛盾。现在中国革命对亚非拉人民革命的影响也是这样。中国革命对不同的国家起了不同的作用，因为各国情况不同。所以，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外因被内因所接受。俄国革命经验被中国所接受，起了作用；土耳其没有接受思想帮助，只接受了物质帮助。批评起作用，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得靠他自己的自我批评。一个人犯错误，他的思想像赫鲁晓夫一样，你再批评也不能起作用。

外因和内因算不算一对矛盾？也可以算一对矛盾。因为是一对矛盾，就会互相转化。怎样转化呢？外因在一定范围内也可叫内因。比如西藏的解放，是我们把人民解放军开进去，帮助西藏

的农奴取得解放的。解放军开进去，对西藏这一地区来说，是外因。但是，在国际上来说，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事情，因而是内因，不能说是外因，如果说是外因，那尼赫鲁就同意了。内因和外因就是这样转化的。转化要有条件，条件就是外因。范围不同，内外不同。中国和外国，外国对我国的影响，是外因；但就整个地球来说，是人类历史内部的矛盾，是内因。对内因和外因的转化，一般地只能这样看。在工作中，有时要着重抓内因，有时要着重抓外因。在不同的时间内，着重点可以转化，这种情况并不是说外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内因、外因也是讲的"一分为二"。矛盾的规律是"一分为二"的规律，这是辩证法的核心，我们主要要掌握这个核心。掌握这个核心，还要注意以下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矛盾普遍性是什么意思？《矛盾论》讲得很清楚："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简单地说，矛盾对于世界一切事物都没有例外。如果认为世界上有哪一种东西有例外，那么，辩证法就不彻底。彻底的辩证法观点，就要承认一切事物都有矛盾，而且自始至终有矛盾，毫无例外。修正主义者有一种手法，可以叫做"例外论"。就是用矛盾有例外，矛盾不是普遍的这种诡辩来宣传修正主义。它一般承认世界一切事物都有矛盾，但在紧要问题上否认矛盾。它承认阶级社会有矛盾，但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它一般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又说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对抗性矛盾；它可以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又说今

天的这种矛盾可以和解，矛盾变为乌有。这些都是荒谬的。

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矛盾就化为乌有么？毛主席说，到将来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先进、落后的矛盾，还有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而且还会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矛盾。我们彻底承认任何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任何时候都有矛盾的。绝不能说可以有某种事情某个时候便没有了矛盾。

矛盾是不是完全普遍的？有没有例外？在这个问题上，很早就有分歧。德波林学派就是认为矛盾不那么普遍。德波林的观点是：事物发展的开始没有矛盾，事物内部各方面只有差异，不是矛盾，矛盾是在发展到一定时候才有的。同时，事物发展到最后也没有矛盾，矛盾发展到最后就可以和解。既然可以和解，当然也就说不上矛盾了。毛主席在《矛盾论》里特别讲到差异是不是矛盾的问题。毛主席说：差异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一件事物发展的开始就有矛盾，就包含着矛盾，不过不太显著、没有激化罢了。从现象上来看，是差异，实际上是矛盾。一个阶级社会开始就有阶级矛盾，但是德波林学派认为只有差异、没有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有没有矛盾，德波林学派认为没有矛盾。马列主义者认为有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每一差异就包含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暴露出矛盾的性质。这个思想不是不重要的，而是很重要的。从差异里面看出矛盾是很重要的辩证方法。这是从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的方法。毛主席的辩证法思想之所以高，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运用得非常出色。我们要学会善于从差异中发现问题，运用从差异中发现矛盾的方法，不是要我们抓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而是着重抓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要抓主要的矛盾，从看来仅仅是差异的现象中抓住我们要抓的问题。

我们认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

是有矛盾的。过去一般只是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有差别。我们肯定差异就是矛盾，就要肯定三大差别就是矛盾，所以知识分子要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领导与群众也有矛盾。这一点，苏联坚决不承认。现在苏联的一些哲学家的文章，说领导与群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只有差别，没有矛盾。我们要揭露这种反辩证法的思想，坚持有差别就有矛盾的原则。有差异的地方就有矛盾，问题是矛盾表现得显著不显著、激烈不激烈，激化的程度有区别。

很多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把自己“一分为二”，有成绩有缺点，有正确有错误。能不能说蒋介石、约翰逊、赫鲁晓夫，也是有成绩、有缺点，有正确、有错误？如果用不上这个公式，就想不通了，就认为“一分为二”完蛋了。这样的观点，还是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要讲清这个问题，必须打破这个框框。“一分为二”是个方向，不是框框，是工作指南，只负责指出一条道路，至于如何分析，要看具体情况，对自己的工作是可以这样分的：有缺点，有成绩；有正确，有错误；有长处，有短处。对敌人就不能这样分析。对蒋介石、约翰逊、赫鲁晓夫就不能这样分析。约翰逊假和平真备战，是“一分为二”。赫鲁晓夫假马克思主义、真修正主义；对亚非拉革命假同情、真捣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是假团结、真分裂，这也是“一分为二”。这样分析，就没有问题了，符合事物的特点。修正主义是敌人，又是教员，不过是反面的教员。帝国主义、反动派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如此等等，这都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没有例外的；同时，不同事物有不同的“一分为二”。

承认矛盾普遍性对工作有什么意义？我们观察任何问题、解决任何问题，都得坚决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这个方法不能

有任何例外，在任何时候不能有任何动摇。这在今天特别应该强调，因为对“一分为二”的方法动摇，是很容易发生的。

在形势的分析上，常常可以看到对“一分为二”的观点有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困难的情形下，只看到黑暗一面，不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趋势。

对形势的估计，也有相反的情形：在顺利时就看不到困难了。在顺利时又能看到可能遭到的困难，这就是“一分为二”的方法。

再一种动摇的情况，是对工作不能“一分为二”。工作有了成绩，就看不到缺点；对自己只看到成绩，看不到缺点，而对别人只抓住缺点，否定成绩。这也是对辩证法的动摇。

这些情形是生活中的例子，比较容易出现动摇。有这些动摇，就妨碍我们正确认识问题。

不管社会科学或文学，没有辩证法就不能正确反映客观。就会使工作发生偏差。所以研究矛盾，承认矛盾普遍性，主要是在工作上掌握“一分为二”。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有任何动摇，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对工作、对周围一切事情要“一分为二”；对权威也要“一分为二”；对19世纪的高峰，也不能颂扬备至，也要“一分为二”。30年代的作品当然也不是一塌糊涂，也要肯定，也有成绩，但绝不能认为比我们今天60年代的作品高。只有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才能看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前进。

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是分不开的。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一分为二”，对每一个事物要“一分为二”，同时又要按矛盾的不同情形来作具体的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不同的矛盾有不同的特点。矛盾是普遍的，但每一个事物的矛盾又都是具体的，特殊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在对具体问题上要作具体分析。

《矛盾论》一文用很大篇幅论述矛盾的特殊性，主要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当时主要的错误，是不承认矛盾的特殊性，不注意国内阶级矛盾的特殊性。

具体矛盾要具体分析。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忽视一面，而只注意一面。矛盾的普遍性是要坚持“一分为二”；矛盾的特殊性是用“一分为二”作具体分析，没有具体分析，就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也就不能真正解决矛盾。所以，对一个矛盾的不同发展时期要做具体分析。同一个人昨天和今天就不一定相同。同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每一个阶段，又有它的特点。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在科学上是如此，在文艺上也是如此。文艺上反对公式主义，就是因为它对社会矛盾没有具体分析。公式主义不好，它妨害文艺创作。好的文艺作品，一般都能提出问题，通过文艺典型，暴露矛盾，解决矛盾。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这样：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具体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当做一个题目联系起来讲，原因就要注意在研究矛盾的时候，一方面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另一方面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就要把“一分为二”作为最普遍的方法，对任何问题在任何时间都要“一分为二”，都不要动摇，不要认为可以没有矛盾了。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注意每一种矛盾都有特点，即有个性。在我们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时，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要注意它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不注意矛盾的特点，就要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错误。《矛盾论》里指出教条主义错误之一，就是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注

意中国矛盾的特性。毛主席写这篇著作时，王明的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不承认、不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就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不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辩证法没有学好，有些问题就会想不通，譬如对人要“一分为二”，总是要分为正确与错误，那么对帝国主义是否也可以这样分？如果对它不能这样分，就不能搞“一分为二”了，是否“一分为二”就无效了。这类问题是普遍的，到处都有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发生这个问题，就是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同的矛盾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一分为二”不是死的公式。不同的事物，矛盾不同，对立的两面不都是一样的。对任何人都用简单的正确与错误来分，就没有效果，这就是公式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这样分，世界革命人民可以这样分，有正确有错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正确认识没有完成以前，免不了有一些错误。但对帝国主义不能这样分。我们文艺作品写一个坏人，就可以把这个人的两面性写出来。坏人作假，作品上可以写出他的作假，同时又写出他的本质一面。一个很坏的人如果只简单写他坏的一面，有时还不够，要把它的假象写出来，揭露出来，那才能够说是全面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法。正确与错误也有不同的分法。斯大林是三七开，有些人是倒三七开。有些人的错误很少，是暂时的错误，如马克思、恩格斯写文章中也写到在某个问题，有过错误看法，这错误很小。列宁与斯大林比较起来，不能说列宁也三七开；但不能说列宁一点错误都没有，列宁讲过自己也有过错误。不过，这是个别的情况。正确与错误有各种各样特殊性，斯大林三七开，就可以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比例不同，质量也就不同了。如果倒三七开，这个人就不很好了。譬如普列汉诺夫在早期，有好的地方，有对的地方，但是后来成了叛徒，叛变革命

了，就不能算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变成修正主义者了。

对矛盾要做具体分析，把矛盾的两面，每一面都作具体的分析。我们讲和平，帝国主义也讲和平，这和平不一样，帝国主义的和平是假和平，与他的真备战联系起来，一研究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矛盾，它是反动的两面性。反动就是反动，可是反动也有反动的两面性。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投降美帝，可是与美帝之间也有矛盾，美帝有时又想把他一脚踢开，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与美帝经常有斗争，斗争不是为了反美帝，而是为了取得奴才资格，他不斗争，就会像吴庭艳一样下台。蒋介石投靠美帝，是美帝的奴才，又怕当不成奴才，这是奴才与主子间的矛盾。

运用辩证法，最重要、最困难的就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我们要努力学的就是这一点。毛主席明确地讲，要用较大的力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偷懒和怕麻烦的人，就没有办法运用辩证法。随便抓一个公式来，没有办法掌握辩证法。要掌握辩证法，既要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又要掌握矛盾的特殊性，特别要掌握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不能放弃，放弃了矛盾的普遍性，不搞“一分为二”，就会离开辩证法。但是，你主观上不动摇，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在实际上做的时候，不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结果还是不能掌握辩证法。我们要有坚定的观点，同时要落脚到具体分析上。能不能作具体分析，是能不能掌握辩证法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把事物“一分为二”的关键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作具体分析呢？主要是为了我们的斗争，为了工作。没有具体分析，就不能用辩证法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指导我们的斗争。我们的工作就是解决矛盾。解决矛盾，就要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从哪里来？从具体分析中来。解决矛盾要经过斗争，用什么方法进行斗争，决定于矛盾的特点。对矛盾的特点认识清楚了，才能找到

针锋相对地同他斗争的方法。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要拿起枪杆子来和它斗争，没有武装斗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自己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就不能拿枪杆子来搞。这也拿枪杆子来搞，那成什么样子呀！要作具体分析，才能找到恰当的方法。武装斗争也有不同的斗法。我们的方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个方法是对敌人的强弱点作了具体分析才能做到的。即使原则上掌握了这个方法，实际上做的时候不作具体分析，不能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还是不行的。

总之，任何时候对任何事物都要坚持"一分为二"，应用两分法，但是，又要根据矛盾的不同情形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千篇一律，把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等当做死的公式简单地去套用。

## 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一件复杂的事情同时存在很多矛盾，要注意用最大力量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主要矛盾是带关键性的矛盾，是事情的主要环节，是我们斗争的主攻方向。解决矛盾，要斗争，斗争方面多了，就要考虑，哪是主攻方面，要用主要力量。主要矛盾又表现为主要斗争。主要斗争搞好了，其他的斗争就容易胜利了。主要斗争失败了，其他斗争胜利了，也会垮台；主要斗争胜利了，个别的斗争失败也不要紧。主要矛盾对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主要矛盾是会变化的，要经常注意它的变化。在历史上关于主要矛盾运用在实际斗争中最好的例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与王明关于要不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论。王明看不到抗日战争所引起的民族矛盾已是主要矛盾，看不到全民的抗日要求，把自己孤立起来了。1935 年遵义会议后，大家认识一致了，才搞

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一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那就是我们抓住了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

我们的文艺创作也有这些问题，要不要反映主要矛盾？创作反映当前的主要矛盾，这是艰苦的工作。要创作，就要熟悉，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搞“活报”容易，要搞成艺术作品，就要经过相当时期的努力。一个时代的作品应当反映他们时代的主要矛盾。每个时代的杰出作品，好的或很好的作品，主要是反映了他们当时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革命时代的作品，主要反映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古代很多杰出的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为什么那样受欢迎，因为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反映了农民与封建势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我们今天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努力反映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要矛盾。

就斗争来说，主要矛盾也就是主要斗争，是斗争中、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它关系着斗争的胜败，关系着对立面能不能转化。因此，我们运用辩证法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分析主要矛盾。学毛主席著作，凡是学习好的，都不约而同地注意主要矛盾问题。在工作中会不会运用辩证法，就看你会不会找出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找主要矛盾，是要费力气的。因为有些主要矛盾不太好找，而且主要矛盾是变化的。一个主要矛盾解决了，又出现第二个主要矛盾。变化的时间长短不同，但总是要变化的。世界的主要矛盾变得慢一些。具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可能几天一变。我们学习哲学，用哲学来指导工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怎么来确定主要矛盾？找主要矛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毛主席说要用最大的力量去找出主要矛盾。矛盾是很多的、很复杂的。不找出一个主要矛盾，工作就被动，就不容易解决问题。确

定主要矛盾用什么方法？我的实践经验不多，很难说具体办法，讲哲学也只能讲原则，因为有不同的情况，这一件事的这一个方法不能代替另一件事的方法。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找主要矛盾的方法。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去实践中去摸，经过几次实践，把自己的想法加以比较，而后就可以找出来。有时候找得不对，放弃了再找，总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有些情况的主要矛盾比较显著，容易找，比如日本打进来了，只要有一点辩证法头脑的，也就可以感觉到。有些问题，某些资产阶级都看出来了，可是有些人就是看不见。“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有很明显的不同，很快转向抗日方面，就想找共产党。可是教条主义就不承认，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危险。主观主义害人到了这样的程度！

只要是立场、观点、方法正确，经过研究，主要矛盾是不难找到的。有的时候找主要矛盾要经过一些实践、认识的反复。具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往往要经过实践才能找到。主要矛盾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环节，抓住这个环节，其他工作也就迎刃而解。主要矛盾也就是我们主要用力的方向。所以，抓住主要矛盾，对我们确定战略策略有重要意义，主要矛盾抓住了，我们的战略策略就可以正确。战略部署要根据主要矛盾来确定。

再讲一下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关系问题。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基本矛盾是整个运动过程中能够起决定作用，起根本作用的矛盾，时间可以是很长的。比如民主革命过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自始至终有一种基本矛盾：中国人民和三大敌人的矛盾。主要矛盾则不同，它是整个过程中某一个时期（阶段）特别突出的矛盾。这种矛盾并不是全部的基本矛盾，只是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组成为一种，称为主要矛盾。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矛盾并

不是所有的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人民的矛盾。讲基本矛盾，整个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那个时期主要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要用主要力量去反对它。其他的矛盾要照顾，但是，解决其他的矛盾，一定要服从主要矛盾的解决。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土改就不搞了，而搞减租减息。主要矛盾突出了，次要矛盾缓和了。

主要矛盾一般是一个时期的，也有很长的过程，比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如此。说长期，是不是始终都有？这还要看情况，比如把资产阶级的进攻打下去以后，就要把主要精力用来搞生产，发展经济，加快建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讲矛盾的焦点，有时也是指主要矛盾。有时候，一些名词是可以通用的。焦点并不等于它是主要矛盾，是指许多矛盾集中点。但是，有时是总矛盾最突出的一点，最主要的一点。讲亚、非、拉是矛盾的焦点，就是指主要矛盾。亚、非、拉可以说是各种矛盾的集中点。焦点就是集中点，也是主要矛盾的所在地。各种矛盾的焦点，就是讲全世界的矛盾在当前一个时期来说，都要集中到那里去解决。有时候主要矛盾也可以讲引起主要斗争的矛盾，主要矛盾表现为主要斗争。我们日常工作中讲的主要环节，就是我们主要用力的地方。焦点和主要矛盾的意义多少有点不同，但有时候可以看成是一件事。各方面都用主要力量去争取亚、非、拉，所以，现在主要斗争所在，又是焦点、主要环节。

下面再讲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矛盾两个方面中间占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不是两片虎符，半斤八两相等，不是平均的。矛盾的对立面不可能平均，而且关系经常变化，总有一方占优势，占主导地位。旧社会剥削阶级占优势，今天总的说来是人

民占优势。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有国家政权嘛！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占优势、占支配地位的矛盾方面。分析矛盾时，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注意究竟哪一方面占优势。现在讲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人民的关系，和人民的矛盾，今天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人民占优势，到处可以证明。我们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研究矛盾的优势，因为它确定事物的性质。

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毛主席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来，也不是偶然的，是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分不开的。在目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个问题仍然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主要的有两点：第一，认清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矛盾的性质、事物的性质；第二，认清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决矛盾的恰当的斗争方法，在战争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恰当的战略战术。

如果找不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搞不清事物的本质。这个问题，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最为明显。社会性质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我国在1949年以前，除了解放区以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1949年以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好人、坏人，决定于好思想、坏思想哪个占统治地位。不能说好人一点错误、缺点也没有。好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党性占统治地位，有时也有点个人打算，但是碰到与党的利益矛盾的时候，能够服从党的利益。坏人不同，他们是追求个人利益，牺牲党的利益。人的品质好坏以哪个思想占统治地位这一点来决定。

矛盾的主要方面更重要的是确定战略、策略、工作方法。可以从两方面确定：首先是从客观方面研究矛盾力量的对比，看哪一方面占优势、主导地位，然后，在主观上确定应该采取什么战略、策略。我们大家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可以看出

来毛主席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1927年敌我力量对比，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因此敌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战略（只讲战略）应该是防御，保存、积蓄力量。政治上、军事上都应该是这样。那时候分清谁是主要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因为当时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他们不承认力量对比的客观情况，写文件动不动就是敌人是“惊恐万状”、“吓得发抖”，总是把我们看做占优势，敌人占劣势。特别是毛主席辛辛苦苦组织了游击队打了一些胜仗，主观主义就更嚣张起来，抓着一些胜仗贪天功为己功，而认为他们“正确”。他们既然认为革命力量占主导，所以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战略上要实行进攻的思想，在城市里要搞公开的游行示威，在乡村里就主张进攻大城市。在敌人力量占主导时，我们采取战略进攻是错误的。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部讲的是战略防御，一直到1947年6月以后才说“军队向前进”。你们看1947年以前，哪有一篇文章讲这个话。这讲的是战略，还有战术。战略和战术是对立的统一。战略上的防御不等于战术上都是防。战役、战术是个局部问题，战略是个全局问题。在战略上是防御，但在战役战术上则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实行进攻。当然，也有防御，这是有条件的。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讲了。毛主席运用辩证法高明的地方，就在于运用得非常全面。在战略上把敌我力量对比“一分为二”，在一个时期里，肯定他们是优势，采取防御；但是不把战略上观点片面扩大，机械地运用到战役战斗上，而是重新作分析。战役战斗上我们的力量必须占优势，而且我们要自觉地组织这种优势。比如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毛主席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术的进攻作这样巧妙的结合，以前的军事书上是没有的，因为过去的战争没有像中国革

命战争这样复杂、曲折。毛主席在战争问题上，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哲学上作了最高的总结。"一分为二"，不是简单的分一分就完了，它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折衷论，不是半斤八两。分了以后，还要掂掂轻重，哪个方面是主要的。不掂轻重就不知道相互的关系怎么样。

主要方面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工作中着重抓哪一方面？《矛盾论》上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说到了："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立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这里讲了实践和理论的矛盾，在工作中抓实践还是抓理论？有时候应该用主要力量抓实践，有时候应该着重抓理论。当着很多同志都脱离实践了，搞官僚主义了，就要用主要力量号召大家参加实践。等到大家都参加了实践，这方面没有问题了，总结经验又成了主要的问题。那时我们的工作就应该抓总结经验。在工作中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哪一方面有问题，就把这一方面作为我们主要用力方面，着重去抓它。这也是研究主要矛盾方面的一个目的，也是运用主要矛盾方面来指导我们工作的一个意义。

从文艺方面说，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应有什么特点？决定于什么？文艺作品都要写矛盾，要确定作品有没有社会主义性质，标

准很多，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标准，首先是劳动人民成为主角，特别是劳动人民的英雄人物作主角，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准。可以不可以写中间人物，当然可以写，为什么不能写？反动派还要写嘛！作品中没有反派、没有中间人物，就没有戏啦！要写，问题是你把它摆在什么地位。如果你要把它摆在主要地位，当做歌颂对象，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文艺特点。

我们现在的文艺算不算社会主义文化？有没有什么标准来判断？有一个标准，就是要看在文艺戏剧中，工农兵是否占主要地位。苏联的芭蕾舞一直演《吉赛尔》、《天鹅湖》、《天方夜谭》，从来没有出现工人和农民，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把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搬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来。我们可不可以演一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当然可以，问题是它该占什么地位？如果帝王将相占主要地位，我们的戏剧文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戏剧文化，也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尽管你也把这些戏送到工厂农村去演，但是在舞台上占支配地位的不是工农兵而是过去的帝王将相，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一定要把这种现象倒过来。帝王将相的东西，为了参考，可以少演，分量要少一些。量和质有关系，大量的应当是现代的东西，应当是工农兵英雄，应当是劳动人民。过去的、外国的东西可以小量的存在。我们要很好地努力，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矛盾的性质问题，对文化、文艺意义很大。

## 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同一性是指对立面的相互联系；斗争性是对立面的相互排斥。对立的东西联系起来叫做同一性，相互排斥就是斗争性。研究和分析矛盾的对立面如何相互联系，又怎样相互斗争、排斥，就是

研究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两种性质。同一性有两种，一种是对立面互为存在的条件，你不能离开我，我不能离开你，在统一体内同时存在，叫互为存在的条件；另外一种是互相转化，转化中间联系起来。例如劳逸结合，白天工作，晚上睡觉，不断转化。工作、休息联系起来，有同一性。辩证法中讲的同一性与形而上学讲的同一性不同，形而上学的同一是等同，没有分别，而辩证法的同一，是讲一个统一的东西分为对立的方面，这对立方面有联系，所以它们是同一的。如果资本家改造好了，资产者变为劳动者，这是转化。能转化，就有同一性。

这里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提出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有时想不通。例如生转化为死，就想得通，死转化为生，就想不通了。这个想不通，还是没有注意到转化是有条件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人活到老，转化为死，这是有条件的；已经死了的人变为活人，除非是假死，真死就没有条件可以转化为活。但是在另一方面，另外条件、另外情形下，还是可以理解的。情形有好几种。我们身体为什么能够活下去？我们身上有一些细胞天天死去，又天天产生新的细胞，我们才能活下来。如果旧的细胞不消灭，老不死，新的生长不出来，人就活不下去。从这一点看，是死变为生。另外还有一种情形，从个人与集体关系看，个人死了，集体可以活。黄继光死了，队伍前进了。一个人死了，保住了集体。在战斗中有这种情形，个人的死变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但这正是辩证法，也是死变为生。

我们学辩证法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揭露矛盾，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努力促进对立方面向进步的方面转化。我们的工作是转化的工作，向前进方面转化的工作，使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国家，使社会主义变成共产主义，使资产阶级改造成劳动人民，甚至

“五类分子”也要通过劳动得到改造。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一切事情向进步的方面转化，坏的变成好的，落后的变先进的，坏事变好事。学辩证法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学会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我们都在做这个工作。我们了解了这个任务、方向之后，就可能做得更自觉、做得更好。

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是列宁所说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个原则。这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忘记这个原则，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第一次讲这一原则，都是有所指，都是针对修正主义的。老牌修正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调和，经过谈判，经过协议，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有没有这种同一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搞谈判，可以达成协议，这种协议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绝对不能。列宁指出和资产阶级谈判都是暂时的。我们跟帝国主义也可以谈判，但都是暂时的，而斗争则是绝对的。

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讲过两次，一次是在《矛盾论》。那正是与国民党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王明回来了，他提出把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共产党不要领导，他把统一战线看得很绝对。毛主席讲国民党与我们搞统一战线是要整我们，他要我们抗日，这是借刀杀人，先消灭我们三分之二的力量，将来再消灭三分之一。他们是要消灭我们，这是他们的绝对的方针。当时毛主席这番话有极重要意义。毛主席第二次谈到这个问题，是在 1957 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1957 年那正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敲锣打鼓，当时一片乐观，有些人便认为资产阶级没有问题了，他们欢迎社会主义。那时有些人就忘记了同一性是相对的。资产阶级敲

锣打鼓公私合营，好像非常欢迎社会主义，非常欢迎无产阶级专政，好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绝对没有问题。殊不知他们表面上是一套，回到家里对亲戚朋友讲的又一套。他们说："我们是上了贼船"。《水浒传》里不是有"贼船"吗？阮小二、阮小五是农民英雄，统治者说他们是强盗。有钱人上了他们的船，划到江心，停下来讲条件：你是吃板刀面还是吃浑沌面？吃板刀面，就是砍头；吃浑沌面，就是把你绑起来，抛到江里。反正是要同你的财产"一分为二"，把财产留下。他们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表面上跟我们讲统一，实际上跟我们讲斗争。事实证明，他们敲锣打鼓是被迫的、相对的、表面的，而且只是一方面，根本的东西同我们斗争，斗争是绝对的。毛主席重申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也是"有的放矢"的。

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两句话可以统一到毛主席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句话是归纳了列宁的思想。两个对立面能够在一个统一体中共存，能够互相依赖，是通过斗争才产生的，是斗争的结果。斗争是根本的。对立面要互相依赖，就要互相斗争，不斗争就不能互相依赖。你要去依赖它，就要跟它斗争。所以，辩证法是很妙的，有时脑子不灵活一点就想不通。对立面又是互相依赖，又是互相斗争，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但是斗争是根本的。你不斗争就依赖不了。资产阶级不跟无产阶级斗，不斗得把无产阶级压迫在底下，它就依赖不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时，无产阶级要活下去，也是要斗。你不斗，活也活不成。你要出卖劳动力，能够保持自己活下去的水平，非要经常斗不可。

统一战线也是一种互相依赖，你不斗就不行，不斗就没有统

一战线。我们要搞统一战线，为了工作的目的，要跟一些别的阶级联合，所以要互相依赖。要互相依赖就非斗不可，不斗就依赖不了。对资产阶级不斗一下，它不跟你搞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必须是革命的统一战线。革命的统一战线一定要依靠无产阶级掌握领导。你要掌握领导，要资产阶级跟着你走，就非要斗不可。要利用他的力量，在这一点上要依赖，不是完全靠他，这也算是依赖。

所以，没有斗争就没有同一性，没有斗争就达不到同一。有没有同一性，互相依赖到什么程度，要看斗争得怎样。所以说，同一性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最根本的条件是斗争，保持一定的斗争水平，才能出现某种同一性。这些问题要从实质上来了解，不能从形式上来了解。从形式上来看，任何时候矛盾都有同一性，任何时候矛盾都有斗争性，是否说斗争也是绝对的，同一性也是绝对的？从形式上看好像是这回事，没有斗争当然不叫矛盾，可是，没有同一性也就很难说是矛盾。两个东西一点联系也没有，发生不了斗争，当然也就没有同一性了。从形式上看，好像同一性也是绝对的，因为任何矛盾都有对立的同一性。问题的实质是同一性只是斗争的结果，因为对立面要互相依赖，所以必须要斗争，经过斗争才能出现同一性。同一性是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目的，如统一战线是我们的要求，这个要求能够实现，必须经过斗争。所以，斗争是根本的，同一性是斗争的结果，因此说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是一个纠缠最多的问题，许多同志觉得不好理解。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不对，永远也不能解决。什么方法能解决，什么方法不能解决？教条主义的方法，抠字面的方法，从原则出发又回到原则去的方

法，那就无法解决，不能理解这个问题。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研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同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多多少少有点从原则出发又回到原则，多多少少有点抠名词、概念。在这种影响下，就不能解决，这种影响很大，许多人舍不得丢掉这种方法。他们认为，凡是矛盾总有斗争性，总有同一性，有斗争的地方就一定有统一，要斗争就要有联系。因此，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好像也是绝对的。就是因为有这一套逻辑，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毫不可惜地抛弃这种纯粹从原则出发的方法。

矛盾的同一性是对立面的同一性，本性是互相排斥，斗争是绝对的。这个原则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在文化、文艺工作中，有没有了解这个原则？我们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东西采取什么态度，符合这个原则么？很值得我们研究。

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因为它是对立面的本性，斗争性不是绝对的就不能叫做对立面。从逻辑上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对立性，对立性总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在实际生活中到处都有这种例子。

广义的互相斗争、互相排斥，不是光指打架。自然界也有同一性、斗争性。矛盾怎么样推动事物发展？就是因为它有统一，又不统一，所以才推动事物发展。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矛盾规律有一段话概括得很全面：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相互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一个社会的两个阶级，在一定条件下联系起来，暂时互相依赖，但又天天在搞斗争。这个斗争最后要破坏这个同一性，这样就出现飞跃的发展。

矛盾斗争是绝对的，但斗争的方法是具体的。不同的情况下

面，不同的条件下面，应该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主要是区别两种矛盾，区别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两种矛盾。这是涉及矛盾性质的问题。对抗性矛盾通过对抗性斗争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用非对抗性斗争来解决，不能混淆。区别两种矛盾，用两种不同方法解决，这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矛盾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性，总的分起来基本上是两种：对抗的与非对抗的。这在我们实际工作中特别重要，所以特别提出来研究一下。

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没有专门讲，为什么《矛盾论》要讲这个问题？这也是从实践中来的。16 年的斗争碰到了要区别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1927 年陈独秀就把对抗矛盾看做是非对抗的，甚至不承认这个矛盾。蒋介石拿了枪来屠杀工人农民，他还要把工人农民的自卫武装缴掉。另外还有非对抗的问题用对抗办法来解决。比如党内的问题，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又犯了错误。所以，流血的经验逼迫人要考虑区别一下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失败的经验，流血的经验，使我们得到许多感性认识。这些感性认识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思想，就是要区别对抗与非对抗的性质。把物质变为精神，就出现在《矛盾论》里的一节。学这一段主要想一想历史经验。所有讲的问题，都是由流血的经验作基础的。可以说，这些著作是用血写的，不是用墨写的。流血的感性认识使人非考虑这些问题不可。不搞清楚还要犯错误。这样大的国家犯错误不得了，小国家犯错误使小国家的革命失败，几亿人口的国家犯一个错误，就要涉及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

有人问：对抗矛盾是不是就是敌我矛盾？不可以这样说，对抗这个概念比敌我的概念还要宽一些。有些对抗矛盾，比如炸弹爆炸就无所谓敌我问题。对抗在自然界也可以出现，敌我矛盾则

是阶级社会的现象。敌我矛盾一定是对抗的矛盾。对抗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时候变成对抗，比如工人打起架来了，农民甩起扁担来了。这样的对抗是不是敌我矛盾？不是的。内部矛盾也会发生对抗。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也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当然，这些都要有一定的条件。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

(1965.5)

“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杨献珍同志散布了这个修正主义观点。有一个时期，一些人看不出它的错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合二而一”披着一层辩证法的画皮；杨献珍等同志百般地粉饰了这层画皮，使它在一个时期迷惑了人。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话：‘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仔细注意，就可以知道，这是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公式，拿来代替“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

如果把杨献珍同志的基本思想具体分析一下，就更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基本思想，包括在他的下面几段话里：

---

* 1963年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从文艺开始，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学术领域，包括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观点，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这是在毛泽东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本来是学术问题，也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上纲为“阶级调和论”、“修正主义”观点，作为反党事件来处理。

艾思奇在当时情况下，按照中央的指示，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坚持“一分为二”辩证法，批评“合二而一”观点，提出事物的不可分是相对的，可分是绝对的观点。但是，文章出现了上纲过高的问题，学术上也有偏颇，这是不应该的。我们按照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时的原文收人，未加任何改动。

“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

“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

“学习对立统一的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思想联系起来的本事。要经常记住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经常记住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实际工作中的片面性。”

杨献珍同志这个基本思想，在他自己讲课的手稿里，在他授意别人所写的文章里，都作了系统的解释。这里既包括他关于客观事物的见解，也包括他关于人的主观如何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见解。把他们的解释概括起来，就是：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因此，人们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包括制定和执行路线政策）的方法，就是要经过“一分为二”达到“合二而一”。这就是他所谓的“学习辩证法”的目的。“合二而一”，既是客观事物存在的规律，又是人们主观上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目的和原则，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就是杨献珍同志的基本思想。

在这个基本思想里，“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还有什么地位呢？它只是个陪衬罢了。杨献珍同志明明是要彻底地用“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来否定和偷换“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 一、客观事物是“一分为二”，决不是“合二而一”的

把客观事物说成是“合二而一”，这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根据。让我们先摘引几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关于客观事物的辩

证法的论点，然后再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来加以说明。

恩格斯的论点是：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整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以其最后的互相转变或转变到较高形态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自然辩证法》，第174页）

列宁的论点是这样的：

“一分为二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原译作“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也可以译作“一分为二”。）

“‘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408页）

“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再看毛泽东同志的论点：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关于客观事物辩证法的论点，和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思想，难道有什么共同点吗？不但没有共同点，而且是根本相反的！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思想，只强调“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而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却着重强调对立面之间的“不断的斗争”，强调“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强调一切现象和过程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肯定对立面之间的联系，指出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但在这里他们又特别强调了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把对立统一规律解释成“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而更应该强调这种联系是可分的。列宁曾用“一分为二”的概念来概括辩证法的主要实质；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加以展开，指出“一分为二”是个普遍现象，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也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难道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犯了根本的错误，竟要杨献珍同志发明一个“合二而一”的公式来加以修正吗？当然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错误，根本错误的恰恰是杨献珍同志的修正。

这里的决定性的分歧是在于：我们要不要承认宇宙万物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要不要承认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的永无止境的前进发展的过程。唯物辩证法承认客观事物就是这样的过程，形而上学则反对这样的理解，把客观事物看做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各自孤立的东西。形而上学也不能不对事物的变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解释，它把后者解释成仅仅是量的增加和减少，解释成既成事物的永无止境的循环。按照形而上学的这些理解，当然可以把客观事物纳入“合二而一”的公式；把对立的统一曲解成“只是”对立面的双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这就是“合二而一”；把发展曲解成两个一成不变的东西的交替出现，曲解成走马灯式的循环，这也算“合二而一”。然而这究竟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结合论和循环论，因此也就应该老老实实

承认“合二而一”是形而上学的公式，怎样能把它硬塞进辩证法的范畴里来呢？

但是，如果承认客观事物是辩证的运动变化过程，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减和循环，而是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的永无止境的前进发展的过程，那么，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合二而一”的公式，决不能概括这样的过程，也不能表达这个过程任何一个方面、一个环节、一个部分的实质。这个过程只能看成是对立的统一，或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对立的统一，是事物内部不断地相互斗争着的对立面的统一，由于“不断的斗争”，尽管对立面之间存在着联系，甚至存在着某种“不可分离的联系”，但这个“不可分”终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对立面之间的不断的斗争使它们的统一经常存在着走向破裂、分解的趋势，而且迟早总要使破裂、分解成为现实，从而使事物由旧的运动形态转变为新的运动形态；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这正是“一分为二”的过程，这正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对立的统一，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是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本规律，它决不是形而上学的静止的统一、取消了斗争的统一、无条件的和平共处的统一，因此，决不能把它的实质说成是“合二而一”。

杨献珍同志通过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列举了许多事物运动的例子，从自然界的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一直到人类社会和人类认识运动，说这一切运动都是由各种不同的对立面“合二而一”构成的。其实，他们的例子举得愈多，就愈加暴露自己不但对唯物辩证法一窍不通，而且对于所谈到的事例都是毫无常识。因为那些自然界的、社会的和人类认识的运动，正是统一物“一分为二”的矛盾斗争的表现，而决不是什么“两个侧面”的“合二而一”。

什么是物体间的机械运动？举例来说，如：一个物体的运动能量经过冲突、摩擦等等形式转移到另一物体，这个能量的转移，使前者失去它的能量，而后者则获得了前者失去的相等的能量。这就是一种机械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对于后者来说，就是前者的能量起了“作用”；对于前者来说，它失去能量，就表现为后者对它起了“反作用”。所以，作用和反作用，只是同一个能量在两个相互接触的物体间“一分为二”的表现。机械运动，能量在两个物体间转移的运动，正是由于同一个能量的“一分为二”、作用和反作用的统一和斗争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作用和反作用的“合二而一”。物理运动的吸引和排斥，例如电磁的吸引和排斥，是由于同一电磁波“一分为二”、形成对立的两极的表现。同极互相排斥，异极互相吸引，这个排斥和吸引的统一和斗争，才引起由电磁推动的运动；这个运动决不是由于排斥和吸引的“合二而一”。化学上的化合和分解，在化学运动中是有联系的，但不同原素化合的时候，就是对分解的排斥和斗争，反过来，分解对于化合，也是如此，两者永远是在互相排斥、互相转化的过程之中，怎能算是“合二而一”呢？同化和异化是有生命的蛋白体和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的两个对立方面，这两个对立方面的统一和斗争引起了生命物体的新陈代谢运动和它的生长和衰亡过程，而新陈代谢和生长、衰亡的过程，正是生物体本身的新旧成份不断“一分为二”的过程，怎能把这说成是“合二而一”呢？生物和环境的关系还表现为遗传和适应的一分为二的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曾指出：“进化论证明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则进化到人”（《自然辩证法》，第 174 页）。恩格斯在这里着重说到遗传和适应这两个侧面的“不断斗争”，根本没

有把它们看成是“合二而一”的。就社会生活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同一社会生产过程“一分为二”的表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统一的社会形态“一分为二”的表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又表现为人和人的矛盾和斗争，在一定历史阶段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合二而一”了，也就是说，它们相互间都“完全适合”了，它们不再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再表现为人和人的矛盾了，一切人们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完全一致了，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岂不就要停顿下来了吗？

杨献珍同志等人想用来证明他们的“合二而一”论的例子，全部都是站不住脚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而一切发展过程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斗争，都是“一分为二”的过程，也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日益暴露、发展、激化和解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对立面之间自始至终不断地进行着斗争，使对立面由统一到不能保持统一，由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到相互依存的分解和破裂，最后就转化到相反的方面或转化为较高的形态，这就是矛盾的解决；这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出现新矛盾，新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新的一分为二的过程，新的由对立面的统一到不统一、由相互依存到分解、破裂，并再转到较高形态的过程。一切事物就是这样不断地通过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的前进运动过程。只要我们承认一切事物都是这样辩证地发展着的，那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事物的统一体中的对立面的联系，决不是不可分的，而是必然要分解、分裂的。杨献珍同志只强调对立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抹煞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把对立的统一规

律歪曲成“合二而一”，是毫无根据的。

## 二、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一分为二的，而不是“合二而一”的

再谈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杨献珍同志的基本思想，是由“一分为二”达到“合二而一”。它有两种具体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认识“合二而一”的事物，然后在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等等的时候，一律要遵循“合二而一”的公式。第二种解释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分析与综合两个方面，“一分为二”只是指分析而言，“合二而一”则是指的综合。这些解释都包含在杨献珍同志的讲稿里。

这两种解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因为两者都是把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结为“合二而一”，归结为“只是”“要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起来”；或者是在制定和执行路线政策的时候“结合”起来，或者是在理论研究方面“综合”起来。杨献珍同志所谓的“结合”和“综合”，在这里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杨献珍同志的这些思想，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的。

让我们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的提法引用几段，来作一个比较。

列宁说：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毛泽东同志说：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

又说：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矛盾论》）

“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矛盾论》）

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辩证方法的主要论点，怎能归结为“合二而一”，怎能归结为“只是”“要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起来”呢？这里说的是“要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要把现象看做“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而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更加展开的说法，就是要分析和暴露事物的矛盾，研究矛盾着的对立面如何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研究它们在相互依存中和依存破裂后各用何种方法和对方作斗争，并根据这些研究，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简单地说，辩证法就是通过暴露矛盾来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正是“一分为二”的方法，根本不能归结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

让我们把《毛泽东选集》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例子来研究一下。这篇文章把当时中国相互矛盾着的各个主要阶级——其中包括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

殊性，一一作了分析，然后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9页）这个结论，既是经过分析而达到的综合，又规定了当时革命斗争的总的政策路线。这个综合的内容是什么？它规定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呢？难道可以说是"合二而一"的路线吗？恰恰相反！这条路线是要回答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的"革命的首要问题"，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这条路线，就是分清敌友的路线；这正是"一分为二"的路线，而决不是"合二而一"的路线。这条路线不但在敌我之间"一分为二"，在朋友之间，也把最接近的朋友和动摇不定的朋友"一分为二"。如果在革命的政策路线上不能掌握这个"一分为二"的原则，而是采用"合二而一"的原则，不是分清敌友，而是敌友不分，或者在朋友中只是一味"求同存异"，没有斗争，那就不能"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就会把革命领错了路而使革命失败。当时的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就是个最好的例证。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正是针对陈独秀把敌友"合二而一"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写的。杨献珍同志要把"合二而一"的公式作为党的政策路线的根据，这不就是说要走投降主义的路线吗？

革命的路线，就是解决社会阶级矛盾的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要解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

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要解决阶级矛盾，必须首先暴露阶级矛盾，必须分析矛盾着的各个阶级，分析它们的各自不同的经济地位以及它们对革命的不同的态度。把这个分析的结果加以综合，就要指出在革命斗争中应该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联合什么阶级，反对什么阶级；发展什么势力，消灭什么势力。这就是解决社会阶级矛盾的方法，这就是革命的路线。暴露阶级矛盾是把矛盾着的阶级"一分为二"，解决阶级矛盾的路线，是要分清敌友，指出应该发展什么势力和消灭什么势力，也是"一分为二"，根本不是什么"合二而一"。杨献珍同志授意艾恒武、林青山所写的文章里，摘引了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一段文字。他们企图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这条路线也可以纳入他们的"合二而一"的框框。但他们除了简单的摘引之外，找不出任何一个字来说明这条路线怎样能是"合二而一"的。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办法找到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首先是对国际上的四个基本矛盾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的结果，是针对着现代修正主义者投靠敌人、出卖革命的反动思想和阴谋行为，再一次把全世界革命斗争中的敌友关系正确地指明出来的结果。这正是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认识了和指出了全世界的阶级矛盾及其解决的方法。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最明显、最不容易掩盖的现实生活的辩证法，它和"合二而一"论的对立，是非常清楚、非常尖锐的。因此，在杨献珍同志等人的讲课和文章中，都采用了这样一种狡猾的手法，就是尽量回避直接谈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不能不谈到的时候，也只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或者只谈某些阶级之间的统一战线问题，强调"求同存异"、"共同的要求"，不谈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他们把主要的力量，用在不是直接属于

阶级斗争的、比较容易隐蔽自己的思想原形的问题上去，用在红与专、劳与逸、质与量、工业与农业等等的结合问题上去。结合这个名词，望文生义，比较容易被曲解成“合二而一”；好像其中只有着两个对立面联系起来的问题，而不存在对立面的斗争，相互依存的破裂、分解和一方战胜、克服另一方的问题。杨献珍等同志就是着重抓着“结合”这个名词来制造矛盾调和论的。

如果抛弃咬文嚼字的诡辩，把各种“结合”的问题从实质上加以具体分析，那么，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就完全站不住脚跟。“结合”这个概念，可以有两种相反的理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理解，那就是指用折衷、拼凑的方法，把两个一成不变的东西机械地粘合在一起，杨献珍同志的所谓结合，实质上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解。与此相反，按照辩证法的理解，所谓结合的实质，就是要在运动、发展中去掌握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关系，正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关系；它仍然表现为不断地暴露矛盾、展开斗争、克服矛盾的过程；仍然表现为由对立的统一到统一的分解，经过对立面的斗争，和一方战胜、克服另一方面达到新的对立的统一，这样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总之，仍然是“一分为二”的运动过程。

对立面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联系，不外表现为两种形式：或者是对立面互为存在条件而共处于统一体中，或者是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起初是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统一体中，如在一定质的基础上量的增长。但这个共处不是“合二而一”式的共处，它不是稳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在变化的，不是长久“不可分”的，而是终归要分解的。量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新质因素，就要把量的发展推进到和旧质决裂的地步，就要使量和质“一分为二”，使原来的共处关系发生变化、分解，并引导到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这

个对立面的转化，也就是辩证法的“结合”的一种表现。而且常常是更重要的表现。劳逸结合，就是主要通过工作和休息的互相转化来实现的。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也不是“合二而一”，因为每一次转化，都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环节，相互转化不是走马灯式的循环过程，而是某些新的更高一级的东西不断出现和某些旧的东西不断被克服、战胜、以至消灭的过程。杨献珍等人所谓的“合二而一”式的“结合”是取消了斗争，一劳永逸地把“两个对立的方面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的所谓“结合”；抹煞了新与旧的代谢关系，把对立面的双方都看成是“万古长青”，任何一方都不会有什么东西被战胜、克服或消灭的所谓“结合”，这样的“结合”，其实只是杨献珍同志等人的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的虚构，在辩证地运动着的客观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结合”论，实际上是利用“结合”这个名词的外表形式来玩弄诡辩，是以反对片面性为借口，把辩证法歪曲成折衷主义，为修正主义者掩盖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唯心主义妄想提供一个“理论”的工具。

## 三、不能把“合二而一”说成是辩证法的因素

在这次论战过程中，有些同志搜寻了种种理由，想把“合二而一”说成是辩证法的某种因素。他们的观点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陷入了“合二而一”论的谬误。在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时候，也必须对这些错误观点加以澄清。

有些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辩证法即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侧面。他们以为“一分为二”只表达了对立面的斗争性，“合二而一”则表达了对立面的同一性。他们说事物是“一分为二”，又

是“合二而一”的，“合二而一”是“一分为二”的补充。这些同志是把对立面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机械地、形而上学地割裂了。实际上对立面的同一性只是不断地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着的对立面之间的有条件的同一性。这样的同一性，永远也不会是“合二而一”的。只看事情的表面而不对事情的实质加以分析的人，才会相信对立的相互依存是“合二而一”的。首先，对立面的互相依存，是说统一物自身分裂为互相依存的对立面，而不能说成是两个东西凑起来“构成一个统一体”。共处在一个社会中的对立的阶级是这个社会本身分裂为两个阶级，而不是两个阶级凑成一个社会。这就只能用“一分为二”来表达，而不能说成是“合二而一”。其次，两个对立面共处在统一体中的时候，它们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是一刻也不会停止的。因此，它们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经常不均衡的，其中必有一方面居于主要的、支配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矛盾着的两个对立方面，总有一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次要方面。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不是这个阶级统治，就是那个阶级统治；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既然对立面双方在统一体中有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主要与次要的关系，因而不能简单地叫做“合二而一”。更重要的是，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对立面的不断的斗争，也不是完全稳定的，而只能是相对稳定的，是经常存在着分解、分裂的趋向，并且迟早要走向分裂、分解的。所以，就其发展的趋势来说，同一性也正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的。不但如此，就是同一性的相对稳定，也还要依靠对立面的斗争，才能在一定条件下保持得住。对立面之间既然存在着主要与次要的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处于主要的、支配的地位的矛盾方面，如果不通过斗争，怎能保持它的这个主要的、支配的地位呢？革命的统一

战线必须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不经过斗争，无产阶级怎能保持这个领导权呢？国家是阶级的专政，不通过斗争，统治阶级怎能保证它的政权的稳定呢？“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不是在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千百次地证明了的真理吗？只有对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的斗争，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行为，保卫和平；对帝国主义迁就、妥协，恰恰是帮助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阴谋，鼓励它来破坏和平，这不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实践中被证明了的真理么？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违背这些真理，不是无数次地碰得焦头烂额吗？毛泽东同志说：“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正是从哲学上概括了上述的真理，正是深刻地概括了同一性的“一分为二”的实质。

杨献珍同志讲统一战线，只强调统一战线的“求同存异”、“共同的要求”，不谈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政策、独立组织，不谈通过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杨献珍同志企图掩盖统一战线的这个“一分为二”的内容，把它歪曲成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合二而一”的投降政策。

有些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辩证法的一个环节。他们以为矛盾的暴露、发展、激化是“一分为二”，而矛盾的解决就是“合二而一”，例如说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革命，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就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就是“合二而一”。因此，这些同志又提出了一个公式，说事物是由“一分为二”到“合二而一”，又再到“一分为二”的不断循环交替的过程。这些同志实际上是把事物的辩证运动歪曲成机械的循环论思想，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他

们的论点抹煞了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的实质，即矛盾的解决是事物的积极的方面克服消极的方面，新生的力量战胜腐朽的力量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长期的不调和的斗争的结果，是前者彻底战胜后者的结果。决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合二而一"。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这些同志还企图把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也歪曲成他们的循环论。他们把其中一前一后的两个团结，硬说成是"合二而一"。其实团结本身也就包含着斗争，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某种斗争。只是斗争的具体内容、形式在不同情况下有其不同的特殊性而已。由团结出发进行批评和斗争，正是"一分为二"的过程。在更高基础上的团结，是经过批评和斗争，克服了错误，也是"一分为二"的结果。这个更高的基础，决不是正确和错误"合二而一"的基础，而恰恰是正确与错误"一分为二"之后的基础。在新的团结中又会出现新的不同意见，又会继续"一分为二"，然后又要通过批评和斗争，使正确意见克服错误意见，再进入更高基础上的团结。把这样的过程说成是"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循环，不是很荒谬的吗？

有些同志把事物机械地划分为两类，说一类矛盾是通过对立面的一方战胜、克服和消灭另一方来解决的，而另一类则是通过对立面的"结合"来解决的。他们硬说只有前一类矛盾才具有"一分为二"的性质，而后一类矛盾则是"合二而一"的。这种思想的错误，在前面我们批判杨献珍同志对于党的"结合"政策的曲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批判到了，用不着再来重复。

我们已经对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基本思想，做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又指出了那些想用各种理由把“合二而一”曲解成辩证法的一个侧面、一个环节或一部分的观点的错误。根据这些分析批判，可以做出结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思想，不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和辩证法根本相反的东西。它是系统的调和矛盾和取消斗争的哲学。许多同志说，杨献珍同志的思想，和苏联德波林的思想实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不错。德波林的特点，也是在于宣扬矛盾调和论，推崇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是德波林主义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杨献珍同志的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实际上比德波林主义还更为露骨、更为系统，它的反动性也超过了德波林主义！

（原载《人民日报》1965年5月20日）

# 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

(1965.8)

我对自然科学没有专门研究，但很愿意向自然科学界的同志们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必须密切结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也要重视自然科学的成就。自然科学家们把自己的专业方面的新发现、新理论介绍出来，可以帮助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和群众增长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对研究哲学的同志也有很多益处，使他们有可能依据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来加深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解。

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的文章，从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粒子”理论方面，阐发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很有价值的思想。

唯物辩证法不但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也是探索自然界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自然科学的每一次新的发现和新的进展，都使唯物辩证法获得新的证明或发展。形而上学思维总是力图把科学上的现有成就解释成最后的东西，而科学上的每一新的进步都使这种企图宣告破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的可分性是无限的，宇宙的发展和人的认识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由原子理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真理，粉碎了与此相反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

坂田等理论物理学家的成就向我们证明，自然科学家们如果能够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将有可能加快他们工作的进展。日本的理论物理学家研究基本粒子的历史本来是比较短的，但他们在某些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成就。坂田等几位科学家能够把唯物辩证法用到自己的工作中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事实，有说服力地驳倒了那种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科学研究的观点。

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但是，正确的思想指导，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曾经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到了现代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的腐朽，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表现出畸形化的状态。资本主义的国家的自然科学的这种发展过程，还常常受到主观方面的思想条件的障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界，也像在其他领域一样，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总是居于统治的地位。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广泛地影响着自然科学的研究，特别是理论自然科学的研究。主张哲学无用论的人们，不承认自然科学家的思维活动不可避免地总要受到一定哲学世界观的影响，或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实际上，不受任何一种世界观的影响的人是没有的。主张哲学无用论的人，他们自己的观点，往往就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是同“实证论”的观点密切联系着的。“实证论”的观点实质上是披着“科学”外衣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的哲学观点，它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严重的思想障碍。

像坂田昌一这样的自然科学家，能够打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传统的束缚，和流行欧美的“实证论”断然决裂，和资产阶级哲

学断然决裂，自觉地拿起唯物辩证法这个真正科学的武器，这是十分可贵的。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比资本主义社会远为优越的社会条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其他各方面的事业的发展一样，都应该出现资本主义社会所不能比拟的巨大的跃进速度。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提出多快好省的要求，是有充分的根据的。中国十几年来的历史证明，一个原来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一旦有了无产阶级专政，认真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就会以惊人的步伐迅速走向先进的地位，就会给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极为广阔的天地。

但是，有了优越的社会条件，还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技术工作才能更加顺利地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科学工作者如果不能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也完全有可能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各种反辩证法思潮的影响，从而阻碍科学工作的进步。

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断地号召各方面的工作干部，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要把哲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广大革命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这个号召在国内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深入人心。近几年来，我国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在各个科学领域包括一些尖端的科学领域中，取得了很多成就。这些成就，都是同他们日益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分不开的。尤其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技术人员和普通工农群众，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启发了自己的智慧，能够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各种矛盾，突破生产技术方面的许多旧框框，不断

地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自力更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也就变成越来越强大的改造世界的力量。毫无疑问，只要循着这个方向前进，不要很长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攀登上科学的高峰，把我国科学技术提高到现代化的先进水平。

（原载《红旗》1965 年第 9 期；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 同日本哲学家船山信一的谈话*

(1965.11)

船山先生到中国来讲学，我们很欢迎。中日两国哲学家互相交流，对促进哲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船山先生在讲学中提出了一些问题，我讲一点个人的意见。

## 一、关于矛盾、差异、对立的关系问题

矛盾是最根本的范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毛主席讲矛盾是普遍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是一切事物最本质的东西。毛主席同列宁是一致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的第一句话就讲：一分为二以及对其矛盾的各个方面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列宁不止一次地讲辩证法就是研究矛盾的学说，他把对立统一学说称作辩证法的核心，认为矛盾、对立统一是辩证法中最本质的东西。所以矛盾规律是贯彻于一切事物之中的，任何事物自始至终都是贯穿着矛盾。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根本的观点就是承认矛盾是普遍的。从此出发，来解释矛盾之外，还有差异、对立等范畴问题。简单地

* 1965年11月6日，艾思奇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同日本哲学家船山信一的座谈会。艾思奇根据船山信一在北京讲学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回答。这个谈话是根据哲学所金顺福等同志的记录稿整理的。

讲，同一、对立、差异等都是以矛盾为基础的，乃是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因为，事物的矛盾不是任何时候都采取一种形式的。矛盾暴露的情况不同，程度不同，就有不同的形式。矛盾在开始时不是那么明显地暴露出来的，开始时甚至看不出有什么矛盾，好像是同一，没有什么矛盾似的。

资本主义开始时，它在反对封建制度时，其内部矛盾还没有暴露出来，好像看不出矛盾。以后可以看出其阶级有差异，实际上是有矛盾的，它们的差异表现在反封建的目标上有差异。资产阶级胜利以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发展了，没有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了，矛盾成为对立。欧洲在19世纪就是这样。两个阶级的对立暴露以后，矛盾就充分表现出来了，这时便产生了马克思主义。

同一、差异、对立、矛盾，是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黑格尔的公式给予这样的解释，就有实际意义。矛盾充分暴露了，人们认识到了以后，就可以找到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根据。同一、差异、对立、矛盾的排列，与矛盾发展及人们认识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表现出矛盾的发展过程。

差异与矛盾是两个形式，但矛盾是根本，差异是矛盾的表现。可以说，差异就是矛盾。差异是否是矛盾是有争论的。苏联就有人认为差异不是矛盾。这是错误的。他们想要掩盖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们甚至讲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矛盾。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16年的经验可以肯定，三个差异就是矛盾。当然不是对抗，但是是矛盾，有时还是尖锐的矛盾。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消灭这几对差异，是要经过斗争的，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正在采取许多办法，包括发展经济、发展教育等等，来克服这些矛盾，消灭这些差异。苏联不承认差

异是矛盾，不去消灭，差异就越来越大，已表现为对立了。苏共二十大宣传建设共产主义，实际上还远得很，这样下去，永远到不了共产主义。只要看看他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差别就可以看出。体力劳动者每月工资挣 20—30 卢布，和高工资相比相差几百倍。脑力劳动者加上额外的收入，差别就更大。这两种差别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这是已经形成了对立，已不是差别了。消灭三大差别，就是消灭三大矛盾，只有经过矛盾斗争才能加以消灭。

对立和矛盾本来就分不开。矛盾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对立，也就没有矛盾。对立表现在矛盾发展阶段的差异上，在本质上还是对立。农民中有中农，看起来是一个阶层，似乎只有同一，没有对立，没有矛盾。仔细分析一下，当一个中农有较富或较贫的差别，就可以叫做上中农或下中农。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上就是这么分析的。这种差异也不仅仅是差异，形式上是富裕程度的差异，实际上就包含着矛盾，这表现在下中农较积极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农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下中农积极地跟党走，上中农就须经过大量的工作。同是一个中农，因有富裕之差别，就包含产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因为他们基本的倾向是对立的，这种斗争不是敌对斗争，但还是斗争。苏联科学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企图掩盖矛盾。

矛盾、对立、差异是密切相联系的，是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这是根据我们实际生活概括出来的。

## 二、关于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首先，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客观辩证法是自然

社会的辩证过程，是具体事物的辩证过程。主观辩证法是以逻辑形式反映自然、社会的辩证法。如说：资本主义发展是客观辩证法，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即是主观辩证法。没有客观辩证法就没有主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需在客观辩证法发展到成熟程度时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客观辩证法存在于19世纪前，而《资本论》在19世纪50年代后才逐渐完成。二者是一致的，但也有区别。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第四章中就讲到这两个系列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管哪一个都是表示矛盾发生、发展和克服的过程。但是，形式上却有区别。可从各方面看，主要是客观辩证法复杂，它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主观辩证法反映了客观辩证法的根本的东西，比较纯粹地反映了客观辩证法的规律，抽掉了其偶然因素，概括了必然过程。

## 三、关于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问题

我想讲讲中国的情况。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实用主义的影响大，存在主义的影响几乎没有，所以对前者批判多，对后者批判较少。40年前，实用主义来到中国，它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作用，但那时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实用主义一面反对封建主义，另一面又反对马克思主义。从40年前起，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就开始批判实用主义，这种批判一直不断。解放以后，还展开一次很大的批判，1954—1955年做了一次全面的批判。我们认为，实用主义使用了一些科学的唯物论的概念，但所谓唯物论科学是假的，实际是主观唯心主义，主要是它不承认认识反映客观规律。

存在主义，我们没有什么研究，据我们了解，人的问题，马克思已批判了费尔巴哈的观点，有自己的见解，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解决了人的问题，也许不够，还要研究。

## 四、关于认识的辩证法问题

关于认识辩证法再说几句话。认识的辩证法讲人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如《实践论》中讲的。毛主席发展了列宁讲的认识规律，作了系统的发挥。主要讲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这个规律，可以全面地概括人的认识过程。日本哲学家的文章，我们看过，他们认为讲感性到理性不够，应该按德国古典哲学那样的提法：感性理智或悟性到理性。我们认为理性认识包括了理性和悟性的东西，理性有不同发展程度，有片面和全面之分。悟性是片面的理性认识，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在理性认识中克服了片面性，由感性到理性之初，往往有些片面性，正确的认识是经过反复实践，克服了片面性，掌握客观辩证法。毛主席经常强调克服片面性，克服悟性的缺点。

最后，我们说，通过这次座谈，对船山先生的意见比较了解了。船山不赞成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问题是如何克服它们，更好地战胜唯心主义。作为专业研究人员来看，我们大家都拥护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正在发展，不是到了顶点。毛泽东思想也在不断发展。船山先生的意见是我们还要在经典著作方面进行研究。我们希望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共同研究，反对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可能彼此有缺点，但经过研究之后可以改正，这是个很好的开始。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几个时期

## （讲学提纲）*

（1965 春、秋）

世界上自从产生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历了列宁所说的两个五十年，并进入了我们当代的新时期。在每一个时期，世界无产阶级都面临着一些特定的重大历史实践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理论、策略、组织等等方面正确地解决了各个时期的这些问题，并且和当时的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这样就使无产阶级得以胜利地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任务，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

---

* 这份“讲学提纲”，原是 1965 年春，为了准备出国讲学而写的，又于是年秋，作了最后修改。后因故没有出国，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过，只是作为学习材料，在中央党校内部印发学工人员参考。1977 年 9 月，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同志曾提供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发表四十周年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印发给到会同志参考。这份“讲学提纲”，共有四个题目，除本题外，还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斗争”。除最后一题和当前精神不符未收入外，其他三题独立成篇，作过一些整理。本篇原无小标题，是整理时加的。原有“提纲初稿”字样，改为“讲学提纲”。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三个五十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个五十年（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历史阶段。这时资本主义处在自由竞争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中，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积极成果，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五十年左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逐步战胜了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杜林等所代表的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机会主义派别，使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工人运动中被公认的指导思想，为下一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完成了理论、策略和组织等等方面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五十年（19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实现胜利的时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开始打碎帝国主义锁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取得了几次重大的历史性的胜利：首先是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实现了苏联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随后又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与世界各国反法西斯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粉碎了德意日的法西斯的进攻，推动一系列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是这个时期世界人民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这个时期人类历史的这些伟大发展，都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分不开。首先是列宁，他应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和解决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面临的新的革命实践问题，特别是在理论上和策略上解决了如何在帝国主义时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何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高举列宁的旗帜，并且继续发展列宁的思想，来指导自己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经过了二十几年的革命战争，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走向彻底胜利，并使之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在不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由于马克思主义已被公认为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时机会主义已不再采取和马克思主义公开对立、自成一派的形式出现，而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来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下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这就是修正主义。

这个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之间进行了两次大的论战。第一次是列宁和德国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俄国的孟什维克的论战，通过这次论战，列宁揭露了和粉碎了这些修正主义者的背叛阴谋，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次大论战是在列宁去世后，以坚持列宁路线的斯大林为一方，以布哈林、托洛茨基为另一方的论战。这次论战首先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它的党内展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论战中的胜利，保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保证了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向前

发展。这次论战也发展成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各国共产党在这次论战中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在本国党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后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就是这次大论战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论战中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革命路线，保证中国到后来终于取得了全国的革命胜利。

本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了我们的当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以及其他各国革命人民对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时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相应地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们的时代，是东风日益压倒西风的时代，是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力量日益压倒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力量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向胜利、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向灭亡的时代。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相应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因为它面临着这些新的重大革命历史实践问题。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理论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前阶段的任务和特征。

机会主义也在当代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在曾经是以列宁的思想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于1948年就露头了，但它的最大代表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利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列宁党的威信，从1956年开始把一整套的

机会主义路线强加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来，由此挑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又一次新的大论战。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目的，是要取消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各国反动统治者的革命斗争，取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路线，这条路线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把它偷偷地改变成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权和资产阶级政党，以便于帮助资本主义的复辟。总之，现代修正主义是要从理论、策略和组织等等方面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为日渐灭亡的帝国主义效劳，为病入膏肓的各国反动派输血。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每一步胜利都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新的发展。代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的伟大旗帜，就是毛泽东思想。

##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阶段的特点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相应地由一个阶段推进到更新的阶段。

从思想的形式方面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产生，是由于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在进步时期所做出的哲学的成果，即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又是由于不断地和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斗争的结果。但从事情的内容和实质来看，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产生和

发展，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哲学总结；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间无产阶级这个新的先进力量的兴起，为着正确理解这个新的阶级的历史作用，他们批判了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把唯物主义扩大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上来。当时自然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进化论、能量转化法则、生物蛋白体的发现——开始突破了18世纪以前自然科学界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坚固的自然科学的根据。

在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五十年间，他们先后又批判了蒲鲁东、拉萨尔的浅薄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批判了杜林的图式主义（也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末流），还批判了资产阶级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曾经流行一时，而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界的时髦。这种情形，也在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者中表现出来。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战斗的哲学著作中，就要比较着重从辩证法方面来发展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且不止一次地强调了黑格尔哲学在辩证法方面的贡献。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45页）。这些话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一个五十年间的一个主要特点。

列宁在和修正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也批判了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哲学上的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在无产阶级及其政

党队伍中的反映。列宁说："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7 卷，第 13 页）这就是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列宁当时的情况。

这时的资产阶级哲学界，和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当年有所不同：唯物主义完全被抛弃了，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变成了主流。这些哲学流派给自己粉饰了各种"科学"的招牌，如"实证论"、"新实证论"、"新实在论"之类，但究其实质来说，只是 18 世纪贝克莱、休谟和康德的哲学思想的再版。在恩格斯的晚年，资产阶级哲学界的这个反动倾向已开始显露出来。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里曾对这种从唯物论倒退的倾向提出过严肃的批评。特别是在 20 世纪初，由于镭、X 射线和电子的发现，自然科学界根深蒂固的旧形而上学物质观宣告破产了，当时自然科学家曾认为这是"物理学的危机"；科学界的思想出现了混乱状态。这就给各种各样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提供了便利的气候，使它们在资产阶级教授中间大大地泛滥起来。修正主义者在哲学方面，就是完全跟在这些资产阶级教授的屁股后面跑的。

列宁在哲学上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不能不着重针对这种新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以后发展到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由于这一年的革命遭到失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动摇，他们不但不能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正确地消化革命的经验，反而开始背叛这个世界观，反而和资产阶级教授站到一起来批评、"修正"和攻击辩证唯物主义。他们标榜的"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实际上就是当时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列宁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这些哲学上的修正主义以及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哲学进行了坚决的、全面的、彻底的反击。

这些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的背叛行为，主要是在于想毁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因此，这一次列宁在哲学上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得用主要的力量从唯物主义方面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自始至终，从哲学的各种角度上、也从自然科学新发现方面反复不断地阐明了唯物主义的一些最根本的原理，即物质是根源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维是存在的反映，等等。列宁的这部著作，主要地就是坚持了和发挥了这些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与此相反，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特别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列宁当时在哲学上反对修正主义的主要贡献和主要特点。

应该指出，说列宁在当时用主要力量从唯物主义方面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决不是说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外一个方面，即辩证法方面就完全没有注意。

修正主义者不但企图毁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而且攻击了它的革命的辩证法，想用调和矛盾的庸俗进化论来代替它。修正主义者的政治言论充满了折中主义和诡辩论。一方面，为着彻底驳斥修正主义者的这些谬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着正确理解物理学的新发现，给习惯于形而上学物质观的自然科学界遭受到的"危机"指出一条解脱困境的道路，都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但是，列宁写《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由于战斗的任务要求集中主要力量歼灭主观

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方面，就没有特别加以阐明。只是在几年之后，才在他的《哲学笔记》里着重研究了这一方面的问题。

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方面，包括两个问题，即认识论的辩证法问题和辩证法的根本规律问题。列宁在1914年到1916年写的《哲学笔记》里，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了新的贡献。认识论的辩证法问题，主要地就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哲学笔记》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公式："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42页）。在辩证法的根本规律问题上，列宁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的实质，并且强调对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列宁的这些思想，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新发展的重要标志。

列宁在哲学上的这些贡献，受到了修正主义者抹煞和攻击，这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不起来和他们斗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第二次大论战中，还包含着哲学方面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德波林学派，就是当时在苏联出现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这个学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外衣下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否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宣扬"对立物的和解"，即矛盾调和论的观点。斯大林领导了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斗争，并正确地指出了这个学派的错误实质，把它叫做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

对德波林学派的揭露和批判，促使苏联以及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大大地注意到对列宁的哲学遗产的研究，注意到列

宁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如何正确地阐明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特别是列宁对于辩证法方面的新贡献，在这次新的大论战的条件下，有必要进一步地加以研究和发展。这首先是因为，这一次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修正，和1905年后经验批判主义者的修正有所不同，他们不是直接从唯物主义方面来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公开地站在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立场上来攻击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而是主要地从辩证法方面来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通过歪曲和反对辩证法的途径走上唯心主义的路线。德波林学派的唯心主义就是采取了这种迂回的、隐蔽的形式。它的特点，主要就在于取消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法，破坏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歪曲成掩盖阶级矛盾、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烦琐的空论。尽管它在口头上也承认物质的根源性和反映论的原理，但实际上却走的是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践的唯心主义道路。要彻底揭露德波林学派的唯心主义，需要更着重坚持和发挥列宁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宝贵思想。这就是说，在新的论战的条件下，又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哲学上特别强调**辩证**的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特别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但这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而是在新的历史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任务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第二次大论战在中国的展开，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个时期的特点。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又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之间的斗争。毛

泽东同志在政治上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对党内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多次地提出尖锐的批判。党内的这些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者，并不是在学术理论的形式上表现为一个唯心主义的派别，并不是在口头上言论上公开反对物质的根源性和认识是存在的反映这些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他们之所以成为主观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仅就哲学世界观方面来说，主要是由于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没有能力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不会应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复杂的阶级矛盾。这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曾成为特别严重的思想障碍，它使党员和干部不能清醒地认识周围事物的实际情况，不能正确地掌握革命的路线政策，从而导致革命多次的失败和挫折。艰苦、曲折、复杂的中国革命斗争，要求我们的党认真地、彻底地克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错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路线详细地指明出来，让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会在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掌握这个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特别是列宁的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来对中国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大量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加以全面的总结。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回答了中国革命提出来的这个历史要求。这两篇著作，是第二次大论战、特别是哲学方面反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在中国取得的伟大成果。它从哲学上概括了十几年的中国革命战争所取得的实践和认识的丰富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新贡献。它系统地阐明了认识的辩证法规律，特别是认识和实践的相

互关系的辩证规律；它按照列宁的遗志，把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从各方面系统地加以解释和发挥。这两篇著作为彻底粉碎革命斗争中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错误奠定了颠扑不破的理论基础，为以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照亮了思想上的前进道路。

##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

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进行的大论战中，也包含着哲学世界观方面的论战。和在政治上一样，在哲学上，现代修正主义者基本上是继承了老修正主义者的衣钵：用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来篡改唯物主义，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的辩证法。不过，在当代，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力量有新的巨大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很多新发现，特别是微观物理学的研究的发展，又进一步揭示了物质结构的极其复杂的内容，对于辩证法的世界观又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包括哲学世界观方面的斗争，不论从它的实践内容或理论内容来说，也相应地有了新的发展。这个斗争将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特别是列宁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个时期还只是开始不久，它将要取得多么宏伟的成果，还难于作全面的估计，只能就当前已经知道的情况说明它的某些特点。

如果说列宁生前时代的老修正主义者在哲学上主要是跟着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屁股后面跑，那么，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者们则主要地是在实际政治活动和政治言论中破坏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他们热衷于拾取资产阶级政客的牙慧，把美国资本家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

奉为自己的思想的指南。他们强调眼前的物质利益，抹煞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大量使用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两面三刀等等的作伪手法来玩弄诡辩术。他们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同时又妄图掩盖和抹煞当前世界上存在着的对抗性矛盾，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各个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他们到处散布这些谬论，幻想以此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阻止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继续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便帮助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阻止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以便帮助帝国主义维持它的摇摇欲坠的世界统治。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的这些背叛和歪曲，要求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给予坚决的揭露和批判，通过这个揭露和批判，把当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积累起来的新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总结起来，把现代自然科学上的许多新发现、新成果概括起来，进一步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世界观。由于现代修正主义主要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并且，有些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又跟到了资产阶级教授的屁股后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攻击，反对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概括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因此，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法，还需要就对立统一学说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加以新的阐明，也就是要进一步强调辩证唯物主义，进一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次大论战中都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在反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有些国家的自然科学家开始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来概括现代新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不小的成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具有着划时代的决定意义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

正当赫鲁晓夫集团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抛出他们的一套现代修正主义纲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随后不久，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来和现代修正主义相对抗。这些报告又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除个别地区外）开始建立起来的条件下作成的。它总结了中国全国解放后七八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综合了世界上自有无产阶级专政以来四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它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充满着矛盾的社会，十大关系就是十类矛盾。它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复辟的企图，仍然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这些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贯彻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学说，贯彻和发展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抹煞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矛盾，掩盖资本主义复辟的活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毛泽

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这些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理论上提供了戳穿现代修正主义骗术的锐利无比的新武器。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把列宁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加以发展，他概括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现实，也概括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新发现，提出“一分为二”是个普遍现象，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毛泽东同志强调在当前需要对这个辩证法观点作广泛的宣传，要使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在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根据毛泽东同志和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把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规定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项迫切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决贯彻了这个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敌友关系问题，观察和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各方面的实际工作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要想胜利地实现这样的过程，首先需要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广大干部能够正确地认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规律。问题是在于怎样才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以往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如果不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尽管口头上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大讲辩证唯物主义，而在实际工作和行动中仍然可能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仍然不可能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事业做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把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大量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从哲学上加以总结，进一步具体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特别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正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最根本的原理、即认识依赖于实践的原理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肯定和发展，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干部要获得正确认识，首先必须亲自参加三大革命的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也如在自然科学的问题上一样，每一个正确认识的完成，往往必须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这些认识论的原理，坚持应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即“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我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面临的一切问题，这是使我们的广大干部在社会主义事业中避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保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进行到底的保证。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过去哲学家们的思想根本不同。以往的哲学家们总是妄想建立一个“说明世界”的最后完成的体系，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则是要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各有不同的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随着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历史斗争任务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改变世界的作用，是要通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行动才能实现的。毛泽东同志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

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历史，始终证明了这个真理。当代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任务，比以前的阶段更为宏伟。这要求在比以前更深、更广的程度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来武装群众。毛泽东同志号召哲学从书斋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这在当代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群众中散布各种谎言，使用各种骗术，妄图阻碍群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无产阶级要胜利实现自己在当代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阴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交到广大群众的手里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交到广大群众的手里去！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 ——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 （讲学提纲）*

## （1965 春、秋）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革命斗争中，经常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的斗争。就哲学的认识论方面来看，这个斗争，又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直在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下来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在认识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工作，把革命引向胜利。所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要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实际行动中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个原理做了系统的阐明。现在我们准备就这个认识论的主要原理做一些解释。

###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

我们在哲学上研究认识论，目的是在于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什

---

* 见《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几个时期（讲学提纲）》题注。我们整理时删去了两段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例子。

么是正确的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个问题，唯物主义者的回答和唯心主义者根本不同。一切唯物主义都肯定，人的主观认识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反映；正确的思想，就是指人的主观意识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唯心主义者的答复和这相反。唯心主义者不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不承认正确的认识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正确反映。他们把人的认识看做是人的精神内部（或者是个人的精神内部，或者是哲学家臆想的什么“宇宙精神”内部）自生出来的东西。他们心目中的人的正确思想，不外只有两个来源：或者是从天上（即从所谓“宇宙精神”或上帝那里）掉下来的，或者是个人的头脑里生来固有的。在我们的工作和斗争中，就往往可以碰到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把国外的某些地方看成是自己的“天堂”，专门等待那里的“上帝”降下来某种“天书”，把它拿到自己办公室里来简单地照抄，而自己对周围的事情则根本不做任何调查研究，以为这样就找到了指导工作的正确思想。这种人就是把正确的思想看做天上掉下来的。有些人带着主观上的“想当然”来从事工作，以为只要根据周围事情的一些表面印象，凭自己的头脑随便想一想，就可以找到正确思想。这种人就是把正确的思想看做自己头脑里生就的。这两种人都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爱好者，是主观主义认识路线的拥护者。唯物主义者在认识论上坚决反对这些唯心主义观点，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荒谬的，甚至是反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引向这条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上去。不反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就会使我们的革命工作和革命战争迟早遭受挫折和失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跟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共同点，又

有根本的区别。一切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都反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都承认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根源性的东西，人的主观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而正确思想则是客观事物规律性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仅仅承认这一点，最多只能回答认识论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正确思想的问题，而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一切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的一个重大弱点，正是在于他们都不能解决人们怎样才能掌握到正确思想的问题，不知道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怎样才能反映到我们头脑里来。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唯物主义都不了解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人们认识的基础，不知道人们只有通过改造世界的实际斗争，才能一步一步地对客观事物获得正确的全面的认识。这些唯物主义都不能理解人类的能动的革命的活动在认识论上的重大意义，他们把人类看成是世界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旁观者，以为人的头脑似乎就像一面静止不动的镜子一样，不必通过实践活动就可以深入反映客观事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叫做直观的反映论。与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则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它的基本特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就在于肯定“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列宁：《哲学笔记》），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离开了实践观点来讲反映论，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就再三地强调人的认识依赖于社会实践这个真理，他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

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是在于，他不仅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作了十分明确的肯定，并且又对实践概念的内容做了进一步具体的分析和阐明：他指出人类认识所依赖的实践，主要地就是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由此做出结论，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分析和论断，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来概括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量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结果，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认识路线之间的长期历史斗争的总结。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曾经出现过的主观主义者的领导错误，是一个彻底打中要害的揭露和批判。因为所有主观主义者的领导错误，不论是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的认识路线的共同的特点之一，就是轻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就是使自己的认识脱离群众，脱离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一切革命工作的领导者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起进行革命斗争，认真向他们学习，必须学会善于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才有可能在革命工作和革命战争中避免犯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这个原则，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技术人员，对于文艺工作者和其他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也是同样适用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我们建设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这个实践观点，当做我们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指针，号召广大干部普遍地积极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实践经验证明，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条

原则，是使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免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是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并稳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确实保证。

## 二、认识过程的两大飞跃

人们的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那么，在实践中人们的认识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认识发展的过程和这个过程的规律性。其中最基本的规律是：任何正确思想的形成，在认识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过两个飞跃阶段，即从实践到认识或由物质到精神、存在到思维的飞跃，然后又由认识到实践或精神到物质、思维到存在的飞跃。

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首先是要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即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等官能，直接从外界的客观事物获得许多感觉，在脑子里生起许多印象，并形成这些印象间的各种外部联系。这些就叫做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只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它只能使我们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而不能帮助我们抓着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例如，在我们最初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特别是在革命处在困难时期的时候，我们的感性认识给我们的印象，通常只能看到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而不可能直接把握到敌人必然灭亡、革命力量必然要得到胜利这个事情的本质和规律性（即事物的内部联系）。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要能深刻地了解到敌人虽然表面强大而实际却很虚弱，就必须使我们的感性认识飞跃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

由实践到认识的飞跃，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实际上也就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人的感性认识怎样才能飞跃到理性认识？这需要通过两个步骤：第一，要积累十分丰富的感觉材料；第二，要对这些感性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

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是在事物的现象发展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的。要揭示这个本质和规律性，需要掌握大量的感觉材料。片面的感觉经验只能为我们提供事物的某些表面现象的知识，甚至于只能提供和本质不一致的假象；只根据零碎不全的材料，就不可能保证对事物做出正确的论断，甚至只能做出错误的论断。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的诡辩，常常就是利用和夸大一些片面的现象和假象，来作为自己的荒谬臆说的根据。为了避免认识的片面性和错误,革命的领导者必须亲身参加群众的实践斗争，认真作调查研究，认真向群众学习，努力去集中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十分丰富的（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的感觉材料，才能避免单凭个人的或少数人的狭隘的感觉经验，来对问题做出片面的、错误的论断。

有了十分丰富的和合于实际的感觉材料，并不就等于已经飞跃到理性认识，正像工厂生产有了原料并不等于已经有了产品一样。要实现这个飞跃，就要像工厂生产一样对感觉材料进行加工制造，使之发生一个由量到质的变化。我们头脑的思考能力，就是对感性认识的加工厂。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里所说的"改造制作工夫"，就是说的要

采用辩证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将感觉材料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方面加以分析和综合。这就是首先要把重要的（精的）材料和不重要的（粗的）材料一分为二，把能反映事物本质的真实材料和不能反映事物本质的虚假的材料（即假象）一分为二，然后着重根据重要的和真实的材料，来研究事物的矛盾的各方面（即此一面和彼一面、表面和里面）之间的关系。例如，就社会生活来说，就要研究这一个阶级和那一个阶级的关系，各种政治思想的表现和它们的经济实质之间的关系，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革命斗争中的困难条件和顺利条件的关系，反动势力的强大的外表和它的虚弱的实质的关系等等。只有应用这个“一分为二”的方法，把大量的感觉材料概括起来，在思想上进行这样的改造制作工夫，由此造出比较正确的概念、判断和推理，才能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由实践到认识、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由存在到思想飞跃的阶段。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要求我们在实现了由实践到认识、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之后，还要反过来把我们所获得的理性认识再变为实践，也就是把精神再变为物质，把思维再变为存在。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把前一阶段所获得的认识放到实践中去，看这些认识（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毛泽东同志说：“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

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同志强调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比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意义更加伟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指出：离开实践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的问题，乃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就是说，要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是真理，唯一的标准就是实践。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在实践中始终不能获得成功，始终不能按照预期的想法把精神变成物质、思维变成存在，那就证明指导他行动的思想是错误的思想。一个人尽管会背诵经典著作，熟悉某些科学原理原则，如果他不能把这些原理原则运用到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取得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胜利，那就不能说，他已经真正掌握了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和正确的科学原理原则。只有经过群众实践能变为物质的思想，或者是经过某些暂时的失败终于获得成功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才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规律性的真理。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帝国主义的这个逻辑，就在实践中证明了它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真理。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人民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人民的这个逻辑，就是在实践中证明革命的人民能认识社会历史的客观真理。

认识的第二个飞跃的意义之所以伟大，还在于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是仅只为了说明世界而认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识世界，只是为了要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人类的历史是由必然王国不断地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所谓自由的王国，就是能够按照预期的计划和目的，胜利地实现改造世界的活动的意思。"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斯宾诺沙和黑格尔曾经说过的哲学上的名言。这句名言反映了辩证法的客观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如果把这句话作如此理解：似乎仅仅只要认识了必然，就等于已经得到了自由，那就是片面的、错误的。认识必然，是在认识上准备了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条件，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这个飞跃。要实现这个飞跃，还必须把已获得的必然的认识，变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只有成功地实现了这个实践活动，只有按照预期的想法把精神变为物质、思维变为存在，才能算是真正实现了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如果有了正确的思想，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再好的思想也会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认识必然，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必然转化为自由。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规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认识的第二个飞跃，由认识到实践、精神到物质、思维到存在的飞跃，具有着比以前任何历史时代更为伟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和以前的阶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可能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自发地产生出来，

而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广大工人农民群众自觉地建设起来。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还必须不断地和剥削阶级的抵抗进行斗争，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斗争。如果不去经常努力加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不去经常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改造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不可能防止资本主义自发的发展，就不可能顺利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现在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反过来，也可以说，广大工农群众在思想上有了社会主义，就会在客观上、物质上得到社会主义。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思想第一"、"政治挂帅"的原则。反对"思想第一"、"政治挂帅"的原则，叫嚷什么"物质刺激"的"原则"，这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用来破坏社会主义和帮助资本主义复辟的自发论观点。我们要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这个反动观点，从而也就要强调精神变物质、思维变存在这个飞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特别伟大的意义。

这里，主要的关键是在于：要把认识变为实践、精神变为物质、思维变为存在，首先需要使正确的思想变成广大群众的思想，也就是要使之成为群众手中所掌握的精神武器。毛泽东同志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就会化为革命斗争的行动。革命的领导者不但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把实践经验变为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指导思想再拿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使之变成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集中了工农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的大量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路

线、方针、政策，再把它交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手里，发动他们坚持下去，这样就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以后几年中间克服了许多困难，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这些都表现出认识变实践、精神变物质、思维变存在这个飞跃的极其伟大的意义。

## 三、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研究了认识过程的两大飞跃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来研究认识发展的总的规律性，认识了这个总的规律，就有可能在工作中把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形而上学唯物论者以为，人们可以不必通过实践，只要偶然找到某种巧妙的方法，一下子就能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的，因而是错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即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维，再由精神到物质、由思维到存在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是一条认识规律。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全部科学的发展史，各个历史时代的革命斗争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都证明这条认识规律的正确性。

不了解上述认识的辩证规律的人，虽然在正确路线、政策指导下面进行工作，但在具体工作中，一旦遇到缺点和困难时，就不知道从这些缺点和困难中积极地总结经验教训，来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我们对于这个正确路线政策的认识，而是相反地，把这种暂时的局部的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误认为是我们的全部认识的根本错误，因而对本来是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也发生怀疑。这实质上就是一种以片面代替全面的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观点。几年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克服困难和缺点的经验，

对于那些有着形而上学观点的人，给予了很好的教育。这些经验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认识规律，即在一个问题的认识上，要获得正确的思想，往往需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一步步得到完全实现。

关于认识发展的规律，列宁曾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有过简单的论述，他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81 页）列宁这个初步提示出来的基本思想，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两篇著作中关于两个飞跃的理论里得到进一步的全面的系统的发展，并且提出了一条关于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这条总规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条认识发展的总规律，一方面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另方面是概括了人类历史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所获得的十分丰富的认识经验，特别是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和认识经验。中国革命经历了非常曲折、复杂、艰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认识经验包括着互相矛盾的内容：一方面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正面经验；这就是按照上述认识的总规律，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反复集中人民群众斗争中所取得新的经验来补充、改正和发展原有的指导思想，使我们指导革命的理论、政策、方针、计划等等不断地一级比一级更高地向前发展。另方面又有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所走过的主观主义认识路线的反面经验；这就是不顾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只凭着"天上"降下来的或自己头脑

中随意想出来的意见来向革命发号施令。中国革命的实践（也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始终证明了，在革命指导思想遵循了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时候，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就得到胜利和发展；当革命指导思想陷进了主观主义认识路线去的时候，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就遭到挫折和失败。把这些大量的正反面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就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必须坚决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规律，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认识路线，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使我们的认识向前发展，就必须坚决跟违背这条认识发展总规律的主观主义认识路线作斗争。

主观主义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脱离和轻视革命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生搬硬套地搬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国外的经验，或者简单地跟着国外某些人鹦鹉学舌，这是教条主义的形式；另一种是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把狭隘的经验当做普遍的真理，"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实践论》），这是经验主义的形式。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中国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在认识路线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并且成为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当时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进行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尖锐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不但取得了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丰富经验，也掌握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丰富经验。

要反对主观主义，就必须遵循认识发展的总规律，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路线来观察和解决工作和斗争中的问题。这里还要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密切联系。要正确地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路线，就必须同时在工

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两个飞跃过程，也就是领导思想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革命的实践来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人类就是这样在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在不断地从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维，又从精神到物质、由思维到存在的过程中，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掌握客观真理，一级比一级更高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

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让我们学会自觉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在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向着有史以来空前广阔的自由王国飞跃前进吧！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

## （讲学提纲）*

## （1965春、秋）

列宁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指出了什么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矛盾规律，或对立统一规律。列宁说："一分为二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也可以译作"一分为二"。）又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应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复杂经验，肯定了列宁的这个宝贵思想，并且按照列宁的遗志，把辩证法的这个最根本的规律从各方面作了系统的解释和发挥。他告诉我们，只要把矛盾规律的各方面问题弄清楚了，也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

为什么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这是因为，辩证法的宇宙观告诉我们，事物的内部矛盾，乃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毛

---

* 见《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几个时期（讲学提纲）》题注，整理时删去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是主要矛盾一段。

泽东同志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这里所说的"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就是指由事物自己内部矛盾所引起的运动。他说："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矛盾论》）

既然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正确认识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性，就必须首先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暴露事物内部的矛盾，研究这些矛盾如何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我们研究辩证法，主要地也就是要学会观察和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毛泽东同志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在我们的一切工作和斗争中，学会善于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学会掌握"一分为二"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学习辩证法的主要目的。

和辩证法宇宙观相反的，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形而上学否认事物的自己运动，不承认事物内部存在着推动自己发展变化的动力，不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性。因此，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是否认矛盾，掩盖矛盾的方法；就是用片面夸大来代替事物内部矛盾的全面分析；就是反对"一分为二"的观点；就是在思想上抹煞了事物内部自己发展的动力，把事物本身都看成是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是错误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就属于形而上学的性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三和"、"两全"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

"全民党"的路线）的世界观基础，也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矛盾调和论。

## 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矛盾法则或对立统一法则是宇宙万物的最普遍的规律，辩证法的宇宙观，首先要肯定这个真理。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在指出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批判了形而上学否认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这个根本错误之后，接着就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他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第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是说，世界上充满着矛盾，任何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是包含着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事物。自然界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科学发展的历史，都证明一切事物是遵循着矛盾规律而变化发展，不可能找到任何例外。

既然肯定了矛盾规律在一切事物中的普遍性，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和观察任何问题的时候，自始至终都必须坚持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有所动摇，不应该把任何问题看做例外，否则，就不能避免认识的错误。

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常常是通过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来歪曲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德波林学派的错误之一，就在于不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他们硬说一事物在开始的时候只包含着差异，而没有矛盾；在一事物发展终结的时候，矛盾就被调和，而不是经过斗争来解决矛盾。有些现代修

正主义的哲学者散布矛盾将要被“融合”、“结合”，以至于矛盾“将要化为乌有”的谬论，这就是通过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来反对唯物辩证法，来为那些投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政治变节行为制造理论的口实。

在一些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中间，也往往因为不能坚持分析矛盾的辩证方法，而在认识上发生各种错误。例如，对周围形势的观察，往往不能“一分为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悲观失望，把事情看得一片黑暗，不会从困难形势中看出克服困难的条件；在工作发展顺利的时候，又盲目乐观，既不注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善于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新的困难。有些人在估计自己工作的时候，只愿意谈成绩，不愿意看缺点，因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或者只看到缺点而看不到成绩，因而丧失信心，丧失前进的积极性。这些错误思想，都是以片面代替全面的形而上学方法的表现。不坚决克服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就会对我们的工作造成障碍。只有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全面地看问题，才能正确地观察形势，正确地对待顺利和困难、成绩和缺点、胜利和失败等等的关系问题，从而使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善于及时发现缺点、克服困难，善于利用和创造顺利条件，把我们的事业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不断地推向前进。

在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辩证法还要求我们要以更大的力量来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一切事物内部都普遍地存在着矛盾，但每一事物的矛盾都各有其自己的、与其他事物矛盾互不相同的特点，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但在它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这个矛盾运动又各有其不同的特殊性表现。因此，要学会善于坚持运用辩证

法的方法来正确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必须对每一事物的矛盾运动的特点以及它们的各个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行科学的具体的分析研究。

矛盾的特殊性之所以需要特别加以重视，是因为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得到正确地解决；而只有认识了每一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解决这个矛盾的特殊的方法。因此，在研究任何事物的矛盾运动的时候，都不应该预先设想一个既成的固定公式，主观随意地硬套到这个事物上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共产主义》)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科学的矛盾分析方法的范例：中国革命包含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若干不同的时期。在每个阶段、每个时期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都各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每个时期的阶级矛盾都分别做出精确的具体分析，把握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根据它们不同的特点指出了各自不同的解决矛盾的具体斗争方法。像中国这样空前曲折而复杂的革命斗争，能够取得迅速发展和胜利，就是因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克服了任何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掌握和运用了具体地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科学的辩证方法。

凡是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胜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观察问题的时候符合于这个"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的辩证方法。

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事物矛盾不能够具体地分析它的特殊性，那也就不能够真正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就不能在一切问题上真正贯彻辩证法的方法。如果我们用一个预先设想的公式，去解释

各种不同事物的矛盾，那么，结果只能得出一些牵强附会的、与事物本身的矛盾特点毫无关系的主观主义的（公式主义的）臆想，从而也就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辩证法；也有的人由于用这种公式主义的方法处理事物的矛盾碰了钉子，他们不去检查这个公式主义方法的错误，却反而对辩证法的正确性在思想上发生动摇。所以，要坚决贯彻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才能在一切事物和一切事物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正确地掌握辩证法。

怎样来对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进行科学的具体分析？要把握事物矛盾的总体的特殊性，就必须用“一分为二”的方法，首先把事物内部相互矛盾着的各个对立方面的特点，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综合起来，就能把握这些对立面的相互联结的特点，就能把握矛盾总体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说：“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矛盾论》）

要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殊性，决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一个方面同其他方面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而是相反地，要把他们放在与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毛泽东同志说：“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矛盾论》）

总之，我们应用辩证法去观察问题，不能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分析矛盾的各个方面在矛盾总体中的具体地位以及它们具体的相互关系，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片面

地、表面地看问题，就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能认识事物固有的相互关系和内部规律性。主观主义的错误根源之一，就在于丢掉了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灵魂，就在于把事情的片面误认为全面，把表面的现象错看成事情的本质，因而就使主观脱离客观，走上唯心主义的路线。

## 二、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的各个方面所处的地位关系中，首先应该研究的是主要和次要的关系问题。例如，在我们研究同时包含着许多矛盾的复杂事物的时候，要想暴露这个复杂的事物的矛盾总体的特殊性，就必须着重研究这些矛盾中哪一种矛盾居于主要地位。不同的矛盾之间也表现为相互矛盾的关系。在这个相互矛盾的关系中，必有一种矛盾居于主要地位，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只有把握到了这个主要矛盾，才能够把握这个复杂事物的矛盾总体的特殊性，才能够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到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毛泽东同志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的领土大举进攻，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在中国国内外的各种复杂矛盾中，上升到主要的地位。当时中国共产党把握了这个主要矛盾，根据这个主要矛盾的特点，正确地规定了这个时期具体的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领导中国人民来进行斗争，解决这个革命时期的各种复杂矛盾，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不但在复杂事物的各种矛盾之间有主要和次要的关系，在同

一种矛盾中间，相互矛盾着的两个对立方面，也有着主要和次要的区别；其中主要的矛盾方面，就是在矛盾总体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要了解每一种矛盾的总体特殊性，要了解包含这种矛盾的事物的特殊性质，并找到解决这种矛盾的特殊方法，就必须在它的两个对立的方面中，去找到主要的矛盾方面。

解放以前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和中国人民的阶级矛盾中间，三大敌人居于统治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也规定了必须采用民族民主革命的方法，主要地是采用革命战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社会的阶级矛盾。全国解放后，统治权转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手里，他们成为社会阶级矛盾的支配的主要方面，这就使中国社会根本改变了性质，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 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有着又统一又斗争的关系，我们研究事物的矛盾，不外就是要研究事物内部的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就是指对立面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性质。矛盾的斗争性，就是指对立面之间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关系。暴露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要暴露这一事物内部的对立面是如何成为同一的，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的；在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全部过程中，又是怎样自始至终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

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就是说，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内部推动自己本身运

动变化的根本原因。但在研究事物运动变化这个根本原因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列宁所指出的一个原则，即对立面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从这两个阶级的产生一直到阶级的消灭，自始至终任何时候都不会停顿的，因而是绝对的，而这两个阶级的同一性则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是相对的。例如，这两个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建立统一战线这个同一性，只是在这个革命的一定具体历史条件下才能建立和存在。在这个统一战线中，自始至终两个阶级之间都不断地进行着斗争。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了，历史条件变了，这个同一性也就不存在了；但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发展下去。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下面，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也有着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的内容不同了。这个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又由于民族资产阶级除了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的一面之外，还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我们党和国家就有可能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统一战线，就是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统一战线。和平改造决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而是相反地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也就是要在最后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对立的同一性的特点。

不能离开斗争性来看同一性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矛盾论》)实际上，对立面的同一性应该看做是对立面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结果。

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必须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才能实现。不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和新老殖民主义者激烈的革命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转化为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这不是很清楚吗？

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也只能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才能保持得住。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对立面是互相排斥的，要使相互排斥的对立面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没有一定的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相互依存中，对立面的双方总有一方居于主要的支配地位，这个主要的支配的地位正是斗争的结果。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领导的地位，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如果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反动性不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坚持革命的路线政策，就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因而也就不会有这个统一战线。这不也是很清楚的吗？

斗争是绝对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都要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而矛盾是普遍的，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个原理突出地表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实质。共产党人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正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

辩证法指出了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这决不是意味着一切矛盾的解决都要经过对抗的斗争。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当我们在工作中考虑解决矛盾斗争的

方法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区别对抗和非对抗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

毛泽东同志说：“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矛盾论》）对非对抗的矛盾采取对抗的斗争形式，或者对对抗的矛盾采取非对抗的斗争形式，都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采取错误的斗争方法来处理工作和问题，必然要遭受挫折和失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概括和批判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许多历史教训。

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相互转化的情形，并且要学会善于随着这个转化而改变斗争的形式，才能避免在工作中产生重大错误，使工作少受损失。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大量历史经验证明了的真理。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下卷）

# 艾思奇生平年谱

（1910—1966）

## 1910 年生

艾思奇，原姓李，名生萱。1910 年 3 月 2 日诞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家谱载为蒙古族，17 代孙。生萱排行老二，大哥生莊（庄）、三弟生葂、四弟生蕍、妹妹贤贞。

其父李曰垓，字子畅（1881—1944）。1909 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师从严复）。同盟会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大学毕业回滇后，曾首创土民学堂 128 所，是最早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开创者。辛亥革命策动滇南起义及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民政司长、滇南观察使和西藏宣慰使等。曾亲自勘测滇缅公路和水利工程；任殖边督办期间，主持中缅边界谈判。母亲寸宽福为贤淑的家庭妇女。

## 1912 年 2 岁

随母从腾冲迁居昆明。3 岁时，被云南都督蔡锷收为义子，取名翼武。

## 1914 年 4 岁

入幼稚园。

次年，其父亲李曰垓积极参与策划云南蔡锷统帅的“护国讨袁”起义，并参与起草“讨袁檄文”，任护国第一军秘书长。为护国军冠名，并随蔡锷参加护国战争。

**1917年7岁**

入私塾。

**1918年8岁**

祖父去世，跟父母回腾冲和顺乡半年多，年底回昆明，继续读私塾。

**1921年11岁**

入国民小学，插班读四年级。

**1924年14岁**

唐继尧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主张，遭到罗佩金、李曰垓等重要将领的反对。罗被杀害，李曰垓被迫流亡香港。孙中山准备北伐，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任命李曰垓为驻港代表。

随全家搬至香港，考入岭南大学香港分校（教会学校）的小学。

**1925年15岁**

孙中山逝世，李曰垓辞去大元帅府驻港代表职务，赴沪宁。

随母偕弟妹回昆明。秋，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插班二年级。

在省一中，受进步教员楚图南、陈小航（罗稷南）和共产党员李国柱的影响和教育，接受革命真理。读了许多革命的书刊，如《响导》以及李大钊的文章等。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努力会”，并在先生坡1号发起成立“读书会”。在天君殿巷开办义务夜校两年之久，招收造币厂、兵工厂和市民中穷苦人家子弟，免收学费。艾思奇管教务兼教员，教文化，搞演讲。前后办了两年，约三百名学生。还参与李国柱主办的秘密刊物《火花》、《小世界》的编辑工作。在一次学生会上，作了唯物史观的讲演，引起全校师生惊异。为倡导新文化，组织演出进步话剧，在《自芳回

家以后》一剧中，登台扮演女主角。在演出前，邀聂耳组织的小型管弦乐队演奏。

## 1926年16岁

在省一中，他是学生自编刊物《滇潮》编辑，撰写了许多文章，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抨击军阀统治。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特别是"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游行，险遭军阀逮捕。遂乔装出逃，经越南辗转到苏州父亲处。不久去南京找大哥李生庄，投考东南大学附属高中部。在那里加入"新滇社"（党的外围组织）。

李生庄在东南大学修西洋哲学，并师从章太炎，研习中国古代经学、史学，是学生会负责人、共产党员、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委员。北伐战争前夕，反动军阀孙传芳加紧镇压，李生庄被列入黑名单，得息后逃亡上海，匆忙间未及通知弟弟，便将艾思奇逮捕入狱，被打入死牢，受拷打不屈。经民国元老李根源营救出狱，和父兄一起赴苏州暂住李根源处。

父李曰垓在苏州时，常和李根源、章太炎等一道研究国学。他父亲和大哥亲授中外古典哲学、史学，读《老子》、《庄子》、《墨子》等书，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哲学。他大哥还向他介绍西洋哲学，特别是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也向他介绍一些现代自然科学知识。

## 1927年17岁

父李曰垓自参加辛亥革命到孙中山准备北伐，十多年来，国家仍陷于军阀混战，使他救国救民的满腔热忱屡遭挫折，感到不能让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他推崇墨子"兼爱互助"思想，并认为要富强国家应推重贤才，必须发展工业经济、开发自然资源，而云南就有丰富矿藏。为获得科学知识，决定让儿子去日本留学；而

当时东京是世界各种文化交汇的中心。

春，奉父命赴日留学。在东京学习日语及在大学预备班补习，并广泛阅读各种进步思想家、科学家著作，尤其是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

参加中共东京支部廖承志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

### 1928年至1929年18岁、19岁

1928年5月，国内发生济南惨案，中共东京支部发起留学生归国抗议，于是随“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毅然回国，返回昆明。

当时，唐继尧已垮台身死，龙云夺得政权。父回滇出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兴办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开发经济、水利、交通。李生庄亦回昆明在中学任教，并兼任云南《民众日报》副刊主编。

艾思奇从日本秘密运回许多外文马列经典著作，一边养病，一边研读。他用“小幺”、“S.G.”等笔名为《民众日报》副刊《杂货店》（杂文专栏）写了不少理论和学术文章，并与李生庄（笔名“老幺”）就“白马非马”命题进行辩论，引起社会性讨论。其中有十几篇是介绍新哲学的简明生动的短论、解释“费尔巴哈论”的哲学文章。实际上是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艾思奇还写了一些文艺文章，翻译了英国天才青年诗人济慈的名著《夜莺歌》、日本国木田独步的小说《孤独者》、德国诗人海涅的十几首政治诗等，登载在《民众日报》副刊《象牙塔》里。提供一些世界名人音乐家传记给好友聂耳，并将《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译成中文，交由聂耳等人教唱，充分显示了艾思奇的文学艺术才华。艾思奇不仅酷爱音乐，并擅长美声唱法，也证明了音乐对智慧的益处。

还为张克诚主编的《市政日报》副刊《小宇宙》，撰写了不少

反帝反封建的文章。

1928年至1929年，在昆明的一年多，除从事报刊编辑、撰稿、参加社会实践和养病外，还把大量时间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

## 1930年20岁

胃病痊愈。到上海五叔李曰基处，求得经费支持，夏，再度赴日留学。

艾思奇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冶金系采矿专业。

除大学课程外，进一步自修德语，用德、英、日文对照研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经典原著。

从17岁至20岁，通过研读许多马列经典著作，找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理，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他对友人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从此，开始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重新考虑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只有改造社会制度，首先要改造人们的意识形态，使人们都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所以，他学习鲁迅，鲁迅是弃医从文，以文学为武器；而他决心弃工从哲，以哲学为武器，要用手中的笔来战斗。

## 1931年21岁

"九·一八"事变发生，激于爱国义愤，和许多留日同学一起，再度毅然弃学回国，于年底返回昆明。

由于1930年底中共云南省委遭到破坏，李国柱、赵琴仙等人先后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活动中断。在白色恐怖中，他无法与

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决定去上海另谋出路。

1932年22岁

春，离家赴上海。原想到德国留学，因无法获得经费未能成行。父亲又来信，敦促他回云南，帮助兴办实业。经过思考后，他决定脱离家庭羁绊，投入革命的洪流中。

在上海，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为日本问题研究翻译文章，并译写些新诗和杂文。

8月，经留日同学介绍，到有地下党领导并有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泉漳中学，任物理、化学教员。泉漳中学是菲律宾抗日领导人之一王育才创办的。

开始用“思奇”、“李东明”等笔名，在《中华月报》上发表哲学评论和杂文。

1933年23岁

因学潮，泉漳中学遭国民党查封。

在生活极端困难中，写成第一篇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发表在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主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接着，在《正路》第二期上发表《进化论与真凭实据》，批驳自然科学方面反对进化论的谬论。

夏，经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杜国庠和“社联”领导人许涤新介绍，加入“社联”，并担任“社联”的研究部长，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9月和12月，在《中华月报》上发表了《直观主义与理智主义》、《理智和直观的矛盾》，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这期间，还发表了《文艺的永久性与政治性》等文艺评论，批评“文艺自由论”，回答关于“文艺永久性”的难题。

12月，在《中华月报》上发表了《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评析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哲学的斗争和发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发展趋势锐不可挡。此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他开始正式用“艾思奇”这一笔名。

## 1934年24岁

6月，经“社联”安排，由共产党员柳湜介绍，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以读书问答的形式，写了许多有关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文章，在《申报》的《读书问答》专栏发表，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同仁赠与“百科辞书”的雅号。

11月，《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中分出，创办了《读书生活》(半月刊)。由民主人士李公仆任主编，柳湜、艾思奇、夏征农任编辑。艾思奇负责写《哲学讲话》、《科学讲话》，也为《读书问答》等专栏写稿。

艾思奇撰写的《哲学讲话》，在《读书生活》连载24期，1935年集结出版。遭国民党查禁，第四版易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大众哲学》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杰作，从一开始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解放前共印行了32版。十几年中一直成为支撑读书出版社的一本畅销书。

10月，发表了《中庸观念的分析》一文，对孔子的“中庸”哲学思想中正确的因素和错误的实质做了辩证的分析和评判。

留美科学家高士其，因实验中细菌感染脑部回国，治疗期间痛苦异常，心情郁闷。艾思奇鼓励他创作科学小品。高士其的第一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就是在艾思奇的协助下合编而成的。

## 1935年25岁

2月，发表《从新哲学所见的人生观》一文，用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基本观点，对十年前所发生的“科学和人生观”论战，做了评析和总结。

在此期间，戴笠将由蒋介石授意的黑名单交沈醉军统将领办理（沈醉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险遭国民党逮捕，幸得组织保护，方化险为夷。

10月，由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发表了《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一文，开始了和叛徒叶青的“辩证法论战”。1936年6月又写了《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于内因与外因》等文章，对叶青窜改辩证法和“哲学消灭论”的谬论，给予了彻底的批判。

期间，还发表了《论文学的鉴赏》一文，对“文艺自由论”和文艺永久性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批判。

从1934年8月发表《月蚀》一文起，到1935年8月发表《斑马》一文止，写了《孔子也莫明其妙的事》、《由蝗虫谈到鸡生蛋的问题》等二十多篇科普方面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普及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

自《读书生活》杂志创办起，除忙于编务工作外，还为读者释疑解难，约有上百篇之多，如《意志自由问题》（1935年2月）、《抽象名词和事实》（1935年8月）等等。

艾思奇参加了由宋庆龄任主席的“上海御侮自救会”。被取缔后，又加入“中国领土保障同盟会”。中心工作是欢迎巴比塞调查团，包括具体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这一年曾多次到陶行知办的“山海工学团”讲课。

## 1936年26岁

从1935年10月开始，和编撰《英华大字典》的郑易里合译《新哲学大纲》，1936年6月出版。由于艾思奇通晓日、英、德几

国文字，他写了《谈翻译》一文，总结了自己的翻译体会，发表对“信、达、雅”的看法。

结集出版了《新哲学论集》、《知识的应用》。

陪高士其到通俗出版社，安排出版高士其的第四本科学小品集《细菌的大菜馆》。

8月，写了《民族解放与哲学》；出版了《如何研究哲学》。

11月，写了《思想方法论》。

发起组织成立了“新哲学研究会”，每周或双周举行一次座谈，参加的有胡绳、柳湜、林默涵、黄洛峰、陈楚云、钱文珍（钱亦石之子）等，由艾思奇主讲西洋哲学史。该会也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的团体会员之一。又发起组织了“自然科学座谈会”，是团结自然科学界进步人士的秘密团体，主要座谈时事和辩证法，传播科学精神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参加的有章汉夫、于光远、孙克定、钱保功等二十多人。这两个“会”在中国哲学史上实属首创。艾思奇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做了很多工作。

冬，发生“七君子”事件，李公朴被捕，《读书生活》杂志遭查禁，改名《读书半月刊》继续出版。此时，柳湜、夏征农调走，艾思奇独自支撑了一年。

年末，“读书生活出版社”发生资金困难，他多方奔走，邀约进步人士郑易里为股东，聘请黄洛峰为经理，筹集到一笔资金，出版社重现起色。他倡议出版社积极支持郭大力、王亚南翻译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使《资本论》全译本得以在1938年出版。第一卷初版印出时，艾思奇与郑易里逐字逐句为之校对。

## 1937年27岁

年初，在艾思奇筹划下，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几种别的杂志。

有陈子展出面编的《生活学校》，每期大众信箱，由艾思奇负责解答问题，同时组稿审稿。还为《通俗文化半月刊》写稿、编稿。

斯诺的《西行漫记》翻译本，因资金不足，未能出版。当时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委派艾思奇向杜月笙介绍情况。因杜月笙时任上海市各界抗战后援会主席团主席，也希望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底细。经艾思奇介绍《西行漫记》的内容后，杜月笙拿出1000元大洋资助，以标榜自己支持抗日。这样《西行漫记》得以早日出版，使广大读者了解到共产党是光荣伟大的，并确信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共产党。

4月，《哲学与生活》出版。

艾思奇提议并负责主编了大型理论刊物《认识月刊》，5月出版，郭沫若、周扬、薛暮桥、胡绳、孙冶方、王思华、何干之等，都曾为这个刊物写过文章。他自己也发表了《论思想文化问题》、《论批判》等文章。因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出版两期即停刊。

7月，“七七事变”之后，郭沫若、邹韬奋、胡愈之等发起组织上海编辑人协会，将一些进步刊物合并或联合，改为《文化战线》旬刊、《战线》五日刊、《抗敌周刊》等，艾思奇为编委，并参加了前两个刊物的编辑。在《抗敌周刊》上发表了《论信任政府》等五篇文章。

9月，奉党中央令调往革命圣地延安。同行的有周扬、李初梨、何干之、周立波等十几人。10月间到达延安，中央组织召开了欢迎大会，毛泽东亲自发表欢迎讲话。随即被中央组织部派往抗大，任主任教员，并兼任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长。

### 1938年28岁

年初，毛泽东写信给艾思奇，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毛泽东并将“艾著

哲学与生活摘要”19页，送给艾思奇过目，其中有关于“差异和矛盾”问题提出的意见。1月12日，又给艾思奇连写了两信，其中谈到他正在研究军事问题，“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又说：“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还约艾思奇“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2月，在边区文协领导下，组织所有在延安的自然科学理论工作者，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国防科学社”。参加的有董纯才、高士其、陈康白、艾思奇、柯柏年、周建南等。经常召开座谈会，主要任务是在新哲学的基础上，研究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革命事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等问题，进行创新的探索。

3月，由边区后援会发起，延安各界民众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逝世23周年大会，国民党天水行署主任蒋鼎文派代表出席。艾思奇发表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一文，反映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团结抗日的新局势。

4月，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会开幕，毛泽东、张闻天发表讲话，王若飞作政治报告，艾思奇发表了演说，被会议选为29名执委之一。

4月，在武汉《自由中国》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任务。

5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洛甫（张闻天）任院长。艾思奇从抗大调该院任教，并任哲学研究室主任，也在鲁迅艺术学院兼课。

6月，世界（国际）学联派代表团访问陕甘宁边区，成员有雅得女士、柯乐曼、弗洛德等，由抗敌后援会负责接待，刘宁一、毛

齐华代表工会，艾思奇代表文化界，向仲华代表军队参加。

9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负责筹备。9月底，艾思奇、何思敬、周扬、吴黎平（即吴亮平）、王学文、成仿吾、高士其、徐懋庸、郭化若等18人，联名在《解放》周刊第53期上，公布了由艾思奇起草的《新哲学会缘起》。由于毛泽东的积极倡导，用科学思维方法的新哲学成为当时延安学习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 1939年29岁

年初，调中央宣传部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常务理事、鲁迅研究会理事等。

清明节，艾思奇以文化界代表的身份参加祭黄帝陵。祭黄陵代表团团长高岗（西北局书记），副团长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刘宁一、毛齐华为工会代表，莫文骅、向仲华为军队代表，张琴秋代表妇女界。艾思奇为文化界代表，受林伯渠委托，起草了祭文，毛主席做了修改并亲自抄录一遍。

4月，艾思奇在延安《新中华报》特刊上，发表《五四运动在今日的意义》。

5月，陕甘宁边区文协正式成立，艾思奇任中央文委秘书长兼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为副主任，后调丁玲为副主任，接替负责日常工作。

6月，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参加人有艾思奇、何思敬、杨超、和培元、陈伯达，连毛泽东共6人。每周集会一次，着重讨论《实践论》、《矛盾论》的问题。毛泽东事先将两篇著作印发给大家，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

随后，中央宣传部也成立了哲学小组，组长张闻天，艾思奇是指导员，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柯柏年、肖劲

光、莫文骅等，后发展到一百多人，成为当时延安的模范学习小组。

8月，抗敌后援会组织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毛泽东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后援会印发了宣传材料，有关文稿的撰写皆出自艾思奇之手。

8月，为指导延安的哲学学习，写了《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发表在《解放》杂志上。为提供学习资料，编辑了《哲学选辑》一书，汇集当时能找到的较为系统的资料。《哲学选集》附录了艾思奇为中宣部哲学学习小组撰写的哲学《研究提纲》。该“提纲”6万多字，全书28万字。毛泽东对该书做了多处眉批，对《研究提纲》做了长达三十多条、3000多字批注。

1939年，艾思奇与吴亮平合作，完成了《唯物史观》(国统区改为《科学历史观教程》)的编写。该书成为当时中组部干部必读书。在陈云同志倡导下成立了学习小组，参加的有陈云、王鹤寿、王德、袁宝华、武经天、王林、罗少华等。李一氓不在中组部工作，也要求参加学习。每周讨论一次，艾思奇有时去解答问题。

同年，艾思奇将在上海和延安所写的38篇文章结集，书名为《实践与理论》，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这期间，还翻译了列宁《哲学笔记》中一部分(8000多字)。

## 1940年30岁

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74人。艾思奇代表边区文协作了题为《抗战中的陕甘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边区文化协会简章，选出毛泽东、张闻天、李维汉、吴玉章、艾思奇等为执委，吴玉章为主任，艾思奇、丁玲为副主任，吴伯箫为秘书长。

2月，党中央决定创办学术性综合理论刊物《中国文化》杂志，

毛泽东为刊物题名，艾思奇任主编，林默涵为秘书、编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首先在创刊号上发表。艾思奇也发表了《论中国特殊性》、《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还连载他的"哲学讲座"，并以"社论"名义发表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进一步认识中国现实》等。《中国文化》共出了3卷15期，每期十多万字。

这一年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吴玉章为会长，艾思奇为理事。到1941年底研究会会员人数达330人。该会主要任务是读书，既学自然科学，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应邀讲生物进化论和狭义相对论（当时称为特殊相对论）中的哲学等问题，率先将爱因斯坦的学术思想引入忙于抗战的干部的思维之中。

这一年，艾思奇还参加了于光远发起组织的"自然辩证法讨论会"，又叫"《反杜林论》读书会"。

4月，延安文化界追悼蔡元培大会，艾思奇代表文化界讲话。

6月，延安举行"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出席年会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张仲实、何思敬、周扬、杨松、肖向荣、郭化若、冯文彬、和培元、范文澜等五十多人。年会由何思敬主持，艾思奇作会务工作报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会后毛泽东宴请与会代表。

## 1941年31岁

1月，延安成立鲁迅研究会，由艾思奇、肖军、周文三人组成干事会，并成立10人编委会，编辑出版《鲁迅研究丛刊》，设立"鲁迅文学奖金"。

8月，发表了《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文章密切联系中国实际，集中批判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

论、阎锡山的“中”的哲学，论述了唯物论辩证法的发展。指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理论才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正确指导思想。

9月，延安马列研究院改为中央研究院，范文澜为院长，艾思奇为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

9月，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吴玉章致词，徐特立、艾思奇讲话。艾思奇被任命为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

9月，延安成立青年艺术剧院，艾思奇为9人理事会成员。

12月，成立延安诗会，艾思奇为7人理事会的理事。

### 1942年32岁

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整风运动开始。

毛泽东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提出要编一本“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任命艾思奇为主编。在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全体同志和政治研究室部分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如期完成了任务。作为整风的重要文献，这本书成为干部必读书之一。

艾思奇在整风运动中，针对出现的问题，先后写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学习观念的革新》、《谈讽刺》、《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等文章，深入宣传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等重要思想。

10月，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基本结束，艾思奇代表院部作了题为《怎样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总结报告。

同年的5月间，艾思奇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年底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党的代表大会。

### 1943年33岁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解放日报》改

版问题，决定调艾思奇到《解放日报》任副刊部主任。

2月，艾思奇到任后，经深入调查了解，召开了副刊部编辑会议，讨论了如何加强和改进副刊的问题，并把林默涵、温济泽、黎辛等调到副刊部，加强了编辑力量，为改变《解放日报》副刊面貌，作了大量工作。

4月，发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

7月，康生发动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反革命”。副刊部坚持实事求是，未挖出一个“敌人”，艾思奇因此被认为“思想右倾”，多次受到围攻，并被撤销了“学委”的职务，受审查，身心遭到了伤害。

8月，为反击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批判蒋介石抛出的《中国之命运》，艾思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成为当时干部必读的文章。

## 1944年34岁

艾思奇在《解放日报》副刊部，除忙于各种编务工作外，还写了大量政治、科普、文艺、哲学方面的文章，如《逼上梁山》、《群众需要精神粮食》、《人民的军队》等。

5月，邹韬奋先生逝世，艾思奇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会议，布置延安追悼韬奋活动，负责《解放日报》出悼念专刊，并参加纪念委员会，写了纪念文章：《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

春夏之间，一批中外记者到延安访问，也访问了《解放日报》的副刊部，美联社记者史坦因、国统区《新民报》资深记者赵超构等写文章，称赞副刊编得好。赵超构在《中外人士访延安

纪实》一书中指出："艾思奇主编的副刊堪称延安文坛的天枰。"

7月至8月间，《解放日报》报导了许多改造封建家长制旧家庭、建立新民主主义新式家庭的典型事例。为广泛宣传这种新式家庭在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报社决定由艾思奇起草一篇社论，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送有关领导阅示。毛泽东十分重视，作了很多修改，将题目改为《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毛泽东认为："改的与原文颇不调和"，批示："此文不发表"。但这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未刊稿。

完成了坚持14年业余时间翻译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长诗，趁林默涵调往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之机，捎给黄洛峰主持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7月，与王丹一同志结婚。

秋，美军军事观察组到南泥湾参观359旅举行的军事演习，王震将军邀请了艾思奇夫妇、音乐家贺绿汀、农学家陈凤桐，一同到南泥湾参观颇具规模的军事演习；并以开荒生产的劳动成果宴请大家，也将南泥湾的精神介绍给了国际友人。

从1944年底开始，艾思奇参加了中共高级干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学习讨论。

艾思奇父母相继去世，事隔多年方知噩耗。

## 1945年35岁

4月，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并出席了"七大"。

8月，艾思奇被任命为《解放日报》副总编，并担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两社的编委委员。

这一年，艾思奇除了处理繁忙的编务工作外，还撰写了《人类科学文化的胜利》、《血肉相联》、《一往无前》、《东方强盗就缚

以后》、《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等社论、评论和具有指导性的文章。

## 1946年36岁

4月8日，《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史称“四八烈士”）等从重庆飞回延安途中遇难。艾思奇执笔，和余光生、陈克寒联合署名发表《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

5月，“大众书店”编辑出版了艾思奇的一本新文集，书名为《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

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遇害。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唁电，文化界、新闻界反响强烈。国民党特务造谣说李公朴是“共产党杀的”、“是艾思奇杀死的”等等。艾思奇于9月撰文《谁是杀人凶手》，给予严正驳斥，由延安广播电台播出。

8月，中共中央任命廖承志为《解放日报》社社长，艾思奇为总编，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

11月，国民党蒋介石派胡宗南集中了23万兵力，准备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艾思奇和社长廖承志一起，于11月带领大队向晋察冀边区转移。

## 1947年37岁

3月19日，胡宗南的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解放日报》坚持到了3月20日才停刊，所有报社人员都向晋察冀撤退。

艾思奇在撤退至山西的途中，得了副伤寒，留在晋西北苛岚县的伤兵医院治疗。5月，病愈，赴建屏县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受胡乔木委托，审阅丁玲写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肯定这是一本好书。

7月至9月，中央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土地

会议。艾思奇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参加了土地会议。

年底，受中宣部委托，前往太行山专区，去解决北方大学的一些问题，并应范文澜邀请去北方大学讲课。

1948 年 38 岁

7 月，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与晋冀鲁豫区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随后，艾思奇随同华北大学从山西长治迁到河北正定县，并在该校任四部（研究部）副主任。艾思奇原想利用华北大学图书资料较多的条件，着手完成在延安时中央交给的任务——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并已组成以萧前为行政和学术秘书的助手班子。因革命形势变化很快，工作不断变动，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7 月，为配合形势要求，撰写了一篇系统的理论文章——《反对经验主义》。

7 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办马列学院的决定》。随之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成立马列学院，刘少奇为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杨献珍为教育长。

10 月，艾思奇奉命调马列学院任教员。

11 月 8 日，马列学院开学。12 月 14 日，院长刘少奇向学员作了重要讲话。艾思奇主要承担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任务；编写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

1949 年 39 岁

春，北平和平解放，马列学院从李家沟随中央机关以“中央劳动大学”的代号，迁至北平，暂住西山碧云寺。

3 月，在西柏坡参加了以任弼时同志为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

7月至8月间，中组部、全国妇联、人民大学联合，在清华大学举办首届平津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其中有地下党员何东昌等代表学生参加。刘少奇曾到该班讲话，也邀请艾思奇讲课。他在讲课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针对性地做了具体分析，促进了学生思想问题的解决。后来这批学生充实了新中国的国家机关干部队伍，大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央决定在全国解放的城市，普遍组织干部群众学习社会发展史。艾思奇除在马列学院担任这门课的主讲外，还培养了一批学员到北京等地各单位去讲课。

10月1日，开国大典前，艾思奇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他是社会科学方面15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制定政协组织法与共同纲领，选举全国政协委员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委员，拟定国旗、国徽，决定首都所在地和年号等工作。

以后，又陆续参加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对外文教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

7月，北平召开了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重新选了会长和副会长，会长是李达，副会长是艾思奇和郑昕。因会长住武汉，经常由艾思奇主持工作并召开会议。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全国开展学习社会发展史，进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这在全国解放初期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艾思奇遵循党的指示，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曾应邀到许多单位讲授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版了《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单行本。

7月，发表了《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一文。

9月，在《学习》第1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从头学起》(副题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

11 月，在《学习》杂志上发表《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一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科学事业的发展，要求将发展自然科学与自然辩证法相结合，艾思奇、于光远、裴文中、温济泽等，常到一些机关、文化宫举办讲座。

## 1950 年 40 岁

3 月，在《学习》上发表《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一文。

4 月，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一书。1952 年出至第 17 版，发行 46.7 万册。

4 月，又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播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从 4 月 10 日起，连播 23 次，到 6 月底播完。反响热烈。从 7 月 3 日起，又重播第二遍。听众在 50 万人以上，为新中国的首次电化教育。讲稿后经修改，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32 万册。

10 月，在《学习》上发表《前进一步》的文章，进一步指导全国的学习运动。

年底，应《学习》杂志之约，发表了《论思想改造》一文。

这一年，艾思奇曾三进清华园，为清华大学作马克思哲学及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应邀多次为北京大学师生讲课，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他还多次为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等高校上大课和广播讲座，培养了新中国高等院校一大批政治课教师。从此时起，还为党校系统、社科系统、军事院校系统培养了许多哲学理论教员，其中，自己肯定艾思奇为老师的，如人大的萧前、北大黄楠森和汪子嵩、中央党校韩树英、社科院邢贲思、国防大学侯树栋，等等；学者任继愈也自谦地说艾思奇是自己的“启蒙

老师”。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新一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们为繁荣哲学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

艾思奇在全国解放初期，还多次和北大、清华许多哲学界老教授举行双周座谈会，参加的有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贺麟、郑昕、朱光潜、任继愈、任华等等，通过学术交流，平等研讨问题，一些教授说：“没有想到艾思奇他们对旧哲学也是很有见识的”，开始信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艾思奇在帮助他们从以往非马克思主义阵营转到马克思主义一边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1951年41岁

3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与当选为青联主席的廖承志同志，同为得票最多的（全票为456票，得455票），而当选为青联委员。

3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一文。

6月，在《学习》发表了《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一文，并应邀为《学习》杂志组织的关于“功臣”问题的讨论做总结，写了《为什么要批判和克服“功臣”思想》。

9月，在《学习》上发表了《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实践论〉与哲学史的研究》一文，对冯友兰先生等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全国政协建立一个学委会，曾邀艾思奇给各党派及其代表人物讲课。有一次去钓鱼台国宾馆给越南党的领导人胡志明介绍毛泽东思想。一个学员，两个教员，艾思奇主讲，于光远补充。

刘少奇指示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请艾思奇去讲课。

11月，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邀请，前去讲课。陈毅元帅又请他给南京军区做报告。

11月初，参加中央组织的土改工作团，被分至安徽宿县地区

搞土改。共4个月，1952年3月间结束。

1952年42岁

3月间，从安徽宿县返回北京。

这一年艾思奇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俄文，坚持不懈，最后终于掌握了俄文。

其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艾思奇参加后写了《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发表在3月6日《学习》杂志上。文章有片面性，他对此曾多次做了自我批评。

4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一文。

6月，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一文。

1953年43岁

应中国青年出版社要求，从1950年起，利用工作间隙，重新修改《大众哲学》，至1952年下半年，完成了修改稿，1953年初交付出版社排出了清样。

1953年初，刘少奇不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陈伯达也不兼任副院长，由凯丰为院长，杨献珍、侯维煜为副院长兼党委书记。

7月间，在杨献珍、侯维煜的主持下（院长凯丰因病卧床未出席会议），马列学院院组织，对艾思奇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并写了《关于艾思奇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的检查报告》。当时陈伯达虽已离任，但批评所持的基本观点仍是陈伯达的。“报告”按照陈伯达所定的基调，把《大众哲学》定为：“机械唯物论”，说是“错误百出”，甚至说是“敞开了走向二元论和唯心论的大门”。对《大众哲学》和关于领

袖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等问题，对艾思奇进行了违背实事求是的批判。认为艾思奇到外单位讲课及社会活动，是“不务正业”，说艾思奇“思想懒惰”，“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等等。艾思奇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作了口头与书面检讨，并撤回《大众哲学》修改本清样，停止出版。后院党组织将批评的意见写成的“报告”，连同艾思奇的书面检讨，一起上报马列学院管理委员会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当时中央马列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胡乔木口头指示：只在党委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中传阅，不必往下传达。这场波折，使艾思奇的高血压、心脏病开始有了明显症状。

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9月，为马列学院七、八、九班学员讲授《西洋哲学史》。应邀为《中国青年报》写了《“机关青年应当怎样对待工作和学习来适应国家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讨论总结》。

10月，马列学院成立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历史、语文等6个教研室。艾思奇被任命为哲学教研室主任，负责院内各个班次的哲学教学工作和学员的思想工作。

10月，给院内七、八、九班讲《辩证法引言》，并分四次讲了《普遍联系的辩证法》、《运动发展的辩证法》、《量变质变的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等。

11月，讲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下半年，马列学院领导干部在学习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和党在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过程中，在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上，艾思奇和杨献珍发生了意见分歧。后来，1955年6月，杨献珍将他的意见写成《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一文，送到中宣部。中宣部向一些理论工作者征求对杨献珍文章的意见。8

月，艾思奇写成了《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当时文章均未公开发表。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196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说明中有“上纲过高”的不当用词，在1955年8月的原文中是没有的。

年底，按照马列学院院部的布置，艾思奇主持总结哲学教研室成立以来的工作，亲自撰写了《马克思列宁学院对党的高中级干部进行哲学教学的经验》。后经院部集体讨论通过，发表在1955年1月11日《人民日报》上。

1954年44岁

3月，发表《学习斯大林的学说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奋斗》一文。

4月，发表《不能忽视政治》一文。

5月，《中国青年报》组织讨论“什么是我们远大前途”问题，应邀写了总结性文章:《怎样正确认识和争取我们的远大前途》。后出版单行本。

9月，给马列学院二部（理论部）学员讲《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引言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为全国政协委员作学习报告。10月，将报告整理成文章发表，题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职能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10月，给马列学院二部（理论部）10至14班学员讲《学习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

从1953年下半年起，马列学院聘请了前苏联专家来校教学，哲学教研室前后有5位。专家熟悉经典著作，教学严谨，有其优点，但不了解中国情况，教学中很难联系中国实际，这是严重的

缺陷。艾思奇对此采取了两项做法：一是由苏联专家给中国教员讲课，经过备课，再由中国教员向学员讲课；二是自己编写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哲学教材。从1954年起，艾思奇着手编写《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

### 1955年45岁

党中央指示开展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1月，艾思奇写了《胡适实用主义批判》(5.9万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将主要内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85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下前进》一文。

8月，纪念恩格斯逝世6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一文。

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任命杨献珍为校长，艾思奇为校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确定中央高级党校是培养党的高中级干部和党的理论骨干的单位。

5月，参加中苏友好代表团访苏，在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冬，应邀赴波兰参加哲学学术讨论会。

是年秋，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2月，出版了《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小册子。

这年下半年，党校在教学中发生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意见分歧。艾思奇认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杨献珍反对，认为这从来是唯心主义的命题，恩格斯是否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从此，围绕这一问题的中心，开始了热烈的争论。

### 1956年46岁

3月，发表了《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学习

和掌握马列主义哲学武器》一文。

9月，党的"八大"召开，艾思奇被选为代表，出席会议。

夏秋之间，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邀请，以《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为总题目，联系文艺实际，系统讲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

应中国科学院学习委员会邀请，联系科学发展的实际，给科学工作者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54年开始，到1956年共讲了11讲。

同年，完成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早在1938年他就翻译过8封信，发表于《解放》周刊；1956年又增译了12封，共21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 1957年47岁

3月，出版《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这本书以认识问题为中心，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高度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当时国内第一本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材。

年初，参加中国哲学问题座谈会，就"研究中国哲学史总的方向"问题和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针对中国哲学史专家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写成了《对"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一文。

## 1958年48岁

春夏间，因高血压、心脏病加重，去青岛疗养。中央高级党校开展反右派运动，艾思奇奉命从青岛返校。康生直接操纵党校运动，把艾思奇认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观点，上纲为"宣扬唯心主义"，是"反党"、"反马列主义"，被内定为"中右"。运动结束后，被下放。

7月，下放前到天津参观学习，应天津市委邀请，给全市干部和工人作了几次哲学报告。后经教研室白大方同志整理成《工人与哲学》一文。

9月，党校十几位同志，被下放河南，他带领韩树英等四位同志到开封地区登封县。下放期间艾思奇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和登封县委副书记，分工主管文教工作。

他满腔热情接受下放锻炼，初期受群众热情的鼓舞，赞扬过“大跃进”，写过《哪里找根据》等文章。后来，随着工作深入，了解到“五风”泛滥，他写信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指出：“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吴芝圃回信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当时登封三官庙乡是全国农民学哲学的先进典型，艾思奇非常重视，派韩树英去蹲点，后又将吴秉元调去加强那里的工作。

冬，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召开，艾思奇向县委提议开办训练班，将政策学习和哲学学习结合起来。县委通过艾思奇提议，在中岳嵩山脚下的古代“嵩阳书院”，办了两期训练班，除县的三级干部外，吸收部分中学教师和哲学辅导员参加，共有一百多人。艾思奇始终重视教育为先，亲自讲课，倡导正确的思想方法。

## 1959年49岁

1月间，先后发表《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认识客观规律，鼓足革命干劲》等文，既肯定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提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坚持科学精神。

2月，在《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一文，针对当时头脑过热的情况，明确指出，群众的力量既是无限又是有限的。

5月，按照人民出版社提出的要求，再版《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经修改字数增加到19.8万字，书名改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8月出第2版。

6月，下放结束，在回京的路上，先后到开封、洛阳、三门峡、西安、太原、大同等地参观学习。在开封师院作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哲学问题》的报告，给山西大同市、晋北地委干部作了“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问题的报告。

夏，返回党校后，在哲学教研室的下放经验交流会上，艾思奇说：“下面刮‘五风’问题很严重，如果不认真纠正，农民就要打扁担。”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11月底，被任命为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仍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部主任。

## 1960年50岁

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党校于1958年下学期，首次开办自然辩证法和逻辑学班，当时招收全国高等院校理工科和哲学系的青年教师共七十多人。2月，受校党委委托，向自然辩证法班学员做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班“学习计划”的说明》。

7月，又给逻辑班讲了《辩证逻辑》一课，阐述了有关辩证逻辑的开拓性意见。

7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文，系统地阐明了他在1955年所坚持的如标题所表明的基本观点。

9月，作了《关于编写〈自然辩证法提纲〉的讲话》，为自然辩证法班学员编写“自然辩证法提纲”，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在艾思奇的指导下，自然辩证法班的学员编写出了全国第一本《自然辩证法提纲》。

这一年，给中央党校理论班学员做《党史引言报告》，从哲学角度概括了党的历史的基本经验，阐述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1961年51岁

1月，中央任命王从吾为中央高级党校校长。

3月，配合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宣传，写了《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文，发表在《哲学研究》上。

这一年，主要精力集中在主编哲学教科书。中央政治局提出要编写中国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中宣部和高教部落实，并进一步组织和领导编写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艾思奇任哲学专业教材编写组组长，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他提出了编写的指导原则，并逐章逐节做了反复修改。11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全国统一的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育了一代大学生和干部。

1962年52岁

2月，读《资治通鉴》，写了《内行和外行》一文。

3月，给党校"五九"班学员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引言》。

4月，为党校"五九"班做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讨论总结"，回答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许多重要问题。

9月，写了《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文，发表在《哲学研究》上。针对学术界提出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基本观点。

10月，在北京哲学会上做《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问题》的学术演讲。并应邀去人民大学哲学系，做了《关于哲学教科书的一些问题》的报告。

这一年，还针对暂时困难时期人们的思想，写了《曲折前进

是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等文章。

## 1963年53岁

3月，林枫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贾震为常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

4月，给党校党史专业辅导《实践论》、《矛盾论》。

6月，给党校"六一"班学员做问题解答，其中讲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又讲了辩证法核心问题，后来在1964年6月讲课时，又讲到这一问题。根据这两次讲课，整理成《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讲课稿，系统而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6月，给全国政协委员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几个问题》。

夏，感到身体不适，低压120°—高压220°，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更为明显。去青岛疗养期间，还写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一文。

12月底，应陕西省委宣传部的邀请，去西安给省市机关干部辅导《实践论》、《矛盾论》。

## 1964年54岁

1月间，三次为党校"五九"班、"六〇"班哲学专业做《〈反杜林论〉辅导报告》。

3月，三次为上述两个班的哲学专业做《关于〈自然辩证法〉中〈辩证法（札记）〉讲解》，并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

4月，分两次为党校"秀才班"（59、60、61班）讲《〈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5月，又三次为党校"秀才班"学员讲《世界观问题》。这两次讲课，从新的角度，进一步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上半年，按照中央要求，党校组织批判修正主义的研究小组，艾思奇为负责人，搜集并编辑了一些资料。

6月，艾思奇写成了《画皮下的赫鲁晓夫的世界观——实用主义》一文，但未发表。

夏，在北京召开亚非地区科学讨论会，中国科学院邀艾思奇为代表，并做了《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和他的哲学思想》的报告。

1964年和1965年间，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做过多次辅导报告，应邀为中国文联、解放军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海军正师级以上青岛学习班等单位辅导，根据讲课速记稿综合整理成《学习〈实践论〉辅导报告》和《学习〈矛盾论〉辅导报告》。

7月，给党校“六○”班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做《〈反杜林论〉辅导报告》。并为党校学员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辅导》。

1964年4月3日，杨献珍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题为《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认为对立面统一，“合二而一”“意即对立着的两个东西本来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

1964年5月29日，艾恒武、林青山按照杨献珍关于“合二而一”的思想，在《光明日报》发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一文；6月5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署名项晴的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开始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公开论争。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分为

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又在谈话中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

1964年6月和7月，毛泽东两次找艾思奇等谈话，谈到事物的综合问题和对立统一是辩证法核心等哲学问题。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谈话中又说：“‘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段话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这些话触及到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1964年8月4日，中央党校校委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批判“合二而一”观点的精神，召开全校大会，批判杨献珍。

1964年8月，《红旗》杂志社发表题为《哲学战线的新论战》文章，说“合二而一”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的代理人”。文章是由毛泽东吩咐、陈伯达主持撰写而修改定稿的。随之全国展开了对“合二而一”的批判。

康生一开始就插手“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争，蓄意利用和进一步扩大阶级斗争绝对化，居心险恶地制造了巨大的陷阱，把“合二而一”的学术问题上纲到政治上批判，对杨献珍及许多教职员进行了种种打击，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扩大化，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 1965年55岁

年初，艾思奇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写了《不容许矛盾调和论

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的辩证法》一文，5 月 23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合二而一”观点，坚持“一分为二”辩证法，提出了事物的不可分是相对的，可分是绝对的观点。由于当时“左”的历史背景，该文失之偏颇。

6 月，毛泽东称赞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红旗》杂志登载坂田的文章，并召开座谈会，艾思奇在会上发言。后在《红旗》上发表《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的理论武器》一文。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5］592 号）：“中央批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撤消杨献珍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的职务”，安排到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

1965 年春，中央高级党校组织大批干部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艾思奇参加一个工作队，赴京郊通县城关镇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冬，又参加北京海淀区东北旺乡的“社教”。两次下农村历时半年多，他都认真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挤时间准备出国讲学的讲稿，有时还要回京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当时在物质匮乏条件下的农村，超负荷的工作，高盐量的饮食，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艾思奇极为不利，健康状况几乎已近极限。

12 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通知艾思奇出席。会议原定主要是研究为马列主义七本书写序言。毛泽东说到了其他问题，其中，特别是“海瑞罢官”问题。毛泽东说：“《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在对笔记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话写进去，因为《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也不符合事实。这个意见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后来关锋纠缠不休，只好写

进记录。毛泽东这句话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之一。

从杭州回京不久，即受中央军委邀请去总参三部分三次讲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课，即辅导《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去阜外医院做身体检查，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相当严重，12月30日住院，经治疗，有好转。在医院尽管照明条件不好，仍认真研读《第一国际史》，为辅导干部必读经典著作做准备，总觉得自己还能为人民服务10年20年，退休后打算写长篇学术专著。当时他的行李仍放在农村房东家，以为还能回村参加“社教”。住院期间邻室有位鞍钢工人知道艾思奇住在病房（当时阜外无高干病房），便多次找他探讨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问题，艾思奇从不推辞。

## 1966年56岁

1月30日，出院，回家休养。医嘱：对病情在京观察三个月，如无危象，也应去外地疗养。住院和回家休养期间，仍有校刊送审稿，并常有同事来谈话，家人阻拦无效。

3月7日下午6时，应胡绳电话约去钓鱼台谈事，晚饭后去钓鱼台，午夜发生心绞痛。8日清晨，请阜外医院大夫会诊，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再次住院。经大力抢救，危象好转。22日晚，因急性心力衰竭，与多种合并症，于21时与世长辞。终年56岁。

3月25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送了花圈，文化理论界名人郭沫若、李四光等等，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为主祭人，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致悼词。在悼词中，毛泽东亲自加上：艾思奇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说明：**

在以往所出的年谱中，由于出书仓促和资料所限，有诸多不足。为此我们尽力调研，务求简明而又详实，但仍难免疏漏。艾思奇生平暂以此为据。读者如发现还有新的资料，或不当之处，欢迎多加指正。

**国家项目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课题组**

2004年4月26日

# 编 后 记

《艾思奇全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与许多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

“艾思奇著作编委会”对于编辑、出版《艾思奇全书》作出了重要贡献。编委会的专家、学者编委们热情支持，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编委会集体反复讨论了书名，确定了编辑的方针和原则，审阅了全部书目，审定了部分重要题注，还为《艾思奇全书》写了一篇很好的《序》。编委会的正确领导，保证了《艾思奇全书》编辑的较高质量和顺利完成。

艾思奇夫人、老共产党员王丹一，还有长子李昕东等家属，为《艾思奇全书》的收集、编辑、出版工作，呕心沥血，竭尽全力。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中央党校科研部，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批准列入国家资助的中华社科基金研究课题，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人民出版社对《艾思奇全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社长黄书元、原社长薛德震、原副总编辑田士章、副总编辑张小平、哲学编辑部主任陈亚明，尤其是副主任方国根，还有夏青、田园、洪琼等许多编辑部同志，为终审清样、校对等编辑出版工作，认真仔细，精益求精，辛勤劳动。

中央党校以及函授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的许多领导和同志、专家和教授，对艾思奇遗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给予了热心的关注和支持。

国家项目“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课题组，在编辑整理《艾思奇全书》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承担了大量的具体的搜集、整理、编辑、校对等工作。

讲课速记稿的整理工作量最大，得到了许多专家、教授的帮助。参加艾思奇讲课速记稿整理、审编的有：《自然辩证法》讲课速记稿的审编，是吴义生、钟洁林教授；《辩证逻辑》、《形式逻辑》讲课速记稿的审编，是刘健能教授；《西洋哲学史》讲课速记稿的审编，是刘宏章、周桂莲教授；《反杜林论》辅导报告速记稿的整理和审编，是吴秉元、卢国英教授；《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讲课速记稿的整理和审编，是耿立、卢国英教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辅导速记稿整理，是刘德庚教授；讲课速记稿中经典著作引文的校对，是雍桂良研究员；其余所有讲课速记稿和手稿整理以及最后统改，是卢国英教授。

担负《艾思奇全书》整理、编辑、审校等大量具体工作的主要人员有卢国英、雍桂良、刘德庚、田夫教授，尤其是卢国英承担了最繁难的主要工作任务。全书资料的搜集，特别是早期的一些文章的搜集，雍桂良出了大力；朱德生、叶佐英、卢国英还到上海、云南、成都等地去搜集过资料。

沈铁锦州印刷厂的徐德瑞、张立茜、张焕荣、田全、王海林、李相如、李光等几届领导和全体工人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为《艾思奇全书》一再排印清样，精心印制，备历辛苦。

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央党校办公厅档案室，为搜集艾思奇遗著、速记稿，提供了许多支持和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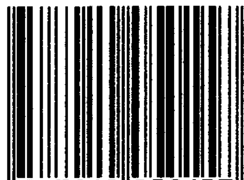
凡对《艾思奇全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给予了种种支持和帮助的专家和学者、领导和同志，我们诚挚地表示衷心感谢！

2010 年 3 月，是艾思奇诞辰 100 周年；2006 年 3 月是艾思奇逝世 40 周年。我们谨以此书的出版来纪念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

国家项目“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课题组

2005 年 6 月 26 日

于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3 号楼




ISBN 7-01-005015-5
定价:600.00 元(共八卷)